

美国中央情报局
最新秘闻

〔美〕马克·佩里著

黯然失色

東方出版社

序

正如每个政府的官僚机构一样，美国中央情报局内部的秘密斗争历史，很少为美国人民所知，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不同于其他联邦政府机关，不管你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或遭到失败，这里都可能涉及生死攸关的问题。由于一种难以预测的情况，或者一宗令人难堪的巧合，你毕生的事业可能从此受挫，甚至被断送，因此，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是个要求极高，压力很大的职业。

由于这些原因，中央情报局内部的争论经常十分激烈，斗争也非常尖锐。在过去 40 多年里，在它公开历史的每一事件中，中央情报局内部存在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斗争。这些斗争对美国政府如何收集情报和使用情报影响甚大。因为干这项工作有很大风险，中央情报局经常坚持说，它所提供的情报不受个人喜爱与畏惧的情绪所左右，也不受外界政治倾向的影响。美国人民也一直对它抱有信心，认为它所提供的情报都有客观依据，来源可靠，并根据这些事实形成美国的对外政策。他们确信这些事实不会被歪曲来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对中央情报局作为一个独立的情报机构深信不疑。

历史证实，情况并非如此。

在五十年代，中央情报局最有经验的谍报人员，在苏维埃帝国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广泛的谍报网。这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到五十年代中期，这些谍报机构大都被出卖了，许多中央情报局的第一流谍报人员，有的被处死，有的转而反对美国。后来事实证明，他们提供的情报很多是骗人的。

在冷战处于高峰的时期，情报工作的失败，造成了可怕的损失。为此，中央情报局内部一派有影响的分析人员提出，采用冒险性的间谍活动，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他们对中央情报局海外活动范围持有不同意见，引起全局对东欧和苏联的这类活动计划，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然而美国政府官员仍坚持中央情报局应该继续进行全面的间谍计划，因为共产主义对这个国家的严重威胁不容忽视。

1954 年在危地马拉反对阿本斯的政变，和同年在伊朗反对摩萨台的政变，重新引起一场内部争论。中央情报局在影响世界的事件中，究竟应起什么样的作用？有少数分析人员争辩说：这种秘密的干涉行为是非民主的，实际上有损美国的利益。但是由于危地马拉和伊朗的政变是如此之成功，致使这种不同意见基本无人理会；

五十年代中期，在西德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修建了一条很长的隧道，从美国占领区通向东柏林，通道的末端正好设在苏军总部下面。技术人员用尖端的窃听装置，装在苏联主要的通讯线路上，从隧道中取得的情报，送到情报局柏林分站，再转到华盛顿。

不幸，这条隧道刚开始工作不久就被泄露给苏联人了。了解这一失败后，中央情报局被迫抛弃它译解密码后得到的许多机密材料。这一明显的失败，重新激起情报局内部持不同意见者的关注。他们说，中央情报局夸大了苏联的威胁，同时也夸大了它们自己的能耐。然而这些人的意见又很快被另一种声音所淹没。因为当时美国正热衷于谈论可怕的梦魇般的故事，说什么美国政府被邪恶的势力以及他们的“同路人”出卖了。

耗资数以百万计的美元，用来译解从隧道中取得的大批密码资料，现在已形同废纸。这标志着中央情报局五十年代的一个低潮。尽管如此，柏林隧道行动至今仍被中央情报局的老资格人士吹嘘为一项光辉的成就。

这场有关中央情报局活动范围的内部争论，到 1961 年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那时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古巴流亡者的猪湾行动，遭到了决定性的惨败。这个行动计划的制订和执行都很糟糕。由于这次行动，中央情报局遭到国际上的谴责。原来在情报局持不同意见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他们认为中央情报局仅仅是一个收集情报的机构。还有另一部分专管计划和执行任务的官员，他们是反对入侵古巴的。现在这两种人站到一起来了。从这个情报机构的各部门里都传出了要求内部改革的呼声，可是，中央情报局只是更换了一位新局长。

在越南战争中，情报局的秘密行动逐步升级，促使这种日益增长的内部矛盾更加激化。当时的局长约翰·麦科恩希望能平息这场日趋剧烈的争论，他努力将这两拨人分开，一部分人认为越南战争不可能取胜；另一部分人则不以为然。麦科恩尽量使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成果不受那些想更深地卷入越南战争者的影响。

即使在麦科恩身边的工作人员中，也存在明显的不同意见。有些官员不同意他有关情报局参与东南亚事务的意见，并试图偷偷地绕过他的指示。例如 1963 年，麦科恩公开表示他反对把南越不得人心的总理吴庭艳赶下台的计划。吴庭艳最终还是被推翻了，中央情报局的人帮助制订了这次政变的计划。

麦科恩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破坏了他作为中央情报局长的威信。积极分子们公开表示，如果换掉麦科恩，中央情报局将在赢得越南战争的过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后来有些官员甚至暗示说，这些积极分子参与了把麦科恩赶下台的活动。1966 年中期，麦科恩被理查德·赫尔姆斯所取代。

中央情报局卷入越南战争，加剧了它内部的分歧。那些一贯主张应该积极参与秘密行动的派别，在 1967 年中期，暂时占了上风。在那一年里，中央情报局扩大了训练南越特种部队的活动。这些小分队被派去执行特殊重要的任务：捣毁越共的“下层建筑”，指南越起义军的政工部门。到 1968 年底，西贡的情报站拥有将近 1,000 名中央情报局的谍报官员。中央情报局的影响遍及越南每个省、村和寨。

关于扩大中央情报局在东南亚作用的决定，在局所在地兰利引起了爆炸性的辩论。愈来愈多的批评者争论说，中央情报局违背了它原有的使命，并破坏了它自称的客观性。多年来，这些持不同意见者强调指出，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们一直在说美国不可能也不会赢得这场在印度支那的战争。现在，由于开始参与了后来称为“凤凰计划”的行动，中央情报局正在使自己卷入这场不可避免的失败中去。

理查德·赫尔姆斯试图在这两种对立的意见中取得微妙的平衡。他辩解说，只要按中央情报局的传统做法，把谍报工作、准军事行动和情报分析区别开来——换句话说，将那些支持战争的人和反对战争的人区别开来——中央情报局作为美国政府可信赖的和有价值的机构，仍然可以保持它的这一地位。

赫尔姆斯这种把西贡站执行的政策与在兰利的反对者区别开来的战略，最终与林登·约翰逊总统对战争的承诺发生了矛盾。到了 1969 年，在中央情报局内，对这场战争的不同意见逐渐平息，但这是付出很大代价的，就在六十年代末，开始有大批工作人员提出辞职。

尽管压制不同意见取得了成功，但中央情报局内那些出言直率的积极分子，再也没有重新获得在越战初期的那种权势。到了 1975 年，中央情报局遭

到美国国会和公众很大的压力，要求公开它最肮脏的秘密。在美国发生了它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后，国会举行了听证会，审查它那些违法的勾当。这些听证会上，反映了中央情报局内部长达 20 多年之久的斗争。1970 年中期，这些丑闻暴露后，中央情报局进行了一些改革，目的是使中央情报局对国会负责。情报局经历了一个自我反省的时期。但如前 25 年间进行的那类争论始终未见衰退。从 1976 年开始，有些保守派对中央情报局施加新的压力，他们认为中央情报局的主要任务已被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抛弃了。人们批评他，说他代表高新技术的侦察卫星代替中央情报局一贯积极主动的工作传统。

情报局内部的辩论这时已成为公开争论的题目。在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上，第一次局长实际上和局里那些最直率的改革者站在一边。一批资深的情报人员，在特纳任期内被迫退休，另一些则调至争议较小的工作岗位上任职。这种做法被许多人说成是对行动部传统的直接攻击。行动部是专做谍报工作和从事秘密活动的部门。

特纳这种偏离依靠人来进行谍报工作的做法，在兰利起了涣散人心的作用。即使那些对中央情报局过去激进的做法持公开批评态度的人，对局长这种过分重视依靠技术搜集情报的方法也感到不安。这种普遍的怀疑态度，造成这样的结果：情报局一向最受重视的谍报工作积极分子的意见，不再被全盘否定了，连他们的传统反对者也不完全否定他们的看法。

里根当选后，威廉·凯西接管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他扭转了这种趋势，并发誓要重建行动部。他试图把一种新的积极主动的行动意识注入中央情报局，但这种做法很快遭到了反对。对该部的有些高级情报人员以及情报部的许多人来说，凯西的有些主意太危险了。一部分负责行动计划的官员和分析员，原来还希望在特纳任期内能采取一点冒险的行动，可现在，在凯西提出的丝毫不加掩饰的建议面前，反而感到望而生畏，却步不前了。

这些官员并非不信任凯西，他们不过是认为，假若凯西要扩大中央情报局在海外的行动计划，除非里根总统和情报局长可以设法修改国家法律，使这样的做法成为可能。他们担心像以前那样，中央情报局的一些积极行动被公开披露，造成一代人的事业和生活毁于一旦，而这些人，只不过是尽心竭力地执行了白宫的命令，他们不希望重蹈覆辙。

凯西仍坚持己见，并得到很大一部分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人员的广泛支持。于是，中央情报局扩大了它海外的行动。接着中央情报局经历了一系列的险情，在它历史上还从未有过，时间长达 6 年之久。1983 年，情报局训练的游击队，炸毁了尼加拉瓜的港口。1984 年，中央情报局驻黎巴嫩贝鲁特情报站站长威廉·巴克利，被绑架并遭到酷刑。1985 年末，中央情报局帮助里根的白宫，把武器运送给伊朗的温和派，最后，在 1986 年，尼克松任总统以来最严重的丑闻被揭露了，这就是将出卖上述武器所得的利润转交给了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后面简称伊朗门事件，或伊朗门丑闻。——译注）1986 年底，威廉·凯西病倒了。

公众对中央情报局在伊朗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进行的辩论，以及威廉·凯西之死这两件事常被有些人引用，作为中央情报局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事实并非如此。45 年来，中央情报局作为美

国政府主要的情报搜集机构，一直保持着它这一地位，并未因凯西之死而有所改变。

在 1987 年 5 月，威廉·凯西的葬礼之后，对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外交政策

中应起什么作用，争论更加激烈了。围绕这个问题的论战又进行了4年。在这期间，威廉·韦伯斯特被委任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布什当选为总统，罗伯特·盖茨任情报局副局长，地位一直上升，直到他在白宫最后并在中央情报局内均拥有巨大的权势。

在这几年里——从凯西的葬礼到盖茨的得势——这些官员，以及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总部的一些官员，主持了美国有史以来情报工作中最革命性的变革。ECLIPSE

内容提要

《中央情报局最新秘闻》是在采访了该局的高层知情人士，并阅读了一些绝密文件以后写成的。它研究的是中央情报局从威廉·凯西死后到罗伯特·盖茨宣誓就任新局长中间的这段历史。人们对美国在海外进行的秘密行动已经有所了解，但对书中所讲的中央情报局的内部斗争却了解极少。正是对这一主题的描写，使全书充满了爆炸性和危机感，读起来颇有新意。

书中谈的主要事件包括：泛美航空公司，103班机的被炸，抓获曼努埃尔·诺列加，粉碎阿布·尼达尔的恐怖主义组织，伊朗门事件的政治影响，苏联及其帝国的崩溃，批准任命罗伯特·盖茨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过程中的激烈争论，还有更为重要的是，中央情报局谍报工作成果的“政治化”问题。这本书还在以下的一些事件上，提供了许多详尽的新材料：

- * 中央情报局如何向萨达姆·侯赛因提供有关防务方面的情报，他后来在伊拉克战争中，如何利用这些情报来迷惑美国轰炸机。
- * 乔治·布什如何损害中央情报局的独立性。
- * 中央情报局在插手天安门事件中的作用。
- * 为什么白宫不理睬关于伊拉克将侵犯科威特的情报。

《从乔治·布什、威廉·凯西、威廉·韦伯斯特一直到罗伯特·盖茨，《中央情报局最新秘闻》一书描写了这几位局长任期内的成功与失败。本书作者认为，中央情报局所做的一切应是代表美国公众的，公众相信中央情报局有能力保护他们，并向他们提供客观正确的情报分析。但可悲的是，它常常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马克·佩里是一位曾经获奖的美国新闻工作者，他专写调查研究性质的新闻，是《四颗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美国军方》的作者，曾为《华盛顿邮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和《新闻日报》等十多种日报和刊物撰稿。

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新秘闻
黯然失色

第一部分：巫师

1 对拉希德的惩戒

他们从未想到他会这样死去。在他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6年里，威廉·凯西显示出各种衰老的迹象。但在他的同事中，很少有人相信，他特有的那种活力，竟被人们常见的顽疾癌症所耗尽。没有任何预兆。事实上，在1986年12月，一个晴朗的冬天早上，当凯西走进情报局他的办公室时，他看起来比过去几个星期显得更好一些。他的同事现在说：他当时也许略显疲倦，但并不比平时严重。几分钟后，在中央情报局的阿韦尔·撒普医生给他做体格检查时，他的右臂有些微颤，左腿也有同样的症状。凯西凝视着医生，接着困惑地眨了眨眼问道：“我怎么啦？”几分钟内，他的助手们匆匆将他送上救护车，十分钟后到达乔治敦大学医院。

第一个临床报告说凯西会康复的；在他脑子动手术取出一个瘤子以后，送来了第二个报告，说他短期内将失去工作能力。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医疗报告了，大家都很清楚，凯西已经生命垂危了。他于1987年5月6日去世。

对他最接近的同僚来说，凯西是一个光荣的骑士，理想的间谍头子，是这种值得骄傲的职业的象征。中央情报局中的某些高级情报人员，也有和他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当他的建议提得太出格时，他们和他激烈争论，同时他们也很害怕他那种象火山喷发一样的坏脾气，和他那种令人不安的、总是不断提出愈来愈高要求的癖好。但是他们很佩服他完成自己使命的那种方式。

他们深知这位面上略带微笑，走路有些弓腰的老战士（他穿着不太合适的条纹套装，活象个退了休的投资银行的老板），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那些对他不甚了解的人说他城府较深，但与他每天一起工作的人，却被他那种令人释然的直率态度所吸引。大家几乎一致认为，中央情报局自从五十年代艾伦·杜勒斯任局长以来，还没有象他这样一位局长。人们从威廉·凯西身上可以看到中央情报局的威力。

与此同时，凯西也有他的弱点，他似乎意识到他一不留意，他在纽约昆士区里从小养成的习惯和作风就会故态复萌。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经常不停地忙碌着。他一会儿从情报局后面的楼梯下来，去到六层楼的东亚处；一会儿又跑到五层楼科技部与工作人员起劲地谈论问题；然后又到位于大楼深处的电缆通讯秘书处办公室。最后，他钻进高级轿车到附近的技术实验室去会见那里的科学家，了解他们使用卫星尖端技术的情况。在汇报会上，他认真听工作人员的发言，他头倾向一边，嘴略有些歪。他不论走到那里，都表现出信心十足。他说话很快，笑起来有些古怪，当他离开的时候，人们搞不清楚他到底讲了些什么，但他们都很喜欢他，并且对他向大家表示的信任和关心感到满意。

当里根总统任命他来领导中央情报局时，他已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了。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律师，并且拥有不少人们所羡慕的股票。他颇醉心于股票生意，每天早上当他进入兰利七层楼办公室时，身后跟着瘦长的，戴墨镜的保镖，臂下夹着一份当天的《华尔街日报》。这是每天的一个重要时刻。庄每日的例会后，他总要睁大眼睛看一下道琼斯指数。只有在完成这项读报任务之后，才从他办公室的沙发上起来，开始一天的工作。犹如一座年代悠久的教堂一样，他的作用不会过时，尽管他的眼窝深陷，脸上布满老人斑，走

路时脚步有点拖拉。秘书们由于不大听得懂他的话，记录他的发言时总要汗流浹背；他讲话时嘴有点歪斜，有时淌涎水。但凯西气喘吁吁的发言和他弓腰曲背的形象，仅仅是一个虚假的外表，在它的背后，则是他的坚强和威严，人们好像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古代战争中英雄的业绩。

1987年5月的一个明媚的早上，当凯西的家属、朋友、同事排着队进入长岛罗斯林港的圣玛利天主教堂时，他们都怀着一种难以置信的心情。头年的12月15日，在他的七楼办公室里，他突然患脑溢血，当时就昏厥过去。来教堂的许多人，如果得知凯西当时正在为他的前列腺癌接受治疗，将会感到十分吃惊。这个事实，除了他最信赖的朋友，别人都不知道（他告诉了里根总统）。正由于知道他的生命快要结束，他更加拚命地工作，当发生脑溢血时，他还担负着很沉重的工作担子。

为凯西举行葬礼的准备工作从清晨就开始了。当地的警察最先来到现场，他们为数不少，将通向教堂的道路封锁了，并检查来人是否带有通行标志，以便使好奇的围观者不能接近教堂。通往圣玛利教堂正门的那条长长的，两旁植有树木的布赖恩特大街也被堵死了，目的是为了给约300名贵宾腾地方。随后来的是一队秘密保安人员，他们经过富人居住区，然后不声不响地通过教堂的中心，进入了二楼的楼厅。不久，第一批吊唁者到来了。

里根总统被引进来，他没有说话。接着，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也来了。他脸上出现了他特有的微微忸怩不安，不大自然的微笑，他立即意识到自己不应该笑，没有讲一句话就进了教堂，在里根夫妇旁边坐下来。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和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他俩在某些问题上曾和凯西有过严重分歧，这时都阴沉着脸走进来，然后在里根夫妇后面的一排长椅上坐下。罗伯特·盖茨因为他和凯西的关系密切，致使他失去当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机会，他坐在附近的长椅上。最后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此人很快将接替凯西的职务，他和其他官员在教堂前几排悄然就座。

华盛顿官员就座的次序是根据标准的礼仪次序。公职人员坐教堂的左边长椅，总统和夫人坐第一排，内阁成员坐第二排。后面就坐的是国会议员。凯西在中央情报局的朋友、同事坐在中间和后排，他们穿着一抹黑色的衣服，形同一片黑海。教堂右边前排长椅留给家属和朋友，凯西的遗孀和她的女儿、女婿以及家庭的朋友，包括他在纽约任投资和税收律师时的亲密合伙人。记者挤到了教堂的楼厅里，他们从那里费劲地设法识别出席这次集会的每一位重要人物。外面还有一些群众被阻拦在警方设置的障碍物后面，还有一大群凯西的朋友呆在地下室，通过扩音器来收听吊唁仪式。

凯西的葬礼相当隆重，尽管没有出现那类常见的高度悲剧性的场面。当天唯一的争论是罗马天主教堂的主教约翰·麦干引起的。他向吊唁者说，他对中美洲发生的暴力战争感到遗憾，然后他轻微地指责他结交了一辈子的老朋友，批评他不断支持反政府武装的行为。他说“当我们一贯反对那些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所引起的中美洲暴力冲突时，比尔一定认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半球上存在着共产党的潜在威胁”。这位主教在他的悼词中还指出，“这并非区区小事上的分歧。这是一些生死攸关的大事。对一位我所了解并尊敬的人，我不能隐瞒和掩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麦干的这段话，立即引起楼厅上人们的不安和骚动，新闻记者们从他们上衣口袋里取出笔和笔记本。当晚的全国新闻广播和第二天报上头版关于葬礼的综合报道中，都把主教的话放在突出的地位，成为悼念凯西一生的追悼会上人们记得

最清楚的一件事。

与麦干针锋相对的是一个强硬的保守派，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她在过分溢美的颂词中赞扬凯西为摧毁共产主义而献出他的一生。她的讲话是一个完美的象征，它全面地反映了凯西的那种义无反顾、毫不留情的、天主教徒的反共精神。她的发言尖锐地驳斥了最近以来对凯西进行批评的人。“这些人对他们的评论不会使我们的朋友感到不安，”柯克帕特里克用蔑视的口吻说。“支持尼加拉瓜的自由斗士对他来说是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和它相比，他更优先考虑的还是法律。”为了加强发言的效果，她停顿了一下，目光向听众扫了一圈，然后援引了凯西说过的话，他宣称自己在天国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他用这个话来维护自己的观点。“他完满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并且以一种随时作好准备、并且不怕邪恶的精神离开了这个世界。”

凯西的葬礼由于麦干和柯克帕特里克的分歧而有些减色；参加葬礼的人好似来向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表示敬意。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对凯西最初的赞词逐渐减退，人们开始对他的事业有一个更客观的评价。只有当凯西的突然死亡，使他在伊朗门事件中的作用消失的时候，才显出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的赞扬——把他作为一个尊重法律的人来加以怀念的辩词——似乎是对他的一生作了一个不恰当的总结。这个颂词原本为凯西作最有力的辩护，但它却说明了为什么凯西在情报工作上的看法经常受到怀疑——甚至包括他最接近的同事在内。尽管他们当时没有说话，凯西在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助手后来承认，他们对凯西常常不顾一切地去反对共产主义的劲头，以及他对出现冲突的无限渴望，感到困惑不解。他们说，凯西的讲话中有某些东西给人以奇怪的、令人不安的感觉。他们回忆说，不至一次，当凯西提出一些建议的时候，情报局的这些高级谍报官员们都偷偷地交换眼色，表示难以置信。

凯西在兰利的6年任期中，从事秘密行动计划的官员们，在若干关键性的事件上，曾公开警告他要小心谨慎。当他们这样做起不了作用时，他们就绕过他，不去执行他的命令。最初凯西不懂为什么他手下的人不愿意执行他的某些计划，他归咎于他的前任，认为这是在士气低落的年代里遗留的后果。可是过一段时间以后，凯西的沮丧情绪加深了。由于关系紧张，使他和那些最有经验的同事们疏远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官员对凯西之死，心里感到特别不安；他们在常有争议的6年里，为他服务，为他辩护，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们违抗了他的旨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命运作了这样巧妙的安排：正当要他在伊朗门事件上公开出庭作证的时候，他死了。但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并不在乎伊朗门事件是否符合他的宏伟设想，他更在乎的是他的手下人不愿意按照他的意志行事。经过几年和他们打交道，他相信有几名重要的行动部情报官员，对他有意设置障碍，他就亲自动手去干了。

他感到被人欺骗和背叛了，他几乎不能相信，他所设想的中央情报局竟然不听他的使唤。于是，凯西物色到一个无所畏惧，什么事都肯干的军官。有这样一件事，使凯西相信了奥利弗·诺斯才是他所需要的那种积极肯干的爱国者，但这件事本身与伊朗或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却无直接关系。中央情报局若干秘密谍报官员，在凯西葬礼以后很久，回忆往事时说，他们确信伊朗门事件早在凯西对一个年轻阿拉伯人的活动发生兴趣时就已经开始，这人名叫穆罕默德·侯赛因·拉希德。

中央情报局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们很清楚拉希德其人。他们甚至在行动

部高级保密档案中保存了这个人的一些照片。情报局曾花了3年时间搜集有关拉希德的情报，并将他们的调查结果通知他们在欧洲和近东的情报站。中央情报局还把这些材料的副本送给国务院，国务院又把它分送给世界各地的美国大使馆。情报局的官员们常常在自己人中间就此事开玩笑，当他们最后在拉希德问题结案时，他们笑着说，他们对拉希德的了解和拉希德本人一样的多。他的档案上说：“他于1949年4月24日生于约旦，身高5英尺8英寸至10英寸之间，身材细长，有一头微卷的黑发，前额头发偏后，眼睛棕色。”在七十年代初，拉希德由于做毒品买卖被判过刑；他撒谎成性，并经常犯些小案，同时利用他不寻常的漂亮外表去欺骗一些天真的人，借此为他自己，也为他的信仰服务。拉希德是个聪明的，充满信心的世界旅行家，他在欧洲和中东社会里都颇能应付自如。到八十年代初期，他学会了制作炸弹的本领，技术十分娴熟，致使他在八十年代初期被视为“世界民航的祸害。”

早在他向西德一个名叫巴德尔·迈霍夫的黑帮学做炸弹的时候，中央情报局就开始对他进行监视。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央情报局往西德派去一个监视小组来跟踪这位年轻的巴勒斯坦人。另一组官员则忙于纪录和整理他和中东激进的巴勒斯坦人的联系。尽管中央情报局成功地追踪了他的行动，但总预测不到他袭击的目标，也截获不了他的炸弹。此人特别危险，不仅由于他极端忠实于他的事业，而且在技术上十分高明。他在巴勒斯坦炸弹制造者阿布·易卜拉欣帮助下，把炸飞机的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它更尖端，危害性也更大。在八十年代初，他和易卜拉欣首创一种隐蔽得极好的手提箱式炸弹，比早期原始的炸弹危险得多，引爆使用的电池藏在手提箱的假夹层里，并装有一个由气压变动来引爆的装置。这是一种致命的结合物，使炸弹无法侦破。（民航公司的保安人员一直无法对付拉希德简单而聪明的新方法，就连使用专门训练的狗，都无法从用环氧树脂包的炸弹上嗅出化学品的残留气味。）中央情报局发现，拉希德的才能是为一个名叫“5月15日集团”的激进组织服务的，这个集团的基地在巴格达。

1982年8月11日，从东京飞往檀香山的一架泛美航空公司830班机上，拉希德安置的一枚炸弹爆炸了。从此，他以一个国际恐怖主义分子闻名于世界。这颗炸弹杀死了一个16岁的日本公民，并炸伤了15人。事件的报告材料上说：炸弹安置在一个叫小泽的青年座位下面，“它是被自称为哈鲁克的摩洛哥家庭成员所携带的，他们与小泽坐同一排座位，从东京飞至香港。”材料又说，这个家庭实际上就是拉希德、他的妻子和他们年轻的儿子。

泛美航班事件引起凯西的勃然大怒，他要求行动部采取措施，摧毁“5月15日集团”。炸机事件是凯西出任中央情报局后，第一件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活动，因而显得格外重要。凯西认为拉希德事件是对他个人的一种侮辱，好像这一事件是专门为了使他难堪似的。但凯西坚信，中央情报局的行动部有能力使拉希德受到应有的惩罚。此人是个已知的国际旅行者，与中东和北非都有广泛的联系，他使用的作案方法也是可以预测的。

拉希德经常和他奥地利籍的妻子和年轻的儿子一起旅行，这样就很难抓到他，因为机场的保安人员很少怀疑，也不会拘留一个体面的显然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家庭。当中央情报局试图追踪拉希德，并将他的活动通知中东和欧洲情报站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巴勒斯坦人总有办法逃脱他们的追踪。

在泛美航班爆炸事件两星期后，又出现一个新的线索，当时有一架从迈阿密飞向里约热内卢的班机，服务员在机座下发现一枚未引爆的炸弹。在几

小时内，中央情报局的爆破专家就把炸弹和拉希德联系起来。在以后的一年里，中央情报局加倍努力地去寻找拉希德，与此同时，行动部负责近东事务的官员做出并执行一个试图摧毁“5月15日集团”的计划。到1982年末，情报局的这些行动获得了显著的效果，他们弄清这个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并且招募了一个专门携带炸弹去欧洲的巴勒斯坦商人为情报局服务，他的代号是“MJ假日”。这位商人兼炸弹携带员证实了两名“5月15日集团”的高级行动人员，他们的代号是“MJ铁克1”和“MJ铁克2”。突尼斯国际机场的保安人员在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手提箱里发现有一枚炸弹。此后，MJ铁克1和MJ铁克2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将中央情况局的人引到北非某城市的一个地窖里，那里专门贮藏着拉希德式的手提箱炸弹。

这一发现使中央情报局行动部大为吃惊，拉希德不但贮存了大批手提箱式炸弹，并且这种炸弹根本无法侦察出来。这种炸弹都装在日本制造的收录机内（它们的气压表和引爆装置巧妙地隐藏在收录机的喇叭后面），或者设置在手提箱的缝线里。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拉希德改进炸弹的制作和隐蔽方法，应当看作是恐怖主义者进行的技术革命。他们相信拉希德和易卜拉欣将会制造出一种根本无法侦察出来的炸弹，甚至机场上最敏感的X光机都无法跟上他们的革新创造。中央情报局没收了拉希德在突尼斯的炸弹库，但没能截获贮存在欧洲的不似那样尖端的炸弹。

“假日”给情报局提供了有关恐怖主义活动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情报。他还准确地透露了“5月15日集团”派出了一名炸弹携带者（代号是MJ铁克3）去瑞士日内瓦，他的任务是在诺加的希尔顿饭店里放一枚炸弹。“假日”提醒说，要制止这个行动恐怕已为时太晚了。中央情报局非常幸运，由于铁克3的胆怯，在引爆前，他痛哭流涕地向瑞士情报官员自首了。瑞士方面把他交给了美国人。中央情报局马上派了一个审问小组前往日内瓦，他立即承认炸弹是阿布·易卜拉欣亲自交他的。炸弹的引线设置在手提箱的接缝处，与拉希德的制作方法完全相符。情报局官员估计，如果不是他自己坦白，炸弹的爆炸力能将饭店最上面的几个楼层掀掉，这场灾难将使数百人丧生。

1983年的秋天，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得知葡萄牙官方由于拉希德参与了谋杀巴勒斯坦温和派伊萨姆·萨尔塔维博士而被逮捕。这位温和派人士是在阿尔布菲拉度假城的旅馆前被害的。拉希德承认他参与了谋杀，但不是他亲自动手的。中央情报局对把拉希德捉拿归案表示庆贺，但这种高兴的情绪又被伊萨姆博士的被害冲淡了，因为他的身亡，挫败了美国政府的计划，它原想通过他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扩大温和派的影响。他并不是拉希德与他同谋人所称的美国特务，而是中央情报局尊敬的人物，他们一直关心他的事业。（中央情报局一位资深的官员说：“他是一位非常勇敢的人。”）

拉希德被葡萄牙法庭宣判为参与了谋害萨尔塔维博士的罪行，判了3年徒刑。但尽管拉希德已关进了葡萄牙监狱，他的手提箱炸弹仍然在起作用。1983年12月，伊斯坦布尔机场的保安人员截获了一枚拉希德创制的炸弹，致命的装置把爆炸时间定在从伦敦转到飞往纽约的泛美航班起飞8小时后，即在快抵达终点站肯尼迪国际机场之时爆炸。

在发现伊斯坦布尔的炸弹后，紧接着中央情报局雅典情报站的一名特工人员，又在一位年轻的英国妇女居住的寓所里，发现了“5月15日集团”使用的爆炸物。他破门而入，拍下了手提箱的照片，并把罪证交给希腊官方。

他还发现这位妇女花盆里也藏有爆炸物。后来证明这位妇女是好几起预谋爆炸案的不自觉的同案犯。她是巴勒斯坦激进派谢拉·福阿德·侯赛因的女朋友。谢拉是拉希德的同谋犯，他的下一个目标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班机。希腊当局逮捕了谢拉，并对他进行了审讯，从而避免了更多的灾难。谢拉的被捕，拉希德在葡萄牙被监禁，以及突尼斯发现拉希德式的炸弹，大大地减轻了行动部的压力。在凯西多次唾沫飞溅的训话中，大谈中央情报局这种无法解释的无能，其目标是针对行动部的。

虽然凯西批准了打入和摧毁“5月15日集团”的计划，但他对计划实际能起什么作用抱有怀疑。他竭力促使行动部采取更积极的办法对付恐怖主义分子。在一次汇报会上，凯西激烈地主张必须绑架拉希德，他说中央情报局不能信赖欧洲的情报机关来保卫美国的利益。凯西特别指出以瑞士人为例，他们显然只相信炸弹是圆形、黑色并有一根长长的引线，“就象卡通片上郊狼所用的炸弹。”

凯西愈来愈感到生气，因为他不能说服他的主要谍报官员采取极端措施去对付“5月15日集团”。到了1984年，他已形成一种固定的看法，认为他的助手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前程，而不是保卫美国的国家利益。行动部并不理会他的论点。这个部的官员们劝他要耐心，因为他们很清楚，要摧毁一个恐怖主义组织需要时间。事实上他们工作进行得并不坏。中央情报局已经发觉了好几起“5月15日集团”在欧洲的行动，并且对一些欧洲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们将这个组织的秘密活动人员驱逐出境。现在拉希德和谢拉都被关进监狱，看来中央情报局已经成功地消除了主要的恐怖主义威胁。凯西也不作声了，至少暂时这样。

1984年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希腊释放了谢拉，并把中央情报局雅典情报站的副站长驱逐出境。希腊人说，美国官员非法搜查被指控为恐怖主义分子的女朋友住所，是蓄意违反希腊的法律。在谢拉释放的几周后，拉希德也被释放了，他立即离开了葡萄牙。一位在行动部近东处工作过将近20年的前官员，生动地回忆当时的情景。这是1984年8月初的一个早上，在拉希德被释放后，凯西满腔怒火地跑上七楼，他高声吼叫，脸红得象甜菜头，脖子上的筋从浆过的白领子下突出来。令他感到沮丧的首先不是葡萄牙人，而是他自己的特工人员。“美国不能指望依靠欧洲人”，他强调说。他忿怒地谴责希腊人，说他们在一群“谋杀者”面前“屈膝投降”。最后他控制住自己的怒火，用吼叫声向他的高级助手们发布命令：行动部——实际上是指近东处——必须拿出一个绑架拉希德的计划，把他立即押送到美国来受审，这个计划要在一周内放到他的桌子上。他要近东处尽快着手这项工作，就从今天早上开始。

在凯西盛怒之下，他的助手们慌了手脚。他们知道，至少这次凯西提出要采取行动决不是诈唬人的空话；他所说的要“逮住”拉希德的话，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命令。这位局长完全有能力震慑全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权力，是里根政府被信任的少数人之一；真正使情报局官员们发愁的是凯西已经能够依靠他手下出现的一批拥护他的积极分子（他把他们称作“我的射手”），这些人非常乐意按他的意志行事。

关于凯西大发雷霆之事很快传遍情报局，特别是局里的年轻官员们，被他的建议所激怒，他们认为凯西是在要求他们去做违反法律，或者至少是进行一项未经批准的秘密行动，他们不愿这样作。因为这一代特工人员（他们

大都是 30 多岁不到 40 岁的中央情报局中层干部），正是越南战争结束，当人们对美国领导人的信任降到了最低点的时候，参加中央情报局的。他们之所以相信中央情报局，是因为情报局的领导一再做出明确的保证，说六十年代的那种过火做法，不会再重复了。

事实上，他们也并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在六层楼的小房间里，这些温和派的官员们伏在桌上，找到了一个对付凯西绑架命令的新办法。在凯西被任命的头几年里，他们对付他的方法已经日臻完善，现在仍可以搬出来用：研究工作完成了，计划做出来了，人员也派往海外了，但最后什么也不做。这些搞秘密工作的人坚持他们的立场，是有充分理由的。行动部最有经验的高级谍报人员清楚地知道，凯西的冒险计划，可能危及他们在阿拉伯世界的一些颇有价值的情报工作计划。在那里，他们的辛勤劳动已经取得了北非、中东和亚洲一些情报机关的信任。尽管谁也不怀疑拉希德是个进行大规模谋杀的恐怖主义分子，如果不加以制止，会继续进行破坏活动。但这些官员也深知，若把他劫持，其结果只能使一场恶性的恐怖活动升级。官员们还了解，这种行动是否触犯美国法律还是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因为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都没有得到授权，允许把手伸到海外去抓人。他们认为，象凯西的其他建议一样，绑架拉希德的方案是十分危险的，其效果将适得其反：即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将国会的注意力引向中央情报局。

凯西拒绝听取他的高级情报顾问的意见。每当他们无法劝阻凯西采取一些成问题的秘密活动时，他们也只好摇摇头。国会禁止中央情报局去参与这类活动，他们决心要按这个意见办。他们不愿把中央情报局推到一种危险的境地。行动部的人也不怕凯西给他们加上什么罪名，或者说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往好里说，凯西的记忆是有选择的。当詹姆斯·施莱辛格决心要整顿清理中央情报局时，他还没有来。当威廉·科尔比透露中央情报局最肮脏的秘密——谋杀、颠覆以及卑鄙的骗局——从而永远玷污了中央情报局的声誉时，凯西也不在。中央情报局的人当然再也不愿重新去冒杜勒斯或赫尔姆斯时代的那种风险。这种观点在 1984 年至 1985 年初最为盛行。只要拉希德的行踪不明，凯西也无法说服行动部采取行动。但当拉希德在苏丹出现的时候，这位局长又给他的高级谍报人员下命令，要他们做出劫持拉希德的计划。为了使他的命令得以贯彻，凯西宣布他已与法国负责海外情报的头头谈过绑架的事。

中央情报局反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官员们都被他这话吓坏了，凯西的这道命令把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外国情报局挂在一起了，而这个法国情报机构以从事危险行动而闻名。这些行动不仅非法，有时甚至非常残酷。他们对凯西的决定十分不满，还因为他们深信，法国人过去已经给美国在中东的工作制造过一些困难。例如：1979 年法国人眼看着霍梅尼离开巴黎去德黑兰，丝毫不加制止，在一边袖手旁观。而现在，凯西却要情报局的高级特工和法国人合作，进行一项绑架活动，这件事引起人们公开的抱怨。有一个搞专案的人忿忿然地说：“还说是‘友好’的情报机构，真是天知道。”从凯西的观点看，在拉希德案件上，让法国人参加进来，作为友好联络，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法国情报工作头子皮埃尔·拉科斯特，前法国海军中将，是个讨人喜欢的人，他与凯西有同样的政治观点。

1985 年 4 月，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发现法国人对绑架拉希德不那么感兴趣，他们更热衷于把拉希德和他的妻子干掉（至于他们十岁的儿子的命运如

何，从未提及)。法国人说，这将是一件困难和危险的行动，很难预测将发生什么情况——也许拉希德会无意中被击毙。这些草菅人命的法国人似乎并不关心这一事件会给美国引起什么麻烦，中央情报局很害怕不必要的动武，可能使苏丹的无辜公民遭到杀害（对中央情报局来说，更害怕的是这个流血事件将会引起国会的调查）。凯西的高级助手相信，苏丹政府也不会高兴美国在它的领土上搞绑架活动。这些高级官员最后的结论是，拉希德不值得他们去冒这个险。

与此同时，和法国人合作的那些反恐怖主义的特工人员，决定通知中央情报局的律师们，他们正在计划搞一个劫持活动。正当律师们还在研究这个行动计划时，凯西想绕过反对的意见，提前动手搞绑架活动。然而在最后一刻，由于法国人不知何故，撤回了他们的支持，才算避免了中央情报局内部的一场全面混战。后来美国几家机构（联邦调查局，联邦航空局，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逮捕拉希德的联合行动也告流产。在接到拉希德将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出现的消息后，情报局的官员在那里等候他。最后，在1988年5月30日，又收到他在雅典被捕的消息。这些官员又赶到希腊，并对该国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把拉希德无限期拘留，直至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

对拉希德一案的处理，典型他说明了凯西的作风。但这仅仅是他在6年任期中，行动部官员所遇到的若干问题中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些更棘手的问题。所以1987年5月在凯西的葬礼上，一些高级情报官员感到如释重负，因为他们再不会为这些问题伤脑筋了。在那些向凯西最后告别的人中有戴维·惠普尔，此人曾担任过陪同这位已故局长出席国会这件不讨好的任务。这是惠普尔漫长事业中最令人丧气的经历之一。这位高高个儿，讲话直率的老战士，在他参加情报局30年工作中，曾参与过几项海外的危险使命，但其风险程度却无法与凯西向国会提出的要求可能招惹的险情相比。凯西当时以国家安全为名，提出了一些过分的要求，实际上他在国会出现时，常把实情夸大到不可置信的地步，目的是使他和中央情报局，在复杂的情报问题上的主张，能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每当凯西完成他在国会的作证，回到情报局后，就该轮到惠普尔去修补他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另一位高级职业情报官员也有类似的经验。他说，1986年凯西在国会监督委员会上言词过于激烈，迫使他不得不采取一种策略，设法取消凯西的一些过分要求，但同时又不致引起人们对凯西的能力产生怀疑。当凯西作证完毕离开后，他的助手通常留下来对他的发言要点作些补充说明。这时助手的发言，实际上是有意冲淡凯西说过的话：这个助手首先要表示对局长所说的话完全同意，然后，请监督委员会谅解局长是处在什么样的压力下才使他作这种发言的。情报局的发言人经常用一种间接的方法对凯西的证词表示歉意，说凯西因为承受过大的压力才使他无意识地说出了一些过分的话。每当他的助手被那些惯于要表现怀疑态度的委员们攻击时，他就佯作生气，争辩说委员会对凯西的发言过分吹毛求疵，还说凯西的发言原则上讲是对的，你们委员们也知道，即使完全确定的事也不一定绝对可靠，如果你们要求提供这么多细节，那就不是凯西过分，而是你们太过分了。

惠普尔也承认：“与国会之间总存在着问题，而且情况愈来愈严重。我们只得去找他（凯西）说：‘听着，这次你去那儿，只是去回答问题。’但这也不起什么作用。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凯西并没有说谎，一点也没有，他

仅仅向委员会讲了威廉·凯西的观点而已。”

在凯西死后，那位经常陪他去国会的高级官员回忆这项微妙的任务时，承认他用以保护凯西的那种战术，失败多于成功。最令人难堪的一次是，凯西任局长后不久，他当时对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说：中央情报局已得到证据，证明苏联在财政上资助和训练国际恐怖主义分子。这是他阅读了克莱尔·斯特林 1981 年出版的一本名叫《恐怖网——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秘密战争》的书以后，从这本书里接受的一种看法（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得到此书的一份长条样，觉得很有兴趣，故转给凯西阅读）。在凯西的坚持下，中央情报局专门研究恐怖主义活动的分析人员和苏联问题专家，仔细分析了斯特林的论点，并且责成一个小组就这个问题准备一份国家情报专题评估。根据大量搜集的情报和私下访问第三世界的一些重要情报来源，这份评估报告对斯特林的论点作出了一个反证。评估的结论是，只有某些证据证明，苏联向第三世界某些革命组织提供过支持。即使这一结论也是极而言之说法。写报告的人特别表明，无法说莫斯科曾给那些反对美国利益的恐怖主义组织提供任何直接的支持。评估报告中甚至提供证据说，苏联曾试图说服巴勒斯坦恐怖组织，不要针对美国采取过激行动。这份官方的结论并没使凯西认输，他仍然坚持斯特林书中的论点。

凯西完成他对国会的作证后回到了兰利，他的助手留下来回答中央情报局如何对待恐怖主义的有关细节问题。这位助手理不直气不壮地解释说：委员会显然误解了局长的意思，绝对的证据是不存在的，他又补充说，从另一方面讲，凯西还是对的。苏联不正是窝藏恐怖主义分子的那些国家的同盟者吗？这位助手坚持说：证据全在那里，人人都能见到。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把铅笔抵在嘴边，背靠着椅子，不以为然地摇着头。戈德华特是该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他不相信有什么证据，委员会的其他人也不相信。事实上，凯西的助手也不相信，更重要的是中央情报局也不相信。委员会暂告休会。

事后凯西对中央情报局的调研报告仍然极为不满。在重新审查这份研究报告时，凯西问他手下人：为什么斯特林能找到苏联支持恐怖主义的证据，而他自己的分析人员什么也找不到？他坚持让他们再仔细研究一下，可是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仍然两手空空，一无所获。“这简直是扯蛋！”这位陪凯西到国会去的高级助手回忆说：“我必须告诉委员会这一切，但又不能真正讲出来。”最后凯西也只得作罢，但非常勉强。

到 1984 年，凯西已深信中央情报局由于害怕失败和多年来接受僵化的领导，已失去了它的活力，它已经成了一个头重脚轻的官僚机构，一个被完全过时的规章制度所支配的、不起作用的力量。凯西拚命想恢复中央情报局的活力，但他在任的 4 年过去了，仍不知从何处下手才能奏效。他特别对他的高级助手感到失望——主要指那些行动部的头头，特别是那些处长们。尽管他们有多年海外谍报工作的经验，但对凯西来说，这些高级情报人员似乎连他最简单的命令都执行不了。

虽然凯西来到情报局时很少抱有幻想，并且清楚地知道在他到职前的 15 年里，中央情报局最有才能的官员们都被挖空了，他仍然对他看到的一切痛感失望。他认为行动部缺乏创造性思维，这是由于害怕公开丑闻的心理形成的一种思想障碍。到 1984 年，凯西已意识到，要搞任何一项行动计划，如果可能影响中央情报局在华盛顿的声誉，他就必须到情报局外部去寻求帮助。

卷入伊朗门丑闻中的一些情报局官员，他们也并不同意当时的许多具体

做法。他们明白凯西之所以要使用奥利弗·诺斯，目的是为了绕开中央情报局，因为那里的人不会同意去参与那种风险很大的活动。诺斯成了凯西非正式的行动部主任，是实现他激进愿望的公认继承人。在凯西眼里，诺斯是个英雄。任凭凯西和这位年轻的中校友谊日增，但一直只有少数官员知道，在白宫内部，诺斯已经搞起了一个小小的中央情报局。直至1985年，中央情报局的人才第一次被拉去参与诺斯向伊朗秘密运送武器的行动计划，为他提供后勤保障。凯西向行动部的官员下达命令，要他们保证支援诺斯的行动，因为他的这个行动计划是经白宫批准的。

这个严密圈子里的官员，对这个计划是否明智深感疑虑，但他们必须按接到的指示办事。中央情报局是为总统工作的，他们是为局长工作的。对这个圈子内的人来说，他们明白，不应该多问。在丑闻公布后，近东处副处长托马斯·特威腾在供词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忿然地说：“我要向你们说清楚，调查诺斯中校不是我的任务。”言下之意，他希望曾有人对他进行过调查。

克莱尔·乔治是中央情报局行动部副主任，也是行动部秘密工作计划的头头。他对凯西和诺斯的行动也抱有怀疑。乔治毕生从事海外情报工作，对凯西的判断形成了一个基本上不信任的看法。乔治当然也得听从局长的命令，但他不断地对这些命令提出疑问。乔治的这种观点，也是他在与凯西密切接触中形成的。早在1982年，这位在行动部做过二十多年秘密工作的乔治，被凯西任命去负责与国会联系，从而使他的事业受到挫折。正如很多人预言，这一任命是一种灾难。乔治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养成了少言寡语的习惯，而他的这项新工作要求他具有坦诚布公的态度，这就让他很难适应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怀疑他这种不愿向任何人多谈情况的态度，是他对民主原则不尊重的一种表现。其实他们的看法错了。一般来说，乔治是个热忱、正派和勤奋工作的人，但由于凯西坚持自己的观点，从而使他的锐气消耗殆尽。

1984年7月，乔治终于被任命为行动部副主任，这是他事业成就的顶峰，并且这项工作对他非常适合。但在第二年，当他知道在凯西的指使下，他得与曼努切尔·戈尔巴尼法尔发生联系时，他十分反感，因为此人毫无信义可言，被人视为骗子。

戈尔巴尼法尔是个矮胖、留着大胡子、讲话很快的伊朗商人。他自1979年起一直在法国过着流亡生活。他过去曾与中央情报局有过接触。行动部的官员都说他是个“造谣大王”，一个“天才的胡诌者”。中央情报局档案上说，他提供的情报“一贯缺乏来源和细节，可他感兴趣的是捞钱。”不管怎么说，1985年凯西决定要认真对待他，因为最近戈尔巴尼法尔在和中央情报局的接触中，声称他和伊朗内部的温和派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凯西并不是唯一认为戈尔巴尼法尔能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的人，以色列情报组织的莫萨德也把他说成是一个可以提供有关伊朗政府内温和派可靠情报的人。这些温和派欢迎和美国打开关系。以乔治为首的中央情报局行动部专家，根本不同意凯西和以色列人的看法。为了证实他们的说法，情报局的官员们在1986年1月，通过测谎器对戈尔巴尼法尔作了一次测验。测验结果证明，他除了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外，其他都是撒谎。凯西并未因此感到不安，正如1981年他舍不得抛弃斯特林一样，1985年他舍不得放弃戈尔巴尼法尔。当乔治告诉凯西，他和戈尔巴尼法尔打交道感到十分腻味，但又不能不去时，凯西说他可不必自己去，可以指定别人与他联系。查尔斯·艾伦是中央情报局反恐怖活

动专家中的佼佼者，是个老资格的中东问题分析员，这个任务便交给了他。凯西和白宫着意要打通伊朗的关系，行动部的特工人员为此目的所做的各种努力中，戈尔巴尼法尔还不是他们面对的唯一问题。另一个人是理查德·西科德，他是一个已经退休的，政治上保守的空军将领。他承认，他想有朝一日取代乔治，当上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头儿。他的愿望纯属幻想，因为八十年代初，由中央情报局的叛徒埃德·威尔逊所指挥的非法向利比亚出售武器的行动，使西科德受到了牵连，他只得被迫退休。但他一直在若干国际买卖中，成功地利用他掌握的伊朗知识，从而使他能继续插手有关伊朗的事务。西科德的合伙人是一个伊朗裔的美国人，名叫艾伯特·哈基姆，此人是个眼神机灵的小个子，很会赚钱。中央情报局军事联络科保存的哈基姆的档案上说：他是一个“有广泛国际联系的商人”，情报局的人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在得到好处的情况下，他才会帮美国做些事。在中央情报局高层情报人员中，没有人愿意和西科德、哈基姆打交道，但他们无权选择；这两个人都是诺斯手下的行动官员。

1985年11月，凯西指定中央情报局负责欧洲秘密行动计划的德韦·克拉里奇去帮助诺斯疏通一条非法供应武器的渠道，以便将一批陶式反坦克导弹从以色列通过里斯本运往德黑兰。克拉里奇和诺斯是朋友。几年前，当克拉里奇在执行有关拉丁美洲的工作计划时，他们就认识了。当时克拉里奇通过诺斯不断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诺斯实际上是克拉里奇在白宫的交通员，是个多面手，他对秘密工作的喜爱不亚于他在中央情报局的朋友。克拉里奇是个白头发的，衣着华丽的专案情报官员，他有25年特工工作经验，他是一个独特的人物，具有传奇色彩。他很聪明，精力充沛，能说会道，抽烟时爱吐烟圈。他常穿黑色西装，系粉红色领带，上衣口袋里还露出一块漂亮的手绢。他是个标新立异的行家，但另一方面，他又不爱出头露面。他的伪装就是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打扮上。在他下面工作的人这样解释：没有人会把这种穿着打扮的人看作是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的同事很了解他真正的力量所在：他是从事秘密行动计划的天才，好象他生来就喜欢这一行。

凯西很信任克拉里奇，后者是他所喜欢的少数几个处长之一。早在八十年代初，克拉里奇还是驻罗马情报站站长的時候，凯西就发现了，后来，在凯西的指使下，提升他为拉丁美洲处处长，接着又负责欧洲所有的谍报活动。克拉里奇在中央情报局内是与凯西个人关系很好的少数官员之一。凯西很重视他对中央情报局前途的看法，特别是他对恐怖主义在阿拉伯世界造成威胁的观点。克拉里奇是在近东处锻炼成长起来的，正如克拉里奇过去手下工作过的一名专案人员所说：“他是个地道的‘近东通’。”由于他有长年在海外工作的经验，他一直保持阿拉伯问题专家的身份，受到人们广泛的尊敬，所以当诺斯在伊朗问题上需要帮助时，凯西很自然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从1985年11月起，克拉里奇就开始和诺斯在伊朗问题上一起合作。

紧接着克拉里奇犯了一个少见的错误，致使他在事业上遭到致命性的打击。1985年11月下旬，当那位退休将军西科德找不到飞机从特拉维夫通过里斯本把武器送到德黑兰时，克拉里奇把中央情报局专用航空系统飞机的名字告诉了他。这个事故使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约翰·麦克马洪感到生气和失望。因为动用了中央情报局的航空系统，就意味着把中央情报局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动计划拴到一起了。中央情报局成为诺斯行动计划中的一个部

分。麦克马洪尽量耐心地提醒克拉里奇的上级爱德华·尤赫涅维奇（行动部副主任助理）说：为了进行一项秘密工作，中央情报局需要一份盖有总统印章的审批件。没有发生此事前，中央情报局不需要这种批件，因为它没有参与这项行动，但现在必须把它作为中央情报局的一项任务，而且批件上的日期要写在出事之前，这样才能掩盖德韦·克拉里奇的鲁莽行动。

作为对德韦·克拉里奇的惩罚，凯西决定给他调往另一个凯西喜欢的工作，就是研究中央情报局如何对付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与此同时，诺斯的武器运送计划交给了近东处去办理，该处由伯特·邓恩和他的副手托马斯·特威腾所领导。特威腾决定牵这个头，尽管让他和戈尔巴尼法尔、西科德以及哈基姆三人打交道，显然使他感到“惊恐”。（这几个人正象特威腾所说“有点臭”）。特威腾是个比较谦虚不摆架子的人，他是中央情报局工作过 30 多年的老手，是从基层上来的，先是一个专案人员，然后是中电站的站长。他的事业大部分时间在兰利。他避免派往国外的任务（正如官员们闲谈时所说，主要是因为妻子不愿意他离家太远）。由于种种原因，特威腾在他的同事眼里不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有人说：“我们估计他当中级官员都难以胜任。”在他到安曼和开罗工作一段时间后，他的同事认为，他只是一个平庸的专案官员，显然和德韦·克拉里奇不能同日而语。

特威腾向贬低他的人证明，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尽管有人预言他永远不可能进入情报局的领导层，他那种稳重扎实，但又不起眼的工作，却使他 1970 年在开罗取得了成果。在那里，人们过去都用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人。特威腾当上行动部副主任助理时，在兰利流传他过去事业上的故事。特威腾和埃及政府中一些显赫人物建立了某种关系，他把这个成果汇报到兰利。他的成果之所以给人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当时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已把穆哈巴拉特·伊拉姆（即埃及情报局）变成了克格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使中央情报局在埃及根本无法开展工作。1970 年 9 月纳赛尔去世，他的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仅仅采取了少量试探性的步骤来改变过去的情报关系。克格勃把埃及称作“苏维埃埃及共和国”，把它紧紧地纳入苏联的轨道。当特威腾被派往开罗时，他发现几乎无法在这个国家立足。他的每个行动都被跟踪，即使与他只有一般往来的人，都要受到审问，甚至施以酷刑。（埃及的情报机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留在那里的纳粹分子建立的，他们使用的方法，在 25 年内没有多大变化。）

1971 年，中央情报局在埃及的情报站是设在西班牙大使馆内的美国科里。特威腾作为该站新来的官员，想竭尽全力打入埃及政府。抱着这个目标，他和一个叫阿什拉夫·马尔万的人交朋友，此人是埃及高级官员，开内阁会议时就坐在萨达特身旁，是萨达特最亲信的顾问。马尔万似乎是一个可能招募的对象，因为他对埃及日益依赖苏联的援助深感疑虑。他还是个美国的崇拜者。他不信任埃及的情报头子萨米·谢拉夫，后者是个四方脸、身材魁梧的人，最喜欢在他命令给人施酷刑时，他在一旁欣赏。谢拉夫是克格勃在开罗的头号特务，而且是萨达特内圈人物中公开维护苏联的人。特威腾最后把阿什拉夫·马尔万争取过来了，这几乎是奇迹般的成就。到 1971 年 5 月初，在兰利的中央情报局高级情报官员，对马尔万反苏的立场印象很深。他们相信马尔万将成为把埃及从苏联影响下拉出来的关键人物。他们的想法是对的。

1971 年 5 月中旬的一个炎热的早晨，特威腾接到从兰利发来的一份急电

说，有人阴谋推翻萨达特，这是克格勃的计划。关于政变的确切证据很难获得，特别是因为埃及的情报机构是在谢拉夫的控制下。但把各方面搜集到的零散情报拼凑起来，中央情报局得知有一批被克格勃收买的萨达特的高级助手，企图发起一场政变，并要谋害萨达特，其中有一份情报被中央情报局认为具有权威性。提供者是一个苏联的职业外交人员兼克格勃官员，名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那维奇·萨哈洛夫。他过去曾在埃及，现在在科威特工作。萨哈洛夫在整个六十年代里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最近在科威特愈来愈感到受克格勃同事的怀疑。他将他的恐惧感告诉他在中央情报局的联系人。此人是情报局近东处的职业情报官员，科威特海外情报所的负责人。

萨哈洛夫汇报了有关开罗进行政变的计划。同时还有另外一些情报材料，是中央情报局直接在埃及收集到的，其中包括策划人之间的电话记录。所有这一切表明，这个政变很可能成功，其意义是令人震惊的。萨达特如果被推翻，这将意味着埃及会紧紧地捆绑在苏联阵营之中，从而使苏联在纳赛尔一些庞大工程上花费的几十亿卢布得到报偿。

就在1971年5月的一个明媚的早晨，特威腾花了三个钟头时间，才把克格勃布置的埃及特务尾巴甩掉。最后当他会见埃及联系人时，他有足够的时间详细叙述了反萨达特计划的概要。他向马尔万解释说：萨达特自己的特务组织已被收买了，他军队中的高级军官也从克格勃那里得到好处，那些过去是纳赛尔、现在是萨达特的高级情报顾问，实际上是为苏联工作的。

就在特威腾会见他的联系人后的不几天，萨达特粉碎了一起未遂政变，并将主要策划者逮捕了起来。特威腾提供的重要证据是策反人之间的电话录音。5月11日早晨，马尔万把这些录音带放在萨达特的桌子上。录音带证实，特务头子谢拉夫和萨达特的副总统阿里·萨夜里都是阴谋参与者（克格勃准备指定萨布里在干掉萨达特后担任总统）。

特威腾成为埃及没有公开的一名英雄。作为一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辛勤地工作，取得了意外的收获。这次政变失败后，美国拼命抓住时机加紧工作，试图使埃及成为美国的同盟者，其中包括让当时沙特阿拉伯的情报头子卡迈勒·阿德哈姆对马尔万施加压力，让他说服萨达特，使他的国家转向西方。由于特威腾抓住了带有关键性的工作，加上一点小小的运气，使这种努力成为可能。事后，人们都把他当成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萨达特政府从苏联轨道上拉出来。对中央情报局来说，这真是个重大的胜利，而且所花的代价与苏联为他们未来的苏维埃共和国所花的几十亿卢布相比，真是微乎其微了。

对美国来说，这个收获更是美不胜收。在萨布里和谢拉夫被捕后的年代里，苏联人被赶出了埃及。他们在埃及收买的间谍大都被追捕、审讯、入狱。他们在开罗用高墙围起来的大使馆几乎被孤立起来。由于萨哈洛夫提供的情报，使中央情报局弄清了苏联在埃及的每一个谍报人员，实际上已经把原来的苏维埃埃及共和国变成了监禁克格勃的集中营。当埃及成为美国的同盟者后，另一个收获是美军建立起一支“红色”沙漠部队。一个完全由苏联坦克和装甲车装备起来的装甲营，这个营的驻地在加利福尼亚州，现在仍然被美国用来给部队作下次战争的战术训练。这个营的装备都是从埃及运来美国的，作为萨达特感谢美国的一种表示。

特威腾的另一个国外任务，不像那么成功。在七十年代后期，他担任在约旦的安曼情报站站长，任务是与侯赛因国王合作。当时侯赛因是美国在中

东最重要的同盟者之一。在安曼，特威腾接收的情报站，是一个四分五裂、士气低落、男女关系很乱的烂摊子。根据熟悉安曼站情况的几位情报局官员讲，在特威腾接手情报站的工作以后几个月，特威腾发觉情报站的秘书和约旦的一名情报官员有桃色关系，后者还兼向克格勃提供情报。这可能发展成一件丑闻，从而毁掉特威腾的事业。他象在埃及那样行动迅速，将这名秘书开除了，并向中央情报局总部做了汇报。他与兰利派来的保安工作小组合作，在站内进行了充分的调查。这个小小的丑闻尽管令人难堪，但不是致命的。

特威腾后来又遇到第二个麻烦：侯赛因国王不喜欢他，因为他不像他的前任，不爱骑马打猎，而这些才能在侯赛因眼里是一个美国情报官员必须具备的条件。特威腾有一次陪国王去骑马，效果并不好。侯赛因一直纠缠兰利，要他们把特威腾召回，行动部领导有些犹豫，最后同意把他调回美国，安置在中央情报局有名的冷宫——技术部办公室。

此后的几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是特威腾作为中央情报局官员工作最有成效的年代。他成为一名反恐怖主义组织的行家，而且由于他在中东政治问题上颇有研究，取得了近东处的领导位置。到他被任命为近东处副处长时，他已学会尊重这一传统职业的基本信条。那种老老实实傻干的哲学，已证明是所有最成功的行动计划的特点。凯西所支持的诺斯计划则与此不同，这正是使特威腾感到不安的原因。用他的话来说：这个行动计划闻起来就不是味儿。可是上面有命令，这个行动又是总统所支持的。他相信他和情报局其他人能做到的，至多不过是在整个计划垮台时，使中央情报局少受牵连，而此事出问题是肯定无疑的。

1986年2月，特威腾认为他已找到了使中央情报局减少风险的办法。他刚与诺斯在西德参加会议回来，这个会是解决未来武器交接的细节问题。特威腾小心谨慎地提出西科德、哈基姆和戈尔巴尼法尔三人不适合与中央情报局直接打交道。他从一种业务观点来提出他的批评，他认为诺斯需要一个比戈尔巴尼法尔或哈基姆更好的翻译（“我不是那种当面给人施加压力的人”，他事后承认说）。当诺斯没有什么反应时，特威腾又说：让这些“局外人”参与这个行动计划不是个好主意，特别是考虑到以武器换人质已成为美国政府当前的政策。他补充说，他乐意给诺斯提供一位能说法尔斯语的可靠官员，但有一点特威腾没有说出口，就是他害怕给伊朗提供武器的行动与美国政府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事碰在一起。现在看来完全有可能，因为后一个行动计划有一部分是西科德在经办。特威腾事后解释道：“只要有可能，我们设法不使两个分开的行动搅和在一起。”

后来由国会进行的调查材料说明，特威腾相信他的任务是尽量使中央情报局与诺斯向伊朗运送武器的计划保持距离，但又不致违抗凯西的命令或总统的意愿。当他坚持说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任务时（考虑到德韦·克拉里奇在11月无意中犯的错误，充其量也只能说这是一个很可怜的辩解词），他心里明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将无可幸免地会被卷入进去，不论他试图采取多少保护措施。特威腾知道，当这件事暴露后总得有人被抛出来，使调查者的视线从中央情报局转移开，这个人要会说法尔斯语，了解伊朗，但目前又与中央情报局的内圈没有什么联系。

已退休的中央情报局老资格人士乔治·凯夫具备特威腾所说的各种条件。他的头发花白，身经百战，嘴灵舌快，是前德黑兰情报站站长。他有语言天才，熟悉伊朗革命的领导人，会讲一口流利的法尔斯语，并且与特威

腾一样，见到一个坏的行动计划时马上能够识别。就象情报局其他退休官员一样，乔治·凯夫是个生来就不轻信别人的人。他的背部受过伤，他把晚年用来抚养一个由于长期从事这个职业未能很好照顾的家庭。特威腾选择凯夫负责诺斯的行动计划非常适合，理由有两点：一是凯夫仍然是中央情报局的顾问，但他已不是全天工作的雇员了；二是凯夫很了解戈尔巴尼法尔，在八十年代初，他断绝了中央情报局和这个伊朗人的关系，并且两个月前对戈尔巴尼法尔的撒谎测验题是他设计的。3月5日特威腾、克莱尔·乔治和凯夫在兰利会面。

特威腾知道，当凯夫了解中央情报局又要和戈尔巴尼法尔打交道时，他一定会感到吃惊，所以他试图在讲话时有点缓冲，他问凯夫想不想会见拉夫桑贾尼，他是霍梅尼之外伊朗最有权势、最显赫的人物。凯夫打断了他的开场白，并且让他开门见山他讲要他出来干什么？特威腾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中央情报局正在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援助，帮他们运送武器到伊朗。这里有两个目的：一是打开伊朗和美国的联系；二是解决释放在黎巴嫩被扣留的美国人质。这些武器是通过诺斯的中间人，其中包括戈尔巴尼法尔运送的。

凯夫对他试探性的讲话反映也正如特威腾希望的一样。凯夫事后说：“听了这个行动计划，我就提醒特威腾，我记得可能还有克莱尔·乔治，参加这一行动计划的在职官员尽量少一些，因为我很清楚，一旦计划败露，他们的事业将处于危险境地。而我已是领年俸金的人，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凯夫工作干得很好，他作为中央情报局和诺斯计划之间的一个可靠的中间人，尽量使他原来的雇主（中央情报局）不去接触那些容易出问题的方面。简单地说，中央情报局的一些高级情报官员，如特威腾、乔治和其他人，他们现在采用了过去另一些人对付凯西的拉希德行动计划同样的办法：他们企图控制它，并希望最后能扼杀它。正象他们所害怕的那样，他们的努力最后失败了，他们只能采取措施，保证尽量使最少的人卷入这桩丑闻中去。当他们无法说服凯西，让他相信他的整个计划是建筑在幻想的基础上（即伊朗政府内存在着温和派），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尽量减少丑闻对中央情报局声誉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成功了，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是这样。

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行动官员，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如何保存自己。特威腾在安曼活了下来，凯夫在德黑兰进行革命时，经历了许多恐怖事件以后，也活下来了，克莱尔·乔治在欧洲和非洲的冷战中，目睹了各种丑恶的内幕后，也活了下来。再说，他们每个人在凯西领导中央情报局的6年里也活过来了。这6年实际上给中央情报局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作了一个评价，同时，这6年也证实了它的高级谍报人员怎样努力保卫中央情报局40多年来的老传统，使其免受攻击而遭破坏。用武器换人质的行动计划正好能说明这一点。

这次丑闻的揭露，打破了一个神话。过去人们对中央情报局有一种传奇的、甚至有时是浪漫的想法。人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无法控制的庞然大物，一个全能的间谍群体，这里的人效忠于秘密工作，只是在它的背后，有大量烦琐的日常事务。我们可以引用《奥茨的巫师》剧中的一个场景来作一个更为恰当和正确的比喻。当年轻的陶乐茜最后到达安麦芬城时，她很失望。她原来想象的万能巫师，原来是个口吃的，有时有些糊涂的，好心肠的老人。他真正的秘诀就是靠给人一种错觉；他会操纵一种杠杆，看上去好似很有力量，

其实他什么别的本领也没有。他的魔袋是空空的，他只不过是骗子。巫师对人们的真正要求（“不要去注意幕后的人物”）是：——正如凯西一样——不要仔细去看他在做什么。

这里还有一个凯西当政 6 年中的怪现象：一方面，中央情报局最有经验的谍报人员庆贺他积极出战的行动；另一方面，他们暗地里正在抵消他的行动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对前任局长斯但斯菲尔德·特纳，他们曾经加以推动和督促，而对凯西则要勒住缰绳。他们赞扬他，维护他，因为他使这帮人回想起他们过去曾有一段光荣历史，并且也希望将来再有这样一段。

前西贡海外情报所负责人、直言不讳的托马斯·波尔格，是参议院聘来调查伊朗门丑闻的。甚至他也无法贬低凯西。他说：“凯西做了他认为正确的事。这些事肯定是有问题的，但他受到人们尊敬。”

雷·克莱因博士是中央情报局退休人员中的老前辈，他也讲出类似的想法：“他在行政管理方面存在很大问题，我认为这不是他之所长。但是他懂得中央情报局应有的自豪感和情报人员应有的优越感。”所有这些说法，都是为他辩解的。如果凯西犯了什么错误，他的辩护人会说他仅仅是因为他相信中央情报局能击败美国的敌人；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整个官僚机构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清楚的部门。一位官员说：“即使凯西在批评中央情报局缺乏创造性时，他仍然欣赏中央情报局有办成事业的能力。对中央情报局存在着矛盾，他感到沮丧，对它能忠于职守，又感到高兴。但最终他还是明白了，中央情报局和政府其他部门一样，也是一个官僚机构。”

在凯西的任期内，中央情报局充满了惊险，其中包括局长本人在内，都担有把中央情报局搞垮的风险。在他的 6 年任期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问题上与苏联作斗争，并有效地制止了它的推进；摧毁了一个在欧洲的恐怖主义集团，并且重新建立了谍报网，为所有的情报工作提供必要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央情报局也遭受了很大的挫折：凯西和国会之间，在究竟什么样的秘密行动计划须向国会通报的问题上进行过争吵；情报局的人炸毁了尼加拉瓜港口，被人抓住了，但事先凯西却答应过他们是不会这样干的；一本反起义的内部手册，被人披露后引起难堪，因为手册里写了包括默许使用谋杀手段，正当中央情报局在伊朗门事件上受到审查时，凯西死了。尽管有这么多问题，中央情报局在经历了凯西当政的年代后，仍然完好无损，并准备在新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威廉·韦伯斯特法官突然被任命，给大家寄予希望，即使最猛烈的批评者也承认，他可能去完成那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赞扬凯西所献身的事业。正如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在追悼会上颂扬凯西时所讲的：他将遵循法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再次使中央情报局作为美国情报界的龙头，回到受人尊敬的地位上来。唯一的问题是，象韦伯斯特这样一个在国际情报界鲜为人知的人物，能否适应兰利那种惯于玩弄阴谋诡计的拜占廷式的传统。

在 7 月 5 日葬礼的结尾，凯西的棺木由 6 人抬上灵车。安葬仪式没有公开举行，安葬在附近的贺来路德公墓。里根总统和其他知名人物都未参加。他们决定立即赶回华盛顿，准备迎接铺天盖地而来的一系列质问。这些都是有关这项秘密行动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这项行动计划是由凯西指挥的。很巧，那天是在一个混乱的气氛中结束的——它象征着凯西在中央情报局时的一切——当时里根误解了一个记者的提问。总统的直升飞机已经发出轰鸣的响声，一位记者高声向里根喊问：“在凯西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的资

金中，有你的捐款吗？”里根点头称是。事后，总统发言人马林·菲茨沃特在澄清这一误会时说，总统以为记者问他追悼会开得是否很成功，里很作了肯定的答复。

2 我们在德黑兰的人

霍华德·贝克正在发愁。这位前田纳西州的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72小时前刚当上白宫办公厅主任，现在正碰上第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难题：里根政府找不到一个取代比尔·凯西的人来担任这个国家的特务头子。早在贝克到达白宫许多天以前，参议院成功地打消了里根总统对中央情报局局长第一人选的提名。他提名的罗伯特·盖茨，由于人们质问他伊朗门事件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本人已提出不要再把他作为考虑的人选。既然不再考虑盖茨，贝克现在又在竭力推荐前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约翰·托尔作为一名理想的人选。1987年3月2日，即总统准备宣布人选的头一天，托尔似乎会接受这一职务。尽管他并未明确首肯，但就贝克来说，毫无疑问他是会接受的。

即使是还在担任代局长的盖茨也认为，托尔的提名会在中央情报局内受到欢迎。尽管托尔的确没有担任此项职务所必需的经验，但盖茨知道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谍报人员一定会非常欢迎这项任命，因为老资格的托尔的到来会使这个机构更为人们所尊敬。此外，盖茨也知道，中央情报局并不需要一位象艾伦·杜勒斯那样的谍报天才，而是需要一位好的行政领导和受国会尊敬的强人。盖茨相信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同僚们，将乐于任何人来领导他们，只要这位新局长不利用伊朗门事件作为支解情报机构的理由。

直到星期一下午，托尔的任命似乎都是肯定无疑的。星期二的早晨他将被引进白宫，并被介绍给全国的新闻界，在这以后，人们期待他将很快得到参议院的认可。托尔在国会山是颇受信任的，公众也很熟悉他，尽管他是一个强硬保守的共和党人，但由于他在最近的伊朗门丑闻中，对里根持适当的批评态度，这又给他增添了客观公正的美名。

托尔主持一个三人委员会，负责审查在伊朗门事件中，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否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在这一过程中，他有时对里根进行严厉批评，因而得到人们的信任。托尔委员会最后发表的报告（正式题名为“总统特别审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的结论说，里根对伊朗门事件中白宫的行动无直接责任，而是允许他的工作人员执行与他公开声明相抵触的政策。托尔的结论，尽管并不是摧毁性的，但却说明他不依附于总统，这一点将有助于参议院对他任命的认可。尽管如此，他在中央情报局的这一职位，似乎仍然是里根对他的一种报答，因为正如有人所认为的那样，主要是他，对里根造成的损害起了某种控制作用。对于这种指责，贝克准备自己去对付。他相信参议院不敢拒绝把这一职位给托尔，或者怀疑他领导中央情报局的能力，因为托尔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

正当贝克准备宣布托尔任中央情报局的新局长时，托尔给白宫打电话说，他将不接受这一职务。他表示歉意，说他完全了解，这一似乎是改变主意的做法，会给里根新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造成很为难的局面，但他的决定是最后的。“我就是不能干”，他对贝克说。长期以来，他一直想当国防部长，而不是当中央情报局局长。他承认，当中央情报局局长是一种荣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将使他永远没有可能再去争取当国防部长。但他已下定决心想当国防部长，他认为将来仍有此机会。贝克和托尔进行了争论，但他的话也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很清楚，这位得克萨斯人是下了决心的。

贝克很生气。他知道托尔拒绝接受这一职务，可能会对里根造成极其尴尬的局面，因为里根的领导能力已成为人们广泛议论的话题。这位白宫办公

厅主任查看了一下他自己的名单，盖茨不行了，托尔正在等待一项他可能永远得不到的工作。当然还有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这位前空军将领也是托尔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在那位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拒绝接受任命以后，这么快就指定斯考克罗夫特，会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总统一直在物色一名他要报答的人。这也意味着任命前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托尔委员会的第三名成员。贝克判定马斯基是一名地道的民主党人，所以从未认真考虑过让他担任此项职务，虽然他的名字曾神秘地出现在几家报纸上。新闻界迫不及待地盯着这项任命的宣布（他们好像在一旁得意地笑着，盖茨的一位朋友对这位中央情报局的代局长说）。贝克认为他得赶快行动。

正在这时，乔治·布什开始插手这件事。在上周末，他和他的幕僚们曾讨论过有必要委任一名可靠的政府官员来领导中央情报局。布什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局长，他认为自己有独特的眼力，可为挑选一名新的候选人出主意。他和他的幕僚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是最理想的人选。布什认为，韦伯斯特和托尔具备同样条件，他一生都是一名忠实的共和党人，为里根的高级助手所信任，也是自己信得过的人。布什不仅把他看成是一位朋友，而且似乎是一位与自己气味相投的伙伴。鉴于他过去在联邦调查局的表现，布什认为他一定会很快得到参议院的认可（特别是因为他过去的任命也得到同样迅速的认可）。韦伯斯特还具备托尔所不具备的条件：作为联邦调查局的领导人，他有近10年和情报界打交道的经验，也熟悉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布什告诉他的助手们，最为重要的是，他佩服韦伯斯特的“坚定”和“责任心”。任命韦伯斯特将给联邦调查局留下一个空缺，但这毕竟是次要的问题，因为他10年的任期反正也快满了。白宫认为，有从容的时间去任命一名新的继任者。贝克马上对布什的看法表示同意，他奇怪自己早先为什么没有想到韦伯斯特。取得里根的同意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3月3日下午，贝克打电话给韦伯斯特提出请他出任新职的问题。

韦伯斯特对领导中央情报局的建议表示有兴趣，但不愿马上肯定下来。贝克催促他说，总统需要在24小时内得到答复。韦伯斯特告诉贝克，他仅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来作出决定。韦伯斯特对贝克给他打电话感到很高兴。他知道尽管自己不想呆在华盛顿，他得认真对待这项建议。事实上他打算在1985年离开联邦调查局，但在司法部长米斯的鼓励下，答应留下来，因为米斯对他说，在不进行大选的年头离职是一个不好的主意。韦伯斯特曾向米斯明确表示，一旦在政治上能找到一个代替他的人，他很想回圣路易斯城去重操律师的旧业。这样，他又呆了两年。现在，由于贝克给他打电话，他不得不考虑作出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也不是他自己单独能作出的。韦伯斯特在妻子死后没有再婚，他给女儿德鲁西拉（他叫她“德鲁”）挂电话，告诉她这个消息。她最初保持沉默，接着表示了她的不快。她说，“联邦调查局是一回事。可是，爸爸，那个地方真有些让人害怕。”他对她说，他还未作出决定，但倾向于接受这项工作。

当晚韦伯斯特挂了另一个电话，这次是给海军上将博比·雷，英曼打的。后者是凯西手下的中央情报局第一副局长。此人当过国家安全局局长，是华盛顿最受尊敬的谍报官员之一。里根最初当选总统时，英曼作为中央情报局新局长的候选人，在所有人手中的名单里，都名列前茅。后来凯西得到这一职位，他只好忍气吞声，同意当凯西的副手。但在16个月以后，当明摆着他

在中央情报局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他就离开了。韦伯斯特希望知道，英曼认为他是否应接受这项任命。他还想了解，在当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候，是否仍然可以当他的律师，而并不影响他有效地领导这个谍报机关？他的工作是否要求他违反法律？英曼对他说，他完全可以在中央情报局工作而不牺牲自己的原则。英曼还解释说，中央情报局也没有违反美国法律，但外国法律却是另外一回事。在这点上韦伯斯特是比较放心了，但他又问英曼对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的士气有何看法，特别是伊朗门丑闻以后。英曼回答说，士气虽受损害，但只要有得力的领导，很快可以扭转局面。最后，韦伯斯特问，英曼是否认为他将是一位好的中央情报局领导？英曼诚恳地回答说，韦伯斯特将是一位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他还说，这一职务将是一个“挑战”。

第二天下午的早些时候，韦伯斯特作出了他的决定，尽管联邦调查局的某些同僚回忆说，对于他将接受贝克的建议一事，从未有人真正怀疑过。他们说，韦伯斯特和布什一样，深信自己是这一职务最合适的人选。尽管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有本质的不同，韦伯斯特对中央情报局的某些工作已比较熟悉，因为在他主持联邦调查局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韦伯斯特已扩展了联邦调查局的海外谍报工作，作为配合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一部分。韦伯斯特相信，他过去为联邦调查局所做的一切，同样也可以为中央情报局做。在他看来，这两个机构所需要的东西，从管理方式来说，并不存在多大的差别。事实上，中央情报局 1987 年的情况和 9 年前他接管联邦调查局时非常相似。在 1978 年的联邦调查局里，J·埃德加·胡佛的阴魂不散。他是在执法方面最强有力，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人物之一。在紧接着胡佛以后的年代里，韦伯斯特的前任克拉伦斯·凯利给联邦调查局的上层注入了许多新鲜血液，但因他在那里的时间太短，不可能带来持久性的变化。这项任务留给了韦伯斯特去完成。他得重振士气。当时各个办公室之间的闲言碎语和内部的政治斗争，已把这个局弄得士气低落，这里的人工作拖沓，被人视为到时候上下班的侦探。韦伯斯特花了 3 年时间才清除了胡佛的派别分子，重新在国会心目中树立起它被损坏的声誉。

韦伯斯特由于完成了这项任务赢得了人们的称赞，但贬低他的也大有人在。1981 年，他负责认可雷蒙德·多诺万任命前的调查工作，受到严厉的批评，当时多诺万被里根提名出任劳工部长。在多诺万被指控受贿以后，参议院发现联邦调查局为他任命提供的背景材料隐瞒了某些重要情节。参议院接着对联邦调查局处理此事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韦伯斯特的领导工作提出尖锐批评。参议院发现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有关多诺万的材料，实际上是他某些亲密的朋友对他溢美之词的汇编，比无用还要糟糕。多诺万后被起诉并接受审判，最后被宣判无罪。如果联邦调查局在参议院审议多诺万的提名前工作比较得力，也许法院的那场戏可以避免。这是最轻的说法。另一方面，韦伯斯特的批评者说，联邦调查局在多诺万案件上的失败，说明联邦调查局仍和过去一样带有政治色彩，韦伯斯特没有使它产生任何改变。

同样的批评在阿拉伯诬骗丑闻以后也出现过，这是一起冒称代表富有的阿拉伯人向国会员行贿，以换取政治上的好处的“诬骗行动”。这一行动最终的结果是好几个人被起诉。但是，联邦调查局的行为却成了参议院深入调查的目标，他们要了解韦伯斯特手下的人，是否特意挑选了某些人作为他们诱骗的对象——大多数都是民主党人。调查委员会发现联邦调查局不认真保存电话谈话记录和录音带，韦伯斯特和他的谍报人员之间的通话查不到有关

的记录。韦伯斯特在这次事件中，遭到和多诺万事件中对他的同样批评。尽管 7 名国会议员由于阿拉伯诬骗丑闻都被判有罪，但联邦调查局的这项调查，却被指控为被白宫利用作为它的政治工具。韦伯斯特忿忿然地回答他的批评者说，“我为我们所做的事感到骄傲，我们的工作经得起法庭的考验。”

在“瓶塞钻行动”中，联邦调查局的目标是想抓住克利夫兰的几名法官从一名法警那里领取贿赂。在此案中，韦伯斯特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进一步扩大了它在阿拉伯诬骗行动中所犯的错误。联邦调查局参加此案的特工人员忘了去查阅这名法警的刑事犯罪档案，事后证明此人是一名被判过刑的盗窃犯。这些特工人员也没有去核实他提供的贿赂是否真付给了这几名法官，这名法警实际上把这笔钱塞进了自己的腰包，可他却把矛头指向他从未接触过的法官。最后在这次行动中真正受控告的是那名法警。

在韦伯斯特主持工作的年代里，联邦调查局最秘密的情报员之一是杰基·普雷瑟，那位矮个子、超重量、说话直喘气的强有力的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的领导人。当这一情报被人知道以后，联邦调查局是否被利用去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普雷瑟是在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的敦促下，当上了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员的。当时米斯说可利用他来帮助对腐败的工会进行清理整顿。（普雷瑟在 1980—81 年里根的过渡班子里担任过职务，在这以前，他的兄弟会是支持里根竞选总统的全国两大工会之一。）普雷瑟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一份有关兄弟会和组织的犯罪团伙关系的详细报告，虽他本人也有两面讨好的嫌疑。尽管围绕普雷瑟的动机和他可信赖的程度有许多争论，联邦调查局进行了为时三年的调查，其结果是撤换了兄弟会内的许多领导人。联邦调查局对整顿了这一工会组织一直引以为荣。该局的高级谍报人员强调，普雷瑟所提供的情报是非常有价值的，使用这位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的主席作为情报员，对结束工会的腐败行为是至关重要的。（普雷瑟最后被指控给他的亲戚和犯罪团伙的成员吃空缺，但还没有来得及受审，就因患脑癌去世。）

正如凯西在中央情报局的年代一样，韦伯斯特在联邦调查局的任期内也有若干突出的、受到广泛宣扬的成就。联邦调查局曾在克利夫兰试图推行的“诬骗行动”，最后在伊利诺伊州的库克县取得成功，联邦调查局对那里几十名腐败法官的指控得以成立。但最大的成功之处是，韦伯斯特恢复了联邦调查局作为美国首要的执法机关的声誉，尽管它也有种种失误。联邦调查局最后被揭发对那些反对美国卷入中美洲事务的人进行过特务侦察，从而影响了它的声誉，但它的上述成就仍然是了不起的。总的来看，韦伯斯特制眼了胡佛时代的活跃分子，使联邦调查局重新赢得冷酷无情的密探之家的美名。

3 月 3 日下午，当韦伯斯特考虑他的前途时，与其说他关心他在联邦调查局过去的成绩，还不如说他更加关心他是否会被参议院认可去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几乎生来就有一种崇尚个人作用的信念，因而他绝对相信自己能胜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务。在接到霍华德·贝克向他提供新职务的电话将近 24 小时后，韦伯斯特拿起电话筒把他的决定通知白宫。他说，总统能想到让他当中央情报局局长，他感到“很受抬举，也很荣幸”。他将接受这项任命，并保证竭力把工作做好。

3 月 5 日正式宣布了对韦伯斯特的任命。和他一起站在白宫新闻发布厅里，里根总统把比尔·韦伯斯特说成是一位“诚实和正直的人”，并引用他曾担任联邦法官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的经历，作为提名他的过硬条件。但在里

根多少有点迟疑的发言中，也流露出他自己也弄不清，他原来曾先后决定任命盖茨和托尔，为什么都没有兑现。在他担任总统的整个期间，很少有象这次的表现——今天的里根活像一名第二流的演员。他不熟悉他的台词，他的发言稿写得也很潦草。他在不适当的地方发出微笑，还常常偷偷地看韦伯斯特一眼，好像不敢肯定他是什么人。韦伯斯特却落落大方，谦恭而又充满自信。他说他在等待参议院的认可，但坚持要熟悉了新的工作以后，再对所有问题发表他的意见。

如果里根还有些对韦伯斯特没有把握的话，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却对他很少有什么怀疑。对他们来说，里根对韦伯斯特的任命，解除了人们对中央情报局前途愈来愈深的怀疑，是值得欢迎和令人宽慰的事。参议员们都很清楚，凯西一伙损坏了中央情报局在公众和国会中的声望，他们同样也很清楚，罗伯特·盖茨也不是能挽回这种声誉的合适人选。当委员会的成员听到里根在考虑任命约翰·托尔来主管兰利的工作时，他们的怀疑情绪加深了。问题不在于对托尔的任命不能得到认可（他可以，而且完全可能会得到认可），因为即使有把握得到认可，也并不说明有足够的理由提名他作为候选人。他们认为，中央情报局需要的是一位享有善于整顿士气低落部门的声誉的人。韦伯斯特正好有这种经历，而且在国会为人们所知晓并受到青睐。他可能在调查多诺万事件和阿拉伯诓骗行动的过程中，曾碰到某些困难，但他至少是相信监督的概念和程序的，在这一点上，任何人都会认为他比凯西强得多。

参议员戴维·博伦，这位表达能力很强的俄克拉荷马州民主党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对于这一点是很坚持的。博伦告诉他的一位助手说，如果因伊朗门事件深受创伤的里根总统还想保住他自己和他的总统宝座的话，他应该作出遵守法律的承诺，并且在物色人选时，找那些能与国会合作的人。

缅因州的众议员威廉·科恩，这个委员会中职位很高的共和党人，也抱有同样的看法，但由于要忠于他的党，不能这样公开说。科恩相信，委员会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停止凯西私下采取的涉及外交政策的行动。他认为，继续保持这一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委派一位熟悉并立志遵守法律的人去当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公开场合，科恩赞扬里根对韦伯斯特的任命，私下里他则表示，他怀疑伊朗门丑闻恐怕比任何人想象的还要复杂。科恩对他下面的工作人员说，白宫和中央情报局可以尽量辩解说，他们是清白的或是不知情的，但他很难说，政府私下采取的涉及外交政策的行动是否已经停止。更使他苦恼的是，他毫无办法去进行核对。科恩抑制他内心的不安，并和博伦一起参加支持韦伯斯特的大合唱。

这种支持犹如笑里藏刀，是非常厉害的。如果戴维·博伦认为韦伯斯特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中央情报局领导人，这就意味着这位参议员已得到某种保证，未来的这位领导人将是一位开诚布公的，甚至是驯眼的局长——也许还可能成为国会在兰利的耳目。这至少是韦伯斯特被任命的那天，许多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想法。在兰利，人们对里根宣布的任命广泛持怀疑态度，并且都在窃窃私议，韦伯斯特是否有必要的背景，使他能恢复中央情报局在公众心目中原有的形象和重振机关内部的士气。

在这所谍报机关第六层的办公室里，中央情报局负责行动计划的高级特工人员，不断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对韦伯斯特的提名表示关切，认为这只

会增加他们的问题。那些参与威廉·凯西以武器换取人质密谋的部分谍报官员更是疑心重重。中央情报局伊朗科科长也特别关切。他问一位同事说，“你认为他会采取什么行动？”近东处主管反恐怖活动的一位专家也很担心，他向另一位谍报官员打听：“他究竟是怎么一个人？这家伙懂不懂谍报工作？”

托马斯·特威腾是最近刚任命的近东处处长，他较为乐观一些。他相信韦伯斯特在兰利开始工作时会比较谨慎的，如果不是因为别的原因，他也会设法不要得罪这些他将来要与之共事的人。特威腾说，韦伯斯特也得先熟悉一下环境。他见过韦伯斯特，知道他，和他交谈过，并说这人“还可以”。

很多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谍报人员对韦伯斯特的任命感到不安，这并不特别令人感到震惊。在联邦调查局里，人们都了解这位原来的密苏里州的法官有时爱教训人，他对官僚机构内部的斗争常感到不耐烦，对那些行动超越了他狭隘的是非观念的下属，常给予惩处。他性子急，要求高，有时对人非常严格，这些都是出了名的。那些过去和联邦调查局打过交道的联络官们都注意到他的这些特点，他们传活回来说，给韦伯斯特工作是很难的。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联邦调查局的高级谍报人员对韦伯斯特忠心耿耿，认为他是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合适人选。他们相信，韦伯斯特将清除那些甚至与凯西—诺斯丑闻稍有牵连的人。那些领导凯西的伊朗行动计划的人，最明显的是克莱尔·乔治、德韦·克拉里奇、托马斯·特威腾和他们的助手们，当然是首当其冲。特别是克拉里奇，他相信韦伯斯特的任命将标志着他的事业的终结。他对一位同事说，“我不会在这里呆多久了”。

人们还有一些其它顾虑。有些人认为，韦伯斯特的任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满足国会由于中央情报局参与了诺斯的行动计划而对它进行惩处的愿望。他们认为，现在国会通过韦伯斯特对中央情报局的监督，将比过去更加厉害了。还有些人认为，韦伯斯特对谍报工作并不象他自己所说的懂得那么多，他对谍报界爱耍弄阴谋诡计的传统只不过是有点皮毛的了解。除了这些怀疑以外，还有在罗伯特·盖茨不能被批准任命问题上的分歧。中央情报局内的大多数高级领导，特别是那些行动部的人，虽不喜欢盖茨，但认为他得不到批准任命，也就排除了其他职业特工人员担任局长的可能。尽管他本身有缺点，他的失败也意味着他们的失败，要看到一名谍报人员成为局长，还不知要等多久。盖茨决定要求把他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中撤回，在情报部他最接近的同事中引起了深刻的反响，因为他原本可以成为第一位长期担任过分析人员工作的局长。至少盖茨是一个已知数，是韦伯斯特则不是。

围绕韦伯斯特对中央情报局内部工作运转的知识究竟有多少，以及他处理局内错综复杂问题的能力究竟有多大，在兰利一直存在着争议。这种争议由于报纸上有关他在某些关键问题上的立场的报道而变得更加激烈了。对那些认为任命盖茨将对中央情报局不利的人，这些新闻报道更是给他们增添了武器弹药。他们引用了三个例子来说明他们的看法。第一，在凯西担任局长初期的1981年，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曾公开反对取消对中央情报局搜集国内外情报的某些限制。韦伯斯特这一令人吃惊的立场，似乎是对即将卸任的卡特总统的报答，因为正是卡特，给了他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职位（下令规定这些限制的也正是卡特总统）。

第二，1984年，他发表了一项对中央情报局不利的声明，这项声明对众多的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来说，暴露了他在谍报工作上的无知。他对报界说，他反对建立军事部队对恐怖主义组织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他说，美国不应

该做那些“可能在以后更加清醒的时候会受到谴责”的事情。对那些一贯批评他的人来说，他的这番话似乎是要把美国法律运用在国外进行的谍报工作中。这无异于说，只有在受到恐怖主义分子袭击后，而不是在这以前，才能采取行动。他的这种观点在行动部的人员中传为笑柄。

最后，与上述一点有关联的是，韦伯斯特曾反对白宫 1986 年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允许中央情报局对恐怖主义分子进行绑架，并把他们押送到美国来受审。他的这些观点受到中央情报局准军事人员的嘲笑，这些人员在中央情报局内被贬称为“把指节弄得嘎嘎作响的人”。一点不假，过去中央情报局有些高级特工人员在凯西试图诱捕穆罕默德·侯赛因·拉希德的时候，曾在这个问题上反对过凯西，但当时他们这样做是有理由的。接着，在 1986 年，正当中央情报局准备为了保护自己有权这样做而在立法上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时，韦伯斯特又抱怨说，法律被引伸到无法可依的程度了。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对他的解释感到震惊，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按照他的逻辑一直推论下去，他的这种立场最终意味着中央情报局在国外的工作统统都得结束。既要工作，总得有些地方有点伸缩的余地。中央情报局迫切需要能对付恐怖主义的方案。但每当它提出一个方案时，都遭到韦伯斯特的反对。

但是，在中央情报局内，引起对韦伯斯特怀疑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一个个人因素：他是第一个从联邦调查局来中央情报局任局长的人，也是第一位被委任主持中央情报局工作的执法官员。此外，所有人都知道，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有长期不和的历史，这种不和曾导致两者的公开分裂。有一段时期，在 J·埃德加·胡佛的指示下，这两个机构的人根本直不讲话。最严重的分裂发生在 1970 年，那时两个不同的国内谍报行动发生了正面冲突。胡佛后来对中央情报局发动的长期斗争，由于他对中央情报局在国内行动的不信任，而更加变本加厉。导致这一结果的另一因素是，中央情报局还享有长春藤俱乐部超级秘密分队的名声，也就是说，它的成员许多都是美国东北部八所名牌大学毕业的盛气凌人的知识分子。在两家分裂后，一提起中央情报局的名字就几乎会引起胡佛发火。

两个机构之间的决裂终于得以弥合，但这只是在胡佛死后的事。美国国会后来不允许中央情报局在国内进行谍报活动，也有助于弥合这一决裂。到 1975 年，这个漫长而微妙的在这两个机构之间重新建立某种合作气氛的过程已经开始了。韦伯斯特的前任克拉伦斯·凯利，为在两个组织间重建一种新型关系而辛勤工作，但直到韦伯斯特的任期内，两个组织间仍然存在一种客客气气但很不自然的关系。在中央情报局看来，联邦调查局是一个更老的机构，它的作用有些被夸大了，这个机构充满了身著灰色制服的警察，他们专门搜捕非法入境的外国人和盗窃犯。联邦调查局认为，中央情报局是一个专门从事阴谋活动的象牙之塔，那里的工作人员都是些抽着烟斗的学者，忙于研究理论而工作却没有多少成效。

这种互把对方典型化的说法，多少还是有点道理。中央情报局把自己看成是谍报工作中的精英，而联邦调查局则经常认为他们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这种互相敌视的态度，对里根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在兰利引起的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韦伯斯特被看做是一位需要在工作岗位上接受培训的外来户。大多数中央情报局的职业谍报工作人员，硬是不准备在他到来时做出任何欢迎的表示。

韦伯斯特似乎也不特别适合扮演典型的中央情报局特务头子的角色，譬

如象艾伦·杜勒斯、理查德·赫尔姆斯或者威廉·凯西那样的人物。他是一位不起眼的、身高只有5英尺10英寸的密苏里州法官，喜欢读海明威的作品，搜集有作者签名的书籍，打起网球来每次都以小时计，也常在美国中西部他自己的农场里骑马。他对法律抱有某种狂热，他不断谈论的“法治”听上去如此古板，以致最接近他的人有时都认为他太老式了。中央情报局似乎还没有见过他这样的人：他是一位主张戒酒的、虔诚的基督科学派教徒，他从不骂人，每天都锻炼身体，还爱引用一些格言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有一次诚恳地对一位来访者说，“我从不把运动和行动混淆起来”。作为一位政府公职人员，他的服务记录无任何污点，个人生活也无可指责。在他的经历中，不存在任何隐而未发的可怕丑闻，譬如在停车场偶尔结识一名妓女、和别人分赃、或者学历上有什么污点，这些东西统统都没有。1987年的威廉·韦伯斯特就象十年前的斯坦斯菲尔德·特纳一样：两人都是宗教信仰徒，工作专心致志，独来独往，二者对比，相似之处立即十分明显，致使许多行动部的官员同声叹息。

即使原来对韦伯斯特最有疑虑的职业特工人员，也很快发现韦伯斯特对人非常友好，几乎让大家无话可说。他被提名后，立即来到兰利参加同大家见面的约会，和每人握握手，在适当的时候摇摇头以表示惊讶，非常专心地听取向他这位已被选定但还未上任的局长所作的第一次汇报。参加汇报会的那些和他一样已被指定、但尚未正式上任的官员们发现，他不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快地熟悉业务。尽管他对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明显地感兴趣，但这些官员们发现，他对自己能力抱有的自信，有时使他看不清楚，他需要了解和消化多么大量的情况和材料。他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他比威廉·凯西更有行政管理才能，但在搞情报工作的才能上却赶不上凯西。他仍然认为，中央情报局的海外工作，可以在完全符合美国法律的前提下进行。而实际情况是，甚至要招募一名外国间谍都是一件危险的任务。对那些在“禁区”（譬如说苏联或伊朗）吸收的特务来说，这是可以判处死刑的叛国罪，因而这些地区成为突出的盲点。但韦伯斯特曾对一批听众说，“从我有记忆力的时候开始，我就想当一名律师”。

如今，韦伯斯特却要去领导中央情报局。

决定韦伯斯特应担任中央情报局新局长是一回事，正式要使他这项任命得到认可却是另一回事。一方面，华盛顿官方很有把握地认为，在批准他的任命问题上，还没有发现任何令人难堪的障碍。另一方面，又没有人愿意说他是毫无瑕疵的。对他的怀疑与他的个人生活无关（他努力工作，认真负责，也是个聪明的、关心家庭的人）。最可怕的前景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将发现，作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他，偶然接触过向伊朗偷运武器或者有关诺斯转移资金的证据，但他却默不作声。换句话说，没有人希望发现任何迹象，说明韦伯斯特有意识地参与了掩盖罪行的活动。

在韦伯斯特是否会被认可的问题上，使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高级谍报人员以及该局的国会联络办公室的官员们最感不安的是，1985年中期开始的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当时行动部近东处的中级官员开始感觉到，伊朗正在发生一个重大事件。一位前情报官员回忆说，“1985年夏天的晚些时候，连着好些天有些人一直关着门在开会。参加会的有特威腾。（克莱尔）·乔治、（伊朗组组长杰克）·迪瓦恩，几乎能想象到的所有人，包括近东处全部高级特工人员。处里的人跑去找近东处处长伯特·邓恩，对他说，‘你瞧，如

果有什么事我们应该知道的，你应当告诉我们。我们不想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碍你们的事’，他对我们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我们追问他说，‘是我们自己在干什么事吗？我们是否在那里布置了什么武器？’他挥手让我们离开，对我们说，‘我们没法那样干’。”

但谣言仍不断在流传。据这位过去的官员说，伯特·邓恩（他是中央情报局主持海外行动的最优秀的人员之一）和他的高级助手们，从八十年代初期起，一直在紧张地追踪外国武器运进伊朗的情况，以了解伊朗在和伊拉克的战争中的军事能力。1982年，他们听到未经证实的谣传说，有相当尖端的英国坦克运往伊朗在波斯湾的繁忙港口阿巴斯港。如果报告属实，它将证明美国最亲密的盟国正利用霍梅尼想把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的狂热愿望，从中捞取利润。中央情报局还发现，1983年，伊朗人为了从国际私商那里购买武器，在伦敦开了一个庞大的办事处。伦敦闹区外的这个生意兴隆的伊朗武器市场被发现后，更是谣言四起，说美国也卷入这场武装伊朗的活动。

到了1985年9月，谣传达到了顶点。当时，近东处的一位特工人员接到一个保密电话，这个电话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务从华盛顿特区打到兰利来的。据这个打电话的人说，联邦调查局成功地招募了一名伊朗学生，这名学生很快要回德黑兰。由于他即将去海外，联邦调查局认为让中央情报局参与此事可能是个好主意。这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还说，由于这名学生很聪明，口齿也颇伶俐，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

中央情报局的这位特工人员把这项建议向他的领导汇报，这以后的两周时间里，近东处的高级情报人员考虑了这项建议。据一位参与其事的官员回忆，关于是否招募和训练这名学生的决定，“逐级上报，从处理伊朗问题的官员到科长，接着到近东处副处长（特威腾）、处长（邓恩），然后到乔治（行动部负责人）。最后，尽管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的谍报网大都被破坏，它最后还是决定不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这一建议。理由是区区一名学生不大可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允许联邦调查局自己去处理这件事。

两周后，当联邦调查局通知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谍报官员，说这名学生将在德黑兰有一个很好的职位时，他们很快改变了主意。这名学生将成为一位伊朗最高级官员的助手，这就使他能接触这个国家的某些核心军事机密和其它情报资料。联邦调查局提供的这一情况真是太好了，几乎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如果中央情报局能完全控制他，这将意味着它将拥有霍梅尼政权内部最接近大量宝贵情报来源的人提供的材料。美国将具备它将近十年来所没有过的条件，即有一名接近伊朗政府最上层的人为它充当间谍。近东处最有经验的官员行动很迅速。10月初，他们在兰利的军事联络科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两方面搞外国情报的高级谍报官员。联邦调查局除了指派在国内主持此事的人以外，还派来了它主管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几名负责人来参加会议。中央情报局参加会议的有伊朗科副科长和两名负责专案的高级特工人员，此外还有负责和联邦调查局联系的官员，以及拉里·拉金上尉（在美国的伊朗流亡者都把他叫做拉里上尉），后者可能是在近东处工作过的负责在伊朗行动最知情的官员。总共加起来，在这里开会的有9名高水平的老资格官员，每人都有20年以上的秘密工作经验。

拉金发言时为这次会议定了调子。他对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说，如果这

名伊朗学生由中央情报局来全权处理，他将会更有价值。在会议室的每个人都明白，按照法律，中央情报局对招募的外国间谍有优先权。从实际情况来说，中央情报局有更好的条件来处理这项工作。讨论一开始就这样单刀直入，未免有些唐突。但这就是中央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打交道时的一贯做法。中央情报局伊朗科副科长接着以一种较低的调子继续发言。他承认，中央情报局很急于想得到这名间谍，因为自霍梅尼的革命以来，该局的谍报网从未完全恢复。

联邦调查局一名主要的搞反恐怖主义活动的专家，对他们两位的发言勉强表示同意，但提出作为合作的交换条件，联邦调查局要求得到这名间谍提供的情报，以及中央情报局使用他时采取的每一步骤的详细总结。联邦调查局的这位发言人在这以后讲的一段话，却使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瞠目结舌。这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说，这名伊朗学生直接通过用声音作为代号的电话联系方法，或者在伊朗境内采用投置信件的方法来提供情报。他还说这些办法似乎很管用。

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都被吓坏了。他们知道，不管联邦调查局如何小心翼翼，霍梅尼的情报部门一定已经截获了这名间谍和海外的通话，他随时都可能被捕。这个伊斯兰共和国不仅一直在进行顽强而持久的监控活动；这在东南亚来说也是数一数二的，而且继承了七十年代中央情报局为伊朗国王装置的尖端的、耗资巨大的电话窃听系统。这一系统曾花掉中央情报局数百万美元，它也是1979年伊朗革命引起的一项美国情报界最大的技术损失。使用这一技术，霍梅尼的情报部门可以同时监听几百部电话。在短时间的沉默以后，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微微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建议联邦调查局马上停止通过电话接受情报的做法。联邦调查局被告知，再和那名伊朗间谍最后通一次话，给他一些新的指示，由中央情报局制订计划设法与他重新建立联系。

除了与这名伊朗学生保持电话联系所产生的问题以外，联邦调查局最大的危险在于它坚持用投置信件的方法作为和他联系的另一途径。这已被认为是一种原始的、很容易被发觉的方法，而且对搜集情报的人来说，也颇难追踪，作为写侦探小说是很好的，但在拥有侦察卫星这类尖端技术的时代里，这种技术的名声已经很成问题。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投置信件的方法已经不灵了。例证之一是，当一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试图从一名已经爬上很高地位的中东间谍那里取回一份情报时，他收到的却是一张这名间谍被砍断肢体的尸体的照片。这个局苏联处的人也不会忘记，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很有价值的间谍，即接触有关苏联导弹计划核心机密的一位著名女科学家，正当她在列宁格勒的大桥上往一块空心砖里投置情报时，被克格勃当场抓住。尽管中央情报局并未完全废弃这种投置信件的做法，但他们已有惨痛的经验，因而给它取了一个可怕的别名，叫做“投置死亡”。中央情报局很清楚，联邦调查局招募的是一名把当间谍看作做游戏的新手，因此不大可能对他进行复杂的职业培训。他被识破和处死的可能性很大，同样他也很可能转过身来反对美国人（我们常用“急转弯”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情况）。至少有一位参加两局联席会议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联邦调查局已经把事情弄糟了。要想把这项工作做好，必须把这名学生从伊朗带出来、重新加以训练，个别谈话，用测谎器考验他的忠诚，给他装备无线电、识别器、密码等设备，然后再送回伊朗、这就是中央情报局所谓的“建立信任和某种通讯系统”。

会后，中央情报局近东处和伊朗科负责专案的官员们，开始起草完成上

述诸项任务的详细计划。在几天之内，他们就决定把这名新招募的间谍带出伊朗，并指定中央情报局在波斯湾的一个情报站来负责这项任务。他们判定，尽管把他直接带到西德的法兰克福更好，但这样做危险性太大。（中央情报局的德黑兰情报站已从伊朗撤出，暂驻法兰克福，该站叫做德法兰，即德黑兰—法兰克福的简称。它是中央情报局海外最大的情报站之一。）

中央情报局最后的计划，在上述两局在兰利召开的联席会会后的一周内被批准。这项计划要求把那名间谍带出伊朗，并在一个秘密场所训练5天。这是一个紧急的培训计划。近东处负责秘密工作的官员们知道，他们得抓紧进行训练，因为他们同时还得准备布置一套假象，以防止他们的工作计划被霍梅尼的情报部门所发现。这项训练的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这名间谍被葬送掉。他将接受中央情报局的通讯设备，并且得到详细的指示，使他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向美国传递情报。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很有信心，认为他们将成功地保护这名间谍，不让他被发现，但他们也了解这项工作仍然是十分危险的。就象他们一贯采取的保险措施那样，中央情报局还计划指定一位在德黑兰工作的外国官员负责追踪这名新闻谍的工作，并为他设计出一个逃跑计划，这种计划过去他们曾成功地运用过。

1985年10月中旬，正当中央情报局即将开始执行它训练计划的前几周，一位近东处的官员从这名间谍在联邦调查局的联系人那里，接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电话。这位联邦调查局的人说，他接到这名伊朗学生的报告，这项报告可能会使美国难堪。这名伊朗学生说，他被指派负责带领雇用他的那位伊朗政府高级官员去视察伊朗的军事设施。他们这次去的地方包括大不里士的军事基地，那里离苏联很近。据这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说，这名伊朗学生站在大不里士军用机场的停机坪上，曾看到一架象是美国但无标志的飞机正在卸下一些先进武器。这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停了一会，想试探一下接电话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反应，然后询问行动部是否正在执行一项秘密向伊朗提供武器的计划。这位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回答很简短。他说，中央情报局不知道任何向伊朗运送武器的事，并补充说，这样做是违反美国的既定政策的。伊朗被定为一个奉行恐怖主义的国家，因此，这名伊朗学生一定搞错了，对此事不可能有其它解释。

尽管这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对此断然加以否认，但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在中央情报局又重新引起猜疑，在那些日子里，行动部近东处整天关着门开会究竟是怎么回事。当大不里士的见闻传遍了行动部的时候，接到电话的官员把这一情况向近东处副处长特威腾作了汇报。这位官员把这名伊朗学生最新的工作情况向特威腾介绍了以后，曾表示担心，中央情报局在更高一级进行着的另一个计划，可能会危及近东处本身的间谍网。特威腾很快采取行动。他立即要求重新彻底审查该处对联邦调查局这名伊朗间谍的训练计划。他还断然否认任何在更高一级水平上进行的向伊朗秘密提供武器的行动计划。

特威腾对计划审查的结果是，它重新确定了它同那名将可能发挥重大作用的伊朗间谍的关系。在接到大不里士报告的几周内，中央情报局决定结束它训练伊朗学生的计划。表面上的理由是，他提供的情报是虚构的，这就使他成为一个不可靠的情报来源。一位行动部的官员说，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是，这名中央情报局未来的间谍发现向伊朗运送武器的活动，而这项活动原本是保密的。

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就在中央情报局同意由它来控制联邦调查局在德

黑兰的那名间谍以后不过几个星期，这两个局的相应人员在一起又开过一次会。这一次，伊朗科科长首先发言，他通知联邦调查局说，中央情报局现在又改变了主意，它对那名伊朗学生不再感兴趣，不再想从他那里获得什么情报。参加会议的联邦调查局官员们虽然对中央情报局这一态度的改变感到吃惊，但他们除了接受这一事实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他们把这看作是两个局之间关系冷淡的又一表现。

如果不是因为凯西的死和有关韦伯斯特批准任命前的听证会，上面谈到的整个事件可能会被人遗忘。在中央情报局通知联邦调查局它不再对那名伊朗学生感兴趣以后将近 18 个月，中央情报局被指定替韦伯斯特搜集局内材料的官员们有些担心，这一事件可能影响他的批准任命。可能已有人将武器换取人质的计划向韦伯斯特作过汇报，而且他也不知道联邦调查局在德黑兰的那名间谍发现有关飞机的事。这种担心终于被事实所证明，当时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在听证会前写给韦伯斯特的一封长信中，曾向他提出他是否“单独”从“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中获悉有关以武器换取人质的行动计划。这一提问的措辞促使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得出结论，这个委员会已经觉察到两个局之间原来商定而后来又流产的计划。在 1987 年 4 月末一个寂静的早晨，中央情报局驻国会山负责立法事务的官员曾给兰利挂了一个电话，确认中央情报局 10 月里企图招募那名伊朗人的详细计划，已经有人泄露给这个委员会了，很显然是联邦调查局的人泄露的。这位官员说，这份报告包括那名伊朗人所说的他曾于 1985 年在大不里士的机场上看到一架美国造飞机的概述。而这个时间是在中央情报局承认它参与了奥利弗·诺斯以武器换取人质计划一个月之前。

这一情况立即上报给伊朗科的新科长弗雷德·伦达尔，此人又提醒新的近东处处长特威腾注意此事。后者马上惊呆了。正当人们设法证明威廉·韦伯斯特是一位称职、诚实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因而也理所当然是一名称职、诚实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候，他自己的局却得到了可能对他担任新职务造成致命威胁的情报。这一报告对中央情报局也形成一种威胁，因为它将推翻中央情报局声称它在 1985 年 11 月前未参与向伊朗运送武器的说法。这是一项不能再坏的消息。在伊朗门事件引起很大震动的情况下，特威腾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中央情报局没有参与策划 10 月份那次运送武器的事件（如果真有这一事件的话），即使事实上并没有这么回事，人们也不会相信，而特威腾对他的高级助手一直都是矢口否认的。

特威腾采取了他可能采取的一切措施去防范这一威胁。他指定参加两局会议的官员们去写一份有关这一行动计划的书面总结。此外，中央情报局还私下向参议院再一次否认它在 1985 年 11 月前曾秘密向伊朗提供武器的说法，并且说明即使在 11 月间，它也是受白宫之命，帮着一架在葡萄牙的飞机取得着陆权，以执行一项它当时认为已得到总统批准的行动计划。中央情报局还辩解，该局在这件丑闻中的作用与韦伯斯特是否听说任何秘密的计划没有什么联系。他当时在联邦调查局，从未听说美国向伊朗运送武器的事。中央情报局代替韦伯斯特所作的回答也清楚他说明了中央情报局本身的立场：那名伊朗人提供的报告是错误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情报局决定不招募这个人的首要原因。

几天之内，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有了它自己现成的解释：它的结论是，材料说明在大不里士发现的那架飞机（它特别补充说，如果真有这架飞机的

话)，并不是美国飞机尽管究竟是哪一国家的飞机谁也说不好。如果要确切证实这是一架（执行向伊朗提供武器任务的）美国飞机（而且早在中央情报局承认自己受命于白宫，参与策划和执行这项计划以前，这项行动已在计划和执行，而这一切中央情报局当时都是知道的），必需飞机上有美国标志，而这架飞机并无这种标志。换句话说，根据联邦调查局所提供的材料，无法作出结论，它不能证实任何问题。一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调查官员说，“我们无法说这件事到底是真还是假。有可能当时在大不里士机场上的确有一架美国飞机，中央情报局也知道这件事，并且是它在经办给伊朗秘密运送武器，它这样做可能已有一段时间了。但我们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我们也不相信有这样的事。”

这件事仍然很令人焦心。没有人否认在8月份炎热的一天，曾有一架飞机在大不里士机场卸下它装运的武器，只是无法证实这一报告。也没有人否认，联邦调查局里有人对外泄露了情报，表明该局曾在1985年招募了一名伊朗学生，让他向美国提供有关伊朗的情报，这名伊朗人很受信任，能接触一般人接触不到的军事和政治机密。在一情况显然是有人故意向参议院泄露的，目的是为了韦伯斯特的任命得不到批准，并且使人们对韦伯斯特否认他事前知道伊朗门事件产生怀疑。对韦伯斯特来说很幸运的是，这一事件的真相，无论当时和现在，都始终弄不清楚。最后，参议院的那个委员会相信了韦伯斯特，也相信了中央情报局，两者都矢口否认他们了解上述情况。

有关大不里士的报告，还有几件其它的类似传闻，继续使有些人纠缠不休，怀疑威廉·韦伯斯特对伊朗门事件的了解，是否要比他自己承认的要多些。这种怀疑又导致在国会中流传一种说法，说里根总统已过晚地认识到，他委托韦伯斯特接替凯西当中央情报局局长，是犯了一个错误。这种传闻还说，在前参议员约翰·托尔拒绝考虑中央情报局的职位之后，霍华德·贝克和里根总统很快决定提名韦伯斯特，是因为他们以为他很容易获得批准。对他们来说，这比找一个适合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人更为重要。批评者还认为，韦伯斯特作为联邦调查局局长，对伊朗门事件知道得并不少，但他拒绝更多地过问此事。逐渐有更多的人感到，韦伯斯特对有关中央情报局同意向中东运送武器的证据故意视而不见，而在同一时期，却向美国海关提供了某些私人进行的类似武器交易的情报。国会的某些成员也同样相信，联邦调查局和韦伯斯特完全了解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事，虽然从来没有人向国会和美国公众提供过有关这种错误行为的证据。韦伯斯特对这些说法很恼火，曾私下对几位同事透露，他担心参议院会利用他的提名问题进一步给里根总统制造困难，使他难以行使总统职权。韦伯斯特对于针对他的指控，都断然加以拒绝。

对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向他提出的有关伊朗军备交易的书面问题，他回答说：“我第一次听见美国官员可能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提供非法和未经授权的援助，还是在1986年11月25日在总统和司法部长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以及在司法部长接着在他办公室召开的会上。”

在第二份提问的书面材料上，有人问韦伯斯特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他是否从“其它来源”了解到美国政府向伊朗运送任何武器的消息？这个问题对韦伯斯特来说，正好像前一次对中央情报局提出的，它是否了解这一行动计划的问题一样，都具有同样的含义，它似乎在暗示委员会知道韦伯斯特没有向他们完全讲真话。经过几天踌躇之后，韦伯斯特收回了他第一次的回答，

说他现在已想起来有人在 1986 年 8 月曾告诉过他，“总统授权对伊朗政府的个别分子正在采取某种战略性的主动行动”。韦伯斯特说，当他听到这一计划时，曾询问司法部长米斯，这位部长告诉他，对伊朗开放是“总统的一份调查结论中所支持的，他本人也审核过”。韦伯斯特说，他本人对这一解释感到满意。因为“司法部长已表示他知道并赞成此事，而且并没有材料说明进一步还要采取什么行动。”

他的这一回答并非情报委员会博伦或其他委员所期待的。韦伯斯特似乎比较晚才意识到，参议院的调查者们已掌握了他在 1986 年 8 月与米斯的会晤，只不过是试试他是否肯讲真话。不仅如此，委员会的助手们还指出，韦伯斯特似乎是在回避问题。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对米斯的回答感到满意，也不在于对伊朗采取的主动行动是否得到总统调查结论的支持，而是他是否知道还有其他为政府所支持的类似计划，例如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资助等等。韦伯斯特是联邦调查局局长，他的职责是执行法律，而不是满足于人家随便给予的某些答复。最后的结果是，当他在 1987 年 4 月初出现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时，他遭到比许多中央情报局的人所预期的更为严厉的质询。委员会的提问围绕韦伯斯特和米斯讨论出售武器问题。尽管这些提问并没有变成敌对似的交叉盘问，但它们也相当尖锐，使韦伯斯特派的人很不高兴。他的一位顾问回忆说，“他们以同样的方式，问他同样的问题，不下几十次。的确毫无必要。”

这种为韦伯斯特鸣不平的事，实际上不过是对委员会态度的过分敏感，而后者只不过是要摆出一副姿态，好像韦伯斯特的任命也并非板上钉钉。虽然波伦和他的同僚们如果发现韦伯斯特参与了伊朗门丑闻，他们肯定会拒绝认可他的任命，但现在看来很清楚的是，如果没有这一情况，批准他的任命是肯定的。最后委员会更倾向于相信韦伯斯特本人关于他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的解释，而不是相反。举例来说，威廉·科恩非常肯定，如果韦伯斯特对伊朗门事件有什么了解的话，那“最多也不过是知道一些皮毛”。波伦在韦伯斯特被任命的那天，已经和其他人一起在对他加以赞扬了。波伦私下对他的同事们说，他看不出“任何理由不让他当中央情报局局长。”

但是，对韦伯斯特持批评态度的人来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仍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韦伯斯特究竟对白宫向伊朗运送武器的计划知道多少。这些批评者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参议院都有，他们坚信，联邦调查局在德黑兰的间谍可能掌握了解开下述秘密的钥匙：中央情报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的这项行动计划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譬如，委员会的一些助手们就曾指出，1986 年 8 月韦伯斯特之所以去找米斯，唯一的理由是联邦调查局已从那名为伊朗高级官员工作的间谍学生那里得到了以武器换取人质计划的情报。韦伯斯特从任何别的地方能弄到这样的情报吗？这些批评者还说，在听到国务院的这一计划后，韦伯斯特竟然不再表示对此事有任何好奇心，这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是往好里说，如果往最坏的方面想，他甚至有可能作了伪证。而另一方面，韦伯斯特在中央情报局的维护者，听了这些批评意见后，唯一的反应是简单他说，韦伯斯特一向以诚实著称。他们都这样说，“这位法官（指韦伯斯特——译注）对委员会讲的是老实话。他不会撒谎。”

在韦伯斯特解释了他和米斯讨论美国在伊朗的行动以后，委员会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韦伯斯特自己对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看法。他们对他们所关心问

题的回答——无论是问他是否坚持要作一名里根内阁的成员，还是他对国会关于中央情报局秘密计划发出的通知——都是相当令人鼓舞的。韦伯斯特告诉这个委员会，他要改变凯西作为阁员在白宫里坐着开会的做法，并且坚持中央情报局局长“不应该参与政策问题的讨论”。最后，韦伯斯特在受到压力的情况下，答应他将让委员会“充分了解”它的秘密活动。这正是委员会的成员们所希望听到的。在4月的最后一天，他们一致批准里根提出的中央情报局接任凯西的人选。一个月后，参议院在5月20日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再过六天，威廉·韦伯斯特进行了宣誓，在弗吉尼亚的兰利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他的女儿在他宣誓时为他手持圣经。第二天早上，他在一队新的保卫人员护送下来到兰利，开始了他在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全天工作。

3 联邦调查局来的新人

老局长走了，新局长来了，老资格的官员们一个个退休（然后与局方签合同当顾问），那些上了年纪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资料、行动计划、传记和统计数字的研究员们也在领取养老金，但中央情报局，虽然饱经沧桑，它的秘密工作仍然坚持不断。1987年5月26日，就在威廉·韦伯斯特宣誓就任美国第14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候，这个情报机关已深深地卷入了在两个洲的5大秘密行动计划，它同时还在跟踪正在巴拿马发生的、一场叫美国左右为难的危机。在局内，它还在试图解决一场因中央情报局一名叛徒的问题而引起不和的内部争论。韦伯斯特要处理的这5大秘密行动计划，说是秘密，实际上仅是名义上的。其中的每一个都在报刊上披露了，并且受到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仔细审查。这些行动计划的细节，不仅大都为公众和国会所知。晓，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已成为政府里激烈辩论的题目。至少在一个案情中，中央情报局的声誉和工作，看来都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害。

在东南亚，中央情报局在向柬埔寨的三支非共产党抵抗力量提供援助，它们正在与越南支持的金边中央政权作战。而这些抵抗力量又与红色高棉结成同盟，后者曾犯下了某些现代历史上最可怕的罪行。红色高棉从中国方面得到武器弹药和财政援助，而中国又是美国经常的地区性盟友。他们的对手越南，一直在依靠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作为报答，向它在远东的军舰提供一个大的海军基地。中央情报局的柬埔寨计划是行动部的东亚处经办的。它通过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每年向泰国东部和东北部的柬埔寨抵抗战士，提供3,000万美元的援助。

中央情报局同时还卷入了阿富汗重要的军事战役，给阿富汗圣战者组织提供价值以百万美元计的先进武器，这是一个由一些长期作战的部落军队组织起来的松散联盟。他们用这些武器来抵抗1979年入侵这个国家的装备精良的苏联部队。用于这项计划的资金都是通过中央情报局在欧洲和南亚的组织系统调拨的，绝大部分军火则是通过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运往阿富汗的。中央情报局的某些款项是用来支付阿富汗地面战争的费用。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可以从邻近的巴基斯坦监控这场战争，他们的大本营设在卡拉奇，在伊斯兰堡也有一个配备了得力人员的情报站。和在柬埔寨一样，中央情报局的阿富汗计划由于中国向抵抗部队输送轻武器而得到加强。在兰利没有一个小的小的联络办公室，负责协调庞大的后勤网络，并策划在阿富汗的军事进攻。这个阿富汗工作组在中央情报局第六层楼，设在近东处内，隔着一个过厅就是伊朗科的办公室。

在安哥拉，中央情报局每年给乔纳斯·萨文比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译注），这是一个反对和苏联结盟的罗安达政府的抵抗运动。萨文比的力量日益壮大，并自1985年开始从美国方面获得武器，这是在美国国会取消了对中央情报局安盟秘密行动计划长达10年之久的禁令以后的事，与10年前美国的援助相比，现在每年1,500万美元是太少了，当时每年运送给萨文比的武器价值达3,000万美元。对萨文比的这项援助计划，由于南非和中国也给他一些帮助而得到加强，这一情况使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多少感到一些安慰。但所有这些援助加起来，仍远远抵不上苏联给安哥拉政府每年多达10亿美元的援助，何况后者的力量，又因有数以千计的古巴军队驻在那里而更加强大。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萨文比的运动在1986

年取得了进展，当时苏联支持的罗安达政府开始对这场冲突感到厌倦。接着中央情报局又加紧对安盟运送武器，并且扩大了原来人员较少的安哥拉工作组，这个组最重要的现场指挥在扎伊尔金沙萨的情报站里工作。从那里，中央情报局协调各方面的行动，以便把武器从里斯本秘密空运到安哥拉西部安盟控制的隐蔽简易机场。这是一项颇为复杂的任务。

在中美洲，中央情报局向反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提供他们所急需的后勤支援和医药用品。游击队成功地不断对马拉瓜政权施加政治压力，但在和桑地诺军队的作战中却没能取得任何重大胜利。特别是在伊朗军火交易中所获得的钱用来资助游击队的内幕，在1986年晚些时候被公开披露后，人们最多只能希望，美国的支持将迫使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接受公开大选，或者让游击队代表的反对派参加政府。中央情报局那个并没有什么危险的援助计划，此时作为秘密已是徒有其名，但在国会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并且还随时可能引起国内爆发不满。此外，被里根称为的美国“自由战士”，不管是在尼加拉瓜，还是在他们所在的东道主国家洪都拉斯，都并不得人心。由于这些原因，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对成功地解决这一冲突，或者早日结束他们的援助计划，都不寄予很大希望。

在黎巴嫩，中央情报局安插了一个人数很少但处境极端危险的情报组，负责监视人质情况的发展。当时几位美国公民被亲伊朗的革命组织所劫持，有很多神秘人物参与提供关押人质的地点。这个情报组的任务就是弄清这些人的可靠程度。贝鲁特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得到的情报总是没有用的，有的即使材料可靠，也无法利用。美国的政策是拒绝提供金钱、武器和毒品，这三件东西是劫持人质的人最希望得到的。在伊朗门丑闻之后，美国非常严格地贯彻这一政策。然而，中央情报局成功地打入了黎巴嫩很小的情报机构，并且制定出一个救出人质的颇为复杂的计划。中央情报局还开辟了一条和叙利亚情报机构高级谍报官员联系的绝密通讯渠道，以便分享关于人质的情报。了解这一渠道的美国官员，仅限于中央情报局执行秘密计划的高级谍报官员、局长、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就连叙利亚军方情报机构的负责人也没有让他知道，因为此人有强烈的反美情绪。这一渠道在1985年开通，在1987年初，在叙利亚谍报官员与他们的中央情报局同僚在贝鲁特举行的多次会议中正式使用。

自从有了这五项秘密计划以后，每一项计划都遭到攻击，通常是由于国会对这些计划的有效性提出质询，或者是由于新闻界提出问题后引起了争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央情报局这些计划中最有争议的是中美洲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同时是最稳定的。甚至在出现了几次令人难堪的局面以后（凯西关于炸毁尼加拉瓜港口的灾难性决定，奥利弗·诺斯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秘密空运武器），中央情报局中美洲计划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得出这一令人吃惊的结论，是由于伊朗门丑闻迫使中央情报局更加密切地监控中美洲的这一计划，否则就会面对国会进一步的指责。中央情报局在非洲、亚洲或者中东的其它行动计划中，不存在这种强大的压力。

威廉·韦伯斯特宣誓就任局长的那天，行动部正在研究其它四项行动计划引起的较小的丑闻。这些糟糕的情况说明，一些不可靠的外国关系，有时会让中央情报局吃多少亏，上多少当。举例来说，在泰国，主管秘密行动计划的高级情报官员正在试图追查，美国准备用于支持在柬埔寨作战的几支军队的几百万美元，究竟到哪里去了。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相信，这些资金已被

人吞掉，但根据他们的调查材料无法作出结论，因为弄清资金的去向必须层层追查，而这样做是很困难的。中央情报局的资金要通过三帮人之手，一是美国、泰国和柬埔寨的官员，二是一些泰国和新加坡的银行，三是中央情报局和泰国分别雇用的独立承包商。这一调查由于下面的情况更加复杂化了：在泰国惯于搞阴谋诡计的政坛上，军队和政府里的官员互相争夺权力，双方都拼命向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泰国王室讨好。

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在兰利，阿富汗特遣工作队的高级谍报官员特别关心的问题是，常常听到他们所支持的反叛组织抱怨，答应给的武器他们并没有收到，尽管没有人能查清这些武器的去向。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这些武器被弄到伊朗去了，另一种说法是有人看到它们已落入俾路支人之手，这是居住在伊朗边境地区的一个有时会很粗野的反叛部落。另有一个可能更接近事实的说法，即巴基斯坦的一群军官从游击队那里扣下了这笔资金，作为“在南亚做买卖的代价”。这项计划另一个糟糕的情况是，中央情报局常接到驻巴基斯坦工作队的报告，说它提供的武器被转卖掉，从而肥了阿富汗部落首领的腰包。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准备运往阿富汗的武器，最后在白沙瓦的市场上出现，或者被转卖给急需武器的民兵，用来换取毒品。（这些毒品又被卖掉，用以向腐败的巴基斯坦军官提供“零花钱”。）只要长了眼睛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执行这项计划引起的贪污腐化。在西巴基斯坦城市街头的小摊上，只需用 500 美元就可以买到一支新的卡拉西尼科夫 AK—47 型的苏联制步枪，这就是中央情报局运进来的武器。一位巴基斯坦官员说，他的国家已变得到处都是“卡拉西尼科夫文化”。

通过邻近的在扎伊尔的基地，向安哥拉反叛力量提供援助的计划，没有发生那么严重的问题。但是，腐败现象也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即使在西非人口稀少的平原和森林地带也是这样。正像美国资金威胁巴基斯坦的稳定一样，中央情报局在扎伊尔的明显存在，也滋生了一个美国被盗物资的黑市市场。美国运往扎伊尔的援助，很大一部分进了这个国家最富有、最有权势的政客的腰包，其中包括它的总统。到 1987 年，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六十年代早期外界知道的名字是约瑟夫·蒙博托——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尽管他所领导的国家，从贫穷程度来说，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这笔交易差不多已成为一项公开的政策。维持安哥拉的萨文比部队，其代价是在金沙萨付出的。

在黎巴嫩的行动计划虽说没有严重的财政问题和腐败现象，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情况更加严重。由于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禁区”，在这里工作随时都担心出问题。1987 年的黎巴嫩到处都有中央情报局的敌人。其中包括马龙派教会的基督徒们，他们认为美国连它的天然盟友也不大敢支持：有德鲁兹民兵，他们对美国在 1983 年干预他们在舒夫山根据地的行为，仍然耿耿于怀；特别是那些扣留美国人质的赫兹博拉民兵更是如此。1987 年初，中央情报局曾试图冲破在贝鲁特包围它的力量，它成功地从纳比·贝里的阿马尔民兵中招募了一些人为它工作。但贝里的力量太分散，而且不为黎巴嫩其它交战的各方所信任，因而收效甚微。中央情报局的高级情报人员，鉴于过去在这一地区的惨痛历史，也不敢过深地卷入黎巴嫩的事态。举例来说，1983 年中央情报局损失了两名高级情报官员——罗伯特·艾姆斯，美国负责中东事务的情报官员，另一位是肯尼斯·哈斯，他是中央情报局贝鲁特情报站副站

长。他俩在美国大使馆被炸弹炸毁时丧生，这枚炸弹是放置在一辆轿车里的。这以后又发生了绑架威廉·巴克列的事件，他是中央情报局贝鲁特情报站的站长，曾被施以酷刑，最后也死掉了。

在柬埔寨、阿富汗、安哥拉和尼加拉瓜，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计划都是支持本地的反叛者去反对苏联支持的政府。在黎巴嫩的计划，则不像这样有一个集中的目标。中央情报局的目的主要是招募谍报人员，以搜集情报。（如弄清人质被关押的地点，对美国利益的威胁进行评估）它也曾努力试图建立一支由多派别的人员组成的黎巴嫩军队，但这项任务过于艰巨，似乎并不可能。由于这些目标的性质，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高级谍报人员很难确定它的工作成果。例如，有关人质状况的情报交易，已经成为一项颇为时兴的行业，吸引了几十名黎巴嫩、叙利亚、伊朗和德鲁兹的投机商，他们都声称自己是人质劫持者的表兄弟、兄弟、父亲、儿子，或者是他们的朋友。他们的要求总是无法满足。举例来说，一位美国政府的黎巴嫩雇员声称，他的表兄劫持了一名美国人，但准备给他自由，条件是要一笔钱。中央情报局贝鲁特情报站为了证实这一说法，跟随此人去贝鲁特的一幢别墅，人质就扣留在那里。但中央情报局没有被允许去满足要一笔钱的条件。后来，当可以作出进行援救的安排时，这位人质又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于是，一切工作又得从头开始。

对威胁美国在黎巴嫩的利益的情况进行评估，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因为美国在这里没有多少利益需要保护。白宫在黎巴嫩问题上的官方立场既平淡无奇，又十分天真。美国寻求公平合理地结束内战，建立一个代表黎巴嫩参战各派的政府。（它似乎从未考虑，正是围绕这一点，各派展开了内战。）

1987年初，中央情报局的这5大秘密行动计划——它们都是在凯西任期内制定或者加以发展的——显然都需要修订，有些还需要扩充。中央情报局每一个参与这几项工作的人，都希望看看在修订和扩充这些行动计划以前，新来的局长将要作一些什么变动。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那就是韦伯斯特将改变中央情报局内部的秘密审批程序，使那些机密性最强的计划，不致再产生那种持续不断的贪污腐化的弊端。虽然这些措施是重要的，但当韦伯斯特宣誓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候，这些问题与另外两件有争议的事相比，仍是比较次要的，这两件有争议的事，后来证明是中央情报局最难以对付的问题。

巴拿马的独裁者曼努埃尔·诺列加同时也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他已成为中央情报局最严重的问题。这位蛮横的军事指挥官引发了一场大丑闻，它的波及面很广，可能会暴露中央情报局每一项重大行动计划中的贪污腐化情况。诺列加不仅是一名前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而且是一名毒品贩子，贩卖军火的奸商和侵吞钱财的骗子。他和国际上的情报界有着广泛的联系，有许多可疑的朋友，这些都威胁着美国的利益。更为糟糕的是，在行动部拉丁美洲处，有两个对立的派别在如何处置此人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派主要由这个处老资格的反共人士组成，他们反对美国干涉

巴拿马。另一派则坚决相信，美国必须帮助发动一场政变去推翻诺列加。争论异常激烈，在中央情报局这样有保密传统的部门，其公开化的程度，实在令人吃惊。

实质性的问题是，中央情报局是否应给巴拿马的反对派组织提供资金，这些组织是一心一意想把诺列加赶下台的，还是什么也不做，希望迟早有一

天，和他在一起的那些军官反正总会把他赶下台。使这一争论更加复杂化的还有以下一个事实：拉丁美洲处的前两任领导，即喜怒无常的、年迈的积极分子内斯特·桑切斯，以及他的继任者，衣著华丽的德韦·克拉里奇，他们都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同时又是诺列加的支持者。1987年，克拉里奇作为中央情报局头号反恐怖主义专家，曾为诺列加辩护过，而当时的桑切斯在国防部也担任类似的重要职务。他们两人结合在一起，有足够的影晌和威望，能挫败任何想把诺列加赶下台的计划。当韦伯斯特出任局长时，事实非常清楚，中央情报局不可能在赶诺列加下台的问题上有任何作为。

在诺列加问题的争论中，过去拉丁美洲处中的积极分子（即赞成先下手的人们）和主张尽量少掺和的人（即不赞成进行干预的人），实际上都从自己过去长期坚持的立场向相反的方面转化。在这种很不寻常的变化中，那些原来主张尽量少掺和的人（按照他们过去的传统做法，他们应该主张不要采取措施去推翻诺列加政权），在诺列加问题上，实际上是在推行积极主动的政策。另一方面，那些过去的积极分子，他们通常都激烈主张把诺列加赶下台，现在却主张谨慎从事，采取慢慢来的政策。在以后的两年里，行动部里的这两派，争论的嗓门越来越大，大有公开对抗的发展趋势。

围绕诺列加的争论有些令人惊讶，因为拉丁美洲处一向在中央情报局内是以保守著称的部门之一。特别是它对那些腐败的亲美独裁者一些异乎寻常的表现，显示了一种愿意宽容的态度。这一传统是一系列失败所形成的，并已变得根深蒂固。这一系列失败包括：在五十年代里，支持古巴的铁腕人物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接着又狂妄自大地想把接替他掌权的共产党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赶出西半球；这些就是它所犯错误中最突出的例子。紧随着古巴政策上的失败，中央情报局又笨拙地策划了反对智利信奉社会主义的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活动（他在中央情报局支持的一次政变中，被一些智利军官所杀害）。其后，它又没能说服卡特总统继续支持尼加拉瓜的铁腕人物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接着，它又未能建立或支持任何政治集团，去对抗索摩查之后的桑地诺主义政权。最后，因迫于解决围绕诺列加问题的内部冲突，中央情报局作出了暂时休战的安排，延迟在巴拿马问题上摊牌。局领导用典型的官僚主义方式，指定几个人专门秘密研究这个问题，要求在1988年12月拿出一个研究报告来，在这以前，算是保持了一段时期的平静。

可是，行动部的苏联东欧处，却并非那么平静。那里的官员们，由于该处的前谍报人员爱德华·李·霍华德叛变，刚刚从强烈的震撼中开始恢复过来。此人曾准备在受训后派往莫斯科工作，后来于1985年匆匆逃往苏联，出卖了一些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还有五六项高度机密的搜集情报的计划。霍华德过去能接触苏联东欧处的专题档案，这就意味着他可以指出所有在最近的将来在莫斯科服务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没有人确切地知道，霍华德究竟向苏联人提供了一些什么材料，泄露这些机密将产生什么后果，但很明显的是，苏联东欧处得重新布置它的谍报工作计划，追查责任，并确定如何防止类似霍华德的事件重新发生。局领导还指定专人就内部问题作一些研究报告。

作为这些有争议的检查报告的中心人物是62岁的加德纳·格斯·哈撒韦，他是中央情报局反情报工作机构的负责人。他的职责是，找出问题在哪里，问题发生的原因，它对中央情报局将意味着什么。尽管哈撒韦作为一名高级反谍报工作官员颇有名气，同时也是中央情报局高级圈子中的一员，但他却在处理霍华德丑闻的问题上受了批评。人们普遍认为，他在发现和处理

这一问题，以及采取补救措施等方面，都表现拖拖拉拉。

这一批评其实是不公平的。这位弗吉尼亚来的、有一点南方山区口音的贵族似的人物，既没有对霍华德的能力进行过评价，也不是他最后决定在1983年把霍华德派往苏联的。这项工作后来都是留给苏联东欧处做的。他们负责教育、训练他，向他提供情况，对他用测谎器进行测试，然后重新加以训练，再一次进行测试，准备让他去做那极端机密的工作。直到这最后一次测试以前，他都证明是一个完全合格的中央情报局谍报人员。但就在这最后一次测试中，在回答一些很寻常的问题时，发现他有欺骗行为。他当时被问道，有无盗窃中央情报局机密文件的行为。他最后承认的事，被一位苏联东欧处的高级情报官员很宽大地称之为“小偷小摸行为”，并在1983年6月把他开除了。在他被开除几天以后，他没能通过测谎器测验的事在局里传开了，引起了一场震动。在霍华德被开除后，哈撒韦手下的人被指定去研究，他是否会构成一个对安全的威胁。最初，哈撒韦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能对霍华德是否把偷出来的材料交给了苏联人提出怀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哈撒韦和他的高级助手逐渐越来越相信，霍华德的确是钻进中央情报局的一名间谍，或者叫“地下工作者”，至少在一个短时期内是这样，但是，没有对霍华德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他悄悄地回去过他的平民生活。这种无所作为的态度，后来由于克莱尔“乔治·威廉·凯西和哈撒韦本人作出决定，不要把霍华德的有关情况转给联邦调查局，因而把问题弄得更糟。这个决定是哈撒韦32年的事业中最引起争议的事情之备受尊敬的哈撒韦被提拔来领导反谍报工作，是在海外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他先是在拉丁美洲和欧洲工作，后来在莫斯科的情报站当站长，这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职位，此后又担任过苏联东欧处副处长。他被提拔去领导中央情报局的反谍报工作，对他和他的同事来讲，都有些意外，因为该轮到他来领导所有有关苏联和东欧的行动计划了，这一职务是苏联东欧处的每一个人都很羡慕的。但是，哈撒韦调去领导反谍报工作，在全局都被认为是一项值得称道的人事调动，因为他的声望很高，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这种看法后来由于维塔利·尤尔岑科在1985年投奔美国，已证明是正确的。对哈撒韦和中央情报局来说，尤尔岑科令人吃惊的突然投奔美国，真是一件特别运气的大好事，因为此人曾担任克格勃第一行动部第一处副处长，实际上负责在美国和加拿大所有的非军事间谍活动。

然而，哈撒韦的胜利是短暂的。尤尔岑科提供的情报反倒给中央情报局当头一棒。在他变节以后不久，他告诉哈撒韦，克格勃从一位美国公民那里，了解到有关中央情报局在苏联的行动计划的重要情报，此人的代号叫“罗伯特”。尤尔岑科提供了有关这个克格勃的美国特务的许多细节，足以使反情报工作组的人和苏联东欧处很快可以判定，事实上，这个“罗伯特”就是爱德华·李·霍华德。1985年，在开除他两年后，中央情报局最后把霍华德的情况告诉了联邦调查局，后者开始派人跟踪这个前中央情报局官员。但霍华德已经察觉，他采用了他在中央情报局学到的那套反监视的策略，以逃避联邦调查局在他新墨西哥州住所外布置的密探的监视。霍华德逃到欧洲，旅行到哥本哈根、赫尔辛基、法兰克福和慕尼黑。按照他的自述，他后来用了一个假名，在拉丁美洲和加拿大呆了一阵子。然后旅行到维也纳，最后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苏联大使馆里出现。

在霍华德的这场灾难之后，哈撒韦很快又遭到一次严重挫折。在把“罗

伯特”作为克格勃的间谍供出来以后，尤尔岑科对自己的变节进行了重新考虑。在抵达华盛顿后的几周里，尤尔岑科被安排住在很舒适的房子里，外面有人守卫。他被介绍给一些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谍报官员认识（他参加了一次不寻常的威廉·凯西的宴会），甚至还飞到多伦多，在那里，加拿大的情报机构帮他找到过去的情妇。但中央情报局为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不能满足这位前克格勃官员。他还对中央情报局有选择地透露他叛逃的某些情节感到不安（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抵消新闻界因中央情报局在霍华德问题上的失误而对它进行的不利报道），并对不断地盘问他感到恼火。1985年11月2日，尤尔岑科在乔治敦一家餐馆停留时，摆脱了中央情报局派去的向导，又重新投奔苏联。

霍华德的叛逃和尤尔岑科的改变主意，对反谍报工作人员和哈撒韦卓越的事业，是两次重大的打击。到了1987年5月，这两件事引起的风波在行动部内仍未完全平息。霍华德的叛逃引起的反响最为严重，因为它说明中央情报局没有能力吸收和留住有才能和事业心的谍报人员。

当时中央情报局吸收爱德华·李·霍华德，是考虑到他是一个驯服而聪明的年轻人，有强烈的进取心，似乎很有发展前途，也相信中央情报局的使命。他过去曾在和平队里工作过，这使他比较能适应在有敌意的外国环境里工作。他有语言天才，有一种天生的很快掌握外交政策问题的本领。他很适应并掌握了中央情报局的培训要求，而且有一种在紧张情况下工作的异乎寻常的能力。但是，中央情报局毕竟应该预见到霍华德可能产生的问题。在通常情况下，中央情报局拒绝使用过毒品的人来这里申请工作。但霍华德在和平队工作时曾使用过大麻、可卡因和其它毒品，后来作为一个年轻的商人在芝加哥经商时，也同样吸用过这些毒品，但中央情报局却没有拒绝他。当时中央情报局也没有过问他那关系十分紧张的婚姻。这些潜在的因素，最后把他从一个可能是很有前途的谍报官员，变成了一个为苏联服务的叛徒。霍华德悲剧事件的余波，也是1987年面对哈撒韦的现实和最迫切的难题，是中央情报局的无能，它过去未能把机关内部打扫干净，而现在，该由哈撒韦去弄清楚，是否还有另一个霍华德隐藏在中央情报局内部。

哈撒韦担心是有理由的。那时，行动部流言四起，说韦伯斯特被任命后要有一系列改变。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反谍报工作的人员要重新调整，有些人要从兰利调走，作为另组织一个新的情报班子的骨干。1986年12月，在伊朗门丑闻暴露之后，大规模的安全检查更增加了这些顾虑，从而使行动部的工作受到损失。安全办公室的官员们特别担心，他们发现局里长期存在的安全问题比他们过去了解的更加严重。霍华德事件又一次提供了最好的例证。在用

测谎器对他进行测验时，提出的许多问题是有关他酗酒的行为的。这当时就应该引起苏联东欧处的警惕，这样的人不该派到莫斯科去。安全办公室的结论是，他偷文件的其它动机姑且不说（还没有证据说明他偷这些文件是为了钱），霍华德的酗酒是使它背叛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因素。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简单化的解释，这种说法对行动部的人来说未免太可怕了。

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声称，这里饮烈性酒是“司空见惯的”。在凯西任局长的后几年，有4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因为上班时喝酒受到正式警告。秘密情报工作大量消耗精力也助长了这一问题。不过，中央情报局官员嗜酒的癖好，在退休后仍长盛不衰。中央情报局常用的术语之一是DDO，常拿它

来代表秘密工作。一位退休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笑着形容他的上年纪的同事都是“醉熏熏的，离了婚的，走下坡路的人”（这三个词的英文第一个字母放在一起也正好是 DDO——译注），他们是“真正从事 DDO 的人”。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政府中，也是离婚率最高的机构之一。曾发生过下面这类情况：一位搞专案的情报官员的夫人，不得不从海外的工作岗位撤回国内，去接受某种治疗；整个家庭需要接受某种心理咨询；一位搞专案的情报官员因和外国外交官的夫人发生婚外关系，因而不得不从海外调回国。

酗酒和离婚的现象相当普遍，这是中央情报局的负责官员不大愿意承认的事实。中央情报局高度紧张的周围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些问题。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它本身。中央情报局是美国政府中最与外界隔绝的部门。在这里工作的人承认这种隔绝是必要的，尽管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特别是那些行动部的情报官员，自己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小圈子。全家都献身于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儿子（和女儿）继承父亲的事业，在某些情况下，女婿成为老丈人创建事业的接班人。

没有人提出，中央情报局的这种小圈子习气，损害了美国的情报活动，但毫无疑问，这已损害了它在华盛顿官方心目中的形象，那里的官员把中央情报局的人都看作是很难接近的。对中央情报局的行动部，他们更是经常这样来形容它，说它是官僚机构中的官僚机构，一心一意维护它成员的利益，这些家庭都在一起工作，一起休假，时而欢聚一堂，时而互诉忧伤。这些官员对不属于这一单位的外界人（包括其它机构的人。新闻界，特别是国会里的人），都持一种怀疑态度，这也是很自然的。对中央情报局的人来说，保密已成为一种癖好，这样就把自己孤立起来。但到了 1987 年 5 月，这里的高级情报官员已经开始担心，中央情报局与世隔绝的境况，将不利于它去完成它的使命。

这种孤立状态，对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负责人，那些每天要向总统任命的局长直接汇报的职业情报官员，有一种特别不良的影响。在海外工作了 2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后；那些最成功的职业情报官员，要在一个从政治上考虑被指派的人手下工作，而他对处理海外情报工作问题往往并没有什么经验，这种情况常会使人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某些军官的遭遇也与此颇为类似，他们常常不得不使自己的观点去适应政治上的某种迫切需要，对此，他们已经越来越感到厌倦了。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对政治和政治家，打心里有一种不信任感。尽管中央情报局的设置，正是为了使情报工作免受政治的影响，但事实上，政治仍是中央情报局内部工作机制的一部分，正如安全检查是它的一部分一样。政治和情报工作，这二者集中在中央情报局局长一个人身上。

在最高法院法官刘易斯·鲍威尔，一位他“信赖的老朋友”，主持了宣誓仪式以后，威廉·韦伯斯特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正式就职了。他对职业情报官员们说，他自己是一个他们能信赖的人。面对坐满了弗吉尼亚兰利总部大厅的听众，这位新局长很清楚，他的某些前任从未得到他们雇员的信任，他们的声望由此受到很大损失。因此，在向 3 位主要对他的任命负责的政治家（罗纳德·里根、埃德温·米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乔治·布什）表示敬意以后，他把注意力转向他的听众，他们在中央情报局工作时间之长，超过了他在华盛顿的任期。

他在发言的开头，就提到他的前任凯西，他说：“我非常想无愧于我的

好朋友凯西，以及所有过去领导过这个伟大的情报机构的人。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对过去取得的一切成就，充满了崇敬的感情，并且深深地意识到，在未来的岁月里，中央情报局将面临多么巨大的挑战。”

这个开场白是他发出的一个谦恭而必要的呼吁，同时也是一个信号，说明韦伯斯特虽然清楚他自己是个外来户，但他将立即采取措施，牢牢地把这个情报机构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也是他在那天下午所说的最后一段态度比较谦虚的话。

“今天，还有些人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但他们不能分享我们这里的阳光，因为我们的国家要求他们不要抛头露面。”他继续讲道：“我谨在此向这些人们看不见的民主卫士致敬，并且要说，我将为‘参加他们的行列’而感到自豪”。这段话还缺少过去的局长们常表现出的那种必要的、更加尊敬对方的态度。但它还是有力的，反应也是不错的。韦伯斯特最为重要的一句话是，他将“参加他们的行列”——不管他们同意与否。

对于那些参加他宣誓仪式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韦伯斯特待最后的一段话，与其说是对这里的传统的一种表面上的尊重，还不如说是一个明确的表示，说明他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今后将怎样做。鉴于当时全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伊朗门事件的听证会上，他的话立即引起了一种害怕情绪，而这一点是完全可以预见到的。他说，“不管多么困难，我们将在忠于我们亲爱祖国的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勤勤恳恳地执行我们在全球的任务”。

举行仪式后，在局长的餐厅里举行了一个寂静无声的招待会（就在七楼的局长办公室套间的附近）。紧接着，韦伯斯特初步听取了中央情报局行动计划的全面汇报，表示他已开始履行他新的职责。这是他在今后两年内，从中央情报局各部的专家们听取的汇报中的第一个。虽然在开始时，并不需要他就这些行动计划作出多少决策，但大家都很清楚，他对第一次汇报的反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定下一个调子，并且将决定他能否适应中央情报局的传统和一贯做法。韦伯斯特立即亮明自己的观点：每一个重大行动计划，特别是那些风险最大的行动计划，都必须通过他，他还要求通知所有的情报官员，他们不许从事非法活动。他对召集在一起的局里各部门的头头们说，这里没有什么模棱两可的情况，也没有作别的解释的余地。接着，韦伯斯特转过身来，对着行动部副主任克莱尔·乔治强调说，中央情报局现在正在受国会越来越严格的检查，他就任局长的头几个月，会受到国会密切的注视和监督。

3天以后，即5月29日的早上，韦伯斯特的领导能力接受了第二次考验。他当时在中央情报局的一个保密的会议厅里，对局内广大的谍报人员发表简短讲话，这个会议厅是专供这类场合使用的，他的语气与两天以前他对这些人的上级讲话时不同，说起话术，丁是丁，卯是卯，面对众人毫无惧色。他开始就说，他知道自己是个外来户，但接着说，他已为履行自己的新职责做好准备。“我和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合作过，”他说，“我了解你们，相信你们”。可是，那些挤满了会议厅的行动部的人都默不作声，只有在介绍他的时候鼓了鼓掌。总之，他们的态度是够冷淡的。

韦伯斯特在他的讲话中解释说，他有一个关于行动部的计划。实行这一计划，他将使国会中的那些持批评态度的人无话可说，同时，这将使那些在灾难性的伊朗门事件中责任最大的人，在不伤和气的情况下离职。一位已退休的前行动部的官员回忆说，“他很硬气，但也就这样轻易地把我们打发了”。韦伯斯特虽说是要对凯西时代的极端行为作彻底调查，但他却和过去15年来

成批地开除人的那种做法保持距离。“不会反过来指责你们，不会大批开除人，不会进行清洗，”他告诉那些沉默的听众说，“但对那些违反我们规章制度的人，要求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交代”。他然后表示要尊重中央情报局的保密传统，他保证将继续对中央情报局最机密的行动计划采取保密措施，使它们不致泄露给新闻界或公众。但他特别指出，他的这一说法并不能进一步引伸到国会，因为按照“法律”要求，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必须向国会报告。在结束他的讲话时，他再一次重申中央情报局必须维护法律，在他任职后的第一周里，每次会上都反复强调这一观点。

正当行动部的人在等待他宣布谁将负责领导中央情报局的内部调查时，韦伯斯特很快把话题转向重新建立中央情报局被损坏的声誉问题。第二天，即5月30日，他任命联邦调查局发言人威廉·贝克作为中央情报局公共关系办公室主任。贝克在联邦调查局时，曾在韦伯斯特手下忠实地工作过3年，他是该局近期历史上最开诚布公、最有成效的新闻官之一，现在他来到中央情报局。但他的这一任命，却使行动部的人感到害怕，因为这意味着韦伯斯特前一天所呼吁要开诚布公的主张很快将付诸实施。这一任命还表明，已经改变了凯西优先挑选行动部的人作为公共关系官员的做法，因为凯西相信这些人最能判断哪些东西应当保密。贝克的前任，乔治·劳德，是一名有21年秘密情报工作经验的人。他在行动部很受信任，并且被大家看做是最理想的中央情报局发言人。但对新闻界来说，劳德作为新闻发布官是徒有其名。一位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承认，“他是行动部的一个工具，他的任务是不让新闻界干预中央情报局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贝克的任命在行动部内引起很多人不高兴。他们认为他不懂保密的必要性。

在贝克任命宣布后的第二天，行动部伊朗科科长就对韦伯斯特说，“我们不需要这一切，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记者在围着我们转”。

韦伯斯特表示不同意。6月中旬，当对任命贝克的抱怨越来越多时，韦伯斯特对他的私人助理说，“老是拒绝别人提问总归有一个限度。我们不能否认存在一个中央情报局”。在韦伯斯特的坚持下，贝克还是走马上任了。但在行动部，抨击之词仍不断涌现。这里的官员们用讽刺的口吻开玩笑说，他该把中央情报局作为一个观光点列在旅游车日程表上了。贝克犹如走进了一个埋伏圈。他从联邦调查局来已经够糟的了，韦伯斯特还让他取代劳德去搞公共关系，而劳德又是中央情报局行动部备受信任的老积极分子，这就更糟糕了。劳德是个个子高高的、面带微笑的人，他懂得他的主要任务是阻止新闻界的提问，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利用新闻界的某些人，作为中央情报局可能感兴趣的情报来源。有一次，劳德甚至笑着告诉他的一位同事，他把在情报工作生涯中招募外国间谍时用过的许多手腕，也用在新闻界的人身上。

韦伯斯特对贝克的任命，使早在酝酿中的关于中央情报局应该如何与新闻界打交道的争议，又重新挑了起来。正如情报局过去的反恐怖主义专家戴维·惠普尔所说，主要的问题是：“大多数人都害怕，对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在公众面前宣扬过分。他们完全反对这种做法。不仅行动部里的人反对，每个部里的人都反对，大家都反对。正因为如此，在中央情报局，人们普遍用怀疑的眼光看公共关系办公室。对于这一点，劳德心里比任何人都明白。在他成为公共关系负责人以后，他决定按照过去的老办法办事，就是人们常说的，“把盖子尽量盖严实”。

贝克可不一样。他是韦伯斯特训练出来的，懂得如何向新闻界敞开大门的艺术。贝克来中央情报局以前，已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了18年，最后担任的职务是国会和公共关系办公室主任助理。他曾在联邦调查局专门学过新闻媒介关系学，并对此颇感自豪。在他上任的第二天，当他在第六层楼转一圈的时候，曾不厌其烦地一再提到这一事实，当然在这样做时多少也有点紧张。一位行动部的官员对他说，“他们（指新闻界）恨不得吃掉你”。“不要主动透露什么，这样谁也不能说你撒谎。”另一个行动部的官员给他提出类似的劝告：“你去买一架录音机，把‘无可奉告’这句话录上，然后，你可以去买一艘帆船。”贝克在中央情报局内到处转了一圈以后，韦伯斯特在会议厅给他安排了一次会，让他和行动部的各科室领导见面，利用这个机会来说明，新的局领导希望同新闻界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位行动部的官员回忆说，“当介绍他给大家认识时，连礼貌性的鼓掌都没有，我们都毫无表示地坐在那里。”贝克想冲淡这种不信任的气氛，他表示希望他“在完成这项工作时，能做到有乔治·劳德一半那样好就行了。”（如果真是这样，行动部的入也就满意了。）他还补充说，中央情报局要想保持公众对它的信任，唯一的办法是让新闻界提问题，但不要透露宝贵的“情报来源和我们所使用的方法”。

这次贝克的招待会开得比他想象的坏多了。他说，“那天，我走进会议厅时，满屋都坐着一声不响、精神又有些紧张的人。其中有些人正在接受政府的质询，所有人都担心，认为国会将要调查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计划。大家都很生气，认为由于新闻界透露了伊朗门事件，已危及参与这项秘密计划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和它招募的间谍”。他们像对待韦伯斯特一样，把贝克也看成是一个外来户。贝克事后承认，“我完全相信，他们看我刚从联邦调查局过来，又是一个在公共关系方面积极主张开放的人，对我参加这里的工作，根本一点也不欢迎。”

韦伯斯特最接近的朋友说，他有一个公共关系计划，这项计划远远超出他的任何前任有关这类计划的设想。他希望实行一个公开化的政策，改变中央情报局是一个从事肮脏勾当的秘密机构的形象。他相信为了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是宣传它的成就。委派威廉·贝克负责公共关系，是实行这一计划的第一步。韦伯斯特还向中央情报局负责与国会联系的官员们宣布，不得向国会隐瞒真相，这是它实行这一战略计划的另一步骤。他对那些在国会里捍卫中央情报局利益的助手们说，“任何时候都不要撒谎。不要对国会讲任何不应告诉他们的话，但不能撒谎。如果你们对回答任何问题感到有困难，让他们来找我。”

韦伯斯特的意见立即遭到反对，反对的主要是凯西时代的那些老资格人士，包括克莱尔·乔治，他仍是行动部负责人，还有德书·克拉里奇，尽管他已失去昔日的显赫地位，在行动部里仍是个重要人物。他俩都坚决反对有一个积极主动的公共关系部门。克拉里奇是两人中更直率的一个，但他俩态度都很坚决，而他们持这种态度是有理由的，因为在当时正在进行的伊朗门事件调查中，他俩都首当其冲。克拉里奇说，“这是一个错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根本不应大搞公共关系。”

韦伯斯特反驳这种意见，他的办法是，经常通过乔治向行动部的人保证，他和他们一样，对保护中央情报局的核心机密非常关心。这位新局长坚持说，对中央情报局的不信任，才是对它声誉的真正威胁。他还说，不管新闻界如

何厉害，不管他们能设下多少障碍，只要中央情报局不违反法律，就不会有问题。

久经锻炼的反谍报工作负责人格斯·哈撒韦被认为是中央情报局里的年长的政治家。他参加韦伯斯特到任一个月以后的这场辩论，其意义颇不寻常。哈撒韦原是站在乔治和克拉里奇这一边的，他对中央情报局在处理和新闻界关系的问题上，采取明确的保守立场。但韦伯斯特的理论开始对他产生影响，6月间，在韦伯斯特办公室召开的一次高级情报人员的会上，哈撒韦劝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应该给韦伯斯特和贝克提出的战略一次试验的机会。他说，“如果失败，我们再从头来。这不会有任何坏处。

在哈撒韦发言后，韦伯斯特对乔治说，贝克关于如果处理和新闻界关系的意见不会收回，从而制止人们对他的这一新方针进一步提出疑问。过去他曾指示贝克，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不必老重复劳德那句令人失望的“无可奉告”，或者单纯对某些事进行否认。他还授权贝克，只要有可能时，采取主动姿态，用这种办法制止谣传，并使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不致透露出去。韦伯斯特说，这一方针过去在联邦调查局执行得很有效，在这里也应能奏效。为了证实自己的论点，韦伯斯特还重复贝克经常举的一个例子。那是说有一次，贝克帮助联邦调查局如何改变了一个很不妙的局面。当时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告诉联邦调查局，他准备发表一篇文章，描写联邦调查局的雇员们如何在该局举行的考试时作弊。在调查了解情况后，贝克告诉安德森，他的文章是正确的，但补充说，联邦调查局正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这篇文章发表了，虽也造成某些损害，但比不采取这一措施要好些。

韦伯斯特依靠他作为新局长的权力，在他上任后的第一次内部争论中取得了胜利。但这次胜利并未取得中央情报局雇员们对他的信任，也没有使行动部的职业情报官员们对他有了信心。许多中央情报局的老资格人士认为，这一最初对韦伯斯特能力的考验，不应看做是他任职初期是否成功的标志。这些机关内部的观察家指出，韦伯斯特的某些最高级的助手，特别是乔治和克拉里奇，由于他们参与了伊朗门丑闻，已被捆住手脚，因此，他们的话在韦伯斯特的眼里已没有什么份量。再说，韦伯斯特扩大公共关系作用的决定，也并不保证中央情报局将比过去更多地接受公众的监督和检查。韦伯斯特执行政策能否取得成功，将取决于今后他是否能继续贯彻他的主张。而贝克是否能有效地工作，也要看行动部的人是否相信他能保守秘密。只有像克莱尔·乔治这样的人，有丰富的经验，在行动部又有众多的朋友，才有可能保证韦伯斯特认为非常重要的那种公开化。但现在，乔治正在接受审查。

6月中旬，正当贝克的任命引起的争论达到顶点的时候，韦伯斯特承受着从外部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处分克拉里奇，也要给予乔治较轻的处分，因为他俩都参与了伊朗门丑闻。但要求他开除约瑟夫·费尔南德斯的压力最大，此人作为哥斯达黎加情报站站长，曾帮助诺斯策划和执行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的任务。早在1985—86年，费尔南德斯就不顾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提供武器，可能会给中央情报局带来政治上的损害。在托马斯·特威腾努力使中央情报局尽量少和向伊朗供应武器的行动发生关系时，费尔南德斯却竭力促使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多提供武器，并且自己去找一些私人资助，以便使这支反对派的武装能继续存在。拉丁美洲处对费尔南德斯主持哥斯达黎加情报站的工作情况，作了单独调查，结果发现他违反了中央情报局的规章制度。用一位同事的话说，他的行动“太离谱了”。

到了6月中旬，拉丁美洲处的人认为，费尔南德斯得离开中央情报局。

7月上旬，韦伯斯特会见了拉丁美洲处的官员，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弄清在这件丑闻中有关人员的责任。处理的高级情报官员们态度非常干脆。有一位官员说，“开除费尔南德斯，让他走”。韦伯斯特决定延期作出决定，认为不让他充分申诉就开除他，这样做是不恰当的，但他重申他以前的承诺，即对违反情报局规章制度的人，要给予惩处。韦伯斯特决定对违反情报局规章制度的人进行内部调查，但他在行动上比人们期待的要慢，推迟调查的部分原因是，韦伯斯特希望这次调查能够比较公正，因此他想从局外调人来进行这项工作。韦伯斯特在和副局长罗伯特·盖茨进行了几次讨论以后，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因为盖茨提醒他，在确定这次丑闻中有关人员的责任时，要谨慎从事。他说，要给人一个处理公正的印象，这一点和弄清事实真相同等重要，要使最后的结论无懈可击。产生延宕的另一个原因，是韦伯斯特上任后的头几个月其它的事务太忙，无法集中精力来处理这一问题。他早期的日程排满了情报工作汇报会，和局内其它各科室的领导见面，去国外各地情报站访问的准备工作。他的高级顾问们，特别注意要保证他能有机会去熟悉一下国外的那些情报活动计划，并且和某些外国元首会见，这些人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对完成国外关键性的行动计划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韦伯斯特自己消化吸收情报的能力，妨碍了这些庞大计划的执行。例如，6月中旬，韦伯斯特认真听取了大量汇报，以便为计划中为期两周的北非和中东之行作准备。在一批中央情报局地区问题专家向他开始作汇报时，这位新局长打断他们，因为他要首先核对他的笔记。“摩洛哥，”他大声对自己念道，“让我来查查看”。他伸手到自己的上衣口袋里去取一本小字典，他一页一页地翻这本字典，直到他找到一张小的世界地图。“它在非洲，对吗？”他问道。汇报的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对，”有一个人回答说。

这位新局长熟悉情况比很多人料想的慢得多，这话很快在行动部的办公室中传开来。对那里的人来说，这将意味着不管他提出什么改进工作的计划，他都需要更多的时间使自己熟悉和适应这些计划。为了完成任务，中央情报局常常得违反外国法律，韦伯斯特也很难接受这一点。他在一次汇报会上对一位行动部的官员说，“我们应该使自己在国外受人欢迎”。这位官员听到这话有些感到意外，他眨了眨眼，然后笑着问，“先生，你以为我们应该怎样办，才能做到这一点？”

1987年6月，韦伯斯特开始他的中东之行。头几天是很重要的日子，他在埃及听取阿富汗工作组的汇报，谈的是给阿富汗反政府军从亚历山大港运送武器到卡拉奇的颇为复杂的行动计划。在完成他的开罗之行之后，韦伯斯特飞往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在那里他会见了穆罕默德·齐亚·哈克总统，并且听取了情报局官员关于在邻近的阿富汗战争的情况汇报。在这以后的几个月里，他还进行了两次重要的旅行，一次是去欧洲，另一次是去中美洲。在那里，同样进行了礼节性拜访和听取了情报工作汇报。这些旅行都是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谍报官员，为了帮助新来的局长熟悉业务，设计和安排的活动的一部分。

到8月底，已经开始有一种传闻，说韦伯斯特在这些旅行中，做得不像他的高级助手们所期望的那样好。特别是行动部的那些高级谍报官员，对他缺乏分辨不同行动计划的能力感到不安。在阿根廷曾发生这样一件事：韦伯斯特把联合行动（指这类行动中，中央情报局与外国情报机构共享情报）和

单独行动（中央情报局在外国执行这类行动计划时，不向该国政府通报）混淆起来。在这个具体事例中，韦伯斯特向阿根廷的情报机构首脑致谢，感谢他们与中央情报局的合作，实际上对方根本并未参与，从而泄露了中央情报局的秘密。

在伊斯兰堡还发生了一件可能是最滑稽的事，但与上面的例子相比倒是没有什么危险性。在会见齐亚总统的时候，韦伯斯特自我介绍时说，他是“韦伯斯特法官”。这位巴基斯坦领导人没有马上在他书桌前弯过身来和他寒暄，而是看了他一会，然后说，“你真的是要告诉我，里根总统委任了一位律师来领导中央情报局？”显然这位总统有些被他弄糊涂了。韦伯斯特不慌不忙，回答说，“对！”

当韦伯斯特在阿根廷的失言在行动部传开来的时候，兰利的官员们都哈哈大笑，这件事证实了他们原来的看法，这位前联邦调查局的领导人根本不适合来领导中央情报局。齐亚的那句话一时也广为流传，进一步证实了上面的那种看法。韦伯斯特的支持者也因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错误而感到很窘，他们还对齐亚的话感到恼火。即使他们，也在后来承认，这位新局长要“加把劲才能迎头赶上”。回顾往事，一位替韦伯斯特说话的人找到一项理由。他说，“的确，韦伯斯特早期是犯了一些错误。但这是因为他带来一种新的哲学，一种新的公开化政策，他一心一意在做这些努力，想使它成功。对于韦伯斯特的批评者来说，这种解释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韦伯斯特继续不断把不同的行动计划混淆起来，其频繁的程度实在令人生畏。在一次白宫汇报会上，他甚至把中央情报局的两个不同科的名字张冠李戴。

如果这位新局长对说他不称职的怨言感到不快的话，他没有把它表现出来。他面对批评一声不吭。与此同时，他亲自审查中央情报局卷入伊朗门丑闻的情况。他发现，他在中央情报局任局长最早凡周里无意犯的错误，与在伊朗门事件搞得最欢的时候，旁人在判断上所犯的错误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中央情报局的某些情报工作报告，被用来支持与伊朗进行以武器交换人质的交易，韦伯斯特对此特别感到震惊。他阅读了若干这种情报工作报告，特别仔细审向了中央情报局中东分析员格雷厄姆·富勒 1985 年 5 月间写的一份报告，在这份研究报告中，富勒建议美国放松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伊朗的武器禁运，目的是为了接近伊朗政府中的温和派。他建议为了赢得伊朗的信任，里根政府应向伊朗出售武器，并把美国的军舰从波斯湾撤出来。韦伯斯特了解到，富勒的报告是与 1984 年国务院的一份研究报告相抵触的，这份报告的结论是，美国在伊朗国内很少有可能找到可以联系的对象。后来的一份国家情报专题评估也肯定了这样一种观点。

在韦伯斯特担任局长的最初几个月里，那种认为在凯西任期内，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存在政治化倾向问题的说法，一直都在流传。这种说法越是听得多了，韦伯斯特就越是相信，并且认为，许多他接管情报局时沿用的那些高级谍报官员，应对此负有责任。在这些官员名单中，第一名就是罗伯特·盖茨，在韦伯斯特的任命还未被批准以前，他任代局长，现在是副局长。盖茨还是国家情报委员会主任，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职位，因为所有的国家情报专题评估都要由他审批。这一切都很令人不安。韦伯斯特想采用听取各方意见的公平办法，一方面可满足他本人的好奇心，同时也可平息情报部中层分析员中的严重不满，因为他们认为，过去局领导曾听任某些弊端自由泛滥。

为了做这件事，韦伯斯特把马克·马休请来，这是在联邦调查局期间，曾在他手下工作过并为他所信任的律师。马休的任务是会见情报部那些主要的分析人员，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向这位局长汇报他调查的结果。这是一项很微妙的工作，要尽可能保密。马休和一位韦伯斯特指定的助手，就所谓情报工作政治化的问题，私下访问了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们。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已有 20 来年的工作经验，他们对伊朗门事件和富勒的备忘录十分不满，过去为此几乎要提出辞职。

马休的调查结果显然使他相信，情报部关于伊朗的报告——特别是伊朗政府内有温和派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他的结论是，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是不可靠的，因为它已被用来为政治目的服务。马休报告的详细内容至今仍属保密文件，也还存在严重的争议。支持韦伯斯特的官员坚持说，韦伯斯特请马休到中央情报局来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调查所谓情报部已政治化了的问题。他们说，马休的调查是保密的，因为它涉及韦伯斯特的主要副手罗伯特·盖茨。

在调查的过程中，情报部副主任理查德·克尔给韦伯斯特一份有关这一问题的备忘录，这份材料是托马斯·巴克斯代尔在 1986 年底写的。此人是近东和南亚情报分析室很受人尊敬的老资格专家。巴克斯代尔的报告雄辩地作了一个概括性的结论，其内容与现在马休和韦伯斯特的结论相同。在这份报告里，巴克斯代尔谴责伊朗行动计划，并且详细叙述了情报材料如何被歪曲，以便情报局能在伊朗采取上述行动。他的这份报告是可以为中央情报局辩护，并帮助它恢复名誉的材料。巴克斯代尔写道，“显然我并没有在我的同事中进行一次民意测验，但我相信，如果进行一次民意抽查，人们就会发现，中央情报局与伊朗接触和打交道的方式普遍存在不少弊端，这些全在与伊朗、人质和伊朗的恐怖主义有牵连的大多数雇员身上反映出来。这对士气是一个沉重打击。

马休对富勒所作的国家情报专题评估的重新审查，拉丁美洲处里要求处理费尔南德斯的压力，以及对韦伯斯特自己在谍报工作中失误的批评——所有这些事加起来，使这位局长得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处理伊朗门丑闻遗留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指定一位外面的人当法律顾问，让他来完成这一调查。韦伯斯特受到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方面来的很大压力，要他迅速采取行动，确定有关人在伊朗门事件中的责任。在 8 月初两人的一次电话谈话中，博伦主席提醒韦伯斯特，他曾答应要对参与伊朗门丑闻的中央情报局雇员执行纪律。但直到 1987 年 9 月，韦伯斯特才任命拉塞尔·布鲁埃默作为特别法律顾问，来负责进行内部调查。对这些任命，行动部的人比对贝克的任命更不欢迎。布鲁埃默被看作是韦伯斯特的坚强盟友，是长长的名单上又一名“联邦调查局来的新人”。但并没有人低估布鲁埃默的能力，也没有人怀疑他寻求真理的热忱。行动部的人都知道，他将被授权翻阅在这次丑闻中任何涉及中央情报局的文件和材料，而且他将向韦伯斯特汇报每一有关细节，即使调查揭露出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读职行为，也不会妨碍他这样去做。他要在 12 月前完成他的这项任务。

布鲁埃默是华盛顿一位著名律师，颇有学者风度，他作为威尔梅尔—卡特勒—皮克林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合伙人而享有声望。人们都知道他也是一位好的行政领导，他精明细致，经常面带笑容，能使别人在他面前感到非常自在。他有两个韦伯斯特很欣赏的特点：和他正在进行调查的人在一起时，他

不会感到别扭；对韦伯斯特绝对忠诚。在联邦调查局时，韦伯斯特从许多候选人中挑选了布鲁埃默，作为他的特别助理，尽管局里有不少传闻说，这是早已内定了的，因为在韦伯斯特当律师时，布鲁埃默在他手下当过办事员。

到了9月晚些时候，布鲁埃默在中央情报局内已是个到处可见的人物，而他要求看更多的档案的便条经常出现在六层楼办公室里。到了11月，他的调查工作已接近尾声。在此过程中，他已向韦伯斯特作了五、六次汇报。虽然没有什么特别惊人的发现，但调查结果非常清楚，必须在中央情报局的领导层里做某些调整。

由于布鲁埃默调查结果，需要调整的最高级谍报官员是行动部副主任克莱尔·乔治，在他担任领导期间，曾发生过不少变动和争议。布鲁埃默并不是专门把他拉出来开刀，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继续让他呆在中央情报局，会引起国会的不悦。在行动部内，乔治是很讨人喜欢，并很受人尊重的。由于他在行动部的会上为韦伯斯特辩护，也颇受这位新局长的信任。参议员博伦曾发出含蓄的警告说，如果这位新局长在年终前不采取措施，处分在丑闻中受牵连的中央情报局雇员，他和参议院情报特别会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将会动摇。韦伯斯特讨厌在这种受到警告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最后，在11月13日，国会关于伊朗门事件的联合委员会发表了他们关于这件丑闻的调查报告，乔治当天主动向韦伯斯特提出，他认为他退休的时候已经到来，韦伯斯特没有表示不同意。

克莱尔·乔治的离职，使中央情报局近期历史上最受人尊敬的一名官员的辉煌事业从此结束。他的同事们认为，他是当过行动部领导的最“文雅、宽厚、博学、可亲”的情报官员之一。在1987年以后的年代里，即使是在他被指控了解伊朗门事件的内情，并曾指派他手下的一名主要助手向国会撒谎，因而使他的名誉受损以后，他作为一名杰出的情报官员的名声仍然完好无缺。尽管在情报局服务30多年的历史中，有很多关于他的轶事未经证实，但有一个经过证实的例子，颇有象征意义，可以说明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地位和作用。

1985年晚些时候，中央情报局帮助阿富汗反政府军的行动计划被停止。由于内战日趋激烈，苏联决定在阿富汗部署数以千计的兵力和武器，其中包括好几队能给游击队造成巨大损伤的军用直升机。这使代表游击队利益的华盛顿院外活动集团慌了手脚，他们害怕苏联人会把装备不良的游击队彻底打垮。眼看中央情报局购买的武器被巴基斯坦的情报机构搞走，他们也感到很气愤。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们，在听了反政府力量的支持者的陈述以后，也被他们带感情的发言深深打动。有两个组织，即自由阿富汗委员会和美国阿富汗行动联合会，在给国会施加压力，以加快给阿富汗输送武器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中央情报局内部对此反应冷淡，因为在行动部官员中，只有极少数人相信，阿富汗游击队能够对抗苏联所进行的一场使用高科技成果战争。克莱尔·乔治就是其中的一个。

乔治针对战场上出现的危机，建议中央情报局给阿富汗游击队送去美国制造的毒刺式地对空导弹。派到阿富汗去实地了解援助计划执行情况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发回了一些第一手的报告。这些报告，再加上特种部队官员对国会作证时的证词，对乔治的影响很大。但乔治必须说服凯西，因为后者对这项秘密行动计划保持一种惊人的低调门。美国政府中的一切有关人员都反对采取这一步骤，其中包括参议长联席会议（他们害怕导弹会落入恐怖主义

者手中），国务院（他们怀疑导弹能否在那里发挥作用），甚至还包括行动部里的一些官员。但乔治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最后，他被允许直接到国会去陈述意见，在那里，他雄辩地说明，他“绝对相信”使用毒刺式导弹“效果会截然不同”。他的发言使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为之动心，他们决定冒点风险去试一下这个计划，从而把美国和这一冲突直接联系起来。1986年2月，这一计划被批准付诸实施。

不到两年，乔治那个有争议的关于导弹作闲的预测，已证明比他所希望的还要准确。这一时期内，苏联长期的干涉使这个国家变成一片血海。通过中央情报局的系统，经由巴基斯坦，共向阿富汗反政府军输送了将近700枚毒刺式导弹。到1989年，苏联在那个地区的军事力量几乎耗尽，它所吹嘘的直升机队列差不多从阿富汗领空上全部扫荡干净。一份美国军队的特别报告最后确认，在阿富汗部署毒刺式导弹，“已改变了战斗的性质”，并成为“战争中决定性的武器”。乔治的计划给予苏联军事力量的打击是巨大的。阿富汗游击队用340发导弹，击落了苏联269架飞机，比美国地对空导弹试验中任何一次的成绩都好。克莱尔·乔治一项简单的建议，就为美国赢得了阿富汗战争，迫使苏联撤军。在美国和苏联进行的长达40年的冷战中，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中央情报局独一无二的、最重大的、准军事行动的胜利。

乔治的主动退休给韦伯斯特解决了两个问题：它不仅帮助他摆脱了一个很为难的问题（处分一名行动部的官员就够困难的，何况是行动部的负责人），它还给韦伯斯特一个机会，使他能任命自己的人来接替乔治。在乔治决定退休以后不久，韦伯斯特宣布由老资格的理查德·斯托尔茨接替他的工作。此人和先来一步的布鲁埃默一样，是新局长的可靠朋友（他们在阿默斯特学院同学）。但不像贝克和布鲁埃默，斯托尔茨的任命是受欢迎的。他虽说是韦伯斯特的私人朋友，但作为一名谍报官员，已在中央情报局工作长达30年之久，而且为行动部的官员们所熟悉。韦伯斯特在12月8日宣布了这项任命，这正好是在他处分参与伊朗门丑闻的7名中央情报局人员7天以后。

一位老资格的官员说，韦伯斯特选定斯托尔茨来领导行动部，“可能是他作出过的最好决定”。这位官员承认，韦伯斯特选定斯托尔茨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在到任后的头几个月里犯了一些错误，这使他感到难堪。这位官员解释说，“他（指斯托尔茨）可以在恶劣气候下为他导航”。但斯托尔茨的任命也并非所有人都赞扬。有一位行动部的官员反映了少数人的意见，他说，“斯托尔茨太保守。他不肯冒任何风险”。

凯西的时代结束后，在国会对中央情报局的批评愈来愈多的情况下，这种态度正是韦伯斯特所要求的。他告诉他的高级助手们，中央情报局需要这样一位领导，他能“在风险面前权衡得失”。韦伯斯特对斯托尔茨判断问题的能力非常器重，实际上自从他被任命当中央情报局局长以来，他一直在私下依靠他。韦伯斯特对他的个性也非常欣赏。斯托尔茨和克莱尔·乔治相比，更像一名真正的特工，并且脾气也够坏的，完全具备一个特工头子的典型性格。斯托尔茨完全是韦伯斯特所需要的那种人，他可以给行动部带来一种“别胡来”的正规作风。

对斯托尔茨来说，他被任命为行动部的主任，似乎是对他在斯坦菲尔德·特纳和凯西时期所遭到的蔑视和冷遇的一种补偿。海军上将特纳在1977年就没有选中他，而选中了约翰·麦克马洪。特纳后来说，他曾用抛钱币的办法从两人中选了一人，但这对于斯托尔茨来说，却使他大失所望。但3年

以后，他的失望更是无法比拟了，那时，他第二次没有被选中。当凯西接替特纳时，他委任他做买卖时的朋友马克斯·许格尔作为行动部主任，此人根本没有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任何经验。斯托尔茨因此对中央情报局感到厌恶，便退休了，但他签了一个担任顾问的合同，继续和他的同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7年后凯西宁权的时代宣告结束时，他的气也全消了，但他还是提醒他的老同学，注意行动部官员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麻烦。

斯托尔茨很清楚中央情报局如何工作，也了解这里经常发生的有关情报工作政策的争论，会使最受尊重的局长也很难有所作为。他作为一个情报官员，在苏联和东欧度过了他的大半生。1965年因苏联对美国驱逐一名驻华盛顿的外交官进行报复，斯托尔茨破苏联下令离开了莫斯科。在保加利亚工作了很短一个时期以后，他成为中央情报局苏联东欧处处长，一共服务了31年。

把斯托尔茨安插下来以后，韦伯斯特感到比较坐稳了，他开始兑现他对博伦的诺言，即处分那些在用武器换人质的行动计划中违反了中央情报局规定的那些雇员。这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根据布鲁埃默的报告，可能有40来位行动部的官员在凯西当政时期行为不当，但只有7人有无可辩驳的证据。韦伯斯特把一些不明确的问题撇在一边，只处分那几个罪行确凿的人。12月17日，他开除了两名中央情报局官员，另5名给予惩戒或降职的处分。

在受后两种处分的人名单中，非常令人吃惊的是查尔斯·艾伦的名字。他一直在警告他的上司不要参与诺斯行动计划，在凯西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最后的几个月里，他总是给人带去不好的消息，他经常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伊朗中间人曼努切尔·戈尔巴尼法尔不可信赖，因此使自己得不到别人的信任。艾伦之所以受牵连，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首先是他同意和戈尔巴尼法尔打交道，而克莱尔·乔治却拒绝和他打交道。总之，艾伦受到惩戒是颇令人费解的。

其他几个被韦伯斯特处分的人，他们在伊朗门丑闻中的作用是大家都清楚的。约瑟夫·费尔南德斯，中央情报局哥斯达黎加情报站站长；罗伯特·阿特金斯，中央情报局洪都拉斯情报基地负责人，他俩被开除。其他有4人被惩戒，其中包括德韦·克拉里奇和阿尔·菲尔斯，中美洲工作队队长。另外，克拉里奇还被降职，薪金也下调一级。菲尔斯和克拉里奇都从中央情报局退休下来。另外，有两名在拉丁美洲处工作的官员也受到惩戒的处分。行动部过去曾谣言四起，说韦伯斯特要大量辞退部里的人员，这时也松了一口气。

到了1988年1月，韦伯斯特任职已7个月，但他还没有得到行动部的人们的信任。他刚到职时人们对他普遍所抱的怀疑态度，这时仍未完全改变。他已提出自己对中央情报局前途的展望，但他还得经过火一般的考验。他的能力和对中央情报局的忠诚，不仅要受批准任命他的国会那批人的考验，而且还要受中央情报局内的那些强大势力的考验。他们对中央情报局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的性质。在下一年里，中央情报局又在如何对待它以前的一个间谍的问题上，意见严重分歧。作为新局长，韦伯斯特面对两个敌人：一个是直言不讳的、很多人都害怕的参议员，另一个是信誉扫地的、暴君似的人物，他还是中央情报局过去的一名间谍。

4 参议员、军人、独裁者……间谍

参议员是北卡罗来纳州的杰西·赫尔姆斯，名誉扫地的中央情报局间谍是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巴拿马实际上的独裁者，也是巴拿马国防军的首脑。赫尔姆斯和诺列加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但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相信中央情报局是一个无能的机构，而且他俩都致力于运用他们的政治势力去证明这一点。这两人之间的斗争早就在 1970 年就开始了。当时这位南方保守的共和党人指控巴拿马的第二号人物诺列加从事国际贩毒，侵吞钱财，把美国情报提供给外国政府，但是，由于赫尔姆斯当时正单枪匹马地进行着一场斗争，企图阻止卡特总统在本世纪末把巴拿马运河的主权交给巴拿马政府的计划，他的上述指控被国会中的民主党人认为是出于某种政治动机，因而不予理睬。赫尔姆斯最终在这场辩论中失败，国会还是于 1978 年 4 月投票批准了卡特的建议。在受了这一政治打击后，赫尔姆斯始终不忘在这次巴拿马运河之战中蒙受的屈辱，他并且深信，曼努埃尔·诺列加是一个腐败透顶的危险人物。

7 年以后，赫尔姆斯于 1985 年 12 月再一次敦促参议院调查诺列加和贩毒活动的联系。这一次参议院之所以感兴趣，并非纯粹、厂政治上的考虑，而更多是由于巴拿马政治活动家胡戈·斯帕达弗拉的弟弟来访引起的，他名叫温斯顿·斯帕达弗拉。在与哥斯达黎加交界的巴拿马境内，发现这位政治活动家被人杀害了，他的头被砍了下来，尸体被切为多块，令人惨不忍睹。斯帕达弗拉告诉赫尔姆斯，他的哥哥是被诺列加手下的人暗杀的，因为他收集到可以对这位将军进行起诉的罪证材料，说明他参与了侵吞钱财和日益扩大的贩毒活动。看到那些胡戈·斯帕达弗拉血淋淋尸体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赫尔姆斯答应要使谋杀者受到惩处。现在回过头来看，赫尔姆斯这一承诺，标志着美国与巴拿马这个独裁者关系的转折点。在同斯帕达弗拉会见以后，赫尔姆斯宣布，以他为主席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将就诺列加与毒品走私贩的联系问题举行听证会。

听证会在 4 个月后开始举行，首先出席作证的是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那位个子瘦瘦的、脸发白的助理国务卿，他曾顽固地为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辩护，并肆无忌惮地批评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对里根总统的中美洲政策支持不力，因而已臭名昭著。艾布拉姆斯能说善辩，单刀直人，咄咄逼人。他为诺列加辩护，说他是这一地区反对苏联影响的美国盟友。艾布拉姆斯说，“巴拿马人民不想要一个像尼加拉瓜那样为外国统治的、反民主的国家，这种国家只能在这一地区制造武装冲突”。他指出，诺列加是美国的盟友，美国要保卫它在中美洲的政策，像他这样可以依靠的盟友为数很少。

这些话丝毫不能打动赫尔姆斯。在保护反共分子的问题上，他从不亚于任何人。他深信诺列加并非艾布拉姆斯所描写的那种领导人，他的反共声誉也是很可疑的。赫尔姆斯调查此案的主要助手德博拉·迪莫斯说，“杰西完全是因为斯帕达弗拉谋杀事件动了感情。这件事实在使他忍无可忍了。”

几星期后，赫尔姆斯的听证会在一片怨声中结束了，因为他的小组委员会提不出可以告发诺列加的确凿罪证。赫尔姆斯在国会的同事们，私下把他描写成一个输家，他们批评他的调查，并指责他之所以攻击诺列加，是因为他没能阻止运河条约的签订。甚至在公开场合，他的同事们也在为诺列加辩护，说赫尔姆斯搜集到的所有材料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说他不该把诺列加

讲得那么坏。最后，当赫尔姆斯敦促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并通过一项要求对巴拿马进行经济制裁的决议时，廉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克里斯多弗·多德争取了足够的票数来支持诺列加，并且在参议院里质问赫尔姆斯他出于什么政治动机。

尽管遭到一些挫折，赫尔姆斯的听证会还是对诺列加提出了许多问题，因而引起了一位名叫西摩·赫什的备受称赞的作家兼记者的注意。此人对诺列加与贩毒活动的联系曾进行过研究，并将他的研究结果在1986年6月12日的《纽约时报》头版上发表。赫什的报道题名为《巴拿马独裁者据说参与毒品、军火和非法钱财交易》。这篇报道证实了赫尔姆斯提出的许多疑点。紧接着在第二天，《华盛顿邮报》也发表了一篇引用中央情报局研究报告的报道。这份研究报告表明，诺列加参与了大规模的非法毒品和军火买卖，并且还和古巴的情报机构进行合作。

中央情报局进行这项研究是出于以下这种惧怕心理：诺列加有意要牺牲美国在中美洲从事秘密工作的一些间谍。中央情报局很害怕，重要的秘密将落入苏联人之手，因为诺列加的亲信正在和与毒品交易有关的古巴情报官员合作。总之，这项研究报告反映，中央情报局拉丁美洲处越来越担心诺列加，害怕他会滥用他与美国长期建立起来的关系。中央情报局的这份报告甚至提出，诺列加为了对里根政府进行敲诈勒索，可能威胁要牺牲中央情报局的某些间谍，并泄露它的工作方法。

虽然早在七十年代中期，中央情报局就已开始调查诺列加的犯罪活动，但最近的发现才是迄今为止所有材料中最令人不安的。中央情报局的材料主要是根据国家安全局从通讯中秘密截获的情报。这些情报使国务院官员得出结论，诺列加进行威胁的策略，加上政治上的腐败，使他的老搭档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在上一次巴拿马选举中获胜，而实际上领先的是阿努尔福·阿里亚斯，他比前者多得大约三万张选票。

直到1986年6月，尽管证明诺列加很腐败的材料越来越多，他同里根政府的联系仍较巩固，那时他对华盛顿进行了一次旋风式的访问。（《纽约时报》故意把赫什的第一篇文章安排在诺列加到达美国后的第二天见报）在公开活动中，为了突出诺列加的这次访问，特别作出了安排，让他在麦克内尔堡举行的美洲防务委员会上，发表中美洲共产主义威胁的演讲。在私下活动中，又安排了一些颇为隆重的活动，其中包括在白宫官员的陪同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诺斯也在场），乘坐游艇在波托马克河上观光游览，以及访问中央情报局总部并和局长凯西会见。（凯西在公开场合，曾大肆吹嘘诺列加，说他是中美洲的反共堡垒。）这次访问已是他和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第三次会见了。第一次是1983年11月在巴拿马（当时凯西要诺列加帮助反对桑地诺主义者），第二次是1985年11月在白宫（当时凯西责备他有“反民主的倾向”）。

1986年6月的这次会见进行得没有前两次那样好。这次讨论的时间短得多，而且周围环境和气氛都不如上两次。凯西主要重复他的这一观点，即诺列加的独裁行为使美国很难继续支持他，尽管他一再发誓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他们的谈话在一小时后结束。根据凯西的几位亲信说，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最后已开始认识到，诺列加的问题比他原来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后来，即使他能让兰利与这位巴拿马的独裁者疏远，但发现这样做已愈来愈困难了。这种障碍至少部分来自拉丁美洲处，他们坚持说，中央情报局需要利用

巴拿马人来搜集有关尼加拉瓜桑地诺主义者的情报。

在这一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凯西听取德韦·克拉里奇的意见最多，他当时是反情报工作的负责人。有些人争辩说，巴拿马的这位独裁者尽管坏，但美国还缺不了他，而且克拉里奇本人似乎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抱有盲目的好感，但克拉里奇对改变中央情报局对待诺列加的政策，实际上起着某种催化作用。有好几个晚上，克拉里奇和凯西一直谈到深夜。在谈话中，克拉里奇提出了诺列加的问题，说他经常使中央情报局在公众面前十分难堪。克拉里奇指出，中央情报局内部在诺列加问题上的争论，已经使这里的工作人员不能专心致志地推行经过凯西多年努力才形成的积极进取政策。凯西不能不表示同意，但他仍拒绝彻底断绝同诺列加的联系。他强调说，美国首先要反对桑地诺主义者，只有打翻了他们以后才能腾出手来对付诺列加。克拉里奇对他同凯西的这些谈话密而不宣，不让中央情报局内对诺列加批评得最厉害的人知道。在公开场合，中央情报局仍然保持原来的态度：如果有人提出任何关于中央情报局与诺列加关系的问题，都坚决不予理睬。

对里根政府来说不幸的是，要求彻底调查指控诺列加与贩毒活动的联系、骗取钱财和出卖情报的呼声，在国会中越来越高。除了赫尔姆斯进行的调查以外，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约翰·克里发起的一项调查也涉及诺列加，虽然它主要是想弄清中央情报局所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是否卷入了毒品贩卖活动。联邦调查局在1986年4月也接着进行类似的调查，目的是想弄清中央情报局哥斯达黎加情报站的站长是否参与了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非法提供武器的活动。联邦调查局还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的飞机，回程是通过巴哈马向美国贩运麻醉品，在公众日益密切的注视下，里根的白宫也勉强承认，有些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分子可能“参与了”毒品贩卖活动，但马上又补充说，这些毒品贩子完全是自己在单独活动。在白宫承认了这一点以后，克里要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这一问题召开听证会。

参议员克里最初追查这方面的问题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在1986年5月6日在他办公室召开的会上，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国务院、禁毒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代表一致否认关于贩卖毒品的指控，并且也否认国家安全局的人员参与了秘密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的活动。在这群政府官员中，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是最敢于讲话的。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参议院的工作人员说，这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坚定而断然地否认，有任何来往于中美洲和美国之间的航班，专门用来秘密运送武器和毒品。他全然否认这些指责，并说这是非常荒谬可笑的。由于这些否认非常有力，克里搜集的证据不管在官方或公众心目里都没有产生多少反响，即使在国家安全局私下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的详情公布以后，克里关于他们进行贩毒活动的指责仍未引起很大兴趣。

真正推动克里的调查，使它引起人们对它应有的严重注意的是参议员赫尔姆斯，这位他原来没有想到的同盟者。赫尔姆斯召开的关于诺列加的听证会这时已经结束，他建议克里和他联合起来。他之高兴这样做的原因是，尽管他认为克里一般说来是一个自由派对手，但他有勇气参加他召开的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而其他人都躲得远远的。从克里的角度来说，他也不愿批评赫尔姆斯，因为他想证实诺列加的毒品贩卖活动与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之间的联系。这两位参议员认为，把他们两方面的调查联合起来，可以有扩大宣

传的好处。5 月间，克里和赫尔姆斯公开联合起来，事先取得一项协议，在处理这两件事时，赫尔姆斯对诺列加指控将有优先权。

虽然参议员克里是一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位众所周知的政坛上的新手，但他仍然是赫尔姆斯为了把诺列加赶下台，可能找到的最好盟友。正像那位北卡罗来纳州年长的参议员一样，这位马萨诸塞州的年轻参议员经常批评中央情报局，并且强烈主张加强对它活动的监督。两人都信任中央情报局，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克里怀疑中央情报局，是因为他认为，中央情报局作为美国政府的秘密工作部门，享有特殊的地位。他觉得中央情报局经常逃避国会的监督，不按照它的要求办事。赫尔姆斯不信任中央情报局，是因为他认为中央情报局无需向任何人负责汇报工作，从而使自己松弛无力，没有多少用处。他俩的联盟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相互需要。按照克里的看法，中央情报局太强大了：而对赫尔姆斯来说，它太软弱无力了。

两人几乎在其它所有方面，也都迥然不同。克里身材高大，面庞轮廓突出，嗓音低沉，他似乎生来就有搞政治的那种口若悬河的演讲才能。他通过反对越南战争进入了官场。在这以后，他成为反对越南战争老兵协会的领导人之一，经常作为证人在国会出现。一位早在当时就认识他的朋友说，“他从那时起就开始竞选参议员”。赫尔姆斯与他形成鲜明对比。他是一位典型的南方政治家，粗圆的身躯，秃头，平平的脸，和人握起手来非常亲切，好像是见到自己的堂兄或表弟。他性格爽朗，笑声一直发自丹田，他还有一个红脖子。他的同事们常常低估了他的那股子犟劲，以及他那不屈不挠忠于他保守主义原则的精神。

赫尔姆斯和克里结盟以后不久，就组成了一个自从水门事件以来参议院最受人尊敬的调查班子，尽管它主要的成员只有 4 人。克里指派他的两名最杰出的调查人员，来追踪在诺列加和国际贩毒集团之间牵线的人和有关证人。他们是律师杰克·布卢姆和克里本人的助手理查德·麦考尔。布卢姆曾在克里的参议院恐怖主义、麻醉品和国际通讯小组委员会任特别法律顾问，在这个小组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曾最早公开提出对诺列加的指控。不少人知道，这位律师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调查工作者，他特别擅长于说服那些不大愿意或有些害怕的人在宣誓后作证。麦考尔是个很讲究实际的调查工作者，他对美国的情报活动有极为渊博的知识，在着手一件调查时，他的低调门常使人摸不清他的意图。受克尔之托参加调查的还有业务水平高超乔纳森·温纳尔律师。他负责把各方面的书面材料汇集拢来，以追踪诺列加的犯罪活动线索。参议员赫尔姆斯则指派了他的助手德博拉·迪莫斯参加这项工作，以便发挥她具有中美洲丰富知识的专长。迪莫斯是一位专心一致的调查工作者，她懂得如何在中美洲危险的环境下求生存的窍门。

在短短一个月紧张的准备之后，赫尔姆斯一克里联合听证会开场了，安排出席作证的是已哈马群岛的两名贩毒犯。接着，1986 年 7 月 15 日，这个联合小组委员会又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上，即诺列加在国际贩毒卡特尔中的作用。克里召开了第二次听证会，然后很快把会议交给赫尔姆斯实际主持。赫尔姆斯审问一个名叫豪尔赫·莫拉莱斯的已被判刑的贩毒犯，要他交待他知道在巴拿马是如何进行走私活动的。

赫尔姆斯对莫拉莱斯说，“我希望你尽可能简单地告诉这个委员会，在巴拿马诈骗钱财的事究竟涉及面有多广，你们如何进行这种活动。在巴拿马诈骗钱财的活动中，有无任何政府官员牵连进去？”

莫拉莱斯回答说，“我把钱搁在手提箱里，坐上一架飞机，一架私人飞机，然后飞往巴拿马，我就去会见那些为[巴拿马]政府工作的人，他们负责疏通海关和移民局的人，还有当权派和机场的人。”

从这一耸人听闻的证词可以清楚地看出，诺列加卷入了贩毒的诈骗钱财的活动，尽管证人拒绝对诺列加指名道姓。但这一供词对克里和赫尔姆斯来说已经够了。到9月为止，他们搜集的有关这个巴拿马独裁者的材料，已经足够建立起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其中有一厚叠材料是关于他同中央情报局的关系的。

早在1959年，中央情报局驻秘鲁利马的情报站站长就招募了他，要他提供他在秘鲁军事学院同学的情况。在1962年他回到巴拿马以前，给他的报酬是很少的。此后至少到1976年，除了几段极短的时间以外，中央情报局一直在给他发薪金。诺列加证明是一项很值得的投资。在六十年代后期，他已成为军队里一位很有权势的人物。这主要是因为他效忠于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这位漂亮的军人统治者在1969年发动的一场政变，颇受当时盼望改革的国民的欢迎。诺列加当时的任务之一是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以下几方面的情报：哪些巴拿马军官和文官曾在莫斯科接受训练，巴拿马政治斗争的最新动态，和他在一起的军官中哪些人比较友好可靠，能维护美国的利益。在1969年诺列加帮助挫败了反托里霍斯的政变后，他被任命为巴拿马国防军军事情报部主任。到了七十年代初，中央情报局已开始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以致给他的年薪高达十万美元。

从1976年3月起，诺列加开始成为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布什获悉美国国防情报局已开始对诺列加进行一项代号为“广州歌”的调查。美国国防情报局出示证据，说明诺列加用钱向驻巴拿马的3名美军军士收买了一些机密情报，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官员给这几名美军取了一个代号，称他们为“高歌军士”。诺列加把这些情报交给托里霍斯，以便在和美国进行关于运河地位的谈判时，作为迫使美国让步的材料。美国国防情报局还担心，同样的一些机密材料，包括有关古巴的高度机密文件，都直接给卡斯特罗送去了。布什认识到，美国国防情报局揭露出的这一具有爆炸性事件，弄不好可能将影响福特的白宫宝座。当时福特受到他的共和党对手、前州长罗纳德·里根的攻击，后者说他一心一意想放弃运河。

布什决定中央情报局不对那3名军士采取行动，因为如果对他们起诉和审判，可能会暴露中央情报局进行的秘密活动，其中包括招募巴拿马的高级官员作为美国间谍。布什还相信，如果公开进行审讯，还将在美国和巴拿马关系很脆弱的时刻，暴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战略。他的结论是，应该由美国军方，而不是由中央情报局来惩罚这几名军士。由于中央情报局局长是美国情报界的头子，他不理会这一丑闻的决定就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

布什拒绝对这3名军士采取行动还有其它重要理由。布什完全懂得，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发现，意味着他们已挖出一项大的情报秘密，它涉及一名中央情报局雇用的外国高级官员。如果把这一情况公开，将使中央情报局的形象更坏，说明它要么太无能，要么太天真，以致无法开展在国外的情报工作。布什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情报工作中的紧要关头，事态的发展可能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如果里根州长发现美国士兵向诺列加递送中央情报局的机密，他将可以证明，福特总统在运河问题上的谈判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里根进一步了解到诺列加把同一情报交给了卡斯特罗，公众中产生的忿怒，可能

被里根利用来作为他夺取总统职位的跳板。

另一方面，布什也要考虑诺列加巨大的情报价值，他被认为是中央情报局在中美洲最好的情报来源之一。他是一个可靠的反共分子，曾多次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这一地区有用的政治情报，从而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诺列加还是中央情报局向在巴拿马的其他间谍提供经费无法取代的渠道，他并且招募了一些巴拿马军官为美国人工作。如果突然断绝诺列加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将意味着美国与巴拿马整个情报网的关系也将断绝，而这一点是美国所不愿做的。再说，诺列加是巴拿马第二号最有权势的人物，而且将接替托里霍斯成为巴拿马国防军的统帅。有了这样一个地位，他就能成为中央情报局在中美洲职位最高的间谍。布什的决定没有什么好争论的。虽然诺列加给中央情报局带来了一些问题，而且还有使福特政府政治上严重难堪的可能，但他长期以来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了中央情报局官员们认为他已造成的一点损害。

7个月之后，布什可能因没有把诺列加从中央情报局的薪俸名单中删掉而感到后悔。1976年10月，中央情报局发现，诺列加应对巴拿马的3次恐怖主义的爆炸行动负责，其目的是为了向福特政府施加压力，让他放弃关于运河问题的谈判。在这3次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但美国驻巴拿马大使威廉·乔登把证据摆在托里霍斯面前，说明这几起事件可以一直追查到诺列加身上。乔登警告说，这些事件可能使在运河谈判上已取得的进展化为乌有。

托里霍斯满肚子不高兴，他派诺列加到华盛顿去和布什面谈。据说会见时是客客气气的，但也仅仅是官样文章，显然两人都决定把这事忘掉。这意味着到1977年初布什的任期为止（即卡特任总统两个月之后），曼努埃尔·诺列加一直是困扰布什最厉害的问题之一。布什被他弄得很不安，他因这个局面引起的沮丧情绪几乎可以明显地觉察到。布什在中央情报局时期的一位同事回忆说，“他常在琢磨，不知诺列加下一脚往哪里踩”。

在布什离开中央情报局很久以后，对他处理诺列加问题的做法，仍然存在严重的褒贬不一。在这件事上，对他最表同情的是那些他在国会中的热情支持者。他们说，布什对“高歌军士”这一不体面的事件，处理很得体，从而保护了美国的情报来源和进行谍报工作的方法。他们争辩说，不应把运河问题的谈判和福特在共和党中提名的胜利联系起来，因为福特能否当选不取决于布什做出什么决策。这些为布什辩护的人进一步指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对“高歌军士”事件的处理上，认为布什的决策没有问题。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也为布什的行为辩护。这些官员争辩说，诺列加提供的情报一贯可靠，他还为美国开了一个后门，使它有一条与古巴通话的重要渠道。这条渠道已在好几件事上证明是有价值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由于诺列加的帮忙，那位单独乘小艇闯入一个古巴渔村的美国人得以获释（他的这次冒险行动好像是经过中央情报局批准了似的）。整个七十年代，诺列加一直和卡斯特罗保持通话联系。他把古巴政府内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美国人，同样，他也把美国国内发生的事情告诉卡斯特罗（诺列加后来承认，在1983年，布什也使用了同一渠道向卡斯特罗通报了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的情况）。这些官员觉得，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不愿意为了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事，去引发一桩丑闻，从而牺牲这个国家一项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他们说，布什完全了解对诺列加错误行为的指控，而且采取了措施去疏远诺列加。

批评布什的人却对他不是那么同情。他们说，布什从未考虑断绝中央情

报局与诺列加的关系，也没有明确警告过这个巴拿马人，说明美国不能容忍盗窃它的国家机密，也不能容忍他对巴拿马公民进行咄咄逼人的威胁和直接的攻击。他们说，布什更热衷于保持中央情报局和诺列加的关系，而不是保护美国的机密。

在布什离开兰利后，斯坦斯菲尔德不顾内部有些人反对，立即断绝了中央情报局同诺列加的所有关系。举例来说，拉丁美洲处负责人内斯特·桑切斯公开表示不同意特纳的决定。桑切斯是行动部的积极分子中的一个，他们对诺列加有强烈的责任感，因为他们相信，行动部的间谍网应该扩大。

德韦·克拉里奇拒绝为这位巴拿马人辩护。克拉里奇曾负责中央情报局内部的一个总结材料，题目是研究在3位美国军士出卖情报的丑闻中，诺列加扮演了什么角色。尽管1976年的克拉里奇还比较年轻，但他已被看中是一名很有前途的谍报人员，当时也是布什的高级情报顾问之一。据这一时期克拉里奇的几名同事们说，他决定对特纳的决策保持沉默，虽然他也相信诺列加在这一地区仍可成为一个有用的情报来源。

1981年，在里根—布什的班子上台以后几个月内，威廉·凯西批准重新把诺列加列入中央情报局的薪俸单里，据说年薪为180,000美元。如果布什对七十年代中期诺列加的价值有怀疑的话，他没有表示出来。在布什领导情报局时为诺列加辩护的那批人，当凯西当局长时，仍然是诺列加最主要的盟友，这一点自然也不是为怪。在这些人当中有内斯特·桑切斯，他已从中央情报局退休，去就任五角大楼国际安全局的拉丁美洲防务助理。该局同他在一起工作的一位官员说，桑切斯是“拉丁美洲的超级间谍”。克拉里奇是凯西最信任的行动部官员，他也相信，诺列加在巴拿马的显赫地位，可能再一次证明对中央情报局有用。克拉里奇持这种看法，是在他被任命为拉丁美洲行动计划负责人以后的事。但事实证明，在里根时期，诺列加最重要的朋友是凯西自己。凯西欣赏诺列加滔滔不绝的反共言辞（有一位前情报局官员说，“诺列加的反共言辞和水龙头开关一样，随时可开可关”）。当然还有他经常提出的帮助美国反对尼加拉瓜的种种建议。

在第二届里根政府期间，布什与诺列加关系的问题越来越频繁地被提了出来，到1987年晚些时候达到了顶点。在1988年4月初，当参议员克里就贩卖麻醉品问题举行第二轮的听证会时，一些记者被派往巴拿马，去寻找据说是1983年布什与诺列加的一次谈话的录音带，其中也讨论了诈骗钱财的问题（如果的确有这个录音带的话，他们这次并未找到）。1988年4月的一个星期四，在举行总统初选前的24小时，那种说布什和诺列加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关系的谣传达到了顶峰。当时布什与参议员罗伯特·多尔正在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多尔试图利用克里的调查，作为攻击布什原谅诺列加非法活动的根据，当时布什的身份曾先后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副总统。多尔有一次在电话中对一位国会的调查官员高声嚷道，“不要把证据扣压起来，我知道你们已经有这些材料。快公布！快发表！”但克里从未有任何真凭实据，他也无法把布什和诺列加直接挂钩。恰恰相反，克里的调查人员所得出的结论是，布什对这个巴拿马独裁者，总是保持一种公事公办甚至是冷冰冰的态度，特别是在他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更是这样。

举例来说，1983年，布什在一次路过巴拿马的短暂停留中，会见了巴拿马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里卡多·德·拉·埃斯普列拉总统，后者当时由诺列加引来同布什见面。在谈话过程中，布什整个注意力集中在德·拉·埃斯普

列拉身上，诺列加则静静地坐在一旁。但即使没有材料证明布什和诺列加之间存在令人难堪的关系，仍不能说服 1988 年的克里—赫尔姆斯小组委员会，布什过去没有支持这个巴拿马的独裁者，以后也不会政府在政府圈子里继续为他辩护。1988 年 4 月，行动部内对布什持强烈批评态度的一部分官员私下也有同样看法。其中有一位曾说，“你可以通过行动部副主任和拉丁美洲处，在市什和诺列加之间划一条线，这条线可以一直划到内斯特·桑切斯。真见鬼！桑切斯就是管诺列加专案的。”杰克·布卢姆，这位克里的天才调查员，1988 年从情报局的人那里听到这类话，因而不肯善罢甘休。他解释说，“这些有关副总统的问题，他都没有作出回答。难怪人们怀疑他到底知道多少有关诺列加的情况，有多少事他不愿公开。”

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更是直言不讳，他对一位采访他的人说：“在福特执政期间，布什在政府里工作，那时薪俸名单上还有诺列加的名字。布什在卡特执政时离开了政府，那时诺列加也不在薪俸名单上了。布什一回来，诺列加又在这名单上出现。这就是事实，你自己去琢磨吧。”

过去有人把威廉·凯西的问题看得很严重。诺列加参与国际贩毒活动的丑闻，再一次证实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是他重新恢复了中央情报局与巴拿马的这个独裁者已经中断的联系，甚至加以扩大。到了 1984 年，即凯西任期的第四年，诺列加被认为是美国中美洲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这项政策是把矛头指向尼加拉瓜的。但 3 年后，当停止了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支持时，中央情报局内支持诺列加的残余势力也跟着土崩瓦解了。如果美国准备抛弃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有什么必要继续和巴拿马腐朽的独裁者保持友好关系？国会听证会的紧锣密鼓，使中央情报局也不再愿意去宣扬诺列加作为情报来源的价值。1988 年 2 月，当诺列加正式被起诉时，这一论点也被抛弃了。行动部副主任理查德·斯托尔茨认为，中央情报局不能与起诉诺列加的检察官合作。当后者要求中央情报局提供诺列加的档案时，他们拿到的仅仅是薄薄两叠没有多大价值的材料，其中一叠还是关于诺列加与贩毒活动关系的剪报资料。当对任迈阿密州联邦检察官助理的理查德·格留戈里说，“中央情报局的材料没有用处。他们似乎在给我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能这样做[即对诺列加进行起诉]，你们就进行吧，可我们不会帮忙’。”

对克里—赫尔姆斯听证会，以及佛罗里达州即将对诺列加进行的起诉，中央情报局都决定保持距离。这一决定并非轻易作出，在中央情报局内也并非没有反对意见。理查德·斯托尔茨，这位韦伯斯特手下的新任行动部负责人，是这一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在斯托尔茨上任的第一个月里，拉丁美洲处里有一小部分人找到他，他们担心中央情报局没有和这个巴拿马的独裁者保持足够的距离。他们争辩说，中央情报局应当谴责诺列加与毒品贩子的联系。但是这个反诺列加的派别却敌不过一个更大的、更有影响的集团，这批情报官员认为，中央情报局应该闭口不谈它同诺列加的关系。最后，不管是斯托尔茨还是韦伯斯特，都相信那种认为中央情报局应当特地发表声明，公开谴责诺列加的主张，并没有多少说服力。他们深信，公布它所搜集的诺列加的犯罪材料，对中央情报局并没有什么好处。斯托尔茨还认为，和国会的委员会合作，将创立一个危险的先例。他主张仅仅做法律规定他们应做的事。不管你想帮忙是出于什么好意，一旦中央情报局决定合作，将使中央情报局的行动计划公开化。斯托尔茨对情报局的一些官员们说，“克里或者赫尔姆斯

迟早会问，我们是如何搞到这些情报的，而我们又不能告诉他们。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开这个头？”

斯托尔茨的决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央情报局的沉默似乎证实了公众的这种猜疑：中央情报局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贩卖麻醉品的活动。最起码的是，似乎为了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保持它的间谍网，它主动宽恕了这些贩毒活动。第二，中央情报局的这一政策意味着，别人已无法利用它作为改变巴拿马现状的一股力量。任何想推翻诺列加政府或把他带到美国来受审的努力，都得在没有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策划和进行。在美国政府内，已有越来越多的官员认为，对诺列加采取任何行动，想要靠中央情报局是靠不住的。格留戈里有一段话，完全反映了这些人的看法。他说，“我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央情报局这样对待诺列加。那里基本上都是些热衷于冷战的人，他们的一切政策都要从这点出发。他们说，‘对，我们知道诺列加是个大坏蛋，但他是我们的人’。”

中央情报局与诺列加合作的历史，已经使华盛顿的政府机构决定，在采取任何关系到诺列加的行动时，不要让中央情报局插手。到了1988年3月，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当时国务院决定进行一项秘密计划，谋求建立一支反政府的力量，企图最后推翻诺列加。搞这种计划对国务院来说，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但不寻常的是，这一次很显然已做出某种努力，保证使中央情报局对这项计划知道得越少越好。本来已在外交上作出了计划，要迫使诺列加自动下野。但新的计划已在此以前提前执行。这种违反美国传统的执行政策程序的做法，更加使情报局的官员们相信，“河对岸的那些人（指他们在国务院的同行竞争者）不仅是不相信中央情报局，而且他们的行动实际上是一种绝望的努力，远远不是出于政策上的深思熟虑。”国务院试图建立的反对派，其中心人物是巴拿马驻以色列大使爱德尔多·埃雷拉·哈桑上校，他也在巴拿马国防军内批评诺列加最直率的人物之一。

3月下旬，埃雷拉·哈桑被偷偷地从以色列带了回来，乘上了一架飞机，在军事人员的护送下来到华盛顿进行磋商。他的这次访问想不到却变成了一件令人难堪的事。在访问的中间，埃雷拉·哈桑感到，华盛顿对这个计划能否成功改变了看法。这主要表现在他和国务院的一些官员举行高层会晤时所受到的冷遇。对此他感到很生气和痛苦，他和流亡在华盛顿的其他反对派人物商量后，决定只有在他们确信不会被出卖的情况下，才愿和美国政府合作。然后，他仅在华盛顿呆了3天，就回到了以色列，行前没有给他的美国主人作任何解释。他回来时，对华盛顿要把诺列加赶下台的承诺，已感到非常失望。事实上，埃雷拉·哈桑的怒气不应该冲着国务院。真正阻挠他去领导一场反对派运动的不是别人，而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他们把推翻巴拿马现政权的任何秘密计划，都看成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危及军方在巴拿马的利益。

中央情报局获悉国务院的这一计划完全是出于偶然。在埃雷拉·哈桑秘密访美的前几天，他按照惯例给中央情报局在特拉维夫的情报站站长挂了一个电话，目的是了解此行的详细安排。这位站长毫无思想准备，他不知道埃雷拉·哈桑在讲什么。这位巴拿马人还不大相信，最后把国务院的秘密计划的详细情况都告诉了他。那位情报局的官员听了这番话，几乎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一位同事解释说，“在他工作的20多年中，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种事。”）这位情报站站长最后重申，他不了解有关这一计划的任何情况，然后谈了谈他的个人看法。他认为，任何要推翻诺列加的秘密行动必须很好组

织，而且得到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全力支持。他又没有必要地加上了一句说，他怀疑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如果中央情报局得到了通知，肯定会让他知道。在这次通话后，埃雷拉·哈桑几乎想取消他的美国之行，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只要有任何搞掉诺列加的机会，即使有风险，也是很值得的。

埃雷拉·哈桑对美国的访问证明没有组织好。国务院甚至没有采取措施去保证他到达后的安全，尽管事先他一再说明，如果诺列加发现他在华盛顿，肯定会把他干掉。据参议员阿方塞·达马托说，国务院不关心埃雷拉·哈桑的安全，破坏了美国支持在巴拿马本土上建立一个反对诺列加的派别的计划，而且直接危及这位外交官的生命安全。这位参议员早就和克里和赫尔姆斯站在一起，直言不讳地批评诺列加。为了证明他的上述论点，阿方塞·达马托举了一个例子。3月25日，反对派的人物在五角大楼刚刚同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开完一次会议，当军官们带领着客人走过五角大楼的主要过厅的时候，他们被中央情报局的前官员纳斯特·桑切斯发现，这次在过厅里偶然的相会是诚挚的，桑切斯和这些巴拿马人大都很熟悉，也了解他们反对诺列加的观点。一位参加这次会见的巴拿马国防军中的人回忆说，“在五角大楼星期六的那次会后，我们在五角大楼的过厅里见到了纳斯特·桑切斯。第二天我们的名字就出现在诺列加的报纸[《批评家》]上。有六位巴拿马国防军的官员在场。另外还有鲍勃·帕斯托雷诺，当时他在国防部的巴拿马事务部任职。伊格那休·莫拉莱斯（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自从我们后来一直在同我们联系...[安东尼·]格雷博士（国防部泛美地区处副处长），国防部情报局的约翰·卡什上校，此人后来为[詹姆斯·]科尼利奥所取代。这家报纸就说我们在那里开会，但没有说讨论什么问题。

达马托参议员一直深信桑切斯是有意泄露这一消息，为了把“埃雷拉·哈桑置于危险的境地”。他还补充说，“这个狗娘养的[桑切斯]搞的鬼，也许中央情报局也知道。”在这以后的几个月，在参议员克里就诺列加参与贩毒活动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达马托参议员大发雷霆地质问桑切斯有关这一事件的情况（后来这成为头条新闻）。桑切斯承认在3月里见到过那些巴拿马官员，但宣誓否认这消息是他泄露的。他说，“我和他[诺列加]没有任何业务关系。我没有和他手下的任何人谈过话，包括他的办公室主任，他的秘书，他的翻译...我知道有这次会，因为他们开完会出来，我正好在那个地方。”

“但你知道有这次会，是不是？”达马托问，眼睛直盯着桑切斯。

“他们一定是开过会，”桑切斯回答说，他的嗓门也提高了。“我看见她们从部长副助理的办公室里走出来...你想问什么问题？参议员先生。请问得具体一点。我不喜欢你含沙射影，或者暗示是纳斯托·桑切斯把这一消息透露给巴拿马政府的。这不是你要想说的话吗？”桑切斯放在证人席桌上的那只手有些颤抖。

“好，那么，是不是你干的？”达马托问。

“我没有，”桑切斯回答说。

“你向任何人说过关于这次会的事吗？”达马托进一步追问。

“我不知道开会是在讨论什么问题，”桑切斯说，他很巧妙地回避这个问题。“我知道开过一个会，因为他们走出办公室时向我打招呼...”

达马托打断他的话，他说，“好了，你知道有这样一次会。所以，我问的难道是一个不现实的问题？”

谁都能觉察出达马托和桑切斯之间存在的敌对情绪。整个听证会的会议

室里充满了紧张激动的气氛。桑切斯已感到够呛。他说，“我无法知道开的是怎样一个会，因为我是在他们开完会后走出来时看到他们的。参议员先生。如果你有那种权力，我可没有。”

达马托撂下了这个问题。他知道桑切斯已经承认了不少东西，实际上已超过了 he 应该承认的范围，尽管他没有承认对他最基本的指控。

对桑切斯的攻击不仅是针对这位国防部官员的，而且也是针对中央情报局的。这位参议员公开把那里的人斥为“一群懒惰的笨蛋”。人们指责中央情报局在保护甚至怂恿一名国际罪犯的活动。对于这种指责，中央情报局不作回答。这对于达马托来说真有些受不了。他在听证会上对克里说，“主席先生，正如你我从材料上所知道的——我敢保证说，中央情报局在这些材料面前将说，我们不会作任何评论——诺列加这个恶棍兼讹诈钱财的歹徒，受雇于中央情报局并从那里领取薪俸已经有许多许多年了。据我所知，一直到前不久还是这样。我敢说，这个国家的情报机构本应参加这场战斗，可是，天啦，他们却和这种国际社会的渣滓一起合作，他们就是这样干的。”

有些行动部的官员，特别是拉丁美洲处的某些官员，打心眼里同意达马托的意见（当然，另外也有很多人发誓永远不会宽恕这位纽约的参议员）。但对理查德·斯托尔茨和威廉·韦伯斯特来说，达马托的话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已经作出决定，不让中央情报局去碰他们认为纯属政治性的问题。

这个决定实际上是把除掉诺列加的计划，包括策划工作与执行，都让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去操办。这对助理国务卿艾布拉姆斯来说，也是毫无问题的。现在，在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已经无所作为的情况下，艾布拉姆斯发起了一场针对巴拿马领导人的运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国务院。当罗纳德·里根对巴拿马实行经济制裁的时候，艾布拉姆斯的计划就开始执行了，这不过是第一步。作为第二步，艾布拉姆斯派国务院的首席巴拿马问题专家迈克尔·科扎克去巴拿马城，试图说服诺列加退休。科扎克对诺列加施加了很大压力，他明确无误地对他说，科扎克提出的方案是诺列加能得到的最佳方案，这比被弄到美国去接受审判，或者面对他原来的同事领导的装备精良的反对派武装都要强得多。

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艾布拉姆斯又一次碰到推行埃雷拉·哈桑计划时遇到的同样为难的局面。几周以后，国务院仍然未能取得美国军方高级官员对执行这项计划的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再一次明确反对任何可能危及他们在巴拿马的军人及家属的行动计划。联席会议主席威廉·克罗特别坚决。他告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国人员和财产没有受到诺列加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支持一项旨在推翻他的计划的确太危险。克罗警告说，美国在巴拿马境内建立反对派，一旦政变失败，将危及运河，并造成数以千计的美国囚徒。

中央情报局站在军方一边。4月中旬在白宫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情报局的官员们详细地介绍了诺列加其人，这份材料是情报局的政治心理处写的。它把诺列加描写成一个诡计多端的对手，他总会找到可以战胜反对派各种压力的办法。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还强调，反对派的人物在巴拿马境内没有多少威信。例如，流亡总统埃里克·阿图罗·德尔瓦列，只不过是一个令人感到难堪的败家子，他对去海厄利亚赛马比在中美洲建立民主更感兴趣。

在里根总统的坚持下，艾布拉姆斯成功地战胜了军方和中央情报局持怀疑态度的人。他迫使他们作出了重大的让步，从而保证建立起一个诺列加的

挂名反对派，虽然它的经费短缺，而且得不到美国政府某些最重要部门的支持。4 月间，里根签署了一项总统批文，文中指示中央情报局向巴拿马境内的反诺列加的武装提供非杀伤性的援助。这些援助包括一部广播发射机，还有为在美国及运河区反对派人士提供的宣传经费。中央情报局在巴拿马城的情报站站长负责分发这些援助，并且组织一个可靠的代替诺列加的政治班子。当这些措施背后，又有艾布拉姆斯和科扎克在谈判中施加压力与之配合，里根政府中的高层领导完全有信心，使巴拿马问题可以在不需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但几个月后，这一计划显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部分是由于中央情报局在履行它的义务方面很拖拉。除了其它的事例以外，为了找一架合适的广播发射机，竟然莫名其妙地花了 6 个星期的时间。一位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逗乐地说，“我在卖无线电的货摊上就能弄到一个”。另一个问题是，反对诺列加的力量比原来美国预料的还要分散和不团结。埃里克·阿图罗·德尔瓦列几乎丝毫不能取得他流亡的同事们对他的信任。与此同时，把巴拿马境内的民主力量组织起来也并非易事，因为老百姓已在开始抱怨。里根下令对巴拿马的经济制裁，更多地是损害了他们，而不是损害诺列加。更重要的是，迈克尔·科扎克试图说服诺列加退休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诺列加不相信有任何理由要他退休。他一直认为，他能对付外来的压力，可能他觉得在中央情报局内还有很多盟友在保护他。

5 月中旬，这个独裁者与美国官员的谈判破裂。诺列加拒绝辞去巴拿马国防军统帅的职务，以作为美国联邦法院对他参与贩毒活动免予起诉的条件。（参议员罗伯特·多尔把这一笔交易称之为“合法的金色保护伞”。）此时事情已经明摆着，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解决诺列加的问题。6 月间，里根总统原来提出的仅仅提供非杀伤性援助的批文，已扩大到可以把运河区作为基地，对诺列加采取准军事行动。这项计划的成功要依靠从国防情报局借调的一名军人。

这位军人就是杰勒德·克拉克上校，他身高 5 英尺 9 英寸，是一位态度强硬的越南战争的老兵。他被认为是美国军队中最有才华、最能干的拉丁美洲专家。3 月间，他被指派负责把埃雷拉·哈桑从特拉维夫偷偷地用飞机送到华盛顿，要保证不让诺列加在以色列的朋友们发现。在埃雷拉·哈桑的使命夭折后，克拉克开始作为迈克尔·科扎克的助手，参与说服诺列加离职的谈判。当这一计划也失败后，克拉克又被指定负责一项秘密行动计划，要他把诺列加抓获并押送到美国去接受审判。这是一项很微妙、复杂而危险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选他这样一位有奉献精神，训练有素并且无所畏惧的军官来担任的原因。

克拉克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物，他是美国军队中少有的军人兼外交家，一位有作战经验、同时又习惯于谍报工作所特有的危险的军官。他作为一个军官已经有 21 年的经历，但他这一辈子也经常情报圈子里担任各项任务，他所服务过的单位包括国防情报局，国务院以及中央情报局。

克拉克于 1944 年生于波多黎各，这一独特的背景使他很了解中美洲的文化，也很了解这一地区的人们对于他们强大的北方邻国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在越南服务时表现突出，此后他于 1981—1986 年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即担任美国驻洪都拉斯的防务参赞。克拉克很快发现，最有权势的洪都拉斯军队领导人害怕，美国给予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大量的援助会损害他们

国家的主权。洪都拉斯领导人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头头们的傲慢无礼也颇为反感，这些尼加拉瓜人在洪都拉斯的南部建立起了一个差不多是完全独立的国家。洪都拉斯领导人的不满由于得到不少美国援助而有所缓解。克拉克得要说服他们这些援助并非贿赂，但他这一说服任务由于以下情况而变得更加复杂了：洪都拉斯军方一贯在保护中美洲非常赚钱的毒品交易。洪都拉斯军方情报机构的领导人里昂尼德斯·托里斯·阿里亚斯上校，强烈反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留在洪都拉斯，他还保护那些贩卖毒品的暴发户，使他们不会遭到起诉。他的这些行为使克拉克十分恼火。克拉克一到洪都拉斯，他就面临一项颇为棘手的问题，即要说服洪都拉斯军方，要清除这个腐败的上校。运用他的经验、机智和个人的魅力，克拉克在他到达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几周以后就完成了这一任务。一些克拉克结交的洪都拉斯亲美军官，把托里斯·阿里亚斯从他原来的职位上赶走，把他打发去当驻智利的武官。克拉克很快了解到，托里斯·阿里亚斯的离去并不能解决洪都拉斯的贩毒问题。在托里斯·阿里亚斯离开以后不久，克拉克访问了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在那里他结识了豪尔赫·奥乔亚，麦德林毒品卡特尔的领导人之一。托里斯·阿里亚斯事件是一个象征，它表明美国要想摧毁毒品贸易有多么困难。正如这个地区的其他任何美国重要官员一样，克拉克被迫与这一地区的主要官员合作，而这些官员因与贩毒活动有联系，本人就很难有诚实可言。要与这帮人合作，这本身就是一个灾难性的政策。

对一些洪都拉斯腐败的军官，克拉克只好装着看不见他们的问题，这使他非常不高兴。他的一位同事说，“格里（指克拉克——译注）告诉我，他们都不让他动弹。对[洪都拉斯的]腐败，他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解决，因为白宫害怕会损害他们关于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计划”。

对洪都拉斯军方的腐败问题只能不闻不问，这就是为了在中美洲进行工作要付出的代价，对于这一点，克拉克感到非常恼火。他对奥利弗·诺斯意见最大，后者是里根政府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最忠实的支持者。正如赫尔姆斯的助手德博拉·迪莫斯所说，“奥利（指诺斯——译注）不喜欢格里，格里也恨诺斯”。对克拉克来说，要建立一个反对桑地诺主义政权的堡垒，中美洲必须有一个清廉的军事领导。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又来自诺斯，因为他一直热衷于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毫无疑问，他为了保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能够继续生存，不惜牺牲洪都拉斯。巴拿马反对派人士何塞·布兰唐说，“克拉克是美国在中美洲最好的情报官员。他从不撒谎，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你感到他不会抛弃你。而对奥利，我从来没有这种看法。

他在洪都拉斯一共呆了7年，好像是美国派往这个国家军方的一名非正式的大使。他成功地减轻了洪都拉斯政府上层中的反美情绪。克拉克还发现，参与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洪都拉斯的某些公司，也存在腐化现象，还听说它们也参加了贩毒活动。于是他也专心致志地设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在这些公司中，名声最坏的是一个名叫赛特可的公司，它是国际毒品贩子胡安·拉蒙·玛塔·巴列斯特罗斯在特古西加尔巴建立起来的。在八十年代中期；赛特可公司还得到美国国务院的一项合同，负责向洪都拉斯境内的尼加拉瓜最大的一支反政府武装运送军火。这笔买卖包括“至少一百万发子弹，还有食品、制服和其它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的军需品。”

玛塔长相十分英俊。他养成了健身的癖好，过着豪华和罪恶的生活。他出身贫困，生长的地方一向以歹徒恶棍的集训地而闻名于西半球。他幼年时

即被美国的移民归化局的特务逮捕并被判刑 5 年，关押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所警卫极少的监狱里。但在那里只呆了 3 年半，他就在买通警卫后逃往墨西哥。在墨西哥，他成为一个走私毒品集团中强有力的人物，这个集团同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和卡利毒品卡特尔有联系。在他参与谋杀美国禁毒局的调查官员恩里克·卡马雷纳·萨拉萨尔以后，玛塔又逃往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在那里，他会见了卡利和麦德林毒品卡特尔的负责人，后者想利用洪都拉斯作为向美国贩运毒品时的中转站。当玛塔再一次被捕后（这一次是在哥伦比亚），他强有力的贩毒朋友花了二百万美元收买狱吏，使他能成功地越狱。1987 年，他回到洪都拉斯时，他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犯罪集团的头目，这个集团的组织从哥伦比亚的丛林和波哥大的郊区，一直延伸到迈阿密的黑人、波多黎各人等少数民族居住区。这时，格里·克拉克已经离开了洪都拉斯，并接受了国防情报局的新任务，开始计划在巴拿马建立一支反对派武装。当克拉克在乘飞机穿梭于华盛顿和特拉维夫之间的时候（迈克尔·科扎克则来往于华盛顿和巴拿马城之间），玛塔作为特古西加尔巴最体面的公民，正在那里享受他的新生活。但不久，玛塔又被迫中止他在特古西加尔巴的逗留。

1988 年 4 月 5 日，即在克拉克回到华盛顿 6 周以后，一支名叫“眼镜蛇”的精锐的洪都拉斯国民警察包围了玛塔的寓所，海关、美国执法人员局和禁毒局的特工人员在一旁注视着。正是由于克拉克已得到洪都拉斯军方高级官员的同意，要对这一贩毒头目下手，才进行了这次搜捕行动。克拉克还同意担任军事联络官，协助禁毒局和司法部联合的行动小组来进行工作。按照这一计划，玛塔一旦被抓住，就立即把他秘密地转移到美国。首先把他用飞机押往多米尼加共和国，然后把他转交给一架美国飞机，经过短时间的飞行即可到达迈阿密。飞机一到美国领空，就可将他逮捕，罪名是贩毒、飞越国界、参与阴谋和暗杀活动。

但计划一开头就卡了壳。当全副武装的洪都拉斯国民警察冲进玛塔的寓所时，他们发现屋内无人，玛塔不见踪影。人们立即互相指责。禁毒局的特工人员暗示说，一定是那些反对逮捕玛塔的洪都拉斯腐败军官向玛塔通风报信；这立刻引起了美国人和洪都拉斯人就在玛塔公馆门前的大街上相互对骂。就在他们忿怒地指责对方的时候，玛塔本人却在远处出现了，原来他是在黎明前刚刚做完穿过特古西加尔巴街道的短跑回来。玛塔抓住后，被捆起来送上飞机，经由多米尼加共和国飞往美国。飞机一进入美国领空，他就被逮捕了。

禁毒局和美国执法人员局的官员个个兴高采烈。他们相信，玛塔的被捕证明，里根政府是在认真做点事来制止毒品交易，他们还认为，这件事同时证明，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官员可以合作，向毒品卡特尔的领导核心发起攻击。同样重要的是，禁毒局原来计划，在不求助于中央情报局的情况下采取这一行动，因为它对情报局根本信不过。当记者们表示怀疑，在没有中央情报局的同意下。这一行动何以能进行，这项行动的主要策划者、美国执法人员局官员霍华德·塞弗说，“这次[行动]是我们搞的，我们才是真正的策划者，和他们无关，一点关系也没有。”

这一尖锐的批评反映了禁毒局和执法人员局为一方，中央情报局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对立情绪。情报局在中美洲有一批间谍，他们参与了贩毒活动，但仍受到中央情报局的保护，这件事已使情报局出了名。它引起了人们的愤恨，并且在美国政府中造成分裂。批评情报局的人指出，玛塔事件是一

个最好的例证，它说明那些毒品贩子，只要他们坚决反共，中央情报局就会保护他们。参议员约翰·克里的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指出，玛塔在八十年代中期拥有赛特科公司，这件事至少提供了一个旁证，说明只要有助于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继续生存，中央情报局愿意容忍贩毒和伴随而来的贪污腐化。他们还说，已经有材料证明，玛塔和曼努埃尔·诺列加的朋友里昂尼德斯·托里斯·阿里亚斯上校有联系，这说明玛塔被捕后，中央情报局也遭受了损失。

但是，禁毒局所说逮捕玛塔的行动中央情报局事先并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在中央情报局拉丁美洲处内，禁毒局搜捕的目标一般人是不知道的，但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在他们执行这项计划两周前就获悉了。中央情报局在洪都拉斯基地的负责人，当时已向兰利的总部打招呼，洪都拉斯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帮助这项行动，并且说在洪都拉斯政府内，对是否让这项计划进行下去，有不同意见，因而展开了一场斗争。那些赞成逮捕玛塔的军官在辩论中占了上风，但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坚持第一段押送玛塔的路程，不能使用洪都拉斯的飞机。他们争辩说，这样做，至少他们的政府可以说，此事虽违反了它自己制定的禁止引渡洪都拉斯公民的法律，但与洪都拉斯政府无关。美国人同意可以用一架没有标志的美国飞机，把玛塔押送到多米尼加共和国，从而解决了这场争论。在特古西加尔巴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向他在华盛顿的上级汇报了这一争论的情况，并且预言，抓获玛塔的事件，将加剧反美情绪。他的预言果真没错。

在玛塔被捕以后两天，在特古西加尔巴爆发了反美骚乱。1988年4月7日晚，两千名抗议者试图冲进美国大使馆，并且纵火烧了它的附属建筑。6名洪都拉斯人遇害，其中包括一名14岁的女孩被活活烧死。美国向洪都拉斯政府提出抗议，并且声称，大使馆曾向当局发出紧急呼吁，但没有得到反应。洪都拉斯军方花了两小时，才派来警察平息了这场骚乱。

尽管由于玛塔的犯罪活动，禁毒局和中央情报局之间产生了彼此怨恨的情绪，但洪都拉斯的这场反美危机终于过去了。接着中央情报局又在考虑，是否有可能以捉拿玛塔的行动为样板，搞一次针对曼努埃尔·诺列加的类似行动。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争辩说，逮捕玛塔的行动证明，美国可以收到很大的宣传效果，表明美国决心向毒品宣战。4月底，理查德·斯托尔茨的一个行动计划得到批准，这一计划酷似捉拿玛塔的计划：由巴拿马反对派人士把诺列加抓起来，押送他上一架飞往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飞机，然后把他转移到另一架短程飞机上，最后飞往美国。（也曾考虑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将他绑架，有人时而看到他在那里探望他的女儿，她嫁给了一位多米尼加医生。）斯托尔茨和他的顾问们都坚定地希望，逮捕诺列加，审讯他并将他判刑，这将驱散那种不体面的谣言，这种谣言说中央情报局参与了国际贩毒的买卖。

在得到威廉·韦伯斯特新成立的秘密行动审核组的批准后，斯托尔茨制定的中央情报局关于诺列加的行动计划，在1988年5月中旬开始付诸实行。这个审核组的建立，是为了防止在伊朗门丑闻间明间那些过火的做法再次发生。行动部的官员们批评韦伯斯特，说建立的这一高层次的审查组，“不过是另一层官僚机构”。韦伯斯特反驳说，秘密行动的审查程序本来就应当加强，以便在中央情报局上层管理中使这一程序“制度化”。他建立的这一小组，将审查所有未来调查研究的成果，着眼于判断它们是否符合他新的、更加严格的法律标准，以及韦伯斯特所谓的“美国政府的传统”。韦伯斯特后

来说，他从不反对任何这个审查小组通过的东西，但他犹豫了一会，然后很快补充说，“只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斯托尔茨从巴拿马把诺列加捉拿归案的建议。有一位情报局的官员回忆说，“韦伯斯特一直反对这玩意儿，他认为这是荒谬可笑的”。

中央情报局关于诺列加的行动计划，在付诸实施前，还需要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因为它所需的经费，得从其它已批准的行动计划里拨过来。根据一位持怀疑态度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说，为什么中央情报局在执行这项计划前来征得国会的认可，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央情报局想表明，对搞掉诺列加，他们的兴趣和我们一样大。但实际上，我认为他们并不想做任何事情。他们拿出一个致命的危险方案，知道会遭到五角大楼的反对，因为五角大楼过去就一贯反对关于巴拿马的任何行动计划。这样他们就可以说，‘好哪，我们是想搞掉诺列加的，可军方又认为这样做太危险’。”

参议院原订举行一次听证会，研究情报局的这项计划。在听证会前一周，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写了一份有关这一计划的备忘录给副国务卿约翰·怀特黑德。他写道：“送上你的一份[参议员丹尼尔·]井上的证词，仅供你准备星期四（5月26日）的证词时作参考。届时可能会提出不少问题，我们将就这些问题尽可能多搜集一些情报材料。当然，到底会提出一些什么问题，就得看谁出席，还要看井上那天卜的哪一卦了。”

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最后决定推迟它们的陈述，以便让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有时间研究这项计划。这样，到陈述这份研究结果时，情报委员会也会认为它是参与这项工作的一分子。在7月以前，中央情报局不采取任何行动。国务院官员迈克尔·阿马科斯特这时也提醒国务卿舒尔茨，不要参与这项建议可能会引起的争议。他在备忘录中写道，“预定狄克·斯托尔茨、[国防部的]里克·阿米塔奇和我要作证。在白宫内，普遍感到如果由你和比尔·韦伯斯特来处理这些作证，我们取得国会支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而他们的支持是必要的，因为经费的分配需要重新调整。科林（·鲍威尔将军，他当时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也许会在园林里（一个华盛顿高级人士饮水的场所）和你谈这个问题。他们的估计无疑是正确的，但我劝你不要揽这件事。你的事已排得够紧的了。还有些华盛顿以外的事需要处理，那也是些很麻烦的问题，必须做些准备工作。这件事我准备去办。里克、狄克和我将尽力而为。”

理查德·斯托尔茨对中央情报局的计划，能否得到国会的批准持悲观态度，因为他早在阿马科斯特给舒尔茨写那份备忘录以前，就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委员们作了一次非正式的民意测验。斯托尔茨发现，国会虽然也想在诺列加的问题上采取某种行动，但它希望的是“快速修理”，而不是这种有争议的绑架方法，它怎么说也只是半合法的。委员会也很担心这种行动在巴拿马公众中可能引起的反应，特别是鉴于捉拿玛塔一事已在洪都拉斯引起大规模的骚乱。

迈克尔·阿马科斯特也同样是小翼翼的。他对舒尔茨确认：“从中央情报局和情报委员会商量后的初步反应看来，我们面临一场非常艰苦的战斗”。斯托尔茨和阿马科斯特的看法证明是正确的。中央情报局在7月的作证以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再一次告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这一计划危险，而且也没有必要去冒这种危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罗警告说，“我们在运河区有15,000名美国人，每一个美国人都可能成为一名人质”。情报委员会的反应是，暂不批准中央情报局的计划，并且要求克罗研究，将美国人从

巴拿马全部撤退需要多长时间。

如果中央情报局的意图是想暴露军方在诺列加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从而把对诺列加无所作为的罪责推到五角大楼身上，那么，克罗在撤退军事人员问题上给情报委员会的答复，肯定会在兰利受到欢迎。1988年8月初，参谋长联席会议把他们的研究结果通知了情报委员会。它表明从运河区撤退美国人可能需要好几个月，也许会超过一年。一位赫尔姆斯参议员的调查员带着厌恶的口吻讽刺说，“我奇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列出他们需要多少车辆。他们弄了半天，还是跑来说，他们干不了这个。他们排除了任何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还尽量使中央情报局的计划流产。”

到了8月底，情报委员会投票否决了中央情报局那项致命的计划，但要求斯托尔茨准备一项加以改进的非致命的计划。

但即使这样一项计划后来也搁浅了。这时，里根总统已经私下向巴拿马的流亡总统埃里克·阿图罗·德尔瓦利保证，他已经批准一项调查研究的结果，准备让诺列加下台。但真实的情况是，美国政府根本不愿意，也没有这个能力去解决巴拿马的问题。9月间，巴拿马城的情报站站站长告诉他在兰利的上司，给巴拿马反对派配置一部广播发射机将给情报局在中美洲的行动计划带来危险。于是，中央情报局又撤销了广播宣传计划。一位巴拿马反对派人士说，“这真是开玩笑，我们有一个很小的广播发射机，我们刚刚广播了半小时，诺列加的电台就对它进行干扰。美国军方答应帮助我们，而现在他们又在计划搞另一次行动，于是我们又被晾了起来。过去他们告诉我们，让我们做好准备，现在却又说，‘算了，不搞了’。我们感到很失望。”

帮助赫尔姆斯和克里的小组委员会搞调查的人也感到很失望。其中一个人说，“中央情报局和军方都参与了破坏这项调研结果和提出的建议。这两方面的人都认为想搞掉诺列加的主意太困难，太冒险。杰克·布卢姆，克里的这位最直言不讳的诺列加和国际贩毒问题专家，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我[听到这次听证会情况]的第一个反应是，‘噢，当真吗？简直是发疯了’。我想政府的意图是，让国会把它否决掉。这并非他们害了妄想狂的毛病。”

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最后否定了斯托尔茨的修改计划后，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研究在1989年对付诺列加的方案。里根政府想弄清楚，采取经济制裁的办法是否能迫使诺列加下台。如果他辞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还想知道。在巴拿马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政府，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这一研究工作由华盛顿特区的嘎玛公司承担，这家公司过去曾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过。从本质上讲，嘎玛公司的分析，有点像过去5年中央情报局在诺列加问题上分为两派时争论的重演。嘎玛公司把这个模拟的辩论称为“地理政治途径的游戏”。在这场模拟辩论中，参加者包括在诺列加问题上代表正反两方面意见的人。辩论中的兰队代表美国政府，其中有一名杰出的成员，即中央情报局拉丁美洲处的负责人吉里·格鲁纳。他是一位诺列加的公开反对者，曾带头支持在巴拿马建立一个反对派的方案，并主张它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他在嘎玛公司的报告中化名为杰·格鲁宁。

绿队是代表美国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朋友的。成员中包括一位中央情报局情报部的官员，还有司法部和五角大楼的官员。红队代表巴拿马，以詹姆斯·科尼利奥上校为首，还包括马克·英尼斯（国防情报局主管巴拿马的官员）和内斯特·桑切斯（美国政府内诺列加主要的辩护者）。据几位参加这项游戏的人说，最后还是桑切斯那个组“赢了”。研究报告的结论是，不可

能迫使诺列加下台，而且即使他被迫下台，也会有另一个“诺列加上校”接他的班。

这个研究小组的结论还说，如果美国继续它目前的政策，“诺列加离职的可能大约只有一成或二成”。如果美国在“非经济领域”的政策更强硬一些，这种可能性会增加到“二成到四成之间”。这个小组的结论强调。美国的军事干涉，虽说不大可能。却会对国内产生严重影响。这一报告还指出，“如果诺列加威胁了美国安全的利益。而美国因此采取了军事行动，电视上就会出现一些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美国方面可能会有十多名士兵丧生，其中很可能包括直升飞机失事造成的损失。”

这个嘎玛公司的小组最后结论是，什么事也不要做。结论最后说，“他的继任者只会变本加厉，而绝不会朝着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民主政府迈进一步”。

换句话说，这份嘎玛公司的报告的结论是，美国制造的这个魔鬼也许比它不认识的那个魔鬼还强一点。或者正像参加这项研究的科尼利奥上校所说，“在这场游戏中，我扮演诺列加，每次都赢了”。

当副总统乔治·布什在 1988 年的选举中,击败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的时候,中央情报局没有人感到惊讶。唯一使他们感到奇怪的是,布什在中央情报局当局长的短暂经历,在这次竞争中没有起多少作用。从布什赢得了共和党的提名开始,在中央情报局内,几乎一致的意见是,早晚总得有一天,由于他作过这个国家的头号特务头子,有人要和他算帐。

对他的高级政治助手来说,布什能不因有人怀疑他与诺列加的联系而遭到公开谴责,是一件非常令他们惊奇的怪事。他们原来确信,尽管副总统早已否认他事先知道诺列加与贩毒活动的联系,杜卡基斯一定会就这个问题对他发动一场强大的攻势。1983 年 2 月,布什在共和党中的对手,参议员罗伯特·多尔,曾公开要求布什详细讲出,关于诺列加与贩毒活动的联系,他究竟知道多少,并解释他通过情报局和诺列加建立起来的关系。但布什巧妙地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说,“我在就职宣誓时保证过,不泄露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来源和搜集情报的方法。我不能和别人出去谈[这类事情]”。布什言下之意是,他自己而不是多尔,才是能遵守誓言的人,多尔应该很清楚,这样的问题,他问都不该问。

1988 年 5 月,追查诺列加问题的提问,越来越频繁和厉害了。当时,前国家安全助理诺曼·贝利告诉《华盛顿邮报》说,1981—83 年间,在白宫内部印发的国家情报总结报告中,有若干份报告的主题就是谈诺列加与贩毒活动的联系的。贝利暗示,几乎可以肯定,布什了解这些题为“每日国家情报”的报告。布什曾宣称,他第一次知道诺列加与贩毒活动有联系,是在 1988 年 2 月对诺列加提出起诉的时候。贝利的揭发说明,布什在撒谎。

布什通过他的高级国家安全顾问唐纳德·格雷格,首次否认了贝利的说法。格雷格说,布什从未看过“每日国家情报”中有关诺列加的事。格雷格解释说,布什作为副总统,有权看比“每日国家情报”更高级的情报资料(格雷格指出,通常情况下,布什不看“每日国家情报”)。格雷格补充说,因此说布什不知道诺列加与贩毒活动的联系,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对新闻界的提问,布什本人作出了颇带感情的反应。当被问到担任情报局局长期间,他是否知道诺列加的这些活动时,他勃然大怒,回答说,“就毒品问题而言,我绝对不知道。”他说,“政治界任何有一点自尊自爱之心的人,从未说我知道此事。他们没有这样说最好,因为这不是真的。如果他们说是真的,请把证据拿给我看...让他们像个男子汉那样,站出来面对我,对我当面讲。”在维护政府对这个巴拿马独裁者的政策方面,他甚至反应更快。当杜卡基斯攻击里根时,布什反击说,“正是我们的政府,一旦发现他已经变坏时,就在设法使他受到法律的制裁。”

美国政府内了解真实情况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些话。对他们来说,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布什,和作为副总统的布什,都几乎不可能不知道诺列加和贩毒活动的联系。对于布什的上述谈话,诺曼·贝利也许是最感到惊讶的一位观察家。1988 年 3 月,贝利告诉众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他曾追踪一笔被诈骗的钱财,一直追到巴拿马的国防军,他们把这笔钱用来从事军火和毒品走私。这种非法活动从七十年代中期起就没有断过。贝利解释说,“我个人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或者任何别的被授权的美国政府官员,都可

以接触大量情报，其来源包括谍报人员提供的材料，截获的电讯，卫星和飞机摄影获得的情报。这些情报统统加起来，可以提供的罪证远非土枪土炮，而是 21 英寸的加农炮。”

贝利补充说，“要说不知道[诺列加的犯罪活动]，唯一的理由或借口是，当事人不想知道。不想了解，或者有意忽视大量的罪证”。

布什恰好是这样说的。要说布什不知道诺列加同贩毒活动的联系，以及他的其他非法国际活动，这就需要这位新当选的总统，不仅没有看过“每日国家情报”中的资料，而且在佛罗里达州对诺列加起诉前的整整十年中，都必须是处于几乎失去知觉的状态。关于巴拿马在贩毒活动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的第一篇公开的权威性报道，刊登在 1977 年 11 月的一份《华盛顿邮报》上。当时已经对诺列加的主子奥马尔·托里霍斯提出了疑问。诺列加被指派对此进行驳斥。他回答说，美国在巴拿马打击贩毒的活动，正被利用来“破坏我们政府的声誉”。1978 年 2 月《华盛顿邮报》的第二篇报道，透露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已经“明确提出”诺列加和毒品交易的问题。1985 年，《纽约时报》援引一位巴拿马政府官员的话说，诺列加是一名“贩卖麻醉品的奸商”。1986 年 6 月，《纽约时报》又刊登了西摩·赫什关于诺列加的长篇新闻调查报告。

一位布什的同事在选举以后很久说，“很难相信，布什会不知道诺列加在干些什么，或者他究竟在从事什么样的犯罪活动。但是，我毫不怀疑，布什作为副总统，也和其他人一样，非常想把诺列加搞掉。”可是，当布什本人也这样讲时，人们都纷纷表示怀疑。

在这些怀疑的人当中，有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他声色俱厉地批评里根政府，说它在布什当选前的整个夏天，一直在公开场合对诺列加采取了一种不冷不热的政策。赫尔姆斯还在私下指责布什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科林·鲍威尔，说他们在和诺列加打交道时，表现“骨头软”。在布什当选前两个月，赫尔姆斯在他参议院办公室里，夜间很晚的时候曾和鲍威尔通电话。在电话交谈中，他勇于直接向鲍威尔开火，尖锐地批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计划工作的人，在处理诺列加的问题上“缺乏创造性”。鲍威尔把几周前对一批参议员讲过的话，又给赫尔姆斯重复了一遍。他说，他和他之前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罗一样，无权批准“任何会引起生命损失的”、针对诺列加的行动计划。当赫尔姆斯得到的是这样一个汇报，他几乎不能相信。“活见鬼，我们在那里[巴拿马]驻军队干什么？”赫尔姆斯发火了，谈话也就此结束。他最后说，“你们努力不够”，然后把电话啪的一声挂掉了。

大选临近，国会山上贬斥布什的声音变得愈来愈刺耳。人们指控这位副总统为了政治目的，掩盖他同诺列加的关系，还指责他在是否支持采取行动把诺列加赶下台的问题上，发表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公开声明。

但如果进行一番仔细的考察，就会发现布什至少在有一点上讲了真话：他不愿意任何人说他在诺列加面前是个懦夫。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1988 年 9 月，正当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在努力实行一项在巴拿马的秘密援助计划时，布什的助手萨姆·沃森告诉国务院巴拿马工作组，布什并无意“在大选前避免给诺列加施加压力”。沃森解释说，布什在竞选中倒是希望避免另外一种问题。“他们希望避免因透露美国各机构之间的争吵而产生的压力。他们一点也不介意那种给诺列加施加压力的报道”。

毫不奇怪，沃森在这两方面都如愿以偿，尽管并非以他所想象的那种方

式。

在大选前6周，巴拿马联合工作小组，就紧迫而困难的诺列加问题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反映了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之间广泛的意见分歧——用沃森的话说就是“争吵”。争论的具体问题是，是否应该帮助以博斯科·巴里亚里诺为首的巴拿马反对派，给他们提供一部高效能的广播发射机。有关这次会议的一份机密材料作出了以下的结论：

“ [中央情报局]没有回到使馆去和博斯科·巴里亚里诺派的人联系，讨论广播发射机的事，但他们本周要做这件事。[中央情报局]现在有一份实地考察后所写的可行性报告，说可以在活动的汽车上发射广播。从技术上讲，这是完全可行的，它的覆盖面能包括整个巴拿马城，发射地点也不会被发现。一旦决定要开始行动，3天内就可以发射广播。但是，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站站长和美军南方军区，都因这个方案风险太大而认为不能接受。如果诺列加看出是我们在帮助反对派，使他们的活动更有成效，他肯定会会对美国进行报复。”

换句话说，国务院再一次又遇到来自五角大楼的不妥协态度，同样的态度也来自中央情报局，尽管程度上稍轻一些。这和年初时的情况一样。

除了博斯科·巴里亚里诺以外，中央情报局还帮助吸收了不少其他的巴拿马人，在巴拿马境内建立起一个名义上的反对派。其中包括商会主席奥雷利奥·“耶约”·巴里亚，商人钦科罗·卡德纳斯。此外，还有一些从幻想中清醒过来的巴拿马国防军军官，他们围绕在爱德尔多·埃雷拉·哈桑周围，被中央情报局称为“埃雷拉集团”。国务院对这些反对派人士的能力都评价颇高。但对国务院来说，不幸的是，中央情报局无论是对巴里亚里诺，还是对埃雷拉·哈桑，都一点也不信任。巴里亚里诺被认为是一个能力不强的人，他的一些天真看法，很容易被诺列加利用。埃雷拉·哈桑则被一位情报局官员形容为“卑鄙的恶棍”，“并不比诺列加强”。

在这批密谋者中间，还有一批至少八十年代中期起，就在巴拿马参加了策划政变的前国防军军官。其领导人之一是奥古斯托·比利亚拉斯空军少校。他曾负责3次从古巴运送武器到巴拿马，深信有朝一日他会用这些武器来进行一场对付“美国的全面战争”。比利亚拉斯参加了1987年为期很短的反诺列加政变。这次政变因守卫那个巴拿马独裁者的一营士兵拒绝参加反叛而失败。这营士兵由莫伊赛斯·吉罗迪上尉领导，他是巴拿马国防军最有才能的军官之一。他当时表现了令人生畏的勇气和对诺列加的高度忠诚，在同比利亚拉斯及其同伴的斗争中，扭转了局势，并呼吁他的士兵们逮捕发动政变的领导人。诺列加在这次政变后变得更加强大了。他向美国记者吹嘘说，那天在未遂的政变中发射的几颗子弹是对他的“亲吻”。

从那时起，比利亚拉斯在巴拿马一直被通缉。他仍然是一位忠诚的反诺列加的反对派成员，曾参加埃雷拉·哈桑1988年4月华盛顿之行。但他最后对美国的意图产生怀疑。在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推翻诺列加政权的计划，由于内部争吵，以及在华盛顿和运河区的军事领导人反对而受挫后，他滋长了一种怨恨情绪。他说，“美国政府似乎认为，你不必做任何事情，诺列加就会自动离职”。1988年9月，美国要帮助巴拿马反对派开展一场全面的宣传运动，比利亚拉斯特别对此事持批评态度。当回忆这件事时，他很厌恶地说，“所谓的秘密行动就是设置一个广播电台”。

9月的巴拿马工作组会议以后，在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推翻诺列加政权的

问题上，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意见仍然不一致。在 11 月选举前几周里，中央情报局驻巴拿马的站长继续对国务院的方案表示怀疑。为了对这一方案的有效性进行评估，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参与策划此事的人，在巴拿马秘密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美国驻巴拿马情报站站长告诉与会人士说，他反对支持巴拿马的反对派人士，因为他们“不堪信赖”。这位情报站站长送回兰利的报告越来越悲观，以致上级给他下令，不要再给家里送这类消极悲观的报告，要更多地和埃雷拉·哈桑、比利亚拉斯以及其他反对派人士合作。

中央情报局实际上是敦促它的情报站站长，把日益恶化的巴拿马局势加以美化。这也是中央情报局对推翻诺列加政权越来越感兴趣的一种表现。情报局的行动部是在向它的情报站站长发出指令，叫他“不要发牢骚”，不管是否同意国务院的计划，都要很好开始和他们合作。这一指令对沃森来说，真是正中下怀。对巴拿马反对派作出支持的表示，至少可使中央情报局免受说它无所作为的批评。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还可以以此来满足某个人的愿望，而此人几乎可以肯定将成为美国的下届总统。

中央情报局的这一新态度，表明它现在已同意国务院帮助巴拿马反对派的计划。至于中央情报局中的某些人，他们仍然腻味和埃雷拉·哈桑这类人打交道，并且认为，那种相信比利亚拉斯这样的人能推翻诺列加的看法，真是太天真了。但这些人现在也保持沉默，因为他们知道，新总统不能容忍官僚主义机构内部的争吵。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当过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第一位总统，是他们的自家人。

乔治·布什作为第 11 届中央情报局局长，是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于 1975 年 11 月提名的。他于次年 1 月 30 日正式宣誓就职。在情报局呆了一年还差 10 天以后，他又离开了，因此人们都称他为“中央情报局过渡性的局长”。

布什之所以被任命当情报局局长，是因为当时的总统急于想恢复人们对美国政府机构的信心，使国会恢复对中央情报局的信任，同时也想借此多少增加他重新当选总统的机会，而这种可能性似乎已变得越来越小了。布什曾担任过两届得克萨斯州的众议员，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美国驻中国的使节。他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项任命，并且觉得自己在很短的任期内，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但他也同时感到，福特总统和他共和党的同事们，既没有看到他作出的牺牲，又不领他的情。吉米·卡特上台后，很多中央情报局的官员都认为，新的民主党政府应当让布什留任。布什本人这时也开始喜欢这项工作，他很不寻常地去向卡特毛遂自荐。尽管他的这一请求被小心翼翼地搁置在一旁，当时布什的助手德韦·克拉里奇仍然同意这位局长的看法，他应该设法留下来。克拉里奇告诉他的同事们，布什“熟悉业务很快”，是少有的几位局长，他“似乎掌握了这项工作，理解它的要求”。这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当时和这以后，许多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谍报官员都不同意克拉里奇的看法。当福特第一次提名布什去领导中央情报局时，他被看作是一个局外人，不过是利用情报局来谋取他个人和他的党的狭隘利益。布什在新英格兰一个非常拘谨的上层家庭里出生和长大（他的父亲普赖斯柯特·布什是来自廉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在耶鲁大学毕业时获得杰出学生的称号。当福特任命他的时候，他没有丝毫情报工作的经验，因为在他成年后的年代里，要么是在赚钱（他是得克萨斯州扎帕塔石油公司的创始人和老板）要么是在仕途上奔波。

在这两方面，他都相当成功，虽说他公司的销售收入比起他的有些同行来要少得多。在政坛上，他有时也得不到他所追求的东西。他虽也当上了众议员，但想当参议员的打算却没有成功。后来，在1974年，杰拉尔德·福特没有让他当副总统，在最后一分钟，选择了纳尔逊·洛克菲勒。在经历了这件令人失望的事以后，他接受了福特的建议，去当美国驻北京的代表。这项差事也颇令人泄气。当时，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牢牢地把对华政策掌握在自己手里，使驻北京的外交代表很少有灵活处理问题的余地。

布什仍然希望，终归有一天他能被考虑担任更高的职务。1976年，一个最好的机会来到了，当时福特总统可能还有一个机会提名他当副总统。作为前共和党主席，布什相信选择他是理所当然的。许多民主党人认为，1974年福特就该挑选他，这回也同意提名他。但是，福特却决定提名布什当中央情报局局长，并且私下告诉他。这是一项挑战性的工作，情报局很需要他这样有才能的人来领导。更为可能的原因是，福特是想由他自己来挑选他的竞选伙伴。福特的决定在国会引起了一些疑问，人们认为，这项任命是为了给共和党内的盟友一个机会，让他取得某些经验，以便今后寻求全国性的职位。而这正是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最不愿看到的。他们仍然害怕福特会要布什在1976年当副总统。因此，在批准布什任命的听证会上，民主党人要布什答应，在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期间，“不参与政治”，而且在下次选举中，不作福特的竞选伙伴。

最初，如果说福特不愿意布什当副总统的话，布什则更不愿意当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什非常清楚，批准他当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后，他近期内取得更高职位的机会是不会再有了。他接受在兰利的工作，主要是出于对党的忠诚，并且他也没有其它的地方好去。他深信，这不过是他未来一系列职务中的一个，他的事业会使他的工作岗位不断调动。由于他非常自信，并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他确信自己大出风头的一天肯定会到来。尽管如此，布什也曾表示，他本可能有朝一日成为椭圆形办公室的主人，现在却再一次被迫去破坏自己的这一机会，因此，他有些感到怨恨。他的这种态度最清楚地表现在他的自传中。在描写他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他流露出一种并非专门针对谁的埋怨心情：“1974年，我在福特挑选副总统候选人时输给了洛克菲勒。在这以后，有些人可以考虑让我作为堪萨斯城第二号位置的竞争者（该城是197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会议的会址），但如果我在未来的6个月里在中央情报局工作，我将不会有这种机会。当时中央情报局是一个有争议的工作单位，国会的两个委员会正在对它进行调查。”

布什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公众对中央情报局的信心，并且防止情报局的官员提出辞职，因为已经有些人在考虑这样做了。至于日常的具体工作，那还是次要的。布什很快发现，这些事最好还是留给专业情报人员去做。第一天上班，他出席了传统的局长工作汇报会。当他走进七楼的会议室时，屋子里坐满了人，他们不仅在情报工作上比他有经验，而且除了个别例外，年纪也都比他大。这时，他才有了点亲身感受，要取得这些高级谍报官员的信任是多么困难。在大的椭圆形桌子旁边，紧挨着他左边座位的是弗农·沃尔特斯中将，他是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也是美国军界和情报界的老前辈。沃尔特斯比布什大7岁，他是一位方脸的、说话直来直去的军人。他颇有派头的举止，主要是从事高级军事和外交活动35年所形成的，他曾在5位美国总统手下工作过，最早可追溯到艾森豪威尔。

在沃尔特斯左边，围着桌子坐的有中央情报局各大部门的领导人：约翰·布莱克，经验丰富的负责行政的副局长；卡尔·达卡特，负责科技工作的副局长；爱德华·普罗克特，负责情报工作、足智多谋的副局长；威廉·纳尔逊，新任行动部部长。这是情报局的四方诸侯，出席会议还有他们的主要副手，国家情报委员会的领导人 and 布什的主要助手。缘着屋子边坐的（没有在桌子前给他们安排座位）还有一些助理人员、速记员和来自情报局其它部门的主要官员。

沃尔特斯主持布什任期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他当然要保证做到，让新来的局长重温福特总统的指示，并以此作为开场白展开讨论。布什说，“中央情报局刚刚经历了一段困难的时期。但是总统对我们的能力有绝对的信心”。他补充说，他得依靠大家的帮助，完成好政府情报工作首脑的任务。

听他这番鼓舞士气的话，每个人都明白，为什么派他来当新局长。他的任命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结束。在过去若干年里，中央情报局备受各种丑闻的折磨。从今以后，他的前任威廉·科尔比时期的那种揭露情报局内幕的做法也该中止了。福特总统正在采取措施，去疏远他的政府与“旧的”中央情报局的关系，以便为1976年的选举作好准备。他选择了布什作为情报局局长，是为了使中央情报局尽量不引入注目。根据福特的看法，他自己、国会和选民们，越少听到中央情报局的事越好。布什和大家一样，很清楚福特的这一目标。除了福特每天例行的听取情报工作汇报，以及传统的国会听证会以外，布什注意尽量让中央情报局不要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在他当局长的一年里，中央情报局从全国报纸的头版上消失了。在亨利·基辛格牢牢掌握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情况下，中央情报局对白宫的影响显然更加少了。

在布什宣誓就职后的几调内，中央情报局内的士气明显有所提高。如果不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那就是因为这里工作的人现在看到，中央情报局终于不是众目睽睽的目标了。布什没有在情报界工作的经验，他来这里纯粹是一个政治上的任命，也注定是一位临时性的局长，但这些都无关紧要。中央情报局现在急切需要的是回到无声无息的状态中来。布什在这方面可以作些贡献。他是一位严肃而努力工作的局长，经常向人们作出各种保证，以增强中央情报局的自信心。

布什上任的第二天，他就给自己整个任期内的工作定了一个调子。清晨在白宫和福特总统会见后，布什再一次在七楼会议室里和情报局的高级谍报官员碰头。这次坐在他面前的这些人，更有兴趣听的是总统讲了些什么，以及布什是如何回答总统的，而不是任何别的题目。这位新局长没有使他们失望。他开始讲道，“早上我会见了总统，当他问我第一天的观感如何时，我告诉他，在我周围的那些人，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聪明能干的人”。这个头开得不错。人们对他的谈话反应良好，虽然沃尔特斯和其他人都完全明白，布什深信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争取大家的信任。

布什懂得福特总统要他做什么，他也做得蛮好。当国会议员要求他参加非正式的讨论时，他把中央情报局的高级情报官员都带上，让他们作汇报。这种做法过去很少有人采用。当参议院最后根据1974年的休斯-瑞安法案，建立了情报监督委员会的时候，布什也很注意，在有些他自己回答不了的问题上，让他的助手们回答。不止一次，当他的助手们讲话有较多的保留时，他指示他们作出更清楚的解释。这位有经验的政治家，用各种方式来给人一种开明和坦率的印象。布什当过众议员，他在国会显得很自在，这一点有别

于他的许多前往。他完全了解，和国会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可能在他离开局长的岗位后，仍然能继续下去。因此，他总是注意凡事不要过线，不要走得太远。布什还不断提醒参议院，按照法律，它主要的任务仅仅是按照复杂的审计程序，监督中央情报局的预算。虽然他和中央情报局都害怕，国会对情报局的监督将会扩大，但他们也知道，国会实际上没有多少实权，至少在它进行监督的早期更是如此。

布什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公开表现，丝毫不能说明他在这个情报机构内部，是否进行了有效的领导。使国会满意，并表现出一种开诚布公的态度是一回事，而取得中央情报局高级谍报人员的真正信任，却是另一回事。毫不奇怪，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认为，布什是一位能干并受人尊重的局长，这些人愿意公开讲出他们的看法，而持不同意见的人则不予置评。

老资格的官员安格斯·瑟默，当时中央情报局公共关系办公室的负责人，经常参加每天的会议。他同意那些赞赏布什的看法。他说，布什“能抓住问题，很快给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瑟默回忆布什时说，他是“你想认识的最好的人。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忠实的人，一旦和你交上了朋友，他将尽一切努力来帮助你。中央情报局的人很珍视这种态度，当时更是这样。”

对布什这个最早为石油商后来又成为政治家、情报官员的人，他的私人助理德韦·克拉里奇有一个详细而恰到好处的评价。在一次高层的中东情况汇报会之后，克拉里奇对他的一位下属说，他很高兴地知道布什“懂得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的差别”。正是这种专业知识，使克拉里奇和其他行动部的官员印象最为深刻。他们认为，布什常从各个角度来研讨一个问题，而过去很少有局长这样做过。”

布什是一个喜欢博览群书的人，他也善于吸收新思想。他对情报分析员谈到的任何新的或独特的事物，都喜欢问个没完，特别是关于穆斯林世界的事更是如此。这也不足为怪，因为布什的扎帕塔石油公司曾在六十年代中期得到一个合同，为科威特修建一个近海石油钻井平台，而且布什本人也能应付裕如地同阿拉伯商人打交道。一位布什的朋友简单明了地指出，“他对那一地区非常了解”。

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什的兴趣不限于中东地区。他身边的助手们发现，他对情报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作都有浓厚兴趣。他们在发展搜集情报的尖端技术方面，正在取得情报工作史上最了不起的进展。在高级情报官员的建议下，布什竭力争取大量增加情报局摄影侦察的预算，其中大部分款项将用来发展 KH—11 卫星。他强烈主张，中央情报局需要增加四亿美元的预算，用来发展“全天候”的轨道卫星，它能在黑夜里或在有云层的情况下拍摄数据化的照片。布什请求的项目中还包括高度机密的通讯信号工程，其中包括建设四个海外的地面站，专门截获外国通讯情报。据情报局的官员说，布什对高科技侦察工作的关心后来产生了巨大效益，使美国在若干国际危机中，明显地在情报工作中占了上风。

布什在中央情报局正式担任局长的 9 个月并非是没有争议的，尽管几乎普遍地认为他干得不错。虽然职业情报官员承认，布什对提高中央情报局的士气起了积极作用，但他们老是念念不忘“布什的出卖”。他们所谓的“出卖”是指损坏了中央情报局提供独立情报分析，特别是苏联核威胁的情报分析的名声。对布什的这个批评是人们所谓的“B 组事件”引起的，当时因情报局对苏联意图的估计比较保守，因而引起争论，而布什曾试图去引导这场

争论。（这些估计大体是根据苏联军事费用的“成本”计算出来的，这是中央情报局情报分析员所用的词汇）。1975年在科尔比的任期内，对苏联的这一估计已经完成了。那时总统外国情报咨询委员会负责人，退休的海军上将乔治·小安德森告诉白宫，这一估计低估了苏联的能量。福特总统害怕会发生公开争论。于是，他屈服于党内的压力，同意中央情报局不再是估计苏联威胁的唯一机构。福特指定了两个组来重新审查中央情报局的调查结果。A组由霍华德·斯托尔茨牵头，他是中央情报局主管苏联的情报官员；B组由理查德·派普斯牵头，他是哈佛大学一位保守的教授、苏联问题专家，经常批评中央情报局对苏联的估计。

科尔比认为需要建立两个组来研究这个问题，从而推动了这两项分开的研究工作。中央情报局情报部的人都嘲笑这一决定，他们不喜欢别人插手对苏联的能量进行估计。他们对白宫参与此事感到忿怒，认为这是有人想以他们的政治观点来影响情报研究的成果。他们抱怨的不是科尔比或福特怀疑中央情报局的估计，而是情报局局长和总统向明显的政治要求让步。

当布什当上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候，情报局的分析员们希望他能进行游说，以改变福特的决定，或者至少减弱这种争论的影响。这将是他能否顶住政治压力的一次考验。但在他宣誓就职后不几天，布什就明确表示他将不干预此事。他容许B组继续进行工作。他对一位助手说，“这不是我干下的事”。

布什的决定在中央情报局内引起了强烈的抗议。他们认为他和科尔比都屈服于保守派的威胁。布什的建议得到福特的同意，这更是加强他们的这一看法，因为他们认为，福特正在拼命增强他在保守派中的地位。（这些右翼人士一贯对中央情报局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认为它是反映美国东部权势集团思想的温床）对于这些抱怨，布什的解释是，他只是想在这一重大问题上，能听到另一种观点。他告诉他的主要助手，那些负责写中央情报局的估计的分析员，只要他们的意见正确，即使外单位有另一种不同意见，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前情报部主任雷·克莱因代表了中央情报局很多被此事激怒了的人们。他反问道，“为什么要找外面的专家。这件事是有意使人们对中央情报局的专业水平产生怀疑。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决定。”很多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认为B组的观点正被利用来支持有名的保守派的立场，克莱因正反映了这些人的看法。他说，“这是对原有制度的挑战，显然是带有政治色彩的，也是反知识分子的。”

布什竭尽全力安慰他在情报局内的批评者，但仍未能完全恢复他在宣誓就职前花了好几个月才培养起来的对他的信任 and 好感。在他宣布让亨利·“汉克”·克诺赫作为副局长接替即将退休的沃尔特斯中将以后，这项很不得人心的任命特别引起人们的抱怨，因为克诺赫在情报业务上是不行的，而在网球场上倒是一把好手。由于他的任命给中央情报局的高级情报官员泼了一瓢冷水，他以后就湮然无闻了。此人从未在行动部内担任过任何工作，情报局的科学家和分析员根本不认识他。他一直在搞行政，包括在六十年代早期曾担任过副局长帕特·卡特的执行助理。尽管克诺赫是一个工作努力、愿意学习、而且又颇有风度的人，他缺乏当行动计划官员或情报分析员的经验，使他无法成为一名胜任的副局长。他的声望如此之低，以致局长能派给高级助手的任务，都从来不会派给他。在被任命几周后，他就再也没有参与情报局的任何决策性的讨论。在布什辞职后不到4个月，他就永远离开了中央情报

局。

克诺赫的任命，也许是布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期内，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件事。虽然人们赞扬布什是一位很好的行政领导和聪明的政治家，但他对人过于老好。他任命克诺赫更多是出于和他的个人友谊，而不是因为克诺赫适合这项工作。他的好几位同事都承认，这种不恰当的忠于友谊，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他最令人不安的毛病。在他的整个事业中，他周围都是些忠于他的顾问，而他反过来也非常忠于他们，因为他们是他的朋友。他们并不一定愿意或者有能力向他提供好的意见。但这种友谊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他需要把自己与外人隔绝开来，而和自己的“知己朋友”在一起。这种习惯使他所在的中央情报局，以及后来的白宫，充满了一种既有点像大学、又有点像排他性俱乐部的气氛。

任命克诺赫虽然并不影响布什作为情报局局长的地位，但却使他和其他助手的关系也增加了一层个人色彩，同时也影响了他在一般工作人员中的声望。因为中央情报局的人过去都认为，量才提拔干部是为这个秘密工作机构服务的好处之一。

布什担任局长的短暂时期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不耐烦情报工作的那种很细很复杂的性质。即使情报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他也交给他的高级助手去处理，而他自己则集中去做国会的工作，以恢复它对情报局的信任。实际上，他在兰利的整个任期内，中央情报局的工作都由他的助手在处理。而他则集中处理政治问题，例如刚刚出现的诺列加丑闻，以及指定一个 B 组来单独对苏联进行评估等等。

如果布什最后没有成为美国总统，也许他作为局长的这段时期，会被认为是中央情报局最容易被人遗忘的几段历史之一。除了其他 3 位同样是影响很小的局长以外（悉尼·索尔斯、霍依特·范登伯格和詹姆斯·施莱辛格）在中央情报局 40 多年的历史中，布什工作的时间最短。在七十年代中期，很少有人称赞他的领导，或者他实行的新政策。在布什领导下的中央情报局，被认为是一个垂死的机构。这个机构的权威，过去由于威廉·科尔比揭露它的罪过而受到损害，而现在又由于布什没有能力给它开创一个新的前景，也几乎受到同样程度的损害。这不仅是因为中央情报局还没有从前一段时期丑闻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而且是由于布什自己也没有什么主意，不知道究竟中央情报局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他自己应该领着它往哪里走。再说，他也无法使中央情报局不受政治的影响。B 组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把布什担任情报局局长时的神秘色彩去掉，对正确了解他担任总统后和中央情报局的关系至关重要。布什的确在他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一直保持着和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联系，但说他深受这 354 天里在情报局工作的影响，又未免夸大其词，尽管有不少人这样说。布什在他一年的任期中，尽可能重振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的士气，但兰利所吹嘘的那种高昂热情，直到 5 年以后在威廉·凯西任职初期才完全恢复。

可能有人会问，对于布什后来政治上的雄心壮志，中央情报局抱什么态度。的确有一群抱团的前情报局官员支持布什在 1980 年和 1988 年两度竞选总统。在这两次竞选中，汉克都是突出的布什铁杆支持者。但是，对布什最了解的大部分中央情报局官员，在这位局长任职期间，要么还在情报局工作（因此不能参加政治活动），要么是决心不参与政界的事。因此，如果有人说是中央情报局抬他出来竞选总统，不管说的是两次中的哪一次，或者说，

中央情报局作为一个机构在幕后活动，设法保证让他当选总统，这种说法都是非常可笑的。恰恰相反，人们记忆中的布什是一个过渡性的局长，一个有才能的主管和政治家，他在情报局交了一些终生的朋友，在他的任期内既取得不少成功，也遭到不少失败。

正如布什在情报局的一位助手清醒回忆的那样，“布什在他的任期内，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争议。而那些真正有争议的决定是他自己作出的，记住这一点颇为重要。这些引起争议的事包括：指定B组对苏联的情况进行估计，决定对‘高歌军士’不进行起诉，任命克诺赫作为副局长”。

这三次争议中的头两次纯粹是政治性的，因为两者都对福特是否能连任总统有直接影响。第三次争议完全反映了布什喜欢把友情和才能混为一谈的倾向。所有他遭受到的这些挫折都不影响他进一步高升的计划。相反有些朋友把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经历作为他应该当总统的主要理由。布什本人也以这段经历自诩。他似乎在说，请看，我这位总统候选人是懂得情报的价值的。他一再反复讲这一点。1988年夏季，作为候选人的布什拒绝泄露他和中央情报局同曼努埃尔·诺列加的秘密关系，他还引用他就职时的宣誓作为他保持缄默的理由。他似乎是在说，他仍然是情报局的一份子，并且打心里讲，他并不是一位政治家，而是恰好参加了竞选的前中央情报局官员。

乔治·布什以压倒优势战胜了迈克尔·杜卡基斯，这件事正好同威廉·韦伯斯特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期间的第一桩丑闻发生在同一个时候。揭露出的丑闻在全国新闻界中反响很小，对布什在选民中的声望也影响极微。但兰利的人们却担心，新当选的总统，作为全国的统帅，可能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在兰利进行另一次整顿。

那次丑闻是布什在新罕布什尔州竞选的头几天开始露头的。当时中央情报局通过内部的一次审计发现，在用于支持柬埔寨非共产党抵抗力量的秘密经费中，至少有350万美元不知去向，很可能是被人吞掉了。虽然和其它秘密行动的费用相比，这笔钱数字并不大，但却占美国资助这些抵抗部队总数的四分之一。最初，主持这次例行审计工作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审计是衡量一项计划的有效性的标准做法）弄不清这笔钱的去向，也弄不清和什么人有关，因为这笔款项要经好几道手。经过了几周的调查才弄清，帮助情报局分发这笔款项的3名泰国军官是盗窃这笔钱的罪犯。

控告这几名泰国军官的罪证，也是对中央情报局行动部某些谍报官员的严厉指控，他们全都是柬埔寨工作组的骨干。这一工作组包括准军事行动的教官和地区情报分析员，他们的任务是监督资金的调拨，保证中央情报局的钱使用得当。当1982年计划刚开始执行时，东亚处有经验的行动计划官员就提出，要泰国官员也参加这项工作，这样，美国政府就有可能否认它参与了此事。他们还说，为了使这个计划得以实行，美国必须取得泰国军方的合作，因为泰国负责向非共产党的抵抗力量提供他们所急需的物资。工作组内的分析员最了解当地的情况，他们非常不赞成东亚处领导提出的这一办法。”他们争论说，泰国的高级军官很腐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是反对美国的。他们说，这些问题在泰国军方的最高层特别明显。泰国陆军总司令差猜·春哈旺为首的一群军官权势很大，他们并不总是把美国的最高利益放在心上。在这场辩论中注定获胜的还是东亚处的领导，因为正如他们所指出的那样，这样大规模的行动计划，不同当地的政府合作，不符合中央情报局的一贯做法。即使当地的政府官员很腐败，他们也在所不计。

1982—1988 年间，美国总共向柬埔寨的非共产党盟友提供了近一亿美元的秘密援助。在同一时期，美国国会正式批准通过泰国给柬埔寨的公开援助，也有 350 万美元。在那些年代里，这些行动计划从未引发过任何丑闻，更不要说像 1988 年初发现的那种公开盗窃的丑闻了。当中央情报局的审计官员报告说，有 350 万美元的美国资金在泰国莫名其妙地丢失了的时候，柬埔寨工作组的官员们都惊呆了。他们知道，如果这件盗窃案公开出来，整个计划就要完蛋，而这正是里根时期情报局最成功的项目之一。他们还害怕，一贯对中央情报局在使用经费的问题上很少说过什么好话的国会，将可能对这项行动计划丧失信心，而这项计划特别需要向他们报告情况，因为国会的民主党人一直很担心，不管中央情报局如何监督这项计划的执行，有些援助终归会落到红色高棉手里。

鉴于这些考虑，中央情报局的有关官员根本不敢把这个消息瞒着理查德·斯托尔茨，也不敢不给他一份审计报告的全文。在情报局内部，有关柬埔寨行动计划的争论很快又重新挑起来了。这次盗窃案使那些原来不赞成让泰国官员参与行动计划的情报局官员，更加理直气壮了，而工作组中的那些主张让泰国人参加这项计划的行动部官员则有些理屈词穷。那些情报分析员说，这次资金被盗至少说明，柬埔寨计划已失去了它继续存在的意义。他们认为，依靠每年区区的 1,200 万美元，不可能希望打败在金边的洪森政权，也不可能战胜红色高棉，这两支部队的武器装备都精良得多。

斯托尔茨制止了争论。首先，他向韦伯斯特作了汇报，并说明了它可能引起的后果。（一位韦伯斯特的助手回忆说，“这位法官马上脸色灰白”。）接着，斯托尔茨派了一个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联合审计小组去泰国进行全面调查。3 月下旬，他们发回一份报告，指出了 3 名高级泰国军官是侵吞这笔公款的主要嫌疑犯。

4 月间，斯托尔茨把这一案情告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维·博伦，并向他提供了一份情报局和国务院的联合审计报告。博伦马上召开了一次不公开的听证会来审议这一事件。这次会议被一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形容为“狄克·斯托尔茨参加过的最热闹的会议之一”。尽管这次盗窃资金的案情是一个坏消息，但斯托尔茨对国会坦诚相待的战略还是起作用的。他把一些重要的参议员请来参与清查这项计划，从而使这些人支持把这项计划继续下去。在斯托尔茨的建议下，情报委员会派出的自己的审计小组去审核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调查结果。这个小组在泰国将近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于 7 月 12 日向情报委员会作出报告，他们的调查结果与情报局的结论完全相符。韦伯斯特、斯托尔茨和柬埔寨工作组都参加了第二次的会议，对他们来说，情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也就意味着肯定了行动计划本身。博伦对这次处理特别满意，他赞扬韦伯斯特和斯托尔茨，说委员会的审计结果证明，在韦伯斯特领导下的中央情报局是可以信任的。但博伦的某些同事并不像他那样有把握。

在有 14 名成员的情报委员会里，有 5 名民主党人强烈主张，整个柬埔寨援助计划应该放弃。他们非常怀疑，企图推翻一个得到充分财力支持的中央政府，这样的行动计划是否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他们对中央情报局不能管好自己职权范围的事表示异常忿怒。有一位参议员问斯托尔茨，“就这次审计来说，你能否给我讲出一条站得住的理由，说明今后这类事不会再一次发生？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我们这种信心？”

按照他们心中的一笔账，中央情报局在这类重大使命上出毛病，这已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发生在它不应参与的问题上（伊朗门事件），第二次是它已在进行的一项计划，但由于它的无能又出了纰漏。斯托尔茨坚持说，对于泰国和支持美国这项计划的其它国家来说，继续进行这项计划涉及美国的信誉。他还说，尽管发生了盗窃资金的情况，这项计划还是成功地使柬埔寨的抵抗运动继续进行下去。斯托尔茨强调说，考虑到红色高棉日益强大的力量，以及苏联继续支持洪森政权，这一秘密计划是美国目前在东南亚能运用的少数手段之一。他还争辩说，要么支持这项计划，要么完全取消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作用和影响。尽管这5位民主党批评者在委员会内有相当大的影响，斯托尔茨最后还是成功地做成了一笔交易，使这项计划仍保存了下来。作为条件，他答应中央情报局将愿意在未来决策的问题上，更多地接受情报委员会的监督。他甚至保证委员会可以有一个调查小组，帮助对这笔钱的使用情况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督。这项计划似乎使那几位民主党人平息下来。它也使这个委员会的副主席，参议员威廉·科恩感到满意。他说，那几名被指控的泰国军官“应该把盗窃走的钱原数归还”，不管他们的职位多高。

斯托尔茨微微地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耐性地解释说，这项计划的成功，取决于与泰国军方的合作，正像也取决于要得到情报委员会的同意一样。他对参议员们说，“他们会了解我们的意思”。

在这次变幻无常的会议结束时，情报委员会的委员们都深信，这项计划应该继续下去。一共给中央情报局的柬埔寨计划拨了8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将用于购买制服、电台和其它“非致命的”有关军用物资。

到了7月中旬，中央情报局似乎又一次逃过了对它的声誉可能造成损害的窘境。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已批准了中央情报局的一项最重要的秘密计划，甚至投票继续对非共产党的抵抗力量提供财政支持，虽然数目不像柬埔寨工作组所希望的那样大。看来中央情报局也成功地使这桩丑闻不致公诸于众。

但这一表面上的成功只是短暂的。10月里，就在总统选举前一周，整个事件被整版地刊载在《华盛顿邮报》上，该报并把这笔款项如何在泰国被盗，以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如何决定削减这项经费的详情全都公布了。这篇《华盛顿邮报》的突出新闻报道，使柬埔寨工作组的官员大为恼火，接着又在整个政府内开展了一场紧张的追查，企图找出是谁把这件事给泄露出去的。

情况揭露出来以后，对泰国也产生了巨大影响。那里的军官把这种指控说成是杜卡基斯为了破坏布什的竞选而采取的行动。泰国军队最高统帅差猜将军——他是泰国近代军事史上最有权势、最令人害怕的官员之一——忿怒地否认他下面的官员与此事有任何牵连。这位将军让《曼谷邮报》印出了一个通栏大标题：“要么指名道姓，要么见鬼去吧”。在这个标题下面，刊登了他的谈话。其他的泰国官员也跟着差猜一起进行反驳，说对泰方的指责是“不负责任的”。参谋长顺通·功颂蓬对《纽约时报》说，“[这项计划中]不可能有贪污”。在最初的报道发表后不几天，在曼谷市中心，一群忿怒的群众抗议上述报道，并焚烧了《华盛顿邮报》主编本·布赖迪斯的模拟像。

猜差并不是由于《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而唯一感到不安的人。在资金被盗的这篇报道发表后，作为总统候选人的乔治·布什也有些担心，可能会有人提出问题，一年前情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允诺的改革是否已经上路。考虑到布什在挑选韦伯斯特作为凯西的继承人时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如果韦伯斯特和中央情报局给人的印象不好，布什给人的印象也不会好。柬埔寨计

划有流产的危险，这件事使布什竞选班子中的重要官员怀疑，在布什当选后，韦伯斯特是否应该继续留任局长。布什也同样担心，1982年，当这项情报局的重要计划还处于创始阶段时，他个人就给予支持，而最后这项计划有可能由于参议院拒绝拨款而中途夭折。布什认为，对柬埔寨的非共产党力量的秘密资助，是保持美国参与亚洲事务的一个手段，而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已经由于它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而严重削弱了。他也了解，中国同意美国的这一计划，以便向越南施加压力，并抵消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在白宫内，布什一贯是中央情报局柬埔寨计划首要的倡导者。1982年，他是威廉·凯西的主要同盟者之一，他们一起说服了里根总统，帮助他认识了这项计划的价值。在很多情况下，每当涉及中央情报局的这一计划，布什的个人声誉，以及他竞选总统的成功机会，都要受到影响。布什懂得，如果他成为总统，在他首先面临的问题当中，就有一个是否需要任命一位新的情报局局长的问题。

詹姆斯·格林利夫是一位个子高高的、有点秃头的颇为谦虚的人，他有一种让人感到很自在的本领。他是韦伯斯特氏局长期间的第二任公共关系办公室主任（接替已回到联邦调查局担任更高职务的威廉·贝克）。格林利夫是布什的一位公开崇拜者，他很喜欢谈论布什和韦伯斯特之间的良好关系，以及两人明显的相似之处。他说，“总统和法官的关系很密切。他俩很像兄弟俩。我还记得副总统曾邀请我们去肯纳邦克波特，那时法官还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他们做事时在一起，还在一起打网球和干什么别的事。他们相互很了解。”

格林利夫所说的“像兄弟俩”有些夸大，因为布什和韦伯斯特的关系，从未发展到彼此很随便的程度，而这才是真正友谊的标志。在布什当选前和当选以后，和总统真正最接近、最受信任的顾问，还应算他的老盟友詹姆斯·贝克。

布什热忱地需要一个由喜欢他的亲信组成的小圈子，这是他一个永恒的、也颇令人不安的特点，有时甚至有点离奇古怪。当威廉·韦伯斯特的妻子1984年死于癌症的时候，布什几乎是千方百计地安慰他，一再问他有什么需要布什为他做的事。布什也给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提了一点建议，“工作，工作，不停地工作，这是度过这类困难的最好办法。”

当韦伯斯特仍很忧伤的时候，布什把自己在肯纳邦克波特的家提供给他使用。这是一幢位于两个城镇间的房子。格林利夫回忆说，“布什基本上把全部钥匙都交给了他，并且坚持要他在那里呆上一星期。他在那里跑步，跑呀，跑呀，不停地跑。然后去打网球，钓鱼，接着又慢跑回来打网球。每天结束时，他已精疲力竭，就这样他把个人的悲哀都忘掉了。到一周末，我认为韦伯斯特已克服了情绪上的低沉。布什对他讲，‘回去吧，把这事抛在脑后。不断工作，你会好起来的。’”从那个困难时刻开始，韦伯斯特一直是个忠于布什的人。

韦伯斯特并非唯一接受布什这种友好表示的人。当得克萨斯州的金融家罗伯特·莫斯巴赫尔的第一位妻子在七十年代中期去世时，布什也对他提出了同样慷慨的帮助。布什亲自接待，让客人在那里打网球，松弛一下紧张的情绪，使他精神逐渐恢复正常。早些时候，当詹姆斯·贝克的第一位妻子去世时，布什也同样对待他。莫斯巴赫尔成为他的终身朋友，在布什总统任期内曾担任过他的商业部长，而贝克曾被任命为国务卿。除了韦伯斯特、莫斯巴赫尔和贝克以外，布什还有另两名忠于他的朋友，后来也成为他政府内的

重要成员：约翰·苏努努（他支持布什参加 1988 年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尽管当时布什看来要落选），罗伯特·盖茨（他在布什决定让韦伯斯特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后，很漂亮地退出了竞争）。对这些人来讲，他们每人欠布什的情，比布什欠他们的情还多些。在未来的四年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千方百计地设法报答他。

这些人在布什当选总统后，只有韦伯斯特在未来政府中的地位有些成问题。中央情报局的许多高级情报官员都颇有把握地感到，韦伯斯特的位置将被李洁明所取代。李洁明也是布什的老朋友，当时正在南朝鲜当大使。这位高个子、头发开始灰白、脾气有些急躁的人，原来是中央情报局很受尊重的行动部官员。布什担任局长时，他登上了他一生漫长事业中的顶峰，当上了中央情报局负责中国情报的官员。布什对李洁明在情报工作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非常尊重。李洁明孜孜不倦地追求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位，虽然他走的道路并不是有这种雄心壮志的情报局官员通常所走的路子。李洁明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亚洲问题专家，而这方面的专家通常不会提拔当局长，至少在目前这样的时代是如此，这一点早已由好几任的局长所证明。他们当中有政治家（布什）、海军上将（特纳）、竞选班子的负责人（凯西）和法官（韦伯斯特）。这些全都是情报界以外的人，但他们却当上了情报界的最高领导人。李洁明之所以想当局长，一方面是因为他同布什的交情，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有情报工作的经验。他和布什结交朋友，是在李洁明被派去担任北京情报站第一任站长的时候，当时布什是美国驻中国联络处负责人。在 1988 年的竞选即将结束时，布什开始考虑让李洁明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候选人。布什甚至曾对他的竞选班子负责人詹姆斯·贝克谈起过这种可能性。

布什当选几周后，在已当选但还未上任的总统的顾问中，正在酝酿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人选。提名中优先考虑的对象有：威廉·海兰，他是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季刊》主编；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他最后成为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科林·鲍威尔，他最终被任命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还有弗兰克·卡卢奇，里根总统的国防部长。奇怪的是，布什对韦伯斯特作为候选人的可能性闭口不提，虽然很显然，韦伯斯特是希望继续留在这一岗位上的。韦伯斯特曾对他的 3 名主要助手谈过他的这一愿望。大选后，他在不同场合对理查德·斯托尔茨、罗伯特·盖茨和情报部主任理查德·克尔都谈到过，他希望继续留在中央情报局工作。这几个人都对他说，他们支持他争取继续留任的努力。斯托尔茨特别敦促他的这位老同学，让他亲自对布什说，他希望保留这一职务。

韦伯斯特拒绝当面向布什谈这个问题。他私下对他的同事们说，他希望至少要摆出一副不要“公开毛遂自荐的架势”。他觉得采取这样一种低姿态，可以使自己更为布什所器重。

另一方面，在布什的顾问当中，特别是在詹姆斯·贝克心目中，不清楚究竟韦伯斯特是否希望继续留任。这种疑惑的结果是，韦伯斯特的名字在布什的亲信圈子中，逐渐被淡忘了。甚至韦伯斯特也告诉他的一位高级同僚说，他自己认为他留任的机会“很小甚至没有”。他抱怨说，他因此感到“沮丧和郁闷”，他在大选后，最多偶尔和布什有一点联系。布什在取得压倒优势的胜利后，韦伯斯特曾在电话中祝贺他，但他们的谈话避开了谁将担任中央情报局新局长的的问题。韦伯斯特对这件事感到无能为力，而斯托尔茨和克尔都因他的这种态度感到不安。韦伯斯特曾凄惨地对他们说，如果他得不到

重新任命，他将回圣路易他的老律师事务所去重操旧业，他私下对他们讲这话至少有五、六次之多。最后，在 11 月中旬，韦伯斯特这种不能为自己的留任想办法的态度，使斯托尔茨感到极为不安，以致在有一天早上开会的时候，他直截了当地向韦伯斯特提出了这一问题。

斯托尔茨对韦伯斯特说，如果他还想保留这一职位，他得明确他说出来，因为布什显然以为他对这工作并不感兴趣。斯托尔茨还对他说，如果他想离开兰利，他也应该把话说清楚，因为眼下在情报局里，传说纷纭，都在猜测谁来当新局长。韦伯斯特显然因斯托尔茨的警告而感到恼火。他承认他想继续当局长，但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说服争取工作。他说，这样做是“根本是和我的本性相抵触的。”

斯托尔茨认识到，他的老友并不是他所想像的那种政治家，尽管他在处理和国会关系的问题上表现得相当老练。斯托尔茨提出了几项建议。首先，韦伯斯特应该让总统知道，他想继续当中央情报局局长。然后，他应提出这个国家的情报界应由他牵头。但布什会要他答应一个条件，即他不要求参加白宫的外交政策班子。最后，韦伯斯特应重新对《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凯瑟琳·格拉厄姆发出邀请，让她给情报局新招募的人员开课，讲授在国家安全工作新闻媒介的作用。

斯托尔茨说，这将使他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韦伯斯特还是下不了决心。他重复说，他不想为争取这项职位而去进行游说。斯托尔茨高兴地说，“那好，你至少可以把这一点讲出来。”

韦伯斯特知道斯托尔茨说得对。现在他的重新任命成了问题，他必须作出一番努力来保住他的职位。韦伯斯特还同意，这种努力也包括讨好新闻界。第二天，韦伯斯特打电话给格拉厄姆夫人，重申请她来作演讲。她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并且在几天后来到了中央情报局总部。她受到热烈的接待。她的演讲非常成功，特别是在韦伯斯特眼里更是这样。

她给中央情报局新近招来的人所讲的内容，几乎和韦伯斯特自己的观点完全一致，表达了他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根深蒂固的保守观点。这家报纸的发行人对学习班的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肮脏而危险的世界里。有些事情一般公众不需要、也不应该知道。我相信，当政府能采取合法措施保护它的机密时，当报纸能决定它所了解的情况是否应发表时，民主就会繁荣。”

在格拉厄姆夫人离开兰利之后，韦伯斯特希望，他已在华盛顿的这个新闻机构获得了一名强有力的盟友，他还期待着《华盛顿邮报》能发表一个比较有利的报道。

为韦伯斯特留任进行的活动接着进入了高潮。在一次早晨的汇报会上，他向情报局的高级情报官员们宣布，他决定要留下来当局长，因为他相信，保持中央情报局作为一个独立机构的名声是重要的。在新总统就任前更换局长，将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给国会和美国人民。我们不希望使我们的工作带有政治色彩”。他接着指示他的公共关系办公室主任，要他在与新闻界的谈话中，宣传这一观点。11 月 16 日，一位记者被告知，韦伯斯特的名字之所以没有在最近讨论人选问题时出现，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进行这方面的活动。这位中央情报局的发言人说，“[韦伯斯特所希望的]是一次平稳的过渡，不要使情报局带上政治色彩，而是使它的工作不要间断”。《华盛顿邮报》11 月 18 日刊登了这篇谈话的报道，该报还同时刊载了一篇资料，介绍韦伯斯特担任情报局局长期间取得的成就。

对韦伯斯特来说，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机再好也不过了。接近布什的某些情报局退休官员尖锐地批评布什，说它对情报工作抱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说，韦伯斯特既不是那种大家原以为很快就会熟悉业务的人，也不是许多人所希望的那种积极进取的人。尽管他和国会的关系不错，韦伯斯特显然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布什应该指派一位中央情报局比较了解的人物，“一位情报界里的人”。一批布什的顾问，包括新委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苏努努在内，都同意这种看法。苏努努认为，布什应该指派他自己的人来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什还受到来自一批很抱团的外交事务专家的压力，这些人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结合在一起。斯考克罗夫特当时被考虑担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职务。

到11月底，在考虑了所有人选以后，布什倾向于让韦伯斯特留任情报局局长。布什倾向作出这一选择，主要是因为他的高级顾问詹姆斯·贝克，即他未来的国务卿，深信布什如果把他自己帮助任命的人又换掉，这将是一个错误。布什自己也希望看看，在一个积极进取的政府里，韦伯斯特领导情报局是否会更富有成效。布什认为，韦伯斯特在里根执政期间，没有多少机会来创建一番事业。应该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是否能胜任这项工作。布什告诉他的助手们，他希望就任后的头些天，在重要外交政策问题上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而要委派一位新的中央情报局局长，需要费很长时间才能使他真正就位，即使新任命的人像李洁明那样有经验也不例外。贝克非常同意这种看法。归根结蒂，韦伯斯特之所以能重新任命，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贝克。他在一次会上对布什说，中央情报局现在最不好的事是换局长，一切又得重新开始。目前中央情报局正值多事之秋，尽可能以安定为好。12月6日，布什正式宣布，任命韦伯斯特作为他这届政府的中央情报局局长。

这一决定显然使韦伯斯特感到高兴。在中央情报局40年的历史中，当前可能是最重要的时期，他将在这一时期里主持它的工作。原来的主要目标苏联正在很快瓦解，取代它的是一系列令人操心的其它问题。中央情报局将有时间来研究未来，而不至于应付一次又一次的危机。至少可以说，这是人们抱有的一种希望。但在12月21日，情报局通常非常平静的放假季节，又被当今破坏力最大的恐怖主义事件打乱了。

6. 魂断晴空

1988年12月21日的晚上，在乔治·布什还没有就任总统之前，苏格兰洛克比村漆黑的上空，突然被一团巨大的爆炸火光所划破。在冬夜发生的这场悲剧，使270名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丧生。布什总统又气又恼，并为此事操心长达3年之久。

对美国的反恐怖中心来说，此事肯定显得十分离奇，而对中央情报局近东处的官员们，又颇具讽刺意味，因为这件历史上最血腥的恐怖主义惨案，和本世纪一部争议很大的小说开头中描写的事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萨拉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一书的开头，完全可以作为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惨案的简要介绍。这次意外事件似乎证明，世界上最残暴的歹徒不仅政治上很狡滑，而且也喜欢使用奇特古怪的手段。他们的恐怖行为是一个信号，它表明中央情报局和中东某些恐怖主义组织十多年前开始进行的那场长期斗争，远远还没有结束。

在没有其它提示的情况下，萨拉曼·拉什迪给中央情报局发出了这场悲剧的第一个信号。“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就在接近新年的一个黎明前，两个真正活生生的成年人，从29,002英尺高处的万里晴空，坠入了英吉利海峡，没有带降落伞，也没有其它翼状滑翔设备。”

真是无独有偶。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于1988年12月21日傍晚，由伦敦的希思罗机场向东北方向飞往纽约。当飞机即将到达30,007英尺的高度时，隐藏在一个旅客手提包里的一枚炸弹爆炸了。这个提包放在机舱前部14L号的行李柜里。炸弹将机身穿破，把一块机身外壳向东部方向射出，马上使飞机无法操作。事后有几十个国家的数百名情报官员和执法官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炸弹造成的洞正好18英寸宽，12英寸高，和通常见到的这类洞口大小差不多。但这个洞口已足够在引爆后的几秒钟内，产生一条裂缝，使机身弯曲并把飞机的前部折断，从而使这架747飞机分为很清楚的两部分。两秒钟后，第二个裂缝又把机身分为五大块，它们急骤向洛克比村袭来，使这个苏格兰小镇的11个人惨遭飞来横祸。

现在参加调查的人都知道，当时从天空掉下的有数以千计的碎块，其中有金属、皮革、地毯碎片、人肉。这场大规模的灾难留下一大堆残骸，它的碎片散落的范围达数百英里，从洛克比村的西北方向一直延伸到北海。单单寻找飞机最重要部分的碎片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但乘务员舱倒还比较完整。在事故发生后整整两年内，人们一直在苏格兰的田野里，仔细搜寻任何可能的线索，以设法解开这次航班突然消失的奥秘。

在爆炸中许多东西都毁掉了，包括乘务员最后的话以及飞行员驾驶舱中的其它讲话录音。当这架747飞机的机长发觉爆炸时，他在高空发出的任何惊呼声都不会有人听见。几小时后，地勤人员重新检查这架喷气式飞机发回来的无线电信。这架747飞机在突然完全沉默前，唯一能听见的是一个短暂的刺耳声（一位参加调查的人解释说，“就像细纺纱机转动时发出的声音”。）虽然还没有人能肯定这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但这个短暂的声音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线索，因为其它飞机爆炸事件，在出事前也有同样的声音。或许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的被炸，是萨拉曼·拉什迪攻击穆罕默德所引起的；这种解释并不比其它解释差。书中的描写和这次空难的相似之处，令人感到毛骨悚然。萨拉曼·拉什迪写道：“飞机分裂成两半，像一只裂开的豆荚把它

的胚种吐了出来，也像一只蛋壳破裂后把它的内部奥秘全都暴露在外”。

当然也并非完全相同。不管是在事件发生后的几小时后，几天后，甚至几个月后，这个泛美 103 航班炸机事件，一直是世界上最令人不解的谜之一。它是一个如此庞大而复杂的疑团，以致过了一段时期以后，就连最有本事的调查人员，也分不清哪些是事实，哪些是人们的杜撰。在两年期间，关于这次炸机事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其说法之多，可能和飞机碎片的数目媲美。在苏格兰南部的一间大仓库里，经过人们千方百计的努力，已经把这架飞机的碎片重新拼凑起来，以还其本来的面目。有一种说法是，这枚炸弹是一名携带毒品前往底特律的人受别人蒙骗带上飞机的，另有一种说法是，一位飞机上的情报局官员的提包被人倒换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央情报局的某项诓骗行动在法兰克福出了纰漏。这些原来有很多人相信的说法，后来也被认为成问题了。最后，一种最简单、但最不令人满意的说法被人接受了，即泛美公司 103 航班的被炸是一次报复行为。

在事件发生后几小时内，中央情报局局长韦伯斯特下令该局的反恐怖中心开始调查这一炸机事件，并找出肇事者。韦伯斯特、斯托尔茨和他们的高级助手都知道，正像一位记者所说，从很多方面来说，泛美航空公司 103 航班空难事件将成为“一个样板”，“使情报局能够展示它最有希望的新成就”。它将以一种方式表明，中央情报局进入冷战后的世界，仍和早先一样健全有力，完全能够同联邦调查局和其它政府机构合作，来解决一桩国际犯罪案件。如果说，这次炸机事件是对反恐怖中心的第一次公开考验的话，那么它对情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行动部副主任理查德·斯托尔茨和行动部副主任助理托马斯·特威腾，同样也是一次考验。

韦伯斯特完全明白，他所领导的情报局能否解开泛美航空公司这场空难之谜，并将罪犯捉拿归案，很可能成为衡量他作为情报局局长的表现的依据。对这架飞机突然遭到致命的袭击，韦伯斯特感到十分恼火，正像 6 年前威廉·凯西在遇到一个类似的、但损失不像这样大的空难事件时一样。至少对一位情报局的官员来说，这次摧毁泛美航空公司 103 航班的爆炸事件，非常像是一个住在巴格达专门从事这类活动的人干的，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侯赛因·拉希德。

情报局负责全面调查此事的是弗雷德·特科，他是一位有 25 年经验的老手，为人稳重并常表现出较强的洞察力，他的这些优点都是出了名的。克拉里奇推荐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来领导反恐怖中心，也可以证实这一点。特科得到行动部的信任，不简单是因为他在行动部内是一个有名的人物，在 20 多年里，他还结交了情报局内某些最有权势的官员，他的好朋友托马斯·特威腾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过去经常追踪国际恐怖主义者，但他之所以为人们所知晓，更多地是由于他直言不讳地说出应该如何对待这批人。用凯西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射手”，他和某些情报局的职业特工人员一样，相信中央情报局应该对那些恐怖主义组织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但特科的同事们都同意，他和克拉里奇并不一样。他更善于对付官僚主义，衣著也不像克拉里奇那样华丽。他个人的特点是绝对严格保守机密，并且正像他的同事们所形容的，“生性就非常冷静”。

威廉·韦伯斯特之所以喜欢特科，是因为他在领导联邦调查局时，听到他自己的反恐怖活动官员对这位情报局的老手评价很高，并且说特科是他们遇到过的中央情报局最合作的官员。此外，特科曾支持凯西和克拉里奇建立

反恐怖中心的建议，这主要是因为过去他不得不和国务院、联邦航空局、联邦调查局、秘密特工组织和五角大楼协调行动，对这种做法他有些感到失望。当凯西和克拉里奇认定最好成立一个联合组织，以对付日益严重的反恐怖主义活动时，特科成为这一主张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和克拉里奇指定的接班人。韦伯斯特很尊重特科的看法，这使有些情报局的高级谍报官员感到奇怪，这主要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特科对韦伯斯特的任命，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不欢迎态度，他认为韦伯斯特与国会的关系太密切，不可能对情报局进行有效的领导。

特科能接触世界上有关恐怖主义活动最大的资料库，这在情报界被称为底西斯特资料库系统。根据这一资料库可以找出恐怖主义分子的所在地，还可以按其作案手段，查到其它有关资料。依靠这一资料库，可以查出一个组织的财政来源、已知的成员姓名，他们和其它组织的关系，曾经向什么谍报机构提供过情报，参与过什么类型的恐怖主义活动。一位反恐怖主义活动专家说，“我们可以得到 15 种类别的资料。凡是我們想知道的东西，它几乎都能提供”。底西斯特资料库系统的分类整理功能是绝无仅有的；甚至它设计者的名字也是中央情报局内最机密的材料。在泛美航空公司 103 航班被炸 48 小时内，底西斯特资料库已经解除了对原来的怀疑对象中百分之八十的人的嫌疑。

但是，底西斯特资料库却回答不了反恐怖中心最重要的问题：究竟是谁炸毁了这架飞机？这样做是为什么？紧接着这场空难以后，以及此后的两年中，没有人能真正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事发后 24 小时内，反恐怖中心的官员们就断定，这架泛美航空公司的 103 航班是被恐怖主义者的炸弹炸毁的。中央情报局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一看法。这架飞机的突然出事似乎排除了机械故障的可能，因为直到最后几秒钟前飞行中的一切都很正常。像任何优秀的高级谍报工作领导人，在这种急迫而又困难的情况下通常所做的那样，特科在反恐怖中心内建立起一个工作组，集中研究他的高级助手向他提供的有关这次空难的大量材料，每天都工作 12 至 15 小时。这个泛美航班空难工作组从事的是一项庞大的工程。特科把中央情报局内凡是对恐怖主义组织有所了解的人的力量都动员起来，其中包括行动部官员、炸弹专家和中东政治分析员。他同时通知马里兰州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通讯的官员，要求他们从截获的数以千万计的电讯中，仔细搜寻各种线索，以帮助弄清究竟谁是炸机的罪犯。

在中央情报局历史上，第一次特科被授权能接触反恐怖中心其它成员单位的情报资料，联邦调查局、联邦航空局和五角大楼的调查员都把自己的调查结果向他报告。在惨案发生后 48 小时内成立并开展活动的泛美航班空难工作组，已在开始追踪各种航线，注意旅客的提包，并采访有可能提供情况的所有人。情报局还立即给它在欧洲和中东的情报站发电报，要求他们指挥下的、熟悉这 20 几个恐怖主义组织活动规律的间谍提供资料，这些组织从专业技术和作案动机来说，最可能是制造这场灾难的嫌疑犯。这个反恐怖中心还同英国和西德的谍报官员建立了经常联系，并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一直保持这种联系。所有这一切准备工作都在 4 天内完成。这样，到了 12 月 26 日，反恐怖中心就准备听取来自出事地点的第一个主要报告。这时，在洛克比的调查人员已经断定，泛美 103 航班是被放在机身前部的一个货舱里的一枚炸弹炸毁的。在仔细检查了出事地点周围找到的几块金属碎片后，调查人员得出

了这一结论。它并未使任何人感到惊奇。

在炸弹如何被带上飞机的问题上，存在着许多未知因素，这就使泛美航班空难之谜更加复杂化了。任何人都可能无意识地把这颗炸弹带上了飞机，兴许那些在伦敦或法兰克福机场的数以百计的经手行李的人员当中，有人把这枚炸弹从泛美航班入口处送上了飞机。实际上涉及了两次航班，一次是从法兰克福出发的泛美 103 航班，装载着商人、学生、家属（有些是从中东地区来的），他们都飞往伦敦或纽约。这些从法兰克福登机的旅客又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可能无意识地把这枚炸弹带上了飞机。也可能装有这枚炸弹的提包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被人偷偷地运进了飞机的货舱，因为在希思罗机场有不少从法兰克福来的旅客下飞机，另有一批旅客上飞机。这个时刻里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的共有六个班机，都能与这架名叫“海女”的 747 飞机衔接。最后它离开伦敦时，装载的乘客来自四面八方，有来自伦敦和法兰克福的，也有来自贝鲁特、马尔他、塞浦路斯、斯堪的那维亚诸国和非洲的。

从调查一开始，特科就依靠几位曾和恐怖主义分子打过交道的谍报官员，依靠他们这种非常稀罕而有时能派用场的经验。其中的一位就是中央情报局老资格的专家文森特·坎尼斯特拉罗。他个子很大，说起话来轻声轻气，大约有 45 岁左右。他在中央情报局干过多种多样的工作，包括当过行动部的官员，对恐怖主义者和他们的活动很有研究。在八十年代中期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当时聪明能干的谍报人员都把反恐怖主义活动看成时髦玩意，并且都把克拉里奇当作这方面颇有影响的人物。

坎尼斯特拉罗从事谍报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执行任务，一直到 1984 年他被任命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情报工作。他在白宫内有一间办公室，在那里他和奥利弗·诺斯交上了朋友。1987 年 2 月，他成为国防部情报特别助理，并在泛美空难发生两个月前，被派到反恐怖中心，负责行动计划和情报分析工作。特科认为坎尼斯特拉罗是他手下最好的分析员。但此人在反恐怖中心和在中央情报局，并非大家都喜欢他。这是因为他抱有一种自由主义观点，认为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政策中发挥的作用应该是有限的。

坎尼斯特拉罗和中央情报局某些高级谍报官员的关系，特别是他同托马斯·特威腾的关系，曾因他在 1987 年初拒绝接受派他去“中东某个重要国家”任情报站站长而受到损害。一位情报局官员在谈论坎尼斯特拉罗的这一决定时说，“如果一个人想不断得到提升，他就不该拒绝接受这类任务。坎尼斯特拉罗不接受这项任务，说明他并没有兴趣在情报局呆下去”。坎尼斯特拉罗后来向情报局副局长罗伯特·盖茨提出，希望允许他到国防部当情报特别助理，这项调动他自己后来也承认，“可能对我个人发展前途并不很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对他要求调动都不以为然，认为这表明他更愿意和军官们在一起，而不愿意和他现在的同事在一起。他在五角大楼工作了 18 个月，当特科决定需要坎尼斯特拉罗来主持反恐怖中心的情报部门时，他离开了五角大楼。

反恐怖中心对泛美空难的调查，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联邦航空局的爆破专家沃尔特·科尔斯加尔德。他是一位不愿引人注目的、骨瘦如柴的炸弹侦探专家。他还获得了无畏的行动计划官员的美誉。这是很了不起的恭维话。因为行动部的官员，特别是那些曾和特科一起工作过的人，不愿意相信在中央情报局以外的任何人是真正无畏的，科尔斯加尔德是唯一的例外。在科尔

斯加尔德的一生事业中，他遵照政府官僚的通常做法：尽量不抛头露面，不参与是非之争。他最不愿意由于他的言行引起一场争议，从而使自己成名。简而言之，科尔斯加尔德是美国政府最高级的反恐怖主义活动专家，善于排除恐怖主义分子安置的炸弹。他的有些工作成果几乎带有传奇色彩。

例如，1984年1月，科尔斯加尔德被派往巴基斯坦的卡拉奇，他在那里帮助法国人分析了一枚炸弹，这种炸弹曾在飞往沙特阿拉伯的德哈兰（Dhahran）的一架747大型喷气式客机上炸了个洞。一位同事说：“既然法国人从没来请过他，这就很奇怪了。但科尔斯加尔德干得棒极了。”在完成了初步调查后，科尔斯加尔德中途去了希腊的雅典，以便取回他被告之在那儿等着他去拿的炸弹。这是从那巴勒斯坦人的女情人的寓所里没收来的谢拉炸弹。记忆力通常极佳的科尔斯加尔德说他记不起那件事的任何细节了。当受到敦促时，他回答说：“哦，是的，我的确在雅典，我取了一枚炸弹，但我记不得它是什么炸弹了。真的，我记不得了。”他天真无邪地笑着。他说：“你要明白，有那么多的炸弹，我不在乎谁制造了它们；我只是想研究它们。”

在另一次国外旅行期间，当科尔斯加尔德得到从华盛顿来的指示时，他正在从巴基斯坦把炸弹带回家的途中。该指示让他中途在伊斯坦布尔停一停，在那里运气好的话，他也许能得到被土耳其情报机关没收的炸弹。这枚炸弹曾放在飞往罗马的意大利航空公司的一架早班飞机上，但没有爆炸。科尔斯加尔德交了好运。凑巧一位朝鲜战争期间和他一起在一支联合国部队中服役的老朋友是土耳其职业情报人员，得以接近意大利航空公司的设备。他们两人先出去在伊斯坦布尔一家咖啡馆慢斟细饮了一番，重温了昔日光阴。那位土耳其官员提醒科尔斯加尔德时，他才想起他是来干什么的。他说：“喂喂，你要的是什么东西？”科尔斯加尔德无所谓地笑了笑。他回答说：“炸弹。我要你让我看看炸弹。”科尔斯加尔德的土耳其朋友让他查看了炸弹，画了一张炸弹的图。但当这位美国人问他是否可以把它带走时，那位工作人员摇着手指笑着对他说：“哦，不行。我确实认为这不行。”

科尔斯加尔德收起了他的图和巴基斯坦炸弹，试着找到一条回家的路。这不容易。以前的一个同事回忆说：“沃尔特有极佳的时机把那巴基斯坦炸弹弄出那儿。我们以为我们会不得不派一架联邦航空局专用的喷气式飞机去运回它——这种专用飞机非常昂贵。但科尔斯加尔德在最后时刻来了，他说他将搭乘C-141飞离伊斯坦布尔，进入多佛尔空军基地。于是他走到乘务员那儿去，告诉了他们他是谁，他们说：“嗯，如果你打算带着它坐飞机，那我猜想我们也可以办得到。欢迎你和你的炸弹乘坐这架飞机。”所以我们在多佛尔见到了他。他通常能从任何政府得到任何炸弹。然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会一而再地研究它。炸弹是如何制造的会告诉你相当多的东西。

另有好几次，科尔斯加尔德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解决了运输问题：他压根不告诉航空公司安全工作人员他正把炸弹放在他们的机上运走。他以前的同事解释说：“它一定会把它搬上去而且带回来。他想，‘嗯，这没有什么了不起。’”

泛美103班机空难刚发生后，科尔斯加尔德就被急匆匆地派往洛克比。爆炸后的第二天早晨，科尔斯加尔德就站在泥地里和英国的调查人员交谈。他们中一人问到：“我们在找什么？”

科尔斯加尔德四处找了一阵，发现了一块零落的金属片。他拾起它，把它弯了回去，又以90度的直角转动他的身体。他说：“这就是我们在找的东西。”

西，但它被烧坏了，像是有人尽力焊接过它。”

第二天，一个苏格兰的调查人员来到了科尔斯加尔德在洛克比的临时办公室，放了一根金属条在桌上。这根金属条有3英尺长，但只有1英寸宽。科尔斯加尔德认出它是747班机左前方金属架上的银器。它被折弯，那正是他说它会被折弯的地方，它被烧焦了。爆炸使那金属条向外扯裂，冲击波的热量几乎使它突然折断。除非在33000英尺高处寒冷稀薄的空气把那爆裂的金属片凝固在外面的一个奇特的角度处，它通常会被突然折断。科尔斯加尔德点着头说：“对啦，炸弹炸毁了这架飞机。”

特科、坎尼斯特拉罗和科尔斯加尔德在解决泛美班机空难之谜中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他们也得到了其他许多能干官员的帮助。搜集关于可疑的恐怖主义组织的材料的绝大部分工作是由反恐怖中心的工作人员干的。在苏格兰的实地调查工作是由科尔斯加尔德和一帮英国刑事侦破专家干的。这帮专家不辞辛劳地按原样拼凑了飞机，逐渐辨清了它的秘密。其他调查是由遍布中东和亚洲的情报汇集站中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全球网络进行的。在突尼斯，中央情报局派了它的一名主要官员去请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合作（那次聚会是在巴解组织情报主任阿布·伊亚德房中举行的）。远在曼谷的一个中央情报局官员接触了泰国安全机构的内部材料，以确定他们所得到的关于炸弹的威胁是否与洛克比事件有关。

从调查一开始，中央情报局的高级情报官员就相信揭开泛美班机空难之谜或许全在于世界的一个部分——中东，在那里该机构却最难找到它最难达成一致的问题的答案。例如，中央情报局的伊朗办事处设在德国的法兰克福。考虑到泛美103班机空难的来由，这多少是件幸事，但这个办事处离德黑兰实在太远了，难以搜集到能把伊斯兰教革命政府同爆炸事件联系起来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的人提供的情报资源是没有用的，它也没有搜集关于伊朗政府内部政治策略的情报的能力。在大马士革也如此，中央情报局在那里有名无实。该机构的工作人员处在叙利亚人的持续监视之下。这些叙利亚人是由哈菲兹·阿萨德总统专为这一目的而布置的。在约旦，中央情报局靠当地情报机关提供信息，当地情报机关与巴勒斯坦人社区的广泛接触（一个前反恐怖中心官员说：“说到巴勒斯坦人，没有人比约旦人更好。”）可以提供可贵的信息，不过中央情报局好不容易才与约旦情报官员建立起泛泛之交。

更糟的是，中央情报局在黎巴嫩的最高外勤官员再也见不着他们了。他们本可望提供关于泛美班机爆炸和住在贝鲁特和贝卡河谷的恐怖主义组织间可能的联系的最好情报。对中央情报局来说，他们的离去是泛美103班机事件的雪上加霜的、难以弥补的悲剧：中央情报局第一流的阿拉伯专家之一，或许是它最有前途的年轻中东官员，34岁的马修·甘农，和一个名叫查尔斯·麦基的年轻未婚少校军人一起，死在了那趟班机上。查尔斯·麦基是被五角大楼派到黎巴嫩去帮助重建那为战火所毁的国家军队的。

甘农和麦基彼此熟识。他们21日乘坐经由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亚飞往伦敦的同一架飞机飞离贝鲁特。该日稍晚，在等飞机去纽约时，他们和国务院的两名安全官员丹尼尔·奥康纳尔与罗纳德·拉里维埃在希思罗机场的泛美头等俱乐部休息室共饮了一番。这4个人是被国务院的外交官伯恩特·卡尔松招在一起的。伯恩特·卡尔松在成功地完成了解决纳米比亚争端的谈判使命后归来。他们全都处在节日气氛中。休息室的一位女招待员说：“他们为

回家而感到开心。”

放炸弹的人是否认出了甘农和麦基并把目标对准他们，以及他们在贝鲁特的使命是否泄露，这成了要弄清楚的问题。因此，这两个美国人之死为反恐怖中心的调查工作更增加了麻烦。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需要也更加重了反恐怖中心的工作。文斯·坎尼斯特拉罗说：“由于马修之死，有一种伤逝的悲剧感，我们也因此而干得特别卖劲。我想那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对工作单位、对所有那些离开了我们的人负有的义务。这件事对家庭的打击超过了我能记得的任何其他事情。它肯定有影响。”

甘农的离去不只显示一个有前途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之死；它对中央情报局保护它自己的成员的能力提出了疑问。当所有那些在秘密机构中做事的人都认识到他们的生命时常处在危险中时，甘农之死留下了远远超过那件简单的事情本身的持久印象。他出自中央情报局最有名的家庭之一，他的妻子是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他的岳父托马斯·特威腾是行动部副主任助理。

爆炸事件发生两天之后，国务院女发言人菲莉斯·奥克利确认在泛美 103 班机上有 3 位“国务院职员”：罗纳德·A·拉里维埃，“自 6 月起作为安全官员被派往贝鲁特”；丹尼尔·E·奥康纳尔，“4 月份作为安全官员被派往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亚”；还有“加利福尼亚奥伦那的马修·K·甘农，被派往国务院中东办事处，作为政治官员在贝鲁特任职后正在回家的路上。”

甘农确实确实是中央情报局为培养阿拉伯研究专家新招收的第二批学员，在 1977 级毕业中央情报局化了不少时间培养这批毕业生。他很快就被上级官员确认为行动部最壮健和最有才能的官员之一。

在被派到贝鲁特之前，甘农供职于约旦、叙利亚和北也门的工作站。他在北非的周内行家中也成了一个名声卓著的人物。在兰利，他的专业技能终于也使他受到了注意和尊重，特别是因为他家常便饭似地自愿参加危险的国外行动。

到 1985 年，在反对欧洲的阿布·尼达尔组织的兰利秘密战中，他成了关键人物。在这一事关重大的反恐怖主义进攻行动中他所扮演的确切角色是严格保密的。

正是由于甘农独一无二的经验见识，中央情报局官员从一开始就推想，泛美 103 班机之所以被炸，是因为他在飞机上，而且很可能从事爆炸的人就是以欧洲为活动基地的阿布·尼达尔活动分子。坚持主张甘农会成为靶子的理由在于：尽管中央情报局竭尽全力为他的身份保密，他在贝鲁特仍作为“中央情报局的人”而广为人知。在贝鲁特，大概是为了防止绑架者劫持（这是在仅 5 年之前威廉·巴克利身上发生过的事），戒备森严的机关安全人员护卫着他。他还卷进了跟踪被扣留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的漩涡中。与安置在该城市的其他国家的情报工作人员接触给他带来极大的压力。

在泛美班机爆炸后数日内报上发表的文章说，中央情报局贝鲁特工作站的头头也在那架飞机上。这些说法是不准确的。甘农的工作远比这更重要。在 5 年多时间中他去过黎巴嫩不只 6 次，多是为了搜寻关于美国人质被扣留的地点的材料。同时，作为一名反恐怖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从事过谍报活动，帮助确认恐怖主义者戳穿他们的计划。

在甘农死后的几周内，许多中央情报局官员抱怨说他本无需死在泛美 103 班机上，因为该局并未着意为他作为一个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身份守密。近东处官员的抱怨特别普遍，他们在国外的使命被认为特别使人犯愁。一位

退休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说：“5年多时间中在黎巴嫩临时指派的6项任务实在让人吃不消。他们不应把马修送回那儿，那实在太危险了。”

这正是托马斯·特威腾、弗雷德·特科和其他中央情报局高级人士以前听到过的抱怨。当贝鲁特站的头头威廉·巴克利被劫持和折磨时，该情报机构中他最亲近的同事为他的获释发动了一场强有力的内部运动。可是，由于中央情报局似乎不能有效地寻找他的下落，他们时常受挫。由于官僚间为谁应对给巴克利下达去贝鲁特进行虚张声势、大事张扬的任务负责而暗相争斗，这个问题就更难了。给巴克利在贝鲁特下达的任务包括笼络该市民兵首领的危险职责。尽管前军官、准军事专家和越南退伍军人对经管情报站都几乎没有经验，威廉·凯西还是派巴克利去贝鲁特工作，这样一来，责备就应公正地加到他身上。可是，由于特威腾与特科对营救巴克利的“傲慢态度”和他们在他被绑架后对国内发生的争吵的不当处理，他们受到了巴克利许许多多同事的责备。甚至有人暗示说，巴克利之死是由他在局里树敌太多造成的，至少部分是如此。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合同雇员说：“巴克利不受喜欢，他一点也不受喜欢。”

对在巴克利这件事上的重大失败，一个更要命的说法是由一个前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讲出来的，他深知中央情报局的争斗底细。这位见证人坚持认为中央情报局的官僚因甘农和巴克利之死应受指责。他争辩说，如果中央情报局更多地派遣受过训练的官员到中东执行任务，它在世界上这个地方也就不会如此势单力薄，甘农也就不会如此经常地被派到那儿去。他说，如果中央情报局不能补充大量有能力的工作人员，它的基本的谍报使命还会失败，其职业雇员还会陷入危境。因为没有别的人可派了，中央情报局最后只得派甘农去贝鲁特。

甘农的情况与巴克利的悲剧的一个重要不同在于：中央情报局官员坚信，为找到杀害甘农的人他们局会不惜一切代价。既然巴克利是一个准军事人员，一个指关节有毛病的新闻记者，中央情报局就会漫不经心，但甘农是正宗的行动部官员。在1988年，甘农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就已赢得了诚实可亲的名声。毋庸置疑他将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情报官员。

尽管威廉·巴克利和马修·甘农的年龄和经历有明显不同，但他们有几点是共同的。他们最重要的共同处在于两人都是中央情报局秘密的和极端危险的行动的牺牲品。中央情报局的这些行动从不公开。两人都是在初出道时受到低估的有能力的工作人员，两人都是热爱政府工作的爱国主义者，两人都被慢慢地卷入了中东的政治漩涡中，当预想不到的事情介入他们的生活时，他们都丢了命。

巴克利留下来的东西基本上是在他在朝鲜、越南和长时间的黎巴嫩内战中显示出的勇气。较之巴克利、甘农更为理智。甘农在兰利的名声基于他坚实的学识基础（他毕业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过国际关系与阿拉伯语学位）。两人都是引人注意的人，都是美国在这个地区执行外交政策的公认的工具，这个地区的人民仍记得欧洲人占领的屈辱。这个地区的一位领导人，卡扎菲，被认为是美国最深恶痛绝的阿拉伯敌人。

甘农死的时候，中央情报局几乎从事了15年不曾宣布但无休无止的反对卡扎菲的战争。这是搞掉一个北非领导人的努力的一部分，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把这位领导人描绘成“一个国际恐怖主义者”。通过代理人、特务、国家代表、从正在崩溃的利比亚反对派运动残余发展起来的军队，以

及在 1986 年进行的实际的军事干涉，从七十年代后期以来，美国一直在努力抵销他的影响。在里根年代，这些努力大大加强了，这段时间中央情报局确立了大量目标在于煽起暴力颠覆他的政权的方案。

在八十年代早期，为了在利比亚人流亡组织中增加对这位北非领导人的压力，近东处建立了与利比亚全国拯救阵线的联系。近东处强化了由利比亚人流亡领袖阿里·阿卜扎阿库克牵头的利比亚全国拯救阵线，不久就把它从一个无力而令人担心的流亡者组织，改造成了卡扎菲政权最热诚的反对者中有国际联系的资金雄厚的组织。1981 年，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策划了一个特别计划，代号为“早期召集行动”，想通过假装一次亲利比亚分子要接管苏丹政府的行动而诱使卡扎菲进攻苏丹。卡扎菲揭露了这一计划，但没给美国带来多大难堪。

1984 年 5 月，中央情报局扶持了一场遭到血腥镇压的由利比亚军官进行的政变。卡扎菲处死了 75 个以上参与阴谋者。到 1984 年底，里根政府的高级官员逐渐被搞掉卡扎菲的问题缠住了，由利比亚工作组的头头文森·坎尼斯特拉罗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唐纳德·福蒂埃牵头的高级情报工作小组起草了一份文件，提出了对付卡扎菲的双面策略，包括把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持不同政见的利比亚人武装起来。由于 1985 年 7 月情报局副局长罗伯特·盖茨执笔的文件的发表，这一计划很快得到贯彻。盖茨建议美国支持埃及入侵利比亚，那将“重绘北非地图”。

盖茨的方案，“玫瑰花行动”，得到了国家安全顾问约翰·波因得克斯特的支持，但国务卿舒尔茨使它夭折了，他厌惧参半地看了这一建议。实际上最应为断送这一计划负责的人是穆巴拉克总统，他不信美国能守住这一方案的秘密。他的看法是有先见之明的；年底，在反对这一方案的国会领袖写信给里根总统说他们打算阻止它后，《华盛顿邮报》公开了该计划的详细情况。在盖茨反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主意被放弃后，美国和法国情报机构继续合作执行了另一项动摇卡扎菲政权的计划，这是靠在外交上分化卡扎菲与他的北非邻居来进行的。这项行动较之盖茨提议的行动远不广泛，但中央情报局的许多官员认为它有不错的成功机会。

这一中央情报局的最新行动方案，打算通过在乍得制造军事威胁来推翻利比亚政府，在乍得，亲美国的希森·哈布雷总统自 1979 年起一直忙于与卡扎菲的激烈的边界争端。这场战斗在一个已为灾荒所毁的国家造成了数以千计的饥饿的难民。尽管有法国人使卡扎菲和哈布雷之间达成了和解，利比亚部队仍继续在暗中与哈布雷政府作对。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的中央情报局高级顾问和充任哈布雷主要保护者的人常常是威廉·巴克利。在训练哈布雷的军事顾问和一支精锐的防暴部队时，他让他的军事经验派上了好下场。到八十年代中期，当巴克利被调离乍得时，掌握乍得的哈布雷的军队是强大的。中央情报局相信它会永远强大。

美国与利比亚的关系在经历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间后，卡扎菲莫名其妙地命令他在利比亚的港口城市锡尔特的高射炮部队对在锡德拉湾巡逻的美国飞机开火。1986 年 3 月的这次军事行动是为了验证他所称的“死亡线”而进行的公开挑衅。数小时之内美国航空母舰上的喷气式飞机通过破坏卡扎菲的雷达网和对利比亚的巡逻艇开火作了报复。这场实力不均的较量结束之后，卡扎菲指示他的恐怖主义网攻击在欧洲的美国目标。4 月 2 号，当环球航空公司 840 机在雅典降落时，它被炸了，有 4 位乘客被炸死，他们全都是美国

人。4月5号，一枚炸弹在西柏林的拉贝勒夜总会爆炸，一个美国士兵身亡。

中央情报局确认环球航空公司840班机和拉贝勒夜总会被炸都是卡扎菲指使的“5·15行动小组”干的。这位利比亚独裁者和“5·15行动小组”与这两次爆炸有牵联的证据是强有力的。5月15日，美国作了还击，从英格兰派了一个中队的战斗轰炸机到利比亚去袭击卡扎菲的私人寓所和贾马哈里亚兵营。有的炸弹完全没有击中目标，落到了旁边的住宅区。利比亚报道说有37人身亡；卡扎菲奇迹般地从这一秘密暗杀行动中活了出来，尽管有谣言散布说他15个月的养女死于这次攻击。

对的黎波里的轰炸标志着美国开始暂时终止公然推翻这位利比亚人的政权的活动了。但反卡扎菲行动并未搁置。例如，罗伯特·盖茨仍然企图实施一个用美国支持的利比亚人流亡组织去对付卡扎菲的方案，在泛美103班机被炸前一个月，中央情报局取得了盖茨方案的总统授权。该方案的目的是培训一支由乍得所俘的利比亚士兵组成的军队。乍得总统哈布雷仍得到美国的保护。中央情报局的这一方案也是煽动反卡扎菲政变所作的最彻底努力。

中央情报局的秘密部队是从大群在八十年代早期与乍得进行的4年边境之战中被俘虏的利比亚人中招募的。这些利比亚俘虏拒绝返回他们的故国；相反，为了换取自由，他们同意在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武装力量中战斗。这支流亡的利比亚军队变成了以美国为后台的利比亚全国拯救阵线的军事武装，该阵线派了抵抗领导人去教育受了他们以前的指挥者伤害的士兵。几十名中央情报局军事培训辅助人员与几十名近东事务工作人员，还有一条从五角大楼通到恩贾梅纳郊外受风吹的营地的后勤通讯线，都投入了这一计划。几百名利比亚士兵加入了中央情报局武装。

中央情报局这项吃掉卡扎菲的方案是其历史上牵涉面最广的方案之一。然而，奇怪的是，很少有参与这一行动的官员相信卡扎菲会对如此公然威胁他的统治的行为作出反应。反对卡扎菲是因为他把美国人和基于美国的重要空中航线作为靶子。因此，在1988年，这位利比亚独裁者有手段、企图和机会毁掉美国747飞机的事实就被忽略了。绝大多数反恐怖中心分析家相信，卡扎菲太害怕美国人的报复了；以至不会考虑发起这样一场攻击。前利比亚工作组组长文斯·坎尼斯特拉罗是唯一的例外。在1988年返回美国后，坎尼斯特拉罗是如此怀疑中央情报局反卡扎菲的方案会产生效果，以至他对这样明目张胆的动用美国力量发出了警告，他暗示这一偷偷摸摸的行动使人回想起中央情报局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努力。他确信，卡扎菲会回击。在一篇保密的专题文章中他警告说：“美国人积极参与由利比亚抵抗组织进行的反卡扎菲行动，会招至对针对利比亚资助的、目标对准美国公民和官员的恐怖主义行动的最后约束的解除。”

1988年12月，这些约束放松了。

甘农之死使中央情报局笼罩上了悲哀气氛。现在明显是理查德·斯托尔茨的接班人的托马斯·特威腾心碎了。一位同事说：“马修之死夺走了他大量的东西。”甘农的妻子也是一样，她突然成了两个小孩唯一的亲人。可悲的是，反恐怖中心的调查人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甘农不该在泛美103班机上；由于急于回家过圣诞假日，他临时改了预定的后一班机票。这一事实几乎没有减轻他是恐怖分子要炸的目标的推测。1988年春末，反恐怖中心官员特别害怕甘农会被贝鲁特的恐怖分子认出，当时他正帮助监督一项有希望的人质释放活动，这涉及到美国人罗伯特·波尔希，中央情报局相信他是与其

他贝鲁特郊区的美国人质分开关押的。该消息得自一个与捉拿波尔希的入之一有关系的美国大使馆卫兵。这个卫兵也是伊马德·穆格尼亚赫的极端主义伊斯兰圣战组织前成员。穆格尼亚赫忙于用人质去换取他内兄的获释。他内兄是什叶派激进主义者组织达阿瓦 17 的成员，因 1983 年在科威特制造了 6 次恐怖主义爆炸事件而被监禁。

在直到那时为止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收到的关于美国人质的所有情报中，这位大使馆卫兵提供的关于波尔希的消息看来在最有指望的消息之列。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消息来源，波尔希正被关在贝鲁特南部一个郊区，该地有立即被正在推进的叙利亚军事部队占领的危险。看守人质的卫兵头目正担心叙利亚人会获得对波尔希的控制，所以他认为最好尽快地把美国人质处理掉。登记日期为 1988 年 5 月 17 日的一份从贝鲁特的美国大使馆发往国务院的秘密海底电报报告说，美国方面建议用“50 万—60 万美元”去换回波尔希。这一提议立即就被国务院否决了。通过国务院秘密的罗杰线路送达的海底电报注明：“地区安全官员指出美国政府不会同意为任何人质支付赎金，但如果能有效地营救人质，美国政府会表示感谢。”这份海底电报也通知华盛顿，地区安全官员派人去请求看守人质的人应提供波尔希的相片以表明该组织的“诚意”，贝鲁特的一家报纸有该照的复印件。这份海底电报的抄本送到了中央情报局的反恐怖中心。

这一援救波尔希的提议从未执行。可是，从关于这件事的海底电报提供的详情看，对那些他们声称是扣留波尔希的人，以及所称波尔希被扣在贝鲁特南郊的某个地方，美国官员明显是满意的。甘农和其他美国官员曾尽力去弄清有关波尔希的消息的确实性。在这之后，他们终于能够确定波尔希被扣留的确切位置了。但就像以前所有人质事件中的情况一样，无论是甘农还是他的同事都没有提议或得到批准发动一次营救行动。他们断定这样作会使其他人质的生命遭到巨大的危险。结果波尔希事件被搪塞过去了，就像是又一次为扣留人质的人获取“赎金”的行动一样。正如美国在黎巴嫩的临时代办作出的结论那样，“在我看来，‘营救钱，等于‘赎金’，50 万美元不是‘活动费’。”在接踵而来的伊朗门丑闻中，这个判断看来是正确的。

马修·甘农在泛美 103 班机爆炸事件中罹难，并没有使美国停止努力寻找美国人质在贝鲁特被扣留的位置。他的同事查尔斯·麦基少校之死也没有使国防情报局放弃在黎巴嫩的行动方案。该方案被用来帮助被打垮了的中央政府重建它分崩离析的部队。由于麦基也是国防情报局在这一地区安置的最有经验的军事情报官员，他的消失使人感受强烈。麦基，一个身高 6.5 英尺、体重 270 磅的奇才，朋友们称他为蒂利，是在德国慕尼黑的第十特别军事小组作为一个情报工作人员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他在国防语言学校学了阿拉伯语，作为使馆陆军武官在沙特阿拉伯供过职。后来他被指派为军事情报和安全指挥部的参谋，像中央情报局一样，该指挥部也吸收外国特工搜集情报。麦基在黎巴嫩的使命是保密的。军事官员拒绝说明他在黎巴嫩干什么，在爆炸事件发生前仅 24 小时内麦基给他母亲的电话中，这位 40 岁的官员拒绝透露他的落脚处。麦基太太对一个记者回忆说：“我说‘你在那儿？’他半笑着说‘在这儿’。”

麦基死前几个月所作的军事记录表明他参与执行在黎巴嫩的一项危险任务。一项军事记录证实了“麦基少校在不断从事美国军队中最危险和需要的工作之一”，并补充说他被“派用于执行美国大陆之外的一项极端机密的任

务。”根据另一项报道，他的工作“高度危险”，“他靠他的特别知识才免于难（从他的工作中）……”依据这些和其他线索，有理由认为麦基和甘农都参与了勇敢搜索和营救美国人质的工作，也参与了针对以黎巴嫩为基地的恐怖主义组织的间谍活动。

在泛美 103 班机被炸后，关于甘农和麦基在贝鲁特的“真实使命”的谣言在报刊上传播开来。（欧洲人的新闻报道主要集中于他们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由于报道说在洛克比找到了属于他们的装满现金的手提箱，使这些传说得到了加强。）甘农在贝鲁特花了大量时间去搜集关于在该城活动的阿布·尼达尔小组的情报，或者他正在黎巴嫩南部为了该目的招募特工人员，没有地方对此作过准确报道。甘农的职责是复杂的：他使中央情报局继续在黎巴嫩存在下去（在某种程度上是要表明该局不会被增长的暴力所吓倒）；他维持了一个特工人员网以搜集关于美国人质的情报；而且他尽可能多的搜集了用于反对阿布·尼达尔的情报。蒂利·麦基是个能干的助手。麦基在黎巴嫩的任务也充满危险和阻挠。

从洛克比找到的个人物品中，麦基在一张打印的纸上列出了美国大使馆官员的名字，挨着这些名字出现了用于与他们联系的代号。麦基以“卡彭”（二十年代芝加哥黑帮头子，有“头号公敌”之称。——译注）列入名单中，其他大使馆官员则被冠以其他歹徒或暴君的名字，包括狄宁格杰（本世纪初美国著名银行抢劫犯。——译注）、邦尼、克莱德、希特勒、斯大林和波尔市特。（一张长条纸还难解地使人注意到监狱、墓地、火葬场——没有一个曾被说明过。该纸条并没提到甘农或中央情报局，关于麦基究竟是谁所雇的谣言在洛克比空难后不久就流传开了。推测说他实际上是从国防情报局出借到了中央情报局。凡月之后，当麦基的一个同事引证说他肯定麦基“既为中央情报局指派又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时，他实际上确证了这一谣言。

与甘农一样，麦基急于回家度圣诞假日。与甘农一样，他改了他的航班安排，以便能比原来安排的早一天到纽约。麦基最近去黎巴嫩的旅行仅持续了 4 周。一位同事记得刚过完感恩节就曾在美国国务院的楼道上看到过他。这位少校告诉他说他正要返回中东去，但希望在那儿不要呆得太久。这位同事回忆说：“很清楚他不希望回去。”

甘农和麦基返回美国的机票都是由贝鲁特的卢塔斯旅行社准备的，这个旅行社是由反恐怖中心进行即时调查的主体，以确定在该旅行社的任何人是否会有意无意地把关于他们两人的情况告知了熟识的恐怖分子。反恐怖中心的调查人员很快得出结论说不像是这样。在从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亚飞往伦敦的班机上，这 4 个美国人——甘农、麦基、拉雷维埃尔和奥康纳——紧挨着坐着，4 个小时后下了飞机，在一个泛美航空公司高级俱乐部的休息室等候。

第二天早晨，12 月 22 日，在这架 747 飞机从天上坠落在洛克比空难后还不到一整天，麦基被毁损的躯体就在通德尔加斯村的一个小教堂附近的地上找到了。

有合适的理由相信，泛美 103 班机上的炸弹与穆罕默德·侯赛因·拉希德的恐怖组织网有某种关联，尽管拉希德本人当时正被关在雅典的监狱里。他有进行这种袭击的经验、专门技能、动力和胆量。这次爆炸具有老练的拉希德行动的所有印记。在泛美班机空难事件调查工作开始后 8 周，反恐怖中心得出结论说秘藏在一个手提箱内的一件挥发性爆炸装置造成了该 747 班机被毁。后来调查人员能够指出爆炸的确切位置和怎样把炸弹带上飞机的详

情。他们还断定该装置放在一个东芝收音机内。但关在狱中的拉希德明显不能炸掉泛美 103 班机。反恐怖中心也不能把这次爆炸与拉希德的支持者阿布·易卜拉欣以任何方式挂上钩，阿布·易卜拉欣好好地呆在伊拉克，国际法与他沾不上边。尽管如此，拉希德和易卜拉欣的联系是中央情报局调查泛美 103 班机爆炸事件首先着手的地方。

在调查工作进行的最初 7 天中，反恐怖中心的官员散布了一张关于阿布·易卜拉欣复杂的、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组织网的详细组织机构图表。拉希德在图表上正好被列在易卜拉欣下面。在拉希德下面，紊乱的分支机构延及叙利亚、利比亚和黎巴嫩若隐若现的前线组织和团体。既然卡扎菲的国外情报机构时常为易卜拉欣的活动打掩护，易卜拉欣在利比亚的组织网看来就为反恐怖中心的进一步打探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另一个麻烦的问题是，在欧洲和北美的合法的利比亚商人，显然与卡扎菲布置在日内瓦、法兰克福和马德里的军火走私者和恐怖主义组织有联系，显然也与易卜拉欣用之于中東的恐怖主义组织网有联系。到 1989 年初，易卜拉欣和卡扎菲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没有一个提供过任何与泛美班机空难事件的调查有关的确切证据。因为其他在欧洲出现的更有希望的线索，使得易卜拉欣与利比亚人的联系被搁到一边去了。

当反恐怖中心的调查人员在清查关于近期可能发生的恐怖主义行动的警告时，他们不断碰到一个男人的名字，阿赫迈德·贾布里，几乎在美国政府保存的所有关于主要恐怖分子的档案中都有他。贾布里带领着一个规模小但却危险的、分裂出来的巴勒斯坦组织，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PFLP—GC），基地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美国当局认为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要为几乎成打的恐怖主义暴力行为负责，包括 1969 年劫持从雅典飞往特拉维夫的环球航空公司客机。像拉希德和易卜拉欣一样，贾布里，一个前军火专家，喜欢摆弄爆炸用品；作为一个能为从事暴力行动提供新方式的发明爱好者为人所知。贾布里还罗致了一个技术精良的制造炸弹的人，名叫马尔万·克里斯哈特，他最中意的行动方法就是把气压触发爆炸用品做成晶体管收音机。前联邦航空局安全专家比利·文森特说：“做这样一个炸弹，你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买一个高度表，像滑雪者用的那种。它难以置信地有效。”

关于贾布里，最令人头痛的消息来自监视着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都在欧洲和中東的行动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在泛美班机被炸前 3 个月，美国、西德、法国和英国的情报人员知道贾布里正在考虑在西欧的某个地方作一次目标针对美国人的有声势的恐怖活动，但他们不知道他会在何时何地发起攻击。所有人都在猜。例如，在飞机被炸前 5 周，反恐怖中心工作人员就提出过一个关于提到过的贾布里。阿布·尼达尔在南美的行动的警告，那里的美国靶子被认为特别脆弱。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显示，“1988 年 11 月中旬，阿布·尼达尔组织和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正在共同策划一次目标对准拉丁美洲的美国靶子的行动。（局的评语是：阿布·尼达尔组织是高度隔离的组织，它通常与其他在活动的恐怖主义组织不相干。关于阿布·尼达尔组织和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在拉丁美洲的共同行动，我们没有来自其他消息来源的补充情报。）”

中央情报局应从西德当局收到有关提到过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在欧洲的行动的最有用的消息。但在这件事上，德国联邦警察局、德国

联邦警政局、德国外国情报局、德国联邦内务保卫局和美国同行是不合作的。由于竞争和国家主义猜忌，表面上是因为事关德国人在职业上的骄傲，他们没有分享情报。德国人的职业骄傲在于，因为他们时常常以犹太人为目标的恐怖分子更留神，他们得到了信赖。所以，1988年10月26日，当德国当局在一次代号为“秋叶行动”的一系列协同搜查中，捣毁了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的一个基层组织时，他们没有告诉美国人就行动了。落网的16名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活动分子对德国的搜捕感到吃惊；在诺伊斯、法兰克福、汉堡、曼海姆和柏林对恐怖分子寓所的搜查，找到了电池、熔断器、起爆剂、收音机元件和大量空白护照。几天之后，德国情报工作人员才告诉他们的美国同行，他们还发现了看似要爆炸一架客机的重大阴谋。

10月底写成的一份美国绝密情报文件干巴巴地概述了“秋叶行动”让人吃惊的后果。报告注明，在西德当局抓获了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的活动分子后，他们莫名其妙地释放了其中的12人，包括马尔万·克里斯哈特，“因为缺乏证据”。这一轻率的处置触怒了美国情报官员。该秘密报告继续写道：

依据德国人的情报，为了阻止对定于10月28日飞往以色列的一架西班牙客机可能发动的攻击，10月26日警察进行了搜捕，有12个以上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成员落网。在联邦德国和其他地方的其他恐怖主义活动在怀疑对象之一的指使下也在进行，这个怀疑对象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中央委员会成员，他持一件使用假名的叙利亚官方护照旅行，从该组织大马士革总部接受命令。

这份美国报告用政治评语作为结束：“有可能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想在巴勒斯坦国民大会召开当头，使温和的巴勒斯坦人感到难堪。以一架西班牙客机为攻击目标可能与马德里1986年承认以色列有关。

德国情报人员还从以色列人那儿收到过关于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在西欧的行动消息，他们密切追踪着该组织“西方部”头目哈菲兹·马赫迈德·卡西姆·达勒卡穆尼。（他是美国情报局的报告中提到过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中央委员”。）虔诚的穆斯林教徒达勒卡穆尼是个高大方头的人，长有引人注目的满脸胡须，面带神秘的笑容。泛美班机爆炸前几个月，谣传他去了一趟德黑兰，在那儿他协助了从阿亚图拉·霍梅尼政府为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获取约1000万美元付款的谈判。这笔钱是实施对美国的恐怖袭击的费用。美国情报官员相信，伊朗要毁掉一架美国客机以报复伊朗大型655航班客机的损失，1988年7月3日，在波斯湾战争中，这架飞机被美国海军驱逐舰温森斯号偶然击落。虽则美国政府为这悲剧性的错误道了歉，并同意为受难者家属付赔偿费，伊朗却公开发誓要报复。

当正在洛克比调查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读完关于‘秋叶行动’的厚厚文件时，他们起初就得出结论说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是爆炸事件的主要怀疑对象。包含在早些时为德国联邦警政局获得的材料中的关键证据是一个无线电录音带唱机，那是与后来从泛美班机的遗物中找到的相同普通类型的唱机。1988年11月的联邦航空局公报用生动的言词对这一专门设计的炸弹作了描绘。由西德的临爆装置权威所作的初步分析（已完成），在最近逮捕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成员所作准备的各个阶段中找到了根据。

（德国人）发现了一个由东芝453收音机作成的临爆装置，那个收音机内装有约300克重的可塑型炸药，炸药装在一个蒙有‘托布罗’牌号的金属质糖

果包封中。那炸弹里有一个电雷管。”

找到一个可能炸了泛美 103 班机的怀疑对象是一回事，证实它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在调查洛克比空难事件的第二个月中，反恐怖中心的工作人员确信贾布里与该事有关。可是，他们被德国人决定释放他的炸弹制造者马尔万·克里斯哈特激怒了。马尔万·克里斯哈特被私下逐回了约旦。这导致他们推测德国人与约旦人商定了使他获释的秘密交易。德国人放出克里斯哈特是个可怕的错误，因为这立即使所有人都把他认作一个密探，并使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中。

反恐怖中心的工作人员还认为德国人在其他方面也把事情给搞坏了。他们觉得在克里斯哈特获释后，其他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活动分子在 12 月实施了贾布里的计划。

反恐怖中心不得不把几乎无休无止的一系列线索清查到底，这些线索从在欧洲和中东的数十个消息来源提供的关于这一事件的情报发展而来。例如，反恐怖中心的调查人员发现列名在这次泛美班机上的一个女服务员不在那飞机上，因为她日前说病了。他们了解到那个年轻女人在莫斯科有套房子，这套房子由她和她的阿拉伯未婚夫分享，她的这位阿拉伯未婚夫正好又是贾布里组织的成员。得到情报的反恐怖中心官员希望高涨。一个前反恐怖中心官员说：“这种安排是恐怖主义组织的标准方式。我们已数十次看到过它了。我们总是盯着女服务员们。”

在洛克比炸机事件发生后 3 个月，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请他们的克格勃同行在莫斯科对那女服务员及其未婚夫作一个非官方的调查。刚过了一个星期，他们就得到了明确的回答：克格勃说，可以相信，那女服务员和她的未婚夫都与这次袭击无关。一位反恐怖中心官员记得，苏联的调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有结论，包括弗雷德·特科在内的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都感到奇怪。“你们知道，特科实质性地问道，‘你们怎么能有把握？’但他们全都有把握。我们与之谈话的一个家伙只是耸耸肩膀，说出这样的话‘嗯，他（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怀疑对象）不堪一击，只坚持了一会儿’。说老实话，他们只是吓唬他。”

反恐怖中心还必须弄清大量在泛美班机被炸前数周内针对欧洲的美国定期航线的威胁。例如，12 月 5 日，在给赫尔辛基的美国大使馆的一个电话中，一位来路不明的打电话者警告说，年底之前，阿布·尼达尔组织在欧洲的活动分子会弄毁一架泛美国际班机。这消息使反恐怖中心感到头疼。尽管阿布·尼达尔组织作为美国的残忍的仇敌的名声使它成了可能的怀疑对象，但是由中央情报局最可靠的中东行动人员挑起的该组织不断的内部倾轧，似乎使它不可能成为凶手了。尽管如此，赫尔辛基的消息必须认真对待。例如，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官员记得在该消息传出后的几个小时内，白宫就收到了有关这一威胁的详细材料。他说：“我们知道有某件事马上要发生。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它。”反恐怖中心官员被派到了赫尔辛基，但很快得出结论说这一威胁是“骗人的东西”。

由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滋生出来的另一线索看来甚至更有油水。在 10 月份，西德联邦警政局抓了 16 名在西德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成员（包括克里斯哈特）后，他们发现了该组织网与以斯德哥尔摩为基地的另一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组织间的联系。在泛美班机被炸前，斯德哥尔摩组织的成员甚至曾经拜访过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在德国的活

动分子。瑞典当局逮捕了嫌疑犯，他们也与1985年和1986年丹麦的哥本哈根的一系列爆炸事件有关。更让人心寒的是，这些嫌疑犯常去马耳他，为了拿到生活在瑞典的巴勒斯坦人中去转售，他们在一个被称作“马利之家”的马耳他商店购买衣物。

在泛美103班机空难事件调查工作开始几个月后，英国和美国的侦破专家告诉反恐中心，装炸弹的东芝盒式录音机曾被包在来自那商店的衣服中。既然它把斯德哥尔摩的巴勒斯坦人直接与泛美飞机被炸联系起来，此时它看来就像是反恐中心的调查人员拥有的最大线索了。在把由西德当局提供的情报和关于克里斯哈特（现在事实上被关在约旦安曼的一个安全的房子中）制造的那种炸弹的情报联系起来后，反恐中心的调查人员确信他们能制造一对“配偶”，把从飞机碎片中找到的纤维制品同该斯德哥尔摩小组联系起来。

暂时看来，反恐中心似乎解破这个案件了。但正当这一期望似乎达到高峰时，斯德哥尔摩调查工作的外缘开始出现破绽。“马利之家”的主人坚持说他能轻易认出那使泛美103班机完蛋的衣物的买主。但当店主被示以在瑞典的嫌疑犯的照片时，他使劲摇头说不是。他告诉美国和苏格兰的调查工作队他与那些从瑞典来的巴勒斯坦人相熟，但他们没有买在泛美班机残余物中找到的布。他是坚决的。他坚持说：“如果你把买了那些布的人的照片拿给我看，我会认出他。”可是，反恐中心的调查人员拿不出这样一张照片。他们许多人开始相信那等于是不可可能的。

退休的反恐中心官员坎尼斯特拉罗自豪地忆起反恐中心关于泛美103班机爆炸所作的工作。但他对英国侦破专家的辛勤工作留有更深的印象。这些英国侦破专家能把从残余物中找到的几小块纤维同卖给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人一批衣物的那个马耳他小店联系起来。那批布是用来包藏在泛美103班机上的炸弹的。坎尼斯特拉罗还能生动地回忆起马耳他的调查遭到的严重挫折和用于从理论上探讨最让人头痛的问题的漫漫长夜。如果在斯德哥尔摩被捕的巴勒斯坦人没有在马耳他买那衣物，那是谁买了？

使坎尼斯特拉罗和他的同事更沮丧的是，反恐中心当作事实的所有事实原来都是假线索或不可思议的巧合。坎尼斯特拉罗承认，“斯德哥尔摩的嫌疑犯全不是嫌疑犯把我搞糊涂了。有关他们的证据只是让人难堪的巧合。我们对他查了又查，但找不出什么东西来。”这同样的疑虑折磨着前联邦航空局安全工作人员文森特。他惊奇他说：“我仍不能相信那些人（在斯德哥尔摩的）与此毫不相干。”

那一度看似如此可靠的反恐中心调查线索，终于被既事关重大又稀奇古怪的证据破坏了。这些线索从大马士革延及法兰克福和斯德哥尔摩，然后又返回大马士革，甚至返回德黑兰。

在那线索拿出来之前，必须了断其他重要线索。甘农曾经被当作目标吗？坎尼斯特拉罗说：“我们花了两个月时间来排除这一可能性。”来自底特律的一个学生哈利德·加涅尔无意中把炸弹带上了飞机的说法又如何呢？坎尼斯特拉罗回答说：“驳斥这一说法花去了我们更长的时间。9个月——差不多是这么长。”在莫斯科和其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的未婚夫在一起的泛美班机女服务员的情况如何？他说：“我们很快就处理了它。”唯一留下来的又一个重要选择是：炸弹是由克里斯哈特制造的，用某个还待确认的巴勒斯坦在马耳他的活动分子买的衣物包着。现在反恐中心要作的全部

事情就是证实它，使它摆脱怀疑的阴影，以便让其公诸于法庭。

当亲切的坎尼斯特拉罗讲着反恐怖中心如何终于找到改变了泛美班机爆炸事件调查进程的唯一最重要的证据的情况时，他惊奇地摇着头。他承认：“调查中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了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而后，我们几乎像是在一个早上醒来，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这件事发生在约旦安曼的一天早上，正值炎热的沙漠夏季。在 1989 年中期的那一天，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第一次被允许询问马尔万·克里斯哈特，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制造炸弹的能手。克里斯哈特对西德警察把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决定仍然感到愤怒（对阿赫迈德·贾布里来说，这证明此人被某个外国情报机构收买了）。克里斯哈特厌恶地看着审问他的中央情报局人员。他用常常是刺耳的音调告诉他们：“我没制造那炸弹。”他们像是肯定地回答说，他肯定制造了。根据一个了解这场审问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说，克里斯哈特重复地说，“我没有制造那炸弹。你们会明白的。”

泛美 103 班机爆炸事件和马修·甘农之死像一个晴天霹雳在中央情报局回响，将休假季节蒙上了阴影，使行动部处在一种非正式的哀悼中。中央情报局不能公开作排解悲伤的任何事情。局领导人甚至几乎没在私下作什么事情去减轻打击。尽管甘农死于完成在黎巴嫩的机密任务后返回途中，他也没被正式认作“因公殉职”。由于表面上他是在度圣诞假期，一枚象征他的牺牲的星章是否可以加到中央情报局的勋章本上和复制在兰利的过厅墙上就成了问题。即使把这样一枚星章献给甘农作纪念，他在中东的经常是极为出色的工作也得不到庆祝，甚或得不到公开的承认，就他的中央情报局有关同事而论，他必须悄悄地埋葬，但他不会死得不明不白。他被看作中央情报局反对恐怖主义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的殉难者。他被看作是一位英雄，尽管他危险的工作的详细情况只有中央情报局本身知道。

在韦伯斯特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后的 18 个月期中，甘农之死增强了弥漫兰利的放任感。对行动部的高级官员来说，情报局的士气看上去像是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打击，降到了比伊朗门丑闻被揭发后随即出现的情形更糟的地步。甘农的岳父托马斯·特威腾受影响最深。

韦伯斯特用他妻子死时乔治·布什用过的同一劝导方法，来使特威腾摆脱甘农之死所带来的悲伤；他让特威腾离开一段时间，但要使自己忙乎着。当特威腾短时间离开后回到办公桌时，韦伯斯特用工作把他淹没起来。韦伯斯特认为这是保证特威腾作为他最尊重的顾问之一日益增长的重要地位的有效方法。这一策略只是部分成功地使特威腾的头脑中不再萦绕洛克比的景象，在充任行动部副主任助理角色中，特威腾不断接触到他的老朋友弗雷德·特科，并得以接触反恐怖中心每周的最新情报。他沉浸在泛美班机爆炸事件的调查工作中。

在韦伯斯特的其他同事看来，对泛美 103 班机进行穷凶极恶的恐怖主义袭击的时机并不坏。中央情报局局长知道，该局仍在为消除由伊朗门丑闻的困境引起的士气普遍沮丧而奋斗。这一使人垂头丧气的境况也在不断伤害韦伯斯特本人。国会希望他在里根时代结束时清理好中央情报局。虽则他尽了最大努力去减轻国内调查活动所造成的伤害，但事实是对 6 名情报局官员的惩戒，加深了他极力想使之结束的那种放任感。韦伯斯特也没有成功地把中央情报局从美国冷战政策的工具，改造成一种适合于处理美国国际经济问题的情报组织。在乔治·布什总统就职典礼前夕，对中央情报局能说的最好的

话是，当它仍在里根时代最后日子里暴露出来的问题中蹒跚而行时，今后的事情只会变得更好。

这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允诺。1989 年开始时中央情报局面临的挑战看来必定势不可挡。威廉·韦伯斯特仍在为重新指派它的使命而奋斗，从追捕苏联间谍到追踪恐怖分子，从清点新的俄国导弹到评估正在出现的核力量的威胁。最重要的是，韦伯斯特的中央情报局需要使它自己熟习新总统的议事日程，这位总统曾经当过中央情报局局长，但反常的是他使这个局现在的作用比在七十年代中期他当局长时所具有的作用更小。中央情报局为使它自己熟习布什的新安排而进行的努力，结果转变成了最大的挑战！

第二部分 分析家 中央情报局的危机

中央情报局的最重要的战斗，不是发生在外国土地上，而是在弗吉尼亚州兰利情报局总部的长长走廊和灯光通明的办公室内进行的。进行这些战斗的男男女女完全不像小说或电影中所描写的那种美国间谍，事实上，中央情报局的最重要的间谍并不是真正的间谍，而是分析人员，接受人文科学的训练，他们对一个地区的习俗、语言和政治传统等的迷恋，更甚于对情报局职业技巧细节的专注。他们有些人在其专业内所享有的地位，足使他们能够参加美国学术界的泰斗大师的角逐。而当美国公众和舆论界充斥着窃听、闯入和非法秘密搜查勾当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时，中央情报局的更为重要和不事张扬的工作——分析情报和作出情报人员的估计——事实上反而无人注意。

像许许多多人对中央情报局的看法一样，我们对情报局的观感，也是与它的实际相扭曲的。在左的方面看来，中央情报局被理解为某种中世纪的星法院，是政府中的政府，其罪恶是如此昭彰，甚至把改革其职能的考虑也视若狼狽为奸。他们认为情报局应该彻底取消。右的方面则认为，中央情报局是一把被同黑暗势力妥协而磨去锋芒的刀剑，是一群自命不凡的来自象牙塔的知识分子怯懦地制造出的工具，不可能指望它有效地保卫自由。他们解决之道是相同的：把中央情报局取消掉。即使是一些明智之士，他们的意见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取其中，对情报局的看法也是基于社会上一般的观念，而与实际毫无共同之处。一个情报人员的形象是穿一套灰色法兰绒西装——一个过着双重生活的充当秘密间谍的正常美国人——，这种形象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灵中，成为情报局本身的一个标志。美国人相信中央情报局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擅长于在遥远的异国进行秘密战争。

事实大大地被搅乱了。中央情报局在布什年代开始时远不是公众所认为的那样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有力武器，也没有它 40 年历史中任何时期所具有的那种进行成功的秘密行动的能力。事实是，情报局并没有包藏一个“秘密班子”用其他什么手段去推进外交政策，根本没有这样的班子。问题不在于勇气，而在于它的使命。穿法兰绒西装的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已经被更关心工资级别和退休年金的人所取代了。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央情报局并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政府机构，它已成为一个典型的政府官僚机构。

1989 年 1 月时的美国对中央情报局的观感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对乔治·布什的判断，他可是这个机构有史以来最享有盛名的有关人物。自由派认为遴选布什标志着美国情报工作的制度化，他被看作是会扩大威廉·凯西始创的危险计划的中央情报局鼓吹者。另一方面，保守派则担心，布什的名牌大学出身的背景，使他容易接受情报局内天真幼稚的情报专家们的观点。但是所有这些最有趣的意见都没有说到另一个政治上的个人企图：布什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经历是担任总统的良好训练，它意味着他了解了作为美国制度的一个必要部分的情报界的价值。

每个人都错了。照中央情报局所说的，在此后 3 年中，表明中央情报局对乔治·布什的影响比对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都小。布什在关键时刻一再显示他更相信个人外交，而不是秘密行动，他还故意避免听取情报局专家们的建议。

1989 年 1 月，即将来临的布什的就职典礼，在中央情报局内部产生了自

豪和焦虑相混合的想法。一些人，自豪地认为新总统可以作为一位中央情报局长也能问鼎国家最高职位的明证。另外一些人则感到，布什入主白宫远不能说将开创情报工作的黄金时代。许多布什过去的同僚认为他是他们所认识的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在他们看来，布什蔑视常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他刻意拒绝表露与他过去最亲密同事之间最一般的交往往事。他们是他们遇到过的最不显露自己内心世界的人。尽管他对中央情报局有明显的兴趣，但是他的助手们怀疑他不过是把担任 11 个月的情报局局长当作政治旅程上达到顶峰的一个插曲而已。

原来设想布什当选总统标志着情报局复兴的开始，在兰利被当作笑话来谈。他几乎同过去的一些情报局密友都保持距离。除了来自退休的情报局官员的一个布什吹捧者非官方小集团，以及在布什离开兰利后对他怀有强烈忠诚感情目前仍在他手下工作的前情报局官员外，布什与中央情报局谈不上有什么深的或有意义的联系。

一些中央情报局高级情报官员相信，布什在 1976 年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期间，他毫无建树，而且在实际上加速使情报局影响下降（特别是由于他在 A 大组与 B 大组这两个班子争执中所持的态度）。他们还认为布什在任职期间，没有能够了解和掌握情报局的真正性质。在他们看来，布什进出中央情报局不过是一名匆匆过客而已。但是，使他们担心的是他会远不是那么回事地相信他在情报局的经历真的使他成为一名有成就的情报官员。因此，当布什在 1989 年搬到他的白宫新居时，兰利的职业情报官员感到危险的，倒不是他会利用情报局去推行一项冒风险的外交首创行动，或者说把情报局的职能转到白宫，反倒是他对这两者都漠然处之——他的入主白宫将不是标志中央情报局的兴起，而是它的没落。

乔治·布什局长在 1976 年接下来的中央情报局同他在 1989 年担任总统时遗留下的中央情报局是大不一样的，在这 13 年间，中央情报局已经从国家的独此一家的情报局转变成一长串情报官僚机构中的一家。回想一下，十分明白的是，布什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带来意想不到的促使情报局职责发生裂变的变化，至少就秘密行动方面来说是这样的。

至少早在 1975 年，五角大楼在监督准军事行动方面就担当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军方在为中央情报局一些重要的国际计划提供专门技术方面也被授予更大的职责。例如，在八十年代中期，由美国陆军指导下的特别训练队负责执行一些高度秘密的国外行动。

这种被中央情报局的老战士们辛酸地贬之为“情报工作军事化”的转变，实际上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已开始了，那时情报局使用军方资产发动猪湾行动。这种倾向后来在越战年代更为明显，当时武装部队建立了搜集情报特别单位，它与中央情报局官员的竞争在印度支那和华盛顿都是经常的摩擦之源。使用军事单位执行中央情报局行动的政策，或允许各种不同机构进行他们自己的秘密行动，这都是不可逆转的。许多中央情报局的高层官员都是从地区军事专家的富饶土地上招募进来的。在凯西就任局长时，情报局的文职人员抱怨兰利“充满穿军服的家伙。”说情报局被授予对所有军事情报行动的最后批准权，似乎也满不是那么回事。我国穿军服的男男女女的权力在各地都是显而易见的。

自从布什出任情报局长以后，中央情报局在其他一些重要方面的影响实际上也缩小了。复杂的情报收集卫星的出现，为国家安全部门提供了史无前

例的获得可靠情报的手段。开初，中央情报局在使用这个新技术方面起主要作用。在 1973 年，中央情报局设立了全国照片解析中心（NPIC），它为整个情报界提供“共同关心的服务”。中央情报局的科学技术部不断增设的科室单位协调处理从上空侦察得来的情报。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这种类型的情报工作越来越有价值，它获得情报界预算的很大一部分份额。

历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从威廉·科尔比到乔治·市什，再到斯坦斯菲尔德·特纳，都对这种上空间谍活动给予越来越大的重视。在八十年代，威廉·凯西继续这一传统做法，那时，中央情报局监督发射一系列高度机密的通讯卫星，被称之为“平台”。不过实际上中央情报局从这些行动中只得到间接的好处。在那时，由国家安全局（国防部的一只臂膀）和国家侦察局（由空军和中央情报局共同管理）向政府提供最大部分的情报报告。

这种技术上的革命完全转变了情报搜集和解析的方法。它也改变了中央情报局的地位。当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后，三大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NSA）、国家侦察局（NRO）和国防情报局（DIA）——在注意力、经费、影响力和在国家安全机构中的地位，与中央情报局展开了竞争。这个竞争使得中央情报局在华盛顿的地位产生了急剧的改变。

一位情报局的老资格解释说：“不可能凭直觉办事。你被证据、证据、证据缠绕着，争论的是关于它的事，要根据你实际看到的加以权衡。情报工作的过去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另一位工作了 30 年的老资格抱怨情报工作的真本领被牺牲掉了：“在中央情报局几乎不可能干出什么事来。没有时间思考。你被穿军服的家伙们，科学家，译员和分析家们包围了。日常文书工作之多使人感到惊愕。结果秘密工作的成果受到了损害。情报工作变成了一项巨大的官僚事业。”

更精确地说，情报界实际上是由许多官僚机构组成的。

国家安全局负责截取和解析外国资讯往来，执行美国密码计划。这个不事张扬的机构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的镶有巨大的现代化绿玻璃 3 座一组的建筑物内。它的年预算估计在 100 亿至 120 亿美元之间，在全世界拥有 5 万以上雇员。由于它的灵敏的搜集情报活动能力，高质量的情报成果，它已经取代中央情报局，成为最有吸引力和最有价值的外国情报的提供者。当外国领导人的意图（这通常是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员们所注意的）难以捉摸，而一场核战争的潜在可能仅在分秒之间的年代，国家安全局的报告在情报界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同样地，国家侦察局，它的工作同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性质相近，这个情报机构的小姐妹，每年经费也在 40 亿至 50 亿美元之间。侦察局拥有 1,000 多名分析家和科学家，他们负责执行情报卫星计划。

美国各军种的单独情报机构的经费总共也超过 8.5 亿美元。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各拥有独自の指挥系统负责人员情报、反情报、通讯情报和信息安全等，每一个兵种还各有其特别的情报职能、陆军负责反恐怖和威胁分析中心的运作，海军负责海上监听计划，空军有一个战略研究部门（目标是苏联空军）。

这些军方的情报部门还不包括国防情报局的费用，它负责协调武装部队各项情报活动，并管理一个单独的情报搜集单位（沿中央情报局的地理处的相同活动路线），它可就军方的专门项目进行单独的评估。国防情报局每年花费近 4.5 亿美元，雇用 6,500 名军职和文职人员。在里根年代开始时，军方情报机构所获费用总额已超过中央情报局的经费额。与此同时，在情报使

用者当中，国防情报局的情报已经开始与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展开竞争了。

当凯西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期间，日益增多的证据表明，中央情报局成为那个时代的受害者。这不仅是因为它重建在过去十年间遭到破坏的人员情报网才刚刚开始，还因为它为重建它在全国情报界中的威信而正在进行斗争。对于中央情报局的江河日下的局面的原因，一种普遍的错误看法是归咎于凯西的目光短浅，或是公众对在过去出现的任何丑闻中中央情报局起的作用感到愤怒。倒不如说，中央情报局的江河日下是由它本身所决定的。在空中，国家安全局和国家侦察局获益于技术复杂的情报收集器械，它的重要性正日益增加；在地面和海上，军方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远比中央情报局所能提供的快得多。

在 1984 年凯西任职的中期，这些改变已经制度化了。巨大的权力已经让与技术知识分子专家和掌管五角大楼庞大情报计划的军官。诚然，中央情报局局长仍然指导着情报界，在执行情报政策方面仍具有巨大影响力，但是中央情报局的普通工作人员则在很大程度上限于间谍活动和分析工作。他们的工作确实也是美国情报力量的十分重要的部分，但它与中央情报局 1947 年正式设立时最初设想的业务范围和享有的权力大相径庭。

1988 年的美国情报预算表明，中央情报局的权力已经显著地受到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局设立的界限的限制。根据一项权威的估计，归于中央情报局使用的只有情报总预算的 10%。而在这 10% 中，有 90% 是用作行政、情报分析、通讯协作和卫星侦察活动的。这些数字表明，凯西打算减缓 15 年来增加美国高科技收集情报能力的趋势，但是，即使是他也不能阻止这种新的发展。

在威廉·韦伯斯特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期，情报局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所得到的年度经费估计仅 10 亿美元多一点，情报局只能花 1 亿美元用于间谍计划——训练和部署情报局官员，招募外国特工人员，维持海外开支，遍布全球的情报基地和情报站的一般维修和保持费用。正当大约 3,000 名从事秘密工作的官员仍然可能把自己看作是情报界出类拔萃的外勤间谍，但他们很快成为情报官僚机构的被遗忘的继子。

更糟的是，韦伯斯特面临秘密情报工作的迅速瓦解，在他就任局长的一年当中，有近 20% 的外勤官员辞职、退休，或考虑调职。东亚处和近东处受的损害最为沉重，留在东亚处庞大的中国科的会讲中国普通话的官员只有 6 人，留在近东处会讲阿拉伯语的也是屈指可数。这一危机由于一些关键性的调动而更形严重，一些在中央情报局内受过多年训练的人员，决定到别的政府部门另谋高就，以求发展。

在情报局近东处发生的事情具有这次危机的象征意义。在七十年代初，中央情报局花费了巨额金钱和精力招募近东事务专家；情报局派出至少 6 个招募队到美国大学校园去寻觅阿拉伯事务专家。结果说明，近东处招募的最佳土壤是来自军队，一批优秀的应征入伍的军人塞满了情报局训练班教室。1973 年和 1977 年的两次浪头中，形成了从情报局训练班毕业的年轻的阿拉伯事务专家的最重要的队伍。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这批新军官协助进行了在中东的一系列情报局关键性战役。他们还为美国的最重要的地区盟友进行了反恐怖分子训练计划。

在 1989 年 1 月，在国内外办的训练班都寿终正寝：大部分优秀的阿拉伯事务专家不是被杀就是另有高就。一名最出色的年轻军官离去后到空军当了

副部长。这是唯一的例子。其他近东处的官员到一些著名大学担任教职，或是担任一些大国际公司的顾问。近东处再也没有真正复元。

辞职、退休、调职，显示了情报局内部存在的一种独一无二的矛盾处境。事业型行动官员地位提高，并得到事业心极强的局长们（如凯西）的表扬。可是，当他们奉召去从事损害情报局公共名声的不光彩的活动计划时，他们感到困惑难堪。中央情报局的历史显示，情报局在经历了积极行动的时期后，就为间歇性相对沉静的时期所打断（积极奉行充满原动力政策的局长的，继任者不可避免地是保守人物，如韦伯斯特）。这时，这个相对沉静的时期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内部的压力，要求转而采取更有活力的领导。中央情报局这样政策摆动 40 年，但到八十年代末，他们开始付出沉重的代价。

韦伯斯特（还有凯西）明白中央情报局不再受到国家最高级政策制订者们普遍的信任。情报局受到的来自丑闻、高科技情报收集技术，以及五角大楼不断增加的专门特别行动班子的伤害似是无法弥补的。1989 年初，冷战临近结束，中央情报局的基本目标的解体，情报局的 40 年戏剧的最后一幕已经写好了。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央情报局将作为对付威胁国家安全的政府主要机构退役；最好的情况则是情报局将被当作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僵化遗迹保存下来。一些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预见到了这种结局的来临，并力图采取措施来延缓其到来。即便是对世界共产主义有天生恐惧症的威廉·凯西，也不得不承认中央情报局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它的使命需要再检验和改变方向。凯西认为开始这种过程的地点是在华盛顿。

韦伯斯特和凯西是截然不同的情报局长。韦氏是一位得到授权的合情理的狂热人士。凯西则是一位更理智、重程序的行动家。韦氏小心地操纵权力的手段，凯西则予以粗暴对待。韦氏是一位沉着自信的管理者，凯西则是一位激烈的战士。韦伯斯特也许是历史上最富有公开性的中央情报局长，而凯西则珍视自己的隐私和非常喜爱情报局的秘闻。

凯西很少向他人吐露自己的心事。在他作为里根总统的一名亲密顾问花费好几个小时来施展他的影响力之后：凯西常常是把他在 7 层楼的办公室的窗帘拉上，喝上一点酒。大多数情况下，他邀请一些亲近的高级顾问来参加，包括约翰·麦克马洪、爱德·尤赫里威茨、罗伯特·盖茨，或是他在情报局中的最信任的德韦·克拉里奇。凯西用了许多晚上同这些人长谈。在 1986 年秋的一个晚上，凯西与这些人谈起他对情报局前途的看法。

凯西透露他的想法：情报局正在改变。它干的许多事干得很好，必须继续干下去——监视苏联的军事威胁，实施广泛的间谍计划，渗入外国的情报行动，向总统提供美国易受袭击所在的忠告。但是，情报局建立的初衷以及四十多年来孜孜以求的主要目的，已经渐渐成为历史。凯西解释说，他指的是大家毕生从事的与共产主义的斗争。尽管苏联仍是一个主要竞争对手，但它的帝国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也许拥有比世界上任何机构都多的苏联问题专家的中央情报局，必须承认它的最基本的情报工作目标正在慢慢消失。

凯西还不愿宣布取得最后胜利。苏联在中美洲的影响，证明当它想这样做的时候，仍然有能力损害美国的利益。不过，有了明确无误的征兆说明冷战的结束已经临近，这意味着中央情报局必须重新评估其使命。随着这一进程的展开，将会有来自外界对情报局的攻击。长期以来的敌人们将试图找到摧毁这个机构的共同理由。这就是中央情报局必须作好准备的原因所在。

凯西在许多方面比他所能想像到的还正确。世界在转变，美国政府亦复

如此。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政府中享有的权力比过去更少，但是它的失败则更为公众所知晓。国会的监督使它受到沉重损失。国家安全局和国家侦察局，配备有似乎是战无不胜的高科技发明，继续得到越来越多的情报系统预算分配额。凯西可以争辩说，最重要的情报大多数不是来自卫星或电讯截留译码器，不过他知道，政治的逻辑表明，权力来自金钱。

凯西在他下班以后的私下讨论中，详尽地对中央情报局怎样再也不能维持住它的特殊利益地位进行了评述。他指出，激发中央情报局早年热情的优越感和精英意识，被一连串的难堪的事弄得焦头烂额，权力被限制，地位被削弱。凯西严厉反对进一步侵蚀中央情报局的权力。他亟欲翻转这种倾向，他缓慢地开始着手进行他相信会把情报局带到下个世纪的改变。他的第一项实验，就是把中央情报局的作用从搜集和传播情报，转移到它正确的位置，充当整个情报界的一种内部思想库，这件事与德韦·克拉里奇有关。凯西描绘的中央情报局未来的蓝图，是以克拉里奇早期的成功之举为蓝本，他成功地建立了反恐怖中心（CTC）。凯西想要建立一系列其他中心，类似政府机构间的委员会，由专家和行动官员组成，集中注意力于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凯西认为，如果来源、情报和专门技能调变得当，各种各样棘手的问题会迎刃而解。（凯西特别专注于组织情报小组，目标集中在麻醉品和安全问题上。）

反恐怖中心的建立，标志着中央情报局一次革命的开始。从来还没有过中央情报局官员被要求公开与其他政府的情报机构合作，搜集和分析外国情报机构的情报。文森特·坎尼斯特拉罗，一位参与其事者，把它说成至少是“凯西所作出的最引起争议的决定之一”。开初，凯西的决定受到基层官员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与其他地方的政府分享秘密，会损害情报局的情报来源和方法，而且会加速情报局的衰落。克拉里奇利用凯西的名字迫使中央情报局改变其官僚作风，又对沉默的官员和分析专家们甜言蜜语。克拉里奇对在情报局行动部的普通官员进行威胁，要未在新的事业中合作，要未就一起离开。他还警告，反恐怖中心一经成立，它就是执行政府反恐怖政策的权威。

坎尼斯特拉罗解释说：“反恐怖中心是一个典型，从它的成功，别的都将以它为榜样。我们把中央情报局这个衙门以一种正式的方式向其他政府开放，这确实是头一遭。”

凯西依靠反恐怖中心的成功要达到两个目的：他想要中央情报局获得对新情报和评估的途径，以便更好地解决情报工作的问题；他寻求增进中央情报局在政府内部的形象，使它比一个“选手”还要多点什么。但是凯西重建中央情报局的广泛计划具有更大的竞争性，对某些兰利的根深蒂固的官僚习性形成了威胁；他的计划被看作是对“四王子”的权力的直接威胁，这“四王子”是中央情报局内主要部门的首脑，他们对情报局的政策和最重要的计划有极大影响力。

1985年发生的一系列未曾预料的恐怖活动，导致反恐怖中心从危机中成长。这些恐怖活动是从美国环球航空公司847航班的一架飞机被劫持达17天开始的。这次恐怖事件是在八十年代最能说明美国对付恐怖活动无能为力的最突出例证之一。一位前反恐怖活动官员解释说：“在环球公司飞机被劫持的日子，里根总统一个劲地要凯西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恰恰不能执行一种我们必须天天去与恐怖主义打交道的外交政策。”

同年的12月，来自阿布·尼达尔组织的枪手在罗马和维也纳机场的多次单独事件中杀害了25个人。对凯西的压力增加了。美国政府内部的批评者指

责中央情报局不是无能就是不愿意集中起国际情报来源与恐怖主义者的威胁作斗争。就这一点，凯西指示克拉里奇开始调整情报局在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做法的长期过程。凯西认为克拉里奇是这样的一位圈内人士，他有足够的条件按照他的意向转变情报局内各不相同的部处目光短浅的状况。

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承认，“在情报局行动部内部，我们接近于一场该死的内战。真是腥风血雨，因为第一次出现了不依照行动部既定路线去组织的一个机构，克拉里奇从行动部的每个处抽走人。他迫使各部门负责人放弃他的人员。我们光明正大地迅速取得一些重大胜利。当情报局把一切事情归拢到一起，我们发现我们对恐怖主义的了解之多真是我们过去想也不曾想到的。我们确实在于一件非常好的工作，只不过我们过去不知道它。我们没有分享到情报。”

建立反恐怖中心也激怒了情报部，这个部门认为中心的建立纯属越出常轨的行动，其唯一目的就是要绕过情报局有资格的分析人员作出的不得人心和令人不快的结论。一些分析人员力言，反恐怖中心规避专家们，这样做损害了中央情报局所宣称的提供客观和不存偏见的情报报告，他们认为反恐怖中心的作用完全是一种内部的秘密行动，是由行动部发动的歪曲情报部调查结果的一次制造内部动荡的战役。一位高级分析人员后来争辩说：“凯西和盖茨开始在中央情报局内建立联合的行动部——情报部中心，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対关键问题作出分析。其结果就是制造一个行动部歪曲情报部的情报的局面。这就是反恐怖中心的实质所在。”

在威廉·韦伯斯特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期，反恐怖中心成为美国政府反恐怖政策的主要计划和行动焦点。这个中心还在其他情报部门内部为中央情报局赢得新朋友，特别是在情报局官员明白表示他们愿意让联邦调查局来控制反恐怖中心。这样一来，就部分地提高了联邦调查局作为执法机构的地位。坎尼斯特拉罗说：“我们让他们去领导，不过我们这样做，因为事实上他们将会取得领导权。这是一个十分不牢靠的安排。我们仍不把情报来源和方法告诉他们，但给他们在执行任务时所需要的资料。我猜想你会说，我们把前门钥匙给了他们而我们自己走后门。”

当行动部官员执行情报局一项最危险和最秘密的行动时，韦伯斯特就在反恐怖中心权力最隆的这个时候继承了它。这项行动计划（由近东处负责。使用了来自反恐怖中心的官员和情报来源）始于1988年中，在这以前进行了6个多月的周密计划。行动涉及到在差不多12个国家中执行任务的官员。中央情报局的目标是臭名昭著的阿布·尼达尔的组织（ANO），这个组织比任何其他恐怖组织对许多劫机、爆炸和暴力行为负有更大的责任。在1985年11月尼达尔组织劫持了埃及航空公司的班机并杀害5名乘客；1985年12月，尼达尔组织声称对在罗马和维也纳国际机场杀害25名旅客负责；在1986年，它又在伊斯但布尔爆炸一所犹太教堂，杀害16人。在尼达尔组织于1988年杀害希腊游艇“帕洛斯城”号上9名海外度假旅客后，中央情报局决定对它采取行动。

从1981年以来，中央情报局已经在采取一项大规模的危险的搜集尼达尔组织情报的行动。情报局招募变节者打入该组织，并且设立了一些前线公司，与阿布·尼达尔在欧洲和北非的代理人做生意。中央情报局建立的公司向巴勒斯坦人的外围组织出售有关军用器材，如皮靴、帽子和背包。另外一些中央情报局商行卖给尼达尔组织一些电子装备。

通过运用这次战役，中央情报局还能向美国海关关员通报与尼达尔组织订有合同的美国公司的情况。中央情报局发现，一些这样的公司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前线小组，也是在使用中央情报局相同的策略企图渗入恐怖组织。情报局的官员们心花怒放，因为这些情报宝藏使他们能够发现摩萨德在美国活动的前线公司，并在使它们关门大吉这件事上感到得意洋洋。一些由以色列支持的这样的公司终止活动，主管人员受审判、判刑，被投入监狱。

中央情报局对尼达尔组织的渗透是极为广泛的，一小撮中央情报局的商号成了恐怖组织的独家供应者。

这种战略从一开始就存在问题。到什么火候中央情报局才停止搜集尼达尔组织的情报并开始摧毁它呢？又在什么火候上掌握使中央情报局不跨过从一个情报机构到成为尼达尔组织恐怖行动的帮凶的界线？

“帕洛斯特城”游艇事件是使情报局高级官员相信他们需要过去 7 年内得到的情报使用起来的分水岭。这一事件的谋杀者们也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个组织的最高层官员在 1988 年秋与中央情报局官员在北非见面，谋求这两个组织合作一劳永逸地结束阿布·尼达尔的恐怖活动。中央情报局同意巴解组织领导人们的意见。

紧接在“帕洛斯特城”游艇事件之后，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开始与好几个欧洲情报机构合作，执行一项广泛的反阿布·尼达尔组织的计划。使用温和派的巴勒斯坦人和约旦人合作充当渗进该组织的特工人员，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成功地招募了该组织基层特工，在它的分布广泛的基层单位中散布谣言和不实消息，并且制造该组织领导干部中虚假的权力斗争消息，激起普遍的变节行动。在这种行动的头 6 个月里，有近 60 名该组织的高级别成员投向比较温和的巴勒斯坦组织。

在反阿布·尼达尔组织运动期间，有一项保守得极好的秘密，那就是中央情报局与以突尼斯为基地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紧密合作，它协助提供瓦解阿布·尼达尔的欧洲和北非恐怖组织网络。中央情报局通过在贝鲁特、摩洛哥和突尼斯的中介人与巴解组织官员接触。他们与最高级别的巴解组织官员的接触是萨拉赫·卡拉夫，此人以阿布·伊亚德为人所知，他是阿拉法特首席情报助理。在合作的鼎盛时期，伊亚德向一名记者证实中央情报局与巴解组织的联系对行动的成功极为重要。

据伊亚德称，巴解组织曾“从尼达尔集团勾出 20 名变节者”，这使得阿布·尼达尔组织“在世界各地处境十分脆弱”。从该组织出来的变节者中 3 名最重要的人物是阿卜杜勒·拉赫曼·伊萨、阿提夫·阿布·巴克和苏卜希亚·穆拉德，她是阿布·尼达尔组织第二号人物的未亡人。他们为目睹尼达尔集团内部血腥冲突的人提供了中央情报局分裂该组织的计划得到成功的证明。这些目击者向中央情报局报告的一个特别残酷的事件，说尼达尔亲手处决了他的居统治地位的“政治局”一半的成员。其中两名被杀害的同事，据变节者说，被尼达尔埋葬在他家的钢筋水泥墙内侧。尼达尔后来在认为阿布·伊亚德应对该组织内部问题负最重大责任后曾威胁要杀死他。

在反对尼达尔的两年行动期间，由于尼达尔组织支持的民兵在南黎巴嫩与巴解组织武装作战，巴解组织与尼达尔组织之间的斗争在好几个地点转变成公开的战斗。1988 年晚期，在贝鲁特发生的一系列神秘的暗杀事件，也都是尼达尔组织成员冲着阿拉法特和伊亚德来的。

中央情报局从 1986 年以来即追踪尼达尔组织的行动，使用的手段就是从

声名狼藉的伦敦国际信贷和商业银行官员那里搜集情报，尼达尔组织在这家银行拥有好几个秘密帐号。中央情报局得以断定尼达尔使用沙基尔·法尔汉的化名在银行存了几百万美元的活动资金。尼达尔时常利用以伦敦为基地的一个中介者办理上述存款，并担任他的金融代理人。获自国际信贷和商业银行的文件有助于认证尼达尔组织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行动。

巴解组织还向中央情报局提供关于阿布·尼达尔在欧洲的庞大的网络的有价值的文件。这些情报包括尼达尔在澳大利亚和瑞士银行帐号的细节，他招募的技术人员，他的武器交易，以及他是怎样通过他在德国和荷兰建立的前线公司购买武器。中央情报局利用这些文件去发现尼达尔组织在远东的行动。

中央情报局的行动结束时，有近 300 名尼达尔组织的行动人员——这个组织欧洲和中东两翼的心脏——逃离。这些巴勒斯坦人中的一部分人去了突尼斯，在那里他们接受盘问、再训练，然后。被招募为巴解组织的主要成分法塔赫的安全官员。坎尼斯特拉罗评论说：“我们让尼达尔组织四分五裂，当我们结束这次行动时，阿布·尼达尔甚至无法收拾残局了。”

凯西的其他计划还没有像反恐怖中心计划这样有持久影响的——只有一个例外。在 1982 年初，凯西出人意料地决定扩展苏联情报收集处的业务，要函括全世界。多少年来，这个单位一直是个拥有俄国问题专家和行动官员的富有传奇色彩的精英集团，他们从在苏联工作的美国公司主管那里搜集情报。凯西命令将这个处的情报资产和专门技术并入行动部的不引人注目的国家情报收集处（NCD）。这一调整将使国家情报收集处成为行动部内基本情报搜集单位。它的新任务范围，将聚集整个国际社会的情报，其重点是访问在苏联以外的外国工作的美国企业界领袖人物。

凯西还没完毕。他又让这个新扩大的、杂交组织与国内联络处（DCD）联姻，这个处有一个国内学术界的庞大网络，这些人都是各专业的国际知名学者。作为某种内部超级机构的国家情报收集处，它承担的新任务是造访那些掌握外国企业和政府最新情报的著名美国实业界人士，这个主意是要扩大行动部的职能以反映凯西所认为的变化中的世界秩序；苏联仍然重要，这是确实的，但是它只是许多情报目标中的一个，也不是关键所在。

像创造反恐怖中心一样，凯西宣布赋予国家情报收集处在行动部内部的巨大新权力，这立即在行动部官员中引起争论。苏联情报收集处处长特德·卡尔森，这位夸耀自己的浓密的亚麻色胡髭的 6 英尺大汉（他是情报局中终生以苏联集团作为工作对象的那些人中的佼佼者），对凯西的设想特别感到疑虑，他对同事们说，这位情报局长正在冲淡 40 多年渗透经营的对苏工作。卡尔森，他曾协助把在六十年代末期与苏联谈判合同事宜的一些第一流的美国企业界人士招募到手，对把他的工作范围扩大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有效性表示怀疑。他的处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官员有关于苏联的专门特长。

卡尔森的怀疑态度得到处里一批高级间谍活动官员的赞同。他们说，中央情报局所需要的是一个小规模、工作目标集中在美国商人身上，而不是要一个内部的超级机构。凯西不考虑这些抱怨。他争辩说，获取情报的装备改变得这么快，中央情报局难以支持去训练新一代的地区分析官员，他们的唯一目的是描绘全世界的经济和商务发展倾向图。他还说，中央情报局不需要地区性专家，它亟需出色的行动官员、招募来的特工人员、搜集情报，还

有就是执行行动计划，比如说，在约旦执行行动计划同在苏联执行，并没有什么不同。

由凯西说了算。国家情报收集处的新任务将是对新技术进展、工业、生产力、制造业产量以及对外国企业界领袖人品的透析，都作出详细的评述。凯西强调，情报工作能够提供美国所能找到的关于外国潜在力量的最佳战略情报。

凯西关于国家情报收集处的宏伟计划，不令中央情报局的最上层人士感到吃惊。特别是考虑到他曾是纽约的一名律师，毕生与企业界结下不解之缘。凯西置身在美国企业界人士之中时，感到轻松自如，他时常迅速抓住一切机会同商业集团谈话，他有一个特别的诀窍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判断受到国家安全部门的极大重视，而同时他们也能从为他们国家干点侦察工作中得到好处。他万变不离其宗地让他的听众感到，他们听到的话是他只对自己说，别人不知道。他还不只一次用戏剧性的夸张向那些生意人讲些无害的趣闻轶事，显示他是内幕消息的知情者，他用这种手法既可解除对方防范之心，又奉承对方使他感到满意。他经常重复他喜爱的一句话，那就是中央情报局做的是“情报生意”，中央情报局也必须好好向生意人学习。他向生意探求情报，与此同时他的举止使他们感到他是一个大间谍。（他的这种戏剧化的表演常常使他受到新闻界的严厉攻击，说他泄露了秘密情报，好像他知道企业主管们不会那样不谨慎。）

尽管情报局内部反对他的国家情报收集处的创造性做法，凯西关于加强中央情报局与企业界联系的决策，并不一定就是标志中央情报局政策的一个革命性的转变——至少在起初时不是。从态度友好的美国企业家们那里收集情报，是从情报局最初日子以来的标准工作方式。并成为情报部苏联分析室评估苏联动向的一项制度的最有效手段，行动部的许多盘问变节者所得材料都由苏联分析室进行仔细研究。不过根据前行动部头子约翰·麦克马洪所称，这个进程往往变得漫无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行动官员倾向于遇事退缩不前，更不用说中央情报局插手工业间谍这事了。此外，情报局向来对来自美国企业界的情报持谨慎态度。正如麦克马洪对一位记者说的：“……这些该死的傻瓜醉心于出国去搞特务活动。他们常干一些得不偿失的事。”

凯西了解他的新政策的一些缺点，不过他相信它是利大于弊。为维护他的决定，他常谈到老的苏联情报收集处的很多次成功的情报奇袭行动，他争辩说如果他们在各处都如法炮制，中央情报局就更能应付各种奇怪的和异常事态了。凯西的前特别助理赫伯特·迈耶解释说：“比尔·凯西嫌恶心血来潮，他要中央情报局对某些事情要尽一切可能多加注意，他把这看作是中央情报局的基本职责。美国的生意人不能单独做这些事，但他们能提供帮助。”

此外，对凯西来说，新翻修过的国家情报收集处就像一个预警系统，是中央情报局使威胁美国安全的措施暴露的一种办法，同时，这种办法还可以提高中央情报局在美国企业界中的声誉。凯西甚至对他的一位最高级助手说，通过许多“现代的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tRer, 1834—1899，美国著名少年儿童读物作家。——译注），来实施把情报局置于公开的正统管理政策之下来实现计划的扩展，中央情报局还会从中间接得到好处。

不管凯西的最终意向是什么，他的初衷是使新的国家情报收集处启动，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八十年代中期，这个处是情报局内发展最快和最重要的单位之一。它的公开搜集情报的本领确属上乘，它在美国与企业界联系的网

络，扩大及于在中国、北非和中东工作的企业主管。在 1984 年时，中央情报局的 24 个国内的单位已有了与美国企业家联系的更多的现成途径，现在更形扩大以满足凯西的需求。同时，在兰利国家情报收集处使自己与秘密工作的特工传统更为贴近，它在秘密工作部门往往只被看作是一个附属品。凯西强调利用美国企业主管作为情报来源的新观点，贯彻到中央情报局的上上下下。

情报局与国际企业界的联系还在其他一些方面得到扩展：在 1984 年中期，150 多家美国公司为海外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提供掩护，比两年前增加了近 40%，但到 1984 年底，在关于凯西扩展国家情报收集处的争论终将平息之际，他又增加了另一种让人感到关切的折磨人的事。他提升近东处副处长、主管南亚行动的詹姆斯·凯利推行一项国家情报收集处的计划，这项计划十分危险地接近于招募美国企业界人士向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

凯西委派凯利领导这个新处，是因为凯利具备近东事务的专业知识，还因为他相信这一委任将表明这项计划在情报局内具有最优先地位。一名中央情报局官员坚决认为，“这是一项肯定无疑的间谍计划。凯西的委任使这个处变得十分具有挑衅性。凯西要不择手段地去实现它。他的想法就是招募在海外工作的企业界人士为你提供情报。这个想法就是得到情报，并把情报转为行动部的行动任务。”

换句话说，国家情报收集处不再单纯管理情报搜集工作，现在已从事间谍活动。在 1985 年初，8 名中央情报局办案官员负责训练和招募在国外的生意人作为情报来源，不久，国家情报收集处处长到开罗去招募在埃及工作的企业主管作为秘密情报来源。

1986 年 7 月，凯西在对一批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企业主管的一次讲话中，他公开提及中央情报局的一项新任务——利用美国人充当情报来源，他说：“除了我们订阅的商情报道，我们购买的出版物，我们收到的和汇集的资料汇编，以及我们在海外的人民之外，我们还要倾听企业界要告诉我们些什么。我们发现美国生意人——不论他们是制造商、银行家或是日用品商人——都打算和愿意同我们分享他们的深入观察所得，从欧洲和日本的高科技发展，到第三世界的债务问题，到苏联的谷物购买，还有许多其他问题。”

凯西的这番话是十分乏味的，但是它表明当他出人意料地承认情报局开始一项将加强与美国企业的联系的新计划时他在想些什么。凯西说：“我们已改组了我们负责与企业界接触的组织，我们还奉献出我们最优秀的人才——人数很不少——致力于此，……我们把这种关系看作是完成我们使命所必不可少的，我们要保证这种关系仍然是强有力的。”

1986 年晚些时候，国家情报收集处再一次扩大了它的任务。这一次，凯西指示这个处招募外国商人搜集外国工业先进科技情报。中央情报局第一个目标是埃及。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回忆道：“这一步骤十分有争议，阿拉伯行动组的人反对它。克莱尔·乔治也反对它。情报局内大部分稳健人士认为它走得大远了，超出了我们的任务范围。争论点在于，我们已经授予我们开罗站站长以权力，对我国公司与之竞争的外国公司进行间谍活动。它离开了保留的权限。”

这种对国家情报收集处任务的私下的争论，最终使得凯西原来的计划发生倒退。这个处转而采取对从海外归来的美国企业主管采取询问的传统做法。它的任务又公开化，也没有争议。但是在那允许积极招募美国和外国企

业主管充当中央情报局特务的短暂时间里，国家情报收集处对情报局的情报行动产生显著影响。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凯西死后，这个计划并没有产生结果，而是威廉·韦伯斯特从此计划中获益最大。

1988年6月24日下午，美国海关官员截获一批运往开罗的重432磅的碳纤维货物。这件高科技物体是用来作远距离弹头外层和火箭发动机喷嘴的材料，也用来作为“偷偷摸摸”飞行的逃避雷达的飞机涂在外层的吸收剂。这批包裹在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装上一架C-130型埃及军用飞机。目的地被近东处的官员们叫做“开罗—南方”，它是中东武器主要的进出转运点。由于上述原料是发展远距离弹道导弹所必需的，因此受美国出口法的严格限制。

在截获这批碳纤维前24小时，加利福尼亚州圣克莱门托地区法院提出了一项刑事控告，指控两名埃及军官与一名埃及出生的火箭专家密谋将高级技术装备出口到开罗。调查终致逮捕3名嫌疑犯：詹姆斯·赫夫曼，达因电视公司的美国市场代表；阿布德尔卡德·赫尔米，被认为是火箭推进器方面专家的美籍埃及人；另一个是赫尔米的妻子。

正当美国海关把这件事当作他们持续进行的阻止将美国技术非法转移到国外的努力的一次重大胜利而洋洋得意时，对案件的调查，如果没有凯西加以扩大的国家情报收集处所搜集的情报，就不能圆满完成。在范围遍及4个大陆的行动中，国家情报收集处获悉埃及、阿根廷和伊拉克高级人士，据说还包括埃及的国防部长阿布德勒·哈利姆·阿布·加扎拉，都涉及一项国际阴谋，去购买（如果必要就去窃取）复杂的火箭部件。尽管出现更多的干扰，得到的情报显示有一批西方公司从事秘密将禁运出口的先进的技术资源偷运到第三世界国以供军用。这些证据的细节令人目瞪口呆：利用在华盛顿、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开罗、莫斯科的代理人和巴格达、埃及和伊拉克的官员，成功地收集制造一枚阿拉伯导弹所必需的材料，它在中东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都能够安装上弹头。一位近东处的官员说：“这将是一枚该死的导弹，它将改变一切。”

根据国家情报收集处得到的情报，制造一枚阿拉伯导弹的计划实际上于1982年早些时候已在南美开始，是在阿根廷军队被英国人逐出法克兰群岛之战后不久。阿根廷政府为其失败感到羞辱，乃建立一个提供适当资金的导弹发展计划，其目的是制造在南大西洋打击英国海军的武器。可是阿根廷由于它的捉襟见肘的支付危机，不可能提供足够的资金，计划陷于困境。不过，在1984年10月，这个计划得到它所急需的支持。那是在埃及军方领袖不动声色地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签订了一项秘密的议定书，由阿根廷、埃及和伊拉克合伙进行相等于美国潘兴”式中程弹道导弹的阿拉伯导弹的设计、制造和部署。（这些导弹阿根廷人称之为秃鹰”式，埃及人则称之为巴德尔2000式。）这项发展导弹计划从伊拉克得到32亿美元的注入而得以大步启动，作为此计划的一部分，这两个中东国家同意从阿根廷购买以百万美元计火箭发动机固体燃料和火箭燃料，以偿付阿根廷为此计划提供的技术知识。同时，合伙人还将帮助阿根廷人纾解其严重经济问题。

中央情报局是在八十年代中期，首次从一名在中东工作并与一些埃及国际工业高级官员交上朋友的美国生意人那里获悉此一非法行动的。（这一案件成为对这个新改组的国家情报收集处扩大了的任务首次重要考验。）很明显，在起初，这位企业主管的情报有多大价值还模糊不清。国家情报收集处

请他再回开罗，在为时两年中搜集这个计划的更多的情报，他得到的情报显示阿拉伯国家“疯狂地”进行发展一枚中程弹道导弹的工作，而且“接近完成”。这个生意人的埃及情报来源证实最后阶段使用这一窃取来的技术的是伊拉克。

在阿根廷签订了这项秘密协定之后，埃及和伊拉克开始购买欧洲的先进技术，它将为三国提供制造一枚导弹的基础结构。在欧洲，埃及特工人员接近来自西德最大空间公司梅塞施米特—伯尔科—布洛姆的科学家们，要求他们提供对这一计划的全面指导。有利可图的协议最终使这家公司赚得 2.5 亿美元以上，大部分是由伊拉克政府支付的。另一家名叫康森的西德公司，据说同意供给两百名技术人员帮助训练伊拉克的科学家。超过 12 名的梅—伯—布公司的高级导弹专家也受雇为此计划工作。为梅—伯—布公司工作的另一家名叫特兰斯特克尼亚的辅助公司，帮助埃及和阿根廷的技术人员重新设计他们的原始的火箭发动机。特兰斯特克尼亚公司还实行一项计划，帮助把实验室装备用船送到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附近的伊拉克秘密研究所萨德—16 去。与此同时，埃及待工人员还接近意大利巨大的菲亚特公司的一家辅助工厂 SNI-A—BPD，它成为向伊拉克输送装备和技术的渠道；另一家法国公司 CFF·汤普森，它担任发展导弹的制导系统。

在 1986 年时，阿根廷—阿拉伯导弹计划是世界上发展最快也最具危险性的军事项目之一。一名近东处官员回忆，“情报局中对阿拉伯人能够干得十分成功，并对以色列人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深感担心，他们从不同国家获得不同种类的技术，然后拼在一起。他们用汤普森公司的制导系统技术。利用德国梅塞施米特公司的火箭推进和其他的技术。这将使阿拉伯拥有他们前所未有的更远的距离和更大的负载能力的物件。”

这个计划的目标是为埃及和伊拉克制造 200 枚导弹，射程至少为 600 英里。埃及和伊拉克早些时候曾购买过苏联的飞毛腿—B 型导弹——伊拉克甚至曾不那么认真地考虑在苏制比较原始的飞毛腿—B 型导弹上拼拼凑凑装一种尖端的阿根廷发展制造的锥形鼻。巴德尔—2000 型将是在中东部署的第一个这样的武器。当它装上核弹头，那就将改变这个地区的脆弱的均势。

1988 年初，中央情报局获悉在开罗工作的美国商人关于埃及在三国导弹协定中的作用另外的报告之后，国家情报收集处把这密谋的最后一些片断情报拼凑在一起。最使人警惕的消息是，埃及在开罗郊区修建一所制药厂，它很容易地就能转而生产化学武器。由好几个美国企业主管提供给国家情报收集处的详细情况表明，一些科学家和化学材料正在去往开罗以北尼罗河上的阿布扎巴尔城。（据政府官员后来查明，这些化学器材原料等是由一家名叫克雷普斯的瑞士商号提供的。）这个新的地点很容易侦察出来，因为它就在好几家美国制造厂附近——包括通用动力公司属下的一家维护和修理美国 M—1 型坦克的工厂，以及由强生公司经营的一家联合投机性公司。

根据这些报告，海关开始追踪在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工作的埃及官员。在 6 月，海关断定，这伙埃及裔美国人是在企图把尖端的导弹锥形鼻技术偷运出美国。

在 1988 年 6 月的拘留事件之后，国家情报收集处的官员（以及在行动部工作的近东事务专家）承认，他们揭露出的国际大阴谋，造成了极端爆炸性局面，它威胁到卡特政府任内埃及和以色列达成的脆弱谅解，使之完全破裂。他们击破的远不仅是一件简单的非法出口管制物品阴谋，这是一个以改变中

东均势为目的的大规模行动。埃及军方卷入这项阴谋被认为是他们反对他们的政府与特拉维夫关系的发展。军方长期以来认为埃及需要得到自己的导弹能力，以抵销以色列生产的高度精确的耶利哥型导弹，这种导弹是一种进攻型武器，很容易地就能达到开罗。

就以色列而言，它也要秘密策划破坏埃及制造这种导弹的努力。例如，中央情报局官员断定那件暗杀埃克哈德·施罗茨（一家资助埃及发展导弹计划的瑞士公司的总工程师）未遂的汽车炸弹事件，可能就是以色列特工人员干的。（一个不为人所知的亲伊朗集团“伊斯兰卫队”声称是他们干的，但是情报局官员对他们一无所知。这个集团所宣称的理由——是为了惩罚帮助伊拉克的企业主管——被否定了。）

国家情报收集处加以研究过的情报证实，阿拉伯导弹计划是由埃及和伊拉克政府最高层人士指导实施的。有证据表明，穆巴拉克总统肯定知道这项阴谋。一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穆巴拉克知道在干的事，他肯定知道。我们实实在在地对他施压，要他停止干这件事。以色列也确实确实为此事而心烦意乱。我听见他们来对我们说：‘嗨，什么戴维营，到底发生了什么该死的事？我们可不希望在我们边境上有疯子。’”这位老资格的情报局官员补充说：“我们说我们将对这件事采取措施，我们已经做了。”

埃及和阿根廷官方都否认他们的国家卷入发展秃鹰型导弹作为进攻性武器的事件中。埃及人在一项正式的新闻声明中，把出口这些物资的企图轻描淡写为“不过是一种程序性的错误，对这种能够在美国市场上公开购买并用于非军事领域的物资，忘了申请出口许可证……。”阿根廷则声称它发展秃鹰型导弹，是为了给予南美洲以它的第一枚导弹。

1988年6月海关拘留事件不过是中央情报局对追踪国际导弹卡特尔发生兴趣的开始。1988年整个夏季，国家情报收集处继续调查从一些国家转移技术到埃及和伊拉克的活动。该处发现的证据使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分析家相信，萨达姆·侯赛因正打算建立一个导弹基础设施，这个设施是如此尖端，足以使他成为中东的最有权威的领袖。例如，情报局发现西德梅塞施米特公司为伊拉克提供模拟实验室和指挥控制部件，以及先进的技术专门知识——简而言之，一切的一切，可以用来建立一个令人生畏的导弹发射能力。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证实，“1988年夏天，我们关切的头号问题就是阿拉伯导弹。我们认真地追踪其发展状况。这是我们优先的收集对象之一。”

到了1988年底，中央情报局断定，伊拉克已有将近50台飞毛腿导弹机动发射架，作好对付任何威胁的部署准备，以色列是其明确的目标。

直到两年多以后，在海湾战争期间，全世界都知道了萨达姆·侯赛因的导弹计划并不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威胁。不过，在1988年，他的未来可能意向被当时发生的海关拘留事件丑闻引起的激情所遮掩。公众舆论当时更为关心的是在华盛顿埃及大使馆外边发生的国际阴谋，以及有牵连的高层埃及官员。尽管埃及坚决否认，阿根廷又坚持说它不过是发展卫星能力，美国政府仍私下向穆巴拉克总统致送一外交函件，要求他的国防部长辞职。穆巴拉克不同意。另一方面，伊拉克则没有对它卷进输入尖端导弹技术的指责作出公开反应，也没有就伊拉克海外最高级官员是否直接参与此项阴谋表态。不过，一位知情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则坚持认为伊拉克是个重要的角色。他说：“埃及人不过是伊拉克的中介人，萨达姆·侯赛因支付全部费用。”

1988年6月的拘留事件证明威廉·凯西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就是中

中央情报局孜孜不倦地从企业主管们那里取得情报——这些人长期以来在苏联处于得十分出色——可以卓有成效地应用在国防问题上。拘留事件终止了关于国家情报收集处作为秘密行动部有价值的收集情报的臂膀的一切遗留的怀疑。比这个计划扩大中央情报局收集情报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情报局的任务和加以优先考虑的，出现了信号的明显转移，这种转移由凯西开始，并由韦伯斯特继续。

中央情报局从一个从事评估美国的基本的冷战威胁者苏联的官僚机构，转到了一种既是多种多样又是颇有争议的任务上。情报局企图成为情报活动的中心以及在不几年以前还敬谢不敏的特殊领域中的活动：特别是在经济情报、反恐怖主义和反麻醉品等领域。这一艰难的转变在情报局的许多中层雇员中持续不断的抱怨。在他们看来，作为有执法官员背景的韦伯斯特正在强加给中央情报局。事实上，是凯西而不是韦伯斯特把情报局合作的大门向其他美国官僚机构开放，这似乎没有被当回事，凯西是个传奇性人物，韦伯斯特是联邦调查局的前首脑。

韦伯斯特的一些亲近同事也未能逃脱激烈的批评。1988年12月理查德·斯托尔茨被委任为行动部新主任，他是苏联处的资深老干部，本人是个好人，可是不能干。不像他的前任克莱尔·乔治，斯托尔茨被看作是个四平八稳的行动部头头。他被看作是对如何使情报局能够在华盛顿生存下来更感兴趣，而不是想怎样使情报局成为政府行政当局的积极的助手。他的副手托马斯·特威腾，看来与斯托尔茨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一名领导机关的坐办公桌的人，很有限的外勤经验，造就了他成为一名只会讲些不关痛痒的套话的官僚。行动部的真正有实权的人士业务部门官员和各处负责人，感到他们深受韦伯斯特改革之害。中央情报局第三代的官员，他们曾使情报局渡过艰难的特纳岁月，后来站在他们下台的局长凯西一边，也无力扭转这个趋势，特别是因为他们中的佼佼者（德韦·克拉里奇、乔治·凯夫、约翰·麦克马洪、乔治·劳德和爱德华·尤赫尼维奇）最近都离去。

出现的这些局面，似乎让人感到行动部的权力，它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它的声望和才能，都已从中央情报局消逝。不再有任何怀疑，行动部遭到了攻击：从国防部的高级军官集团（他们想夺走情报局对准军事部门情报的控制权），到国会——它要使中央情报局的各种建议都陷入法规律令的混乱中失去作用，到白宫，在这里的政治权术使情报局的分析工作造成极度混乱。认为中央情报局已丧失其影响的想法，更因一些未可预见的因素而加强，作为对美国安全基本威胁的苏联的衰亡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认为在中央情报局所做的与它需要的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的认识，最好地标志了在1988年后期使情报局感到苦恼不堪的境况。这种缺乏指导的处境来得真不是时候：这个机构处在它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孤立无援的境地。情报局似乎也回天乏术。40年来使中央情报局具有重大价值的一件——它的保守秘密和远远避开公众的注意开展行动的能力——现在影响日益受到削弱。在乔治·布什就任总统前夕中央情报局的有讽刺意味的可悲地位是，它的行动能力被如此“分隔”，它的秘密行动已几乎瘫痪。或者正如一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所说的：“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情报来源和方法是那样具有秘密性，因为如果我这样做那就是把情报来源和方法告诉你。我不能这样做。”

结果，华盛顿的一般印象是，情报局为它自己而积累情报。一名国会情报助理说：“中央情报局为与人分享情报而吓得要死，因为这意味着泄露秘

密，情报局是不愿这么做的。”即使在政府机构内部，也是对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不屑一顾的。情报局最初的显示自己显赫地位的标志——为总统提供及时而精确的情报——已经声名狼藉。一位前里根政府的高级官员还记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们面对中央情报局文件时那种丧气感觉。他说，“我们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回答，什么事都被打了折扣，中央情报局同它自己玩政治手腕。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惹麻烦，并说：‘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其结果对情报局人来说是可怖的：重要的政府官员们开始相信情报局专家们知道的并不比别的任何人多。

令人惊奇的是，一大批中央情报局官员，特别是身居高位的高级官员同意这些评价。为了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在凯西任期临近结束时，派出了一个雇员工作组到政府机构去了解政府希望要什么样的情报工作。首先要询问的问题正是要得到中央情报局在行政机构内部未来脆弱地位的暗示，情报局知道它的任务应该是收集情报。可是不知道收集什么样的情报。征询意见证明为一次令人沮丧之举。一位退休的前高级官员反映，“我们派出人员与[使用情报]的顾客交谈，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界定人们需要什么。道理很简单，我们需要知道这是否我们正在干的工作。因此，我们要问，‘你们需要我们收集哪类的情报？’咳，中央情报局发现在很多情况下，政府机构并不知道他们要情报局收集什么样的情报。他们竟对他们究竟需要什么毫无想法。你给什么他们就要什么。他们就靠上了它，而且说，‘多给我一些这样的情报，你们继续这样收集吧。’有时他们并不真正需要它。可是他们甚至并不知道他们不需要它。天知道如果我们不能使用它，我们还收集情报干什么？”

凯西解决危机之道，是开始把使中央情报局与政府其他部门隔离开的墙推倒，并使内部情报单位现代化，重新规定国家情报收集处的任务和建立反恐怖中心就是两个这样的改变。尽管有其早期的成功，国家情报收集处与凯西真正所设想的比较起来还算是温和的：他心中想的是建立一个情报单位，有朝一日能从事国际性企业间谍活动。一个支持凯西的人说，“日本人早就这样干了。‘宪兵队’（Kampetei）从来就是一个商业间谍组织。这就是日本人过去干得十分出色的东西。所以现在他们说，‘好啦，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打破了“宪兵队”，因此他们现在没有一个这类谍报组织了。’不过，恰好不是这样。他们不过是重新作了配备，现在是设立在他们的公司内。他们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国外情报组织。”

反恐怖中心是凯西新计划的样板，他希望它将会止住中央情报局丧失权力的趋势，并在政府机构内部重振声誉。他预见多种的情报单位的一系列的合，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使用中央情报局辛辛苦苦收集来的情报。反恐怖中心的真实目的也是政治性的 凯西亟欲推倒 40 年来中央情报局在自己周围设起的使自己处于官僚式的孤立境地的不信任壁垒。他还想要重新安排兰利的权力中心。

在布什就任总统前夕，中央情报局仍无指导原则可言。它仍不能行使它曾拥有的权力。层出不穷的辞职使它士气涣散；一个变化中的世界的需求使它不知所措；分享情报问题使它内部分裂；领导它的是一位经验不太丰富的局长，他在行动部内其他重要官员之间日显孤立。对布什来说，它一定同 1976 年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他得再次继承一个在危机中的中央情报局。

布什重新委派韦伯斯特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似乎使这一职务恢复了生气。在 1989 年 1 月总统就职的整整一个月中，韦伯斯特频频在公共场合露面的次数，比他整个任期任何时候都多。韦伯斯特是在提高他的形象，以便使他自己看起来对布什的新班子颇有价值，并借此强调他要狠抓情报问题。这个策略起了作用：韦伯斯特比起以前来显得更有信心，也更愿意负起领导中央情报局的责任来。

但是他这种比较高的形象，没有使得情报局一般工作人员对他的看法有多少改变。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回忆说：“关于他的开玩笑的话无时无刻不在流传。当我们听说他在某些事情上干得不错时，我们认为他取得的成就就他与像杜勒斯或麦科恩这样的人物比较起来，不过是刚够平均线的标准。”

这一评论看来过于苛刻，特别是权衡刚在布什就职前不久对韦伯斯特的巨大压力更是如此。最迫切的事情是马修·甘农之死及紧急查出爆炸泛美 103 航班飞机的恐怖分子。中央情报局还加班加点整理不断增加的使人焦虑的情报，报告显示穆阿迈尔·卡扎菲在利比亚建立化学武器工厂的计划接近完成。这座建立在交叉路口城镇拉布塔的工厂，具有生产武器等级化学品及尚未辨明的毒气的的能力。关于拉布塔工厂的报告，自 1988 年 10 月以来引起即将离任的里根政府的极大焦虑。

中央情报局是从一个外国政府内部一个情报人员来源那里得到关于该化学工厂消息的，这在近代历史上实属罕见的事例。一位在意大利工作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是从卡扎菲政府内部一名极有价值的人士那里得到这个化学工厂的消息的。当里根政府在几个月之后首次公开这个消息后，对卡扎菲施加了要他关闭该工厂的压力，利比亚的这位领袖派他的外交部长到罗马去，对美国在意大利设置的军事基地表示强烈不满，这个基地使的黎波里处在被打击的距离之内。根据一位来自中央情报局方面的目击者所说，利比亚外交部长“痛骂”他的意大利对手，并且声言利比亚宣布“永记意大利殖民主义哀悼日”。这位利比亚人还宣布对的黎波里与罗马之间恢复关系的计划加以控制。这是对美国施加予卡扎菲的压力的温和反应，但是慢慢升温的危机势必恶化。

1988 年 10 月 28 日，在里根总统 8 年的任职行将終了之际，中央情报局收听到卡扎菲的一次电视讲话，谈及拉布塔工厂。卡扎菲坚决否认利比亚在生产化学武器，说该工厂是一家“药品制造厂”。

同一周，国务院送了一份报告给中央情报局，该报告称卡扎菲很想再次伺机与美国作军事摊牌以提高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和影响。近东处的最高级官员们决断，形成的局势远不只是卡扎菲的外交姿态；10 月底发自 KH-11 卫星的对准拉布塔工厂的照片精确无误地显示，利比亚的领导人在急不可待地朝生产供贮存的大量化学武器方向努力。

一份令人胆战的国务院情报在 10 月 28 日送到中央情报局，报告表示拉布塔工厂对卡扎菲是何等重要。一份高度机密的报告称：“卡扎菲对美国指控其化学武器工厂一事感到不安。利比亚空军宣布拉布塔为禁飞区，并警告所有飞越其上空的飞机将遭到射击。据特别情报部门的分析，他改变对意大利的态度似乎是在自行拆台，尽管他可能认为贝蒂诺·克拉克西总理和朱利

奥·安德烈奥蒂外交部长打算推迟预定的访问。”

中央情报局从11月初开始，有目的地在欧洲、加拿大招募许多利比亚籍特工人员，期望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有关化学武器工厂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官员也纷纷涌入马耳他，这里是进出的黎波里唯一转换站。到月末，据一位近东处官员说，情报局已得到足够的情报证实该化学武器工厂“在1989年仲夏”将可开工生产。这一日期给了情报局以充分的时间去拟订一个摧毁该工厂的计划。

为加强对卡扎菲的压力，担任总统职位只剩几个星期的里根总统，在12月18日把韦伯斯特和一批近东处官员召到白宫来，讨论他使该工厂解除武器的可能措施。在作汇报时，韦伯斯特向里根保证，中央情报局在利比亚有“无懈可击的情报人员”，他们已提供关于该化学武器工厂状况的“最佳情报”。不过，韦伯斯特承认，中央情报局还没有制订出对付利比亚威胁的除军事行动以外的可行计划。

里根乃与欧洲的领导人们联系，看看他们是否愿意支持对该工厂进行一次空袭。只有英国表示无条件同意，在1986年4月轰炸利比亚的那次事件中，玛格丽特·撒切尔告知美国总统，美国可以用它在英国的基地进行空袭。12月21日，也就是泛美103航班被炸毁的同日，里根对美国广播公司的戴维·布林克利说，他正与美国的盟国磋商可能进行的空袭事宜。

里根和当选总统布什两人在下个月间，都继续对欧洲盟国施加压力，要它们同意停止进一步向利比亚输出化学品，并支持一项摧毁拉布塔工厂的计划。最大的压力是冲着西德，它被验明是应对检控化学品运往的黎波里失败一事负最大责任的政府。开初，德国人拒绝承认对此负责。但是，在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及其继任者詹姆斯·贝克的压力下，德国人只好承认拉布塔工厂的化学品制造能力确是由于他们的技术帮助的结果。中央情报局在布什就职前夕在一份关于拉布塔工厂的秘密报告中点了三家西德公司的名，并捎带提了提第四家在伦敦的一家由伊拉克商人所有的公司。

直到布什就任总统两个月之后，中央情报局报告称，卡扎菲已停止在拉布塔工厂生产化学武器，至少是暂时停止。尽管如此，拉布塔危机在兰利引起了对从欧洲公司运出其他化学制造技术的担心。对这方面的关切，是韦伯斯特在1989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系列公开演说的主题。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没有告诉他的听众们，像这类的输出每天都由美国工厂在进行——恰恰是在中央情报局官员们鼻子下进行。

在1月中旬，韦伯斯特、斯托尔茨、克尔和特威腾，提出一项计划，意欲提高情报局在新政府中的重要性。他们的最初目标是要让即将上台的总统对中央情报局遍及世界的行动有一个简明扼要的全面了解。他们准备了一份总结美国情报计划的详细文件，要在布什上台后立即呈送到布什手中。这份报告是否扎实，关系重大。因为新任总统与情报局发生联系的非官方网络，以及总统本人对情报工作的经验，使得布什对中央情报局报告的内容，将作出比他的前任们更为严格检视。因此，韦伯斯特在12月中旬对斯托尔茨说，“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斯托尔茨并不需要人给他打气。就像他对一位刚退休的同事说的，在转换期间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就是为布什今后处理与情报局关系的舞台搭布景。斯托尔茨承认，中央情报局给予新总统的印象是至关重要的。

情报汇报在布什就职前后都在进行，但是没有产生人人所曾预料的那种

影响，布什是很严肃的，但是他在情报局多次最重要的汇报会上态度轻松，也似乎没有利用这些会议来对中央情报局或韦伯斯特的的工作作出评断。情报局的官员们如释重负。

中央情报局的高层官员很清楚韦伯斯特的弱点所在，但是也认识到继续领导情报局的重要意义。他提供了连续性以及对于诚实品德的极为必需的重要认可。他不喜欢让情报局卷进公开丑闻中。但是这些高层官员对韦伯斯特能否在新政府中长期干下去意见不一。一方面，韦伯斯特与布什友善而且得到他的信任，毕竟是布什在 1987 年使韦伯斯特当上中央情报局局长。他们知道在政府圈内，韦伯斯特被看作是一个软弱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他的这一特点也确实被利用了。新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是不愿意在中央情报局内有一个外交政策竞争者的。

另一方面；情报局内高级人员中对韦伯斯特将很快被取代的持续不断谣言感到关切，据信布什要使他新上任的政府享有清白名声。根据这一道理，韦伯斯特必须下台，因为在公众心目中，他被认为他有伊朗门事件的污点——即使把他置于用来表现净化情报局这一目的的地位也无不当。另外，据推测布什由于他与中央情报局的密切渊源，可能会通过一个中间色彩人物来指挥情报局。他们还争辩说，韦伯斯特之所以必被更换，还因为他被认为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不是一个职业情报人员。更为重要的是，韦伯斯特对政府的价值在于被认为他有接近布什的能耐。自从这位局长说他将不像凯西那样参加内阁会议后，他的上述价值就成为一个问题了。不能参加内阁会议势将不可避免地使他被排斥于总统内层圈外。

这些看法在布什就职前不久的一件传闻而得到加强，那时在中央情报局内盛传布什在决定韦伯斯特留任局长之前，曾要求另外两个人出任局长，但被谢绝。这两个人是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布什决定任命他担任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另一个是科林·鲍威尔将军，他仍留任在亚特兰大的美军司令部司令。不管怎么说，现在已十分清楚，布什肯定有兴趣改变一下中央情报局。如果说这是他在 12 月时的立场，那么这也是他在整个总统任期中的立场。看来很明显，韦伯斯特之所以仍留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唯一理由，是由于布什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出任此职的人选。

那种认为布什要亲自管理情报局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向韦伯斯特所作的不予干预他的工作的个人保证。这一许诺是在他们两人的一次电话交谈中作出的，时间是在他宣布韦伯斯特留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前一晚。布什要他“好好干”，并保证给予充分合作。如其所说，布什以愉快语调宣布他留任韦伯斯特的决定，而且对他所深知的韦伯斯特仍面临的挑战表示同情。布什再次肯定韦伯斯特曾是 1987 年担任此职的适当人选；他还强调他没有在近期更换韦伯斯特的打算。韦伯斯特感到这是他所需要的将他自己的行事方式强加于中央情报局的信任票。

尽管得到了来自当选总统的直接祝福，关于韦伯斯特即将离职的谣言在华盛顿仍继续流传。为了制止此一流言，中央情报局公共事务办公室在 12 月决定，突出布什继续对韦伯斯特的能力表示信任是十分重要的。（这是件有点古怪的动作，因为像这类赞扬，正确地说，应该来自白宫。）公共关系办公室继续强调韦伯斯特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干劲和显著的业绩；尤其重要的是，发言人强调他仍然是布什最为信任的顾问圈子中的一员。这种与布什的密切关系，很快就会一清二楚，那就是新政府的立即见效的试验结果。

例如，中央情报局公共关系官员詹姆斯·格林利夫，在过去两年中，用同样的措辞否定了几十次关于韦伯斯特将被取代的传闻。他一再重复说：“这位法官继续得到总统的信任。”为了支持他的说法，他总是加上一句：“你们知道，他们是好朋友。”

如事实所显示的，问题不在韦伯斯特是不是布什的朋友（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于他是不是布什的一位密友，如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科林·鲍威尔、罗伯特·盖茨、理查德·切尼，或是大约6名在总统当前圈子中的官员那样。这些圈内人都明白，越是与布什靠得近，就越有保住职位的机会。在未来的4年中，那些总统的亲信们，竟公然不惜把他人挤走。那么当前的问题，不在于韦伯斯特是不是一个好的情报局局长，也不在于他是不是总统的朋友，而在于他是不是乔治·布什俱乐部的一员。

这种猎取地位的手段，是韦伯斯特对1989年元旦《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勃然大怒的关键所在。标题为“中央情报局助理不服处分采取行动”的这篇报道，是有关韦伯斯特在新政府内部的地位问题上，布什的助手们与韦伯斯特之间有严重不和的第一个证据。文章报道了一件显为人知的私下争斗，那是在韦伯斯特与查尔斯·艾伦之间积累的不和引起的，艾伦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备受尊敬但又颇有争议的老资格人士。争执是由于韦伯斯特对艾伦在伊朗门事件中起的作用而采取纪律措施引发的。艾伦对韦伯斯特的决定十分恼怒，并采取行动要推翻它。艾伦首先是试图利用情报局内部的渠道对处分的决定进行申诉。当申诉失败后，他雇用了著名华盛顿律师R·詹姆斯·伍尔西，此人是华盛顿颇有名气的政治街头打手。碰巧，伍尔西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设计者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朋友。韦伯斯特知道，在他艾伦进行的斗争中，他也是在与新政府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对抗。

这可不是他想做的事。

艾伦-韦伯斯特的争执是情报局内普遍谈论的话题。艾伦，被记者迈克尔·瓦恩斯描写为“衣着朴素、语法精确、头发灰白的高个子”，一般都把他看作是个古怪的拼命工作的人，时常找点碴同上级争吵。凯西局长的一位前助理赫伯特·迈耶，描述艾伦是一位“有争吵癖”的“出色的人物”，“是一位深受尊敬但直言不讳的专业官员”。另一位高级情报局官员补充说，艾伦被看成是“不只是有点古怪，你简直就不知道他是何方尊神”。在他上班时，他看来几乎控制不了自己，整夜都在办公室里，对他的秘书们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一位以前同艾伦共过事的人回忆起“一次极不平常的72小时马拉松”。艾伦把自己关闭在情报局的一间办公室里，从事一项关于苏联外交政策的新研究，艾伦认为这项研究将实质上改变情报局对东欧变化的认识。

艾伦以他的与众不同的观点闻名，他的贬损者则认为他有巨大的自我中心意识。他有规律地对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评估提出挑战。实际上他自封为情报局的非官方监察人和常驻怀疑论者。很难再找到另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有像对他这样多的不同意见了——一些人认为他“足智多谋”，另一些人认为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政治动物”——但是没有人怀疑他是一位情报局暗斗能手。艾伦在擢居中央情报局高位的同时，能够始终如一地挡开批评意见。

艾伦受到的处分源自他未能在调查情报局卷入奥利弗·诺斯一案中，与主持此内部调查的韦伯斯特的人拉塞尔·布鲁埃默合作。1988年12月，当韦伯斯特的决定发表时，艾伦大怒，在情报局内部和在广大退休的情报局官员中的一些艾伦的支持者们，也感到恼怒。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艾伦依靠这

种支持，以及他对自己立场的正确性所持叭喇狗式的坚信不移，采取寸步不让的态度。（他甚至于对他的一位同事说，如果对他的惩戒处分不予撤销，他就离开情报局，“从而使这个国家实际上处于无防御状态”。）使艾伦的支持者们最感恼怒的，是韦伯斯特毫不考虑艾伦对中央情报局领导人们提出的告诫，诺斯中校是把出售给伊朗的武器所得利润转移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艾伦的同事们宣称，他们所遇见的最有预见性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就是艾伦，他们还举出他关于伊朗门事件的告诫来证明这一点。

艾伦首次卷入伊朗门事件是在 1985 年早些时候，那时凯西命令他与伊朗武器商曼努切尔·戈尔巴尼法尔见面。艾伦知道此人名声不佳，但他把这一任务当作一次挑战。在几次交谈之后，艾伦确认这个伊朗人有些才干，但是他过分夸大他作为一个情报官员的才能的意向，这使他受到干扰。艾伦思忖，面前的这个人深为有机会同中央情报局一起工作而兴奋不已。

当戈尔巴尼法尔建议一个精心策划的“花招”来套取卡扎菲的 1,000 万美元时，艾伦担心加深。这笔钱是卡扎菲出的悬赏，用来换取以伦敦为基地的利比亚反对派穆罕默德·穆加里埃夫的性命的。戈尔巴尼法尔建议由他和中央情报局一起伪造穆加里埃夫谋杀事件和葬礼，然后去领取卡扎菲的赏金来平分。奥利弗·诺斯被这个建议迷住，但是艾伦和凯西却对此举是否可行表示怀疑。艾伦尤其表示怀疑，他对一位同事开玩笑说，戈尔巴尼法尔是“发疯了”。根据这一计谋和类似事件，艾伦回复凯西，他认为戈尔巴尼法尔“浮夸”、“聪明”、“狡诈”，还是一个“骗子”。

艾伦并没有要求凯西向戈尔巴尼法尔关门。艾伦相信此人只要小心谨慎培养他，对中央情报局来说，还可以证明是有价值的。他也不怎么在乎关于此人不可靠的种种迹象，因为有过得硬的证据说明这一个武器商与伊朗政府内部的一些高层人士有联系。艾伦现在正担任中央情报局反恐怖行动的国家情报官员，还发现戈尔巴尼法尔还具有另一吸引人之处：他说他能查出以波斯湾国家领导人们为目标的恐怖活动阴谋，而这个地区是归艾伦负责的。

由于伊朗军售行动是秘密进行的，艾伦就有效地成了戈尔巴尼法尔的中央情报局“套中官员”。与此同时，艾伦仍是与奥利弗·诺斯联系的主要情报局官员。在行动进行期间的一些关键时刻，艾伦怀着关于伊朗军售的利润（诺斯称之为“剩余的钱”）被转移的疑虑，几乎要与诺斯面对面弄个明白，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艾伦把他的忧虑向中央情报局的指挥当局作了汇报。

1986 年 8 月下旬，艾伦对情报局情报部副主任理查德·克尔说，诺斯行动的某些事情让他感到困惑，说不定还会引起与中央情报局有关的问题。艾伦怀疑诺斯在经手一项秘密计划，计划资金来自有目的地高价向伊朗出售的美国重武器。艾伦的警告还不是有条有理的，因为他还不完全清楚诺斯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器事业的许诺，也不了解他对国会关于美国限制对外援助的憎恶。艾伦对克尔说，他感到忧虑。他警告说：“如果这个行动中有什么差错，那就会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克尔仔细地听了艾伦的话，接着就将艾伦的报告给了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罗伯特·盖茨，时间是在 1986 年 9 月的第一个星期。克尔觉得盖茨的反应很平淡。克尔反过来对艾伦说，他不认为盖茨相信他所说的。

艾伦采取下一个步骤，他直接向盖茨表达他的感受。在 10 月 1 日的一次会议上，艾伦强调，他认为伊朗军售行动可能会公开化。他警告说，没有拿到钱的武器商人如果拿不到钱，他们威胁说要向新闻界曝光。他不祥地补充

说，“我还不能证明它，但是根据指示器所表明的，我得出一种分析性的判断。武器款也许已经转移到了”中美洲反叛者手中。艾伦认为“这件事简直是在制造一场大灾难”。盖茨被这意想不到的事弄得大吃一惊，又开始大笑起来，因为它是太荒谬了，不过接着他变得很严肃，说：“哎，这可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10月7日，盖茨带着艾伦去见凯西。在会见中，艾伦重述了他的警告，并自愿写一份关于这件“麻烦事”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在10月14日完成，接着在11月份又写了第二份，说明一些加拿大商人“相信他们曾受骗上当，伊朗人付的武器款可能已被输送去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

这两名加拿大人是著名的国际武器交易商欧内斯特·米勒和唐纳德·弗雷泽，他们声称曾借给沙特商人阿德尔·哈肖吉1,000万美元，说卖给德黑兰的武器就能得到800万美元的利润。这笔钱划归戈尔巴尼法尔名下作购买美国武器和武器的零部件之用，这些武器即将船运到伊朗。预计将达几百万美元的军售利润将人人有份——戈尔巴尼法尔、哈肖吉、弗雷泽和米勒。可是伊朗拒绝付款，因为武器价钱太高。这就使得戈尔巴尼法尔（以及哈肖吉）负债1,000万美元。10月7日，弗雷泽的和米勒的生意伙伴也是凯西的从纽约时起的生意上的老伙伴罗伊·弗马克来见凯西这位局长谈关于钱的事。弗马克说，哈肖吉威胁着要将伊朗军售事件公诸于众，除非付他的钱，而弗雷泽和米勒也许已经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接触告知有关情况。

这一明目张胆地从中央情报局敲诈金钱的企图，是使艾伦最感困扰的发展。这也就是他为何迫不急待地向盖茨但陈其担心的原因。艾伦强调说，关键在于钱从伊朗流入反叛者手中。那些交易把中央情报局卷进了一个非法行动。盖茨对艾伦的警告作出的反应，是要中央情报局的总律师审查这次伊朗行动。盖茨后来对国会说，总律师的最后报告认为艾伦的申述查无实据。盖茨坚称他对这一事件之外的伊朗门行动的详情毫不知情，因为凯西或行动部首脑克莱尔·乔治都未曾向他报告此事。

尽管艾伦未能使凯西和盖茨就他的警告采取行动，但当伊朗门丑闻曝光后，他成了行动部的速成英雄。从此以后，他被普遍认为是一位把情报局的事业置于个人事业之前的官员。他的已有大量文件来证实的关于伊朗军售行动会“弄得不可收拾”的警告，使韦伯斯特对艾伦的惩戒处分在两年以后看来，往最好里说它是令人讨厌的，往最难听里说则是迫害。

韦伯斯特处理整个事态表现得极为拙劣，当《华盛顿邮报》刊载出艾伦对处分问题的申诉的原委之后，韦伯斯特这位局长在情报局最有实力的专业官员中的地位更加孤立了。在情报局的上层重要人物中艾伦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一些有权势的华盛顿官员也熟知艾伦。在他担任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近30年中，情报局的每一重要部门他都干过，尽管他从未领导过一个重要部门。在八十年代早期，他曾担任凯西的颇受重视的顾问，享有提高情报局反恐怖活动和反毒品能力的美誉。

艾伦的工作如此受到重视，在1986年，凯西委任他作为中央情报局的代表参加一个跨部门的项目，研究在核大战时怎样确保美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的安全。这个牵涉多方面的政府项目（COG）负责人称赞艾伦的人品才华，说他是情报层最出众的人物，并且确认他是中央情报局正在冉冉上升的重要人物之一。始终如一，艾伦仍然保持他那喜欢争辩和不随大流的名声，他的不那么尖锐的评论也往往是接近于不服从。一位他的同事引述他在COG的一次会

议所说的话：“我看，我们的工作是把宪法抛在九霄云外”。他是这个项目的副主任，这更加剧了他已经深思熟虑过的灾难临头的感觉。这一委派使他与奥利弗·诺斯发生接触，诺斯是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派来监督听取 COG 研究结果的。

在一些官员眼中，艾伦被看作是情报部的德韦·克拉里奇，此人是第一位分析人员-行动人员新的混合新品种，而为中央情报局内这两个部门所共同赏识。他们相信，艾伦将一帆风顺成为中央情报局伟大的情报官员伟人祠中的一员。

不过，在情报部，对艾伦的赞誉之词并没有很多的根据，一些直言无讳的分析人员尖锐批评他在伊朗事件的发端阶段，使自己的意见屈从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他们说，艾伦利用他接近凯西之便而提倡一条政治路线——可以给伊朗的温和派网开一面——，这条路线是与他们收集到的伊朗内部政治情况的情报是相左的。这些批评者宣称，艾伦玩白宫牌，办法是利用中央情报局顾问乔治·凯夫设法弄到的情报来支持他的伊朗计划。一位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分析人员解释说：“艾伦依据凯夫的不确实情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简报，情报部（克尔）阻止了这个程序。高级的伊朗问题分析家……对这一行动开始时完全不知情。”中央情报局内部对艾伦的不同看法，在扩大了情报局行动部与情报部的传统分歧的同时，却增加了艾伦作为一名积极肯干的情报局忠诚分子的美名，这是令人觉得自相矛盾的。

韦伯斯特阻碍一位以真诚闻名的谍报英雄这件事，他发现自己牵涉进了一场诽谤中伤的竞赛中，对手不仅是一批有影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而且还至少有面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潜在可能性。一位行动部官员说：“他们在行动部内围绕在这位北斗星周围，就好像是在保卫他们自己一样。”争论始于韦伯斯特发布对艾伦的惩戒处分之日，处分他的原因是由于他在伊朗门事件中以及在随后一年不断升级的事态发展中的作用。艾伦表示强烈抗议，不过当韦伯斯特明显地坚持其立场时，艾伦转而到情报局之外谋求撤销处分的办法。紧随《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而来的，显示出艾伦决心公开与韦伯斯特较量到底，不管它将是多么令人为难。韦伯斯特也清楚艾伦不是在虚声恫吓。出于艾伦的几乎是带有神经质的对权威人物的逆反心理，他为韦伯斯特设置下了圈套。一位中央情报局的老资格情报官员强调说：“艾伦知道韦伯斯特法官不会、不会、不会把对他进行处分的理由公诸于众，因此艾伦也愿意与韦伯斯特进行不事声张的解决，如果必要的话。”

有讽刺意味的是，艾伦对韦伯斯特的攻击，同韦伯斯特施加于他的处分同属不公正，在 1989 年 1 月认识到这一点的只有少数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由于艾伦不肯遵照韦伯斯特局长的要求，在情报局内部对伊朗门丑闻进行调查予以“充分合作”，艾伦受处分也是应该。在布鲁埃默听证调查中期，一份包含有关于以武器换人质行动报告的失踪文件，在艾伦的办公室内发现。艾伦宣称他疏忽大意地忘记了这些文件。（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嘲笑地对《纽约时报》记者迈克尔·瓦恩斯说，艾伦的办公室“看起来像一间杂货铺。”）尽管艾伦的办公桌上凌乱不堪，但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仍不把艾伦的辩词当真。他们相信，韦伯斯特的指示完全被当作耳边风，艾伦停止对高级情报官员采取蔑视姿态此其时矣。可是，艾伦的辩护者则认为，比起艾伦对情报局所作出的贡献来说，这不过是点微疵而已。一位替艾伦辩护的情报官员说：“艾伦向凯西、盖茨和克尔提出过警告，要他们注意奥利弗·诺斯其人，等

到韦伯斯特一来，就着手调查起艾伦来了。”另一位官员提出另一不同看法：“艾伦不是受到了韦伯斯特的威胁，那只不过是艾伦对他尊重不够。”

高级情报官员们希望艾伦目前的职位——提出预警的国家情报官——会缓和他那寻求争论的天性。他的任务是评估苏联迫在眉睫的攻击的可能性，并对其他迫近的危机提出顶警。这个特别的国家情报官职位，尽管它是十分重要的，可是实际上脱离了情报局的日常活动。韦伯斯特是很乐于让艾伦干他现在这个工作的。正如韦伯斯特的一位助理所证实的，“‘韦伯斯特的主意是让艾伦别碍手碍脚，让他待在他不能造成任何损害的地方，韦伯斯特也不必非要与他打交道不可。’艾伦的一位密友和同事、前联邦航空局官员和反恐怖主义专家比利·文森特也猜想，这个国家情报官的职务可能是让他处在人们注目的中心位置之外的一种办法。他说，“他们也许会以为艾伦在这个工作中只能睡大觉，被一群戴着厚镜片眼镜的苏联问题专家限制在那里，他们围着他计算导弹的数目。”

一位紧跟艾伦事业的同事同意这种说法：他被放逐到国家情报官这个职位上是特别用来对艾伦人品的警戒。这位艾伦的合作者指出：“查理在他那无所事事的职位上等待，等那三秒钟（指苏联发动导弹攻击所需时间。——译注）。可是看不出俄国人将攻击我们，他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并不呆坐在那里无所事事。他有兴趣研究每一件事情。”

艾伦重新界定他的工作范围，并且将他手下的小小工作班子与中央情报局各重要处的官员协作，扩大任务，以便包括对世界各地事态提出预警报告。他终于能够开始向他的上级和其他政府机构发出许许多多危及美国利益的警告——包罗万象，从单独的恐怖分子活动，到死气沉沉的第三世界解放运动。在1988年底，艾伦向白宫、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致送一月两次的简报，报告世界范围内的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事态。

尽管艾伦的支持者们用近乎敬畏的语调来描述他，可是他作为国家情报官仍在情报界树立不可有权势的敌人——甚至行动部的积极分子也有人指出他的警告，错的时候同他对的时候差不多。批评者们认为他的表现过露锋芒。他成了中央情报局内部心怀不满者的避雷针和骄傲自大的精英论者的象征。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解释说，“军方忌恨他的胆识，千方百计贬低他。”

艾伦经常与他的上级发生小小争执也成了他的一个令人讨厌的怪癖。在所有对他的批评中，对他爱好发布“狼来了”式的警告是批评最严厉的。用记者迈克尔·瓦恩斯的话来说，艾伦开始被认为是“卡珊德拉式的人物”（希腊神话特洛伊公主，能预卜吉凶。——译注），他的刺耳的争辩降低了他预警的效果。瓦恩斯引用布什政府一位官员的话说：“顶警是一个程序，而不是一个‘我预言’之类的事件。忍住不要表态，务求其准确无误，这是正确做法。动辄表态，没有个准，这不是正确做法。”

可是华盛顿律师詹姆斯·伍尔西认为他的主顾是一位“有能力和有尊严”的人物，对他的处分是不公正的，需要改正。鉴于艾伦通过伍尔西与布什政府上层的联系，以及公开这一事件本身所具有的危险性，韦伯斯特也不得不同意。从他的被高度吹捧的声誉，艾伦确非可以小看之辈。惩罚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没有效的。韦伯斯特知道，如果他还想得到中央情报局基层活动人员的信任，他需要艾伦站在他一边。不过，由艾伦施加的公众压力——以及中央情报局应被公开起诉的明显的威胁，这些自然是韦伯斯特应加考虑的重要因素。在《华盛顿邮报》报道了这次争论事件后不几个

星期，艾伦的处分悄悄地从他的档案中去掉了。就韦伯斯特来说，艾伦案件的解决使中央情报局历史上疯狂的一章——伊朗门丑闻，终告姗姗来迟的结束。随着这一结局，韦伯斯特感到他有了从新开始的自由，作为布什政府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来管理这个机构。

乔治·布什建立了在现代美国历史上最严密的外交政策班子。这一小群朋友们，在政府的核心中构成一个关系亲密的顾问班子，实际上掌管国际关系的每一个方面。这个政府最有权势的高级官员是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他是布什竞选运动中的总管，得克萨斯同乡，终生挚友。贝克是布什当选后几个小时内作出的第一项任命。贝克隐隐然成为决定中央情报局未来的一个重要人物，这是由于他是布什外交政策有巨大影响的设计师，还由于对政府机构之间的长期不和特别敏感，他认为这种不和导致伊朗门事件。贝克相信，如果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之间，能多用些时间推行里根总统的政策，而不是相互争吵不休，伊朗门丑闻就不会发生，他们的不和使政府瘫痪，给了凯西的机会去推行灾难性的对伊朗开放。贝克要求决不能让旧事重演，中央情报局的任何人都将不能向这位国家外交政策主要设计师的最高权力挑战。

另一位布什的主要顾问是在白宫外面的国会议员迪克·切尼。他在约翰·托尔没有能获得参议院的确认以后被提名为国防部长。切尼最初并不被认为是布什的内圈人物，可是新总统很快就仰仗他的卓有见地的见解。切尼之所以能获委任，很大程度上是他与国会的良好关系和在防务问题上的人所共知的保守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政府内部的权力不断增加，尽管他并不立即构成对贝克在布什顾问中独占鳌头的地位的威胁。在美苏关系方面，切尼属强硬路线派，而且厌恶国会提出的削减防务预算的要求。不过，切尼的毫不妥协的保守主义所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题，都会由于他的勤奋工作的名和在军事问题上的专业知识而得以抵销而有余。

在白宫内部，布什指派退休空军将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是布什政府中心的强劲的声音。他同切尼一样，也是一位在美苏关系上奉行强硬路线的人。斯考克罗夫特还是与共和党外交政策老派权势集团之间的桥梁，这些人包括围绕在亨利·基辛格周围的专业人员。（基辛格最近还是斯考克罗夫特在一家很赚钱的国际咨询公司中的合伙人。）由于斯考克罗夫特拥有在杰拉尔德·福特政府中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经历，在早些时候的新闻报道中，把他看作是贝克国务卿潜在的强劲竞争者。但是在布什就职后不久就批准国家安全第一号指令，制订了作出重大外交政策决定的新程序。指令规定了斯考克罗夫特担任权力有所削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角色。他将是在政府发生辩论期间竞争的各方的政策协调人和一位“诚实的中间人”。

前新罕布什尔州州长约翰·苏努努被任命为总统的参谋长（即白宫办公厅主任。——译注）。他的任务是充当这个政府的“硬汉子”角色，如《华盛顿邮报》所称的“带爪的猫咪”。苏努努为他所担当的角色而自豪。从他任职的第一天起他就被看作是布什的看门人，他具有与尼克松的参谋长H·R·海德曼相同的人所共知的冷峻的人品。苏努努很快就博得了党派斗士的名声，把坚持白宫政策和忠于布什放在一切之首。在他的傲慢自大和自我中心的态度中，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助手，愿意去做布什会感到不愉快的任何政治肮脏勾当。苏努努任务的一部分是要查明对白宫政策纰露的指责，

是否找到替布什班子当替罪羊的人而得以终止，像威廉·韦伯斯特，苏努努就把他看作是布什政府的一个薄弱环节。韦伯斯特在布什的内圈人物中没有什么支持者，被苏努努看作是从里根时代遗留下来的平庸之辈。

在布什上任的最初阶段令人惊讶的白宫人事任命是罗伯特·盖茨，他是乔治城大学哲学博士，前中央情报局专门从事苏联分析的老资格雇员。盖茨所具有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外交政策方面的履历，堪与布什周围的任何亲信相媲美。这位堪萨斯人在1968年进入情报局，开始的5年担任一名初级分析人员。1973年担任从事战略规划的助理国家情报官。1976年，盖茨初遇布什，在布什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期，成为他的崇拜者和卫护者。1977年盖茨曾短暂调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1981年盖茨出任中央情报局政策和计划办公室主任；他还被凯西任命为情报局的苏联东欧国家情报官。1982年他当上了情报部副主任。1983年担任有威望的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主席。不久，他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行政助理，1986年出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在凯西去世后，盖茨代理中央情报局局长职务，但未获参议院同意真除局长一职。此后，他忠心耿耿地担任韦伯斯特的副手19个月直到布什选中他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

凯西的前特别助理赫伯特·迈耶，是盖茨在中央情报局中早期的支持者之一。迈耶离职他就时告诉凯西，盖茨是一个有见识、尖刻而坦率的分析人员，是他可以倚重的忠诚的崇拜者。盖茨正是凯西在情报部中所要寻求的委以重任的那种人。迈耶在八十年代初对行动部的一位官员说：“我是一个特级盖茨迷，这小子前程似锦。”正值盖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已经拥有一人数众多的拥护者俱乐部之时，迈耶的庇护有助于使他在情报界一路顺风，并使他成为凯西的顾问小圈子中的重要人物。不过，凯西也了解，在行动部内部，盖茨不受信任，因此他尽量使他与行动部高级特工人员如德韦·克拉里奇和克莱尔·乔治等相隔离，这两个人对盖茨都心存疑虑。在八十年代，得到凯西和迈耶的持续支持，帮助了盖茨登上情报局最高职位的宝座。

盖茨得以进入布什的白宫班子中任职，在华盛顿开始都认为是对他的一种奖赏，奖励他在里根总统任职末期受到丑闻困扰时所作的牺牲，那时他十分得体地不参加角逐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位。但是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务比当时大多数观察家们所能理解到的有更重大的意义，因为盖茨是美国最主要的苏联分析家之一。当斯考克罗夫特在七十年代中期担任福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时，盖茨是他的苏联政策的首席顾问。他对苏联事务的广博知识和他的老练的政治见解，给斯考克罗夫特以深刻印象。布什总统也还对他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盖茨所表现的忠诚仍记忆犹新。在里根年代盖茨从情报局局长职位的角逐中退出的高姿态，更使他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他看来是担任斯考克罗夫特副手的最完美的选择，因为选中他，是布什的外交政策将集中力量赢得与苏联的一揽子的武器控制谈判的一个信号。

盖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次任命，是使里根政府遗留下来的由于伊朗门事件而招致的官僚主义式的破坏局面恢复正常。他被委派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副职人员委员会主任，这个机构是由政府各主要外交政策单位的最高助理人员组成。这是个很有权力的职位，它能保证使盖茨的意见得到总统的例行的关注。盖茨在上任后立即就关键性外交政策问题草拟出一系列文件。他很快就涉猎美国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从与在突尼斯的巴解组织举行对话（是在里根总统任期最末几个月开始起来的），到严密注视得到美国支持的

穆贾希丁游击队与苏联残留部队在阿富汗的日益增剧的恶战。盖茨还在斯考克罗夫特指示下对隐蔽行动进行监督。他还奉命拟制一份内部文件供布什用来指导中央情报局国外行动何者应维持，何者应废止。

盖茨不知疲倦地工作，在布什新班子中打上了他的印记。他对副职人员委员会的控制，使他得以在国家安全部门的心脏部位行使巨大权力。在布什新政府的最初几个月中，盖茨在中央情报局长达 20 年的经验，使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外交政策和情报工作问题上享有很重的份量。他的影响在白宫的禽鸟等级（指最凶的禽鸟可啄次凶的，次凶的可啄一般的……）。——译注）中的地位亦可反映出来。在总统举行非例行的记者招待会时，人们常常会看到盖茨站在斯考克罗夫特和苏努努身边，成为白宫的掌握大权的新三驾马车的一部分。从这种一望可知的信号中，很快就会明白盖茨的作用不止于充当斯考克罗夫特的助理而已。他实际上主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而让斯考克罗夫特充当国际关系方面的某种副总统的角色，并充当布什的“正式朋友”。从国家安全委员会体制开始以来，还未曾见到过一位副手有如此风光。尽管盖茨极少发表供报刊发表的演说和谈话（这要留给斯考克罗夫特或贝克），但很明显，布什重视他的意见，把他看作是一个有才华的外交政策博士。

有讽刺意味的是，布什的意见并未受到盖茨过去在中央情报局里的同事们的赞同。一大批专业情报官员私下批评凯西过早委派盖茨担任副局长。委派一个像盖茨这样的分析人员担任中央情报局的第二号人物，这也是不平常的。他先前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关系，以及他将分析人员与行动官员的工作混合成一体而引起争议的观点，也激怒了行动部高级官员。对他们来说，盖茨是一个“为自己树碑立传”的“自我宣传者”。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认为盖茨有“难以置信的野心”，他说，只有这种描述才能解释盖茨从一个情报部中级官员如流星般地擢升为情报局的第二把手，一个中央情报局官员说，“他在情报部也不过是众多博士中的一个而已”。并不是人人都像斯考克罗夫特和市什认为的那样吹捧盖茨是苏联问题专家。但是这些异见无伤大雅，因为盖茨得到凯西的支持——是凯西说了算。一个情报部分析人员回忆说，在一次简报会上，凯西“张动着嘴”听着盖茨“列举苏共政治局每个成员的名字，他们的选区、教育情况、党内背景，这一切他都没有笔记。就好像他曾经同这些家伙生活在一起似的。”

盖茨在情报部中的批评者们回答说：这种轶事是把人导入歧途。他们说，他在中央情报局内飞黄腾达纯属偶然。他们回忆，在七十年代早朗，盖茨作为一名苏联问题分析人员的事业还很不起眼，一个代号为“三角形”的俄国秘密特工人员的一份情报，使盖茨时来运转。这份来自“三角形”的情报是关于苏联与中国边境冲突的，其中有一些中央情报局过去从未接触过的原始情报。当时还是当前情报办公室的初级分析人员的盖茨奉命把这些情报进行综合处理，并将他的报告呈送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亨利·基辛格。

基辛格深为这份情报的价值所动——它非常适合尼克松总统正在推行遏制战略的胃口。他尤其对盖茨的洞察力感到震惊，这对基辛格决定寻求打开通往中国的途径作为对苏联施加压力的手段十分重要。从这点来看，得到基辛格和斯考克罗夫特两人保证的盖茨的前途是确保无疑的。可是，后来的事态证明，从那以后的盖茨在中央情报局中激动人心的上升，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中央情报局官员后来发现“三角形”的报告完全是苏联

编造的假情报。把这些情报传送到中央情报局手中，是要使美国情报官员相信苏联在军事上比它所显示出来的更强大。在 1977 年，当事情完全暴露后（在中央情报局切断与“三角形”的一切联系以后），为时已晚。罗伯特·盖茨已经扶摇直上。

盖茨的最负面的观点来自他的使人感到不舒服的自信和天生的保守主义。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他对凯西有消极影响，因为盖茨时凯西唯命是从百依百顺，哪怕他对任何事的本能反应即便是关于苏联影响的暗示也是如此。一个中央情报局的老资格人士说，“凯西想看到的是每棵树后都有俄国熊，而我们需要的是让某个人去警告他们不要轻举妄动。而我们做的却是另一回事，我们这位老兄给凯西的熊打气助威。他们两人是一丘之貉。”

首中央情报局官员戴维·惠普尔却另有不同解释。他说：“我是喜欢盖茨的。但是他是从另一种环境中来的人。他同那些一辈子都与情报行动打交道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在行动部中，对一位具有不同经验的人存有偏见。”

惠普尔的看法实际上没有充分表达中央情报局行动官员对布什的这位新的国家安全助理的不信任的逆反心理。在兰利，布什对这位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长的日益倚重，达到了对总统究竟如何对待整个情报界产生了怀疑的地步，盖茨的任命似乎是对中央情报局领导权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总统将依靠盖茨从他在白宫的办公室里来对情报局发号施令。

起初，盖茨凡事小心翼翼，除了强行介入一些事情外。在布什政府的第一次国家安全汇报会期间，他使劲赞扬韦伯斯特抓紧情报重大问题。在随后的汇报会上，盖茨时常向这位局长征求意见。韦伯斯特注意到盖茨的这种谦恭的态度，乃报之以为他公开辟谣，有传言盖茨曾凌驾于韦伯斯特之上。韦伯斯特称这种传言“完全是胡说八道。”

尽管有这些否认，华盛顿传媒界仍然相信在布什政府的最初几个月里，盖茨从他的国安会办公室对中央情报局发号施令，或者至少秘密地让布什及时了解中央情报局的第 7 层楼的动向。这些谣言由于其他报纸报道韦伯斯特即将离开情报局长职位的传言而火上浇油。转过来，这些文章提供更多的关于白宫-中央情报局小摩擦的材料，以及对韦伯斯特表现的批评。在那以后的 4 年中，编写这类故事成了一种新闻家庭工业的行当。最后，这种政治上的闲言碎语的滴滴答答的细流，终于汇聚成为一种官僚政治的灭顶之灾。结果，韦伯斯特的助理们不得不花费许多时间支撑他作为一个力能胜利的负有全责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形象。

在布什政府最初两年中，使韦伯斯特负责公共关系的班子感到更为难办的是，那些记者总是夸大盖茨在情报局中的影响。而实际上，盖茨在情报部内部只有一小撮盟友，而在行动部那就更少了。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说：“如果他打电话来问局里正在办些什么事，我怀疑会有人告诉他。”在韦伯斯特最接近的圈子中，盖茨也是颇不得人心的。理查德·斯托尔茨私下把关于盖茨在情报界的影响的报道予以撤销。斯托尔茨对他的同事们说，盖茨在确认其提名的听证会上的表现，永远埋葬了他担任中央情报局最高职务的机会。同许多来自行动部的人一样，斯托尔茨不喜欢盖茨既部分地把事业寄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而又在凯西年代走红。理查德·克尔，他在盖茨得到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务同时，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他仍然没有向说他是盖茨传递信息的渠道的谣言屈服。克尔有次对韦伯斯特说：“我对这类说法毫不在乎。”即便说克尔当初是盖茨的一名门徒，但他对从世界各地如潮

水般涌来的情报报告的日常处理工作的关心，远胜于对传播盖茨是布什的中央情报局长代理人这类闲言碎语的关心。

克尔是一位讲究精确和详情的职业官员，他赞赏韦伯斯特严格坚持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产品不受政治考量的干扰，这个信念正如他有一次向一位同事所描述的那样，“它是使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情报机关的唯一应该坚持的事情。”他对那种认为中央情报局花费大量时间去冲淡它来自海外的情报的批评十分敏感。一位熟悉中央情报局情况的国会的批评者说：“总是说什么‘嗯，如果发生这种事——但它可能不会发生——除非发生了什么别的情况，发生这种情况的机会很小’。显然，中央情报局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想坚持它自己的观点，因为如果他们错了，那我们就会说，‘那么，我们还需要他们干什么？’”。

克尔决定他将改变这种状况。他作为情报部的头头，花时间来确保报告文件等要写得清楚，还要写明中央情报局对该情报的含义作出最佳的评估。一位前分析人员回忆克尔所作的一次最不客气的评论，那是在他读了一份关于苏联农业生产的一个次要方面情报摘要后发表的。他回忆说：“他甚至没有从他的办公桌抬一下头，只是说：‘谁都可以从报纸上读到它。告诉我这份报告说明什么问题’。”

克尔最担心的是情报部作出的评估会被政治偏见所污染，他知道不论是个多么敏锐的分析人员，都应该坚持情报的诚实性，因为往往会出现将情报精心加工后以满足他们想要这类情报的主顾的机会。前情报部头头雷·克莱因说，“对一个情报分析人员来说。应该诅咒的事是制造出什么事情来，因为他认为可以投白宫或国务院之所好。这比剽窃还恶劣。歪曲情报报告、文件、任何种类的评估，以满足常规智慧的需要，或见风使舵，可以这样说，咳……那都是不该做的。”克尔担心会出现另一个伊朗门丑闻，但这次不会引起人们注意，因为它不会牵涉武器运输或转移军售款项，但对情报部这个情报局内进行大量最重要工作的部门来说，面对无可辩驳的事实，将把它的官僚式的生存系于流行的政治信条。克尔对他的同事说，出现这种事件的含义是令人寒心的。它意味中央情报局的终结，他说，“我们只好卷起铺盖回家了。”

对盖茨最严厉的指责则是说他曲解情报评估以谋取政治上的宠幸。克尔不愿相信这种说法，但他认识到盖茨的众所周知的在美苏关系上的保守主义观点使他的客观性成了问题。在较具有自由派色彩的卡特年代，盖茨减弱了他那反苏观点，可是到了里根当选总统后，他又迫不急待地提高了调门。盖茨政治观点的变化逃不脱人们的注意。一位刚退休的行动部官员指出：“任何一个人既能与斯坦菲尔德·特纳相处很好，后来又能与威廉·凯西融洽共事，我看此人就不可信任。盖茨是个捉摸不定的人，此一时，彼一时，判若两人。”

这些说法使克尔最感到困扰的，是因为他对盖茨有好感，而且欠了他的情，因为他最近的成功多亏盖茨的提携。当盖茨担任凯西的副手时，克尔填补了盖茨原任的情报部副主任的职位；盖茨担任斯考克罗夫特的国安会顾问副手以后，他向布什进言，让克尔继任他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一职。

不过，克尔认为盖茨在担任情报部主任时造成了一些本可避免的错误，这些错误酿成对盖茨领导工作不满的暗流。例如，回溯到1982年1月他刚就任情报部主任时，他在情报局的兴奋气氛中召集了一次情报部高级官员的会

议。在他这位情报部的副主任被介绍给大家以后，受到了热情欢迎，对苏联分析办公室的分析人员来说，盖茨的任命被看作是一次胜利。不过，当他们听到盖茨对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评估所说的话时，他们对他的看法改变了。一位分析人员回忆当时情景，“盖茨使我们失望。他说的话使我们目瞪口呆。从他口中说出的最初的几个字眼是‘你们作的工作令人作呕’。我们当时知道，事情要大变样了。”

一些参加了会的听众或是收看了闭路电视听到他讲话的人，描述盖茨的表现是“永远不能忘掉的”、“令人惊诧的”，是“对我们所支持的事业的背叛”。这位副主任只不过是想要明白表示一下中央情报局应该有些改变，可是他的讲话招致的敌人多于朋友。

盖茨开始说道，“我被派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白宫任职，在两党的三位总统手下工作，并同两位中央情报局局长密切共事，使我得以了解我们高级的读者一方，了解政策制订者判断事物的方法。在那里我看到的情报分析是不切题、不适时、不中要害，或两者兼备，甚或三者全有。分析人员未能预见重大的发展或事件的发生，他们固步自封，自命不凡，以倨傲的态度对待合理的质疑和建设性的批评，那些号称专家的分析人员不学习他所负责国家的语言，他们很少到那里去；他们对学术团体和私人机构关于那些国家的研究毫不在意，还说没有什么了不起；优柔寡断、自鸣得意、不可靠的臆断，再加上不能容忍他人的意见……偏爱写历史，以抗拒向前看；蹩脚、噜嗦的文笔；一种回避对美国和政策制订者们都密切相关的问题、搅乱情报客观性和独立性的明显倾向……”

就这样继续着，过了惊心动魄的 20 分钟，盖茨提出了连续不断的指控，渎职、无能、不完善、拖拉、偏执、愚蠢和与世隔绝，再加上轻浮、懒惰不堪之类的谴责。他说：“我可以保证，对你们和你们的管理者们的基本要求的中心点是保持我们赖以存在的单一目的：产生出经得起任何推敲的高质量的情报。那是我唯一的目标。盖茨说的这些话，从凯西年代的初期开始就成为一个响亮的宣言，它要求的是情报部应该改变，应该像他要求于他们的那样去运作。”

盖茨随后作出的一项引起争议的决定，把情报部弄得乱七八糟。35 年来，分析人员与行动官员分开的方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两个部门进行截然不同的任务，只通过起草报告的官员发生合作关系。甚至曾经一度出现由武装警卫分别将行动部和情报部的办公室分开的情况。两个部门间的友善关系是严格禁止的，并被认为是不可宽恕的滔天罪行。在这种分裂后面的原因是很直截了当的：行动部是制订政策的机构，是总统的一只臂膀，而情报部的任务是被设定为尊重事实，尽人力之所能提出客观和完整的报告。把这两者混合在一起，就无异于在哈佛大学校园部署第 82 空降师。这种分离的政策是坚如磐石的；把分析工作与谍报工作分开是情报局图解的一部分。戴维·惠普尔说，“这两者不会搅在一起。情报部是不会对一个谍报行动表示不同意，因为我们压根就不知道这个行动。”

盖茨在对情报部官员说他们干的工作很糟糕之后，他提出进行一次革命性改变：从他担任情报部主任开始，分析人员将要在海外情报站与中央情报局的外勤官员共同待在一起 3 至 4 个星期。这一政策使盖茨成为中央情报局内一位强有力的、受到广泛憎恨的人物。

罗伯特·盖茨被布什总统委任为斯考克罗夫特的副手时年仅 45 岁，尽管

他相当年轻，但他却是一名外交政策的强硬路线派——他也是许多在冷战兴盛时期形成其美苏关系观点的俄国问题专家之一。他对苏联动机的不信任乃是一个信念问题。例如，在 1983 年，盖茨描述苏联的威胁是“承袭了西方文明已面对了 3,500 年的同一威胁；造成这种威胁的，是专制主义反对多少是在平稳发展的以保护和培育个人的创造力和自由为国家最高目标的思想。”甚至当中央情报局的评估开始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横扫一切的改革是实质性的而且像是持久的以后，盖茨仍拒绝改变他的看法。他的批评者认为，盖茨不仅是与苏联的有重大意义改变脱节，而且他是漠视中央情报局所能提供的最佳的情报评估。

许多中央情报局官员设想，盖茨的看法一定会同他从前的门徒理查德·克尔所持观点相冲突，尽管克尔并非是外交政策的自由派，作为一名公认的苏联军事方面的专家，克尔也得到与盖茨相同的报告。但是，他与盖茨不同，他相信这些报告。克尔深受戈尔巴乔夫国内首创行动的影响，认为这些行动预示另起炉灶建立美苏关系的可信的企图。克尔想要美国利用新牌号的三驾马车提供的机会。他与盖茨在苏联改革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不是程度上的差异：克尔相信苏联领导当局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他想用这个观点说服苏联分析室主任乔治·科尔特，他是盖茨的坚决支持者。克尔争辩说，戈尔巴乔夫宣称苏联将单方面在东欧削减驻军，反映了苏联内部的重大改变，而这在西方几乎毫不知情。盖茨在苏联分析室的门徒表示不同意。他们严格遵循盖茨-科尔特路线，他们坚持，俄国历史充斥着改革运动的苦难，每次改革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外国的畏惧和仇恨的反应。他们警告说，当前的改革会终止，苏联仍将是西方民主的无法改变的敌人。

当克尔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于 1989 年 2 月 28 日举行的确认他出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会议时，中央情报局内部此项炽热的辩论的概略得到了反映。克尔对此次参议院听证会作了充分准备，他为参议院此委员会成员们对中央情报局未能预示戈尔巴乔夫令人吃惊地宣布单方面削减在东欧驻军所表示出的关切程度感到意外。有讽刺意味的是，克尔这位倾向于认为苏联的改革是一次机遇的人，不得不为中央情报局的怀疑论观点辩护，持此种观点最突出的人就是盖茨。这一次，克尔只得依靠一个精心编织的谎言：预示某种特别的外交动向并非中央情报局的任務。他说：“有时作出的决定的人并没有作出你打算作出预示的决定。”

克尔试图划出他所负责的中央情报局对苏联军事调动所作的分析，与情报局对苏联内部改革所持观点之间的区别。他为自己的工作辩护，但他并没有重点划出盖茨在苏联分析室的门徒们所持的在他看来是狭隘的观点。他说，他自己的几次评估对苏联在削减驻军这个特别的主动行动提出过警告。克尔承认他曾经错误判断过苏联改革运动的“巨大意义”，情报局还面临在预示苏联举止行为方面的一些固有的问题，但是他为中央情报局的全面成果进行辩护。他声称，苏联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央情报局成功地报告了这些变化。

参议员们听了克尔的发言后，没有人会忽略他对中央情报局的盖茨影响下的评估所作的间接批评。但他们几乎都没有理解盖茨观点影响所及的深度。在 1989 年 2 月底，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就苏联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所进行的辩论，反映出布什政府自己的拿不定注意。但是当这次在兰利的战斗看来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引起爆炸时，情报局却面对布什年代第一次重大的情报危

机。命中注定，劫数难逃，这次发生的突然事件与苏联无关。

老朋友

1989年2月中旬的一个寒冷的早晨，三个人首途前往总统别墅戴维营，他们三人是老朋友了。他们在寒冷的大地上并肩缓慢地走着，有说有笑。走在右边的是李洁明，他是刚刚返国的美国驻南韩大使。李是一个文质彬彬的、耶鲁大学出身的中国问题分析专家，在美国政府中一小批亚洲事务专家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走在中间的是密歇根大学的迈克尔·奥克森伯格教授，他的知名度颇高，是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出类拔萃的专家，走起路来身体微微有点摇晃。此公醉心中国事务，一谈可以谈几小时。左边是布鲁金斯研究会的哈里·哈丁。他和李洁明一样显得文质彬彬，不过不怎么健谈，他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在政府圈内很受重视，提起他来，人们怀有崇敬之情——这使他迅速在亚洲问题专家中成为泰斗。

这三位是奉召去总统住所与总统晤谈，另外还有两名中央情报局主管东亚地区的官员，他们是乘直升飞机奉召前来戴维营的。安排这次戴维营的特别会议，是在布什总统宣布他将把美中关系置于他的对外政策议事日程的主要地位，而且将访问北京，这是他就任总统后首次出国访问，而且也将是他的4年总统任期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起步点。在布什的政治顾问们看来，中国之行是新总统显示其对外政策的擅长的大好机会，也是为了要在世界舞台上大展鸿图，施展其国际事务计划的抱负。他去北京，无异是一次重返故地的凯旋，他问鼎白宫的征途，正是从北京开始的。在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向西方开放之际，布什正好在北京，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

布什对他的中国经验，倍感自豪。他喜欢对人讲这样一段往事：他本已内定出任驻英或驻法大使，他却力促福特总统派他出使中国。布什在他的政治自传《期盼》中写道：“出任驻伦敦或巴黎的令人垂涎的要职，自然对填写履历表大有裨益，但是，北京是一个挑战，是一次进入陌生世界的旅程”。布什自然也知道，在他的履历表上写上任职北京的经历，会比任何其他外交任命更引人注目。布什在北京任职仅13个月，但此后他自认为是一名了解中国政治结构以及了解中国人民的向往方面的权威。布什在1974年9月抵达北京后，他有意识地避开他的新办公室的种种拘束，尽量接近中国老百姓，就像本地人一样骑着自行车在城里满街跑，就像他日后提到的那样，在一群以赞许目光注视他的中国人中有人说：“布什骑起自行车，就像中国人那样。”

布什接触的中国人中，很主要的一部分是好几位势力日增的企业家。这些身居北京的年轻企业家，后来在后毛泽东时代形成中国新的掌管实际事务阶层的核心。布什还结识了许多中国政治领导人，包括日后领导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副总理邓小平。他在北京任内的一大收获是认识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中国问题专家，与他们建立了最有意义和持久的友谊。这些专家中最重要的是李洁明，他就是1989年2月应邀去戴维营的那批人中的一位。

李洁明在开始他的外交生涯之前，他曾是中央情报局秘密组织的一名出色的工作人员，工作已超过25年。能够讲一口流利中国普通话的李洁明，被中央情报局当局认为是一位冷静而又长于争辩的“考虑周到、机智敏锐、有良好职业素质”的情报官员。他是中央情报局培养出来的少数最优秀的智囊型情报人员之一而倍受青睐。如果说他因大家都说他以搞小动作而在中央情报局总部内树敌过多而感到困扰的话，他可并没有表露出这种情绪。在六十

年代——这是中央情报局近东处造就出一批传奇性特工人员的年代，像德韦·克拉里奇这样的人物；东亚处也不甘落后，它能提出像李洁明这样的冉冉上升的年轻新星。李洁明和克拉里奇曾是中央情报局行动部主任的两个最强有力的竞争者。

毫无疑问，李洁明有足够经验胜任其工作：他 1951 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了他的中央情报局生涯，光后在日本、台湾、菲律宾、柬埔寨、老挝和泰国担任行动官员。1965 年任老挝情报站副站长，1968 年调任香港情报站副站长。当布什到北京任职时，李洁明已是中央情报局过去还未设置过的中国情报站站长。在布什离开北京返国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李洁明也返回美国的兰利担任国家情报官。此一任命使他成为情报界首席中国问题专家。在布什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9 个月的任内，李洁明和克拉里奇一样，深为布什所倚重。李洁明在 1978 年从中央情报局退休，担任多家美国公司的顾问，其中包括达拉斯亨特石油公司。1980 年李洁明又重返公职，担任里根竞选班子的一名较晚参加的工作人员。

李洁明由于他的秘密的中央情报局背景，当他参加到里根竞选班子时，即使是在最亲密的顾问圈子中，也不知李是何许人也，直到里根一布什班子的最高外交政策助理理查德·艾伦把他包括在 1980 年 8 月访华之行的人员名单中，方为人瞩目。此行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定下来的，为的是弥补由于里根的失言而动摇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损害，里根在一个引起轩然大波的声明中说他认为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是“真正的中国”。这一声明引起很多问题，特别在布什看来，可能会损害共和党赢得大选的机会。

艾伦清楚地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需要消除里根关于中国的谈话所造成的坏影响，因此我向他建议，由布什和我到北京跑一趟，并且就我们的感受发表一个声明。布什和我商定先到肯尼崩克港聚谈一下，在那里，布什介绍我与李洁明认识，问我好不好让他同行，因为他可以充当翻译。我说这样很好。”

艾伦说他们这个三人访问团“很快”就平息了台湾争论，“主要是由于我们持强硬态度。我们不打算放弃我们与台湾的关系。”

但事实真相并非如此，在 1980 年的中国之行中，布什和李洁明反复向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保证，美国对华政策不会改变——不管里根就“两个中国”说些什么。不过，他们到达中国首都时气氛是冷淡的：在人民大会堂里，邓向他们提出折磨人的美中关系问题。李洁明回忆说：“他问我们：‘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他非常困惑，非常生气。他紧紧抓住一点不放问道：“难道我们的友谊什么也不是？你们要甩掉我们？我们尽力向他一再保证，里根不会改变对华政策，但是他就是不相信我们。”

当这三个美国人回国时，他们带回一个五点纲要，它是艾伦在李洁明协助下草拟的，它完全改变里根的冷战观点。这个阐明立场的文件毫不掩饰其企图是要向里根送去一个新的纲要，希望他同意他们所缕述的观点，而不去理解他们的真正用意所在。但是当这三位非官方的使者回到洛杉矶时，发现里根仍坚持他的反华的激烈言论。他们与里根在洛杉矶旅馆的会见，气氛之冷漠较在北京与邓之会见有过之而无不及。里根说他不仅对他关于中国的评论引起的公众争论毫不在乎，而且他还将发表一篇新的讲话，这篇讲话将使争论告一结束。里根这篇写在黄色纸上的这篇讲话，艾伦和李洁明一看，不禁目瞪口呆。李洁明后来解释说：“如果里根在电视上宣读这篇讲话，我们

可能已经在打仗了。情况之糟，无以复加。”

里根的心腹顾问、未来的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介入此事，化险为夷。布什将米斯拉到洛杉矶面商，设法使里根平静下来，米斯是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米斯先是把里根的讲话稿读了一遍，一语不发，接着好言好语地劝诱里根仔细阅读艾伦·李洁明草拟的文稿。米斯硬说这个文稿与里根的讲话稿实际上没有什么分别。随着里根的高级顾问们的目光，里根也审阅起这个五点纲领起来了。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停顿，里根终于点了点头。他凝视米斯片刻，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态。里根竞选班子的一位成员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非常让人心情激动的。因为里根总算明白了。里根知道他必须倚仗米斯，你知道，里根对这事一点也搞不明白。艾伦和李洁明焦急不安地等待他的回答。里根终于问道：“这就是你们要我向新闻界宣布的事吗？”米斯点点头。里根最后说：“那么，嗯……”——你们知道里根说话方式——他说了好几遍“那么，嗯……”，然后，他抬起头往上看，他输了。他知道这一点，他说：“那么，好吧，如果你们要我宣读它那我就读吧，我想你们是这个意思。”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问题解决了。

李洁明 1980 年的中国之行，标志着此人步入政坛的起步点，从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前东亚问题头号专家，一变而成里根的白宫内的令人生畏的人物。在布什和艾伦的持续的支持下，李洁明官运亨通，前程似锦。在中国行之后，李洁明成了里根的圈内人，他作为里根的一名的内层人物，锦绣前程无可怀疑。里根当选总统后，李洁明成为接管政权班子中的极为重要的外交政策顾问。里根就职后，李洁明成了理查德·艾伦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班子中的主要东亚问题专家。

6 个月后，里根总统需要遴选一人主持“美国在台协会”（美国在台北的非官方联络处），李洁明膺选此职。艾伦解释说，这一选择，令人惊讶，因为“中央情报局的人被选中担任大使级的职务是很不寻常的——这是忌讳。”

李洁明的任命，也使他昔日中央情报局同僚感到惊讶。一位高级情报局官员说：“我相信他是前中央情报局官员中在任何一届政府中获得这类职位的第一人。”

李洁明的这一台湾任职，标志着他终于从间谍界转入外交界。然而，他获选此职，在国务院官员中引起尖锐的不满。这些官员们把李洁明说成是“没有营业执照的人”、“乔装打扮的外交家”。一位国务院官员补充说：“李洁明的任命之所以引起激烈反对，还因为此人在国务院人缘不好。”

这种情绪在 1984 年传播更广。这是因为李洁明奉调回美后，又当上了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局的顾问。第二年又成为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这一任命又在雾谷（国务院所在地）等级森严的集团中引起激烈反对——那里的老资格外交家们，在传统上就是不信任“来自河对岸”的任何中央情报局人物移值到外交界来。1986 年里根总统指派李洁明担任美国驻南韩大使。在汉城服务 3 年后，及时赶回华盛顿参加好友布什的总统就职典礼。在新政府成立的初期，公众舆论关于李洁明就职的传闻颇多，包括他曾经担任过的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一职。

可是这一次，来自国务院高层人士的反对如此强烈，任命终于被封杀。暗中反对最力的是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的副手、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他反对李洁明的这一晋升而终于使其告吹。不过，据国务院某高层人士

透露，“伊格尔伯格和贝克都没有公开反对李洁明，他们都知道比公开反对更有效的办法。不能当着布什的面去反对李洁明。”伊格尔伯格私下认为李洁明过于保守，不宜于担任国务院的这个职位，因为伊认为李是“台湾帮的人”。伊格尔伯格对李洁明的反对，也反映出外交系统人士对前中央情报局官员移植于外交界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此外，国务卿贝克认为自己才是布什外交政策的居于支配地位的缔造者。一位国务院官员评论说：“贝克不要有任何竞争，这就意味着李洁明必须靠边站。”

但是，对李洁明要在新政府中获得要职一事，布什总统总不能充耳不闻。这位前主管中国问题的国家情报官，是布什的好友，又是他的长期以来的支持者，每当需要，必效犬马之劳。布什还记得他初次出使北京时，还是一名没有经验的新手，得到李洁明的耐心指点。布什初到中央情报局任职时，李洁明作为一名有声望的圈内人士，帮布什大造舆论，他向他的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同事们保证，新来的局长可不是个等闲之辈。在就职后几天，布什就私下同贝克商量李洁明的未来工作。布什终于想出一个两全的办法，既可以给李洁明安排一个重要职位，又不致于触犯国务院职业外交官的敏感神经：任命李洁明为美国驻华大使，继承温斯顿·洛德的职位。

布什对这一解决办法十分高兴，这意味着有他自己的人在北京。唯一担心的是，李洁明会不会在美国的远东政策上同贝克较劲。

但当李洁明数周后来戴维营开会时，这种可能性看来是不存在了。在1989年2月这次会议之前，李洁明和贝克曾作私人会晤，讨论出使中国之事，一切歧见均已解决。李很清楚，国务院官员对他的这一任命是感到犹豫的。他对贝克表示，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外交官员，他只想在北京当两年大使，而不是通常的三年。贝克自然暗中窃喜——美国既有一位与中国领导人熟识的外交代表，他本人作为政府外交政策主要发言人的地位又得到保护。他接受了李洁明的保证。

戴维营会议在许多方面显示出布什处理外交政策事务的模式。一番客套闲话之后，两位情报局官员开始提出一份标准的事实分析报告（据一位政府官员的描述，这份介绍是“一盘统计数字大杂烩”）。这份中央情报局报告指出：“同中国的贸易已达140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有4万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美中之间有着庞大的科学技术合作计划。”在中央情报局的汇报之后，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和哈里·哈丁分别就中国政治发展情况作了个人分析。他们都谈完以后，布什转向李洁明听他谈南韩的情况。

在听取三位专家长达两小时的意见之后，布什再次转向中央情报局官员，问他们对中共政治局人事变动有什么看法。中央情报局的估计是乐观的：对中国共产党权力的唯一威胁来自城市知识分子中一些与海外华侨有关系的改革派，整个国家看来没有内部不和。中央情报局的东亚分析家们断言，中国发生重大政治危机极少可能。

李洁明离开戴维营时，对布什决定以中国作为首次出访的目的地感到高兴。这样一次正式访问表明新政府把它同远东的关系与同苏联的关系看作同等重要。李洁明知道，在今后的岁月里，美国与中国的关系，随着中国领导人开始放眼外部世界，将会变得更加重要。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一战略思想，但到目前为止，邓小平能够抑制住这些分歧。中央情报局的分析是正确的。中国从下面发生革命的机会看来是微乎其微。但也正如李洁明曾一再警告过的那样，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

第一个报告在6月3日（北京时间）晚到达，报告称在距离天安门广场西边一英里多的地区冲突在进行，那刚好是报纸刊载布什选派李洁明出使中国的消息之后4个月。美国情报官员从燕京饭店高层一个可以远眺的地点往下看，一群至少有一千之多的抗议者同一队士兵对峙。在饭店内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用保密通讯工具同美国大使馆联系，在晚上十点零三分发出第一个报告。

美国大使李洁明从距冲突正在进行的长安街以东不到3英里的大使馆办公室里，听到远处传来的微弱枪声，他知道，他过去几天来最为担心的事终于开始了。早在事件开始前四大，他就对中央情报局北京站站长说：“示威者将被赶出天安门。军队奉命结束抗议活动，必要时使用武力。”

站长摇摇头，表示不同意。他告诉李洁明，中央情报局得到最可靠的情报，中国领导人不会很快采取行动平息示威。他对此估计满怀信心。他对李洁明的警告摆摆手、耸耸肩。就好像是为了强调他的这些保证，站长两天后离开中国，作长途旅行，返回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作例行磋商。谁也没有为他的离去感到有什么不安，直到驱赶开始，忽然都记起他在动身前说的：不用担心，我离开期间不会出什么事。

站长的决定招致灾难性后果：他离开之后，使得美国在中国的秘密间谍网和中国内部其他提供情报的来源陷于混乱。更糟的是，在天安门事件期间，美国大使馆的一些要员，担心他们自身的安全纷纷逃出北京，6名国务院官员以及为数更少一些的情报局雇员，干脆逃回美国，只有李洁明大使和国务院情报组长等5名大使馆负责官员留了下来，对付这个似乎处在内战边缘的巨大国家出现的一片混乱局面。基于他的级别和经验以及中情局站长的离去，李洁明成了美国在北京的事实上的首席情报官员，这是他14年来的第一次。幸亏他预测中国政治局下令驱赶的时间准确到以小时计，所以他能及时派出几个监视小组观察情况。其中一个小组派在燕京饭店，一个在天安门广场以东的北京饭店，另一个深入到广场内部。另外两个小组派在京伦饭店和位于广场以南的友谊饭店。6月3日傍晚时分，在燕京饭店内的指挥小组报告军队与学生之间发生冲突，但直到十点零三分真正的冲突才发生。

随着冲突沿着长安街从西向东朝着天安门移动，李洁明从他的其他指挥点得到报告。正当军队在北京西部行进时，广场东边相对平静，尽管在外交人员公寓附近军队与人群明显地对峙着。在广场东部边缘的北京饭店外边也有军队布上岗哨。在美国大使馆东边据报发生小的冲突。

在北京京伦饭店内，李洁明和他的手下人，决定把愿意离开中国的美国学生安排在这里，这时抗议者和军队之间的冲突还在继续。在第一次战斗开始约9个小时后，李洁明通过公开电话线路频繁地向白宫和国务院报告事态的详细情况。第二天早晨，在暴力达到高潮后逐渐平息下来，他才停止了报告，他已精疲力竭。

李洁明接到的最令人感兴趣的报告，是派到天安门广场的一个美国情报小组在6月4日凌晨两点钟发出的。报告说，中国安全部门官员在仍留在广场内安营扎寨的学生中间来回做工作，劝他们离开广场。美国情报小组推测，一个特别安全单位在军队进驻之前就派到了广场，它的明确的目的是阻止流血。

据中央情报局谍报人员发现，中国安全人员还安装了大扩音喇叭，劝说学生们和平撤离广场。安全官员在广场周围的建筑物上俯瞰广场内的学生

们，有些人则打着手势示意他们往西朝木樨地方向撤退。早上四点，广场上的灯全部熄灭作为一种警告。最后，留在广场的一小批头头同意离开。大约凌晨五时，广场内的学生列队离开天安门，向东边的北京饭店方向走去。

天安门事件以后的日子里，李洁明和其他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为它们能不能更好地预料这次危机之事而受到精神折磨。李洁明爽快地承认 1989 年 2 月在戴维营向布什汇报的人中，没有谁能预料到 4 个月后在北京街头发生的乱轰轰的事件。

布什 1989 年 2 月胜利地重返北京，也没有形成关于中国政治结构内部在发生什么变化的新思路。几乎没有人，不论是在中央情报局或美国政府任何处所，会认为中国的昏昏欲睡的“支持民主的改革力量”会突然发难。尽管如此，考虑到中央情报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其以后在中国所进行的范围广泛的招募活动，6 月事件也并非那样的突然。

中国成为中央情报局的不解之谜长达 20 多年之久。在 1948 年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之后，在这个新的革命的共产党政府内部，情报局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个人情报来源。在人民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情报局所唯一倚靠的是在共产党胜利后仍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或由台湾派遣到大陆的特务。在这些年月里，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活动与在苏联的活动相似，不过更少成绩。在东欧，美国打算招募海外流亡分子充当特务，但也正是在东欧，中央情报局建立的情报网总是短命的。在五十年代中期，情报局改变了策略，打算在人民中国驻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使馆内招募中国官员为它工作。不过，早期的这些活动成效极微，还抵不过一些情报失误造成的难堪：中央情报局没有能预知中国军队出兵朝鲜；情报局再次未能预知中国爆炸一颗原子弹，但是，最最令人难堪的，也许是中央情报局本身被“特务”——中国的对外情报机关渗透进来了。

在这种渗透被发觉以前很久，五十年代最声名狼藉的一件中国间谍案，它涉及到一名中国代号为“百合花瓣”的妇女。她是一个美国人，在抵达美国时的名字是明霞森（译音），她在去她的故土的旅途中乘坐的船遇险沉没，在中国海岸上她真是被淹死过去。中国人却使她身体复元，并立即把她送到纽约建立起一个间谍网。在此后 13 年中，她的谍报小组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活动。可是，中央情报局却在五十年代蒙受了严重的挫折。1952 年末，情报局的一架间谍飞机在中国北部被击落。驾驶员杰克·唐尼（别名约翰·多诺万）和情报局人员理查德·费克图被抓获，经过审判，以间谍罪被中国一军事法庭判刑。

在同年发生第二起事件，它使得中央情报局受其破坏性影响达 30 多年。1952 年中国在关岛策反了中央情报局特务金无怠（他在情报局的名字是“拉里·无怠·金”），中央情报局在关岛设立有对中国大陆的电子监听站。金在中央情报局潜伏 34 年，向北京传送了大量绝密情报。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负责中央情报局东亚情报活动的是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他是一位风度翩翩、富有、社会关系广泛的波士顿人，后来他负责整个的行动部。菲茨杰拉德从兰利指挥以台湾为基地的针对中国的隐蔽计划，在台湾还进行以中国大陆为目标的半军事性质的秘密组织的训练。菲茨杰拉德的副手雷·克莱因，他毕业于哈佛和牛津，曾任中央情报局台北的负责人，后来擢升为情报局的副局长（一度曾说他是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有希望的候选人，尽管他现在说“不是那么回事”。）菲茨杰拉德和克莱

因领导着一批美国情报界极有才干、喜欢争吵的谍报官员。尽管他们在中国内部没有发展到什么真正有价值的特工人员，但是他们在别的一些国家中取得了对付中国谍报站的出色成功，特别是在非洲进行的反中国特务的行动很成功。这些成功中最重要的是现已公开的、发生于1966年下半年的一件事，那就是由中央情报局策动的推翻加纳的克瓦米·恩克鲁玛，取代他的政府很快将300名中国特务顾问驱逐。

中央情报局反对毛泽东政权的最重大的胜利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5—1973）取得的，这期间在中国和在它的海外使馆内部爆发了实际的内战。1966年9月，中央调查部派遣特别安全官员到各地中国大使馆去肃清“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和中央情报局特务”。在内部进行的调查和激职，使得中国的外交系统发生分裂，却使中央情报局得到收罗特务的意外收获。中国的执行上述任务的官员甚至采取立刻断然处置的办法。例如，在荷兰，一个名叫徐自采（译音）的工程师被急送医院，他在中国外交人员公寓附近的一条路上遭到拷打后发现的。他对荷兰当局说，他被指责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不几天，他被一个中国突击小组从医院绑架返回大使馆，不久即因伤死去。在世界各地都发生牵涉到中国人的类似事件。据一位毕业于情报局中国行动讲习班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说，整肃行动在非洲尤其严厉，中央情报局在阻止中国打进非洲大陆最具活力的解放运动方面特别有效。

上述中央情报局官员还说：“不管具有什么观点的人都能看列在文化大革命后中国面临巨大的问题。他们在海外的谍报行动由于这次运动造成的分裂变得一团糟，他们渗入和联络非洲解放运动的重要计划，在六十年代末已告寿终正寝。”在文化大革命年代，中央情报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卓有成效的招募情报人员的工作。据一位前情报局东亚处的官员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驻外使馆人员分裂成三部分，他解释说：“持强硬路线观点的人大都是地位最高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职务的人居于中间地位。余下的是革命中的激进分子。因此我们就从中间派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伤害的人中物色对象。然后我们就招募他们。”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招募的中国特务中，最有价值的是一大批在中国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作家和外交界人士。一位前东亚处的老资格官员说：“他们的安全和情报官员把这些科技人员当作狗屁不如，驻外使馆刚刚被砸烂了。这些人在他们国家里叫于什么就干什么以换得一些东西。我们发现这些人是我们从未有过的最具献身精神的特务。我们要什么他们就提供什么。”

这笔横财包括中国秘密的科技规划的详细情报。七十年代中期，东亚处的官员把中国最重要的导弹科学家之一招募到手，他向中央情报局提供有关中国核能力的最精确的情报。这一情报说明中国在发展核武器和导弹运载系统方面所取得的巨大的进展，比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原先所承认的要大得多。这一泄露使中央情报局对金无怠警觉起来，到那时，他将美国的核秘密传送给中国已达20多年。

另一个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说：“使我们感到震惊的是，中国已拥有一个小型的、尖端的而且十分有效的洲际[导弹]运载系统。他们拥有技术精湛的电脑系统，而这是经过他们改进的。显然，这个系统的某些计划是从美国窃取的。”

在1971年，当尼克松总统和亨利·基辛格联袂使美国对中国开放时，美国官员没有人能料想到两国关系正常比的一个成果会是中央情报局和中国情

报界联手进行针对咄咄逼人的苏联在亚洲和非洲进行扩张的一系列联合冒险行动。例如，在 1974 年，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得出结论，苏联为了在南部非洲建立一个以新近获得自由的葡属殖民地为主的南非洲亲苏集团，为此正在秘密地武装安哥拉争取自由人民运动。作为回答，第二年，中央情报局建立一个安哥拉工作组，以近 2500 万美元暗中支持反争取自由人民运动的势力。中国人也参加了进来，通过中央情报局在南非、赞比亚和扎伊尔的情报站向反人运战士提供小型武器。甚至在美国国会禁止中央情报局再给反叛者以任何援助以后，中国人还在继续进行这一反苏联的行动。

这类联合行动最为成功的是在阿富汗，在该地，中美利害关系一致，联手向同苏联军队作战的穆加希丁游击队提供武器和训练。中国以武器（由中央情报局付款）供应游击队，经由中国沿喀拉空朗大道运往巴基斯坦，这条山路联结两国长 700 英里。1988 年晚些时候，中央情报局还资助这条中巴道路修抵巴基斯坦边境的大规模修建项目。中央情报局和中国情报部门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在白沙瓦，在中国西南部为数以千计的穆加希丁战士建立联合训练营，在这些地方，他们得到机关枪、火箭发射器和地对空火箭。

中央情报局与中国人在多种大规模情报方面的合作，也为情报局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军事能力的窗口——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在阿富汗行动中，这一方面尤其确实无疑，这一行动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在武装其军队方面的难题的新机会。据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说，庞大的后勤问题折磨着中美联合阿富汗行动的第一年。阿富汗游击队领袖们抱怨他们得到的武器很多不配套，有些干脆就不能用。中国有一个重要的小型武器工业，但是生产的弹药却跟不上，这使得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得出结论，中国人在军队的军火供应上大概有困难。一些参加行动计划的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和行动官员们也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在阿富汗廉价销售一些老式武器。阿富汗特遣工作队辩论过要不要请求美国正式对这种情况提出抱怨，但是终于决定只陈述事实不加评论。

不过，在许多领域的中美合作所得到的短暂好处，并没有在柬埔寨表现出来，在那里，中美两大国分别支持反对越南的不同反叛派别。中国给红色高棉提供大量的小型武器、迫击炮和坦克。通过泰国高级军官的合作而流入的武器，给美国历届政府造成政治麻烦，还有谣言说中央情报局也秘密向波尔布特游击队提供装备（中央情报局一直斥之为“捏造”）。但是，这些指控损害了美国为解决柬埔寨内战进行的外交努力，并导致美国与中国在里根政府那段阴暗日子里出现紧张的暗流。虽然如此，由于反对苏联的共同立场使得联盟得以保持。

对苏联在亚非的恐惧感是如此深刻，直到亨利·基辛格北京之行 9 年以后，美中情报当局终于同意联合采取一项技术收集计划，它是以苏联在亚洲东部的核试验及导弹试验基地为目标的中美情报分享合作计划。这个规模宏大耗资颇巨的建设项目建立起两个监听站，位于中国西部荒凉的新疆自治区的奇台和库尔勒。这两个监听站由中美双方的技术专家组成的双套情报小组，在美国国家安全署（NSA）领导下进行操作管理。情报站所需技术物资由一个中国情报小组（中国军官也参与其中）在北京每天运到美国大使馆。中央情报局还在中国人合作下掌管另外两个情报收集点，一个雷达设施，代号为“眼镜蛇戴恩”；另一个是一艘情报收集船，代号为“眼镜蛇朱迪”。

在 6 月事件后，中央情报局与中国人之间的情报合作在美国心目中有多

重的份量很快就清楚了。布什政府采取了一些广为宣扬的步骤表示美国对中国政府的不快之情，不过明摆着的是布什总统不愿意走得太远以致会牺牲美国与中国人 20 年的情报协作关系。针对布什政府的批评——认为它对中国人的行动反应过于温和——，首当其冲的是李洁明大使，他已经处在美国新闻界的抨击之下，指责他对中国领导不愿进行谴责。在“六四”后李洁明返美与布什磋商的旅程中，在西雅图机场停留时，他受到人权活动分子的当众诘责。他失去冷静。他怒火中烧对他们吼叫道：“你们不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当电视台播放这一令人难堪的录像带时，布什被迫为他的大使的行为进行辩护。公众施加压力要求布什将李洁明从其任内召回，总统却称赞李洁明是“我们在中国最好的监听站”。

但这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内部贬损李洁明的人士所说的话。李洁明由于他对中国的“软姿态”而受到公众批评，与此同时，他又在私下受到白宫和雾谷的官员们的怪罪说他过于强硬。冲突的核心在于李洁明认为美中关系与他们对苏联的共同疑虑过于紧密相依。李洁明辩称，一旦苏联的威胁消失，美国与中国关系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李洁明不遗余力地在两次分别在白宫总统办公室召开的会议上反复阐述他的有争议的观点，这两次会议是在 1989 年 7 月和 12 月召开的。他警告说，美国受到了中国人的讹诈。美国政府应该勇敢地面对中国领导人，而且要如他所说的——“诱使他们摊牌”。他还反复讲述美国对华政策是“反应性的”，而且“过份随苏联的行动而定行止。”

李洁明提出的把中美关系摆脱依靠对付一个共同敌人的形式“重加修整”的战略，在中央情报局内得到追随者。情报局中的中国问题分析家们自从 6 月事件以来正在忙于彻底改变自己过去所作的计划。

不过，总统的最高级顾问们在天安门事件后更热切于批评中央情报局，而较少去推动情报局去利用事件的新影响给予美国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外交政策上所得到的好处。威廉·韦伯斯特在政府各部门圈子内受到指责，因为他自己的表现表明他是一个软弱和无能的情报界领导人，还因为他没有提供关于会发生事件的充分警告。在那些把中国当作美国反苏世界战略的关键的人当中，批评尤为强烈。批评者认为，如果美国能够预测在 5 月末或 6 月初出现的问题，那就有可能走在事件的前面，避免最后算总帐。当李洁明和其他人私下不把批评当回事的时候，他们的地位不断遭到中央情报局十分拙劣的表演所损害，象征这种拙劣表演的就是，中央情报局北京站站长在“六四”后第三天回到他的北京任所。

布什政府把中国看作是对付苏联在亚洲影响的战略性的抗衡力量，这在对地区的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强有力的影响。随着天安门事件而来的，这个政策对中央情报局的一些最危险的掩蔽计划中的一项产生了甚至更重大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黄雀行动”——从中国秘密营救“民运”的最重要的领袖们的行动的非正式名称——仍然是布什政府严加保守的秘密之一。布什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们——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詹姆斯·贝克、罗伯特·盖茨——害怕这个计划会激怒中国的领导人，而且也许会使他们投入苏联人的怀抱。尽管如此，规模巨大的秘密营救努力得到了布什的全力支持。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说：“让我们这样说吧，在六四事件之后，如果没有得到白宫的批准，情报局在中国是不会有动作的。这件事是总统的裁决。”

在6月4日事件后的6个月，部署在中国、香港和澳门的几十名最宝贵的特工人员组成的网络，为那些“民运”最重要的组织者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和脱逃的手段。布什和中央情报局在批准这项营救计划时事实上别无选择。他们知道情报局在大陆建立的广泛联系网络，使得一项总统的裁决成为多余之举，因为不论华盛顿当局会说什么，美国情报人员都会发起这场地下营救行动。事实上，布什所批准的是一项已经在进行中的计划，它实际上在暴力发生的当天就已开始。

“兰利之争”的阴影，可以在6月事件之后的几件鲜为人知的事件中辨认出来。例如，冲突那天的清晨，两个最重要的“民运”领袖北京师范大学的吾尔开希和南京大学研究生李录神秘失踪，中国安全部门全力搜寻不得。6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另外两个异议人士，优秀科学家万润南和赵紫阳的秘书严家其，也到了西方国家。所有这四个人的脱逃，是因为有一个支持者的网络才有可能。他们为出逃者事先准备了身份证、大量现金、伪造的火车票，以及沿着一条从北京到东南的“地下铁道”的一连串的安全住所，在东南沿海，异议人士或是坐船经过变化莫测的海路偷渡至澳门，或经由陆路去香港。如此复杂的行动没有中央情报局的至少是缄默的合作，那是不可能的。

中央情报局担当的角色，早在事件之前，便由李洁明决定帮助处境最危险的“民运”领袖前往西方显示出来。在6月的最后一周，李洁明轻率地为200多名中国人签发签证，包括学者、科学家和学生，有时甚至借钱给他们卖火车票或飞机票去香港和其他安全地点。这笔钱从大使馆的“特别应急基金”中拨付。在事件发生后，李洁明还为美国工作的宝贵的情报人员提供后勤支援，让他们寻找逃出中国的出路。按照李洁明的一位同事所说，这“使人想起我们从西贡撤出的情景，不过这一次我们没有甩下我们的朋友不管。”在其他一些事例中，李洁明成功地吁请释放一些被捕学生，然后就是使他们从北京在“安排下无影无踪”。许多这些年轻人后来都到了西方。当情报局在中国缺少可靠领导的情况下，李洁明再度担任了中央情报局北京站站长。

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由数百万人严密组成的遍布全国的提供消息的网，这给中央情报局造成巨大的阻碍。但是安全机构由于“六四”事件有某种程度的瘫痪。

在“六四”后的第二天，中国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一群记者的护送下进入美国大使馆。方励之知道怎样利用新闻记者来保护自己，有一次他还曾经躲在一位著名的美国新闻记者的旅馆住房中。李洁明大使仍然极力保护提供合作的来源和方法，仅提供一个模糊不清的解释。他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万能的极权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共产党的情报网和中国安全警察是竭力阻止异议分子逃亡的。

在六四后不到两周，在全国公布了21名首要通缉犯名单。当共产党在全国重新建立起它的权威后（“六四”事件在中国70个城市引起骚乱），“民运”的同情者越来越难以组织起大规模的联络和采取成功的行动了，在从1989年7月初到12月末的这一危急时期中，中央情报局在文化大革命后招募的特务，向中央情报局请求帮助。

“黄雀行动”虽然最初是由海外的“民运”同情者们组织的，但很快就受到港英总督和澳门的法国高级情报人员的注视。中央情报局香港情报站起初还与“民运”同情者保持“一臂之遥”的距离。不久，情报站便通过美国在大陆吸收的一大批特务为营救“民运”人士出主意和提供支援。幸运的是

中央情报局处在帮助这次行动的极好的地位上。这要归功于中央情报局东亚问题专家约翰·吉尔胡利，他在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破大荒地在中国招募特务，他们提供了使这次行动成功所必需的联络工作。尽管吉尔胡利在天安门事件之前就已去世，他所建立的大陆上的情报网仍完好无损，他们在地下营救活动与在港澳的有关团体之间提供了首先的接触。

当时，中央情报局在北京的最显眼的行动，是与在广场负责示威者安全的小批小批的学生接触。其中之一叫做“敢死队”，它最为激进。在5月中旬示威活动的高潮中，吉尔胡利先前在香港和中国大陆招募的特务与“敢死队”接触，为的是评估运动领导的素质，估量最后成功的机会。在天安门事件后的几个月里，当敢死队成员成为营救行动的核心力量时，这些早期接触，被证明正至具有更大的价值。

港澳同情“民运”人士的营救网，在7月和8月发展成为北京至深圳的“地下铁道”。随着营救行动的扩展，采用了更为复杂的躲避追踪的方法，如伪装术、扰频电话、夜视镜、红外线信号装置，还有快艇和海岸营救行动使用的武器。一个中央情报局官员证实，“大部分高技术的装备是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它经由为此特别目的而在香港设立的前线机构来执行。尽管动用了情报局在中国内部的最重要的关系，但是营救行动并非中央情报局“包办”或“单于”的行动。许多西方情报机关为使地下行动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当然还有美国人。由于西方情报机关的努力，使中国通缉的21名要犯中有15名脱逃。

天安门事件几周以后，一批逃出中国的学生、异议人士和知识分子，在巴黎出现在新闻界面前，宣布成立流亡的中国民主运动。这一个团体的建立是“黄雀行动”的圆满成功。（“黄雀行动”还在继续将异议人士秘密运往西方）。尽管如此，中央情报局官员拒绝承认他们在营救行动中的作用。情报局默默地跟随在喜气洋洋的国务卿贝克的后面，贝克公开感谢法国政府“削减繁琐官方程序”，接纳中国逃亡者在法国避难。这样一来，全世界都知道，主导营救行动的是法国。

营救行动开始半年以后，快到布什总统结束其第一年任期，这时环绕“黄雀行动”的秘密坚壁开始裂开，首度公开曝光。中央情报局官员私下对美国公众表示真正的诧异，因为他们居然听到这样耸人听闻的表面故事。说美国政府没有支持法国政府的营救努力。中央情报局官员仍然默默承受痛苦，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称赞。但是布什政府不愿对“黄雀行动”有所夸耀，原因仍然是担心如果将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原原本本公开出来，将把中国推入苏联掌握中。中央情报局认为没有这种危险——中苏联盟恢复元气是根本不可能的。

介入营救行动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相信，白宫关于中苏关系的先人之见，从布什总统在天安门事件后几个月就决定派遣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到北京执行秘密使命一事得到反映。这位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抵达北京之际，正值中央情报局人员正在公海上与“六四”事件中的同样的军队进行炮战。不公开的斯考克罗夫特的使命，对那些招募了冒着生命危险的年轻异议人士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们来说，绝对是一剂苦药。其中有两位异议人士（目前仍不能公开他们的身份），是中央情报局在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务。他们在天安门事件后被捕，下落不明。

夏至前后，中国的六四事件逐渐从头条新闻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发生在巴拿马的麻烦事情，在那里，一位迷恋于伏都教的、性被动的麻子将军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美国给予反共活动的奖赏高于它给予其余一切活动的奖赏。中央情报局招募并培养了曼努埃尔·诺列加，给他钱，称赞他，替他辩解，前后达三十年之久，以此表明，该局指望赢得同苏联进行的那场代价昂贵但前景朦胧的斗争。但是，到了1989年年中，事实表明，为依靠诺列加而付出的代价高得令人无法接受了。

美国在巴拿马问题上处置不当被视为中央情报局的失败。在公众的心目中，兰利支持诺列加乃是说明该局不称职的一个具体事例，这算是最客气的意见了，最难听的意见则认为，此事使人有理由相信中央情报局想要扼杀中美洲的民主。按照惯例，中央情报局不理睬公众中的这些意见。该局的官员们私下里争辩说，他们一直是在执行来自白宫的命令。中央情报局的辩护士们抗议说，正如该局对北京市中心的事件不负任何责任那样，他们对巴拿马的这场灾祸也毫无责任可言。他们说，诺列加应该由从艾森豪威尔到里根历届总统集体负责，因为他们全都愿意看到巴拿马是令人满意的一潭死水——一个类似格雷厄姆·格林小说里的宽边帽国家，在那里，反卡斯特罗的狂热分子始终还能买到装在保持一定湿度的烟盒里的古巴雪前。

对中央情报局和诺列加的口头批评，大部分被中央情报局的专业人员驳回，他们争辩说，唯有在稳定的（意指反共的）社会中，美国的政治理想方能牢固确立。超级大国的争斗使得像诺列加这样的人成为可能，甚至成为必需。就连像阿兰·菲尔斯这样受人尊敬的军官——中美洲工作队前队长，一度是行动部的新星之一——后来也承认，在连连受挫的拉丁美洲处里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他们渴望一次胜利，“恰恰是在”抵御苏联势力扩张的“某个地方取得一次胜利”。

因此，在情报界看来，诺列加并不像公众所认为的那样是个了不得的麻烦家伙，也远非新闻界所描绘的那种撒旦式人物。用中央情报局一位官员的话来讲，诺列加是“一个狗娘养的，但他是我们的狗仔”。这个独裁者一贯反对美国方式，他好羞辱人又常自负地挑衅，确实令人恼火，但是他提供了中美洲的一个可靠的岛屿，而且正是在中央情报局不顾一切亟需这样一个岛屿的时候。美国设法在尼加拉瓜推翻桑迪尼斯塔政府时，诺列加是公开的支持者。拉丁美洲处搞的几次无声战争的老兵们，天天面对他们当年反菲德尔·卡斯特罗失败的事实，对他们而言，诺列加的帮助是唯一要紧的事情。

换一个角度去看，中央情报局长期支持诺列加有助于恪守有关美国谍报界该如何运作的大部分传统智慧。对情报完整这一原则的信奉是这样一个理念，它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影响力如此之大，致使它已经成为该局非正式的信条：对情报的评估不得受政治考虑的影响，原始材料不得加上党派偏好或个人打算而走样，判断不得受偏见左右。必须报告事实真相，不论它是多么复杂或者危险。

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南部等地黑人中流行的一种巫术迷信。——译注

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英国作家。——译注

这一不容置疑的信条，情报工作可靠的第一原则，曾使中央情报局有可能采取不受欢迎的和引起争议的立场。例如在越南问题上，中央情报局提出的警告占相当大的比重：已退休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们非常喜欢指出，他们始终如一地警告约翰逊总统，美国会在东南亚吃败仗。但是，这些官员们未能再补充说一点，在选择他们所搜集的任何情报时，他们已经作出了一种政治选择，不论他们是否承认这一点。而这样的选择经常影响着他们所得出的结论。

在对待曼努埃尔·诺列加的问题上，情况正是如此，这也有助于说明，至少部分他说明，为什么中央情报局看来那么愿意替他辩护。只要中央情报局拒绝调查（或者，这一点更加重要，宁愿视而不见）诺列加同国际毒品贩子的联系、他同军火商们的广泛友谊、他同国际恐怖分子的联盟、他的洗钱套路以及他的野蛮屠杀，那末，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就可以一直声称，他们一概不知情。正因为如此，参议员约翰·克里和杰西·赫尔姆斯才大发雷霆：中央情报局的官员静听着国会议员、新闻记者和外交政策专家们提出的意见、要求和论据，随后竟然无动于衷地回答说，他们无法确切地讲明这种指控是否真实，是否当真很重要。1989年以前，这样地设法回避一直是中央情报局的例行公事，因为该局首先考虑的根本不是什么巴拿马而是苏联。中美洲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主要由于该地区是中央情报局同苏联交锋的战场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作出决策，认定苏联是对美国的自由与民主的唯一的和最严重的威胁，从此以后中央情报局的全部活动都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的：如摩萨台政变、推翻阿本斯、刚果内战、猪湾、古巴导弹危机、在印度尼西亚屠杀共产党、在越南的灾难、谋杀阿连德以及支持各色反对派。中央情报局作为对外政策的一种特殊工具，它的存在的主要理由在于如下信念，即该局倘若不存在，苏联就有可能取胜。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该局在阻挠苏联实现其图谋时的成败来衡量的。

1989年初，情势不同了，苏联的威胁正在消失，这就把诺列加置于一种新的突出地位之上。中央情报局被迫重新明确思想以及重新确定情报目标；从许多方面看，诺列加成了冷战后对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个挑战，一个独裁者，他构成对美国的非共产性质的威胁。诺列加不仅是个麻烦家伙，他如今又成了情报目标和布什政府的一个敌人。这一新估计对中央情报局产生了值得注意的影响。当要求兰利搜集有关诺列加违法行为的情报时，该局已有能力马上照办，速度快得出奇（因为许多情报早已掌握在手）。到1989年2月为止的大约8个月内，兰利就整理出一份情报材料，列举了诺列加的种种罪行，就是没有无论克里参议员或者赫尔姆斯参议员指望得到的任何东西。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摇身一变成了反对诺列加的头号批评家。

对中央情报局的这一举动，五角大楼热情不高，主要原因有二。首先，中央情报局过去袒护中美洲的这个独裁者，军事情报官员们本来就几乎无法掩饰他们的鄙夷不屑，眼下该局突然改辕易辙，更使他们作呕。多年以来，他们一直收到有关诺列加为非作歹的报告，而兰利则始终装聋作哑。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高级军事官员们正关心着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担心会指派他们用军事行动去解决巴拿马的麻烦问题，而这样做既有可能引发争论又会流血。支持这一观点的最有权势的人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威廉·克罗，他一贯反对在巴拿马动用武力。克罗仅仅不愿危及美国在运河区

的地位，那里数以千计的美国属民有可能被无恶不作的诺列加当作人质。

1989年初布什就任总统前的半年内，在如何对付诺列加的问题上，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冲突不断。这场争斗，起初是通过互相抵触的情报报告进行的公文战争，有时升温为以中央情报局拉丁美洲处为中心的反诺列加派，同在国防情报局和国防部上层军事官员组成的人数更多的派别之间言辞尖刻的争论。（尤其是中央情报局驻巴拿马的站长，他确信除掉诺列加并不太费事，五角大楼则批驳了这类乐观的预言。）这些争论表明，冷战后时期美国情报政策该如何制订，在华盛顿存在着分歧。这场争论还表明，即使苏维埃巨怪正在被驱除，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之间的传统斗争却仍在继续。最后，这两个官僚机构甚至被指控利用一个美国情报官员的命运来实现它们各自的意图。

1989年2月26日是巴拿马一个非常典型的白天，早上下雨，接着放晴，继而又下雨，正午过后天空又复晴朗。在克莱顿堡的美军基地，部队的每日作息表始于世纪初美国从新独立的国家巴拿马获得一块狭长土地以开凿一条运河之日，眼下表面看来并未受诺列加独裁统治的影响。在一连串严重对抗之后，被叫作佐尼安人的美国公民同巴拿马国防军脱离接触。但是，那里并无明显的危机感。在佐尼安人的眼里，诺列加不过是个狂人，他自己的人民定会有办法对付他的。

26日正午前后，杰勒德·埃·克拉克上校——美国驻中美洲的第一流军人外交官——驱车离开克莱顿堡前去会见一名美国情报官员。他把一个装有重要文件的公文包放在他旁边的座位上。两小时后，下午两点二十分光景，克拉克沿原路返回——巴拿马人叫它作奥马尔·托里约斯大道，美国人则叫它盖拉德公路，突然间，一辆迎面驶来的汽车猛然拐入他正前方的行车道。两车相撞，后果是灾难性的。克拉克的汽车被撞得横穿过公路，靠在公路边上。迎面撞他的那辆小汽车，又撞了另一辆车，最后被弹到公路的同一侧离克拉克的车几码远的地方。

陆军刑事调查处的有关部门事后的报告称：“牺牲者：1. 克拉克，杰勒德·埃德蒙（死亡）；上校；387—50—3398；1942年5月27日，圣胡安，波多黎各；男；白种；司令部，美国南方军，克莱顿堡，巴拿马共和国”；触犯巴拿马刑法第133条；疏忽杀人（一次不幸事故的结果）。”

根据后来归档的一份医生报告称，杰里·克拉克“在一次车祸后”受重伤（多处外伤、脊椎断裂、一根主动脉撕断）致死。他的死亡发生在一辆由一个国籍不明的巴拿马人驾驶的汽车突然拐入他的行车道迎头撞上他的汽车之后，差不多是当场死亡；克拉克的丰田牌小轿车的前端几乎完全毁坏，轮胎由前轮至后轮相继爆裂。与克拉克那条方向相反的行车道上的第三辆车也被卷入：乘坐者之一，一个打算去买蔬菜的中年巴拿马妇女受伤，多处骨折和脑震荡。她的丈夫，驾驶者，站在公路旁放声大哭，以为他的妻子快要死了。在公路另一侧，克拉克一动不动地坐在车里，伏在他的方向盘上。

陆军刑事调查处巴拿马外勤办公室提供的照片反映了由撞击力造成汽车近乎全部被毁的情形。但是，坐在迎面驶来的那辆汽车里的两个人却没有受致命伤，这简直就像奇迹一般。那辆车是从附近一家国际租车处弄来的。开车的是个巴拿马人，25岁，既无工作也无财产，他受了脑震荡，满口牙齿松

动，住院治疗了若干天。他的伙伴，一名巴拿马学生，19岁，仅仅脸部擦伤，出事的第二天就出院了。他们两人都没有喝酒；两人都有熟练的驾驶技术，都系上了安全带。（克拉克没有系安全带，这是他的习惯。）事故发生的白天，地点是公路的一个笔直路段上，并不特别险峻。（虽然证人们确认，在这条三条行车道的公路上经常出事，原因是违章改变行车道。）

克拉克上校之死是由一次预想不到的不幸事故造成的，起初对此似乎没有任何怀疑。在撞车后数分钟内即来到现场的军事警察局官员们证实，几乎不可能发生节外生枝的事情。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让人假设会有任何在诺列加政权下担任正式职务的或者替任何情报机构工作的巴拿马人卷入此事。（军事情报官员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弄清楚在车祸现场附近确实没有人曾用步话机秘密联络。）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故令人目瞪口呆，因此幸存者中无一人能确切讲清楚导致这一事故的环境的时间顺序。当问及有多少车辆被卷入这一事故时，例如第三辆车的驾驶者就说，他记不清了，因为车祸是“这样突如其来，因此我看不清发生了什么事”。

尽管有了这些初步的判断，五角大楼还是立即派遣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特别调查组到巴拿马城查明克拉克是不是被谋杀的。由国务院外交安全局的官员组成的第二个小组也来到巴拿马，继军方的调查之后进一步查询。克拉克的国防情报局的同事们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私下透露，中央情报局还派了一个特别调查小组到巴拿马指导他们自己的工作。在这些调查人员中的任何一个提出初步报告之前，五角大楼就坚持强调克拉克之死是“一次不幸的灾祸”，力求以此减少公众的猜疑。一位资深陆军军官受命出面说明，新闻界的全部调查已经迅速而明确地得到了处理。“杰里·克拉克死于车祸，”他强调说，“这是一次事故。里面没有别的东西。”

这样迅速而绝对地否认就足以增加任何一个人的怀疑。詹姆斯·科尼利奥上校，曾以武官身份和克拉克在中美洲共事的军官三人小组中的一员，在华盛顿国防情报局他的办公室里坐不住了，他的同事死亡时的环境尤其使他感到困惑。“当时的情况看来是那样地古怪，”他回忆道，“我开始提出疑问。我们大家都被这件事弄得心烦意乱。”科尼利奥最后对他得到的答复感到满意。“我去问知情人，”他说，“他们告诉我，他们肯定这是一场事故。我自己思想上感到满意。”

科尼利奥接受官方关于克拉克之死的说法，是因为这种说法适合于他天真地称之为美国“最富竞争性、最有献身精神的”情报官员的“形象”。“谁以为这是有人策划的，谁就完全想错了。”科尼利奥补充说：“如果你和克拉克一起开过车，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这个事故肯定像他们所说明的那样。”按照科尼利奥的说法，克拉克在巴拿马过着一种放浪形骸的生活并且每天去冒别人觉得无法接受的危险——这两者都在他的汽车轮子背后起作用。

由于克拉克的秘密工作性质危险，关于他的死因依然疑团未释。克拉克不但是在拉丁美洲后院政策方面训练有素的一流国防情报局官员，而且还在巴拿马参与被认为是他所曾承担过的最折磨人的使命之一。表面上，克拉克是被正式委派到驻运河区的第470军事情报旅任职的，但他实际上还指导综合观察诺列加的反派的活动。在有可能的场合，他还应帮助他们的活动。据五角大楼的两名情报官员说，克拉克的任务不是国防部而是中央情报局指派的，该局尤其要求他帮助指导巴拿马的反诺列加运动，这曾经是一个严格

保守的秘密。

克拉克的使命确实对前来确定他的死因的军方调查人员产生了影响。事故发生的时候，克拉克携带一个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并且是在会晤了一个同巴拿马反对派人物有联系的美国官员后返回的途中。前一天，克拉克参加了几个同巴拿马“埃雷拉小组”领导人举行的会议，并帮助协调他们的反对活动。

克拉克很适合做这项工作。他不仅在先前的五年内同诺列加多次遭遇，而且当美国政府谋求得到巴拿马的埃雷拉·哈桑上校的合作以反对诺列加的时候，护送此人从以色列抵达华盛顿的正是克拉克。尽管国务院怀疑埃雷拉·哈桑的能力，而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内部的亲诺列加派又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克拉克仍旧努力争取建立一个以这位巴拿马上校为领袖的反抗小组。用一位国防情报局官员的话来说，克拉克为埃雷拉·哈桑“担保”，尽管克拉克也承认，埃雷拉·哈桑可能不是能胜任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但他仍全力以赴，毫不畏惧。末了，克拉克在巴拿马的经验证明是失败的。“杰里恰恰不认为我们做得够充分的了，”国防情报局里他以前的一位同事说，“埃雷拉小组是一伙笨蛋；宣传工作收效甚微。诺列加的地位比以前更加巩固了。”

在克拉克看来，诺列加乃是拉丁美洲的首恶——他是那种老一套的假强人，他利用居民传统的反美情绪来争取人心。克拉克认为诺列加是“一个在校园里恃强凌弱的恶棍”，“一条叫起来很凶的狗”，是美国真正的敌人。反对派人物何塞·布兰唐闻悉克拉克的死讯后大为震惊，按照他的说法，克拉克“藐视诺列加，而这种感情是共同的”。与克拉克一起在中美洲工作的美国陆军上校约翰·卡什表示同意：“在克拉克看来，诺列加是个麻烦。”克拉克从经验中了解到，通过谈判或简单的政治操纵是不可能让诺列加下台的。（克拉克在一年前曾目睹国务院官员迈克尔·科扎克劝说诺列加下野但纯属徒劳。）克拉克告诉他的同事们说，诺列加真正尊重的唯一东西是赤裸裸的实力。因此，一有机会，克拉克就力促美国的反诺列加计划逐步升级。

克拉克对诺列加的憎恶差不多就像传奇里所描写的那样，这也是官方关于他的死因的说明在此后数月内蒙上疑云的主要原因。3月中旬，巴拿马官员私下里说，给克拉克验尸时拍摄的照片中未公布的那些，底片被他们曝光了，这时，美国调查人员中出现了最初的不安迹象。这件事一直未作解释并且令人困惑——尤其因为巴拿马当局曾经答应把验尸结果转交给美国陆军但事后又一直拒不交出。4月，熟悉克拉克在巴拿马的工作的记者们开始听到谣传说，克拉克可能是一次有目标的攻击的牺牲品。当美国政府拒绝把它关于克拉克之死的调查结果交给大众媒体时，猜疑就更大了；接着，巴拿马官员不愿答复有关事故的例行提问，又加深了怀疑。克拉克的一些朋友认为，对他的死不应该只进行表面的调查。

4月中旬，当达马托参议员获悉围绕克拉克之死的种种怀疑之后，首次出现了突破。达马托，那时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个新成员，公开批评里根和布什政府措施不力未能除掉诺列加，他一听说这位美军上校有可能是被谋杀的就怒不可遏。达马托在形容诺列加时说：“那个狗娘养的！”为了强调，他屡次重复这个咒骂。他吩咐他的班子对此事件进行独立的调查。达马托在大发雷霆的次日又就克拉克之事询问陆军部长约翰·马什。马什回答说，对该事件的进一步调查正在进行中，至今尚无任何迹象表明系暴力行为。达

马托后又接到正式保证称，怀疑克拉克被谋杀是没有根据的。尽管达马托自己派出的调查人员最后同意这种结论，但这位参议员对围绕克拉克之死所发生的种种事情一直表示怀疑并重提此案，于是，1989年5月五角大楼又派遣第二个官方小组去巴拿马。

这些调查人员为深入了解克拉克一案而需获得诺列加政府的许可时，却遇到了重重困难。他们处处受到巴拿马当局的阻挠。巴拿马警官对美方的调查不予合作，甚至非常无礼。约定会见时他们不露面，也不转交任何他们所掌握的证据。甚至像获准给克拉克的汽车拍照这样简单的事情也遭拒绝。仿佛他们有意助长有关克拉克之死的谣传。

尤其使美国调查人员感到吃惊的是，巴拿马官员拒绝以任何刑事过失传讯造成克拉克死亡的那辆汽车的驾驶人。突然转向克拉克的汽车前方的那辆车的驾驶人没有有效的驾驶执照，但巴拿马官员无视这一事实仍不予追究。直到5月下旬，由于美方坚决要求，那个开车的巴拿马青年才被指控犯有疏忽杀人罪。

该青年对事故发生前事情的陈述，在细节上模糊不清，充满矛盾，疑点不小。他说，在事故发生前的那天夜里，他参加了一个聚会，在那里，“我的一个熟人”，名叫“波乔”——他以前从未见过此人，也无法对调查人员证实此人的身份——约他次日在一家旅馆前见面，要他帮助此人去弄一辆车，随后开到哪里，目的何在，他一概不清楚。

“就这样，波乔露面了，”那个青年驾驶者说，“他要我去取车，车是租给他的，停在圣米古埃尔。波乔给我一张便条，写明委托我去取车。我去到圣米古埃尔（区）新光酒吧前……一个年轻人站在那里，以前从未见过，也不知他的姓名。我把便条给他并对他说：‘波乔说你会给我一辆车。’他不愿把车给我，便（打电话）去问，我也不知他要问谁，电话打不通，他便决定把它（汽车）给我，（尽管）他不相信我以及我对他说的话。”

那个青年驾驶者补充说，事故发生之前，他还去看过他的女友，“她的名字我记不得了。”

关于那辆汽车——究竟是谁让他去取车的，租车处的商号是什么，随后又把车开到哪里去——这个年轻人同样统统记不起来。美国军事情报调查人员得到一份租车协议的复制件，但简直莫明其妙。一位有见地的五角大楼官员声称，刑事调查处的官员在3月或4月间都未能找到事故的目击者，他们发现，事故目击者们先前提供的证词的关键部分矛盾百出。但是，最可疑的障碍仍旧是那个开车的年轻人，他甚至连他本人生平中某些简单事实都记不清。在调查过程中，对于克拉克死亡事故中他所扮演的角色，他从未有过丝毫的自责，尽管他无可争辩地应对这一事故负责。

最后，五角大楼对这些疑点也无可奈何。第一个美方调查组组长A·T·罗西上校在4月间写道，他们找到的证据使人确信“杰勒德·克拉克上校之死……是一次不幸的公路事故”。三个星期以后，被派往巴拿马的第二个美方调查小组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的报告称：“鉴于新近提出的克拉克上校系遭蓄意谋害这一断言，对克拉克死时周围环境的进一步调查业已完成……导致克拉克上校死亡的事故发生在一条可以高速行驶的公路上，驾车者经常违规改变行车道，因此很不安全。若要蓄意制造这一事故并能取得成功，那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这需要把时间安排得分秒不差，而且还需要一个甘愿冒生命危险迎头冲撞的驾车人。”

本来指望有了这份最后的报告便可打消关于克拉克之死的疑问。说也奇怪，国防情报局里克拉克的同事们仍然对就2月26日交通事故进行调查的方式感到愤慨。假如克拉克是被谋害的，那末，只有一个人可能下令干这件勾当。既然如此，诺列加将军肯定就得偿命；最低限度美国将被迫对他采取行动。

事故发生后三天，克拉克被安葬在阿灵顿公墓，享受全部军人的荣誉，这时，他的死亡的高度政治性质即已彰明昭著。参加追思礼拜的人数众多也清楚表明克拉克是位有声望的军官。参加者之一，巴拿马反对派人物何塞·布兰唐回忆说：“所有关心中美洲的人都来参加葬礼了——好的巴拿马人，坏的巴拿马人，中央情报局人员和对立派，来自萨尔瓦多的威廉·沃克大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鲍勃·帕斯托里诺，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和内斯特·桑切斯。死一般的寂静。”

追思礼拜正要开始，奥利弗·诺斯中校也前来表示他的敬意。人所共知，诺斯是克拉克的引起争议的竞争对手，克拉克认为他过去在洪都拉斯遇到的难题都应由这位军官负责。诺斯的到场使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真使我吃惊，奥利露面了，”克拉克的一位支持者说，“这有点过分，确实非常不得体。这（追思礼拜）是为克拉克的朋友们举行的。我不明白诺斯有什么理由要来。”

克拉克之死不可避免地成了情报界广泛关注的事情。实际上，就五角大楼对该事件所作调查提出质疑的那些官员构成了反诺列加派的核心，而该派眼下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地位突出。在他们看来，克拉克之死（即使是偶然的也）象征着巴拿马的危机可作多种解释；已经有人提到诺列加有可能是一次暗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加速实施推翻巴拿马独裁者这一计划的充分理由。另一方面，国防情报局的官员们宁愿持一种更为稳健的看法。他们承认克拉克是一位重要的美国军事情报官员，但他们坚持认为，克拉克支持诺列加的反对派，他的这一角色未必会使他成为谋杀的目标。

关于克拉克之死的意见分歧使情报界关于诺列加问题而进行的规模更大、性质更加严重的争论表面化了——它暴露了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有关在巴拿马该怎么办的看法是以不信任和猜疑为特征的。同任何人一样了解克拉克的詹姆斯·科尼利奥上校讲得最好：“假如我是记者，正要报道关于克拉克被谋杀的传言，那末，我就会非常非常小心的。我知道，政府里有人乐于看到让大家知道克拉克上校是被诺列加杀害的，他们正需要一个理由去捉拿他。”

在1989年的前6个月内，曼努埃尔·诺列加有目的地推行一项威吓居住在巴拿马的美国人计划，自负地试图争取到他本国人民的支持。屡屡发生的暴力事件威胁着平民的生命，也拧了一把自以为居于超级大国地位的美国的鼻子。1月，3个巴拿马国防军士兵强奸了一个美国妇女；2月，1名美国陆军军士遭诺列加士兵的攻击；数周后，巴拿马警方以汽车牌照违章为由，勒令21辆乘坐着数百名美国儿童的学校大轿车停下（这一事件正是一次使人神经紧张的警告：如果美国硬要向诺列加开战，等待着美国属民的将会是什么）。

在发生这些事件的期间，国防情报局发出的一份简报称，“在过去的13个月内差不多有1,000次骚扰事件”完全针对心惊胆战的美国人。当时的另一份简报详述了美国如何易受攻击。这份军事情报报告断定：“巴拿马国防

军参与的事件从违反条约和侵入美军设施直至不起诉即予拘留和严重殴打。”“不起诉即予拘留的事件屡见不鲜；从1988年2月至1989年2月底，此类事件记录在案的已有292起。”这份报告还补充说，“美国人遭受巴拿马国防军肉体侵害的有20起”。

毫不奇怪，布什总统的高级顾问们确信，巴拿马危机乃总统的当务之急。这诚然也是国务卿贝克的看法，他上任后的第一个星期全被用于参加详细介绍这一日益危险的局势的会议。在一次这样的情况介绍会上，贝克得到一个厚厚的文件夹，全是中央情报局的机密报告，它们用材料证明，诺列加对于乔治·布什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潜在的厄运般的政治麻烦；他是对美国安全的一个发展成熟了的威胁。尤其是一份中央情报局的备忘录，对美国所面临的危险作了率直的评估；该报告称，诺列加已从穆阿迈尔·卡扎菲手里得到超过2,000万美元，显然在美国业已实行的经济制裁的情况下维持住了他的政府的生存。一位熟悉这类情况介绍会的情报分析人员说：“我们无需陈述显而易见的事情。看了我们的报告就会明白，诺列加已经同恐怖分子结盟了。”2月间送交贝克的另一份特别情报摘要称，诺列加和卡扎菲勾结始于1988年9月，而那时，中央情报局首次自信地报告说，美国的经济惩罚正在生效。经济制裁现已收到严控之效，”中央情报局那时报告说，“诺列加已快用尽他从利比亚得到的钱。”

贝克还得到有关难以理解的事件的绝密报告，即美军同巴拿马国防军在美国基地附近公开交火——在此之前，这些事件无人提起过。美国情报机构相信，有一次事件可能把古巴突击队员也卷入了，他们参与了一次对运河区一个美军油罐场的袭击。袭击始于凌晨的黑暗之中，穿“黑色伪装服”的身份不明的士兵“用步枪和迫击炮”向守卫油罐场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开火。战斗持续了“两个半小时”，但是犹如出现了奇迹，美军没有伤亡。中央情报局告诉贝克的同类事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像是真实可信的。

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这份报告看，很明显，在该局内部就针对诺列加该做些什么的争论已经结束——中央情报局行动部拉丁美洲处里的反诺列加派至少取得了局部的胜利，现在回头去看，那时该局领导已得出明确结论，反正该局必须做点什么，哪怕仅仅为了表明该局正在脱离它过去同这个巴拿马独裁者的关系也好。在GAMA公司的咨询研究完成之后，中央情报局推出一项由行动部资深官员建议的特别谍报计划。该局利用外国特工作为初步情报来源，制定一项高度机密的综合计划，以调查诺列加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资金来源为目标。在行动部内部成立了一个巴拿马特别工作组，复查从英国、瑞士、南美、开曼群岛和巴拿马的银行中的消息来源传来的原始情报资料。

最有价值的情报或许是在瑞士获得的。在日内瓦贴现银行和倍托公司里，诺列加政府和若干巴拿马公司有大笔存款，该行一名高级经理人员把同诺列加有关的文件透露给了行动部。中央情报局的报告称，1988年年底和1989年年初，诺列加私人的钱和巴拿马公司的资金鬼鬼祟祟地从日内瓦转移到了开曼群岛的银行里，使之离巴拿马近些。某些情报分析人员推测，这可能是巴拿马商人的“资本外逃”，可是，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更倾向于把这种转移看作是一种迹象，表明诺列加担心美国有可能摸到他的资金。

中央情报局所掌握的关于这些资金转移的资料以情报与调研办公室撰写的绝密备忘录的形式送交国务院：“根据特别情报：瑞士的贴现银行和信托

公司的巴拿马分支机构于（1988年）7月5日把超过23,600万美元转到大开曼岛一家银行的账上。”

这些信息没一件能安慰贝克，他相信诺列加能靠残酷剥夺巴拿马剩余的资产而在经济压力下生存下去。这种观点反映了布什政府内部的传统智慧，即对制裁的作用持怀疑态度。中央情报局的谍报计划实行后四个月，政府官员不顾兰利先前提供的保证而争辩说，单靠制裁不能把诺列加赶下台。政府指出，强化其立场的正是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即诺列加可以从诸如外国银行、没收资产以及像卡扎菲这样的盟友等任何一个来源获得资金。

1989年初，中央情报局对制裁的看法开始起变化。先前，即1988年问，该局轻率地向里根总统保证说，制裁已“收到严控之效”。但六个月后，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已不愿向布什总统讲同样的话了。对制裁作用的怀疑絮聒不休，有关美国公司无视政府禁令的报道令人烦恼，这都暗中破坏了布什总统借经济压力迫使诺列加下野的尝试。布什在他的政府该如何对付诺列加的问题上把自己描绘成正在步入困境；在秋天的大选过程中，他曾向美国选民允诺，他不会就这个独裁者自愿引退一事同他谈判，然而在如何对付诺列加的问题上卷入内部争论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们，都坚持说该局仍继续向白宫提供有关巴拿马政治局势的“准确而及时的情报”。1989年2月以后，兰利显然逐渐调整了它的立场以反映布什本人的想法：摆脱诺列加这个麻烦的唯一途径是强迫他下台。中央情报局退而承认，制裁不再有效。

另一方面，军事情报官员仍旧像是确信制裁最终会奏效，因为五角大楼要避免在巴拿马采取军事行动。为支持军方的这一立场，五角大楼广泛出击，对中央情报局于2月间向贝克国务卿提出的每一主张均表怀疑。对中央情报局最直言不讳的批评是国防情报局的官员们传播的。五角大楼的官员在一份国防情报简报里公开嘲笑中央情报局气喘吁吁地接连报告说卡扎菲向诺列加提供资金。“有暗示称，可能从诸如毒品贩子或利比亚等国外来源获得现金”，一份广泛传播的国防情报简报这样写道，“但是，对这些来源如何提供金钱的真实情况却鲜有报道。”这一最初的指责乃是国防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之间在如何对付诺列加问题上进行激战的背景。

这场部门间战斗的第一枪是由中央情报局打响的，该局再次传送在里根总统任内最后一年首次传阅过的一份绝密情报报告，题为《哈瓦里行动队员前往巴拿马开展反对美国利益的行动》。中央情报局称，哈瓦里特别行动小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情报与安全武装——的头头计划对美国在巴拿马的资产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这份中央情报局的备忘录详细得不同往常。“3个黎巴嫩巴勒斯坦人，用真名实姓的护照旅行，已离开黎巴嫩赴巴拿马，他们打算对运河区的美国籍船舶采取恐怖行动。在此之后，他们计划进入美国。”该报告又说：“由3名巴勒斯坦行动队员组成的第二个小组已在9月初离开贝鲁特赴巴拿马。同时，在巴拿马，6名行动队员将设法让另一些行动队员搭乘驶往美国港口的船只潜入美国。”

这份报告以及相继举行的由反恐怖活动官员谈诺列加同激进的巴勒斯坦小组之一的联系的高层情况介绍会，受到国防情报局的大声嘲笑。在中央情报局歇斯底里地发出战斗号召后数日，充耳不闻的国防情报局在一份备忘录里论证道：“有若干因素对这份报告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倘若阿拉法特事先知道哈瓦里将采取行动反对美国利益的话，他很有可能会阻上这次行动，理由是它对当前巴勒斯坦运动的利益是有害的。”国防情报局的这份报告接着

以驳回的口气说：“诺列加将军很有可能不赞成……在巴拿马国土上搞恐怖活动，他担心一次威胁运河安全或美国在巴拿马利益的攻击会向华盛顿提供充分的理由对他采取军事行动。到目前为止，诺列加的行动都有力地强调他一心想的是避免向美国提供这样一种理由。”

这份报告概括了国防情报局的正式立场，军事情报官员私下里对中央情报局的批评还要刻薄。一位官员指出，该局“肯定知道”以色列同诺列加在情报方面的合作，他暗示，中央情报局的警告“受以色列的影响”。国防情报局传播这种怀疑确有某些根据，因为诺列加的密友之一是前莫萨德（以色列情报机构）的特工迈克·哈拉里，1974年，他把一个在挪威工作的无辜的摩洛哥招待员，误认为是慕尼黑奥运会屠杀事件的巴勒斯坦策划者，因此声名狼藉。他下令谋杀了那个摩洛哥人之后，被莫萨德开除。此后他去到巴拿马，先为托里霍斯将军效力，这位将军死后，他又投靠诺列加。巴拿马国防军的反暴乱分队后来就具有经他训练的特征：派小组冲进人群作为威吓手段，继而迅速、果断、势不可挡地使用暴力，强调残忍地殴打。哈拉里受诺列加的器重，派他负责严密监视巴拿马国防军中的背叛者。埃雷拉·哈桑上校由毫无结果的华盛顿之行返回后，哈拉里认定他是个有可能制造麻烦的家伙，就根据诺列加的命令，解除了埃雷拉·哈桑的巴拿马驻以色列大使的职务。

尽管哈拉里对诺列加有影响，但是，中央情报局这份关于巴勒斯坦杀手小组的报告系来源于该局一个亲以色列的小集团之说则是不可信的。国防情报局一位经验丰富的官员对这份警告提出了较为温和的解释：“他们并不把有关恐怖活动的原始情报资料通报各科。如果他们有，这些原始资料也永远不会见天日的。”

中央情报局作出选择，对五角大楼的批评不予回击。有关杀手小组的警告，该局反正已经报告了，这样也就可以了。中央情报局一位退休官员说：“与诺列加有关的局势非常危急。如果我们有好的情报，详细的情报，我们必须报告。我们不能因为它不合模式就断定它是假的。倘若一艘美国船在运河上遭到袭击，国防情报局就会大声尖叫，说我们白吃饭。”

国防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意见不一乃司空见惯，但1989年他们如此恶狠狠地拳来脚去则非同寻常。仿佛这两个官僚机构交换了角色。中央情报局在诺列加问题上先是保守地推荐他，后又拖着不去调查，还相信他的继承人将成为“曼努埃尔二世”，如今它改辕易辙，转向强硬战略。该局断定，制裁不能迫使诺列加下野；他自负，财源充足，有国际恐怖分子网的支持，可是，国防情报局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同样的情报报告：诺列加快把钱花光了，他的政府濒临崩溃，有关他同利比亚杀手的勾结的报告所根据的是不可靠的证据。

诺列加对于情报界的确是个棘手的难题。中央情报局告诉白宫，巴拿马危机已到紧要关头，需要直接行动，并暗示应进行军事干涉。这种观点激怒了军事官员，他们私下指责中央情报局是要五角大楼保释他们。国防情报局一位官员抱怨说：“他们拆了烂污，现在却要我们去替他们收拾干净。”

兰利和五角大楼的争斗加剧，3月前后，拉丁美洲问题专家们纷纷表明自己在这场辩论中站在哪一边。例如主管美洲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告诉记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故意忽略在巴拿马的美国公民遭攻击的报告。克罗反击。克罗的发言人威廉·斯姆兰告诉《陆军时报》：

“主席选择更秘密的途径通过（南方司令部）处理（有关巴拿马暴力事件的报告）。这是他的作风。他并非把他的情况传递给公众或新闻界的人。”

南方司令部公共关系主任罗纳德·T·斯科尼尔斯在致《华盛顿邮报》的一封信中替军方辩护，他否认有任何巴拿马的骚扰事件被“掩盖或缩小”。斯科尼尔斯写道：“恰恰相反，美国陆军南方司令部尽力公布全部对安全无害的或正在调查中的事件。”

斯科尼尔斯的说明是准确的但是不完整。他不能披露的是，美国情报官员受到诺列加的安全机构日常的监视。中央情报局告诉贝克国务卿，有若干美国人已被拘留。该局还承认，诺列加已成功地渗透进某些巴拿马反对派小组中；若干埃雷拉·哈桑的人员已被“关押”。向公众承认他们的被捕将暴露美国政府拿不出有效办法来迫使诺列加下台以及五角大楼和兰利之间长期激烈的争斗。

总之，1989年初的情报战使布什政府陷于瘫痪：五角大楼叫声刺耳地反对以军事干涉反对诺列加，而中央情报局想发动一场政变以推翻诺列加的图谋仍然遇到重重的困难。

诺列加折磨美国人，对他们想要撤换他的企图提出诘难，但他从不采取会导致公开对抗的任何步骤。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员预言，他会着重运用一种战略来影响拉丁人历来厌恶“美国佬的侵略”的情感。诺列加把一般巴拿马公民作为他的宣传对象，他显然希望他能恢复他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声望。

面对这样的策略，中央情报局束手无策。该局的巴拿马城站长苦心经营，在运河区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反对派队伍，他对埃雷拉·哈桑能对诺列加的统治构成真正的威胁一事不抱多大希望。同时，该站长是从德韦·克拉里奇学校出来的一个行动主义者，他由于华盛顿不能对诺列加采取强硬措施而灰心丧气，他在几份报告中批评美国的计划，他的这些报告在该局资深官员中传阅。最后，他的牢骚越来越大，于是受到警告，不得违反针对他的指令。

一个中央情报局人员解释道：“（该局的这位站长）想通过保持对诺列加施压使他干出蠢事来。他推荐我们采取某种行动，不是仅仅表示支持埃雷拉，而是武装（反对派）。他认为巴拿马局势正在升温而我们可加以利用。”

这位站长的建议的核心是计划在已拿马国防军内部搞一次起义，它可以被用来作为干涉的借口。事发之后，在某种情况下，已拿马国防军的军官们甚至会把诺列加移交给美国人去审判。这些建议当即被否定。总统裁决要求支持反对派力量，而中央情报局的方针是必须严格按总统的指示办。

鉴于中央情报局的精神状态，行动部主任理查德·斯托尔茨并没有认真地考虑要让该局在巴拿马起比较积极的作用，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诺列加是兰利在公众中引起最大争议的问题；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新闻界受到批评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他的名字。密切注视着中央情报局一举一动的记者实在大多了。其次，那位站长的建议太接近于触犯法律：该局不得行刺外国领导人，也不得支持显然以杀害领导人为目的的政变。在国外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准都不愿被牵扯进像谋杀阿连德那样的事件中去。他们认真对待这些限制，故而事实上，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专注于政治上变化不定的事件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往往拒绝同亲美的不同政见者交往，他们担心自己的行动会被人曲解。无论斯托尔茨、韦伯斯特或者特威腾都不愿冒风险：中央情报局会帮助反对派力量，但他们的活动是否成功那就要看他们自己的本事了。

然而，到了5月初情况已经明朗，中央情报局的努力失败了，巴拿马的

异议人士也未能组成一个值得称道的反诺列加的反党派。例如该局很难找到愿意启用上一年就设置好的秘密无线电台网的巴拿马人。他们未能说服任何人去发动一场旨在使国内人民愈益不满诺列加政权的心理战。

这项心理战计划是2月中旬在白宫的一次高层会议上定下来的，布什、贝克、韦伯斯特和斯托尔茨决定给反对派力量1,000万美元，帮助他们参加即将到来的5月间的选举，这项决策，即电很和布什任内中央情报局有关巴拿马的第四份秘密计划，其目的是要看一看反对派人物对诺列加的憎恨能否转变成为一个在巴拿马公民中间有广泛基础的运动。可是，被派往巴拿马执行计划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直到3月中旬才开始分发美国钞票。

尽管已定下计划提供经费，尽管驻巴拿马的站长观点强硬，中央情报局并非真心实意地在执行此项计划。该局眼下渴望新闻界关注甚至夸大诺列加的罪行，然而它在巴拿马不采取直接行动，则反映了韦伯斯特和斯托尔茨两人不愿冒险的态度。中央情报局1988年搞秘密电台网失败了，同样，该局在1989年搞的心理战计划在引发巴拿马人对诺列加的不满上也证明只是一种温和与无效的手段罢了。最后的活动中是散发由运河区一家小出版社印刷的小册子，这些东西不过是废纸一堆，根本不能鼓动巴拿马人上街去反对诺列加。这样的结局并不使人惊讶。计划失败，招致质问，例如布什总统规定了用途的那1,000万美元究竟花了没有。

中央情报局努力帮助反对派，到头来却成了公共关系上的麻烦事，因为反对派领导人照例告诉读者们，他们从未见到过任何美国给的钱。由于这种或那种公共关系上的原因，中央情报局却因为“次使巴拿马安全部门大为恼火的独立而有效的行动而大受赞扬。这另一项计划具有一次成功地隐蔽的行动的全部特色：考虑周全，运作者练，安全意识强，非常有效，给巴拿马国防军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唯一的问题在于，中央情报局同这次行动绝对没有关系。

这项计划的萌芽是一次原来与此毫无瓜葛的谈话，它是1988年初在巴拿马城扶轮国际分社的一次午餐会上在库尔特·弗雷德里克·缪斯——一个39岁的美国商人和无线电爱好者，同若干扶轮社会员——他们都是具有公民意识的美国企业家之间进行的。缪斯兴奋地向他的朋友们提到他曾用他的警用扫描器窃听到巴拿马国防军的通讯联络。他说他甚至能监听该政权警察局的行动并大量记录下警方对付反诺列加示威者的策略。缪斯发现，另外几个扶轮社会员也在干同样的事。

缪斯不久便找到了几个反诺列加的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他们一起监听巴拿马国防军的通讯联络。在短时期内已有大约六个美国商人组成的小组在窃听该政权的通讯网。数月后，缪斯的网变得更为先进了，该小组每天相互传递其收获（包括一张巴拿马国防军使用的周率表）。该小组甚至截获巴拿马高级军官用单元机打的电话，报话人描绘了巴拿马最高军衔的军人们的性爱功夫。缪斯和其他无线电爱好者记录下巴拿马国防军的毒品交易和拘捕反对派活动分子的情况。

最后，缪斯及其志愿人员编制了一个大规模的数据库，贮存有关诺列加罪恶活动的情报和巴拿马国防军驱散反政府示威者时所用的策略。他们甚至能窃听到巴拿马国防军拘捕反对派主席埃里克·阿图罗·德尔瓦利的计划。缪斯还把诺列加的计划告诉了德尔瓦利并帮助他的副主席罗德里克·埃斯基韦尔避开了巴拿马国防军军官，逃离该国。

缪斯逐步升级地卷入巴拿马的政治，自然而然地采取了下一个步骤。他计算出一种方法来测知巴拿马国防军传输的电波并插入他自己的信号。缪斯和他的同伴用定向天线、发射器和扩音器成功地覆盖了政府的发射台——国家电台的信号。缪斯的成功使他又惊又喜。

中央情报局也是这样干的。它在运河区内一个小基地监听国家电台并且把节目的复制件提供给兰利。当该电台的广播出人意外地中断时，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便知道有人有目的地在用信号进行干扰。干扰逐步升级，这是当地人开展反诺列加斗争的第一个迹象。

缪斯录制并播放一个三分钟的反对诺列加信息，要求这个独裁者让巴拿马人民进行自由选举。这个信息使诺列加的部队惊慌失措，还因为他们无法确认背后究竟是谁。诺列加指责美国和中央情报局侵犯他的领空权。中央情报局对诺列加所说的事情感到莫名其妙。缪斯在首次播放三分钟信息后，他还使巴拿马国防军难以确认这信息是他或他的同伴播放的。他购置了定时器、盒带和其他尖端的无线电设备使广播自动化。他还把他的设备搬进一套无人住的公寓里，这样一来，即使巴拿马国防军能够确认信息的来源，他们也抓不到作案的人。缪斯还弄了几套无线电设备，即使一个台关闭后，另一个备用电台即可继续广播。

在一个每天广播三次的典型信息中，缪斯劝说巴拿马国防军推翻诺列加。他使用十足的民族主义语言，仿佛他是个巴拿马公民：“你们以你们的职业为耻，因为领导你们的那个败类玷污了这一职业。”缪斯还利用他的设备的优势，用他的简单的扫描器监听警察局和巴拿马国防军的广播。他和他的小组利用这些情报向拥上街去镇压示威游行的诺列加的支持者发出相反的指示。

1989年3月中旬，缪斯在巴拿马境内的八个地点设了八个电台。诺列加的警察局刚测出一个电台的信号，另一个电台就开始运作了。诺列加的国内安全警察忙于追踪他，中央情报局同样也在追踪他。

就在这同一个月，中央情报局首先和缪斯及其同谋者接触。初次会晤后，该局向这些美国商人提供他们通过经纪人买不到的尖端无线电设备。缪斯还同巴拿马反对派中受中央情报局支持的中间人碰头，后者给了他一台高功率的发射器，使他的广播能让最广大的听众收听到。中央情报局应受称赞的是，它很少干预他的行动。它竭力避免给他建议或向他提供亲美的广播文稿；他自己干得很好。该局又向他提供了一台电视发射器。最后，在迈阿密的反对派小组中最乐观和坦率的人物之一博斯科·巴利亚里诺向缪斯提供了反对派的盒带并提出若干节目主题。

巴利亚里诺于八十年代中在诺列加的压力下离开了巴拿马，此前，他是国内广播电视界的知名人士，他欣赏缪斯的“创造性和勇气”，他称这位美国商人为“临时间谍”，说缪斯“在两个月内（1989年2月和3月）所做的事情比我们（反对派）两年内所能做的事情还多。”巴利亚里诺从佛罗里达继续向缪斯提出挫败巴拿马国防军的新方法，向他建议“会对诺列加产生影响”的广播内容。中央情报局十分信任缪斯。监听他的运作并提供有关他的活动的报告的专案官员们感叹不已，因为他在欺骗、反监听和操作安全方面并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却能如此长久地躲避摆开阵势对付他的巴拿马国防军。

尽管缪斯的广播网是非正式的，但它是在巴拿马进行的设计得最好、保

护得最好以及最有效的反诺列加行动之一。它确实比中央情报局搞的任何名堂都要棒。

这一成功的活动持续了仅数周之久。在几次侥幸脱险后，巴拿马国防军终于查明是缪斯并破获了他的电台网。4月5日，缪斯落人诺列加士兵之手，另有几个巴拿马反对派人物以及价值35万美元的无线电设备。他被投入戒备森严的牢房里单独监禁，等待着他所预期的处决。

两星期后，韦伯斯特和国防部长切尼在华盛顿会面商讨缪斯事态。韦伯斯特尽可能地制造机会，他暗示，缪斯是该局的一个宝，重要得很，营救他对行动部是一件荣誉攸关的事，过去，先是巴克利后有甘农遭恐怖分子杀害，行动部欲救不能。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了。韦伯斯特告诉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不能坐视它的一名“特工”——他这样称呼缪斯——遭杀害。切尼无疑知道缪斯很难说是中央情报局的专案官员或特工，但他同意把营救缪斯作为五角大楼干涉巴拿马的军事计划的一部分。会后，切尼指示，在南方司令部入侵巴拿马的通盘军事计划外再加上一项新的军事行动：假如或当美军干涉时，将指派一个经过特别训练的德尔塔营救小组闯入德洛监狱去搭救中央情报局的这名特工。但是，中央情报局并非美国政府中遇上难题的唯一部门。

缪斯被捕后两周，4月21日，白宫作出了一个没有先例的决定，把布什在2月间签发的情报分析结果的有关消息透露给了报界，于是乎，美国和巴拿马反对派运动间固有的不信任加深了。这条消息最初发表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它披露反对派曾得到资金用以实行反诺列加计划和支付“印刷、广告、运输和通讯”费用。布什总统的本意是借透露这条消息给诺列加送去一个信息：美国正在采取反对他的积极措施。然而，反对派领导人却指责说，透露这条消息使他们在巴拿马的若干活动陷入严重的危险境地。允许发表《美国新闻》上的文章使他们大为震惊，并使他们确信有一个亲诺列加的小集团一直在华盛顿活动。某些反对派领导人甚至把透露此消息归咎于美国政府内部以内斯托·桑切斯为首、由布什的助手组成的阴谋小集团，他们相信，桑切斯是这一事件背后的真正的罪魁祸首。

白宫批准透露消息的真正原因其实同诺列加和反对派都没有灰系，而仅仅为了内耗。透露消息是在星期五夜间，此前白宫获悉《华盛顿邮报》正在印一篇反面文章，说诡计多端的诺列加始终比布什“更为狡猾”，白宫在拨款支持反对派一事上吝啬小气。白宫希望选择这个时机透露消息既能使《华盛顿邮报》尴尬一场，又有助于使美国人民相信，布什正尽其所能地在迫使诺列加下台——包括为一项把诺列加赶下台的秘密计划拨款1,000万美元。

但是这一战略结果令人扫兴。在消息透露出去后24小时内，诺列加让巴拿马各报头版头条都印上反美大字标题，把布什和中央情报局臭骂一顿。标题之一是：“他们以1,000万美元出卖了他们的国家”。

1989年春唯一的好消息是美国政府不必再同无色彩的贪婪的巴拿马总统埃里克·阿图罗·德尔瓦利打交道了，他的任期将满。即将在5月举行的大选中，新的反对派候选人将是52岁的吉勒莫·恩达拉，一位以劳工关系为专长的律师，说话温柔，圆圆胖胖。尽管其貌不扬（矮个子，体重在200磅以上），恩达拉其实是个有头脑有胆量的政治领袖。许多人相信他将是一任好总统。和德尔瓦利不同，恩达拉清楚地意识到巴拿马需要怎样的总统以及如何献身于民主原则。他还是个民族主义者，一听别人说他是美国傀儡就火冒三丈。

反对派的候选人名单还包括两位与恩达拉旗鼓相当的副总统候选人，两位知名的反对派政治家：吉勒莫·“比利”·福特，活跃、健壮、勇猛的演说家；里卡多·阿里亚斯·卡尔德隆，教授，性好犹降却善于用脑，他的政治组织深深扎根在巴拿马有义务感的民主主义者中间。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3人竞选得到了诺列加的正式批准，他要显示他自己的候选人能击败这3个亲美派而赢得选举的胜利。这个估计大错特错。恩达拉、福特和阿里亚斯·卡尔德隆开始在人民中竞选。这时还来了一个庞大的国际竞选观察团，其中有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及其夫人，还有20多个美国人。

5月7日的投票结果表明，诺列加正在蒙受选举失败耻辱的边缘——一次一边倒的选举结果将导致他的政府倒台。然而，一天下来，宣布的选举结果却有利于诺列加。卡特宣布选举结果无效。“政府用欺骗手段赢得选举，”他说，“这是剥夺巴拿马人民的合法权利。”投票后卡特即飞回华盛顿向布什报告。他告诉总统，恩达拉、福特和阿里亚斯·卡尔德隆显然赢得了选举。但卡特告诫说，不要进行军事干涉，他建议总统谋求拉丁美洲各国共同施加压力。布什谨慎但又坚决。“巴拿马人民发言了，”他对新闻界说，“我吁请诺列加将军尊重人民的声音。我吁请各国领导人敦促诺列加将军”尊重明白无误的选举结果。”

在这一片喧闹声中，诺列加采取了一个步骤，这可能是通往灾难的路上最致命的。

5月10日，恩达拉、福特和阿里亚斯·卡尔德隆在巴拿马城走上街头集合群众支持他们的胜利并试图迫使诺列加下台。3位反对派领导人是一群唱着歌的支持者穿过城市。一开始风平浪静。群众的情绪喜气洋洋，似乎巴拿马人民相信，他们为摆脱独裁所做的一切就是显示他们的团结。恩达拉、福特和阿里亚斯·卡尔德隆也与民同乐，尽管他们正确地感觉到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那天早晨，诺列加决定要杀一杀他们的傲气，他派出巴拿马国防军和一伙由他的仪仗队队员组成的亲诺列加的准军事暴徒去冲散他们的游行。

巴拿马士兵在西班牙大街和群众首次冲突，他们用大号铅弹射击游行并施放液化催泪瓦斯。当大批群众向市中心进发时，他们被巴拿马国防军的几个重武器营所阻。紧张地对峙了30分钟后，群众突然四散，进入两侧的大街小巷，随后在大教堂附近再次聚集。这时，一天的神经紧张状态顷刻间被摧垮，巴拿马国防军部队跑步冲进人群，把反对派人物一个个找出来残暴殴打。3个反对派候选人正要逃跑，却遭身穿仪仗队短袖衫的诺列加党徒的攻击。阿里亚斯·卡尔德隆在得救之前先后五六次被国防军士兵用棍棒猛击，他迅速后退，继而快步跑到停在几个街区外的几辆汽车里这才脱险。

恩达拉和福特却没有这样走运。恩达拉停下脚步拣他的眼镜时遭毒打。拦住他的两个士兵几次猛击他的头部。他的几名保镖终于把他救走，他的支持者不知他是否已被打死。

这一天最惨无人道的事件发生了：一个国防军士兵正对比利·福特下毒手，他的保镖曼努埃尔·格拉用身体掩护他。在弹药爆炸的距离内，格拉的头部中了一枪，几秒钟内死于非命。国防军士兵们接着扑向福特，用棍棒接二连三地揍他。他的脸部开裂，鲜血流到他的本已被血染红的短袖衫上。这位巴拿马当选副总统遭毒打的令人毛骨惊然的场面当晚由美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他被推进巴拿马国防军的一辆运载车的后厢里，被送进附近的一座监狱。

福特遭棍棒毒打的暴力镜头使美国人震惊，它也是。中央情报局大量海底电报的主题。事件发生后数小时内，一份详尽的报告已放在了布什总统的办公桌上。这一回布什迅速作出反应。次日，他宣布同意卡特的估计，5月7日的选举已被窃夺。两天后，他在密西西比州立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说中甚至更为率直，他呼吁巴拿马国防军发动政变。他说：“我乐于看到他们摆脱他。”之后，于登上空军一号座机时，布什总统进一步说明他的意见。他对记者们说：“应当把诺列加先生从那里除掉，不论用何种方法。”

尽管布什怒形于色，然而他仍旧必须正确地决定美国在巴拿马该做什么。政府内部继续进行的情报战至少是他踌躇难断的部分原因。

布什花了4个多月的时间才打破僵局——把他的政府内部长期交战的各方分开，从而制定了一项战略，既可除掉诺列加，又可恢复美国的实力与威信。6月间他悄悄地采取了第一个步骤，司法部授权总统可下令联邦调查局捉拿因违反美国法律而生活在国外的逃亡者，从而使诺列加成为像玛塔那样的逮捕目标。7月间又采取了第二个步骤，布什免去了弗雷德·沃纳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之职，让马克斯韦尔·瑟曼接替，此人在其同事中以打硬仗的军人著称。

布什随后作出了他的政府最不幸的几项决定中的一项，即实际上保证美国将使用武力把诺列加赶下台。他让科林·鲍威尔接替退休的威廉·克罗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乍一看，鲍威尔似乎同克罗一样不愿在巴拿马使用武力，因为在军官们眼里，他是个四平八稳的行政官员，他的斗争经验抑制了他赞成用美军去解决政治问题的热情。鲍威尔是里根总统任内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一个完美无缺的政治家，头脑健全，他考虑到军事干涉小国所隐伏的危险，但是，与克罗——他对军事力量的信任仿佛是天生的——相比，他的言行举止则像一个鼓吹战争的人。更加重要的是，他个人有志于把越战失败的遗痕从军队的记录上抹去。在鲍威尔被任命以后，主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与其说是鸽派不如说是鹰派。

到了9月下旬，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鲍威尔从五角大楼指示瑟曼将军重新评估美国干涉巴拿马的计划，在那里，自5月流血事件后还在退却的反对派力量继续向中央情报局的联络人要求得到武器，欲凭此搞一次成功的政变。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继续相互施放冷箭，先前唇枪舌剑的战争已渐渐平息。

在这平静的间歇期内，中央情报局局长韦伯斯特登上一架设计特殊的军事情报飞机往欧洲，去参加一次中央情报局驻欧洲和近东的官员的高级会议。这次会议是历时12个月的复杂安排的结果；把这么多分驻各地的官员聚集到一个地点来并非易事。最重要的是韦伯斯特亲自参加。已经有人向他简要介绍了分析人员和行动指导官员的专门小组会议的情况，他们使他对该局各种行动的概貌有了全面的了解。他的助手们花了许多个钟头使他熟悉了他应处理的紧迫问题。他一点也不知道当他不在国内的时候乔治·布什的巴拿马困境将变成一场危机，他万万没有料到，这场危机过去之后却又被白宫用来作为借口，对他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工作成绩发动了第一次全面攻击。

该死的买卖

1989年10月1日星期日下午早些时候，一个出入意料电话打到巴拿马运河区美军指挥部。莫伊塞斯·吉罗迪少校，诺列加将军的亲信之一，要求同“美国高级官员”谈发动政变的要事。这个请求迅速向上传送，先传到马克斯·瑟曼的司令部，又传给中央情报局驻巴拿马城的站长。此信息继而传到兰利，摆在行动部拉丁美洲处处长的办公桌上，又送交行动部主任助理托马斯·特威腾，最后送到他的上司、行动部主任理查德·斯托尔茨手里。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人在一小时内决定同吉罗迪会晤，看看他是怎么想的。

这可不是一个轻易作出的决定。中央情报局内人人都知道，这位巴拿马少校是一心要维持诺列加政权的。受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巴拿马反对派小组军人首领爱德华多·埃雷拉·哈桑上校以前就报告过，巴拿马国防军中所有军衔较高的军官里，吉罗迪最不可能参加反诺列加的政变。吉罗迪忠于诺列加，行动部若干官员认为，他对诺列加持近于崇拜的态度。吉罗迪的妻子也属于诺列加集团。她是一个年轻军官的妻子们的圈子里的关键人物，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巴拿马城的贫民窟里长大的。吉罗迪、他的妻子、他们的孩子以及他们的朋友全靠曼努埃尔·诺列加才有了今日的职务和地位。

尽管有这些疑虑，行动部的资深官员们仍赞成派两名官员去见吉罗迪，了解他究竟想说些什么。这是合乎常规的步骤，听取不同政见者的想法，即使他们最初是信不过的人。那两名官员得到明确的指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听取吉罗迪的想法，在任何时候也不得以任何方式保证美国将给予援助。美国的政治决定将在听取了吉罗迪的想法后才能作出，而且不得在通报总统之前作出。中央情报局总部还强调指出，那两名官员在美国对他的行动将会作出何种反应一事上不得有半点暗示。

接到那个电话后两个小时，两名官员到达约定的会晤地点——吉罗迪的一个朋友家里。当那两个美国人在那位巴拿马国防军少校对面坐下来时，他们摆出中立的姿态，脸上不露微笑，只显出最小限度的诚意。吉罗迪的开场白漫无边际，继而是一篇自我辩白，他一上来就说，他要美国人懂得他是个巴拿马爱国者。他采取行动反对诺列加仅仅是为了拯救巴拿马。他解释说，事态正在失去控制，诺列加变得更加不愿妥协，而人民更加不满。吉罗迪补充说，他还十分尊敬诺列加，他要证人确信，这位将军将在名誉不受损害的情况下退出巴拿马政界。当这位少校开始争取对他的具体计划的支持时，那两个中央情报局官员仍旧保持沉默。

吉罗迪说，他将于明天早上在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抓住诺列加并迫使他引退。他声称他的行动得到巴拿马国防军中若干最重要的军官的支持。吉罗迪说，诺列加一旦失去了他最忠实的部队的支持以及不能同他的高级军官们联络，他就会自愿辞职。吉罗迪说，他将在一次全国广播中宣布诺列加已被解除职务并且得到允许留在这个国家里。那两名中央情报局官员仍旧没有反应。

吉罗迪接着希望得到美国人的某些保证。他说他要美国人对他的家人采取拘留性保护。他还要美军封锁阿马多尔堡以及进城的主要道路，驻扎在里奥·阿托的诺列加最亲信的部队将会取此道前来。

吉罗迪讲完后，中央情报局的两名官员之一作了字斟句酌、深思熟虑的

声明。他说，密谋者必须了解，美国政府不能支持一次导致诺列加丧命的政变。为强调这一点，他又重复了一遍方才的话。他说；这是美国的政策和美国法律的具体要求，美国公务人员不得参与一次包含有屠杀与刺杀的外国人的政变。这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接着问，吉罗迪的政变是否包括谋杀诺列加。吉罗迪回答说，他无意伤害诺列加，这位将军将和平地从巴拿马国防军中引退。这两个中央情报局官员显然对这一回答感到满意，他们给吉罗迪一个电话号码以便同他们联系，还保证说，他的家人如果投奔美国方面将会受到保护。他们于是回到运河区，急电汇报。

在兰利，官员们已对吉罗迪的动机产生怀疑。一个分析人员和行动官员的特别小组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研究从巴拿马来的报告及提议。在短暂的讨论后他们断定，中央情报局无从验证这位巴拿马国防军少校所说的一切。他们不知道他关于要发动一场政变的说法是不是认真的，或者如拉丁美洲处的几个专家所说，他要“用沙袋打昏”美国人，办法是把美国人牵扯进一场假政变中去，随后向全世界广播美国的军事行动，从而使美国陷入窘境。他们警告说，吉罗迪可能是个可信的、有民主思想的巴拿马民族主义者，也可能是令人担心的“曼努埃尔二世”。尤其使某些中央情报局官员满腹狐疑的，是吉罗迪要求美军封锁巴拿马城的街道交叉点以阻止诺列加的亲兵前来援助这个独裁者。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后来说，这个计划味道不对头，因为吉罗迪更关心的是不伤诺列加的感情而不是推翻他。跟随诺列加多年的吉罗迪竟然设想他会太平平地“引退”，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更有可能的是诺列加会迅速而残忍地用他手中的全部武器进行反击。

威廉·韦伯斯特当时远在数千英里以外的欧洲，他后来说：中央情报局驻巴拿马的官员给予吉罗迪“一个低于对等的成功机会，因为他的计划考虑得不周全”。韦伯斯特还有几分诚意，而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已下结论，吉罗迪的计划是一场被称之为“脆弱的政变”，诺列加不顾一切要保住性命这一点，其后果被大大低估了。行动部有经验的官员们指出，凡是搞成功的政变，都是思想专一，心狠手毒，对结果不存怀疑。亲眼目睹第三世界多次政变的老一代特工官员们会说，这买卖的第一步棋就应当干掉那个强人，以表示决不回头。但是，这样的结局看来远非吉罗迪所想。

尽管有种种疑虑，中央情报局仍匆匆集中了有关吉罗迪和支持他的军官们的材料。中央情报局索检了来自巴拿马、欧洲、以色列乃至非洲的五十余个情报来源的每日情报报告，制作了一个有关政变策划者的组织与可能计划的工作用的模型。这仅仅是一个轮廓，因为该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有限，可靠与详细程度都不足以提供未来 24 小时内巴拿马可能发生事情的完整画面。政变策划者中有尼卡西奥·洛伦索，他是巴拿马国防军的反间谍工作负责人。中央情报局断定，洛伦索和吉罗迪可能指望得到在诺列加的军校受过教育的一批军官的支持，其中的大多数人毕业于 1974 年。这一届中的许多人成了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中服务的进步军官的分遣队的一部分，该分遣队 4 月间曾被派往纳米比亚，其中有阿古斯丁·德·加西亚少校、莱昂·特哈达上尉和胡安·阿尔萨上尉。（吉列尔莫·翁上校、胡利奥·奥弗·扬上校和哈维尔·利科纳上尉，诺列加手下的某些亲信也卷入了这场密谋，可是，中央情报局起初并不知道。）

在 10 月 1 日那天，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吉罗迪和他的同伙“想要摆脱诺列加的部分原因在于巴拿马国防军的上层机构臃肿的结构。巴拿马军队中

的晋升有赖于最高级军官的退役，这是个老传统。最高级军官们离职后，他们以下的军官差不多人人可以提级加薪。诺列加拒不退役，这种晋升就会搁浅，资深军官团中因此怨气冲天。然而，仅仅由于这个问题就发动政变看来是说不通的，尤其因为诺列加的支持者们还可以从他的政权得到其他好处。在此后的24小时至48小时内，尽管中央情报局加班加点，却怎么也找不出吉罗迪的真正动机。他们找不出满意的答案，这就增强了他们对吉罗迪的动机本来就有的怀疑——他们本来就不信任他。

马克斯·瑟曼也不信任他，这位新任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确信，诺列加正挖空心思使美国陷入窘境。他的一名高级副手想搞一次政变看来正是这样的一种手腕。1987年3月，奥古斯托·比利亚拉斯少校发动拂晓政变，该政权受到威胁，那时吉罗迪毕竟曾充当工具救助诺列加。吉罗迪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胆量和对诺列加的忠诚，他重新集合巴拿马国防军的一个营去抵挡占有压倒优势的部队。吉罗迪被捕，比利亚拉斯的同谋海梅·贝尼特斯少校用手枪顶住他的太阳穴，吉罗迪同意设法说服他的部队投降。但当他来到他的部队面前时，他下令逮捕贝尼特斯，并用就近的一挺七毫米机关枪打了一梭子弹，惊醒了还在睡梦中的亲诺列加士兵。他的快速动作救了诺列加政权。

瑟曼的直觉证明是对路的，至少起初是这样：星期一清晨，吉罗迪传话来说，他已经把政变推迟到次日，因为诺列加未按预定计

划到国防军司令部来。吉罗迪说，他将在次日清晨发动政变。星期一夜间，如吉罗迪所说，他的妻子、3个孩子和他的岳父在克莱顿堡露面，请求美国给予保护。瑟曼仍认为吉罗迪的政变是故意安排好会流产的，美国不应采取明显的行动支持这位少校，直到可以确信他是认真的。可是，星期一清晨得到有关吉罗迪的行动计划报告的布什总统却指示瑟曼，派若干美军单位在吉罗迪所说需要封锁的交叉路口附近进入阵地，作为预防措施。

中央情报局也作了准备，它把若干反对派的特工派到关键地点去观察政变的进展，又让它的高技术情报搜集网进入警戒状态。它还派若干反对派的特工到已拿马城闹市区去探听公众对吉罗迪的运动的反应。一天前同吉罗迪会晤过的两名中央情报局官员向兰利报告说，他们现已确信这位巴拿马少校坚定地要实现他的计划。他们指出，假如他是同诺列加合谋在设骗局，那末，他会如他原先所说的那样在星期一发动政变。

可是，中央情报局资深官员们仍旧持不可知态度。他们推论道，万一吉罗迪陷入困境，他们可是爱莫能助。中央情报局一位在此事发生后退休的官员回忆说，局里的许多专家确信，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件和难题将会使吉罗迪除掉诺列加的图谋起变化。这位少校马上就会认识到他必须动武，而不可避免的对抗又必将导致巴拿马国防军各单位相互对立。

在德国参加会议的韦伯斯特通过一条秘密电话线，收到从兰利传来的每小时新情况，从而保持对中美洲事件的了解。在听到吉罗迪的计划后，韦伯斯特当即问斯托尔茨和特威腾是否需要他返回华盛顿。他们两人都认为他没有必要返回，因为他即使待在该局总部也不能有所作为。吉罗迪的政变如果真搞起来的话，那末，也应由白宫对它作出反应。

这次尝试几乎刚开始就过去了，或者说，从此后的数日内看就是这样的。10月3日，星期二，早晨八点左右，诺列加来到国防军司令部，迎接他的是一阵轻武器的射击声。他乘的梅赛德斯车刚要在他的司令部大门前停下前猛地掉头，他跳下车，在两名卫兵的掩护下冲上楼梯，进入二楼他的办公室。

方才在下面庭院里诺列加险些被子弹射中，吓出一头冷汗，惊恐万状，这时，他打电话给他的女友维姬·阿玛多，要她同里奥·阿托基地他的嫡系指挥官们联络，他又命令驻扎在附近的部队速来国防军司令部。自信的吉罗迪在大厅和诺列加办公室周围都设了岗，喊话让他投降。吉罗迪显然确信他的政变已经成功；他捉住了这个独裁者的大部分幕僚，而美军也已到位，挡住了前来救援的任何亲诺列加部队，这也使他感到满意。30分钟后，经过了几次疯狂的电话交谈，诺列加听从了吉罗迪的建议。他走出他的办公室，下到门厅，进入一间房间，人家让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仿佛受审似的，面对一个非正式的调查法庭。

几个政变策划者振振有词他说，诺列加对巴拿马人民犯下累累罪行，应就地处决。一听这些警告性的威胁，诺列加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并恳求吉罗迪说有理由让他活下去。这是个悲枪的场面。诺列加求吉罗迪饶他一命。另外几个政变策划者坚决主张，摆脱诺列加的唯一途径是把他转交给美国人，这样一来，美国人就被迫进行干预并会站在吉罗迪和他的手下一边。吉罗迪吩咐他的士兵把这个独裁者押送到旁边一幢楼里，从而结束了这场辩论。他向诺列加保证，他不会处决，但告诫他必须同意放弃他作为巴拿马军队首脑的职位。方才被吓得心惊肉跳的诺列加又恢复镇静，点头表示同意。接着，当他被单独关押在另一间房间里时，他又用吉罗迪没有切断线路的电话继续策划一场反政变。

国防军司令部里的行动吸引着克莱顿堡的美国人的注意，他们获悉八点钟前忠于和反对诺列加的部队交火了。他们说不清诺列加是否已在交火时被杀，但他们估计他还活着，因为射击又开始了并且持续了30分钟。离诺列加的总部大约500码之遥，在一幢作为军队监狱用的建筑内，库尔特·缨斯也听到了枪战。起先他以为美军终于打进巴拿马来了，他马上就要得救了。

在3,000英里以外的华盛顿，参议院助理德博拉·迪莫斯在枪战开始后15分钟，接到反诺列加政治小组的领导人之一打来的电话，说他听说一次政变已经搞起来了。他还说，他正在同国防军司令部里的造反部队接触，政变组织者是莫伊塞斯·吉罗迪少校。

几分钟后，迪莫斯接到另一个电话，这一回是从国防军司令部打来的，吉罗迪的亲信之一告诉她，美军封锁通往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的所有道路是至关重要的，这样一来诺列加就不可能被人救走了。迪莫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助理，打电话给杰西·赫尔姆斯参议员，把消息告诉了他。赫尔姆斯直接打电话到国务院打听更多的消息，接着又打电话到南方司令部询问是否已注意到吉罗迪关于美军援助的请求。赫尔姆斯和迪莫斯几乎是在欢呼了，尽管他们两人都知道，任何政变的最初几个小时都是充满危险和无法预测的。他们自然知道诺列加以前已有几次侥幸脱险而活了下来，而吉罗迪看来不大像是打算摆脱他。政变策划者之一传消息给迪莫斯，说诺列加一人待在卧室里，正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政变策划者说，他确信不必交战，诺列加会同辞职的。迪莫斯疑虑重重。

迪莫斯得到的有关巴拿马局势的情报十分准确，令人惊叹。关于国防军司令部里面和巴拿马城街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她所知道的看来要比中央情报局多。她同政变策划者、南方司令部、国务院以及巴拿马反对派人物联络。她搜集到情报后，又不辞辛苦地送交雾谷的指挥中心。她卷入得越深就越是确信布什政府正袖手旁观，没有支持吉罗迪。她惊讶地获悉瑟曼不知什么缘

故仍相信吉罗迪试图引他上钩，而国务院、白宫、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看来一致认为，关于吉罗迪是否当真试图废黜诺列加，应由瑟曼而不是他们来断定。同从国防军司令部和巴拿马美军司令部传到迪莫斯耳朵里的忙碌的喧闹声相比，华盛顿官方的沉默令人寒心。

其间，在国防军司令部里，吉罗迪派遣他的得力副官哈维尔·利科纳和另外3个反叛者去同克莱顿堡的美军联络，以便把诺列加转交给他们。这个巴拿马人的代表团又等了一个小时才得以会晤瑟曼的副司令马克·奇茨尼罗斯少将。考虑到瑟曼对吉罗迪的怀疑，这4个人受到奇茨尼罗斯冷冰冰的接待，这并不令人惊讶；当利科纳提出美军可以拘捕诺列加时，奇茨尼罗斯脸色更加阴沉。利科纳满怀希望他说，美军可以来抓他，“就是现在”。奇茨尼罗斯，一位受人尊敬的军官，讲西班牙语，熟悉巴拿马的风俗习惯，他摇头表示不行。他说，美国是想要逮捕他并把他送交法庭，但必须把他引渡给克莱顿堡的美军。美军不会去抓他。

讨论还在继续时，营救诺列加的部队正快速行动，旨在迫使政变策划者释放这个独裁者并结束他们对国防军司令部的占领。巴拿马国防军中支持诺列加的一个特种单位正从里奥·阿托拥入首都，目标是包围司令部。另一个单位，按照诺列加从他的卧室“牢房”里用电话向他们下达的命令，正在捉拿政变策划者的家属。惊恐万状的家属成员们打电话给吉罗迪，告诉他，他们正被扣作人

质。如果不投降，他们肯定会被杀害。上午十一点，即在诺列加被抓后3小时，从里奥·阿托应召前来的精锐部队的几个营向司令部开火，窗户被炸，水泥碎片满天飞。在几分钟内，先前被吉罗迪逮捕的亲诺列加士兵获释，他们冲出大楼，参加反攻。

对政变策划者和中央情报局而言，事态的这一转变标志着一个危急的时刻。数小时以来，该局在巴拿马的侦察网一直接收到巴拿马国防军部队沿几条主要公路运动的信号。侦察网还监听到空运部队进巴拿马城。最重要的是，该局复杂的高技术电子警戒系统指示，巴拿马国防军各单位已离开营地，待命行动。这些窃听到的信息是两种可能情况之一的迹象：或者是诺列加在同巴拿马国防军的增援部队联系，或者是政变领导者们已争取到主要军事单位效忠于他们。中央情报局的这个系统运作良好，但是仍旧没有办法确切地探听到国防军司令部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对吉罗迪来说，所有的消息都变得糟透了，而他也由绝望变成听天由命。被数量占优势的诺列加的部队所包围，被抓去的家属又接连打来电话，还确信美国人不会来支援他了，他于是决定投降。这个决定在他手下的军官中间并没有引起愤怒的争论；他们都懂得政变已被出卖，在诺列加的部队进攻之前，只不过是熬时间罢了。下午十二点三十分，吉罗迪本人向诺列加投降，而诺列加已经准备好苛刻地对待那些卷入政变的人了；一个在几小时前曾粗暴地推过他的士兵，被砍断双手，随后按照诺列加的命令被处决。吉罗迪被逮捕并被带走，很显然，他也将被从速处决。

整个早晨，当所有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瑟曼犹豫不决地、缓慢地着手支持吉罗迪。政变开始后两小时，瑟曼下令美军包围阿马多尔堡，但部队接到严格命令不得再有其他行动。上午十一点，奇茨尼罗斯对吉罗迪的代表的冷淡态度显然反映了瑟曼个人的怀疑态度；关于逮捕诺列加并把他引渡给美国的谈判，由于瑟曼坚持要把诺列加押送到克莱顿堡来，也就无法进行下去。

最重要的是，瑟曼未能迅速行动阻止诺列加的援兵前往国防军司令部，当他派出海军陆战队去封锁通往里奥·阿托的道路时，已经晚了。瑟曼的辩词称，他是在某种不可变更的紧张关系下行动的：华盛顿的指示禁止他采取任何会被解释为美国进行干涉或会使美军同巴拿马国防军发生冲突的行动。因此，他干脆什么也不干。

在华盛顿，整个早晨，布什和他的高级外交顾问贝克、斯考克罗夫特、盖茨、鲍威尔和苏努努聚在一起商量，试图就巴拿马的局势决定他们的对策。他们仍旧得不到国防军司令部里发生的事情的情报，并且怀疑政变策划者的动机。他们主要依靠来自瑟曼的消息，他一再再而三地告诉他们，他相信吉罗迪有可能为使美国陷入困境而导演这场政变。甚至当事态表明吉罗迪是真干、政变策划者同巴拿马国防军部队已经在交火之后，总统仍拒绝下令瑟曼支持政变。令人惊异的是，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无一人愿意相信，那里终于出现了结束巴拿马危机的天赐良机。

在巴拿马，事变血腥地结束了。权力的急速转换使诺列加头晕眼花，他比以往更加相信自己是命运安排的领袖。一场几小时前还十拿九稳的政变被他毫不费吹灰之力地给挫败了。这是一次个人的胜利；在昏天黑地的时刻，他保住了自己的脑袋，此刻他洋洋得意地露面了。他的报复迅速、果断而且不人道。吉罗迪被押到国防军司令部附近的一个审讯中心，他遭严刑拷打，肘部和膝盖骨被用枪打穿，肋骨被打断，一条腿也被打断，于次日清晨被处决。

在华盛顿，白宫意识到它已经铸成大错，但是硬着头皮不承认它有可能把事情办成另一个样子。新闻发言人马林·菲茨沃特直截了当地否认政府预先被告知有关这场政变的事。“如果我们（被告知），”他说，“总统并不知道会有政变，国防部长也不知道。”

几分钟内，在记者们连连追问之下，菲茨沃特就自相矛盾了。“我们不知道这里有谁卷人了”，他说。“我们听到一些风声。我们听到过有可能发生这种事的谣传，但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那里的谣言多极了……”当国会山的官员们开始提问并且获得更多的消息时，白宫的假话就编不圆了。例如杰西·赫尔姆斯，政府在巴拿马不采取行动激起他的义愤。他在参议院发言，把白宫官员比作“基斯东警察”。赫尔姆斯尽可能克制他的义愤，随后按时间顺序一分钟又一分钟地展示这场政变。他批评政府在人家已经提出的情况下不去拘捕诺列加是一次失误。

白宫反击。菲茨沃特答复道，政府没有逮捕诺列加的任何机会。他补充说，赫尔姆斯“富于这种机会”。约翰·苏努努打电话给赫尔姆斯的首席外交政策助手，要求这位参议员马上拿出证据来证明他的断言。“你的证据在哪里？”苏努努大声说，“证实一下。拿出东西来给我们看看。”在这次电话交谈后，菲茨沃特的一个密友觉得是非已明。他对记者团说：“他们拿不出任何东西来。”

然而，在此后数日内，事实表明赫尔姆斯的指责是正确的，国会山的资料也描绘出了政府在政变当日的行动，于是，政府开始受到压力。10月7日，国会主要领袖们对布什所谓事先无预报之说公开质疑。五角大楼关于谁在什么时候知道什么的说明也不能令人满意。一位军方人士对一位记者说，驻巴拿马美军“从未打算插手去捉拿诺列加。这不是我们的政变。对我们来说，

插手乃是美国政策范围以外的使命。”这位官员小声但清晰地补充说：“那不是我们的计划程序中的一部分。”

国防部长的反应是指责国会阻塞了电话线。“我们遇到的麻烦是，在事变发生的过程中，国会议员们打电话给巴拿马的机构甚至个人，要求提供消息，”他说；“这就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新闻界后来获悉，切尼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些；他当时正陪同苏联军事首脑游览葛底斯堡战场。）

批评之声一起，政府官员在关于他们没有采取行动的问题上采取守势，也未能成功地扭转关于政府无能的种种责备，相反，这种责备与日俱增。为反驳所谓国防部采取“按时熄灯”态度的指责，五角大楼告诉记者，它在政变前一天就集合人马成立一个特别指挥小组，监视巴拿马的事态。发言人皮特·威廉斯甚至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来说明五角大楼的态度，但是他的陈述非常不准确。“我们绝对没有得到任何信息暗示那里任何时候有过任何要求要美国去捉拿诺列加，”他说，“或者有过任何表示他们愿意把诺列加送交我们的主张。”政变以后由美军送到迈阿密的反叛领袖们完全不同意威廉斯的说法并且公开作出反应。他们告诉记者，奇茨尼罗斯当时对动用美军一事不表明态度，并对世界各国将会如何看待美国的干涉表示担心。

10月的第二周，争论激烈，致使布什总统用不同寻常的尖刻言辞反击批评他的人。他指责国会中批评他的人是“心血来潮的鹰派”，以“愚蠢的论据”硬说美国应当干涉，他重申，关于吉罗迪及其同伙，政府没有得到足够的情报说明非支持他们不可。“在所有的报告中我没有看到有任何事实其结果会促使我必须从动武出发考虑去做出某些不同的事情来。”布什补充说，他的政府没有采取行动不是由于什么关心诺列加。“我要看他被人从那里带走。我要看他被带上法庭。”布什对于自己这番话是否足以停止争论尚无把握，便求助于里根时期以来的陈词滥调：“美国人民，”他说，“是大力支持我所采取的立场的。”

布什意识到他的辩词变得越来越刺耳并且不可信，他于是劝告白宫助手们停止谈论巴拿马事件。这倒是他自己本该接受的劝告。当他被皆知政府中的消息灵通人士忙于透露政变当日白宫究竟知道些什么情况之后，他勃然大怒，训斥了若干位顾问，要求“禁止泄露”。可是，甚至连他的这番话也被人捅给了报界并出现在一篇文章里，说布什由于政府中有人透露有关巴拿马的消息而大发雷霆，这一手真是非要他服输不可。布什的反应仍一如既往近乎当众人发脾气。“我没有发火，”他对一群记者说，“我没有发火。我倒是说过：‘在面对批评时，我不想看到有任何指责来自椭圆形办公室或者被人认为是来自椭圆形办公室。’我正在做的不是该受指责的事！如果有人要把什么责任归给谁，那就归给他自己。这才叫适得其所。”

布什下面的话是即席所讲，看来并非出自任何方面。他说：“当时未曾有过情报差距会使我以某种不同的方式采取行动。”——从而暗示实际上有过差距。布什说这番活是在莫伊塞斯·吉罗迪试图推翻诺列加之事发生后将近两个星期。那时，白宫正处在国会与新闻界的围攻之下，显而易见，政府以前对巴拿马糟糕情况的宽容态度已经消失，布什、贝克、切尼和苏努努如此高度珍视的以同志间的友谊与忠诚为基础的牢固阵线开始出现裂痕。“孩子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这样称呼他们——相互间甚至开始吵嘴。布什的古怪声明——在10月3日那天不曾有过“情报差距”——是政府发动公共关系攻势的信号，旨在解除对布什的压力。政府的第一策略乃否认

它曾做过任何错事，其次是否认它事先知道会发生政变。第三个计谋是责备某人。被挑选出来的牺牲品便是中央情报局。

政府欲改变有关巴拿马的争论的性质，其谋略于10月16日在《华盛顿邮报》头版上初露端倪。一位白宫官员同记者戴维·奥塔韦和安·德夫罗伊进行了一次谈话，不顾一切地企图把注意力从总统及其顾问们身上引开去，这位未透露身份的白宫消息人士无视布什所谓政府没做“该受指责的事”之说，却声称政府在巴拿马未采取行动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央情报局未向政府提供有关吉罗迪及其同伙的最新情报。

这位未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单单挑出威廉·韦伯斯特来充当巴拿马危机的直接责任者。这位消息人士指责韦伯斯特是位“无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在外交上连连出丑，使白宫“受挫”。这位消息人士还批评韦伯斯特身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其他若干次危机中的表现。他断言中央情报局在中国和阿富汗也失败了（阿富汗正是数周前政府内激烈争论的问题）。

但是，这则报道中真正引起人人注意的部分，恰恰是在有关巴拿马失败一事上几乎毫无必要地背后说人坏话以及那些正成为布什政府内部日常话题的中伤韦伯斯特的言论。《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录有办公厅主任苏努努在参加一次白宫工作会议后说的俏皮话：“关于巴拿马政变的情况，他更多地是看有线新闻网的节目获悉的，来自韦伯斯特的中央情报局的却很少。”苏努努这番攻击中所含有的恶意，表明白宫正在为其失败寻找替罪羊，而总统的主要助手们显然已经选中了韦伯斯特来代政府受过。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一位消息人士还给《邮报》的报道火上加油，他指出，搞政变的时候，韦伯斯特出国去了。言下之意是，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在他理应坐镇兰利的时候却擅离职守。

《邮报》进而报道说，白宫相信，韦伯斯特同国会关系太密切。“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报道称，“韦伯斯特被认为‘太受制于国会’，对中央情报局的日常管理太过马虎，对外交政策和情报界的作用太缺乏总体性的战略眼光。”《邮报》还引述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有一种感觉，这个机构（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不是非常得力或有效……所提供的情报和以这些情报为依据得出的结论都不能令人满意。”这位消息人士还补充说：“（韦伯斯特）跟布什关系不密切。他跟贝克的关系不密切。他跟斯考克罗夫特的关系也不密切。没有理由器重他。”

10月16日晨，奥塔韦和德夫罗伊的文章上了报摊，兰利的公开反应既克制又自信。该局一位发言人称：“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对韦伯斯特法官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成绩，总统会有任何不满。”中央情报局此刻力图摆出一副架势，仿佛那位奇才威廉·凯西本人又回到了现场，正朝着一群急于了解真相的记者轻蔑地摇手示意，中央情报局的“虚构博士们”说，韦伯斯特是坚强的，他能顶得住。“没错，韦伯斯特确实不太在乎这类事情，”中央情报局一位公共关系发言人对《邮报》文章作出反应时以这种咱们之间悄悄谈谈的方式说，“这类事情不会使他心烦意乱的。”

这同真实情形相距太远了。韦伯斯特可不是凯西，他不具备凯西的自信心或者看透他的前任也大有可能会遇上的这种种事情的眼力。《邮报》的这篇报道击中了它的目标，损伤了韦伯斯特在公众中的声誉，尤其重要的是，损伤了他在兰秘中央情报局总部内的精神影响。韦伯斯特新近恰到好处地应付了国会就若干打埋伏的计划的质疑，因而提高了中央情报局官员们对他的

信任。不论何种信任感如今都遭到这位白宫消息透露者的当头一棒。如果韦伯斯特失去了行政当局的信任，那末，作为行政部门臂膀的中央情报局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韦伯斯特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主要理由，是说他有能力消除公众由于中央情报局行为过度和屡屡失败而产生的忧虑，此刻，他这种备受称赞的能力却受到了损害。他和凯西唯一相同之处是善于和国会打交道并获得必需增加的预算的能力。而今，连这一点也成问题了。

所有这些原因凑在一起，韦伯斯特个人对《邮报》报道的反应是强烈的，他的否认是明确的。“法官非常生气，连这样的东西也会被人捅到报纸上去，”中央情报局一位资深官员说。“这是不真实的。由不透露身份的消息来源传出来的这样一类事情是很难让人信以为真的。”

这最后一句话是地道的华盛顿的补白新闻，因为韦伯斯特和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助手们已经确切地估计出同奥塔韦和德夫罗伊谈话的人是谁。他们知道白宫里忌恨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人是谁。他们确信那是约翰·苏努努。

据那些同韦伯斯特关系密切的官员说，由于《邮报》发表这则报道的方式，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有充分的理由对该报发火。例如，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指出，奥塔韦和德夫罗伊明明知道韦伯斯特在欧洲作公务旅行。中央情报局的人员认为，这两名记者至少可以在他们的文章里提到这一事实。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相信，奥塔韦和德夫罗伊是在添麻烦——他们在巴拿马问题上挑动人们肆意抨击。“而《邮报》正以此为乐，”中央情报局一名官员说。令人生气的还有，那两个记者并没有事先“提醒”韦伯斯特——没有打招呼说文章将何时发表，弄得中央情报局“猝不及防”。

“《邮报》的这篇报道准备了好几个月，但一直有一种谅解，即韦伯斯特将有最后发言权，”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同事说，“将允许他有机会作出反应。我们给予合作并尽力回答有关韦伯斯特以及他在白宫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的种种问题。我们让人明白，中央情报局一直在替布什出力。我们向白宫提供我们认为是必要的情报。后来《邮报》的报道出笼了。我们大为震惊。我们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不允许我们在这件事上有最后决定权，至少也得事先打个招呼嘛。”

戴维·奥塔韦是个经验丰富的记者，他故意不注意这种批评。“他们知道文章要发表，”他这样回答。他继而说：“这确实不是我的责任。决定何时发表一篇报道的不是我而是编辑。”（文章发表后的那个早晨，奥塔韦在中央情报局一条过道里遇上韦伯斯特，这位局长先生还向他问候，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韦伯斯特的一个助手说：“我真想揍他。”）

毫不奇怪，韦伯斯特在行动部的高中层官员中有不少支持者，他们构成了中央情报局的保守主义的“心脏地带”，也是该局从感情上对新闻界不信任的发源地。中央情报局这批老资格官员中有许多人觉得，韦伯斯特落到这等地步恰恰由于他以为对《邮报》的这篇文章他无论如何也会有最后发言权的。

《邮报》因打了一个漂亮仗而高兴，它总是春风得意。有经验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们一向懂得这一点。他们认为，公共关系办公室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便是把新闻稿和通讯录统统收拾一空，回去老老实实地做情报工作。

10月16日早晨，韦伯斯特来到七楼他的套间，一声不吭，关起房门生闷气。他坐在办公桌前，背后挂着他家人的照片——其中一幅是他的女儿，手持《圣经》，正值他宣誓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之时，这是他最引以为自豪的收获之一——韦伯斯特细细琢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怒不可遏。他的

秘书心里明白，现在应当让他自个儿待在那里。十多年前，当默默无闻的韦伯斯特首次来到华盛顿掌管联邦调查局时，她就跟随着他。打来的电话都被她转到别处去了，想要开始当日工作的他的助手们也被她一一挡驾。“现在不行，”她说，“法官正忙着呢。”只有一个电话她决定转给他。那是罗伯特·盖茨从白宫打来的。韦伯斯特同意接这个电话。

《邮报》的报道使盖茨深感为难，他连连道歉并向韦伯斯特保证说，他不是为这篇报道提供消息的人。他说，总统对这篇文章也无责任，他同任何人一样感到意外又非常生气。盖茨强调说，布什充分信任韦伯斯特。韦伯斯特默默地听着。盖茨接着用一句话再次确认他对韦伯斯特的忠诚。我们合作得很好，他说，他不想有所改变。

那篇报道的消息来源如果不是盖茨，那又是谁呢？稍后，韦伯斯特告诉他的主要助手们说，他已经知道了。“这是苏努努干的，”他说，从而证实了他的助手们已有的猜测。韦伯斯特等苏努努来电话辩解。正午刚过，电话终于来了。苏努努用他平日粗哑的声音问候韦伯斯特，接着不以为然地称那篇报道纯属虚构，并以从容的、开玩笑的语气再次向他保证说，他从未向记者谈过白宫的内情。韦伯斯特把这番话解释为拐弯抹角地证实苏努努正是为奥塔韦和德夫罗伊的报道提供消息的人；即使他认为韦伯斯特不够格，他也决不应如此公开地——对着录音机把这种想法说出来。

自《邮报》文章发表之日起的一周内，华盛顿新闻界对白宫提供消息的人士究竟是准争执不下。按传统智慧进行推测的人认定盖茨嫌疑最大，因为人人都以为他仍然觊觎他一度被迫放弃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之职。为修复他在国会山的形象，他勤奋工作，经常向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情况简介，表明他赞成公开性。他已经争取到若干人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他知识广博，对议员们的问题能随即给予关注，无论给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议员都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奥塔韦和德夫罗伊的报道引述白宫的消息来源，暗示盖茨间接控制着中央情报局，这使得盖茨将重返兰利的谣传不胫而走。“布什总统的几位助手暗示，”《邮报》报道称，“布什信赖罗伯特·M·盖茨，斯考克罗夫特的这位副手，乃布什的首席情报顾问，他实际上‘绕过’韦伯斯特‘在开展工作’。”韦伯斯特的助手们称，报道中的这一部分是站不住脚的，中央情报局里这些资深官员中的一个后来解释道，说盖茨绕过韦伯斯特控制中央情报局的人“根本不知道该局是如何工作的；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当然还有另外的解释：盖茨不可能对中央情报局产生白宫里为《邮报》提供情况的人所谓的那种影响，原因十分简单，兰利的许多资深官员不信任盖茨。

那天早晨，韦伯斯特同盖茨谈了两个小时，涉及广泛的题目：巴拿马危机、中央情报局以及白宫与新闻界的关系。他同苏努努谈了十五分钟。但是，在交谈过程中，不论盖茨或是苏努努都不能给他一个明确的印象使他了解总统对他是怎么想的，布什是否相信中央情报局在巴拿马实际上是失败了。接着，在16日下午早些时候，布什本人来电话邀韦伯斯特“顺便”到白宫来“谈谈”。二十分钟后，韦伯斯特已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布什对面的一张长沙发上。

那天下午早些时候，韦伯斯特返回兰利，在他的办公室里向他的高级助手通报情况。与会者共四人：行动部主任理查德·斯托尔茨、副主任理查德·克尔（第三章称此人为情报部副主任。——译注）、情报部主任约翰·赫尔杰森和公共关系办公室主任詹姆斯·格林利夫。韦伯斯特向他们复述了布什的

话：他可以待在中央情报局，他想要待多久就多久，他得到总统充分的支持。《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个不幸事件，一次危机的结果已对行政当局产生有害影响。这不该由韦伯斯特个人来承担，布什补充说，他不希望他的政府官员们在报纸上相互交火。但他显然忘了说他将惩罚提供消息的人或者设法查明提供消息的是谁。接着，韦伯斯特向布什保证，今后中央情报局出了任何差错都会引起他的注意；可以由他来承担。布什点头表示同意；布什还强调说，韦伯斯特并没有丢掉他的职务的危险。

10月16日各种会议开过之后，中央情报局以前所未有的举动在公众眼前表明其明确的立场，并且把该局局长描绘成这样的一位领导：他牢牢控制着该局，而且外交手腕高明，别人难以对付。不是有人抱怨中央情报局未向决策者提供合格向导作用的情报吗？这场宣传运动就是兰利对此的反应。中央情报局像迷宫一般错综复杂，监视它的敏锐的观察家认为，《邮报》文章发表后，在公众中突出韦伯斯特的形象的举动不同寻常，这恰好表明，苏努努对中央情报局的批评打到了疼处，对方恨之入骨。

白宫用烤肉扦串上韦伯斯特把他捅到公众中去的当天，韦伯斯特发动攻势，他吁请国会授予中央情报局“更大的自由”去支持政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韦伯斯特对于对他的批评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上雷同于多年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对威廉·凯西的反应。倘若诸位要我们去对付类似诺列加这号人，韦伯斯特说，那末，就应该修改法律以允许中央情报局去干这样的事。在《纽约时报》进行采访时，韦伯斯特廓清了他的这一立场，他还特别说明有必要“重新解释”第12333号行政命令，该命令禁止中央情报局行刺或帮助行刺外国领导人。在行动部里，这道行政命令是严格按字面意思解释的，由于伊朗门丑闻余波未平，行动部官员们的活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与检查。虽然韦伯斯特现在把放宽这道命令的责任推给了国会，但是中央情报局的许多官员后来指出，至少有些事情该他个人负责，例如该局的几次行动以及究竟允许或不允许专案官员干什么这个老问题都被他冻结了。

韦伯斯特现在不再顾及他过去的立场，他指出，他宁愿放松逼绳自由发挥，也不愿当个无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而个人备受责难。

为什么韦伯斯特在10月16日以后引人注目地明确他的立场呢？这有若干其他的原因，甚至是更为突出的。据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官员称，韦伯斯特“处在行动部要求改变该局约束性规章的压力之下”。作这种改变对韦伯斯特有利，他可以由此争取到该局精英们的忠诚。韦伯斯特的一个助手谈得更加具体。“法官在这里处境孤立，”这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解释说，那是在《邮报》文章引发舆论界争论后不久。“他竭尽全力争取（行动部的）那些人的信任，不过，这可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他高高在上，待在七楼，因此想要察觉这幢大楼里的风吹草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韦伯斯特同布什总统会晤后的数小时内，他试图结束这种孤立状态并重申他对正慢慢地从他的手指缝间溜走的中央情报局的控制。他告诉《纽约时报》，国会和总统都有必要指出那道行政命令中的含混之处。“如果有故意含糊其词之处，”韦伯斯特说，“那末。这就给做具体工作的人增添了非常大的、我认为不能接受的压力。”韦伯斯特接着暗示，新规章对巴拿马局势不会产生影响，但可能“‘讨下一次的事情产生好的影响’”。他意指“有可能发生的事”，即巴拿马今后的政变策划者“有可能”谋杀诺列加。至于10月3日的政变，韦伯斯特拒绝为政府未能正确判断吉罗迪少校的动机

一事承担责任。他反倒小心翼翼地抨击了白宫里诋毁他的那个人。“如果事情没有严格沿着它应该沿着的道路发展，那就总会产生若干附带结果并且诱惑人去指指点点，”他说，“于是我猜想，这回该轮到我了。”

《纽约时报》的报道发表的次日，韦伯斯特继续展开攻势。他指示中央情报局公共关系办公室在宣传他关于美国情报工作的观点以及他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成绩时应更有进攻性。公共关系办公室迅速安排了若干次记者访谈，而在10月16日以前韦伯斯特可能根本不曾考虑过与这些人会面的。中央情报局公共关系办公室的官员告诉记者，他们大力支持韦伯斯特并且表达了他们对于那些说他没有做好工作的报道的愤怒。他们异口同声地指责布什的白宫传播那种消息以及让韦伯斯特为白宫的失误充当替罪羊。但是，他们和韦伯斯特本人都不愿闹成明显的公开对抗。

“我们不会被制造这种局面的政治图谋牵着鼻子走，”公共关系办公室主任詹姆斯·格林利夫在10月18日这样说。“我知道，这看上去很像是我们在玩弄权术，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奥塔韦的文章突然出笼时，我们正处在计划阶段，考虑如何对那道行政命令作新的解释。但是我们并不是用那种手段来作此计划的。”

格林利夫的矢口否认遮掩了此后一个月内韦伯斯特的自我辩护的一贯特性。在此后的三十多天内，韦伯斯特把公众对巴拿马突发性灾祸的批评转变为考察他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工作的一场公舟讨论。10月17日，总统公开替韦伯斯特辩护，之后，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华盛顿邮报》与高级编辑们举行了一次“编辑午餐会”。据《邮报》的一位记者说，这是“一次令人惊叹的表演”——就十多个题目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其间，韦伯斯特看来非常了解下情并且令人惊叹地熟悉情报政策。

这次聚会的成果之一，是奥塔韦写了一篇文章，差不多是一首韦伯斯特才能的赞美歌。这篇报道开场即列举了他接替威廉·J·凯西时所面临的难题。奥塔韦评论道：“韦伯斯特任联邦调查局局长时因无可怀疑的正直而获赞誉，他接手新任务时雷厉风行，在许多情况下他确认必须反其丧失信誉的前任凯西之道而行之。”

该文回顾了白宫10月16日所作的种种指责，随后提醒读者，对韦伯斯特的抨击，不单纯由于对他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成绩不满意，这背后还大有文章。奥塔韦写道：“韦伯斯特能否使白宫相信他是个‘同心协力者’并准备按照白宫的政治旨意办事，仍有待观察。白宫显然要求他扮演政治上‘积极活动’的新角色，更加直接地帮助促成与保障白宫外交政策的成功，而他是否适合扮演这个角色尚远未见出分晓。”

该文描述了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如何为韦伯斯特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所取得的成绩拍手叫好，这些人当中有副局长理查德·克尔（在此以前，书中曾分别称此人为情报部、行动部副主任。——译注）和行动部主任理查德·斯托尔茨。中央情报局中此类官员的话被人引述发表已非同寻常“，身居此类官职的人甚至被指名道姓地引述更是前所未闻。

然而他们当真在《邮报》和其他报纸上赞扬韦伯斯特并为中央情报局辩护。这是中央情报局发动的全场紧逼，它还是对布什政府所谓韦伯斯特非“同心协力者”这一批评的巧妙的反击。对于克尔、斯托尔茨和其他人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否允许中央情报局保持其独立性，或者说，布什总统及其顾问们是否继续利用该局来促成他们自己的政治安排。

尤其对斯托尔茨而言，中央情报局在政治上的独立性是个首要问题。这也是在凯西时期迫使他引退的唯一问题，又是他从韦伯斯特那里得到的、鼓舞他重返工作岗位的唯一保证。他承认，如果对这样的独立性没有绝对的保证，中央情报局将不可避免地会重犯伊朗门事件的错误。

自相矛盾的是，对于韦伯斯特来说，若要真正起作用，他必须是布什一伙的人。面对一位只看重幕僚的忠诚而不顾任何其他事情的总统，中央情报局想要得到他的恩宠，唯一的途径是持续地表明它甘愿协作和牺牲。这一点使 1989 年 10 月的种种事件变得更加具有破坏性。有读华盛顿政治花絮新闻癖好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差不多包括在兰利工作的每一个人，谁个心里都一清二楚，乔治·布什对于所谓情报机构应有独立的见解并不感兴趣，他关心的是确保别人不问青红皂白地支持他的政治计划。中央情报局里不少资深官员开始猜疑，这个人，曾经当过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但在大多数人眼里，他只是把该局作为跳板并利用他在该局的地位来实现他个人的抱负，而如今当上总统的他，又要利用该局来保障他在政治上的成功了。

这并不是说，布什在中央情报局里没有支持者；他有支持者，而且为数众多。他的大多数顾问，都是行动部的老资格官员，一般都思想保守，同冷战时期美国的敌人斗了一辈子。对他们而言，布什坐上总统交椅乃是他们忠心耿耿为美国服务的最高表现。尽管他们对政客的看法历来是玩世不恭、冷嘲热讽的，但是布什却代表着他们所称赞的思想顽固、精明而讲究实际的态度。他们相信，布什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这短暂的时间向他提供了有关该局及其价值的知识，而这一点正是他以前的任何一位总统都不具备的。他懂得秘密行动之必要，他把保密之必要——这或许是行动部与众不同的性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提升为他的总统职位之特性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因此，对布什任总统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这就是今后 18 个月的舞台背景——即从欧洲民主革命凯旋的 1989 年年末直到导致威廉·韦伯斯特引退的 1991 年夏季。在这 18 个月内，行动部和情报部之间的分歧比以往 40 年内任何时候都要明显。

1991 年年中，这两个部之间及其内部的冲突激化，在参议院为批准布什提出的接替韦伯斯特的入选而举行的听证会期间，突然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在那场论争中，中央情报局里的温和派和好战派之间长达 40 年之久的斗争归结为一个问题：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究竟能否既为总统服务又为真理服务。

1989 年 12 月 20 日凌晨一点差几分，库尔特·缪斯在他的牢房里听到外面枪炮齐鸣，这象征着他马上就要重获自由了。射击是直接针对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的，还伴随着直升飞机在头顶上飞来的隆隆声。对这位有自制力的美国商人来说，这是个充满希望的时刻，尽管他在莫德洛监狱关押了将近 9 个月，他对自己国家的信任却丝毫未减。他们肯定是会来营救他的。下面门厅里一张金属桌子旁，坐着诺列加精选出来的一名刽子手。派来救他脱险的小组能否在他被枪毙之前赶到呢？这是他眼下唯一的疑问。缪斯站着，沉思着这种困境，朝窗外望去，目光越过监狱和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之间的黑暗地带，但见司令部“被炸得一塌糊涂”。在外面门厅里，焦急的巴拿马国防军士兵们大声向他们的长官喊话请示，与此同时，美国武装直升飞机把数千发炮弹射进国防军司令部里。仅仅几秒钟的工夫，诺列加的总部彻底被毁。这当口，缪斯才明白，美军对巴拿马的进攻——代号为“正义事业”的行动

——全面展开了。

布什入侵巴拿马，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中央情报局不愿或者不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搞一场全面政变，而反对派的部队装备又太差，不是那个独裁者的对手。布什再也碰不上像吉罗迪那样的机遇好去冒一次险。他投入占优势的美国部队去同诺列加政权打一仗，尽管会流血，但毕竟是速战速决。他心中有数，一次压倒性的军事胜利不仅会提高国内政治上对他的支持，而且还能使他的政府摆脱——一个棘手的问题。

然而，这些同库尔特·缪斯全无瓜葛，他正在牢房里看美军进攻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他离开了牢房的铁窗，生怕自己会碰巧被跳弹打伤。片刻后，一团眩目的火花和一声巨响，爆炸的气浪把缪斯仰面震到在地。他注意到他的牢房的门却纹丝未动；他苦恼地盯着它，深信这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听到了枪声，由远而近。突然间，有人在过道里喊他的名字。“趴下，”那个声音喊道，“我要炸门了！”缪斯趴倒在地，只听得一声爆炸，接着看见一名特种部队军官跪在他身边，把他搀扶起来。几分钟后，他上了一架直升飞机，预定飞往某处，那里有一架喷气机在等候他，将把他送回美国。又过了几分钟，来了一场恶作剧，直升飞机被击中，失去控制疯狂旋转，继而坠毁。缪斯再度获救。他上了另一架直升飞机，终于安全脱险。朝北飞去。几个星期之后，他和他的家人在椭圆形办公室受到布什总统的接见。他听说布什把营救他定为一个个人目标，就像威廉·韦伯斯特所曾做过的那样。

缪斯是一位英雄，在这个同的任何意义上讲他都是英雄。他被人从一个普通公民提高成一个同中央情报局有约的待工，从一个在扶轮国际有永久股权的小企业家，提高成美国在巴拿马最重要的和公开反对的声音。白宫里的这一接见仪式诚然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和最值得回忆的事件。他被授予奖章，和总统握手，甚至被中央情报局局长当作名流看待，他成了“我们在巴拿马的人”。

但是，就像在他之前的许多特工那样，缪斯的服务很快被淡忘了。他和他的家眷定居在弗吉尼亚州的伯克并开始寻找工作。中央情报局有更好的事情要做，也顾不上关照他了。他毕竟是个让人窘迫的人物，一个活证人，表明十足的业余爱好者在给外国独裁者制造麻烦时干得比中央情报局出色。而中央情报局又有了其他的烦恼事。

中央情报局全力参与“正义事业”行动。它匆促组建一支巴拿马特种部队，与国防部的一个特别联络委员会合作共事。中央情报局承担着若干最重要的任务：草拟目标，在巴拿马境内招募新特工，复查巴拿马国防军的战斗命令中的现场变化以及向巴拿马移民询问诺列加及其助手们的习惯与日程安排。他们的活动集中在心理战上，每日每时苦苦缠住巴拿马国防军直至美军进行干涉。他们成功了；诺列加对入侵毫无准备，也没有能力作出反应。在战斗进行期间，中央情报局又受命评判美军的武器和战术的有效性，引领巴拿马新领袖们度过他们就任的第一天。然而，中央情报局在“正义事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却被阴影所笼罩，因为人们的注意力随即投到这一年12月间更重大事件上去了。

正当一场危机——在巴拿马——终于结束之时，另一场危机再度在中央情报局内部爆发了。在美军入侵巴拿马前数周，一场独特的、始料所不及的革命席卷了东欧。每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情报机构都感觉到了这些纪念碑式的变化的影响。但是，对于中央情报局而言，旧苏维埃集团中共产主义的没落

和民主运动的兴起却标志着重新估价的开端,它又将动摇情报界的基础。1989年和1990年之交的冬天发生了震撼大地的种种事变,中央情报局却没有预报。究竟该谁负责呢?先是发生了小争执。在此后的数月内,这件事显得越来越重要了。四十年来,尤其在近十年来,在中央情报局内部一直被掩盖着的冲突终于不可避免地暴露在公众眼前了。

第三部分：魔术师的门徒

12

地震

库尔特·缪斯从巴拿马监狱里救出来的第二天，罗马尼亚军队对布加勒斯特的示威群众开了枪。48小时后，由于站在人民一边的罗马尼亚陆军同共产党的秘密警察（Securitate）进行一连串的激烈枪战，这个国家已处于内战的边缘。不到3天问题就解决了。1989年圣诞节那天，罗马尼亚的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草草受审，被行刑队处决。一个允诺实行基本自由和民主选举的新政府掌了权。这是在发生革命的一年里最后一次和流血最多的革命。1989年1月，也就是处决齐奥塞斯库的11个月以前，匈牙利政府签订一项承认公民有出国旅行权利的人权协议。5天后，波兰宣布它将使团结工会运动合法化。然而，2月份，在捷克斯洛伐克逮捕800名人权积极分子时，苏联集团的改革行动暂时受阻。尽管有这种预谋的镇压，反对共产党政权的抗议浪潮在其后的几个月里还是不断高涨。

5月，匈牙利开放了同奥地利的边界，该国共产党领袖亚诺什·卡达尔被迫退休。6月，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东欧举行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中，团结工会候选人赢得了波兰新参议院100个席位的99席和众议院的全部席位。在罗马尼亚，对少数民族匈牙利人的镇压，引发了对齐奥塞斯库政权的首次公开挑战。在东欧控制得最严的共产党国家东德，也感觉到了改革的浪潮。许许多多的东德人前往匈牙利，然后去自由奥地利。这幕具有历史意义的戏剧的最后一幕开始，是在柏林，时间是10月7日，当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通知东德领导人，苏联不再支持它的华沙条约的盟国。其后的90多天，由于苏联在欧洲的帝国以惊人速度的瓦解，整个世界为之愕然。

欧洲旧秩序的结束，在中央情报局苏联问题分析家当中闪现出一个自我责备、再次猜测和自我怀疑的时期。他们非常明白，他们完全没有预料戈尔巴乔夫的惊人退却：事实上，中央情报局的情报部在戈尔巴乔夫大担任苏联首脑的4年多时间里，工作是完全失败的：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简直是没有想到那时的苏联处于一场主要的社会和政治革命的边缘。对于一个花费百分之五十的财力试图分辨苏联领导人意图的机构来说，40多年花费了几百亿美元，其失败之惨难以置信。苏联分析室的工作尤其不能原谅；它的情报评估严重低估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力量和苏联社会的健康力量。对中央情报局的失败直言无讳的批评者——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说它的工作是“可耻的”。

罗马尼亚警察国家的崩溃，成了情报工作失败的象征。在此以前的10年里，中央情报局为了搞出对付华沙条约的技术的美国反措施，从齐奥塞斯库兄弟们那里买到了“无法估价”的苏联军事秘密，这是一种高层次的、秘密进行的和极其成功的隐蔽行动，而且是一种使中央情报局有效地渗入齐奥塞斯库重要的情报部门的行动。兰利应当能够监视终于淹没布加勒斯特政权的不满的骚乱，但是并非如此。罗马尼亚革命的迅速而惊人的成功，对中央情报局来说异常震惊。在处决齐奥塞斯库的前一个月，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并未发出齐奥塞斯库的生命有可能受到危害的警告。他们简直没有想到，早些时候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情况，也会在罗马尼亚出现。情报部关于罗马尼亚革命的许多看法，实际上似乎受到反对齐奥塞斯库有可能被

推翻的一种先入之见的影响。它就像是这些事件完全出乎中央情报局的理解。

情报机关在这一年发生的所有革命问题上的严重失败，令人在思想上感到震惊，而中央情报局的反应却相去甚远。蛛丝马迹满是编成的统计数字，是要表明这样的革命是不可能的。例如 1986 年，中央情报局估计，东德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西德多 220 美元。在它研究其他华沙条约国家的情况时，犯了同样的错误，而且后来在研究苏联时重复了这种错误；中央情报局 40 年来对苏联的经济增长率的描写，一直使用持续增长的字眼。例如艾伦·杜勒斯在 1959 年告诉国会说，苏联工业增长的持续增长率意味着苏联经济同美国经济的差距到七十年代初将会“危险地缩小”。这种说法荒唐可笑，但是依然没有对它提出疑问。中央情报局后来预测，苏联的经济力量到七十年代末将是美国的三分之二；事实上，连三分之一都不到。中央情报局为这些估计一直辩护到今天。情报局的官员们公开坚持说，他们始终是正确的；他们宣称，他们看出苏联正在走向崩溃，而且就是这样说的。情报部苏联分析室主任乔治·科尔特，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首席辩护士。1990 年，他告诉国会说：“我打算为你们审查我们的方法论……”，“并且引用以前的公开证词——我相信将会表明，我们关于苏联经济的描述在时间和预测方面，基本上是正确的。

科尔特详细解释了中央情报局怎样根据一个比较许多国家经济状况的复杂公式，运用自己的方法估计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他的解释是彻头彻尾的混乱。一位经济学家后来把这种解释说成“骗术”，因为情报局的分析人员把他们的办法叫作苏联价格分析模式。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为这种混乱作了更好的解释，他说该局经常评估错误的事情。“国民生产总值只是计算苏联人生产多少废品。事实是，这种废品是一种质的评估。”但是这是不合理的，科尔特为此所作的辩护也不能解释情报局怎样会有这样的错误。兰利关于苏联经济力量的估计，使那些深受尊重的美国经济学家（他们并未给中央情报局工作）感到困惑，他们是这样说的。批评不起作用。情报局就是不愿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而且是个不小的错误。这是个非同小可的错误，根据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说法，它可以同经济学家们未能预测大萧条的错误相提并论。更有甚者，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说，情报局未能充分评估苏联的经济力量（不可避免的崩溃），也许是自从珍珠港遭轰炸以来，美国情报工作最大的失败。

前中央情报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后来写道：“我们不应掩饰为预测苏联危机的大小而造成的巨大失败。”然而这确实是发生过的事情。中央情报局在一项早期的研究中说，苏联的经济产品到 1993 年将超过美国的生产量——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计算方法，因为到 1991 年苏联是否会维持这么久，成了公开的疑问。比较适当的解释是，中央情报局毕竟没有真正犯过错误。四十年代末，美国政府得出苏联是美国利益的严重威胁的结论以后，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除了作出这样的分析外，没有选择余地。毫不奇怪，情报局关于 1989 至 1990 年发生的那些革命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们使 40 年的工作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分析家们不去冒对自己不信任的风险，而是决定根据韦伯斯特的准确预测，说苏联将大量削减军事开支。1990 年的事件证明韦伯斯特是正确的，但是在中央情报局预测戈尔巴乔夫帝国解体的失败的瓦砾堆里，这似乎是一个小小的胜利。正如特纳后来言简意赅地写道：中央情报局

“差一英里的距离没有赶上”。

情报部的分析人员怎能会这样粗心地误解标志着冷战结束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趋势呢？至少部分答案在于八十年代震动中央情报局的一连串事件和这些事件对情报局分析人员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所产生的重大影响。9年间（1981年初至1989年12月），情报部遭受了智囊人物的严重流失，人材枯竭如此严重，使许多关键部门没有足够的、有经验的分析人员提供可信的评估。即使在韦伯斯特任职的年代，情报局也难以吸引那些在传统上担任最重要的分析职务的专家。

在中层分析人员当中，对八十年代的危机感触最深。他们认为，他们很少有机会能使自己的主张为情报局的高级负责人所接受。危机形成了喇叭口形的曲线：八十年代初，凯西来到以后，情报部的权力首先得到加强，并且增加了踏实的专家。但是，这些专家和他们的许多老资格的顾问，后来由于厌恶伊朗门丑闻而辞职了。随着10年时间的消逝，辞职增多了：在1984年至1987年末，苏联分析室的全部分析人员，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的人离开中央情报局。这个数字代表情报局的专业能力在逐渐消失。前分析人员约翰·金特里证实，“在凯西任期结束时，减员数字很高。”“在八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你有一种明确的培育愿望去服务，这在高级职务方面已有显著的变化。我们损失太大了。”

虽然韦伯斯特、克尔、赫尔杰森以及许多其他高级官员试图遏制退休、调动工作和辞职的洪流，但是在凯西死后的两牢里没有任何变化。情报部提供有意义的和抓住要害的情报报告能力，近乎全面崩溃，以及它未能吸引并挽留专心致志和训练有素的专业分析人员、使那些留下来的老资格的分析人员深为烦恼。这尤其难以解释为什么这种大量的人员出走竟然发生在前几年曾经接受国会大量恩施的机构里。这也不能把大量的人员出走仅仅归咎于伊朗门事件的困扰；其他丑闻曾经震撼过情报局，但是没有一件曾经引起过这一种人员的大批离去。

一直不断分裂的真正原因，很少为人所知，剧烈争牛的争论在海外情报处内部令人烦恼。在某些方面，这种斗争比兰利大楼里曾经发生的任何争执更为重要。它触及中央情报局承诺提供不受政治考虑玷污的客观情报评估的核心问题。按照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博比·雷·英曼的说法，斗争集中苏联分析室内部的为数不多的分析人员身上，那里的专家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有些人认为苏联没有能力维持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另一部分人却认为，苏联人是反对变革的帝国主义者。

按照英曼的说法，这种自己家里的情报战由于1975年4月美国从南越的屈辱性撤退而首次爆发。这次撤退有效地破坏了中央情报局的有关美国威信的先入之见，而且，也许永远粉碎了该局雇员的基本信念；用分析人员托马斯·巴斯代尔的刻薄说法，美国领导人们“有一批激发其他国家积极性的精明机警的力量，而且以其精神的、军事的和经济的资源细心地混为一体的办法对付这些力量”。正如英曼所说那样，如果说西贡的陷落“像一次地震”，那么，以后15年里在情报部内部的斗争，就是它的余震。

梅尔·古德曼是一位固执己见、有时说话大嗓门儿的人，但是他仍然是一位出色的苏联问题专家。他1966年加入中央情报局，立即分配到当前情报室任初级分析员。古德曼在任职初期就被挑选为情报局最有希望的苏联学家之一，准备很快提升。他来到兰利不久，就分配他在中央情报局最有威望的

苏联对外政策处任职。其后 20 年，古德曼作为苏联对外政策和第三世界关系专家，“在情报部担任了每一项重大分析和管理工作方面的职务。”他终于升任苏联分析室的一位科长——这一工作对他长期献身于情报社会来说，被认为是一种很相称的成就。人们认为，古德曼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中央情报局情报队伍的首脑；有些同僚希望，他也许会被选作第一个来自情报部的中央情报局长。他是一个热情而有天赋的人，有一双洞察事物的眼睛，保持了对中央情报局理想的热情承诺。

古德曼是非常称职的：他上班时间长；他的论文始终如一，“简洁、善于说理而且富于洞察力”，而他对苏联对外政策的了解，被认为是情报局的任何其他专家都不能相比的。他把锻炼秘密行动官员对克格勃和苏军情报局的行业技术的了解，作为自己的责任；他认为，将来总会有用处的。他成了情报部的关于苏联人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非正式的专家。有一次，他甚至做了行动部了解苏联情报组织行业技术的过滤器。在一位同僚回忆起的一个难忘的事件中，古德曼驳回了行动部的一项报告，因为它同自己关于苏联内部安全体系实际运作方法的结论是矛盾的。在一个项目上，他提醒行动官员们，对克格勃行业技术的研究，也许花费大量时间，但是这对掌握这种技术是必不可少的。这种直率的说法，出自另外任何人之口，也许成为侮辱，但是对于古德曼来说，仅仅是事实的说明。

苏联对外政策处以它的关于苏联政策的论文常有争论，以及它的关于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的扩张的尖锐而高明的辩论而出名。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同僚解释说，整个七十年代，古德曼作为一名非常有才华和知识超群的分析人员而树立了名声。”他由于对克里姆林宫发生的事情有先见之明而使自己出了名。”例如他写的关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物的研究论文，简直是令人眼花缭乱；情报部利用这些论文编成了极为详细的人物传记。古德曼关于苏联对亚、非、拉新兴国家看法的令人佩服的判断，也赢得了拥护者。他年纪轻轻就被情报局当作共产党在第三世界搞阴谋问题的常任专家，局里的领导人向他请教。考虑到在苏联问题专家当中紧密抱团、过热竞争的情况，古德曼得到的美誉就非同一般了。苏联分析室的老手们是不容易给予称赞的。

对苏联的分析机构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中央情报局的大人物们白手起家创立的。这些创业者在七十年代成了初级分析人员的良师；他们是由情报局有争议的国家评估室主任舍曼·肯特领导的。阿博特·史密斯是他的继承人，还有卢埃林·汤普森大使和一度当作中央情报局长候选人的威廉·海兰等人。这一老一代的情报分析家，严格遵守正直原则，而且坚决相信国家的未来有赖于自己的忠诚。肯特对古德曼有特别深刻的影响。正是像肯特和汤普森这样的人，在华盛顿决策人物当中树立了情报局的信誉，而且是因为他们，中央情报局的苏联问题专家们知道他们的意见在政府的一些委员会里是举足轻重的。

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传统是根据舍曼·肯特的竞争观点的哲学，于五十年代建立的。肯特决定，中央情报局需要三个独立的情报分支，各自拿出自己的成果，代替一个包罗一切的研究机构，就像情报部 1975 年以后那种情况。没有一个官员被赋予提供政治情报的全面责任。这种机构鼓励不同意见；有些人认为，这实际上使中央情报局免受以麦卡锡时代为特征的种种迫害所造成的破坏。“我们基本上是不能批评的”，一位退休的分析人员解释说，“因为没有人能够宣称我们是一个派别。有时候，我们就一些最简单的问题

无休止地争论。我们提出过分歧的看法。这是一个广为公开的过程。”

到六十年代中期，肯特的三个机构——国家评估室、高级研究班子和当前情报室——组成了中央情报局的大脑。任何提出独特的透彻见解的人，都受到尊重，有时甚至把他看作名人。对古德曼来说，就是这种方法使他得到高级官员们对他的工作的日益尊重。他们赞赏他的能力，容忍他的智力上的怪癖，以及有时候在绝大多数的不同意见面前他那种坚持一种立场的令人不愉快的习惯。对他的同事们来说，同样明显的是，他是有高度原则性的，而且要求扎实的、有根有据的资料支持任何主张。

古德曼进入中央情报局，比另一个新面孔的苏联分析人员罗伯特·盖茨从威廉与玛丽学院毕业后来到中央情报局的时间早几个月。两个人成了朋友，形同手足。他们都要使中央情报局得到发展；他们对对外政策问题都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涉及苏联的对外政策问题。但是，他们俩人终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古德曼留在情报局，走上直线的职业道路，通过各种工资级别往上爬，职位和任务不断上升、增多。另一方面，盖茨却离开了情报局，终于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助理，在那里他遇到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西贡的陷落对古德曼和盖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古德曼来说，美国在越南的冒险是一幕人类的悲剧，一场对外政策的灾难。他认为，美国未能理解越南人民的抱负，他因此深受影响。他深信，印度支那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运动激发了越南革命。他争辩

说，这场战争不是苏联寻求世界统治的一部分。

盖茨持不同看法：他相信苏联的扩张政策推动了越南革命；苏联就是越南武器的主要供应国。他的论点以不容争辩的证据为根据：因为苏联支持了北越，美国才被迫支持南越。

分歧反映了：在中央情报局内，对苏联政府促进和资助第三世界反美革命的能力存在深刻的分歧。一群人由日益固执己见的古德曼领导，相情苏联无能力支持并维持一项在第三世界进行扩的政策。反对的一群人的智能宗师是盖茨，他们相信，美国从越南的屈辱性撤退，给苏联人以空前的机会去利用美国的弱点。这种看法建立在这种充分证实的信条上：美国的力量遏止了共产主义的侵略，而美国的军事上的软弱鼓励了苏联的扩张。

在西贡陷落后的几年里，一连串摇动不停的余震，冲击了整个情报部门。美国从东南亚撤退不到一年，发生了第一个事件，当时安哥拉爆发了内战。关于苏联在南非的图谋性质的争论，使情报部丧失了为礼仪和学术上的准备而很好建立的信誉。当福特政府决定中央情报局应当悄悄运送武器支持安哥拉反政府力量处于萌芽状态的斗争时，这种争论加深了。国会由于担心美国进一步卷入一项正在失去的事业，而且关注美国经济的衰落，阻止总统不去促进这场秘密战争，停止了中央情报局的计划。

中央情报局内部关于美国在安哥拉的作用的辩论，由于古德曼和盖茨成了对立观点的倡寻者而更加充满怨恨。日益明显的是，标志着情报部和行动部早期存在不同意见的激进派对缓和派的分歧，现在使苏联分析人员产生不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教条，正受到由古德曼领导、虽小但是音调很高的集团的攻击。古德曼对苏联为了扩张而支持海外冒险的能力提出质疑。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甚至指出，当时在苏联政府内部发生了关于安哥拉的辩论；那里的改革集团争辩说，苏联再不能负担这种大规模的对外干涉了。当苏联人决定用古巴军队作为他们在安哥拉的替罪羊时，这种观点得到更多的

支持者。人们认为，这是莫斯科的冒险者和毁谤他们的人们达成妥协的证明。盖茨和他的支持者认为，这种观点对苏联人有利；克里姆林宫不过是要中央情报局相信苏联逐渐衰弱。

由安哥拉行动引起的不信任，开始扩大到情报部关于苏联意图的每一次辩论中。分析人员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分裂，是根据派别界线发生的，现在比以往更怀恶意、更具讽刺意味。简单地说，各派的主要人物就是互相激烈争吵，互相不同意，互相提出学术上论据，这是情报部辩论的传统特征，却为一种接近意识形态狂热的、空前的政治热情所代替。这些苏联分析人员知道，他们支持的立场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会有深刻的影响。有些人深信，国家的未来取决于他们的结论。

由于入侵阿富汗，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在 1979 年尖锐化了；这似乎支持了强硬路线的立场：苏联扩张主义就是美国软弱的自然产物。这不是个恢复为人怀疑的分析判断问题，情报部对美国冷战信条的承诺，在该部内部大多数分析人员当中，仍然起着支配作用。但是对苏联的分析已经经历一场革命性变化，主要因为古德曼和他周围的那些苏联问题专家，对中央情报局的想法有很大的影响。他们把苏联看作一个处于危机之中的社会，在忠诚上存在分裂，其未来难以捉摸。共产党官僚机构上层的错误路线明显可见，那里有个改革者集团，直言无讳，反对领导层对世界革命作意识形态的承诺。

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员道格拉斯·麦凯钦，在情报局工作的 24 年里，曾做过一些特殊研究工作。他回忆说，一个克格勃变节分子向美国提供的关于入侵阿富汗的情报，支持古德曼的总的主张。麦凯钦又回忆说：“八十年代末，我有机会阅读关于询问那位苏联官员的草稿，他是我们已有的最高级的克格勃变节者，在入侵阿富汗以前，他议论过苏联内部的辩论。克格勃反对入侵，外交部也反对。他还提供了这两方面的论据。这些论据的确就是我们的论据，说出了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干。‘但是’，他说‘那些中央委员会的粗暴的家伙、那些理论家，他们胜利了’。”

古德曼和其他苏联问题专家认为，他们编辑的苏联帝国经济资料支持他们的看法。这一点是古德曼的信徒之一珍妮弗·格劳德曼斯许多年后在国会作证过程中提出来的。“苏联自己深知，他们再也不能支撑自己帝国的重担了”，她说。“他们了解自身的弱点和易受攻击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在苏联对外政策方面产生了新的想法。正如‘公开性’证明的那样，苏联人认为他们的大部分对外政策彻底失败，得不偿失。在欧洲部署 SS—20 导弹，入侵阿富汗以及资助第三世界其他一些名声狼藉的政权，这些决定受到传播媒介和议会的公开批评。”

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后，辩论在 1980 年 11 月转变了，部分原因是，他允诺恢复已经削弱的国家安全状况。他深信，苏联是个决心统治全世界的邪恶帝国，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内部的变化。他认为，苏联是铁板一块，政府没有辩论，残酷镇压持异议者，而且调动大量资财同美国进行最后的、像世界末日般的对抗。一个主张加强防务的虔诚集团加强了他的看法，这个集团的人以对苏联的意图持强硬态度而著名。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保罗·尼采，此人曾是估计 1976 年后苏联军事开支的 B 大组的组长。他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在建立一种军事机器，决心发展能够毁灭美国的第一次打击的核力量。尼采的观点受到数目不断增多的苏联分析人员的激烈反对。

提出中央情报局未来问题的里根过渡班子特别委员会，包括当前危机委

员会的成员一来自 B 大组一和保守的麦迪逊集团的成员（所以这样命名，由于这个集团的开会地点是华盛顿麦迪逊饭店）。尼采虽然是这些反对情报局的保守派的前首领，实际的过渡机构都落到爱德华·岁尼中将的手中；罗尼因抗议卡特政府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二阶段中立场温和而从陆军中辞职。这些围绕古德曼形成集团的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员，相信罗尼会做他能够做的任何事情，减弱他们关于评估过程的各种论据所产生的影响。也被看作反对中央情报局的罗尼的同伙，包括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3 名保守委员：安杰洛·科德维尔、马克·施奈德和肯尼思·德格拉芬赖德。尤其是利德维尔，他被选作“怀恨情报局的人”，他会“做出任何能使我们意见不和的事情”。

里根过渡班子最后报告的公开声明，在自由一温和派的苏联分析人员当中，引发了深刻的故意和清洗非正式的古德曼核心人物的恐惧。“总的看来，美国安全遇到的基本问题，是中央情报局的当前危险状况和国家情报搜集的危险状况。美国情报搜集失败的要害在于防务计划的失误，外交政策摇摆不定，指导错误，自相矛盾的是，该报告批评中央情报局“政治化”，并且拒绝中央情报局提供客观情报的论据，说这是“道地的废话”。被选作特别斥责对象的，是情报局的法律顾问弗雷德·希茨，他由于企图使国会批准卡特政府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二阶段协议所起的作用而受到猛烈的抨击。该报告说，希茨应当免职。

该报告断言，在卡特执政的岁月，中央情报局有 12 项失败，大多数涉及过低估计苏联的威胁。这些项目包括：“令人沮丧地未能”预告苏联建立了大规模战略武器；“未能预测”苏联弹道导弹的准确性已经改进；“完全未能”了解或者反对苏联的宣传；“总的来说未能解释”苏联常规武器系统的各种特征；总之，里根的过渡班子指责中央情报局成了一帮自由主义者的俘虏，这些人一贯低估苏联统治全世界的承诺。情报局是个僵化的、官僚主义的、非美的机构。“这些失败是如此巨大”，该报告指责说，“他们不能不向任何客观的旁观者提出，情报局本身受到空前规模的损害，它的无能更多地归因于不祥的原因而不是无能。”

老资格分析人员道格拉斯·麦凯钦，对八十年代末中央情报局发生的事情提出不同看法。远不是用一种“不祥的”看法看待情报部的立场，麦凯钦把情报局的深刻分歧归因于过渡班子的报告中所反映的那种意识形态上的思想倾向。他说：“我认为情报界频繁发生的关于苏联行动和意图的争论，结果形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认为自己是理智的而且了解真正的政治决定，它把另一阵营看作一群逐步屈服的理论家和共产党徒。在另一方面，这个阵营认为自己是不凭感情用事的现实主义者，而另外一些人则是没有骨气的共产党同情者。这是带有色彩的语言，但是我认为，假如你能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找到诚实的人，他们会告诉你二者相去并不太远。八十年代初，这些不凭感情用事的现实主义者，却步了那些倾向共产党的没有骨气的人和共产党同情者的后尘。这就是公开的情况，就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见到的情况。”麦凯钦未能特别指出的是，每一阵营的领袖人物在情报局内部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同情者的首领是梅尔·古德曼；强硬路线派的首领是罗伯特·盖茨。

几星期之内，威廉·凯西被批准为中央情报局长，他解散了过渡班子，开始同它的结论拉开距离。他许诺高层负责人下放情报局的权力一用科德维尔的说法，就是“分散”一是他要做的最后的事情，凯西想当中央情报局局

长，他并不想监督大规模的改组。过渡班子的结论造成的震动，在情报部终归继续产生了反响，因为人们担心凯西会安抚政府的保守人士。这种直观的看法证明是正确的：任职不到一年，凯西就处罚了苏联分析室，因为在苏联威胁问题上它的看法确实是温和的。实质上，凯西对苏联分析人员实行一种内部放逐，一种分析人员的西伯利亚。这是警告说，他们的不同意见不受欢迎。

这次处罚确实是由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约翰·麦克马洪在里根就职前提出的；他批准了情报局分析机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组。当然，麦克马洪的动机同里根的或凯西的动机都大相径庭。他无意处罚（苏联分析室），他只不过是希望通过解散情报部内部各种机构的一些部门，使情报专家更加合为一体，从而简化程序。此事留给新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和凯西的第一副局长博比·雷·英曼付诸实施。

在盖茨和英曼因麦克马洪的建议瞎忙一阵没有效果以后，正如盖茨本人后来所说那样，另外一些“影响深远的变化”于1982年初出现了。盖茨后来承认：“这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造成了可以预料的大分解。”结果，苏联分析室脱离了情报局的支柱地位，而且不再成为东欧处的组成成分。“不仅使大多数人在1982年发现自己在不同的办公室里有不同的同事，而且有不同的监督者”，盖茨解释说，但是，“他们那时发现，在分析过程本身发生了变化。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在我任职的初期有一些不适当的分析人员。”

这是一种相当含蓄的说法；1982年的改组对中央情报局的士气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一次后来的内部回顾对这次改组造成的士气低落作了总结，并描述了它对苏联分析室一向出色的情报论文的摧残性打击。回顾指出，改组“制造了问题”，因为它把苏联分析工作从情报局的台柱地位中分离出来。这次行动也引起谣传说，苏联分析室的分析人员已受到警告，他们对苏联海外意图的温和立场，正在受到严格审查。

这些怀疑逐渐形成了对里根政府，对新任中央情报局长威廉·凯西，尤其是对盖茨的愤恨和敌对。1982年1月7日，这位新任的情报局副局长对情报部的官员发表公开谈话后，他和情报局的持温和态度的苏联问题专家们坚决不移地走上了一条顶牛的道路。按照情报局前分析人员哈罗德·福特的说法，盖茨被看作“个性很强”、“能向各种立场提出严厉诘难的人，并且还能“同最高层官员保持大体一致的看法”。换句话说，盖茨被广泛看作政府的刀斧手——任命他是为了强迫情报部的苏联分析室就范。

福特对盖茨特点的描写，是根据他的第一手材料；他们俩人曾在国家情报委员会共过事。但是，福特的有案可查的描写实际上是对苏联分析室的态度的有所保留的陈述。私下里，其他分析人员认为，盖茨是“自鸣得意，屈尊纡贵，铁石心肠”；他们把他的特征描述为“很有政治目的”。福特后来对他所作的关于盖茨任内情报部的态度的说明，作了简要的补充：“他一向是善于在事业上能争取人；他一向是善于迎合人。”

1982年，由于盖茨坚持为了使苏联分析室的情报文件对决策者更为有用，这些文件应当“更尖锐，并且改变重点”，苏联分析室内部已经冷静的情绪，因此进一步沉闷了。观点温和的分析人员认为，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盖茨要改变中央情报局的最重要的国家情报评估，以便其结论能反映他自己在苏联问题上的保守观点。

盖茨的这些指示，是他和梅尔·古德曼一年斗争达到的最高峰。他们之间的第一次公开冲突，发生在1981年初，当时盖茨还是负责苏联情报的国家情报官。可以预料，这次斗争是关于凯西坚持苏联暗中支持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盖茨热情地支持这些看法，甚至连凯西的其他高层助手，也在努力缓和自己老板的关于克莱尔·斯特林的霸占报纸头条的主张的公开声明。在参议院听证会期间，中央情报局同国会的联络官们，在斯特林关于恐怖主义的惊人谈话以后，继续勇敢地加以发挥。当凯西命令情报部起草一份特别国家情报评估时，盖茨作为国家情报官被委以作出最后结论的责任。

这项计划在里根就职后的那一月开始。第一份草稿完成时，对于斯特林和凯西提出的主张，只表示温和的支持。这一结果，实际上是稳健分子削弱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主张的一次大胆尝试。这次评估说：“苏联人公开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而且私下向他们自己的代理人建议，避免利用恐怖活动。苏联人和东欧人都没有直接发起或协调恐怖集团；他们并没有向基本上是恐怖主义的集团提供直接援助；他们并不鼓励他们在第三世界的代理人使用恐怖手段。”盖茨对此不满意，要求重搞这份评估。毫无疑问，他的命令得到服从，他把这项工作分配给新成立的全球情报室的初级分析人员。

“这次恐怖主义评估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位作家完成的”，古德曼后来告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说，“在分配此人这项工作以前，他来到中央情报局只有几个星期，而这项产品的负责人是一位官员。在分配此人这项工作以前，他来情报局也许只有几个月。”以后的4个月里，最初的低调评估转变成最尖锐、争论最凶的冷战情报文件之一。它同1948年以来已同意的关于苏联的几乎第一份最初研究都相矛盾。这些发现使苏联分析室的分析人员毛骨悚然，他们无权制止凯西和盖茨将其送交白宫。

国家情报专题评估得出的最后结论是：“苏联大力支持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暴力活动。这种卷入是苏联政策的基本纲领，实行这种政策是为了削弱不友好的社会，搞乱敌对的政权，促进苏联的利益……”评估文件继续评述包括“空中劫持、暗杀、绑架、爆炸和使无辜平民罹难的苏联恐怖活动。”

苏联分析室的稳健派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古德曼相信，盖茨为了使凯西满意，玩了一个“操纵体系”的阴谋。

国家情报专题评估提出报告以后，古德曼和苏联分析人员莱恩·埃克达赫尔写了一份向盖茨直接挑战的回应书。他们通过中央情报局的上层将这份反应书送出，从而确信同此事有重大关系的每一个人，都能看到他们的不满意度，并为以后的苏联分析室和盖茨之间的冲突作准备。“苏联人并不煽动、协调或控制恐怖活动”，他们报告说。“苏联同巴德尔-迈恩霍夫、红色旅以及日本赤军这样一些纯粹恐怖组织，并未直接合作。苏联人并未向它们直接提供军事援助或训练。”

结果，他们的反应书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里根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对凯西的看法不予理睬，尤其是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他拒绝把国家情报专题评估报告收入他的简报。（古德曼后来说，“这份评估激怒了他。”）在另一方面，凯西的反应在预料之中：他立即拒绝了古德曼和埃克达赫尔的结论。凯西和盖茨甚至烦恼得没有作出正式答复。

由于对苏联恐怖主义评估所产生的激情仍在沸腾，古德曼同盖茨的下一轮而且是最重要的斗争，在1982年2月发生了。争论的是关于苏联在第三世界意图的一份国家情报评估初稿，它是由古德曼的苏联分析室的专家们写成

的。在许多方面，这份评估打算当作一种独一无二、树立先例的文件，因为40年来中央情报局第一次概述了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大变化。苏联分析室的主要结论是，莫斯科领导勉强允诺从第三世界撤退。古德曼争辩说，苏联人“眼开眼闭”而且已经开始国际上的撤退。这份国家情报专题评估强调，苏联由于试图支持它在第三世界的名声狼藉的盟友，而遇到了大量问题，同时在国内却经受着日益加重的经济负担，而且面对美国会自动对抗这种扩张的清醒认识。古德曼认为，他的评估是根据来源广泛的正确报道，其中包括证实共产党领导内部正在重新考虑对世界看法的苏联变节者的访问记。

盖茨用四页长的答复拒绝了古德曼的估计。“我已读过附来的评估初稿”，他写道，“不幸的是，我发现它相当枯燥无味，而且缺乏苏联卷入第三世界的任何意义上的原动力以及为什么卷入第三世界对苏联来说是重要的。”他严厉批评古德曼，这份研究未能对苏联在第三世界扩张的回顾作一历史的介绍。但是，盖茨的答复最令人吃惊的是，他未攻击评估所根据的资料来源；他似乎只是关注改变评估中的结论。盖茨在答复结尾命令将初稿送回古德曼，并建议如何重写结论：“简单说来，我看出，在未来的岁月里，在第三世界有我们的更多麻烦，因为制造麻烦比解决麻烦更容易。”古德曼一旦看过这段话就会明白，盖茨要的是一份反映他个人的立场而不是事实的文件。

古德曼对盖茨答复中的另一段话也十分恼火——这是他们以前曾经争论的事情。盖茨指责说，古德曼的评估草案未能“适当考虑”中央情报局已经搜集的“关于苏联在第三世界的非洲、伊斯兰世界和其他地方所采取的积极措施的性质和范围方面的新情报。”盖茨写道，“在我看来，”这些情报应在国家情报专题评估中给以透彻的讨论。

这一指示使古德曼惊慌失色。他记得，盖茨当时引用的关于非洲的“新情报”，几个月前在情报部的一次内部辩论中已经受到怀疑。1981年末，当时盖茨还是负责苏联的国家情报官，他指示一名高级分析人员准备一份关于苏联在非洲活动情况的评估。因此而写出的报告初稿，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机会是一种赞扬性的说明。古德曼当时是参加这项评估讨论会的苏联分析室代表，发现其结论“令人愤怒”。他认为，要事先警告这项研究的作者，他的结论“有问题”，而且他还要在评估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提出这些问题，这“才是公平的”。当古德曼面对这位高级分析人员时，此人回答说：“你的问题同我无关……我在这个企业里不过是一个受雇的笔杆子。”

“谁雇的你？”古德曼问道。

“鲍博·盖茨”，这位侷促不安的分析人员回答说。

古德曼最后出席盖茨主持的关于苏联与非洲关系评估的评定会时，情绪激愤。人们围桌而坐，讨论大约30分钟以后，古德曼提出使他烦恼的所有问题，这时盖茨变得不安、不耐烦。正如古德曼回忆的那样：“[盖茨]看看我——但是我想，我的话是对在座的每一位讲的，我不把它看作个人的事情——这就是凯西要的评估，这就是凯西将要得到的评估。”

事实上，盖茨已经批评过古德曼的1982年关于“苏联人和第三世界”的国家情报专题评估未能反映他本人和威廉·凯西的观点，这些观点包括在盖茨个人起草的一份文件里。“凯西和盖茨要做的，就是采用一些前所未有的改变体系的措施”，古德曼后来解释说。“在同中央情报局长进行协调以前，我们第一次不得不就参考术语和各种草案作出澄清。”对于专业分析人员来

说，从舍曼·肯特负责的日子起，这是一个主要的变化。“实质上，所有的情报都要通过鲍博·盖茨过滤”，古德曼补充说。

古德曼和盖茨之间继续存在的不和，对情报部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尤其是对苏联分析室，那里围绕古德曼的一帮人，在非常影响里根政府对外政策的一系列有争论的情报评估的斗争中，输给了中央情报局的领导。回顾在这次斗争中所发表的最重要的情报论文，就是在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布雷区里遨游：关于阿富汗，一篇关于限制穆加希丁的论文被盖茨拒绝；关于尼加拉瓜，当分析人员对苏联人是否会运送米格战斗机给桑切斯分子提出疑问时，惹怒了凯西（苏联人并未这样做）；最后是关于断言苏联卷入了预谋暗杀教皇保罗二世的活动，当盖茨的批评者说，很少有证据或者没有证据能支持这种看法时，他帮助炮制一份为苏联情况复杂辩护的研究报告。（这项研究报告是秘密的，但是盖茨确信副总统布什收到过一份）。

古德曼和盖茨的斗争一直进行到韦伯斯特任内的第一年，当时情报部遇到了新的一连串的辞职和调动工作的情况。分析人员简直不相信新的中央情报局长会保护他们的情报产品不再政治化。盖茨秘密地使中央情报局摆脱白宫的那些报告，把问题搞得更糟——韦伯斯特被认为既不是一位坚强的领导人，也不是在政治上八面玲珑，足以对抗布什或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门徒。后来的事件，似乎支持了那些报告的看法。在韦伯斯特任内，盖茨的反苏观点在私下或公开场合，比以前更加直言无讳，甚至在苏联正在进行大量改革的明显证据面前，也是如此。他在发表的文章中和讲话里，对那些尚未由情报部澄清的美国情报发现作出断言（这在他和凯西 1981 年控制分析人员以前，是正常的做法）。在他的几次有准备的谈话中，他排除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影响。

不出所料，1981 年里根政府开始对中央情报局的不信任，对许多人的生涯产生持久的影响。里根的过渡报告的传布，在情报部内部引发的大量人员离职他去的情况，在 1989 年仍在发生。尽管凯西尽力医治这些创伤并且雇用合格的代替者，然而他的政治偏见使他自己取得的成就打了折扣。到 1989 年，中央情报局内部的战争对于保守派来说，终归是一次明确无疑的胜利。他们操纵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产品竟然达到这般地步；他们没有能力了解苏联社会的大量变化，或者预测八十年代末席卷东欧的革命。稳健派和非意识形态派的比较尖锐的意见，简直是不受欢迎。

“高级分析人员开始离去”，古德曼解释说，“他们开始寻找出路。你知道，你能处理的这种弊端就如此之多……如果你认真对待，你会厌烦。就用于训练这些高级人员的政府财源来看这种浪费和弊端，你会感到不可思议。我相信，在苏联对外政策这门业务方面，只有一位分析人员留下来。其余的人，不是完全离开苏联研究领域，不是完全离开中央情报局，就是像我这样，我因为政治化而辞职……”

假如威廉·韦伯斯特、理查德·克尔、理查德·斯托尔茨、托马斯·特威腾、约翰·赫尔杰森或中央情报局的任何其他高级负责人，由于情报局没有能力预测苏联帝国的崩溃而陷于困境的话，他们并没有表示出来。韦伯斯特反而继续他的改组情报局的公开运动，把工作焦点从超级大国冲突转到首次强调反对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武器及化学武器的扩散。韦伯斯特对他所开创的这些改变感到骄傲；他利用每一机会强调这些改变，作为转移公众对情报局的明显失败的注意力的一种方法。

然而韦伯斯特的的问题并未公开，是秘密的。1990年初，他完全脱离秘密情报工作和疏远情报主管部门内部的重要分析人员，已是既成事实。他由于缺乏对外事务的专门知识而继续受到批评。

再没有人比他自己更了解这一点了，所以他花费很长时间试图掌握基本的对外政策问题。这不是他特别感兴趣的课题，这是为这些课题而全神贯注的其他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一向感到惊讶的一个事实。早在1987年，相信韦伯斯特在做一件好事的将军英曼，当韦伯斯特找他讨论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时，他就提醒他，他缺乏这方面的兴趣。“对外政策不是他手中的长牌，每个人都了解这一点”，英曼说。“他要用很长时间学到手，这对某些人来说，肯定是令人泄气的事。但是我认为他（韦伯斯特）最终会掌握它，而且逐渐会喜欢它。”

韦伯斯特终于精通这些问题中的一些问题，主要由于他接受了赫尔杰森和克尔的忠告，这两人都是受尊重的对外政策专家，同他的办公室有不加限制的开门通道。中央情报局长绝对需要他们。“我们会在七楼的这些圆桌旁呆到午饭以后，我们试着就某些问题向鉴定人作出说明，他会点头同意我们所说过的一切”，一位高级分析人员回忆说，“但是我们离开以后，他独自一人，会把高级助手叫来。他们进来，看到韦伯斯特坐在那里，面部毫无表情。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坐下来向他解释一些事情。他们会一遍又一遍地解释。

韦伯斯特也依靠其他一些和他有同样看法的分析人员，这个看法是，情报局需要继续强调同公众和国会的关系。他们当中有一个叫约瑟夫·德特兰尼的，是一位职业行动官员，韦伯斯特终于吸收他接管公共关系办公室。德特兰尼的感人的旺盛精力，使韦伯斯特着了迷，这完全由于他的新泽西口音和韦伯斯特特别珍视的为中央情报局热心叫好的观点。在向记者发布背景情况时，德特兰尼成了情报局的啦啦队长，对新闻界和情报局一向存在的紧张关系，采取缓和的方法，并且经常促成中央情报局的成功。“这是个激动人心、激动人心的地方”，德特兰尼在一次典型的采访中会这样说。“而且这些都是令人激动的时刻。重大的事情正在这里发生。重大的、重大的事情。”

德特兰尼、克尔、斯托尔茨和赫尔杰森，都是韦伯斯特内层圈子的主要依靠。到韦伯斯特担任中央情报局长的第三个年头，第二个外围官员圈子开始围绕他形成。这是一帮秘密情报官和分析人员，他们开始赞赏他自我吹嘘的政治能力，他能熟练地同国会打交道：而且也许是最重要的，尽管白宫不信任，认为他不是个通力合作的人，他还有能力保住自己的工作。尤其是这最后的成就，似乎起了对他有利的作用。韦伯斯特尽管有这些隐蔽的污点，至少他不会沉默不语，让布什政府贬抑情报局。

他也不会不提出辩护就让国会攻击中央情报局。例如1989年末，韦伯斯特对来自国会山的抱怨就表示过无礼的蔑视，国会山抱怨情报局撤回对参加阿富汗战争最后阶段的游击队的支持。争论在几个月前苏联部队从阿富汗撤退时就开始了，在国会抱怨阿富汗特遣工作队头头工作不力时达到了顶点。韦伯斯特为情报局提出辩护时，面临另一种预料不到的信任危机。

1989年2月15日，苏联从阿富汗撤出最后一批部队时，秘密情报部门内部情绪高涨。40年来第一次，一个隐蔽的中央情报局计划成功地迫使苏联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撤走。为了显示胜利，韦伯斯特在自己的办公室举行一次独特的庆祝会，阿富汗特遣工作队成员和远东处的高级官员应邀参加。他

甚至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其中他向阿富汗特遣工作队负责人祝酒，并且概述关于隐蔽计划的10年历史。“这是美国的胜利”，他说，“但是也是中央情报局的胜利。”在他转向特遣工作队的官员们时，又补充说，“最为主要的，这是你们的胜利。”他结束讲话时，中央情报局上层官员们为阿富汗特遣工作队的代表们热情地鼓掌。按照一位官员的说法，这个真正动人的时刻，帮助创造了韦伯斯特和阿富汗特遣工作队官员们的特殊结合。

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很值得庆祝。中央情报局花了30亿美元向穆加希丁提供来福枪、地雷、摩托车、火箭发射器，甚至肩扛的对空导弹—毒刺导弹。通过这种大量的努力，情报局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完全的战地隐蔽行动。从兰利办公室的走廊里，特遣部队通过特务，通过阴谋战略、购买武器和设计外国的新的武器系统—“阿富汗友好”系统—进行一场战争。中央情报局甚至购买几千头田纳西州的骡子，从巴基斯坦通过陆路运送武器给造反集团。结果证明，这是一条完全正确的路线。1986年9月26日，第一批毒刺导弹击中苏联直升机后——在贾拉拉巴德机场上空击落4架欣德MI24式武装直升机中的3架——又从巴基斯坦通过陆路运送了1,000多件这类武器。穆加希丁迫使苏联人根据他们的条件，在地面上进行一场耗尽苏联军事力量而毫无结果的激烈较量。

10年战争以后，苏联在衰败的情况下离开阿富汗，非常衰弱，很少有人相信它能在游击战攻势继续存在下去。美国新闻界报道说，喀布尔执政的人民民主党被推翻，只是时间问题。这种看法就是美国自己在越南经验的反映，由于北越的一次决定性军事攻势，美国在两年内就撤退了。研究阿富汗政治与军事平衡问题的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员，得出同样结论。他们发表一份情报报告说，造反力量取得全部胜利需用6至12个月的时间，不会再多。情报局的分析人员也得出结论说，由于这场战争，苏联的精力非常疲惫，经济非常衰落，使戈尔巴乔夫很快会放弃对这场斗争的支持。

对于这种看法，有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声音，包括阿富汗特遣工作队成员。他们相信，在阿富汗境内活动的七个主要的穆加希丁集团，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分歧太大，不能在共同军事计划上取得一致。中央情报局的一些行动官员也担心，反西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仍然是抵抗力量内部的一种主要的怀有固有动机的力量，它能进一步损害美国控制游击队的战略。他们指出，主要的游击队由古尔布丁·赫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控制，此人被怀疑为助长反西方情绪。赫克马蒂亚尔的主要供应品是通过巴基斯坦的情报部门得到的，该部门负责在乡下分配中央情报局捐赠的物资。其他一些集团得到一小部分物资。换句话说，不像北越，有一个统一的政党，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常规部队充当征服南方的唯一单位，阿富汗抵抗力量的领袖们在新政府应当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上，是分裂的。

简单地说，即使有充分原因在2月15日庆祝中央情报局的胜利，也没有理由相信这一胜利是最后的胜利。不几个月，特遣工作队的官员们了解，阿富汗的结局看来像黎巴嫩。

在中央情报局，假如有人怀疑阿富汗抵抗力量能够合并成一个统一阵线，几乎无人怀疑苏联人会做这项工作。苏联人被认为是永久离开了阿富汗。由于这种共识，就没有理由向南亚大规模运送武器了。因此，情报局在苏联撤退后的头3个月，减少了对穆加希丁的支持。这一决定证明是错误的。戈尔巴乔夫承诺支持他的附属国—纳吉布拉政权，远不是说说而已，这是他向

克里姆林的强大的阿富汗帮的重大让步，是为赢得它对撤退的支持。在苏联撤退后的6个月里，莫斯科的大规模重新供应，运送14亿美元的援助，支援喀布尔政权。

情报局关于阿富汗会发生什么情况的臆断是错误的，其最初迹象到1989年7月初才显露出来，这时阿富汗的游击队未能对贾拉拉巴德附近的政府军阵地完成协调一致的进攻。从那时起直到秋季，穆加希丁的军事行动配合得很糟，力量非常分散。更糟糕的是，一群有30人的游击队领袖，在一次战略会议后回家时遭到一个对立的抵抗力量派别的暗杀。暗杀集团是在该国北部作战的贾米阿特-伊-伊斯拉米派的一部分。贾米阿特的成员因这次进攻谴责伊断兰党和赫克马蒂亚尔，说赫克马蒂亚尔的一位战地指挥官萨亚德·贾迈勒负有责任。这一事件成了一触即发的内战的征兆，这场内战只会巩固喀布尔政权。

关于中央情报局未能预料苏联的重新补给的争论，对情报局减少对穆加希丁武器的供应再次提出的质疑，以及担心一旦联合的造反集团不能实现和解等等问题，在8月3日韦伯斯特和国会领袖们在兰利的午餐会上争论得不可开交。国会议员们都是国会山上对阿富汗抵抗力量的最直言不讳的支持者。在这些议员当中，有些人就是一致主张在1986年部署毒刺导弹的。午餐会突然变成韦伯斯特和参议员戈登·汉弗莱之间的唇枪舌战，汉弗莱是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人，在参议院领导一个阿富汗特别工作组。汉弗莱告诉韦伯斯特，看来情报局“忘掉了阿富汗”，并且指控中央情报局低估了苏联对喀布尔政权的承诺。汉弗莱坚持说，中央情报局的特遣工作队的领导必须更换，他对隐蔽计划的“管理严重失当”。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比尔·麦科勒姆插嘴附和说，由于减少武器供应，情报局的可耻的工作“使一定的胜利不复存在”。

韦伯斯特为情报局的计划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但是他被迫承认，抵抗力量能在6个月内取胜的内部估计是乐观的。他说，现在看来需要用更多的时间，穆加希丁内部的斗争问题必须在胜利成为可能以前予以解决。韦伯斯特小心翼翼地不提中央情报局根据自己的预测故意减少武器贮备，以及情报局不想使高度精密的武器系统落入造反者手中，或者说更糟的是，最后落入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手中。国会领袖们不满意地离开了情报局；韦伯斯特拒绝同意由一名更为激进的人士取代特遣工作队队长。

一个时期以来，这种冲突一直在发展。这次午餐会的一个星期以前，韦伯斯特接到参议员汉弗莱和奥林·哈奇（犹他州共和党人）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封信的副本，该信强调他们对情报局在阿富汗的失败表示关注。这两位参议员建议，用一次特别的秘密会议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几个月后，哈奇就争论本身写出自己的报告。他的结论是，计划的处置不当不能归咎于中央情报局的中层官员。他说：“这是总统的过错，是韦伯斯特的过错。”情报委员会同意汉弗莱和哈奇的要求，请副国务卿罗伯特·金米特作证；众议院也举行自己的会议并邀请抵抗力量的领袖出席，对参议院的调查作了补充。

这次国会审议的整个结果是，为了增加经巴基斯坦向阿富汗运送武器，对中央情报局施加了大量的压力。为了制止不断发展的争论，白宫和国务院发起一场使不和的阿富汗各派重新团结的运动。最后，韦伯斯特向国会的压力让了步，撤掉了阿富汗特遣工作队队长丹尼尔·韦伯斯特——一位有名的、

受尊重的职业秘密情报官员。行动部的另一部门，给他分配一个临时职位。

韦伯斯特的决定激怒了特遣工作队的官员们，似乎是拆散了他在 2 月同他们形成的联盟。没有很多的理由能够改变他的主意。斯托尔茨试图改变行动部官员们的不满情绪，劝告说，韦伯斯特采取的行动仅仅为了使情报局的计划摆脱公众的耳目，并且保证它所支持的游击队力量赢得最后的胜利。

斯托尔茨的调停失败了。特遣工作队的官员们仍然不相信韦伯斯特了解自己的行动的意义。然而，韦伯斯特私下认识到，他不能继续成为一名得力的中央情报局长，也不能由于在阿富汗的胜利而抛开他在行动部所得到的微不足道的支持。由于他能应付国会的声誉。他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工作，向布什和中央情报局保证，对情报局关心的事情他能成为不抱偏见和忠实的仲裁人。现在看来，就像政客们在操纵他。到 1989 年 12 月中旬，也就是撤掉丹尼尔·韦伯斯特 4 个月后，这位中央情报局长准备消除因阿富汗问题的争论造成的损失。使诽谤他的人们感到惊讶的是，他悄悄地重新任命丹尼尔·韦伯斯特为特遣工作队队长，中央情报局长的行动，立即产生了有助于巩固中央情报局内部对他的支持的效果。以后的 8 个月里，当白宫对他的工作表现重新进行攻击时，他绝对需要的，就是这种支持。

1990年3月7日，也就是中央情报局接到报告说利比亚在拉巴特制造化学武器制剂的18个月以后，布什政府指责北非政府在这个工厂恢复生产，要求将它关闭。一星期后，一场神秘大火烧毁了大部分设备。目击者对记者的描述表明，虽然不知火从何处烧起，但几乎是全部遭破坏。地狱似的燃烧遍及工厂的主要生产区，在利比亚沙漠上空密布含有潜在危险毒气的浓烟。

美国情报官员除了否认他们在这次火灾中的任何作用外，拒绝对拉巴特“事件”发表评论。布什总统也发表一项由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人士支持的否认声明；这位人士透露，美国并未使用卫星情报技能监视火情的发展。即使用了，笼罩北非的浓烟也使拍照成为不可能的事情。3月15日，白宫新闻秘书马林·菲茨沃特重申布什的否认。“起火的原因不明”，他简单地。“美国没有卷入。”

菲茨沃特补充说，那天上午，布什同西德总理科尔在电话交谈中并未提到这一事件。白宫记者团的成员由于这一说明感到惊讶，因为西德的公司同设计拉巴特的设施有牵连，而且输出了开始生产用的化学制品。

当记者追问时，菲茨沃特承认，美国可以被认为至少间接地同工厂的破坏有关。他勉强承认说，“我们从外面帮了忙，你们可以理解为防御性的或理解为一件令人不快的事。”

即使这一最后声明同他早先的否认相抵触，菲茨沃特还是暗示，美国了解的情况比它愿意承认的还要多。他甚至走得更远。他暗示，中央情报局知道这个工厂已经有些时间了。

在回答西德在设计这一设施时可能起的作用时，菲茨沃特间接承认，中央情报局一直在监视拉巴特的危险。“关于这个工厂，菲茨沃特承认，我们同我们的盟友有一些接触，讨论这家工厂是怎样请到专家和得到化学制品的……”

事实上，布什政府秘密地对西德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做些事情保证利比亚的化学武器能力永远不能付诸应用。

有许多线索似乎指出西德对这次着火负有责任。首先，火灾发生在一个非常奇特的时间：这个工厂还没有完全开工，刚刚开始生产芥子气、神经性毒气的化学剂——甲氟膦酸异丙脂（Sarin）和 Somin 以及其他两种有毒物质。其次，火是在能够造成最大破坏的地方——工厂的大型主要生产装置内的一些关键部位燃起的。另一场火是在附近一所基本原料仓库燃起的，那里存放了最易挥发的化学制品。第三，火是细心点燃的，在火灾发生的头几个小时，工厂露天部分（为了使化学剂化合为芥子气而故意这样建造的）周围的结构里没有东西燃烧。这个地点没有火情，就使附近主要生产装置中正在燃烧的化学剂最大限度地四处扩散。最后，火的点燃使用了保证化学剂不致释放到周围环境的正确方法。

国务院并不否认是西德人放的火。国务院的正式声明还表示，美国对此事并不惊讶或不愉快。“我们了解，这个工厂的化学剂燃烧后，不会给邻近的人们带来威胁”，国务院女发言人玛格丽特·塔特怀勒冷冰冰地告诉记者说。她然后闪烁其词地证实，工厂的破坏不是一个事件。“毁掉芥子气的可取方法，事实上就是一场露天大火”，她实事求是地补充说。

至于西德政府，它否认卷入了对工厂的破坏。（一位发言人说，“这种看法完全没有根据，是凭空捏造的”。）在所有的可能中，这些否认故意导致错误的理解。但是，假如西德要对拉巴特的火灾负责，没有中央情报局的帮助，它是不可能行动的。能指出美国所起作用的理由有好几种。事件发生前，情报局用了将近 18 个月的时间罗致反卡扎菲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了解拉巴特设施情况的任何人。中央情报局从和利比亚做生意的化学武器专家和欧洲一些进出口公司的经理那里，搜集了关于工厂的大量详细情报。它还向白宫提供证据，反驳西德人关于他们同建造这座工厂无关的说法。这一情报由美国政府转给西德情报官员。

西德政府接到这一情报以后，也就是拉巴特火灾发生一周以后，正式指控一家大型化工出口公司——伊姆豪森化学公司的总负责人于尔根·希彭施蒂尔——伊姆豪森非法向利比亚运送设计和装备。这一指控是在利比亚宣布停止对西德进口商品付款并取消利比亚对西德的全部石油输出后三天提出的。

与此同时，卡扎菲指控西德在拉巴特纵火，使用“非常先进的手段”，也许是定时装置，使人看来这次阴谋破坏确实是一个事件。

尽管否认，菲茨沃特 3 月 15 日的谈话表示情报界的一次重大胜利，虽然在未来的一年里，这次胜利还无法预料衍生的后果。

1990 年 3 月 15 日，突出作为布什政府的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虽然不仅仅因为在利比亚发生的事件。在以色列，依扎克·沙米尔的保守政府在议会的信任投票中失败后垮台。沙米尔宣布，以色列不同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和谈（和谈是他首先提出的）之后，失败就降临他的头上。同一天在巴格达，31 岁的英国记者法尔扎德·巴佐夫特被萨达姆·侯赛因的政府绞死，指控他为以色列和英国进行间谍活动。巴佐夫特被处死的惊人新闻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但是白宫并未这样做。

发生在耶路撒冷和巴格达的这两个事件，比初看起来有更为密切的关联，而且对美国的对外和情报政策有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布什总统在沙米尔政府倒台中的作用，标志着意味深长地脱离了里根执政年代的亲以色列立场。另一方面，美国对处死巴佐夫特的沉默反应，反映出当此事涉及侯赛因时，政府采取不干预的态度。

逐渐引向沙米尔政府突然垮台的一些事件，在 2 月 22 日晚布什和沙米尔的越洋电话交谈中就开始起作用了。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听布什结束这次电话交谈的，是他的两位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罗伯特·盖茨。在交谈中，布什在几个重点方面转向他们两人请教。布什向沙米尔表示强烈关注的事情是：苏联移民在被占领土上新建的市镇大量定居，这个建设计划会干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在自治问题上的谈判。随着讨论变成不寻常的争论，布什暗示，沙米尔存心破坏以色列—巴勒斯坦谅解的任何机会。布什接着引用以色列的住房数字作为沙米尔故意在错误的时间内在被占领土上增加居民点的证据，正如以色列人所说那样，这是“造成事实”。

沙米尔客气地表示不同意；他向布什允诺，在被占领土上新居民点最后定居的苏联犹太人，不超过百分之十。布什说，他感到高兴。

打完这次电话和盖茨研究了有关数字以后，布什发现，沙米尔的算术只有一部分是准确的。盖茨告诉总统说，沙米尔很容易忘记提及大量的苏联犹太人也会在东耶路撒冷定居，沙米尔并不认为那里是被占领土。加上这些数字时，总数大大超过百分之十。沙米尔的说法是故意隐晦。如果美国同意他

的百分之十的数字，政府就得承认以色列对整个耶路撒冷的主权。布什极为愤怒。他认为，沙米尔故意欺骗他，甚至对他撒谎。同斯考克罗夫特、盖茨和国务卿贝克商量后，布什决定在移民点问题上对沙米尔公开施加压力。

3月5日，在加州棕榈泉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一对策出现了高潮。当时布什口头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在加沙，以及像他故意增加的“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等地建立新移民点的以色列政策。布什的谈话最初并未引起美国新闻界的什么评论，在以色列却成了头条新闻。沙米尔以解除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的内阁职务进行还击，此事引发了政府危机。3月15日，在议会的信任投票中，沙米尔以65票对55票的结果失去信任，被迫要求新的选举。以色列政府的垮台和其后的政治危机，无限期地推迟了中东和谈。与此同时，在东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新的以色列居民点在加速建立。然而奇怪的是，以色列的政治危机对白宫的官员们并未产生多少看得出的影响。他们冷静地看待这次不信任投票。它意味着不妥协的程度较小的工党，如果在选举中获胜，会有新机会领导政府。

现在很清楚，事实上布什的评论适得其反；他一怒之下干扰了近10年来最实际可行的中东和平攻势。沙米尔接受布什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挑战，向华盛顿表示，他会做任何事情来控制这个先前被分裂的城市。这样，布什不是哄骗沙米尔坐到和谈桌旁，而是把他推得远远地。这是以色列新政府非常坚定地开始处理中东和平问题前两月的事情；也是在沙米尔实际面对面会见他的反对者的16个月以后的事情。

伊拉克处死巴佐夫特对白宫说来，也引起了许多问题，在此以前的14个月里，白宫一直试图用脚踏启动器的方法同萨达姆。侯赛因建立一种比较实际的关系。政府的政策是根据里根执政的末期国务院的一项不怎么有名的关于伊拉克问题的研究报告。由中央情报局中东问题专家协助完成的这个报告，得出4点概括性结论：波斯湾对于美国的生存来说，“是一种地理战略实体”的关键；海湾的各个政权（尤其是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各国政府—科威特、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政治上都不稳定，而且需要美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进行长期支持；海湾国家“倾向西方”（该报告说，这是必须“加强”的倾向）；萨达姆·侯赛因是一位不会奉行失败政策的懂道理的领袖。

国务院的研究报告在布什就职后不久，得到白宫的一份类似文件的支持。这份被批准为第26号国家安全指示的三页报告说，美国要采取一项长期有限合作的政策，改善同伊拉克的关系，这项政策是察觉苏联对美国“主要”安全利益的威胁而被迫采取的。第26号国家安全指示建议，在伊拉克实行经济重建计划，并且暗示，也可以采取其他一些有助于减弱伊拉克政权的革命性质的主动行动。这份文件暗示说，萨达姆·侯赛因对这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鼓励，会作出回应的。

尽管一些政府专家和国会议员对第26号国家安全指示发出强烈警告并表示反对，白宫和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们仍然相信，侯赛因对以色列的“仇恨”和对美国的误解，能够有效地得到控制。从新总统就职时起，到他签署第26号国家安全指示，布什政府是赞同1988年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研究报告的：侯赛因是个“残酷无情、但是实用主义的”领袖人物。

然而那年春天，这位伊拉克的独裁者表现了残酷无情。1990年3月15日，法尔扎德·巴佐夫特被革命法庭判决后，因在伊拉克进行间谍活动而被

处死。这位英国记者是在他进入阿尔-希勒尔的一个没有限制的军事工业联合体以后，于1989年9月开始被捕的，他认为该地有生产化学武器的技术。（在他去这个工厂的前一星期，那里发生了大规模的爆炸。）伊拉克进行了审判表演：不许巴佐夫特请律师，制造的用来反对他的唯一证据，是从他衣箱里没收的一支小土壤试管。他承认，他已取样进行化学品痕量的检验而且写了认罪书。但是，他后来激烈地辩护说，他是在强迫下作此说明的。他否认他是间谍。

在他被捕后，尽管国际上强烈抗议，伊拉克还是执行了死刑。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称这次死刑“是所有文明人民深为憎恨的野蛮行径”。然而，在华盛顿，发言人菲茨沃特替布什总统发表了一项冷淡的反应。

在白宫的上午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记者问道：“伊拉克绞死了一个为英国报纸工作的记者……你们对这次绞刑充其量不过是模棱两可。我们不去谴责伊拉克搞的绞刑吗？”

“关于这个案件，我们没有任何情报”，菲茨沃特回答说。

“你怀疑他像伊拉克所说那样，是间谍吗？”

“关于这个案件，我们没有什么判断”，菲茨沃特答复说。

“……在你得到更多的情报以后，对于绞死这位记者我们要作出比较肯定的反应吗？”

“我不期望这样”，菲茨沃特说，“这是一个英国公民。这是个国际上要求宽恕的问题，我们遗憾的是，没有给予宽恕。但是……他不是一个美国公民。对于案件本身，我们没有任何判断。”

由于3月15日白宫新闻室发布的官方评论种下了美国—伊拉克未来冲突的种子。布什政府不仅拒绝谴责萨达姆·侯赛因，而且看来有意证明，它的迎合侯赛因的实用主义方面的政策，能够起作用。布什在向全世界发出信号：美国政府相信，它能成功地将一名中东的激进分子变成一名阿拉伯的温和派。侯赛因后来把美国在这个问题以及许许多多其他问题上的沉默，解释为赞同，现在这已成了一部分历史记录。但是，3月15日的事件及其立即产生的不良后果，也暴露了政府决策人士方面的另一种特殊心态：他们认为在谴责卡扎菲制造化学武器方面没有什么虚伪的同时，却忽视了来自伊拉克的大得多的威胁。

以色列政府的倒台和布什政府对绞死巴佐夫特的反应，给人们留下了明确的印象：白宫不是没有控制中东政治的微妙信号，就是非常相信自己看法的正确，使自己的官员们不能想像他们怎样会失败。这第二个因素是关键。由于确定萨达姆·侯赛因是个实用主义的领袖，布什政府忽视了中央情报局一再发出的警告：侯赛因不断进口用于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原料，并且庇护恐怖分子。总之，中央情报局用文件证明，他对伊拉克的领导和卡扎菲在利比亚的统治，没有什么不同。正如中央情报局很快发现的那样，这两个阿拉伯强人依然怀有对西方的更多的仇恨——他们同样拥有同样的恐怖主义分子。

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事件的调查工作停止了。1990年3月，在调查人员会见许多国家的人民、警官、恐怖主义分析家和法庭专家以后，所得情况与他们15个月前相比，决不是更接近于解决这次的犯罪问题。在洛克比，不同的有耐心的情报官员，对他们能否查出是谁杀害了这次空难的270名遇难者提出疑问。尽管几百万美元已经用于这次调查，然而似乎可能的是，这次

爆炸会永远成为一个神秘事件。飞机上的和掉在下面小村子里的遇难者，是被恐怖主义分子杀害的，但是没有人能够肯定他说这些杀手是谁，对这两点不再有任何怀疑。控告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阿赫迈德·贾布里是这一案件的主要嫌疑人的证据，也不很充分。在洛克比和华盛顿，调查者未找到他们需要的能把贾布里和泛美公司航班爆炸联系一起的关键证据。他们未找到炸弹本身。

4月初一个有雾的早晨，一个苏格兰工人在打扫洛克比附近一个场地时，发现一个难以形容的指甲盖大的烧黑的铜片，这时调查的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这位工人小心翼翼地将这块小铜片和一块电气碎片上粘附的碎片装进一个大塑料袋，把它送到证据收集中心；在那里，对这些发现进行研究、验证并分类编目。这块小铜片是个奥秘的东西。随后的几个星期，尽管炸弹专家们和波音747客机的制造工程师们尽了最大的努力，验证了该机的原始部件，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肯定地说，这个小铜片就是破坏泛美航空公司班机的机械装置的一部分。在几个专家当中，普遍感觉，只有一个可疑之处：这块小铜片非常重要，也许是他们已经发现的验证爆炸的最好线索。在炸弹专家们为验证这块小铜片继续工作的同时，一个恐怖主义分析家小组查找了中央情报局和英国情报局的档案，希望发现这块铜片和其他炸弹的联系。

第一次仔细的验证是在6月，当时中央情报局一位老资格分析家承认，这块铜片，“确实是一种定时装置的电路板上的一小片”。这一惊人的结论转变了陷于瘫痪状态的调查工作。这意味着，“海上处女号”航班不是由装有测高仪引爆装置（一种在3万英尺高空引爆的先进气压计）的炸弹炸毁的，而是被一种早期的由集成电路板驱动的定时炸弹炸毁的。这种定时装置表明，这个航班假如在时间上有任何延误，炸弹就会在希思罗机场，或法兰克福，或马耳他，或在这些地方之间的任何地方爆炸。洛克比的发现的直接意义，使调查人员慢慢地觉醒了：它意味着，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的炸弹制造商马尔万·克里斯哈特，不是泛美公司航班案件的嫌疑人；把贾布里作为最初嫌疑人的考虑，也可能被排除，因为他的欧洲恐怖网有比较先进的爆炸装置，被德国人抓到了；所有这些爆炸装置，都使用测高仪，不是定时器。

这年夏天，在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在安曼对克里斯哈特进行刨根问底的查访中，他一再否认他同泛美公司航班的爆炸有任何关系。“这是一种很好的炸弹”，他说。“我从来没有制造过。”

由于排除了克里斯哈特和贾布里是嫌疑人，负责解决对泛美航空公司犯罪问题的主要情报组织（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苏格兰警方和英国情报局），被迫放弃15个月精心构成的种种理论和他们最有希望的工作假设。他们重新研究了证据，留下了许多基本事实：这种简单的定时装置，装在一个不工作的收音机里，爆炸剂是一种称作RDX的塞姆泰克斯牌弹性塑料炸药，炸弹的动力来源是两节AA电池，收音机是用在马耳他玛丽商店买来的衣服包住的。此外，是谁放的炸弹和为什么，仍然是未知数。

小铜片的发现，也破坏了关于贾布里的特工哈菲兹·达勒卡穆尼的详细情报的用途，此人的活动基地在欧洲。（这次爆炸事件以前，达勒卡穆尼对伊朗革命卫队驻黎巴嫩分队司令部的访问，无关紧要。）德国警察在诺伊斯

发现的爆炸物秘密贮藏处，同这次爆炸事件也没有任何联系。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特工们监视驻德美国人经常光顾的咖啡馆的情报，以及在法兰克福泛美航空公司柜台上拍下的照片，比最初看来，其重要性也似乎大为减色。

在4月份的发现以后，中央情报局的反恐怖中心的调查人员们认识到，16个月以来，他们的调查受到依然大可怀疑的许多前提的驱使。它们是：克里斯哈特以某种方式卷入了这一事件；侦破贾布里在欧洲的恐怖组织网，暗示他是这次阴谋的领导者；在幕后，总的是伊朗的一个起支配作用的策划者集团。一些中央情报局的调查人员得出结论说，当其他证据倾向于减少贾布里的卷入时，中央情报局及其姊妹情报组织也可能更愿意将这次爆炸归咎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因为针对贾布里的证据压倒一切以致使每个人对指出其他方面问题的报告未能彻底追究到同样程度。特别是，他们轻视这样一种看法：其他恐怖主义分子，像利比亚的特工，同样有用行动反对美国的动机，就像贾布里、激进巴勒斯坦人的其他集团、叙利亚或伊朗那样。

反恐怖中心前官员文斯·坎尼斯特拉罗承认，泛美航空公司案件的调查人员“没有了解整个情况”，虽然他仍然为情报局的全面工作大力辩护。他说：“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和模型指出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卷入这一事件”。“中央情报局并未忽视其他证据，但是一旦得出初步结论，就有一种轻视其他证据的倾向。这是一次非常紧张的调查，但是由于它的性质，为了支持更令人信服的其他报告，有些报告不得不给以较少的优先权。”

这种被歪曲的辩解，其他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同样引用，它表明中央情报局很容易成为自己过去遗产的受害者。“我们在泛美航空公司这一案件上，过于着急”，一位反恐怖中心的退休官员承认说，“但是伊朗人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有充分理由对美国的航空公司进行报复。我们无意中击落了伊朗航空公司的空中客车，他们自然要发誓报复”。在伊朗门丑闻中，美国同伊朗进行秘密交易后，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也非常渴望接受把爆炸的罪责钉在伊朗身上的结论。它很适合情报局在改变自身方法的承诺。由于犯了一次错误，中央情报局几乎就像是努力为自己过去的过失悔罪，将一度被认为是可能的朋友、忤逆的亲西方而且温的伊朗人，变成恐怖主义的野兽。

由于抛弃了自己以前的假设，反恐怖中心加速审查以前放弃的证据。一个有趣的线索，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打给罗马一家新闻社的匿名电话记要；此人声称，炸毁泛美公司103航班，是对1986年美国轰炸利比亚的报复。另一线索来自一份可疑的西德情报报告，是一份截获的利比亚驻伦敦“办事处主任”发给的黎波里利比亚对外联络处的消息全文。许多反恐怖主义中心的官员，早些时候已经放弃了这个报告，因为它似乎证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在“这次爆炸中无罪；这个报告还使德国人摆脱从德国监狱里释放一些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成员——包括克里斯哈特在内——的困境。由于这两个因素当时被低估，上述被截获的消息就增加了重要意义。这个消息说，“革命的祝贺，我们趁此机会希望你们‘赞美上帝’，我们已经为美国侵略中被美英帝国主义分子屠杀的烈士报了仇。坠毁的美国飞机上，包括一些离开法兰克福经伦敦去纽约的野蛮美国部队。以我本人的名义和我同伴的名义，向干这件事的英雄们表示祝贺。”

由于利比亚的可能联系受到新的注意，反恐怖中心的分析人员追踪了铜

片的来源（现在调查人员认定，它就是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片的一小部分），洛克比和华盛顿的炸弹专家重新草拟了炸弹的确切特征。这样做的目的是，试图决定这块集成电路片同中央情报局或其他情报机关没收的其他炸弹会有什么可能的联系。当这一关键工作在7月初完成时，调查人员对于炸弹的来源仍然迷惑不解。这种炸弹的特征同巴勒斯坦外围集团以前使用的技术都不一致，同已知的任何主要国际恐怖组织使用的炸弹外形也不一致。

4个月后，美国调查人员提出了这个谜团的实质部分，他们认出制造这种计算机集成电路片的是一家荷兰公司，它把这种电路片卖给一家用来生产定时器的瑞士公司。这家以苏黎世为基地的迈斯特尔—博利埃尔公司通称MEBOAG，将定时器卖给一家利比亚公司—ABH，该公司在苏黎世的办公处是从MEBOAG公司租来的。利比亚军事指挥部和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同MEBOAG保持了密切的业务关系。1985年MEBOAG将20件数控电子定时器样品MST-13型卖给利比亚政府一位高级官员伊兹尔·J·欣希里。这次交易是反恐怖主义中心发现的关于至今仍然神秘的电路片的第一个可靠的线索。

然而，这种炸弹的奥秘最终不是中央情报局的反恐怖专家，而是由苏格兰警方一位年轻法庭专家揭开的，这位专家基于直党的想法，要求看看1988年在西非没收的许多近似的定时器的特征。

泛美航空公司空难发生前10个月，两名利比亚情报官员在达喀尔走下非洲航空公司班机时，被塞内加尔当局拘留。这两名利比亚人后来被确认为穆罕默德·纳伊迪（化名穆罕默德·马丁祖克）和“曼苏尔·奥姆兰·萨贝”（其真实姓名仍然未知），被怀疑卷入恐怖主义活动。中央情报局一位官员将这两人的名字同兰利编的所谓恐怖主义分子“监视名单”进行核对，认出了他们；他向塞内加尔人告密后，他们就被捕了。1986年以来，中央情报局一直在追踪这两个人，当时情报局揭露了一个利比亚支持的要在西非国家多哥炸毁美国驻洛美大使馆的阴谋；在这次未遂行动中被没收的以塞姆泰克斯牌339炸药为基础的炸药，是利比亚驻贝宁情报人员提供的；贝宁同卡扎菲关系密切。

在达喀尔逮捕利比亚人，最初等于一个次要的事件，在美国和利比亚之间不断进行的未经宣布的战争中，是一种小部队的行动。在此以前的5年多的时间里，中央情报局作出更多的努力，收集关于卡扎菲在次撒哈拉穆斯林国家的情报策略的情报，而且小量地、但是有意义地渗入了利比亚的一些情报组织。西非被看作利比亚恐怖组织大有可为的地方，在大西洋东岸的一些国家，机场的安全工作马马虎虎，美国只是最近才开始训练反恐怖主义的单位。

塞内加尔官员检查利比亚人的提包时，发现了实质上是恐怖主义帮凶的丰富源泉：一支手枪和消音器、25发子弹、19磅塞姆泰克斯型的炸药，而且最为重要的是10个炸弹电子计时器。纳伊迪和“萨贝”被塞内加尔人拘留和审问，但是4个月后，他们出乎意外地被释放了。他们立即去了的黎波里。国务院表示愤怒说：“我们对塞内加尔的行动极为失望，此事提出了关于该国对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斗争的承诺问题。”

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们后来得出的结论是：释放这两名利比亚人，是塞内加尔和利比亚达成包括恢复外交关系在内的秘密协议的结果（外交关系是8年前断绝的）。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前官员补充说，这次交易涉及收买现在在普罗旺斯过着高尚生活的一位塞内加尔官员。“我们有这位受贿官员在法

国的照片”，这位前官员挖苦地说。“我们知道他是谁，他是怎样拿到钱的，确实发生了什么事情。”

幸运的是，达喀尔的一位法国法官得到塞内加尔警官们的允许，在这两名利比亚人被释放以前，将他们手提箱内的东西拍了照片。在达喀尔机场没收的塞姆泰克斯牌炸药和定时装置的黑白照片，由这位法官交给法国情报组织（真实的炸药后来同定时装置一起，神秘地不见了。反恐怖中心一位前官员推测，所有这些证据最终可能回到了利比亚）。法国官员们后来又“非常秘密地”将这些照片给了表示感谢的美国人。中央情报局驻达喀尔的官员还偷拍了纳伊迪和“萨贝”在达喀尔狱中的照片，以及他们被送上飞往的黎波里的航班时的照片。这些照片都放进反恐怖中心关于利比亚在非洲活动的日益增多的档案里。

这两名利比亚人被释放 28 个月以后，这些法国人拍摄的利比亚人的塞姆泰克斯牌炸药和定时装置的照片，就被送到洛克比一位年轻的苏格兰法庭学专家的桌子上。调查人员将达喀尔的照片和从瑞士公司搞到的真正定时装置，以及根据在洛克比附近发现的集成电路片重做的定时器进行比较。

彼此完全契合。

法国人很快提供了这次爆炸事件中涉及利比亚的一件最后的和实质性的证据。1989 年 9 月 19 日—纳伊迪和“苏贝”释放一年后和泛美航空公司 103 航班被炸毁 10 个月后，联合航空运输公司 772 航班飞离乍得首都恩贾梅纳后，被一枚炸弹炸毁。和泛美 103 航班的情况一样，爆炸的破坏力将这架 DC—10 客机的碎片撒在几百平方英里的地区里。这架班机最初从刚果布拉柴维尔起飞，是在经恩贾梅纳飞往巴黎的途中，原计划在马赛作中途停留。它是在进入大约 400 英里的航程在尼日尔南部荒无人烟的泰内雷沙漠上空炸毁的。机上 171 名乘客全部丧生。

法国和美国的调查人员，用了 3 天时间才抵达爆炸现场，（美国派遣调查组去现场，因为这架客机是道格拉斯公司制造的。）航空安全专家们检查了烧黑的残骸后，几乎是立即得出的结论是：阴谋破坏造成了这次空难。几天以后，当局宣布，联合航空运输公司 772 航班是被恐怖主义分子用“洛克比式爆炸方法”炸毁的。法国调查人员说，他们从飞机的一个货舱里取出的物质上发现了塞姆泰克斯牌炸药的痕迹。法国官员们，像以前的美国那样，将这次事件最初归咎于伊朗；他们透露：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恐怖主义集团曾经警告说，法国是恐怖主义分子攻击的目标，因为它没有实现在 1988 年释放人质谈判中所作的诺言。然而，正如泛美公司 103 航班案件的情况那样：法国官员们在收集了关于利比亚对这次袭击应负责任的惊人新情报以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将利比亚同联合航空运输公司和泛美航空公司的爆炸事件联系起来的证据，是 1990 年 3 月搞到的，当时法国当局在巴黎逮捕一名走私海洛因的刚果人，并且审问他同西非毒品走私网的关系。为了换取宽大的判决，这个毒品贩子向法国提供了炸毁联合航空运输公司 772 航班的线索。他揭露，炸毁联合航空运输公司班机，是在布拉柴维尔代表利比亚人民局的刚果反对派领袖们的一个受过特殊训练的小组织干的。这个告密者说，刚果的持不同政见者同秘密组织“马塔巴网络”接触后，在利比亚接受训练；“马塔巴网络”是利比亚外交副部长穆萨·库萨为罗致同情的非洲人而建立的一个组织。

这个告密者提出另外两名马塔巴在刚果的特务，他们都是恐怖主义集团

的成员；一个名叫伯纳德·杨加，后来关在布拉柴维尔的监狱里，另一个叫恩加让·里纳，关在扎伊尔金沙萨。法国官员审问杨加时，他口头提供了关于利比亚特务网络的许多详细情况，然后又提到恩加里纳有更可靠的情报。恩加里纳告诉法国人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他说，1988年9月，他在的黎波里参加一个会议，会上利比亚高级官员们制订一项炸毁一架美国客机和一架法国客机的计划；泛美航空公司的103航班和联合航空运输公司的772航班，就是指定的目标。恩加里纳提出穆萨·库萨和卡扎菲的妹夫、利比亚情报组织头子阿卜杜拉·塞努西；是这次会议的关键人物和这两次恐怖主义进攻的指挥。按照美国官员的说法，利比亚人雇用的第三名刚果特务阿波洛奈列·马贾塔尼，把炸弹带到联合航空运输公司的班机上，但是在爆炸以前，他在恩贾梅纳下了飞机。

法国和美国的情报官员后来估计，利比亚人把联合航空运输公司的班机当作目标，是错误地认为，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利比亚全国拯救阵线的态度明确的领袖穆罕默德·穆加里埃弗在这趟航班上。穆加里埃弗是利比亚的前审计总长，是卡扎菲打击对象名单上的主要人物。

到1990年秋天，来自兰利和洛克比的调查人员已经解决了围绕炸毁泛美公司103航班的多数更加令人困惑的问题。他们认为，班机是作为利比亚高级情报官员和卡扎菲政府的一些领导人物的一个阴谋的一部分而被炸毁的。炸弹本身藏在一个东芝牌收音机里，是用和1988年塞内加尔当局没收的相同类型的定时器引爆的。针对利比亚的证据，压倒一切，中央情报局调查人员在瑞士的定时器采购单上，发现纳伊迪的名字。这一证据很快就得到中央情报局搞到的惊人的新情报的支持——纳伊迪网络的一个成员在马耳他买过在洛克比现场散落的碎片中发现的那种衣服。唯一仍需回答的问题是，炸弹是怎样带上飞机的。中央情报局知道，是谁策划了这次进攻，但是还不知道是谁执行的。

调查泛美公司航班被炸事件，揭露了中央情报局处理的最复杂、最有迷惑力的恐怖主义的故事。要解开那些标志着追踪此案证据过程中几乎是难以相信的巧合事件，也许要用许多年的时间。例如，在利比亚特务在马耳他购买衣服的同时，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部的成员也在那里购买衣服。中央情报局难以对这种巧合作出解释，但是有些人推测，利比亚情报特务了解贾布里已经筹划的恐怖主义壮举，因此采取嫁祸于该组织的行动。其他一些人推测说，在这些爆炸事件中，利比亚人和贾布里通力合作。他们指出一些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在塞努西、穆萨和玛塔巴网络为最后完成各自计划的检验而会晤的前三天，卡扎菲和贾布里于9月3日会面。另一个巧合事件曾有一个高潮，它涉及将泛美公司航班爆炸同以迅格达为基地的中东恐怖主义领袖阿布·易卜拉欣联系一起的证据，易卜拉欣的主要门徒穆罕默德·拉希德，仍关在雅典的监狱里。1989年，法国调查人员在特内雷沙漠发现的提箱中的残余物，后来被证实为八十年代中期利比亚人从易卜拉欣处购买的五件这类装置之一，当时此人行动自由，没有受到限制。这种典型的拉希德式的装置，非常简单，就是把塞姆泰克斯牌炸药藏在衣箱的衬里内。但是由于没有一点关于卡扎菲和易卜拉欣合作的证据。恐怖中心的官员们和反恐专家们都认为，这种联系难以相信。

就在洛克比空难发生后的几天，反恐中心的官员们的确估计，易卜拉欣无论如何同泛美公司航班爆炸有牵连，或者至少说，拉希德留下的恐怖网

能够放置炸药。到 1989 年 1 月，中央情报局编制一份可能有实现这种进攻手段和动机的嫌疑分子名单。名单包括易卡拉欣和同他有联系的恐怖主义分子，但是在反恐怖中心得出最过硬的证据指向贾市里的结论后，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的价值打了折扣。

1990 年秋天，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员将洛克比附近发现的小铜片同在达喀尔没收的定时装置对比以后的 18 个月，反恐怖中心的官员们审查了最初的嫌疑分子名单。这次筛选了少数对象，他们都和利比亚人有已知的联系。

这些筛选的对象之一，是利比亚的一名前外交官穆夫塔赫·阿卜杜勒瓦尼斯·阿卜巴尔，他也是一个出名的利比亚特工，并且同国际武器走私分子有联系。对于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来说，问题在于阿卜巴尔是由情报局控制的一个利比亚反对派罗致的。

这是一个奇妙的故事。穆夫塔赫·阿卜杜勒瓦尼斯·阿卜巴尔 1947 年 3 月 30 日出生于利比亚一个重要家族。不过，他后来的成功并非完全依靠他的家庭关系，因为在各个方面来看，他有才，苦干，英俊，高个子，善于处世，有创造性。1967 年，他支持卡扎菲反对伊德里斯国王的政变，很快成了新政府里一名重要人物。他是利比亚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开头的职业是一名陆军军官，但是在七十年代中期他辞了职，进入利比亚外交界，被派到马德里和日内瓦任职，他在这两个地方也许还是一名情报官员。阿卜巴尔成功地使自己的外交和情报职业变成一笔小小的财富。七十年代中期，他成了商人，在欧洲、加拿大和美国的门类繁多的企业中，投资几百万美元。到 1980 年，他已定居加拿大；这位有说服力、有绅士派头而且文雅的利比亚人，后来同温哥华的一位特别漂亮的名叫希瑟·古多尔的模特儿结了婚。

阿卜巴尔离开政府部门以后，显然从未断绝同卡扎菲的关系，尽管他后来宣称不是这样。相反，证据显示，为了执行特殊情报任务，他被故意调到利比亚的外交部门。在他成为商人以后，甚至还保留了这种关系。到 1985 年，在国际武器商人企图在卡扎菲和苏联之间达成一项秘密交易时，他在德国和日内瓦名噪一时。“我们都知道阿卜巴尔打算做什么”，一位武器商人回忆说。“他在德国期间，潜心于通过各种正面的公司将苏联的地对空导弹系统运到的黎波里。我在曼努切尔·戈尔巴尔法尔公司看见过他。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是好朋友。但是我认为穆夫塔赫是个真正可恶的家伙，所以我没有真正同他接近。”

阿卜巴尔也受到美国情报官员们的注意，当他开始被加拿大接纳时，他们从八十年代初对他进行跟踪。后来，在伊朗门事件在 1986 年公开以后，按照一位前情报官员的说法，联邦调查局派出一个调查组在好几个场合就一些仍然保密的项目向他提问。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也就他在加拿大的企业交易情况对他进行了审问。这些交易包括同厄尼·米勒、唐纳德·福蒂埃、阿德南·哈肖吉等人的联合，所有这些人在一个时期或另一个时期，都同伊朗门事件的某些方面有牵连。在另一方面，阿卜巴尔是富有的，他在多伦多买了座庭院式公寓，有三辆罗斯—罗伊斯牌轿车，并且在瑞士信贷银行有存款。美国驻多伦多大使馆的一份机密报告，对于有关他的活动的种种疑问作出判断。报告说：“毫无疑问，阿卜巴尔可能是为利比亚政府进行某种武器交易。”他的财富的数量产生这样的可能：完全是利比亚政府的资金被阿卜巴尔用作同西方企业界进行交易的‘幌子’。”

阿卜巴尔的难以捉摸的企业交易，使他同一大批大小企业建立了联系。

在一些公司里，他成了一名主要官员，而且同一些进行可疑的国际交易的银行家相处友好。在 1982 年，这些银行之一的泛美国家银行的一位官员，为了一笔能弥补该行亏损的 50 万美元的贷款，据说同他进行过接洽。阿卜巴尔同意给该银行这笔贷款，除非他能利用泛美国家银行的关系得到一份美国护照——后来他用过的一些伪造的美国文件，几个月前被美国驻加拿大的官员没收了。协议是在波多黎各护照处通过同银行的接触达成的。1982 年末，阿卜巴尔伪装为斯帕赖提克公司工作的商人而得到护照，该公司是设在新泽西州的一家国防工程承包商。1983 年，泛美银行破产。

这个护照方案注定失败。不仅是美国法律的实施和情报官员对阿卜巴尔活动的追踪，而且联邦调查人员还对他付给泛美银行的贷款追根究底。1986 年，阿卜巴尔被指控为骗取美国护照。波多黎各的一位法官，接着发出了对他的逮捕令。

有理由相信，早在波多黎各的起诉尚未确定以前，中央情报局就把阿卜巴尔当作罗致的目标。情报局非常了解他同弗雷泽、米勒、哈肖吉的联系，以及假如他进入美国很容易被捕的情况。一个调查报告指出，国务院要求帮助阿卜巴尔解决他的问题作为使他进入美国的一种方法。1988 年 10 月 4 日，他开始从蒙特利尔去纽约的私人旅行，当他在拉瓜迪亚机场下飞机时，美国官员们在等候迎接他。

阿卜巴尔被美国海关官员逮捕，指控他有一份骗来的护照，命令他到波多黎各法庭接受审讯。然而在纽约，他的律师要求付 50 万美元保证金将他释放。他被允许迁往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开始住在一座宏大的饭店里。不到一个月，他要求允许他去华盛顿郊区的斯普林菲尔德（弗吉尼亚州）旅行。

1988 年 11 月末，阿卜巴尔到了弗吉尼亚。情报官员说，他在那里会见利比亚全国拯救阵线北美首领阿里·阿布扎阿库克；这个组织是穆罕默德·穆加里埃领导的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外国集团，其军事组织当时是在乍得内部从事反对卡扎菲的秘密战争。根据情报人士的消息，阿卜巴尔告诉阿布扎阿库克说，他同美国当局有些纠纷，他要为利比亚全国拯救阵线作些贡献。阿布扎阿库克带领阿卜巴尔会见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们试图说服他们工作。这次会见的结果从未正式透露，但是阿卜巴尔后来的行动提供了发生什么事情的线索。

阿卜巴尔访问弗吉尼亚后，回到波多黎各，承认指控他骗取护照的罪行。他还向法庭提供大量口供。他声称，他已脱离利比亚革命，讨厌卡扎菲，而且要把美国当作自己的家。他把自己描写为一名简单的商人，要求给他机会证明他会是一名好公民。这次答辩之后，受理此案的法官由于原告显然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提供针对阿卜巴尔的情况而大为吃惊。法官没有办法，只能对阿卜巴尔从轻判决：一千美元罚金和缓刑一年。他并未被驱逐出境，对于所有被指控犯有重罪的人们来说，这次判决是最轻的。不论出于什么原因，美国政府对起诉阿卜巴尔简直是不感兴趣。

阿卜巴尔交付保证金获释后，又向法庭提出请求，这次是要求批准他去英国旅行。他的申请获准，这位利比亚人在 12 月的第二个星期的某个时候离开了迈阿密。

他立即无影无踪。

一星期后，12 月 21 日那天，泛美航空公司 103 航班从空中坠毁。

在洛克比爆炸案中，阿卜巴尔是最初的嫌疑犯之一。他的名字出现在把

他和穆罕默德·拉希德的欧洲网络连在一起的两份情报文件上；一位反恐怖主义专家说，他是“一名拉希德的副手”。阿卜巴尔的情况同情报局对于它所寻找的爆炸者的描述很相称：他是一个知名的武器交易商，很了解卡扎菲内部圈子的情况，并且仍然被怀疑为忠于卡扎菲的分子。

尽管中央情报局愿意相信阿卜巴尔最后而且绝对地撤回了对卡扎菲的忠诚的故事，其他情报组织并非如此。英国情报局特别怀疑他，该局的反恐怖官员，由于中央情报局决定利用他作特工而感到愤怒。所以，他于12月到达伦敦时，就受到严密的监视。一项未经证实的谣传声称，他曾被愤怒的英国情报处官员暂时拘留在希思罗机场，并且询问了他在伦敦停留的计划。此后发生的事情就不知道了，因为阿卜巴尔能够摆脱英国人的监视。

英国官员有充分理由对中央情报局要允许阿卜巴尔不受干扰地来到英国的请求表示憎恶。他们知道他是利比亚人民局驻伦敦的一个前外交官，和一名臭名昭著的武器交易商，他常常把马耳他作为他经常去的黎波里的中转点。在英国人当中，几乎没有人怀疑他利用美国人以逃脱能将他长期监禁的严重犯罪指控。拒绝告发他，被看作在一个短期间题上收集情报的可鄙的方法（英国人认为，罗致阿卜巴尔是为了得到拉巴特工厂的内部情况）。这种事不值得下这样的赌注：英国人深信，阿卜巴尔是卡扎菲雇用的人。

英国人非常坚定地抱着这种信念，以致英国情报官员在泛美公司航班爆炸后，非常愿意散布后来证明不实的关于阿卜巴尔行动的那些谣言。例如，英国情报人士的消息说，在这次爆炸以前，阿卜巴尔和他的加拿大妻子曾去马耳他旅行，有人看到他们在玛丽商店购买衣服——从反恐怖中心的官员后来揭露的证据来看，这种说法似乎是可疑的。“英国人发明了这场游戏，而且要永远玩下去”，一位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说。换句话说，假如英国人关于阿卜巴尔的说法是真的，那么美国的主要情报机关会同自己国家的航班爆炸有牵连。毫不奇怪，反恐怖中心并未找到这些英国谣言所暗示的爆炸者。美国人毕竟是永远不要找到他；这会是非常令人难堪的事情。

英国情报官员还断言，阿卜巴尔和他的妻子，就是英国度假者克里斯廷·米德尔顿和杰弗里·米德尔顿在马耳他斯利马发现的那对夫妇，他们将当地饭店出现的一个神秘事件告诉了调查人员。按照米德尔顿的说法，一对和阿卜巴尔及其妻子的基本容貌、特征相似的夫妇，走进露天咖啡馆，恳请计划离开该岛的顾客将一个手提箱带回伦敦。这对夫妇声称，箱子里装的是给孩子们玩具。一个朋友被认为是替他们携带了这个手提箱，但是他离开马耳他时并没有把它带走。这对夫妇向三个有可能携带手提箱的旅行者提出过请求，但是他们都拒绝了。洛克比调查人员后来对米德尔顿所说的故事情节跟踪了解，但是从未给以足够的重视。虽然说这个插曲能够证明阿卜巴尔及其妻子同爆炸有牵连的说法似乎是可能的，但是只是核对一下日期，就会对其确实性产生怀疑。反恐怖中心断定，在那个可疑的具体的一天，阿卜巴尔不在马耳他，所以他简直不可能是米德尔顿夫妇认出的那个人。

然而反恐怖中心的官员们仍然怀疑阿卜巴尔，因为他们不能确定他在12月9日到达伦敦后一直到12月21日这些天他在何处。他也是反恐怖中心的目标，因为他的兄弟是利比亚阿拉伯航空公司由黎波里飞往马耳他的航班驾驶员，并且被怀疑是个特工。1990年11月，在计算机集成电路片被发现和认定利比亚是这爆炸的一个可能的嫌疑犯之后，反恐怖中心的官员们带着几件最近的证据和关于阿卜巴尔身体特征的详细说明，访问了马耳他的托

尼·戈西。戈西认定他就是 1988 年 12 月在他的商店里买衣服的那个人。但是根据消息灵通的情报官员的说法，这种确认只是暂时的，它只是根据口头的描述，不是根据实际的照片。第二次访问时，情报官员交给戈西一张由联合的情报机关提供的阿卜巴尔的照片。戈西再次认为，中央情报局已经找到了在他商店买衣服的那个人，不过他仍然坚持说，他不是绝对地肯定。他说他需要看更多的东西。情报官员们说，最后戈西拒绝提供调查人员需要的确信无疑的看法。他说，阿卜巴尔比买衣服的那个人高得多。他简直不是那个人。

戈西终于认出另一个利比亚人阿卜德勒·巴西特是买衣服的那个人，这种衣服是在洛克比未经认出的提包里发现的。苏格兰的、英国的和美国的调查人员，把巴西特同利比亚航空公司的一名雇员拉门，弗希马赫联系起来。1988 年 12 月 7 日，巴西特和弗希马赫从的黎波里乘飞机到达马耳他。巴西特然后飞往苏黎世。后来他们俩人都回到利比亚。两星期后，他们于 12 月 20 日又飞回马耳他，弗希马赫在该地将藏有炸弹、系有偷来的航空公司标签的棕色手提箱，装上马耳他航空公司飞往法兰克福的 KM—180 航班。

穆夫塔赫·阿卜杜勒瓦尼斯·阿卜巴尔，目前住在伦敦附近一度属于通俗歌星托姆·琼斯的一座富丽堂皇的房子里，过着奢华的安静生活。他告诉记者们，说他同炸毁波音 747 客机有联系的种种说法，都是“荒谬可笑的”。兰利的官员们拒绝谈论有关泛美公司 103 航班事件的调查记录，而且认为一切问题都起源于协调反恐中心调查工作的联邦调查局华盛顿现场调查办公室。偶然泄露给新闻界有关这次调查的一些情况，为中央情报局可能掩盖在泛美公司悲剧中某些难以解释的作用的猜测火上加油。同中央情报局合作、向它提供关于阿卜巴尔情报的外国情报官员们，依然相信该局罗致的这个利比亚人用仍然未知的某些方法帮助策划了这一悲剧。尽管迷雾笼罩了这一事件以及国际上对其动机的猜测，利比亚应对杀害 270 人负责，是毫无疑问的。

在法国，一位地方法官指控 4 名利比亚人，包括穆罕默德·纳伊迪在内，卷入炸毁联合航空运输公司 772 航班事件。这位法官还决定是否对那些证据明确指出，可能对策划炸毁泛美公司 103 航班的罪行负责的利比亚人提出控告，他们包括纳伊迪、阿卜德勒·巴西特、拉门·弗希马赫、塞努西，也许还有穆萨·库萨。人们没有料到，卡扎菲的名字将被写在任何一份起诉书中。阿卜巴尔是否作为庞大的阴谋分子网络的一部分将受牵连，也还没有作出决定。唯一肯定无疑的事情，就像泛美航空公司和它的主要调查人员宣称的那样，在英美航空史上这一极为恶劣的罪行，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也不是涉及中央情报局—德意志石油公司精心设计圈套的一个奇特阴谋的一部分。

到 1990 年初秋，炸毁泛美公司 103 航班的秘密终于揭开了。正如萨勒曼·拉什迪所说那样，它就像“一个没有胚芽的种子荚，一个产生神秘的鸡蛋。”正如国际上对利比亚的谴责不断增加那样，调查人员在悲剧的日子里得出的初步结论，仍然是最令人信服的。杀害 270 名男、女、儿童，是一种穷凶极恶的复仇行为。

从1990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的好几个月里,中央情报局愈来愈忧虑地注视着萨达姆·侯赛因。这位伊拉克统治者似乎坚决要在某地制造一场激烈的冲突,或是帮助黎巴嫩基督教派领袖米歇尔·奥恩打叙利亚人,或是把他自己的军刀挥向伊朗。中东正酝酿着一场严重危机的第一个公开暗示,出现在1990年4月1日,就在侯赛因(即萨达姆·侯赛因,原书略称,下同。——译注)对一群伊拉克军官所作的演说中。他身穿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卡叽布战斗制服,兴高采烈地夸耀伊拉克的化学武器的能力,并痛斥以色列为未来战争中最可能的侵略者。他的补白新闻式的浮夸言辞并不鲜见,他自命为一位伊拉克的纳赛尔,是在中东地区能使阿拉伯人回到崇高地位的唯一领袖。

他的演讲比他过去说过的一切言辞都走得更远,他宣称:“真主作证,如果以色列人试图以任何方式反对我们,我们将保证让他们的半个国家毁于大火,……无论谁用原子弹威胁我们,都将被化学武器彻底消灭。”这篇演讲立刻在中东引起了反响,它拨动了广大阿拉伯人的心弦。对他们来说,侯赛因看来正是阿拉伯世界正在寻找的领袖;一个能够同美国、以色列相抗衡的人。

布什总统对侯赛因的恫吓反应强烈,他对新闻界说:“我认为这些言论很坏,我强烈要求伊拉克立即放弃使用化学武器。”

国务卿贝克也被侯赛因的演讲深深地扰乱了,以致他相信美国应该采取步骤处罚伊拉克。在一次与助理国务卿约翰·凯利的会见中,贝克考虑了一项较广泛的制裁,它将标志出美国的不愉快,其中包括暂时停止从进出口银行提供资金。这个计划得到了贝克内部圈子里的顾问们的赞同,他们是:凯利、国务院政策规划部门的负责人丹尼斯·罗斯和管理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罗伯特·金米特。

但是,国务院的计划走得太远。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他的副手罗伯特·盖茨认为贝克的反应可能会产生反效果,把美国推到同伊拉克之间的不必要的对抗中去。他们推理说,侯赛因可能被经济制裁所激怒,可能会把美国的行动看作是一个反对他的阴谋的证据。斯考克罗夫特和盖茨相信,经过一番与西方合作的真诚的努力,那位伊拉克强人能够被说服,使他的意见缓和下来;他们指出,他们的看法是与美国的总体政策相一致的。总统同意并批准了这个慢慢走的方案。布什、斯考克罗夫特、盖茨确信伊拉克没有资金去挑起一次重大的区域性冲突,更不用说打仗了。他们认为,制裁不大可能让侯赛因降低调门,历史表明经济压力也很少起作用。布什政策的首要基础是要保持同伊拉克的正常关系,从而保证波斯湾地区的稳定。

这种有节制的反应在4月份布什送给巴格达的一封字斟句酌的信中被强调了一下,这封信是由5位有影响的美国参议员念给侯赛因听的,5位参议员中包括共和党要人罗伯特·多尔和阿兰·辛普森。侯赛因穿了一身做工考究的灰色西服在伊拉克城市摩苏尔热诚地会见了美国代表团,并且很专心地听他们要说些什么。

布什的信批评了侯赛因对以色列的恫吓,劝告他在这个地区为和平而行事:“……你的用化学和生物武器来武装自己的愿望,远远不能加强你们国家的安全,反而使它面临严重的危险。”信中还说:“在你最近的讲话中,

你威胁说要使用化学武器来对付以色列，这已经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如果你重新考虑这样危险的规划和这样刺激性的言论与行动，那么，对于你，对于中东的和平，都会是一件好事。”

侯赛因不为这种呼吁所动。他谴责美国的中东政策，指责美国掀起了一场反对他的宣传活动。5位参议员一致表达了他们的不同意。

多尔说：“请让我向你指出，12个小时以前布什总统告诉我，他和他的政府希望改善同伊拉克的关系，我甚至可以向你保证，布什总统将反对制裁。他甚至可以否决任何这种决议，除非会出现某种挑衅性行动。”多尔的态度是平淡无味的，但他的言辞尖锐而有份量；显然，他是代表布什总统说话的。侯赛因点点头，表面上看来对回答是满意的。

陪同代表团的大使阿普丽尔·格拉斯派支持多尔的陈述：“总统先生，作为美国大使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确实是美国政府的政策。”

当多尔离开伊拉克的时候，他深信侯赛因是某个美国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一个强硬的人，但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这种新的和解的基调上，布什于伊斯兰教斋月的最后一天打了个电报给侯赛因，说他希望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的纽带更加牢靠。

关于伊拉克恫吓的安慰性语言，在华盛顿的其他地方也可以听到。助理国务卿凯利告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政府反对制裁伊拉克。他对委员会说：“本行政当局继续反对强加制裁，这种制裁将会使美国的出口商受到处罚，并且会使我们的国际收支赤字变的更糟。”他还说：“而且，我看不出制裁如何能够增加我们对伊拉克的行动施加起缓和作用的影响的可能性。”最后这句话和凯利本月早些时候同贝克长时间的会晤中所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参议院委员会的许多成员非常不同意凯利的陈述，这时由于侯赛因恫吓以色列所引起的愤怒开始平息，于是加以制裁的行动也就冷下去了。

当白宫和国务院经过仔细斟酌制定出他们关于伊拉克的温和路线的时候，中央情报局正在继续收集关于侯赛因的战争机器的令人发冷的情报。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断定：要说稍有区别的话，情报的报告表明伊拉克加快了它获得尖端的危险的新军事技术的企图。例如，3月中旬，紧跟在巴佐夫特被绞死事件之后，英国的海关情报员——他们在伦敦有一套复杂的有力的行动计划——逮捕了两名伊拉克人，扣押了一只船上装载的美国制造的高速电子电容器，那是用来引爆原子弹的雷管的。3月底，以侦察卫星的照片为基础的美国秘密情报报告披露伊拉克已经建造了发射装置，可以向特拉维夫、大马士革、利雅得发射导弹。4月中旬，英国当局扣押了船载的八根钢筒，他们说这些钢筒可以用来造130英尺大炮的炮管或造超级大炮。

中央情报局还开列了一张美国企业的名单，据信这些企业都是与把美国制造技术合法或非法转让给中东有牵连的。情报局的国家情报收集处加班加点地工作，给它已有的关于伊拉克军事工程的广泛详尽的档案增添新材料。国家情报收集处提供的最后名单中包括这样一些企业：它们把什么东西都运往巴格达，从高速电子计算机到微波通讯（或“转播”）系统，全部附有应用于军事方面的说明。在许多事例中，这些货物的转让都有商业部签发的经过白宫批准的出口许可证。中央情报局还监视了数次伊拉克的最新导弹试验，包括据说在毛里塔尼亚一个试验场发射的那一次，毛里塔尼亚和侯赛因的政府关系密切。送呈布什总统的关于这次试验发射的情报报告，是根据在这个西非国家上空拍摄的卫星图象而来的。

中央情报局发布的关于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可能图谋的第一次警告是在1990年5月初。警告是根据若干中东消息来源提供的第一手报告而发出的。然而，这项情报在白宫受到了怀疑，因为政府官员们认为那些迹象不足信，侯赛因曾经恫吓过以色列，而不是科威特。虽然如此，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仍然是一场中东战争可能正在酝酿的信号，报告的作者们指出，侯赛因已经向他的两个南方邻国——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发出了明白无误的恫吓，指控它们参加了一个“美国煽起的”限制伊拉克石油岁入的阴谋。由伊拉克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递交给阿拉伯联盟的一封信支持这种断言，信中控指科威特盗窃伊拉克的石油、在伊拉克领土上建造军事设施、与一项“帝国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合作压低世界石油价格。

一个星期以后，在巴格达会见格拉斯派大使时，侯赛因谴责美国在进行一场经济战争。他还说：“海湾国家的压低石油价格的政策正在损害着伊拉克的生存。”

按照布什总统和国务卿贝克的明确指示发言，格拉斯派对侯赛因的问题表示同情，她回答：“我敬佩你为重建你的国家所付出的不寻常的努力，我知道你需要资金。我不仅要讲布什总统想和伊拉克建立更好更深的关系，而且他还希望伊拉克对中东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然后，格拉斯派再次向她的东道主保证，美国将不会参予任何阿拉伯之间的纠纷，后来国务院女发言人玛格丽特·塔特怀勒又一次公开地强调了这一点。

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对于所有这一切活动的意见不一。一方面他们知道侯赛因一直忙于在几个问题上与科威特领导人进行愈来愈尖锐的争论：石油价格；波斯湾的一个港口；减免所欠科威特政府的债务。另一方面他们知道，对侯赛因来说，侵略科威特就等于自杀。在与伊朗交战8年之后，伊拉克供给不起在中东任何地方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攻击：这个国家的债务已将近400亿美元，它的精锐部队已经被粉碎，它的全体居民直到现在才刚刚开始步入一个有意义的经济复苏阶段。尽管这样，几乎所有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都同意，侯赛因的大造舆论和集结需要非常密切的监视监听。

因此，在5月和6月美国情报界把它大量的技术工艺方面的物力转移到以伊拉克为目标。到7月份，中央情报局的卫星网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接壤处上空的轨道上部署的侦察装置，比它以往曾经集中在任何一个单独目标上的装置还要多。总共，中央情报局可以接近在一条可调整的极轨上的四颗KH-11卫星；还有一颗军事测距系统图像雷达卫星，那是1988年由航天飞机发射的。情报局的图像实验室加班加点地工作，处理接收到的有关伊拉克集结的信息。到了7月中旬，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已是深信不疑；萨达姆·侯赛因正在进行的针对科威特的计划远远超过了单纯炫耀武力。

情报局关于伊拉克可能侵略的最重要的警告之一，是于7月17日送呈白宫的。情报局报告：美国的侦察卫星已经拍摄到了3万多伊拉克士兵向南移动朝着科威特北部边界前进的照片。在下一个星期内，关于这次军事集结的更多的证据继续涌现。最后，7月27日——就是格拉斯派在巴格达同侯赛因私下会谈的同一天——五角大楼的中央司令部秘密请求在波斯湾显示一下美国的武力，作为一个警告，说明如果入侵科威特，美国是会有所反应的。像他们的中央情报局同行一样，国防情报局的官员们被他们从卫星侦察照片上所看到的東西震惊了。但是，白宫和国务院否决了五角大楼的请求；美国对巴格达政权将继续采取它的温和态度。

否决并不意味着中央情报局停止观察伊拉克南部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央情报局的图像专家们继续夜以继日地工作以跟踪伊拉克部队的行动。例如，他们注意到伊拉克重新启动了一套关键性的雷达设备，这套设备自两伊战争结束后一直没有动用过——侯赛因正在计划入侵科威特的一个重要信号。

然而，侯赛因决心进行侵略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从航空照片中得到的，这些照片是7月27日夜晚大约在天亮前3个小时在中东上空拍摄的。应用一套放大星光的红外线系统，一个KH—11卫星显示出伊拉克卡车装运弹药、燃料、水给驻扎在科威特北部边界的部队。这些照片意味着伊拉克将很快行动，几乎可以肯定就在最近几天，而且，它的进攻决不仅是一次边界“袭击”，因为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释伊拉克武装部队的过份长的后勤“尾巴”。根据一份公开发表的报告，威廉·韦伯斯特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都认为这个证据在他们曾经看过的证据中最可靠最有说服力。他们相信，现在“或许”伊拉克将要侵略科威特了。进攻迫在眉睫。

7月28日上午，一小队表情严肃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抵达白宫，向总统作一次关键性的清晨汇报。这一群人包括中央情报局局长韦伯斯特，行动部主任、中央情报局的首席近东专家斯托尔茨和两位卫星图像分析家。最后一分钟又赶来一位，就是兰利牛虻式的、主管警告信息的国家情报官查利·艾伦。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带来了从撒向远方的美国技术情报网搜集来的十分敏感的数据记录，以及一份情报报告和评估的档案。前一天夜里KH—11卫星拍摄到的照片装在一只厚马尼拉纸做的信封里。他们提供了韦伯斯特将面呈总统的主要证据。中央情报局还为布什准备了一份来自兰利的政治心理处的报告，该处是负责对侯赛因的态度和意图进行评估的。

韦伯斯特即将放在布什桌上的信息是详尽无遗的，但是它缺少一个重要的成分——这群人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肯定他说侯赛因究竟会不会侵入科威特或者进攻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自己就有分歧。那些认为伊拉克领导人决心发动一场全面进攻的人，其根据是他们确信他没有理性；而那些曾一度声称一场伊拉克入侵等于自杀的人现在则认为，侯赛因只是计划对科威特油田进行一次惩罚性的袭击，也许把这作为日后谈判桌上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来使用。但是，没有一个人确实知道底细。关于他的意图的信息是不可能得到的。中央情报局不拥有从伊拉克高级策划会议上窃听到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在伊拉克独裁者的核心集团内部也没有提供情报的人。

布什静静地倾听中央情报局的陈述，陈述完毕以后，他说他仍然不相信一次入侵已经迫近。他指出，情报局的警告完全是根据通过技术手段而搜集到的信息作出的，尽管这个证据给人深刻的印象——有些照片非常清晰，当伊拉克坦克通过巴士拉—祖贝克公路向科威特边界移动时，他可以认出坦克侧面的标志——，他不想反应过度。他说，他已经同许多在中东的官员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使他确信侯赛因是在企图向科威特逼取让步。

向布什提供情报的人无可争辩地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在前几个星期里，他曾亲自同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和约旦国王侯赛因谈过话，企图弄清楚伊拉克究竟可能干什么。在一次谈话中，穆巴拉克使布什确信，如果萨达姆·侯赛因能通过威吓赢得让步的话，他是不会使用武力的；穆巴拉克还说，这是那位伊拉克强人自己告诉他的。据一位暗中参与了穆巴拉克—侯赛因交易的中东官员说，那位伊拉克领袖曾经答应过，在他和科威特的领导人贾比

尔·阿赫马尔·贾比尔·萨巴赫亲王于沙特阿拉伯的吉达举行会谈以前，他不会向科威特采取行动。穆巴拉克解释了这个保证，意思是说明那个伊拉克人在吓唬人，那就是他告诉布什的。侯赛因国王重复了同样的信念。

布什的思想里存在着这些信息，他对韦伯斯特说他需要更多的证据。他向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保证，在此期间他会继续监视在中东发生的事件，通过同他自己的高级的外国情报来源的电话联系。90分钟以后就散会了。

7月28日会议的直接附带结果很难识别，特别是根据后来出现的令人困惑的指责，指责中央情报局未能就萨达姆·侯赛因在科威特的真实意图向白宫报警。国会议员是兰利的主要批评者；他们指出，如果中央情报局充份地使布什警觉即将来临的灾难，他一定会采取步骤警告侯赛因，说他的行动会立即从美国引来反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则指出布什在真正的侵略发生后也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从此来为情报局辩护。他们引用那个无声的反应作为间接的证据，证明他们早些时候为了使他相信侯赛因的意图所作的真诚努力被忽视了。他们争辩说布什一贯过高估计他自己的情报才能。既然他是曾经当过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第一位总统，他相信自己像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们一样，能够对情报作出正确的判断。

对于兰利的高级官员来说，这是总统的最扰乱人心的品质。布什差不多完全依靠私人接触来获取信息。尽管他仔细地阅读正式的中央情报局的评估和重要情报的文件，他很少依靠它们作为他的对外政策决策的基础。例如，他还自夸他具有阅读中央情报局“原始”报告的能力，即使有经验的分析家们知道，这些背景文件常常能引导人误入歧途；在它们被传递到制定政策者们手里以前，它们的可靠性需要根据其他信息来加以评估。通过简化那道程序，中央情报局官员们相信，布什是以此作为他蔑视情报局专家们意见的信号。布什的外交的个人风格，他对他同国际领袖们建立起来的友谊的信赖，以及他在情报事务方面假定的专门知识，往往替代了从中央情报局老手那里接受精明而讲究实际的分析。

布什的辩护者们拒绝这个严厉的判断。中东专家格雷厄姆·富勒说：“坦白地说，我想我们应该高兴，我们终于有了一位懂得什么是情报的总统，那永远是中央情报局的最为关切的事。照我看来，布什利用中央情报局的信息利用得不错。但是他有他自己的独立的看法，坦白地说，那是他的特权，和以往历届总统所做的并没有多大区别。我们不需要一个机械般动作的人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

布什总统是否错误地估计了侯赛因的意图？富勒回答：“通过入侵科威特，萨达姆把他曾赢得的一切都扔掉了。他竟然入侵，我们感到惊讶。最后，你不能预测不高明的决定，而萨达姆关于入侵科威特的决定是他的一个极大的错误。”

前任助理国务卿理查德·墨菲也为布什辩护，他说，在7月底，总统或任何别的人都不可能预言伊拉克的入侵。墨菲说：“我们刚刚倾向于认为这是不会发生的，甚至科威特人也不认为它会发生。”

不管这些，7月28日会议以后，当情报局的官员们回到兰利他们的办公桌前时，他们被布什对他们的警告的态度所激怒了。他们相信他们已经得到的情报信息，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他们呈送给一位总统的最详尽的情报了。尽管他们知道布什可以从中挑选他相信的东西，他们对伊拉克的意图是确信无疑的。情报局过去不能绝对肯定侯赛因的军队会入侵科威特，现在它似乎

没有任何怀疑了。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回忆说，当时情报部的分析家们特别地心烦意乱，总统没有向伊拉克送出一份强硬的警告，反而选择了给侯赛因打电报再次强调改善两国关系的必要性。布什对那个伊拉克人说，他对他邻国的恫吓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却没有提到如果他的军队越过科威特边界他将得到报复。

8月1日星期三上午，韦伯斯特在白宫亲手交给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一包情报情况简介和最新的卫星照片。材料中包含关于侯赛因意图的令人吃惊的新信息；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现在说他们相信有确实的证据说明他即将发动战争。当布什看那些照片时，他看到沿着伊拉克的南部边界排列着大量的军队。总共大约有8个师，包括属于精锐的共和国卫队编制的4个师，已经为袭击科威特油田的中心以及油田那边的首都作好了战斗准备。韦伯斯特说中央情报局确信，入侵将会在最近24小时内的某个时间爆发。

在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中，包括了一份来自分析家查尔斯·艾伦的评估，他写道：情报局的警告官员们现在相信，入侵很可能是一次全面接管科威特。一位情报官员解释说：“这是当时查利能够提出的最清楚的警告。它陈述得直率而明确。我认为他很坦率。”艾伦预言，这场猛攻将会把整个酋长国的整个毁灭作为它的目标。他采用了情报局的技术信息来支持他的论断，他还重复了前几天他、韦伯斯特和其他人对布什说过的话——没有理由搞一次像针对科威特的那么大规模的军事集结，除非侯赛因是当真的。

那天上午，艾伦的报告就被送到了其他高级政策制定者手中，包括国务院的罗伯特·金米特，他被他读到的东西吓晕了，他很少看到这样一个干脆的预报。盖茨正在度假，在他缺席的情况下，金米特决定在那天下午早些时候召开副职委员会（多为专业官员。——译注）。在那次会议上，每一个与会者的思想里都装着中央情报局的评估，人们问情报部副主任理查德·克尔他的结论如何。尽管克尔没有从艾伦的预言面前后退，他承认情报局内部有不少人对伊拉克进攻的规模仍然不能确定。以他为例，他相信进攻是会发生的。

这次会议以后，布什总统和白宫的官员们讨论中央情报局的新信息。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似乎是最担心的。他说，如果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将没有多少明确的选择。布什让别人先谈他们的看法，然后再谈自己的意见，这是他的习惯。在这个事例中，他发表了一篇杂乱无章的讲话，大谈他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的接触。但是他仍然不信萨达姆·侯赛因会把他的军队开进科威特。

然而，金米特决定采取一些步骤来对付那预报的危机。甚至在副职委员会开会以前，他就把中央情报局的信息传给了远在西伯利亚的国务卿贝克。贝克正在那里和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会谈。贝克静静地听着金米特关于中央情报局警告的拐弯抹角的描述（他们是通过一条非保密的电话线交谈），然后说他会了解一下谢瓦尔德纳泽是否知道有关侯赛因计划的事。在与苏联外交部长共进午餐后，贝克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告知谢瓦尔德纳泽，据美国情报界报告，伊拉克的武装部队正密集在科威特边界，可能入侵。那位外交部长的态度不明朗。贝克说：“我们希望你们试着去遏制这些家伙。”谢瓦尔德纳泽用手一挥把这句话搁一边儿了。他辩解说，萨达姆·侯赛因是在吓唬人，就像他以前干过好几次的那样。伊拉克人无意入侵科威特。

他说，当然，苏联没有这类的信息。谢瓦尔德纳泽补充说：“我信任他。”

嗣后的几个钟点里，一种奇怪的麻痹似乎控制了华盛顿当局。甚至在国家最高层的政策制定者中间，关于可能即将在中东发生的事情，似乎也看不出多少公开的关切。乔治·布什仍然相信萨达姆·侯赛因是在吓唬人，他的军事集结是他对科威特石油资源提出新的要求的序幕，至多伊拉克在计划一次突然袭击以期在波斯湾获得一个新的石油集散地。

8月1日傍晚，许多美国高级官员都准备去度假，或在海滩上度过一个长周末。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于下午5点多钟离开白宫。对他来说，他能及时回家和家人共进晚餐，这种日子是少有的。布什总统和国防部长切尼准备第二天飞往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她是到那里去参加一个外交政策会议的。在五角大楼，这个机构第一流的国际事务专家之一保罗·沃尔福威茨正在一份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准备的重要文件上进行最后的修饰。他知道当他在阿斯彭念这份文件的时候，撒切尔夫人将会在听众之中。沃尔福威茨还不知道，他的演讲不得不延期了。

那天晚上8点半钟（在波斯湾是第二天凌晨4点）伊拉克的军队猛冲过了科威特的边界。这个小小的首长国的军队在伊拉克的坦克部队面前土崩瓦解。知道抵抗是无效的，科威特士兵全体投降了。在科威特城有一些抵抗，但在6个小时之内，首都已在伊拉克士兵的控制之下。剩下的科威特空军（它在几分钟的时间就被伊拉克的空军从天空赶得无影无踪）逃到沙特阿拉伯的基地去了。在华盛顿，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匆匆赶回他们的办公室，都被事件的突然转变震晕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是在马里兰州郊区他家里听到入侵的消息的，立即就回到白宫。他决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召开一次副职委员会，由他本人主持会议。几小时之内，委员会草拟了一份供总统次日上午宣读的声明，并且建议政府立即冻结伊拉克在美国的全部财产。布什定于次日上午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二天一早，政府的主要的对外对内政策顾问们包括中央司令部的诺曼·施瓦茨科普夫聚集在白宫内阁密室，帮助策划美国的反应。当记者们大声喊叫向布什提问题时，摄影师们快速抢拍会议的照片。布什说：“我们不讨论干预问题。”几分钟之后，门被关上了。然后布什请韦伯斯特谈一谈有关科威特形势的最新消息。这番陈述也许是韦伯斯特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以来最关键的表演。他做得不错；他的信息很详尽，他的语调是忧郁的。他说，伊拉克军队已经完全控制了科威特城，即使遇到一点小的抵抗，也很快就制服了。10万多伊拉克军队已经进入这个国家，更多的军队正源源而来。中央情报局最近的侦察照片表明，伊拉克的装甲部队处在距科威特—沙特边界的10英里之内，韦伯斯特还说，中央情报局不能预测侯赛因的下一步行动。一大批伊拉克军队正朝南进发，但是，没有办法讲他们是否会真正入侵沙特阿拉伯。

然后，别的官员发言。罗伯特·金米特谈到对入侵的外交上的反应。布什的高层国内事务顾问们讨论了制裁问题。最后，施瓦茨科普夫勾勒了美国军事选择的轮廓。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休会了，但是没有明确的美国政策拿出来。对某些与会者来说，看起来布什对如何反应似乎举棋不定。

散会以后，布什在内阁密室外面拦住了切尼，同他讨论去阿斯彭一事。切尼已经请假不去了，五角大楼需要他留下来研究美国的战备状态，并且决定什么样的军事步骤是可行的。布什也想留在华盛顿，他并不盼望会见撒切

尔。不像里根，他从来没有感到与她很接近。仅仅想一想去科罗拉多的长途飞行，现在也令人感到无法克服的气馁。布什说它好像是一件不该做的错事，特别是按照波斯湾危机的角度考虑。他问：“你想我是否非去不可？”切尼回答：“是的，总统先生。”布什转了转他的眼睛。

布什关于科罗拉多之行的犹豫不定，在他的公开讲话中也可以感到。在一次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说政府没有考虑对入侵采取军事反应，但是，他的陈述是绕来绕去和自相矛盾的。自从他当选为总统以来，也许是第一次布什似乎表现出受到了压力。当他登上“空军一号”飞机时，他仍然在仔细考虑波斯湾的新危机。

撒切尔夫人没有那么谨慎小心。她和蔼可亲地向总统问好，她说：“总统先生，再见到你非常高兴，”然后，仍然直视着他的眼睛，她又加了一点个人的忠告，好像他们在分享一个秘密：“乔治，你必须知道，他是不会停止的。”她说完就不再提这件事，和他一同步入了阿斯彭中心会议室。两个钟点之后，总统结束了他的演讲，他们两人出来了，走了一小段路去到美国驻英国大使位于科罗拉多的家中，他们与他们的高层助手一起在密室里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讨论。

撒切尔直截了当地问：“现在你打算对伊拉克人做些什么？”

瞬息间布什吃了一惊。正如他对这类困难而直接的问题经常作出的反应一样，他轻声地笑了笑，接着又微笑又点头。然后，显然还没有恢复平衡，他给了一个拙劣的回答。他说：“我不知道。”当撒切尔等他继续说下去时，他加了一句：“我们有很多选择。”

撒切尔被布什的犹豫不决所震惊。她宣称：“你必须立即作出反应！”她脸上的极端厌恶的表情是真诚的。她强调：“总统先生，我们将支持你们。”她的左手紧握成拳头放在膝上。她是刚强的，坐在椅子上身体略向前倾，直视着布什，低声谈话。她重复地说：“我们将支持你们，但是，你们必须干点什么，你们必须，你们必须，你们必须勇敢地面对这个人。”她因自己言语而出神，她的嘴抿成了一条坚强决心的细线。她气疯了——气萨达姆·侯赛因，但更气布什。她毫不动摇地说：“我知道，如果是罗纳德·里根，他会怎么做。是的，是的，我知道。我们的朋友，我的朋友，里根总统，他会勇敢地面对这个，这个……”

由于激动，她朝椅背上靠了靠，然后又断然地前倾，伸出右手抓住布什的膀子。他被她的激烈态度惊住了。她坚持说：“这个人希特勒，以前我们曾经站在一起。我们曾经遇到过像这个人一样的人。我们可以再干一次。我们必须再干一次。”

她的话使布什突然变得坚强起来，他用力地点点头。向答说：“我们要干。”

但是，她没有听见。似乎被她自己的论争弄得筋疲力竭，她最后的话是一个请求。她说：“乔治，这不是摇摆不定的时候。”（事后，撒切尔的一位助手向一位吃惊的美国官员解释她的强烈感情。他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期，说：“在本世纪中有一次我们让你们逃避了你们的责任，结果我们付出了可怕的代价。现在，我们不能再允许那样做了，对不对？”）

从那个时刻起，布什总统决定动用美国在波斯湾的力量。新闻界立刻注意到了，他的声调中有一种新的强硬的味道，好像他已经与某座看不见的决心水库接通了似的。看来他切望打一仗。他被撒切尔的话转变了。似乎他突

然认识到他个人已经被萨达姆·侯赛因冒犯了、欺骗了、诱入了歧途、击败了。他对记者们说：“你们就等着听吧。”站在撒切尔身旁，他的举止看上去好像他就是自由世界的领袖。他看上去仿佛是美国的总统了。

次日下午，韦伯斯特带了一套新的指令回到兰利。他通知他的助手们，总统要中央情报局提供一份颠覆侯赛因政府的计划。布什是于当天早些时候在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智囊团会议中间作出这项决定的。在斯考克罗夫特所作的关于在国内打击侯赛因的必要性的发言中，布什突然转向韦伯斯特，说他需要一份可以动摇伊拉克政权的隐蔽工作计划。布什说“任何可以暗中破坏他的政府”或“给他制造麻烦”的事情都会有帮助的，不管这种压力来自内部的反对派还是来自被流放的领导人。他强调，这个计划应该是一份全力以赴的计划。布什要向侯赛因表明：入侵是不会没有反应的；这就是表明态度的方式之一。

韦伯斯特感到奇怪。在那以前，讨论一直集中在中央情报局加紧准备一份评估的问题上，估计一下伊拉克的入侵会如何影响美国的安全。根据报告，伊拉克现在控制了差不多百分之二十五世界石油资源的通道。这样一种武器的效果将是破坏性的，韦伯斯特立即被任务的巨大所击中：情报局拥有大量的关于伊拉克的信息，但均来自几个驻外的随便安置和严密监视的伊拉克外交官，它很少有来自最高层巴格达政府的有用的情报。情报局也没有什么办法钻进侯赛因的脑袋。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为缺乏有关他的信息和什么能使他倒台的信息所窘。据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家透露，情报局给那个伊拉克人作的心理形象是“中央情报局所拥有的关于任何一个世界领导人的最薄的文件之一。”情报局不能依靠它的以往的评估，既然它曾经作出的很少几个有关侯赛因的结论已经被证实是错误的——他远不是他们在1988年所评估的那样一位重实效的领袖。

情报局知道，它不能指望那难以控制的伊拉克当地居民来反对他。与西方的公众观念相反，伊拉克是一个大体上现代化的工业化社会，侯赛因曾经尽了很大的努力给伊拉克的居民提供广泛的利益。结果，伊拉克人普遍支持政府，把侯赛因视为一位土生土长的英雄。在伊拉克实际上没有政治生活；它的政权是高压性的、无所不在的、与世隔绝的。任何一点不同政见的迹象，立刻被残酷地毫不迟疑地消灭。几乎不可能派遣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进入这个国家，或从它的内部招募特工；它的制度简直太严密了。韦伯斯特后来沮丧地公开承认：“我们知道世界领导人都想要从人的情报中获得的知识，（而这是）往往很难得到的——坦率地说，难于在那种类型的独裁环境（即伊拉克）里得到。”

理查德·斯托尔茨和迪克，克尔让韦伯斯特放心，可以做些多情来帮助动摇巴格达政权，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伊拉克工作队去处理那个危机。工作队集中了情报局在各个领域——政治、心理、秘密和半军事性行动、经济、通讯和信号的截取与窃听、卫星侦察、反情报、恐怖主义——中的第一流的专家。领导伊拉克工作队的是首席中东问题专家，一位有着20年战斗经验的行动部官员。他是一位爱好而又有训练的阿拉伯语学者，曾经负责过情报局的几个最成功的间谍行动；甚至行动部副主任助理托马斯·特威腾也听他的。在韦伯斯特从白宫回来的几个小时之内，工作队队长已经向伦敦站站长提出了新的情报要求，该站长接到指令要他同广阔范围的伊拉克流亡者接触，包括过去的巴什党官员。

匆忙集合起来的伊拉克工作队分成了3个小组：一个在行动部；一个在情报部；一个在科学技术部。特别协调官员联络这3个小组，从其他的联邦情报机构来的联络官员也在伊拉克工作队的办公室里安排了办公桌。

在入侵的24小时之内，工作队的主要成员已经行动起来。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解释说：“我们就这么走进行动部的一些办公室，开始重新安排事情。我们从零开始把它建立起来，把我们需要的人带进来。我们把其他小组的人都调光了。为了这个任务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边了。所有的事情。”

工作是紧张、刺激而又需要紧迫的，50—60名支援官员被指派到每个工作小组。几个星期之内，行动部的小组已经增加到150名官员。到了8月底，将近有700名中央情报局雇员参与了在某些方面协助伊拉克工作队行动。

一位曾经担任过几个这样的工作队的职务的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说：“它很激动人心，因为你就在其中，在每一件事情见报以前你就知道了。它也是一个快速点燃的压力炉。人们要最近的答案。这类工作可以牵涉到差不多任何事情：细查精选情报报告，回电话，准备简况介绍，把地图拼在一起，参加会议，策划行动。在工作队内部还建立一些特定小组以处理各种特定问题，并准备阵地文件和报告。”

预告什么将要发生的重担落在了情报部的工作小组的肩上。它的任务是评估伊拉克的军事能力，评估美国的盟友们的可能行动，评估对巴格达施加经济压力的效果，以及评估侯赛因内部圈子里面不同政见的可能性。

最大的和最重要的伊拉克工作队小组聚集在一起，监视、监听、监控、调整、处理、评估截取到的通讯、信号情报和图像情报。这个庞大的工作队与国家安全局、国家侦察局和国防情报局的卫星处密切协作。一条特别的情报局之间的联接线路可以使在华盛顿的伊拉克工作队官员们和海外关键情报站看到和讨论伊拉克的高分辨率的照片，这些照片是从中东上空的美国卫星平台拍摄到的上千张这样的图像中挑选出来的。这个小组分析由国家安全局设在埃及的伊拉克立翁空军基地监听哨和设在土耳其（距伊拉克最近的地点）的锡诺普和皮里密克两个空军基地监听哨截取到的信号情报。国家安全局还供给来自设在阿曼和塞浦路斯的美英联合地面站的材料，这两处地面站是监听海外电话的。这整套高技术装置是中央情报局显示它的资本的一次机会。伊拉克工作队的每一个主要办公室都纳入一个电话会议系统，该系统是中央情报局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使之完善的。这个系统把情报局的海外站和中央情报局以外的联邦机构联系在一起。

8月3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之后，韦伯斯特感到比较放心。他对他的工作已逐渐感到轻松愉快，与周围的中央情报局高级情报官员相处也变得比较自在，就在几个月以前，那些高级官员感到他们不得不握住他的手度过艰难的境地。现在，事实并非如此，在那里。前任法官即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可以掌握的，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形势。他不需要了解外交政策的复杂性；他必须是一位领导人，对布什来说，他是情报局的首席代表。更重要的是，他必须传播信心，使人们意识到他知道情报局将要干什么并表示同意。那就是为什么当他回到兰利时他似乎特别地热切和自信。他对他的助手们说，这是一个使中央情报局大放光彩的机会。总统指望他们提供一些答案。从从容容地干！他告诫那些手边堆满了大量新材料的情报部的关键专家们，从从容容地干，要正确；从现在开始他们大家都要加班加点地干了。他让他个人手下的工作人员在他的办公室支起一张帆布床，开始准备明天上午的发言，那

时他要准时抵达戴维营，给总统再作一次情况简介。

对于中央情报局，8月4日是个大喜的日子。7月28日的沮丧被一种异常欢欣愉快的感情所替代。以往40年情报局曾经谋求建立起来的一切，已经要实现了。情报局的理解是对的，它曾经作出一个大胆的预测，面对从总统和中东领袖们那里来的普遍怀疑，这个预测站住脚了。毕竟那首先就是为什么要建立中央情报局的原因：当美国的利益可能遭到危害时，当国家将要受到攻击时，能够准确地预报。并及时地向总统报警。

8月4日傍晚，大楼七层楼上的欢欣鼓舞的情绪是“说中了”科威特的事情的自然结果。但是，这种欢乐情绪很快就和一种对从国家侦察局收到的那批最近的卫星照片的黯淡反应混合在一起了。初步分析以后（这些照片首先在华盛顿的一个秘密地点——“16号大楼”——被专家们检查过。），这些照片被摊放在局长办公室毗邻的房间里的会议桌上。上午在戴维营同布什会晤后刚刚回来的韦伯斯特，收到了他的第一流的分析家们所作的评估：如果萨达姆·侯赛因打算撤出科威特，正如他在过去24小时内所承诺的那样，那么他最好还是快点开始行动。由一颗位于科威特沙漠上空的KH-11卫星拍摄的那些照片表明，伊拉克军队继续涌入与沙特阿拉伯边界最接近的地区。那里的部队人数已经接近于48小时前入侵科威特时的人数。甚至看上去伊拉克军队已经进入了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中立区。分析家们指出了五处这样的侵犯。他们担心侯赛因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进入沙特阿拉伯石油储量丰富的东部省。

韦伯斯特关注地点点头。现在看起来，好像那天上午他给布什的信息可能错了。在那次特别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局长是第一个发言的，那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房间里几乎每一个人都认识到，上一周中中央情报局的警告是不可思议地准确。当他概括地叙述通过技术手段得来的关于伊拉克军事部署的最新信息时，他的声调是平稳的不动感情的。他说，10万伊拉克军队聚集在科威特—沙特边界的北边，但是，没有一支部队真正向南越过了边界线。在边界线的这一边，一支1,000人的沙特部队面对着3个伊拉克装甲师（和7月27日晚上查利·艾伦曾经看到的准备袭击科威特的部队数目相同）。沙特皇家部队装备精良但人数少训练也不够，如果侯赛因决定入侵，他们是抵抗不了的。用不了3天伊拉克人就能砍掉这个石油储量丰富的王国的三分之一。这还是一个保守的估计。然后，韦伯斯特向总统和他的顾问们重复了他的主要论点：伊拉克军队没有越过边界，也还没有理由猜想他们会那样做。

现在，回到了他办公室旁边的会议室里，韦伯斯特担心他也许会把布什引上错路；毕竟侯赛因还是可能入侵沙特阿拉伯的。克尔同意。这是“纯苏维埃主义”——集中各个独立的坦克兵团进行一次深入敌方领土的闪电式袭击，目的不是包围和扼杀而是突然间一举消灭。面对如此强大的力量，沙特人是不能自助的。就克尔所能分辨出的程度而言，伊拉克坦克正计划继续向南滚动。

韦伯斯特再一次研究了那些照片，但是，他决定不告诉布什，中央情报局认为美国应该在利雅得郊区某地作好阻挡侯赛因的精锐共和国卫队的准备。不仅是由于那仍然不一定发生（萨达姆也许会撤军；那也许是一个错误），而且，布什可以决定做些什么而不用韦伯斯特告诉他。此外，韦伯斯特知道，总统或许已经看过那些情报照片了。中央情报局局长需要更多的信息。他指示克尔每小时给他送一次关于伊拉克人在干什么的报告。然后他提醒他的高

级助手们，他们不应该忘记侯赛因曾经许诺过几天之后就撤出科威特，如果出现任何开始撤军的迹象就立即通知他。

在戴维营，布什已经作出了决定。在和他的高级顾问们举行的特别会议休会以前，他就通知了他们，他正开始实行五角大楼计划 90—1002。他说，美国军队应该准备好进入规定的阵地去保卫沙特阿拉伯；自美国干预越南以来的最大的军事机群将要部署好。布什需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说服沙特政府，因此下午一点钟他给法赫德国王挂电话。通话线路很清楚。向国王致意以后，总统复述了在阿斯彭时撒切尔夫人对他说过的话：“陛下，你知道，他是不会停止的。”

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分析家们真是一语中的。虽然总统没有确切信息说明伊拉克军队会继续通过科威特南部边界，也没有理由假定他们不会。布什为了慎重起见，才事先警告他所关心的沙特国王。同时他相信他没有夸大事实。总统对法赫德说，他想派一名特使去同他讨论对入侵的可能的反应。法赫德回答他不能在美国军队面前表态，但他似乎不能确定下一步怎么做。他唠唠叨叨；接受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可能使他承担接受美国公开援助的责任。他最后同意会晤，但加了一个条件：“不要派外交官，”他坚定地说。布什同意了。切尼去跑一趟，不是贝克。

那天下午早些时候，切尼由施瓦茨科普夫、盖茨和中央情报局一位摄影专家陪同，在华盛顿郊区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乘上了一架特别装备的波音 707 飞机飞往沙特阿拉伯。手头有中央情报局最近的情报评估。但是，切尼需要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当飞机飞临大西洋上空某处时通过一套数字化指示装置收到的。中央情报局最新近的照片显示，两纵队坦克实际上已经进入沙特阿拉伯。这也可能是他们那边的一个错误——边界是一片草草标志了的荒野——但是，切尼不能存有任何侥幸心理。当他抵达利雅得时，他要把照片给法赫德国王看。

那是一篇很长的描述，但在有关技术细节问题上则特意简短，切尼不愿让复杂的分析把沙特国王搞糊涂了。他只想强调，威胁是存在的，美国准备对付它。当威胁消失的时候，美国人将回国。他们将把装备留下，从而使沙特人将来能更充分地保卫他们自己。最重要的，他们将遵守他们的保证，做他们答应做的。他们决不食言。

切尼重述了总统的承诺，美国承担保卫沙特阿拉伯的责任。他强调：“我们愿同你们一道工作。”然后，他催促尽快部署美国部队。切尼把他在波音 707 飞机上收到的照片拿给法赫德看。当国王把那些照片递给坐在他后面的他的兄弟（王储）时，他是明显地发怒了。

美国的证据给法赫德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沙特阿拉伯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他相信美国。在同意美军部署以后，他站起身来和切尼握手，他说：“我想知道的只有一件事，在这一切结束后，萨达姆·侯赛因还能不能自己从地板上站起来。”

切尼的反应很快，他说：“不能。”

8月7日，当布什总统很难得地来到中央情报局总部的时候，情报局的官员们充当主人。就总统方面而言，他这次出访兰利是一个感激的举动，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半道歉。这是他承认7月份中央情报局是对的的一种方式。当布什进门的时候，中央大厅里满满地拥挤着1,000多官员、分析家和辅助工作人员。这是一次胜利返回他以往的办公室。他显然很高兴。他对那一群

向他问好的官员们说：“你们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

他一边步行穿过人群，一边伸出手去和尽可能多的雇员握手，而一位官方摄影师则不断地按快门儿，拍了一张又一张。几个小时之内，这些照片已经陈列在通往情报局自助餐厅的过道里的一个玻璃架子里，一直保留到下个月。中央情报局发言人马克·曼斯菲尔德回忆说：“对我们这里的人来说，那是一次真正的鼓舞士气。”布什对他受到的欢迎感到很满足，在他到达以后就和韦伯斯特以及中央情报局一流中东分析家们举行的一次私人会议上，他还详细地谈到他受到的欢迎。他还说他每一次回到兰利，都给他带来他当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的许多美好的回忆。

在布什善意地出访兰利后的几个星期里，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如同对待10个月以前的巴拿马政变一样，当新闻界和国会开始提出有关入侵以前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的各种问题时，政府官员们开始到处寻找某个谴责对象。为什么白宫这样毫无准备地被抓住了？为什么美国在伊拉克侵略的第一次威胁时没有作出反应？至少有些政府官员是愿意责备中央情报局的。最引人注意的透露于8月13日出现在报摊上的8月20日版《新闻周刊》中，在它的“常规智力瞭望台”专栏里，这个专栏介绍一种对国际问题的直截了当的赞成或不赞成、满意或不满意的观点。《新闻周刊》的编辑们在贴近“中央情报局”条目的地方，放了一支红色的“向下”的箭和下面的附加语：“在入侵之前，告诉每一个人，天下太平去休假吧。出色的工作，伙计们。”

那个被广泛阅读的专栏带给情报局公共关系办公室的当然不是哈哈大笑。发言人曼斯菲尔德说：“我一点都不知道那条消息是从哪儿来的，我甚至都不能开始对它加以评论。”

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回忆说：“据我所知，公共关系办公室没有作出反应。但是韦伯斯特注意到了。对他来说，它看上去像一颗劣质的子弹。”

当时，另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告诉一位记者，中央情报局对于陷入“与白宫的令人厌恶的较量”不感兴趣。在坚持谈话“不准见报”之后，这位官员补充说：“我们关于伊拉克的信息，是在我们曾经有过的最及时最详细的信息之列的。在最适当的时间我们是正确的。没什么奇怪。关于那一点总是有话可说的，但我认为现在不是说话的最好时机。也许过些时候。”

别的官员们不是那样有节制。一位官员说：“这是典型的白宫废话，简直是纯粹的胡扯。”另一位官员更明确：“《新闻周刊》是约翰·苏努努选中的出版物，他为每一件政府弄糟的事情责备中央情报局。也许他应该首先清理一下他自己的屋子。”

布什尽了最大努力为情报局辩护，使它免遭那匿名的中伤。他对记者们说：“我们有很好的情报，我们的情报（关于伊拉克）促使我关心（波斯湾的局势）已有好长时间了。”参议员博伦也说他给情报局“很高的分数”，为了它的7月和8月的情报评估。

大多数国会的领导人都同意。国会议员罗伯特·G·托里切利率直地告诉《华盛顿邮报》：“这是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从情报界收集数据记录很可能胜过制定政策。制定政策的人要认识正在发生的事的内部含义，而对情报的情况也要进一步更好地理解。”

《新闻周刊》的文章终于成了历史，被布什的8月份自我认错平息下去了，但它在韦伯斯特的高级助手中间仍然留下了一种苦味。有一个人说：“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要被白宫抓住弱点来个攻其不备。我猜，这正是政府

玩弄政治的方式。”

解释远比那复杂得多。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都不怀疑，布什正在寻找某个人来取代韦伯斯特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位置。他是以不伤和气的方使使之离任的。并非布什不喜欢韦伯斯特；只是和一群亲密的、懂得他自己对事物的看法的助手相处，他感到更加舒畅。不知怎么地，甚至在巴拿马事件之后，和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韦伯斯特相处，布什从来没感到完全地自由自在，尽管他们之间继续存在着友谊，尽管韦伯斯特为人正直、忠诚。他曾经做过里根要他做的每件事，现在换了布什也是一样。他改善了同国会的关系，增进了公众对情报界的信心，同时他还使情报局摆脱了丑闻和不必要的反宣传。但是，似乎那还不够。

一位政府官员承认：“比尔·韦伯斯特就是不适合。说穿了，总统就是想要一个有更多的固有经验的人来掌管情报局。”

在他任职以来的19个月中，布什和他的高级圈子里的白宫助手变得很亲密，其亲密程度胜过大多数最近的历届总统。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清楚地紧密结合的群体。布什经常使他的高级助手分享他的娱乐，这使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非常烦恼——他是穿着百慕大短裤和黑色短袜在他的华盛顿郊区草坪上除草的人——在驶离缅因海岸的布什的汽艇上，斯考克罗夫特的紧皱眉头清晰可见，那就是表明他自己的兴趣爱好的一个准确无误的标志。有时，布什比起美国总统来似乎更像一群兄弟行的领袖。（以斯考克罗夫特为首的布什的高级助手们亲热地称呼他为船长——韦伯斯特永远不会做这样的事。）中央情报局局长自己的爱好包括经常在华盛顿重大社交运动（布什不喜欢这样的活动）中露面，似乎使他和肯尼班克港格格不入。

到了1990年8月，布什也对罗伯特·盖茨有了很大的信心，盖茨作为主要的外交政策行政官员和情报专家的作用正在增长。盖茨是后来被称为“八人小组”——布什、奎尔、贝克、鲍威尔、切尼、苏努努、斯考克罗夫特、盖茨——整体所必要的组成部分。这个小组负责处理有关伊拉克危机的日常工作。在随后的紧张月份里，这个小组将经常开会以便作出决定和策划战略。韦伯斯特很少出席。

许多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争论，认为韦伯斯特之所以不在内圈中，与情报局的当家人如何看待他们的工作有关，也与布什的俱乐部式的领导风格有关。似乎韦伯斯特、克尔、斯托尔茨、赫尔杰森、特威腾和德特兰尼明确决定离布什远点儿以保持他们的孤立，甚至当正在制定重要的外交政策决策的时候。这正是韦伯斯特曾经说过他所要的那种方式。去年10月巴拿马的吉罗迪政变失败他受到白宫的批评之后，他曾经阐明过他的这种观点，当时人们指责他是一个无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

在一次访问中，韦伯斯特仔细考虑过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情报的作用问题。他强调，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是尽它的全力呈达事实，而不是从事于政治。他说，中央情报局局长不是总统的内阁成员，这个事实是有目的的；中央情报局不是一个制定政策的机关。它为总统和他的政府收集情报，然后站在一边，让他们采取行动。他说，可能发生的最坏的箏就是把情报和政策之间的界线弄得模糊不清；那就是情报局的客观性最常受到质问的时候。他说，中央情报局为总统服务，但是，首先它要为事实服务。

有人问他，如果总统把证据解释错了怎么办？如果在所有的硬数据记录都呈递上去之后，总统和他的高级顾问拒绝承认呈递上去的东西怎么办？

韦伯斯特毫不犹豫地回答：“你告诉他们，他们没有足够仔细地读那些情报。”

问题是在7月份韦伯斯特确实是这么做的，还是面对布什的疑虑他保持沉默，——而不是有力地说：“原谅我，总统先生，你显然没有阅读我们给你看的这些东西。请再研究它一下。”不知怎么地，考虑到他的个性，韦伯斯特似乎不可能那么率直地对待布什，布什在他自己的经历中花过许多时间阅读各种各样像中央情报局局长于7月28日上午送给他的那样的情报报告。在9月18日一次公开演说中，韦伯斯特本人也许已经回答了那个问题，当他含蓄地说应该把夏季的失败放在椭圆形办公室门口。这就是他曾经说过的最接近于批评政府工作的话了。

韦伯斯特几乎为布什感到为难。他说：“我并不总是懂得我们的政策，有时——即使在管理最好的政府里——我们没有真正花时间和精力去拥有这样一个政府，因为某些事情没有彼预见到。”

简单的真相就是布什没有相信中央情报局，因为他不能；如果他相信了，那就会意味着拒绝他的第一流的外交政策顾问们的忠告，意味着掩耳不听他的最信任的中东提供消息者的话。并且，它还会意味着将近8年来里根—布什关于伊拉克的政策是错误的。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后的日子里，情报局奉献了巨大的能量，为布什、他的白宫班子、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提供详细的情报。在幕后，政府官员们几乎是众口一辞地称赞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产品。覆盖中东地区的中央情报局—国家侦察局—国家安全局联合卫星和信号新闻报道网的工作是经常的、详尽无遗的，组成了美国情报武库中独一无二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武器。中央情报局还建立了一个高级联合情报组织去跟踪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有关恐怖主义分子威胁的特殊情报记录就包括在总统的每日情况简报中。

侯赛因入侵之后的前两周内，中央情报局秘密派遣了两个特别准军事小队进入科威特城，收集有关伊拉克防御工事的情报，并与刚开始形成的科威特抵抗组织接触。到了8月底，在沙特阿拉伯境内一处秘密基地活动的、中央情报局指挥的绿色贝雷帽小队（指美国的“特种部队”——译注），正帮助组织、训练、支持科威特的抵抗力量，并计划攻入他们的国家。

反对侯赛因的颠覆运动得到最多的关注。中央情报局招募了一批知道侯赛因政府内部运转情况的伊拉克流亡者，并派了两个高级情报小组渗入巴格达中心。先后两次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能够成功地援救在那个国家内工作的重要的情报提供者脱险。后来，韦伯斯特轻描淡写地谈到那些中央情报局在伦敦和利雅得招募的伊拉克不同政见者的价值。在一次公开演讲中他说：“我认为那些最接近侯赛因的人才是他的最大的威胁，比那些不同政见者更甚。那些人希望他们自己掌权，并且是在外边搞不同政见活动的。”

入侵之后不久，中央情报局举行了一次关于伊拉克核能力的椭圆形办公室特别汇报会，报告说侯赛因只要再过两年就能发展核武器了。对于政府官员们来说，这次特别会议是一个里程碑。伦敦《泰晤士报》报道：“这次情况简介改变了总统和他的助手们对海湾危机的看法，解放科威特是远远不够了，萨达姆也必须推翻。”

中央情报局还处理与伊拉克前盟友——苏联的情报联络的一切行动，它劝使一位苏联高级官员把他的国家与伊拉克签订的军事转让协议送给美国国防部看。这位苏联官员由两名中央情报局安全官员陪同于8月底无声无息地

溜进了五角大楼。

情报局在欧洲的工作也非常有价值。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访问了成百上千个曾经在伊拉克境内工作过的工程师、科学家、建筑师、承包商和企业家。德国公司提供的信息最多，包括伊拉克主要设施的蓝图。在埃及，中央情报局特工们追踪到他们的最重要的业务联系人之一，他们为他们提供了伊拉克国防部的的设计图。（他告诉他们，要做的关键事情就是在国防部的四楼引爆一颗炸弹，那里的房间里装有指挥部的计算机。）在战争开始的几小时内，伊拉克国防部成了美国攻击机的第一批目标之一。

在两个月之内，中央情报局官员们已经把伊拉克的弱点编为分类目录，他们还相信他们已经弄清楚了在战争中侯赛因如何计划保持对他的部队的指挥和控制。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在这样一种设想下向前开展：即，任何战斗的开端都会以空中轰炸伊拉克军事资源为特色；虽然以何者为目标将由美国军方决定，而那些决定的基础将来自中央情报局的数据记录。前国防情报局局长伦纳德·佩罗特斯将军解释说：“我深信，我们在那边的有利条件之二，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就是我们有非常非常有效的情报能力来帮助我们确定目标。在固定不变的意义说，我不相信还有一个主要目标是我们未曾命中过的。”

为了准备对付伊拉克的防御，中央情报局特工们被派往法国，向伊拉克的第二个最重要的武器供应国了解关于伊拉克武器、精密度和部署的准确信息。法国人给了美国有关幻影式 F—1 战斗机、飞鱼导弹雷达系统和法国制造的攻击型直升飞机的详细信息。中央情报局的技术人员还帮助美国卫星定位，以严密监视伊拉克关键的军事编队和军事基地，从而可以提供关于侯赛因的主要武器的精确的计数。到了 11 月，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相信，他们对伊拉克化学和生物武器的能力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他们标出了工厂和货车编组车场，在战争开始阶段，如果把工厂和车场毁掉，将会抵消那些武器的效果。中央情报局帮助国家安全局部署最重要的、秘密的雷达装置，帮助追踪伊拉克的领导层。他们使用了 3 个高度灵敏的被称为象耳的接收器（每个都有一个足球场般大小），用以验明伊拉克的指挥“中心点”和截取从巴格达发往战地指挥官的信号传递。

中央情报局在海外的功绩是决定性的、有意义的，但在华盛顿它的公开行动似乎踌躇不前、摇摆不定。在椭圆形办公室，这样明显地缺乏热情给情报局带来麻烦，那里重视政府异口同声地谈话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在 12 月早期是最明显的了，那时正是关于今后在波斯湾的行动的公开论战的高潮。有报道说，布什总统断定 8 月份对伊拉克实施的经济制裁会迫使侯赛因撤出科威特。当韦伯斯特在一系列关于波斯湾危机的意见听取会上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面前作证时，中央情报局就把它自己放在了辩论的中心。韦伯斯特颇有信心地预言，过些时候，制裁将会迫使伊拉克的军事机器瓦解。韦伯斯特出示了一份伊拉克工作组写的详细的统计分析，包括附带的信息：伊拉克的食品和石油的贮存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韦伯斯特关于制裁效果的证言，不论是公开的还是关起门来说的，似乎都很乐观，因而它鼓舞了委员会主席——众议员莱斯·阿斯平，他的结论是：中央情报局相信美国的经济禁运可能迫使侯赛因撤出科威特，如果给以足够的时间去实施。阿斯平在 12 月 21 日发表的报告中写道：“在伊拉克贸易方面的禁运基本上是全面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法官对委员会说，

制裁已经切断了 90% 以上的进口和 97% 以上的出口。”

将近一个月以后，在参议院关于战争问题的历史性辩论前夕，韦伯斯特的证言成了紧张调查的焦点，由于民主党人指责他对制裁改变了立场。参议院辩论开始前的 24 小时，韦伯斯特写了一封信给阿斯平，那封信“澄清了”中央情报局早些时候的立场。中央情报局局长写道“光有制裁不能”迫使侯赛因从科威特撤军。国会议员们被这个反应的时间选择所激怒了；评论家们指责韦伯斯特在使情报政治化。

中央情报局公共关系办公室还击了评论家们。中央情报局发言人曼斯菲尔德说：“你们必须去仔细看看原始的证言，法官从来没有说过光靠制裁就能把事办成的。”曼斯菲尔德是对的，但只在一点上，因为韦伯斯特的“澄清”时间选择得太糟。它是在阿斯平已经发表了他自己的结论的 3 个星期以后才发表的。不管韦伯斯特是否打算这么做，看来似乎中央情报局坚持支持总统，似乎兰利是白宫的俘虏。

关于制裁的争论起了使中央情报局士气低落的作用，那里的分析家们怀疑韦伯斯特作为一位可靠的独立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行使其职责的能力。他们相信，他把人们认为他能办好的一件事给弄坏了。他的受到高度赞扬的、在华盛顿政治群体中运转自如的能力现在受到了怀疑。情报局的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人弗雷茨·厄马思就是他的贬低者中的一个。厄马思是一位地位很高的官员，他被韦伯斯特的出尔反尔震惊了。为什么中央情报局局长不能告诉阿斯平，就说他坚持他的早些时候的证言呢？他同一位同僚。厄马思是根据个人的了解说话的，由于他是中央情报局内部关于韦伯斯特给阿斯平的原始证言的辩论中关键的官员。在整个 12 月份，厄马思毫不动摇地坚持认为制裁不会起作用，并且有好几次试图说服韦伯斯特使他相信，但是，失败了。随之而来的 1 月份的灾难性怪事本来是根本的不需要发生的，只要中央情报局局长曾经听信过情报局一流专家们的意见。

当时，一位国务院高层官员说：“最初韦伯斯特错解了情报，应该加以改正，他的可靠性被非常严重地损害了。而中央情报局，不管它在这场危机中是如何地挺起腰杆，不管它的功绩如何，现在是士气十分低落了。”

众议员阿斯平发表他关于制裁的报告几天以后，李洁明大使到白宫去拜访他的老朋友乔治·布什。这是一次社交性的访问，稍微掺杂了一点正经事。会晤是于一个冬季的下午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的。布什向李洁明亲切地问好，然后请他坐下。当他们讨论到波斯湾的形势时，李洁明报告说，在支持美国反对伊拉克的行动中，中国人一直非常合作。布什微笑和点头表示赞许。李洁明说完了，布什问他是否还愿意当大使。李洁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为自己说项了。他说，到 4 月底，他想再被委派到华盛顿来，用为那时将是他在中国的第二年的末尾。至于他的下一个职务，他想，要么是中央情报局一个高层的位置，要么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最高职位。布什点点头，眼光闪了一下。他脸上的微笑展开了，他说：“你应该去拜访一下蔡斯·昂特迈耶，我想我们有些东西给你。”

李洁明被布什的含糊的回答所困惑。离开椭圆形办公室之后，他走进通往昂特迈耶办公室的大厅。作为白宫人事室主任，昂特迈耶似乎非常忙，但是这一天当他站起来向他的不速之客问好的时候，他很高兴见到他。他奇怪地问：“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李洁明解释说，他只在华盛顿呆很短时间，他想他可以顺便看看总统。然后，他详细叙述了布什对他说的话。李洁明问：

“你知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昂特迈耶真地感到迷惑了，李洁明在与总统谈话以后还必须问他这样一个问题，他轻声地笑着回到他的办公桌旁。他回答：“你将要获得一个职位，工资级别比我高得多。”

李洁明离开了白宫，他被担任中央情报局最高职位的挑战引起了兴趣。他曾经和几个在兰利的老同事接触过，知道韦伯斯特有些问题。现在，他思想里没有怀疑了：布什打算换局长，而他相信李洁明可以干这项工作。但是，李洁明自己的感情是复杂的。他当一名政府雇员已有许多年了，而且充满压力的中央情报局的职务将把他从他妻子和长大了的孩子们身边拉开，其程度甚至比以前更甚。那个职务除了工作就没有别的。他摇摇头以清除疑虑；他爱当中央情报局局长。

几天以后，李洁明回到中国去了，继续担负起他的大使的责任。3个星期以后，在1月16日的夜晚，美国发动了“沙漠风暴”行动。

在华盛顿，那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对许多人来说，战争开始的时刻必然会带来失去的机会的痛苦回忆。例如，一些前里根政府的官员们被激怒了，因为现在美国竟然发现它自己在科威特边界线上面对着萨达姆·侯赛因的部队。他们深信当前的危机根本不必要发生——只要罗纳德·里根、乔治·布什和其他许多外交政策官员们在1982年时曾经注意到他们关于那个伊拉克独裁者真实意图的警告。

巴格达站

1982年2月一个刮大风的日子，一架私人客机从巴黎降落在安曼的国际机场，滑行到距现代化的主要的旅客集散站约一百码处。许多官员在等待旅客们下飞机，然后陪同他们走到等在一边的汽车旁，乘车进城去会晤约旦国王侯赛因。飞来的最重要的乘客是威廉·凯西，他携带着他自己的棕色公事皮包，穿过柏油路。没有记者在场向他大声提问；这是一次机密的访问，是新的里根政府的短短历史中曾经进行过的最机密的访问之一。

凯西降落后数十分钟内就同侯赛因国王私下会晤，然后他被领到一间布置华丽的房间，同一位高大的穿一身灰衣服的名叫巴尔赞·易卜拉欣·哈桑·提克里蒂的伊拉克军官握手。他是伊拉克总情报处（伊拉克的中央情报局）的头儿，碰巧也是萨达姆·侯赛因的同父异母兄弟。他们的讨论很有礼貌，虽然没有任何坦率热诚的暗示。凯西的陈述是生气勃勃的：美国关心伊拉克于1979年开始的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凯西说，美国想同伊拉克人建立一种情报联络关系，从而可以弄清楚巴格达能够保卫自己反抗伊朗的进攻。他概略地叙述了那个计划的细节。

凯西特别关心伊拉克南方前线的军事形势，伊朗的坦克部队部署在那里，准备乘机利用伊拉克的关键性弱点。他展开中央情报局的手绘伊朗和伊拉克的部署图，并解释美国专家们认为伊朗军队将如何反击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他的陈述是符合事实的、不动感情的，但他的言辞的着力点是清楚的：美国担心伊拉克正处在一场重大的军事失败的边缘，它的防御战线拉得太长了，伊朗的步兵师可以猛力通过这些防线直抵巴士拉。由此而产生的混乱对于巴格达政权将是灾难性的。

在华盛顿，情报官员们和外交政策专家们等待着会晤结果的消息。凯西的使命是在一种不断增长的危机的气氛中最后才凑起来的。情报界只是最近才得到伊朗的可能的军事胜利的证据，又花了一段艰难的时间去说服它在中东的朋友们，使他们相信萨达姆·侯赛因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虽然如此，凯西在巴黎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等待侯赛因将派一位代表同他会晤的回音。谈判不是容易的。计划好的访问的中间人包括约旦国王侯赛因和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他们曾经向伊拉克领袖保证，美国有他应该听取的重要信息。在初步同意会见美国代表之后，侯赛因又反悔了。他告诉侯赛因国王和法赫德国王，他就是不信任美国人。跟随而来的是一个星期的反复消除疑虑的工作。最后，访问进行了，巴尔赞被派到安曼。

对凯西来说，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危险的旅行，特别由于美国和伊拉克没有外交关系。自从1967年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以后，13年来这两个国家彼此对话要跨过一道误解和不信任的鸿沟。在这期间，伊拉克已经成为苏联在这个地区的最重要的盟友；苏联把数量不断增加的武器和技术输送到巴格达，还派遣顾问帮助这个政权制订它反对伊朗人的战略。但是，苏联人没有美国人拥有的那些技术，而且，显然没怎么想到伊拉克正面临一场政治和军事灾难。

凯西和提克里蒂的会谈进行了两个小时。然后，那位伊拉克情报官飞往巴格达向他的领导人汇报会谈的结果：美国和伊拉克有了一项新的协议。他们将共同使用有关伊朗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将派遣一组专家到巴格达来帮助

战事。

会谈结束后不到两个小时，凯西通过安全的通讯联系向华盛顿报告他的使命成功了。几个月以后，又增派了两名官员包括一名高层中央情报局官员，再次来到中东。这次他们是直接抵达巴格达。美国人带来了一套新的伊拉克和伊朗军事部署图，它们是由情报界的一些军事专家细致地按比例绘制的。除了巴尔赞以外他们还会晤了萨达姆·侯赛因，此人仍然怀疑美国人想帮助他。但是，在看了中央情报局绘制的图以后，他改变了他的想法。数小时后，美国官员们回到巴格达机场，返回安曼。监视着这次行动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们非常高兴。中央情报局和伊拉克的新的情报联络关系按计划建立起来了。

然而，在里根的白宫，几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专家则产生忧虑。这些评论家担心美国正帮助在中东培育一个新妖魔，这个怪物不可避免地会反过来用它获得的那些武器来对付它的主人。他们认为，美国正在玩火。这些意志坚强的分析家们之一就是霍华德·泰切尔。

在围绕着伊朗反对派事件的宣传迫使他退出政府以前，泰切尔被认为是华盛顿的第一流中东问题专家之一。在里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职以前，他在雾谷和五角大楼的一些岗位上，就以坚持己见的中东问题评论家而闻名。他的文静、理智、自信的风格使他成为里根政府中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人物，在那里保守派靠把他们的特定观点推向极端的手段来控制政策讨论。他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个受欢迎的人物，在那里，他的仅仅可以听得见的陈述使全场安静下来。泰切尔是事物进程中的一个刹车，一位爱反复思考的知识分子，他信奉保守的议事日程，而这种信奉中又揉合了他的信念：比起意识形态来，政策更是政治需要的产物。一位同事说：“保守，是的，他是保守，但他不是一个理论家，不是从这三个字的正规意义来解释的那种理论家。霍华德是个独特的家伙。他全心灌注在中东问题上。”

贬低他的人则有一种不同的看法。对他们来说，那个矮小、秃顶、紧张、经常急躁的中东问题专家，是里根政府中一个明显的亲以色列派的领导人之一。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说：“泰切尔深信，以色列人是我们在那个地区的唯一的朋友，我们必须尽我们的一切可能去支持他们。他倾向于把任何对以色列的威胁都看作是对美国的一种威胁。那就是他如何看这个世界的。”

泰切尔作为一名反对侯赛因的强硬路线的坚持支持者和作为一名美国—以色列坚强纽带的拥护者的名声是在1979年显露出来的，当时他为五角大楼写了一份关于伊拉克的50页的论争性的评估。用泰切尔的话说，那份仍属机密的研究“充满了事实与分析”。可是，他的最亲近的合作者们说它是一种对美国—伊拉克关系的惊人的、论争性的、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先见之明的见解。在叙述的一个关键部分，泰切尔预言“在9个月内”侯赛因将发动与伊朗的战争，为了使伊拉克成为最强大的中东产油国。泰切尔以具有不容置疑的说服力的措词摆出了他的观点。事实上，这份文件给人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它在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的写字台上告终，布朗仔细地阅读过但否定了它的结论。后来，泰切尔用平淡而尖锐的措词来刻划布朗的评论的特点。他引用布朗的话说：“他们（伊拉克人）不是你所认定的那样的卑鄙家伙。”至少在一个方面布朗是对的：泰切尔的尖锐措词毫不婉转。一位五角大楼的分析家回忆说：“霍华德说萨达姆是个疯子，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去制止他。”

泰切尔回答：“我争辩说，伊拉克正在欺骗我们，隐瞒他们的真正意图。他们正卷入一场与伊朗的对抗，表面上是抑制霍梅尼政权的激进主义。在我

看来，他们做的每件事情似乎都表明他们正企图确立他们自己为中东的主要阿拉伯强国。”

泰切爾的文章充满了统计数字，它们使人联想到伊拉克正致力于一个军事扩张的危险计划，它的目的既是威胁伊朗也是恫吓以色列，最后打断美国在中东的影响的脊梁骨。泰切爾认为，在许多方面，伊拉克的兴起只能导向萨达姆·侯赛因同美国之间的对抗。他说：“在国家安全机关里，我们有不少人能够看到这一点，我们知道迟早萨达姆将面对我们的。”

当泰切爾作为一名近东和南亚的专家参加里根的小组时，他发现了一批有同样想法的分析家，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治和军事事务负责人唐纳德·福蒂埃。泰切爾和福蒂埃同几个中层的辅助官员结成了联盟，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奥利弗·诺斯，他把伊拉克看作一个顽固守旧的恐怖主义的国家，这个国家会不择手段地使美国丢脸。诺斯把以色列看作是一个反对伊拉克独裁的堡垒，对每一个愿意听的人吹捧以色列的美德。由于他多次在制定反恐怖主义活动计划中与以色列人密切合作，他对他们的钦佩加深了。诺斯对以色列的崇拜的态度与他对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阿拉伯语学者们的看法相对应，他把他们看作是他称之为“共同文化”的一部分，“它欣赏在我们和以色列人之间可以培育起来的任何对抗。”他说，形成这种态度的原因，“是由于在国务院有一种长期存在的、勉强隐藏着的亲阿拉伯倾向，我并非第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人。我认为，另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在我们的政府中有一条根深蒂固的反对亲犹太人主义的条纹。许多中层政府官员——不仅是在国务院——都是美国高贵的大家庭的子孙，在那些家庭里，一种斯文的、谨慎的反犹偏见经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很清楚，在中东地区以色列是伊拉克的主要敌人，在世界范围内以色列是侯赛因的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里根政府就职之后不久，以色列的关于伊拉克意图的论据在国务院和白宫占了上风，但只是因为当时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坚持了以色列的立场。他说服里根允许以色列海运高技术武器到伊朗的阿巴斯港，明知道这些武器将消耗在两伊战争的战场上。1981年6月，以色列用美国造F—16在奥希里克袭击伊拉克的核反应堆，美国对此保持缄默，这也由黑格的影响负责。

到了1982年早期，伊拉克的军事地位退化了，从而在里根的白宫内部，泰切爾、福蒂埃和诺斯关于伊拉克的看法被忽视了。最后，在国家安全工作人员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官员们相信，在那个地区对美国利益的主要威胁来自伊朗，1979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革命，成功地推翻了德黑兰的亲美政府。美国担心伊朗是有理由的，在卡特政府末期伊朗扣留52名美国人质达444天之久，并且继续给美国政府贴上“大撒旦”的标签。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们特别担心，自从1980年侯赛因入侵一直不停地打到现在的两伊战争，其结果很可能是巴格达政权的失败和在波斯湾建立一个什叶派原教旨主义的国家。最初美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整个1981年，伊拉克军队在一系列的战斗中打得不错——但是到了1982年2月，形势正在变化。

那个月，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收到一系列关于两伊战争的情况简介，它们使华盛顿的外交机关的上层感到寒心。根据中央情报局军事专家的说法，伊拉克在伊朗南部的进攻停下来了，它的军事队形拉得太长而且领导不力。战争正在变成一场屠杀。凯西被告知，伊拉克的联合库尔德武装在北方反对德黑兰的企图也失败了。简单地说，伊拉克已经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在将

近一年的防御战之后，伊朗准备反攻了。萨达姆·侯赛因处于困境中。

凯西很快就行动起来，他建议美国与巴格达建立情报联络，派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到伊拉克首都会见侯赛因以便商谈此事。罗纳德·里根很快就接受了他的建议。伊拉克人则不同。侯赛因说他不需要会晤，他不信任美国。只是在一系列与约旦国王侯赛因、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举行的电话会议以后，他才软下来。于是，凯西和提克里蒂在安曼会晤。现在，情报官员们说，那以后的去巴格达的代表团是由国家安全顾问威廉·克拉克和中央情报局官员伯特·邓恩（当时任近东处负责人）率领的。

但是，中央情报局两次使命的成功对于改变军事实况的作用不大，而中央情报局分析家们所作的令人沮丧的 2 月预言却证明是灾难性地准确的。3 月中旬伊朗的一次进攻，以侯赛因军队的大败告终：伊拉克士兵死亡 1 万人，伤 15,000 人，另外 15,000 人当了俘虏。伊拉克两个装甲师被消灭；320 辆伊拉克坦克被毁；350 辆坦克被缴获。大量的侯赛因部队被推回到阿拉伯河彼岸。伊朗损失是死亡 4,000 人。这次战斗是战争中最野蛮的，但最重要的是，伊朗人打得顽强打得出色，把第一个年头他们所经受的一系列令人沮丧的失败完全颠倒过来了。

坏消息接着来：尽管中央情报局尽了最大的努力警告侯赛因他必须集中力量组成更有效的防御，伊拉克部队的编队仍然易于受到伊朗的攻击。萨达姆·侯赛因对战争的个人领导起了很坏的作用，如取消他自己的军事指挥官的决定而发出相反的命令，或命令部队投入急匆匆的未准备好的进攻。4 月，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告诉凯西，一大部分伊拉克的武装部队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主要证据是一系列部署在战略城市霍拉姆沙尔附近的伊拉克军队的卫星照片，那个城市距伊朗—伊拉克边界只有几英里。城外，35,000 伊拉克军队差不多被大约总共 7 万人的伊朗部队包围，伊朗部队还得到 200 辆坦克和密集队形的炮兵的支援。霍拉姆沙尔的陷落将使伊拉克的什叶派控制的南方诸省敞露在伊朗的全面进攻之下，这场进攻将横扫一切直至巴格达。伊朗将会很容易地挑动伊拉克什叶派多数的反侯赛因的感情，使他们转而反对逊尼派控制的政府。

中央情报局过高地估计了伊朗进攻的冲击力，但也不算太过份。在霍拉姆沙尔一役中，伊拉克损失了 12,000 到 15,000 人。它的大部分部队都匆忙地、但有组织地往北撤退，它们的防御阵线动摇了。巴格达政权进一步接近失败：伊朗军队距巴士拉 13 英里，而伊拉克的战事又使它的社会变得虚弱。百分之四十的男性居民被源源输送到通往巴士拉的唯一道路上，工业和制造业的生产都停顿了。库尔德造反者意识到伊拉克的部队铺得很长很单薄，如果他们在某处推动一下，这个政权就要垮掉，于是他们在北方向侯赛因的部队发起了突然袭击。

伊拉克南方前线接二连三的军事惨败，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和美国产生了严重的反响。6 月，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企图充当中间人来谈判停战的条件，其中包括以一个代表伊拉克所有主要政治派别的委员会取代侯赛因。在此期间，在华盛顿，里根政府开始考虑它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最后步骤来挽救巴格达政权免遭失败。情报和外交政策官员认为，他们已经作出的努力——不仅是 2 月开放，还有把伊拉克从支持恐怖主义分子的国家名单中去掉（从而允许美国尖端技术公司和伊拉克做生意）——来得太晚，不能扭转冬季和春季的大规模失败。

1982年暮春，凯西和他的高级助手们决定扩大与侯赛因的正式联络关系，希望以此来影响他的政府采取新的激进的步骤来恢复他的几乎不可能的军事地位。为了实施这项倡议，首先在6月初凯西就收到了一系列有关伊拉克在军事上易于受到进攻的弱点的新的评估。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们再次预言巴格达政府濒于垮台，要么是直接被霍梅尼的革命卫队击败，要么是由于国内什叶派叛乱。形势比以往更糟。许多小队的伊朗士兵已经在伊拉克的防御工事上炸开了许多大洞，使得事情更糟的是，什叶派暴动的烈火燃遍了卡尔巴拉、巴士拉、希拉和纳西里亚。情报局的第一流专家们报告，通往巴格达的道路实际上是敞开的。侯赛因的军事指挥官或是故意地把政权置于危险之中，或是太无能因而不能提供一种恰当的防御。

凯西和里根再一次行动起来以扭转危机和挽救伊拉克。他们同意扩大情报联络关系，包括向侯赛因提供关于伊朗军队位置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从1980年10月卖给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机上得到的。中央情报局还派了一个情报官员特别小组去帮助侯赛因筹划他的军事防御，同时在巴格达总统宫附近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情报站。这一次，那位伊拉克领袖听信他的美国朋友了，他把指导战争权交给了他的职业军人，并着手解决了他的库尔德敌人的关系。

按照一些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说法，当时罗伯特·盖茨、理查德·克尔和托马斯·特威腾负责监督计划的实施，但它的日常工作则牢固地掌握在伯特·邓恩手里。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最初安排仍然在适当的地位：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领导人继续担保美国的善意努力，并保证给巴格达政权以新的支持。侯赛因还在其他方面得到帮助：自1967年起设置的贸易屏障被消除了，做工作使伊拉克从其他国家贷款的请求能够被接受。里根政府的官员们后来声称这是一次真正的“交换”：作为美国在战争中给予的帮助的交换，侯赛因向美国人提供中东恐怖分子的信息，把阿布·尼达尔赶出巴格达，提供关于苏联在这个地区的影响的信息，共同使用关于伊朗的情报报告。

为了强调美国的好意，中央情报局还介绍了一些方法，使用这些方法，伊拉克军队可以最好地反击伊朗的行动。他们的信息震惊了侯赛因：美国的情报是惊人地准确和详尽。看来，关于战场上的形势和他的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美国知道的比他知道的还多。美国关于南方什叶派叛乱的信息也十分出色。中央情报局的计划是成功的。1982年6月，侯赛因着手对他的政权进行一次彻底大检查，撤换了一些关键性的内阁成员，用经济的和政治的专家们来取代吹牛拍马者。他还更换了一些军事指挥官，并且命令他的大部分军队从伊朗作战战略撤退，以支持他的巴士拉周围的防御战线。从那时开始，伊拉克将在它自己的国土上打一场防御战。侯赛因政府也停止宣布战争死伤人数——它太令人沮丧了。

1982年夏季，在几次伊朗的进攻中，伊拉克打退了伊朗大规模的地面攻击，这些攻击如果得逞，无疑就会成为巴格达的灾难。最危险的挺进，霍梅尼的革命卫队已经到了巴士拉以北5英里处，就在巴士拉通往巴格达的公路上。但是，他们的每一次攻击都被部署得很好的伊拉克炮兵师阻挡住。实际上伊朗军队是被突如其来的配合得很好的伊拉克炮兵群所屠杀。三个星期他们每天损失7,000人。伊拉克的损失不到伊朗损失总数的十分之一。伊朗人从来没有突破过。到了8月初期，被攻击的死伤惨重弄得气馁和筋疲力竭，他们撤退了。他们占了一小条伊拉克的土地，10英里长3英里宽。嗣后两年，

战争处于停顿状态。

罗纳德·里根再度当选总统之后不久，就扩大了美国—伊拉克的关系。总统扩展了外交关系，并在华盛顿接见了伊拉克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巴格达派了它自己的大使驻华盛顿，他是伊拉克总统的密支尼扎尔·汉东。不久，汉东就成了华盛顿社交圈子里一位熟悉的人物。对于巴格达政权，他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源泉，他深知里根政府担心在两伊战争中伊朗人会打败侯赛因；在美国—伊拉克情报交换中，他是一个可信赖的中间人。在这种关系的某个阶段，汉东甚至特地宴请当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一个非官方的伊拉克暗中游说活动在华盛顿开始了。它得到了一批值得注意的追随者。

白宫还在其他方面迎合萨达姆，把伊朗列入提倡恐怖主义的国家的名单，威逼美国的盟友停止运送武器往德黑兰，作为斯汤奇行动的一部分。但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在巴格达重开美国大使馆，那里是中央情报局为保证侯赛因的生存而制定的隐蔽活动计划的中心。对于一些反对这种政策的白宫官员们，这是使人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

霍华德·泰切尔恨恨地说：“这不是一种情报关系，而是一堆情报垃圾。我们给伊拉克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以防止他们被伊朗打败。我们看出了他们的防御战线上的关键性弱点，我们知道伊朗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巴格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原教旨主义的什叶派国家在伊拉克的南部建立，这把我们吓得要死。所以我们告诉萨达姆：‘醒醒吧，你的战线上有筛眼。’那就是我们说的话。我们给他们战略上的忠告。我们救了他们。”

泰切尔证实，1982年中央情报局秘密策划在伊拉克与伊朗的血战中向伊拉克倾斜，但他的认证甚至更进了一步。他解释说：“我们通过约旦和沙特阿拉伯送给他们信息以确立我们的真诚的善意，我们给他们高空的和电子的信息——珍贵的财富——它向萨达姆透露了我们的情报能力的性质。”

泰切尔论证说，美国为萨达姆·侯赛因所做的事，甚至它为它的最亲近的盟友也从未做过：它暴露了收集和汇报情报的来源和方法——兰利的秘中之秘。他揭露：“凯西和他的高级助手都有牵连，最初是通过一个派去给萨达姆送信息的代表，后来就通过驻巴格达情报站的联络官。”

泰切尔认为，整个美国政府都应该为扶植侯赛因而受到责备。他沉思地说：“当时国务院的官僚被阿拉伯研究专家们所控制，当我们向伊拉克开放时，他们就像粪土中的猪似的。对于叙利亚人，开放看上去像是坏消息，所以那些阿拉伯研究专家认为现在我们也有一根对付他们的杠杆。他们想，结果（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将要改善同我们的关系。”

泰切尔、福蒂埃和诺斯为了那倾斜而责备国务卿舒尔茨和国防部长温伯格。诺斯曾经写道：“美国对伊拉克的倾斜和对伊朗的反感，是舒尔茨和温伯格意见一致的少数几件事中的两件。”他挑选出舒尔茨并引用他说过的话来谴责他：“‘我们不愿意看见’一切伊朗的胜利……我们曾经蓄意地工作来改善我们同伊拉克的关系。”泰切尔还说：“舒尔茨让他对恐怖主义的看法来左右我们的伊拉克政策；一旦萨达姆说他已经驱逐了阿布·尼达尔，他就没事了。”

1985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的新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加入了泰切尔、福蒂埃和诺斯一伙，他带到他的职位上来的是和他的那三位同事一样的对以色列的支持。麦克法兰对美国向伊拉克开放也怀有深深的

疑虑，这疑虑和他对阿拉伯事务的缺乏了解结合在一起。他担心美国在那个地区选错了盟友。他的一位老朋友戴维·金奇支持他的观点，此人是以色列情报局前任副局长、以色列外交部秘书长。

泰切尔对于向伊朗开放记忆犹新。他回忆说：“那是在1985年，当以色列人也就是戴维·金奇第一次同鲍勃（麦克法兰）打交道的时候。他向我们指出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伊朗是那个地区的关键，战略的关键。但是，这次向伊朗开放不是一个以色列的计划；这是我们的计划。每个看地图的人都能看出，伊朗是如何重要。”

麦克法兰把检查美国—伊朗关系的任务委派给福蒂埃和泰切尔，然后这两个人接触了中央情报局管近东事务的国家情报官格雷厄姆·富勒，请他起草一份“特别国家情报评价”，题为《关于对伊朗的政策》。最后的评估认为，有证据证明伊朗内部存在着权力之争，敦促美国帮助伊朗的温和派掌权。

格雷厄姆·富勒的1985年“特别国家情报评价”在中央情报局历史上是最奇怪的文件之一。它只根据来自德黑兰的一些直接的当地情报，也没有行动部的合作就发表了。一个月以后，接着而来的是制定正式美国政策的国家安全决策管理局，它扩展了“国家情报专题评估”的许多论点：它复苏了华盛顿40年的担心，怕苏联在伊朗获得影响；它甚至建议，如果那个政权能缓和它的观念的话，可以“在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的基础上”增加武器贸易。更为奇怪的就是，提出这个方案并非或很少依靠任何可信的情报信息。它是信念的产物——而非事实。不仅在伊朗政府内部没有温和派，而且苏联对伊朗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个国家内的苏联的政治组织——图德党已不存在；在中央情报局秘密地送了一份它的成员名单给毛拉们以后，这个党就被毛拉们随随便便地屠杀尽了。

尽管有这些明显的缺点，泰切尔仍然为“国家情报专题评估”辩护并且赞美它的作者。他仔细地斟酌他的言辞，说：“富勒感到我们的政策很不对称。他是一位战略性的思想家。他知道伊朗是十分重要的。”

泰切尔没有提到的是，富勒是美国政府内部亲伊拉克情绪的公开的批评者。同时，富勒打消中央情报局和白宫对复苏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惧。富勒说：“在华盛顿有一种对伊斯兰教的真正本能的恐惧，它是与美国思想完全相异的一种力量，那才真地吓着了我們。”

富勒继续提出，亲伊拉克政策制定者们也许患了某种政治上的神经官能症。他解释说：“五角大楼和别处的高级人员关心伊斯兰教，大大超过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关心。它几乎是一种鬼迷心窍似的恐惧，导致我们这边产生一种心理：你应该使用任何棍棒去打狗——去阻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前进。”

富勒在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同事，对他在伊朗反对派事件中的作用仍持批评态度，私下问他是否真正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轻蔑地说：“格雷厄姆会相信别人告诉他的每一件事，只要那件事听上去是对的。当泰切尔向他提出关于伊朗的想法时，他爱这个想法。对他来说，它是一幅大油画。它是激动人心的。你看，那就是格雷厄姆；他总是试图提出那一种能解决所有问题、能解释每件事情的理论。”

1985年5月的“国家情报专题评估”是可得到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向伊朗开放是用来与中央情报局对伊拉克的计划相抗衡的，而不是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为在黎巴嫩被伊朗代理人所扣押的美国人质的获释奠定基础。它和苏联或温和派毫不相干。泰切尔解释说：“我本人和许多别的人都

很关心，这次和伊拉克的情报交换，是一面易于滑跤的斜坡。我们不断供给萨达姆战略性的信息，等于告诉他他需要做些什么来愚弄我们。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与之起抵销作用的事物。”向伊朗开放是不是对中央情报局与伊拉克的交易的一种反应？泰切尔回答：“那是你说的，我可没说。美国人必须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我所说的就是请看事实。”

泰切尔的结论从已退休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们那里引起了强烈的否定的反应，他们对情报局秘密向侯赛因开放一事很熟悉。一位官员说：“那都是废话！这个人（泰切尔）对阿拉伯人有成见，而他的上司（麦克法兰）例行地残杀他们（指1983年在黎巴嫩轰炸德鲁兹要塞一事）。这两个人只有中等智力水平。他们不了解中东。他们观察世界的共同观点就是，以色列做的都对，伊拉克做的都错。如果在伊拉克南部我们有一帮大嚷大叫的什叶派教徒代替萨达姆·侯赛因，或者他们会更喜欢伊拉克一点儿。”

另一位情报官员说的更明确：“两个计划沿着两条不同的轨道跑。要害在于，如果我们早一点儿知道，我们一定会试图阻止伊朗计划的创立。那就是为什么它出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原因。”

在此期间，中央情报局向伊拉克的秘密倾斜扩大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则继续它向伊朗作的没有结果的主动表示。1986年8月，中央情报局建立了一个安全的、高度复杂的电子通讯系统，它把华盛顿和巴格达直接联系起来。两个月来，侯赛因政权通过巴格达站直接收到有关伊朗军事部署的海底电报。这个联系系统还传送中央情报局关于伊拉克轰炸伊朗设施的评估。大部分的分析是由巴格达站内部的一个特别小组作出的，这个小组能够向伊拉克的军事指挥官们提供快速的情报，情报非常详细，令人难以置信地准确，而且是蓄意要使侯赛因占伊朗上风的。根据一篇1986年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报道，凯西甚至在华盛顿会见伊拉克的官员们，以便弄清楚那个联系系统运转正常，并且“鼓励更多地攻击伊朗的设施。”虽然白宫把提供给巴格达的信息描述为“纯粹防御性的”，一位政府提供消息者说中央情报局的计划是“一种玩世不恭的企图”要在两伊战争中“制造一个僵局”。一位政府提供消息者会作出这样的评论，这件事表明那个计划在政府中造成的深刻分歧。

自从《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它的1986年报道以后，美国已经卷入“制造一个僵局的企图”的概念很少被怀疑。事实上，情况从来不是那样的。里根政府内部的亲伊拉克派，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亲阿拉伯官员们，对波斯湾的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并不感兴趣——他们致力于伊拉克的胜利，并且正在做着他们能够做的一切来保证这个胜利。与美国—伊拉克情报交易比较起来，“武器换人质”方案只是一个很有节制的计划。它绝对不能保证伊朗的胜利。历史提供了最后的证明。

1988年初期，在一次由美国帮助设计和安排的计划得很好的复合军事行动中，伊拉克军队在战略性的法奥半岛以压倒之势打败了伊朗军队。美国军事专家们根据中央情报局提供的信息画出了伊拉克军队的进攻路线，而伊拉克的指挥官们为了这次猛攻已经在美国情报官员们关注的眼皮底下训练了一年。只用了36个小时那个半岛就被夺回了。伊拉克的胜利破坏了伊朗的士气，带来了战争的实际上的终止。

伊拉克的压倒优势的胜利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提供给巴格达的情报升级了，远远不仅是单纯地向侯赛因和他的军事指挥员提供手绘的伊朗军队部署

图。根据高级情报官员们所说，材料中包括“源于高灵敏度电子窃听和截取的情报的长篇文字报告，和伊朗目标的图像侦察。”至少有一次，伊朗部队位置的卫星照片被拿给侯赛因和他的战略规划制定者们看了，中央情报局官员们也在场。尽管这些照片没有一张真正地送给了伊拉克人，上述举动也是史无前例的。那些材料带有美国政府最高级的情报保密性。

泰切尔说：“我们的情报垃圾就是要使伊拉克获胜的，中央情报局把它拥有的最好的货色给了萨达姆。当他们挽救了他的政权时，他们给他更多。在伊朗问题上反对我们的那些人，由于向伊拉克倾斜，美国的境况比较好些了。”

泰切尔提出，美国的情报设备是如此灵敏，以致伊拉克也许能够“反制造”它的军事防务，以保卫它自己的部队不受美国用来侦察伊朗的情报系统的监视。1988年以后，伊拉克人着手制定了一个大规模的军事规划，以加固和隐蔽他们的指挥、控制、通讯系统。泰切尔所担心的事发生了：中央情报局使伊拉克掌握了美国搞情报的“来源和方法”。泰切尔说：“关键是用于通讯的安全陆上通讯线。”

泰切尔和其他人所描绘的图画，是一个由于中央情报局在伊拉克所扮演的角色而产生严重分歧的政府的写照，是一个先被一批外交政策同党所操纵、后又被另一批所操纵的木偶总统的写照。整个故事的轮廓只是还没有公之于众——但是，至少对泰切尔和诺斯来说，最后的判断已经有了：中央情报局和巴格达政权的关系说服了美国政策制定者，使他们相信伊拉克终于可以成为美国的一个长期盟友；这种关系也加强了萨达姆·侯赛因的信念，使他相信当他在阿拉伯世界积聚更多的势力时，美国将袖手旁观。现在，泰切尔暗示，在危险中的远不止是美国同伊朗或伊拉克的关系。实际上，美国的整个中东政策包括它同以色列的战略关系都将受到攻击。

有人认为，中央情报局向伊拉克开放，其后果就是1990年8月的灾难；对这些意见，前里根政府官员们则轻描淡写。例如：分管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爱德华·W·格奈姆捍卫里根—布什政策。他说：“作为一个具有全球观点的强国，我们应该同处于那些地位的国家发展尽可能密切的关系。萨达姆·侯赛因很可能需要发展同西方的更密切的关系，这是一种合理的期待。”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理查德·阿米塔奇也否定了泰切尔的论点。他对《纽约时报》说：“我们知道这不是妇女投票人联盟。”

事实是，从1988年直到波斯湾战争开始，伊拉克军队经受了大规模的计划，以便弄清楚如果发生战争它的主要通讯联系仍然保持畅通。到那时，泰切尔已不在政府任职，由于他在伊朗反对派事件中的责任，他的事业短路了。他的过去的同事们说，他是被清洗掉了的。

无论布什政府对软化萨达姆·侯赛因的激进政权抱有什么样的希望，8月2日它们都彻底落空了。一旦开始认识伊拉克的所做所为，白宫似乎就致力于战争的途径，始终反对谈判解决危机的企图。中央情报局监听到一些企图通过私下的和不完全私下的使者来调解对抗的幕后活动。一位前中央情报局的高层情报官员就是这些使者中的一个，他在中东的经验被伊拉克的温和派所用，这些温和派企图调解出一个从科威特体面的撤退。8月底，这个消息以备忘录的形式传递到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手里。这笔交易提出以伊拉克的撤军交换取消制裁、进入波斯湾两个岛屿的权利、缓和巴格达的财政危机。很清楚，这项提议来自侯赛因本人。但是，因为白宫要求无条件撤军，

布什拒绝了这项提议。

几个星期以后，一种更重要更严肃得多的努力包含在侯赛因（他称他本人为“两条河的国家中的巨人”）致伊玛姆教长沙姆斯丁·法西的信中，这位教长是中东大的穆斯林神秘教派——泛神论神秘主义者的精神领袖，在该地区有巨大的影响。这封信是侯赛因企图分裂美国—沙特军事关系的一次大胆尝试，包括一项提议：以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交换沙特阿拉伯驱逐美国军队的保证。然而，沙特人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这项提议，多半是由于它的尖酸刻薄的语言（侯赛因在提到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时称他为“说谎者胡斯尼”），也由于他们害怕伊拉克的军事势力。这封信是如此唐突和片面，以致它使沙特皇室受窘。

伊拉克—美国之间的最重要的幕后活动是由美国情报官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北非及欧洲的官员掌握的。在危机中，巴勒斯坦人也许变成最重要的协商者了，即使侯赛因的入侵在巴解组织领导层引起了分歧。他们内部的争吵是关于一件事，即一位巴解组织的高级官员所说的亚西尔·阿拉法特对入侵的“不成熟的”支持。阿拉法特受到一些他最亲密的同事的严厉批评，其中包括阿布·伊亚德，他仍然是情报局在巴解组织中的主要联系人之一。伊亚德对一位阿尔及利亚的记者说：“我不愿意我自己的事业同阿拉伯地区的毁灭联系在一起。我们真正被夹在两处大火之间了。”另一方面，支持阿拉法特立场的人认为，是美国“哄骗了”侯赛因使他搞起他的8月征服的。他们也担心血洗波斯湾，那将永远结束建立一个巴勒斯坦祖国的愿望。在危机的高潮时，巴解组织的发言人巴萨姆·阿布·谢里夫说：“萨达姆的军队里这些人，他们杀起人来就像你吃小鸡一样。”谢里夫也许是提倡一种阿拉伯人解决僵局办法的最能说会道的发言人了；他曾几次出现在美国电视节目中，恳求美国给予时间让阿拉伯的领导者们协商一个伊拉克撤军方案，但是他的公开的努力失败了。

私下里，伊拉克人、美国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主要接触点是一位与巴格达有密切关系的欧洲商人；他的朋友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阿布·伊亚德，他希望侯赛因将无条件地离开科威特。在1990年12月和1991年1月，巴勒斯坦人和那位欧洲商人在欧洲举行了多次会议，会议记录均送交国务院官员们，伊亚德在描述那些会谈时说：“我们尽力而为，但是我们尚未发现一个共同点。”正如以往的谈判企图，侯赛因想为他的撤军要回点什么，而这种态度是白宫不能接受的。

就在看来伊拉克人在美国进攻以前不会撤军的时候，伊亚德仍然希望这种巴勒斯坦幕后活动会成功。他吐露：“让我说，贝克先生似乎很赏识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工作。你从不知道。”

然而，所有通过这个途径进行调停的企图，在1月中旬都最后结束了，是时阿布·伊亚德在突尼斯被阿布·尼达尔安插在他的安全卫队中的一名枪手所谋杀，阿布·尼达尔自己的恐怖主义组织是被巴解组织和中央情报局的一个联合计划摧毁的。尼达尔终于向他的敌手报了仇，正如他说过他要复仇的。一个血腥的时代。

所有的谈判都失败了，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加强了对美国主要使命的支持——伊拉克的军事失败。整个1月份，在这些政策讨论中，韦伯斯特仍是一个局外人；他仍在企图恢复他于8月份曾在白宫内部得到的那种高声誉，但那已经被他于12月作的关于美国制裁效果的蹩脚声明所降低了。当1月15

日最后期限临近时，韦伯斯特似乎茫然若失，不能确定他下一步的行动，并且为他在布什国家安全机构内部的地位而焦虑。他不仅被排除在几人小组之外，而且在中央情报局内部他也被看作是愈来愈不相干的人物。

他遇到的最坏的事情发生在8月下旬，他的忠实盟友、领路人、秘密工作队伍的使者、行动部的负责人理查德·斯托尔茨宣布他将于年底退休。这一着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了，但它仍然是一个打击。这个宣布也惊动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两个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把斯托尔茨看作韦伯斯特的得力助手。在美国国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中，韦伯斯特向两位委员会主席承认，斯托尔茨的计划“像一个真正的打击到来”并且“对我们（中央情报局的人）是一个真正的损失。”在行动部内部，人们接受这个宣布更镇静一些。行动官员们说，斯托尔茨看上去是明显地筋疲力竭了，由于伊拉克危机，他投入了使人劳累至极的时间，结果他的家庭生活也吃了苦头。他的一些同事回忆，他已经厌烦了中央情报局；还说，在韦伯斯特任期开始的时候，他曾经告诉过韦伯斯特，两年以后他将离开了。

斯托尔茨确信，没有他韦伯斯特能够处理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工作，他对他自己的助手托马斯·特威腾的给人深刻印象的工作也感到满意，特威腾有能力管理行动部的日常活动。在过去的两年里，特威腾给韦伯斯特的忠告是非常宝贵的，在情报局内部他已经就座成为他的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像斯托尔茨一样，特威腾对冒险不感兴趣，被看作一位保守的行动人员。可是，不像斯托尔茨，特威腾是一位中东问题专家，正是情报局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所需要的。斯托尔茨认为现在是新一代在七层楼上就座的时候了，他已经准备传递接力棒。

12月，在他的退休聚会中，斯托尔茨似乎特别被他的同事们的祝酒所感动。并不仅仅是由于他正在结束一项很有用的事业，而且还意识到由于某种原因中央情报局本身正在改变。老的守卫消失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正当青春年少之时被吸收进来的青年男女，他们曾经组成情报局的第二代的核心，如今已走到了他们事业的尽头。斯托尔茨、克拉里奇、乔治和一大批其他人已经提供了一座必须的桥梁，从曾经在情报局创立的早年领导过它的老战略情报局班底，过渡到一代新的更直言不讳的专家，他们既夸耀自己政治上的老练，又夸耀自己作为校官的经验。情况好像是情报局本身在渐渐退休。斯托尔茨是“靶子”明确的间谍战的一个象征——倒退到中央情报局集中主要精力对付苏联威胁的日子里。现在，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中央情报局新一代的官员们反映了情报局新的高级三位一体——托马斯·特威腾、理查德·克尔、“特德”·普赖斯——的态度，普赖斯已于早些时候接替格斯·哈撒韦当了反谍报的头头，而且被内定为特威腾的助手——行动部副主任助理。特威腾的提升证明一个中央情报局的雇员不需要先当一名大情报站站长或谍报官然后才能成为行动部的负责人。特威腾是情报局首要的幸存者，他曾顽强地超过了他的竞争者而成为中央情报局的最重要的代言人之一。然而，他被提名为斯托尔茨的接班人的主要原因，也许是他对行动部理想的绝对信奉。特威腾不仅保持了不受伊朗反对派事件的污染，而且他还努力使兰利远离它的影响。

相比之下，普赖斯被看作是怀有一颗官僚主义的冷酷的心的情报局内勾心斗角者。现在，他已经向上爬到了顶层，他显然感到他不再需要对正在退休的一代官员们那么尊敬，像他在以前的许多次场合那样。在一位行动官员

的退休聚会中，普赖斯甚至都没有跨出他的办公室，尽管欢送仪式就在邻室举行。这是老一代和他们的年轻接班人之间的裂口的标志。

普赖斯的态度是这新一代的缩影。他们自命比他们的前辈“专业化”得多，他们说，前辈人把自己卷入了浪漫的异想天开——在欧洲、非洲、亚洲到处跟踪克格勃官员们，并且通常和恶毒的人物“鬼混”。这年轻的一群声称，这类举动往往以灾难告终，恰恰因为老一代人倾向于用简单的方式看世界——像一场善与恶的争斗。情报局已经为这些过去的行为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结果已经失去了华盛顿官方大部分的信任。

另一方面，老一代情报局人员经常批评年轻的官员们为官僚主义的纸上谈兵者，说他们忽视了经过时间考验的传统。但是，甚至他们也承认中央情报局将被迫在一个较开放的环境里工作，恰恰由于他们过去的错误。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它不受欢迎。

对于许多中央情报局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退休官员们来说，普赖斯对那些仍在工作的他们的老同事的公开轻蔑，不仅是他缺乏礼貌的标志，也标志着情报局的紧密结合的工作方式和它是一个：精锐群体的意识正在遭到侵蚀。这些新的领导人不再是被爱国主义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所促动的、有教养的、穿宽松裤子的知识分子，而是专家政治论者和组织者，他们的行业专长就是猜疑，他们之所以能迁升高位，应归功于他们跨过他们的同事们身体的能力。正如一位老情报局官员所抱怨：“这些新人是令人遗憾地没有准备好去和九十年代的现实打交道。如果他们认为我们过去只和一个国际敌人打交道很容易，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同整整一群敌人打交道的。”

然而，至少在 1991 年敌人只有一个。

五角大楼把它的新军事主义称为常胜军战略，但是，它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内战时期，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和威廉·谢尔曼将军都曾使用过同样的战术，当时他们在里士满和亚特兰大连打兵员不足的南部邦联军队。他们率领的汹涌的潮水般的蓝衣士兵有时把名字用针别在制服上，预期他们的阵亡。进攻总是很典型地以密集的炮火轰击为先导，有时炮击延长到几个小时。当格兰特的军队最后向南部邦联的首都发动全线猛攻时，他们发现的是空的战壕。联合部队为波斯湾战争所作的准备中的主要区别在于，在最后的进攻之前，先有一个月之久的空中轰炸，那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了。在 24 小时之内，联合空军确实从天空把伊拉克的战争机器一扫而光。

五角大楼的军事主义向中央情报局提出了独特的要求，它的任务是评估联合部队的无休止的空袭的效果，从伊拉克军队和平民的士气到被摧毁或损坏的军车的实际数目。在科威特和伊拉克南部移动的每件东西都要计数，然后再计数，再评估。任何移动的东西都被炸毁，如果它再移动，它就再被炸。主要目标是原子能的和化学的设备、飞机场、指挥和控制的掩体，最后是伊拉克军队本身。次要目标包括发电站、污水处理工厂、电话系统、通讯塔、桥梁、铁路线。但是，给予中央情报局的最最重要的任务是评估伊拉克的制造战争的机器——由侯赛因支配的部队运输工具和坦克——的数量和质量。

任何政府机构被轰炸所毁，中央情报局多半提供最保守的估计。到了 2 月初，情报局估计伊拉克被炸毁的军用车辆总计为百分之十四——根据五角大楼的标准，这个百分比是低的。在国防部流传着的玩笑说，如果中央情报局评估炸毁状况的官员们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是一辆坦克的炮塔在河的一

边，而坦克的身子在河的另一边，他们就报告说那辆坦克被损坏了——因为它还有一部分留在那里。根据一位国防情报局的情报官所说，中央情报局的“疏忽错误”是“经常的和传奇似的”，因为“他们不愿意受到责备，如果我们进入那个地区突然遇到强硬的抵抗的话。”情报界的分析家们对这类指责也有所反应，他们说，五角大楼的策划者们经常选错目标，摧毁伊拉克的进行战争的能力、它的发电和石油工厂，而不是它的真正的军事构成。他们论证说，在侵入以前，差不多百分之七十的伊拉克的电力被毁掉了，还有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它的石油生产能力也被摧毁了，而伊拉克的前沿部队——共和国卫队的伤亡人数却比五角大楼策划者们所声称的要少得多。

从战争的第一天起，高阶层的军事官员们就卷入了关于轰炸毁坏评估的争论中；他们抱怨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太含糊，以致它们毫无用处。一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回忆：“到处都是防止误解的说明，因为中央情报局不能确定，它的报告真是一点儿什么都没告诉我们。”有关评估的争论不同于在越南战争中发动的有关情报的斗争，那时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经常指责他们的五角大楼同行，说他们毫无根据地给人一种乐观主义的看法。在东南亚，结果是中央情报局对了，五角大楼错了。现在，在波斯湾，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显然记得那早年的教训并且相应办理。他们毫不动摇地争辩说，最好是可靠一些、更确定一些，免得发现情况不是那样而浪费了美国人的宝贵生命。

然而，按照任何客观的标准都不可否认，中央情报局严重地错误估计了伊拉克隐藏和发射它的活动的飞毛腿导弹的能力。就在联合部队的空中袭击开始以后，伊拉克向以色列发动了第一次飞毛腿导弹袭击，五角大楼对兰利用高技术方法准确判定飞毛腿位置的无能感到非常灰心丧气，因此它派出搜索机组进入伊拉克南部和西部，自己去寻找导弹的下落。中央情报局没有能够获得导弹发射场地的电子踪迹，被认为是美国信号截取能力的一次故障。问题的一部分在于，首先情报局少算了伊拉克能够部署的导弹的数目（一位情报分析家说：“大约相差三百。”）。它还低估了伊拉克在卡车上安装粗糙的但致命的导弹发射器的能力。军官们向新闻界发牢骚，为了搜索飞毛腿导弹把空军的人力物力从其他目标上拿走了，最显著的目标就是巴士拉南面的共和国卫队精锐部队。

在最紧急的事件中，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和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麾下的情报官员们就忙于进行一场关于轰炸效果评估的“长距离叫嚷比赛”（某位军官的描述）。施瓦茨科普夫本人也加入了竞赛，他批评在沙特阿拉伯的情报局情报官员们未能及时地把情报报告送给他的指挥官们。他的主要抱怨（战后在国会听证会上又重述过）就是情报局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当它终于提供了一些，那信息已经过时了。中央情报局对那爆发不满，拒绝改变它的保守政策。因此，施瓦茨科普夫自己的军事情报官员们依靠他们自己的“瞄准器”情报报告，研究轰炸照片来判断他们是否已经把特定的目标敲掉。

战争以前和以后，中央情报局都未能恰当地估计伊拉克制造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能力。关于伊拉克的这些危险计划的无数报告和评估经常是混乱的和模棱两可的——一个确凿的标志表明中央情报局不知道侯赛因的能力的最大限度，在入侵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每当兰利的官员到白宫呈递一份有关这个主题的较重要的情况简介时，他们都被迫去复查他们的1月份美国轰炸战役前夕的统计数字，再复查2月份的。但是，最令人尴尬的事件发生在战争

结束后不久，一位伊拉克科学家叛逃到西方，他带来了关于几处隐蔽的伊拉克原子能设施的报告。他的证明清楚地证实了中央情报局曾经低估了伊拉克的原子能发展计划。

也许最坏的战争情报失误发生在2月13日凌晨几小时内(巴格达时间)，当时美国的战斗轰炸机突然袭击位于巴格达郊区的阿马里亚的一处他们认为是指挥掩体的目标。两架可以避免雷达的F-117A每架仍下了一颗重磅的激光引导的炸弹，炸弹穿透厚厚的混凝土墙壁在阴暗的地下房间里爆炸，炸死了数百名睡梦中的无辜男女和小孩。确定轰炸目标的情报直接来自中央情报局对伊拉克流亡者和一些外国工程师的访问，那些工程师说他们曾被伊拉克政府雇用去改建那座掩蔽所以充作军用。这场灾难引起全世界的强烈抗议，而布什政府对此的反应是说侯赛因很可能利用平民百姓去“促进他的战争目的”。白宫和五角大楼都为这次轰炸辩护，坚持说，毫无疑问那个掩蔽所是被用作一个军事指挥中心的。

但是，在海湾战争中曾担任五角大楼顾问的前国防情报局局长佩罗特斯中将后来对英国广播电视记者汤姆·曼戈尔德披露，那次轰炸是一次基于美国过时信息的很糟的错误判断。他不安地、激动地进一步证实：“那是旧的情报。我们本来是绝对不该轰炸它的。”佩罗特斯瞧不起中央情报局在海湾战争中的表现。他说：“哦，见鬼！中央情报局从来没有过一次好战争。威廉·韦伯斯特在那里是绝对地毫无办法。”

正好在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发动“沙漠风暴”行动前24个小时，布什白宫内一位无名的官员向韦伯斯特和中央情报局发动了一场连珠炮似的攻讦。这次批评比以往任何攻击都更尖刻，并且具有真实性的刺；就好像是韦伯斯特正在被公开训斥。源于这位匿名的信息提供者的报道，发表在2月22日的《费城问询报》上。文章比以往两年一直折磨着韦伯斯特的指责——说他无能，不胜任——走得更远。那位官员提到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关于海湾危机的情况汇报会上的表现时说：“他可怜又软弱。他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想法。他不知道拿情报局怎么办。”文章还引用了参议员阿伦·斯佩克特的话。斯佩克特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一位资历较长的成员，他抱怨说：“情报界实际上是无舵的。”《费城问询报》报道，韦伯斯特是为他的蹩脚的表现而“受到攻击”，他是被故意地排除在白宫关于战争的会议之处的。

这些批评使人感觉到一场迫使韦伯斯特辞职的配合得很好的运动。一位政府高级官员、总统的密友认为，反面的评论都是罗伯特·盖茨发表的。可是，与10月攻击的形势不同，这次白宫没有一个人出来发表声明支持中央情报局局长。韦伯斯特的电话仍然不响。这一次中央情报局官员们没有明确地排除苏努努或盖茨就是批评的作者的可能性，虽然私下里他们确信盖茨应对《费城问询报》的攻击负责。官方的反应是简洁的。中央情报局的发言人马克·曼斯菲尔德说：“总统表达过对韦伯斯特法官的充分信任。”他强调韦伯斯特是“全面负责”的，在波斯湾危机期间他曾经“每天向总统作情况汇报”，他坚决否认在危机期间中央情报局没有作出成绩。也许是意识到这次他的上司是真正遇到了麻烦，曼斯菲尔德又补充了他自己的坚定的看法：“韦伯斯特法官是最近25年来伟大的公仆之一。”非正式地，韦伯斯特的支持者们很活跃，他们把《费城问询报》的报道描述为“卑怯的胡言乱语”，是“令人惊讶地无知和充满了轻蔑的引语。那个匿名的‘软弱又可怜’的引语纯粹是瞎扯。”

对于某些人来说，肆无忌惮的反应是一个信号：韦伯斯特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承认：“不祥之兆已经出现。”他私下推测李洁明已经被布什选定为韦伯斯特的继任者。

韦伯斯特特别被那报道所扰，直到2月底他都在努力聚集起一道防御工事。可是，很不幸，他发现他不能指望从那些过去曾保护过他的人那里得到支持了。甚至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维·博伦也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表现的令人吃惊的态度大转变的文章。博伦是韦伯斯特的最大的国会后援者之一，他是一个可以因后者被批准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而出名的人。最近，博伦曾经给韦伯斯特“最高的分数，为了他为人正直，品格端庄，熟知法律……也许是情报局曾经有过的获得最高分数的人。”但是现在，1991年2月。博伦暗示，在波斯湾危机中，韦伯斯特的局务管理是不能接受的。他说：“我根本不认为我们有好的战略情报。”

博伦仔细地选择字眼儿补充说，他的委员会“并不想去管理中央情报局，但是，很清楚，在今后的半年至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将不得不查看情报局。”这位参议员还向助手吐露，韦伯斯特的处理中央情报局局长工作的方式方法，在为什么情报界需要改组的问题中，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事例。

众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新领导人众议员戴夫·麦科迪参加了博伦的这番努力，他保证他将成为一位敢作敢为的主席。他说：“作为一个失察的委员会，我打算重新建立我们的信用。我们不会成为怕见场面的人。”然后，他发表了一份致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个人警告。他宣布：“我打算面对韦伯斯特法官。”麦科迪代表了众议院委员会成员中一种新的态度，他们确信，在波斯湾危机中，作为国家首要的情报组织，中央情报局把它的任务搞得一团糟。麦科迪认为，情报界的彻头彻尾的改组是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他争辩说：“光把门上的姓名换一换或光把组织图表上名誉不好的人换一换，那是不够的。还有很多增加的地区需要注意。会说阿拉伯语的人（在中央情报局）的数目是无底的。往后10年所需地区专家的数目是同样无底的。那是不光彩的。”

几位参议员都有类似的方案。在美国士兵解放科威特以前的一个月，纽约的参议员莫伊尼汉提出“废除某些冷战法规的议案。”他提倡实际上解散中央情报局，把它的主要职能移交给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他的议案实际上是为更严肃的改组建议打掩护的，但是，它表达了一种逐渐形成的舆论，那就是，冷战结束了，在美国情报的优先次序方面应该有个较大的转变。显然，参议院也没有忘记伊朗反对派事件，尽管韦伯斯特坚持不懈地努力把污点从情报局身上擦掉。莫伊尼汉在参议院陈述：“这个议案将重新坚持一个也是在冷战的迷雾中失去的最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在国家安全事例中执行单位不得采取法律权力以外的手段来逃避法律。”

对韦伯斯特来说，那一定似乎是房顶正在坍塌。不仅他突然被剥夺了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相当大的权力，而且他不得不依靠一群助手的忠告，这些助手都是情报专业工作者，对国会的那一套很不熟悉。不像已离去的理查德·斯托尔茨、比尔·贝克、吉姆·格林利夫，新班子对他不够了解，当他受到攻击对也没有在他身旁工作。韦伯斯特得到特威腾、克尔、普赖斯和德特兰尼的欢心，但是，事情很清楚，他们不会为他做出像斯托尔茨在吉罗迪政变的黑暗日子里曾经做过的事。在2月剩下的日子和3月，中央情报局的谣言厂流传着一些有趣的可能性：韦伯斯特将突然宣布退休并很快离开中央情报

局；他将设法抢救他的位置；他将通过新闻界向他的贬低者反击。可是，对那些最了解他的人来说，毫无疑问韦伯斯特将继续是布什的忠实士兵直到最后。他将体面地谦和地退休，赞美布什和布什将选出的继任者，安安静静地回到一个律师的私人生活中去。他将享受网球运动，收集有作者亲笔签名的书籍，到华盛顿的社交场合转转。像克拉里奇、凯夫、乔治和一大群其他的他的前任一样，他实际上在这个岗位上呆的时间比任何人曾经预言过的都更长久。

美国在波斯湾的胜利，是一次军事计划、小股部队训练和纯粹武力的令人惊讶的炫耀。从战斗开始的时刻起，关于谁将得胜的问题从来没有任何怀疑。1月初，一位很自信的国防情报局官员说：

“甚至都不会有近战，你看吧。”

1991年2月23日晚，沙特部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科威特南部攻击了伊拉克的主要战线。它是一次佯攻，目的是把伊拉克步兵部队钉在适当的位置。再往西，一整军团美国兵蛙跳般地向北前进，深入到伊拉克南部，然后迅速转向东，包围了科威特，切断了数千名伊拉克士兵与大部队的联系。这个大胆的策略超过了它的预期效果：伊拉克士兵整师整师地投降了。90个小时的战斗，战争实际上结束了，泛阿拉伯部队开始进入科威特城的南部郊区。再往北，尚未受损的共和国卫队的残余部队缓慢地朝什叶派控制的城市萨夫万、纳西里亚和巴士拉退去。在最后一阵发作中，美国飞机屠杀了沿着科威特城北面一条单独的公路撤退的伊拉克士兵。

布什总统最后决定停止战斗。他告诉他的高级助手们他要“结束杀戮”，但他是想到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罗伯特·盖茨给他的忠告，他们两人都毫不动摇地坚持，一旦科威特解放了，任务就完成了。他们建议美国军队应该呆在伊拉克，直到弄清楚全部美军俘虏的数目和伊拉克战地指挥官签署了正式停战书时为止。但是，不能呆得更长久。特别是盖茨，他提出了希望：萨达姆·侯赛因是如此被削弱了，以致他将被他自己的官员们推翻。很清楚，动摇巴格达政权的努力没有成功：侯赛因的政权有些摇摆，但是，还没有人发动最后一击。

在战争的最后几小时，盖茨向布什表达了他的忧虑。他担心侯赛因将被一个甚至更激进的反美领袖所取代，他担心一位来自那个独裁者内部圈子里的什叶派教徒能够接管伊拉克政府。盖茨似乎是暗示：如果侯赛因幸存下来，可能还好一些。但是，当布什问他是否认为伊拉克将爆发一场什叶派暴动时，盖茨说他不会发生。

盖茨错了。伊拉克投降以后，伊朗支持的什叶派造反者占领了纳西里亚和巴士拉。战斗是血淋淋的和残忍的，在有些事例中超过了2月下旬的灾难性的美国入侵。50多万伊拉克公民成了难民，将近10万人被杀。纳西里亚的战斗特别剧烈，由于精锐的共和国卫队近距离平射的炮弹穿入了掩蔽什叶派兵士的房屋和商店。双方都有数不清的死刑。布什政府决定不干预。一位政府官员解释道：“我们指望，当骚乱恶化时，军方或巴什党领袖们夺去他（侯赛因）的权力。”

当蔓延开来的造反在伊拉克的广大库尔德人中点燃一场叛乱的时候，在白宫引起了一场关于美国是否应该干预的辩论。最初，主张进行干涉的人——包括五角大楼的官员甚至布什本人在内的一伙人——占了上风。3月13日，布什宣布美国飞机将击落任何被用来镇压叛乱的直升飞机。一个星期以

后，两架伊拉克喷气式战斗机被从天空赶出去了。但是3月26日布什决定让叛乱自然地发展，不要美国的帮助。

白宫关于叛乱的讨论的确切细节尚不为人知，但偶然得到的有关证据表明政府有意地决定让侯赛因在南方屠杀他的敌人。对什叶派叛乱的杀气腾腾的反应是仔细安排的；白宫允许侯赛因在伊拉克南部自行其是，在他使用化学武器和飞机方面划了一条线。在美国，无论什么样的反对这项政策的抗议，都被庆祝美国的势不可挡的胜利的欢呼声压下去了。也没有任何一个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不同意华盛顿的决定。在沙特阿拉伯的北部边境出现一个什叶派国家简直是太可怕了。甚至并未受到叛乱的直接威胁的埃及也表达了时伊拉克的“领土完整”的关切，“领土完整”是一种代用语，意思是说，决不允许伊朗利用伊拉克南部的灾难。3月28日，萨达姆·侯赛因用他的完整的共和国卫队发动了一次大反攻。一个星期之内，南方的叛乱被压垮了，后来，当侯赛因把他的军队向北移动时，库尔德人也遭受到无休止的折磨。

4月初，当战斗开始时，受过特别训练的中央情报局准军事小组11人降落在伊拉克北部。仍然存在一线希望：库尔德人可能获得一个较大的胜利，建立一个半独立的库尔德国家。他们甚至可能在侯赛因的内部圈子里点燃一场叛乱。为了更换领导，这是最后的机会。4月初，中央情报局小组已经成功地同库尔德造反领袖们接触过。可是，短时间以后，小组的头号政治官员得出一个暂时的结论，这个结论后来证明是太准确了——库尔德人的叛乱将失败。

它是一个何等壮观的胜利：美国军队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伊拉克士兵，其中一部分是在科威特南部被活埋在他们的战壕里的。生命的丧失比得上空袭战役在伊拉克的基础结构上所获得的吓人的重大代价；联合国秘书长说那个国家已被降到了“一个工业化以前的时代”。另一份报告警告：在伊拉克有17万5岁以下的儿童将要死亡，除非立即采取步骤去修复那个国家的净水设备。此时，在华盛顿，这些恼人的数字并未使人们对乔治·布什的胜利的普遍赞扬变得暗淡。这个国家的注意力很快就转向了其他事情。

“ 盖茨门 ”

八十年代得到了一个“ 间谍的十年 ” 的绰号：1982 年，叛徒、中央情报局官员埃德温·威尔逊因出售武器给利比亚而被捕；1985 年，乔纳森·波拉德被指控把机密文件给了以色列，约翰·沃克因向苏联人出卖机密而被捕。在那同一年，爱德华·李·霍华德叛逃到苏联；而克格勃的叛徒维塔利·尤尔岑科变成“ 逃跑了的间谍 ”。最后，1986 年，关于美国向伊朗的秘密开放和美国在尼加拉瓜的不大秘密的战争二者的暴露，将中央情报局置于新的调查之下，然后，导致 1987 年的关于伊朗门丑闻的听证会，听证会上暴露了大量的关于情报局如何指导它的行动的信息。当威廉·韦伯斯特接替威廉·凯西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中央情报局遭受猛击正在流血。

可是，在以往 10 年中，没有一件事能比得上 1991 年令人吃惊的大暴露。虽然没有人由于向恐怖主义分子提供武器而被捕，或由于为一个外国政府当间谍而被捕，在乔治·布什总统任内第三年暴露出来的秘密仍然是惊人的。40 年来第一次美国人民看到了中央情报局的幕后情景，知道了在那里工作的男男女女自己同自己交战——而且进行了许多年。

1991 年将是“ 中央情报局年 ” 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 1990 年 11 月，当时任职 12 年之久的老练的分析人员约翰·金特里辞去了他在资源、贸易和技术室（它的前身是全球问题室）的职务。1991 年初，他写给情报部主任约翰·赫尔杰森的辞职信在情报界和国会广泛流传。金特里的信给人一种暗示：事情将会发生。

“ 我不能再在一个组织里工作，在这个组织里，官僚主义的上级的满意比优良的分析更重要；在这个组织里，关键的分析上的问题往往是‘ 上司真正要什么？ ’ 而不是‘ 什么真正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有意义？ ’ 在这个组织里，智力的完美从属于上级的需要，这对于官僚主义的成就是必要的；在这个组织里，分析家们对‘ 经理们 ’ 的畏惧已经制造出一支“ 受惊的兔子 ” 的分析队伍；在这个组织里，分析家们被降低到研究助手或宣传员之类的角色，为负责终审的事实上的高级分析家们服务，这些高级分析家们在情报部的产品中注入了个人的政治见解和愿望，而不顾事实或分析家们的判断。 ”

金特里不是从情报局辞职的第一位分析人员，但是，不同于以往那些人，金特里的政治动机是不成问题的。从外表上各方面看，41 岁的前美军特种部队军官和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联谊会经济学家是一位头脑冷静的保守主义者——因训练而成为一名军官，因选择而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他不是那类提出希奇古怪的或没有根据的要求的人。金特里长得又高又瘦，对人热情，他走路时的大踏步完全配得上他的军事训练，看上去没有任何个人野心。他在辞职几个月以后说：“ 我不期望致富或出名，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或中央情报局。” 辞职以后他掌握住不搞个人攻击，不仅是为了保守他对中央情报局安全官员们所作的诺言，也是为了给他的意见以更大的可信性。记者们想知道他对赫尔杰森、克尔、盖茨、苏联分析室主任乔治·科尔特等人的看法，他典型地摇了摇头。他回答：“ 我不能指名道姓。 ”

即使如此，很清楚，所有这 4 个人特别是乔治·科尔特都是他的目标。金特里在他的辞职信中对赫尔杰森说：

为这样一位部门负责人工作真正地令人厌恶，他命令根据一条剪报写一

篇政治上有针对性的当前的情报论文，不顾无数的相反的铁的事实，不顾我的相反的判断，也不顾情报部其他部门的反对。在讨论问题时，我的科长询问我对欧洲分析室的忠诚，而不是对诚实、对情报局、对国家的忠诚。这些人多次重复他讲清楚，他们打算为一批政治上的赞助者服务，有选择地使用他们的数据记录——往往挑选已被无数的更可靠的报道驳倒的信息片断。

金特里提到的部门负责人只能是科尔特。金特里后来重复说：“我不能提任何人的名字，但是，我要说，苏联分析室主任是这个问题的一大部分。”

金特里信中的其他指控甚至更具有爆炸性。他声称（在一次辩论中）一位“部门负责人……威胁要杀掉一位分析人员”，一位主管人“承认有神经官能症，在我看来，他的行为举止像那种病，在关于美国情报机构访问外国情报官员的能力问题上，他容许一个职员经常撒谎。……”在另一个事例中，一位科长“重复地故意地改动文章中包含的事实……据说是为了使句子和段落更有可读性。”另一位科长“从我的办公桌里偷我的个人财产。”更有另一位高层官员。“仔细检查分析人员们的办公桌，以便发现（用他的话说）在他的科里他拥有‘哪种分析人员们’。”

金特里谈话也同样坦率，挑选出盖茨——虽然很小心地没点名——作为对兰利的“当前文化”负主要责任的人。在离开情报局几个月以后，他解释说：“我所看到的就是中央情报局的官僚主义化。它始于白宫的那个当过凯西的副手的家伙。”

金特里的一扫无遗的批评触及中央情报局的每个部分。他不仅指控科尔特和盖茨，也指控克尔和赫尔杰森作为“对缺乏完整性负重大责任的领导者，（缺乏完整性）是情报局的（主要）危机。”顷刻间忘记了他永远不提中央情报局官员们姓名的诺言，金特里证实“赫尔杰森被我的辞职搞晕了。他的态度是‘这简直不可能是真的。’就像他从未听说过有任何问题。他的声调是‘你就是头脑不冷静’。”另一方面，克尔——或者更确切地说“副局长”，像金特里称呼他那样——是“够有风度的，还行”，但是一个“惯于找借口”的人。金特里说不只是他一个人有这种感觉。他回忆说，1990年初的某个时刻，一群分析人员怂恿他把他们的抱怨转告克尔。尝试了许多次以后，他终于在一个情报局的报告会上拦住了他。金特里告诉他，情报部道德败坏，大批的分析人员们认为它的情报产品被政治的利害关系污染了。克尔很有礼貌地听着，但耸耸肩对那些抱怨表示不屑理睬。金特里记得他说的话：“如果这些人认为情报局的管理方式有问题，那么，对他们来说，解决的办法就是离开。”

在金特里辞职的两个半月内，几位重要的情报部官员决定听从克尔的忠告。这些辞职者中最重要的是——一位高级经济学家，他在情报局工作已有20多年；这是情报局担负不起的令人沮丧的损失。但是，那些空缺只是它的最初的问题的开始：正是伊拉克侵入科威特的那一年，情报部全体波斯湾专家中将近“百分之五十”离开了情报局，因为他们对他们的部门和情报部的管理方式“极其厌倦”。根据这个提供消息者所说，在波斯湾危机期间，3位关键的近东和南非室的分析家离去了，尽管情报部的官员们请求他们留下。他们的辞职使情报局的情报能力非常紧张。他们提出辞职的理由完全相同：管理不力，缺乏完整性，以一种约束的态度对待分析家。一位有见识的分析家后来抱怨道：“侵害分析专长的大部分责任在于情报部内部缺乏领导。”

由于这些悄悄的离职没有受到一般公众的注意，情报局的高级行政人员

大体上忽视了这个问题，他们继续描述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评估为“推理好，写得好，论证仔细，很有意义。”金特里坚持认为情报部的产品完全不是那样。他指出：“服务的愿望变成了使人满意的愿望，生产好作品的责任变成了使各级上司满意的责任。”情报局对这类不满的反应趋于缄默，遵循在韦伯斯特任内订立的标准：中央情报局服务于总统，使总统对它的情报产品毫无挑剔。在此期间，中央情报局的捍卫者们轻率他说，这些人辞职是由于“对这项工作造成的压力的普遍不满。很多这样的人就是不能接受这项工作。”可是，这些同样的论证却不能用来转移比较年轻的分析人员们提出的批评，为了实现他们自己的抱负，他们的事业刚刚开始。

这些相对的新来者之一就是斯蒂芬·A·埃默森，辞职以前他作为一名中层分析人员仅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8年。像金特里一样，埃默森在决定离开以前曾试图在内部提出他的批评，但经常被情报部的高级行政人员断然拒绝。他于海湾战争结束后5个月离开了他的工作，而且只是在他想引起内部改革的所有企图都消耗殆尽以后。埃默森在他给赫尔杰森的辞职信中写道：“看到如今在情报部的出版物中被当作‘分析’的东西是令人悲哀的。在生产进料过程中，扎实的、有见识的、熟练的分析往往避而不用，反而赞同危言耸听者、哗众取宠者和高级行政人员的愿望。”埃默森说，在迫使他作出决定的最令人烦恼的倾向中，是“太常见的篡改分析（甚至真实的信息）以便使它符合情报局高级人物或美国制订政策者的观点。”换句话说，埃默森又重新提出了那些标志着凯西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期最坏时刻的连续不断的指控：情报局的产品是“政治化了的”，高级分析家们不顾事实而撰写评估材料。

埃默森声称中央情报局没有从伊朗门丑闻的教训中记取：

最令人烦恼的倾向之一就是在情报局内部那种微妙但清楚地忽视法律的倾向。尽管有七十年代的国会调查，有八十年代的教训，那里许多高级官员仍然保持一种普遍的信念：情报局是超越法律的。而且，情报局和情报部的官员们是太愿意超越他们的权限并把他们的判断来代替行政当局和国会的判断了。事实上，总评议室的一位高级官员有一次曾告诉我：“情报局不必要遵守法律；它可以干它想干的一切。”

埃默森把他最尖锐的词句留给赫尔杰森本人：“我和你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是极令人扫兴的；你显然是宁可相信那种情况根本不存在。”

面对这些越来越多的内部批评，韦伯斯特继续捍卫情报局的产品，即使在他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4年中他曾6次下令研究这个问题。没有一次是有帮助的。虽然他坚持说情报局的文件反映了局里一些最献身干事业最坦率的专家们的意见，他的最亲密的助手们说，他不断地为他应该如何同中央情报局最聪明的头脑的脑出血症打交道而苦恼。他的迟到的结论是生产评估的制度需要一次完全彻底的大检修，但是，到那时他断定由他来开始改革已经太晚了。

金特里认为韦伯斯特失去了一次施加真正影响的机会。他说：“协作的过程很坏很坏，最后你得到的是一份最浅薄的一般水准的文件。那就是在情报部的共同经验。一种不同意见是从来不摆出来的。整个组织用一个声音说话。那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

韦伯斯特没有采取行动，因为他被对抗的力量挤在中间。一方面，白宫要求他更严格地掌管情报局，意思是说，期望他使情报局的最坦率的异议人

士保持安静。另一方面，他受到一群事业心强的中层官员们的压力，要他发动一场政策的全面改革，特别是在情报部内部。问题在于，由于韦伯斯特缺乏外交政策经验，这就迫使他依靠高级官员们(如克尔、赫尔杰森、科尔特)，那些高级官员中有许多人都因他们的职位而感激盖茨。

波斯湾战争快要结束时，韦伯斯特成了一位跛脚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他的作为情报界首脑的地位已多次引起异议，因此他不可能推行必要的改革从而把情报局带入一个新纪元——即使他曾经想那么做。紧跟着《费城问询报》发表那篇文章之后，韦伯斯特与情报局的中级官员的关系比以往更孤立。他还处于一个很不自在的地位：他是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而他的意见在白宫内部却被忽视了；他甚至不能得到总统接见以便陈述自己的观点。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在4月份说：“不祥之兆已经出现，总统要他走。”

在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在韦伯斯特的每日情报汇报会后，他向一些他的高级助手们说起他在考虑回到平民生活中去。这是一句随便说的话，但是韦伯斯特知道他的话是会传入椭圆形办公室的。根据以往的情况，这样一个谣言立刻就会从总统那里得到一张信任票，采用电话问询的方式或一篇公开的声明。这一次只有缄默。在以后的几天里，代表韦伯斯特从中央情报局打给政府高层官员们的焦急的电话，询问白宫计划任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信息。这种用心良苦的征询意见的情况不妙。一位韦伯斯特的坚定的盟友对一名记者嘟囔着说：“看起来也许是李洁明。”绝望中他又说：“报纸上有没有什么关于他的材料？我们有可以用来反对他的材料吗？”

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里，韦伯斯特决定不再拖延马上行动。他直接通知白宫他打算离开情报局——为了给总统一个试图劝阻他的最后机会。再一次没有反应。5月7日傍晚，韦伯斯特带着他的最后决定访问了布什；他说，是离开的时候了。按照韦伯斯特的请求，宣布他离职的新闻发布会定于次日上午一大早举行。

韦伯斯特从马里兰郊区他的家乘坐司机驾驶的轿车独自一人抵达白宫，正好赶上和总统作一次简短的谈话，总统以明朗的微笑和长时间的握手向他致意。站在白宫新闻室外面长长的过道里，布什抓住机会亲自向韦伯斯特致谢，感谢他为政府做了几年工作。布什一只胳膊搂着即将退休的局长并称他为“老朋友”，这是一种不常见的公开的钟爱的表示。罗伯特·盖茨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一旁看着，以微笑和点头表示他们的同意，然后和总统一道对韦伯斯特加以过份的赞扬。

布什陪同韦伯斯特走过门厅进入灯光明亮的房间，在这个房间里，主要的电视网为了总统的特别报告而中断了他们的上午新闻电视节目。然后，既有充满活力的世界范围的观众在观看，又有韦伯斯特站在他旁边，布什开始了：“怀着强烈的骄傲感——为他的成就和他长期献身于祖国的服务而产生的真正的骄傲感，我宣布比尔·韦伯斯特通知我他打算从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位退休。比尔给这个国家的许多情报收集行动带来了完善、效率和洞察力。他做了出色的工作。”

这是一篇由一位明显地感到不自在的总统发表的过份地正式的声明，这位总统十分了解，退休的宣布完全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惊讶。布什意识到缺乏戏剧效果；他重复了好几次这是“他的(韦伯斯特的)决定”，没有人挤他出去。那天上午最令人沮丧的时刻出现了，当时布什搜索枯肠罗列韦伯斯特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所取得的成就，他说，韦伯斯特的主要成就就是他“遵

循本届政府开始时我制订的方针和准则”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他服从命令的能力。

下面，布什无意中说了句真话，暴露了中央情报局对他的政府的影响事实上是很小的。他想说的是韦伯斯特与凯西不同，他没有把自己卷入政策决策中去。但是，他真正说的是——用改头换面的方式一来自中央情报局的信息对白宫的行动没有影响。布什说，韦伯斯特在任几年的特点就是“情报并不试图去塑造政策。”听到了这句顺口说出的话，韦伯斯特露出了一丝苦笑。

那恰恰是问题之所在，是韦伯斯特的最大的失败，由于坚持中央情报局应避免政策的制订，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他曾经婉言拒绝参加政府的最重要的讨论。他希望这么做以保持情报产品不受政治考虑的限制。可是，那个出于善意的原则仍然是他遗留下来的最令人困惑的事物之一。韦伯斯特自己谢绝了政策讨论，他就永远不能对总统说他作出的决策没有事实根据，像他曾经答应过的那样。他曾经有过这样做的机会，那是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的一个星期，但是他被忽视了；乔治·布什说，他有比中央情报局更好的信息来源。没有人知道，如果当时韦伯斯特告诉布什说他忽视了一场即将来临的灾难的明显迹象，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其结果不可能更坏，而且，如果美国根本没有中央情报局，其结果可能还是一样的。布什是对的：中央情报局的评估与形成政府政策关系不大，如果它们真有什么作用的话。

威廉·韦伯斯特是一个非常友好善良和正直诚实的人。他很聪明，表达力很强，具有一种高度文雅的幽默感。但是，他永远不能克服白宫官员们或他拼命寻求他们的忠诚的那些普通专业人员们设置在他的道路上的巨大障碍。最后，这两种人都抛弃了他。4年来，布什的高级助手们暗中破坏韦伯斯特对中央情报局的控制，怀疑他的效率和领导才能，有时还为他们自己的失败而责备他。那些攻击是卑鄙的、偏狭的、眼光短浅的和恶毒的。在兰利，一大群改革者本来可以吸收韦伯斯特为他们对改革的渴望服务，或坚持让白宫不要只顾自己的计划也应该听听他们说些什么。相反，那些在行动部和情报部中最需要他的人开他的玩笑，传播关于他的夜生活的谣言，对他最近在海外的辉煌成就散布流言蜚语，贬低他执著的诚实，似乎它是某种中产阶级的装模作样。

新闻界和国会也加入了这场喧嚷。记者们抱怨韦伯斯特欣赏华盛顿社交场面的乐趣，在每周出版的新闻杂志上得了一个“不赞成”的评语，同国会打交道太坦率，网球打得太多。而且，他看上去不够份儿；他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与总统关系不密切，在政府的议事会议上人们都不听他的发言，而且还出现过很普通的错误；他只是一个“过渡”局长。情况差不多是这样：似乎每个人都害怕在凯西的领导之后，国家会在某个国际危机当中无所事事。在国会，参议员博伦和情报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开始曾为他的坦率而称赞他，后来，当他们认为在波斯湾危机中情报局的工作未能达到标准时，他们又转过来指责他。布什政府官员们在他背后称韦伯斯特“无能”和“可怜巴巴”，但是，他曾经比任何一位高级政府发言人更接近于预言国家将面临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盖茨和切尼正在论证[苏联的]“公开化”和“改革”是过时的风尚，那位曾经不知道摩洛哥位于何处的人如今正在告诉每一个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革命的。

· 韦伯斯特是对的，他们都错了。

在中国和东欧，韦伯斯特的中央情报局猝不及防地被人抓住把柄；它也

未能使阿富汗的内战结束；它的使曼努埃尔·诺列加下台的企图也失算了；但是，它在其他战线获得了给人深刻印象的胜利。韦伯斯特、克尔和中央情报局其他官员一贯地争辩说：世界范围的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扩散将是即将到来的10年的最重要的问题；美国需要开创一项经济谍报计划；南斯拉夫将陷入内战；苏联的经济形势将坏到成为国际危机的程度：伊拉克将侵入科威特；戈尔巴乔夫面对着来自他自己的政府的威胁；北朝鲜在发展核武器；中国的异议人士可以搭救也值得搭救。有许多形容词可以用来形容这份记录，但“无能”和“可怜”两个词不在其中。

尽管如此，情况也很清楚，韦伯斯特对他自己的垮台也出了一份力。他的培养宣传员的企图是不恰当的，一个时期当情报局的官员们正在对公开性进行长时期辩论的时候，他把中央情报局的公共关系办公室变成了一窝实质上的广告员。当他们谈到他的时候，极力控制住控制他们对他的歌功颂德。他们推进韦伯斯特的一套管理中央情报局的方式方法，反复论证他的“巨大的能力”和“夜以继日的工作时间”，说他保持“总统的信任”，最后花了不少时间去寻找友好的记者让他们撰写关于他的生平和成就的赞扬文章。

他的发言人们花费很少——如果有的话——的力气去解释情报局的真正的工作，或者详细解说那些较世俗的收集情报的计划。例如，他们拙劣的工作完全搞坏了那几乎一致接受的想法，认为中央情报局应该制订一项搜集有关对外贸易竞争者的经济政策的国际情报的计划；结果多数美国人以为，情报局根据热衷于某种“流氓行为”的法人团体的有权势人物的指示，将开始一项工业上的阴谋破坏计划。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中央情报局接到许多责难它的电话，认为它应该撤销，这种电话在韦伯斯特任期结束时比在中央情报局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多。

在兰利的最后几个星期中，韦伯斯特意识到这个问题。当他还没有被探索白宫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会对他自己命运的影响搞得筋疲力尽时，他花了很多时间回答国会的要求情报局实行改革的电话，并且捍卫兰利以抵制那些说它在波斯湾战争中情报能力没有达到标准的声音。他有时充满战斗力，有时筋疲力竭，二者互相交替，最后，他简直不愿意为了他的表现问题同他的白宫敌人进行一场代价很高的战斗力。他也许无论如何也赢不了这次战斗。情报局的论据说他不是被推到一边的——说布什感到很惊讶他要离开兰利，他本来可以继续当中央情报局局长，他想当多久就当多久——纯粹是胡扯。到了5月，韦伯斯特和他的高级助手们都清楚，经常的攻击已经致命地损害了他在政府中的地位。

5月8日上午，布什说：“局长，我们将惦记你，我的好朋友……”。

然后，韦伯斯特走到麦克风前。他承认他很难下定决心离开中央情报局，承认“从来没有可以轻松地走开的时候。”他向情报局和它的优秀的工作人员表示敬意，然后转向布什。韦伯斯特说：“总统先生，和你一道工作是一段非凡的经历。”（虽然这句话后来在兰利引起了高声哄笑，在白宫的新闻室里却没有一个人笑。）韦伯斯特继续发言，他强调情报局为了迎接“九十年代的挑战”已经把它自己放在适当的位置。他特地为最近几个月的工作辩护。他说：“我为整个情报界在波斯湾（战争）的表现感到骄傲……。”他的声音逐渐低下去，他突然地正视他的回到平民生活的决定。他说：“你不愿意离开，但是，某些事情告诉你，现在是离开的时候了。”

布什微笑着，似乎为他于 1987 年选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这个人感到骄傲。但是，总统已经把眼光转向未来。他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还没有谈到继位者；还没有想到任何人。”

这个职位有 4 位竞争者：李洁明，罗伯特·盖茨；前副局长博比·雷·英曼和新罕布什尔的参议员瓦伦·鲁德曼。这张短短的名单很快就缩小为只有两个姓名——李洁明和盖茨。有几天似乎李洁明会中选。布什信任他，曾和他在一起工作，并且尊重他的学历和经历——他是中央情报局的老手，在行动部有近 30 年的工作经验。在行动部的长期服务给了他一个胜过盖茨的好机会，因为从来没有一个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人是从情报部出身的，人们认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必须更多地了解谍报和秘密行动是如何进行的。韦伯斯特辞职的第二天，李洁明的名字传到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地位高的成员那里，得到了暂时的认可。除了几个有关他对中国的坦率看法的问题以外，答复是李洁明获得批准将不会有什么困难。

但他还远非大有把握得到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至少国务卿贝克被布什在考虑那位大使的消息所困扰，他反对布什的选择，理由和他两年以前否决李洁明的一个国务院职位的候选人资格的理由一样：能说会道又坦率，李洁明是个竞争者，一位活跃的辩论家，一位有见识的外交政策专家。但是，他不是布什内部圈子里的成员，因此白宫没有人知道他将如何适应，而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一位国务院官员回忆说：“贝克宁愿选择一个可以预测的人，某个不那么容易发火的人。你知道，他稍微挥动着血红的衬衫，在结束谈话时告诉布什：‘听着，我们不需要另一个比尔·凯西’。”

斯考克罗夫特同意贝克的判断。他宁愿布什提名他本人最喜欢的人——盖茨。斯考克罗夫特和盖茨相处很好，差不多在每一个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上，两人的意见是一致的。斯考克罗夫特深信，盖茨已经成功地恢复了他在因伊朗门事件而玷污了他的名誉。布什的办公厅主任约翰·苏努努赞成这个意见。他说，盖茨在每一个他曾经担负的职务中都干得不错。

苏努努深信，盖茨的过去不会成为参议院认可的障碍。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虽然有一些反对盖茨的否定票——参议员霍华德·梅岑鲍姆和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是两位反对者——，但苏努努的新罕布什尔州老乡、参议员瓦伦·鲁德曼向他保证，盖茨在委员会里有足够的朋友可以为他赢得批准。苏努努通知布什，鲁德曼可以引导候选人通过整个程序，并且作为他的主要捍卫者而行动。苏努努的论证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根据布什从其他高级政治助手们那里得到的忠告，他们认为，在盖茨和李洁明之间没有多大差别。他们说，布什提名谁都没关系——作为战争的结果，他在国会和美国人民中已经储存了足够的友好情谊，他可以挑选他想选的任何人。

在宾夕法尼亚大街 1600 号引起乐观主义的东西，在国会却激发了悲观主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中的共和党人，对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人选没有偏爱，准备好了要保护两者之中的任一个。可是，瓦伦·鲁德曼坚信李洁明将是布什的选择，——甚至在白宫询问他提名盖茨是否会在国会里的共和党人中引起问题之后。霍华德·梅岑鲍姆同意鲁德曼的意见，并且相信，布什不敢提名像前任副局长那样的会引起争论的人物——总统不会冒掘出伊朗门事件的尸体的危险，旧事重提就会使谣传的他在这一事件中的同谋关系暴露出来。可是，梅岑鲍姆手下的工作班子知道，在国会，那件丑闻已经成了“历史”，国会中伊朗门事件的起诉人劳伦斯·沃尔什的调查，被批评为“像冰河运动

般地缓慢”，是“一次试探性的摸底”。总统是处于一个完美的位置。一位梅岑鲍姆的助手说：“在布什对萨达姆所做的一切之后，他即使提名阿道尔夫·希特勒也会得到批准。”

直到5月10日星期五傍晚，布什才下定决心，当时他正在白宫和他的第一流政治顾问们聚在一起商量。最后，贝克、斯考克罗夫特和苏努努的论据影响最大。他们告诉布什，盖茨能够赢得批准：他是一位值得信任的忠实的助手，有必需的经验可以把中央情报局带入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李洁明的经验也很有价值，但盖茨很明确地是总统的人。他的提名将昭示全国，布什一点也不怕人们重提伊朗门丑闻。

为什么布什从李洁明转向了盖茨，还有一些不太明显却非常重要的别的理由。举个例说，盖茨将成为第一个从情报部提名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示布什将更多地依靠分析家们，超过依靠秘密行动者。其次，盖茨自命为一名改革者——一位中央情报局局长，他（用一位政府官员的话说）“将使那边（兰利）经历一番剧变。”最后，在布什作出决定的那个周末，不像李洁明跑到加利福尼亚去度假，盖茨却留在华盛顿，并且让人知道，他想要这份工作。

或许最重要的是，盖茨是几位与总统关系密切的、非常受尊重的中央情报局的老战士的选择，这些人中文一就是前副局长博比·雷·英曼。他争辩说，早在七十年代后期盖茨就被认为是一位可能的未来中央情报局局长了，并且被推到愈来愈重要的职位上，其目的就是培养他当局长。当时，英曼告诉一位记者：“鲍勃·盖茨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在情报部所有可能接受局长职位的人中，鲍勃是我想到的一个能够真正干这份工作的家伙。许多人都同意。”

另一位布什的支持者和前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家雷·克莱因也成了坦率的盖茨支持者。克莱因说：“我认为现在终于到了从情报部寻找情报界领导的时候了。这一天等了很长时间才来到。鲍勃·盖茨将成为一位出色的局长。”

5月11日的整个周末，白宫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那里搜集另外的意见，以确定盖茨是否会面临任何未预见到的问题。他们对结果很满意。关键是委员会主席博伦。那位强有力的民主党人对白宫官员们说，他很看重盖茨，前两年盖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表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手里掌握着这个支持，布什于星期二向公众宣布盖茨是他的选择。布什还说，他不认为关于盖茨在伊朗门丑闻中的责任的疑问会成为一个问题。布什很自信他说：“一切将是很好的。这个人得到我的完全信任。他很诚实，他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

正如所期望的，博伦暗示，在批准的过程中盖茨将会顺利通过。他称赞布什的被提名者是“非常能干和超党派的。”每件事都按计划进行。

盖茨的提名在行动部遇到了一种明显的不信任感，行动部的官员们几乎不能让自己接受这件事：现在，一位分析人员将领导情报局。但是，与情报部内部的反应相比较，那个反应就不算一回事了。布什的宣布在情报部引起了一场大风暴。一位分析家咆哮道：“这是一种极大的伤害，这个家伙在这里是被憎恨的，绝对地被憎恨的。给人的直觉就是：他将做总统让他做的任何事情。”一位行动官员同意。他说：“整个行动部都反对盖茨的提名——所有退休的官员和现在还在那里工作的人。他们不要他。他不懂行动这一行。他们怕他当一个秘密行动的领导人，他的无能将使行动部陷于完全停顿的地

步。”这些负面的感情是在提名后不久由一群退休的官员非正式地用文件形式当作旁证的。在中央情报局前高级官员的一次每周午餐会上进行的盖茨提名的模拟投票表明，在情报界一些最有影响的人物中间，他缺少支持：8人反对，4人赞成，4人弃权。

少数欢迎盖茨提名的中央情报局专业人员试图贬低那些传遍整个政府的敌意的议论。已退休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戴维·惠普尔承认：“在情报部存在一些关于盖茨的怀疑态度，但是，那只是因为他们知道鲍勃将进行一些改革，一些必要的改革。另一方面，我认为在行动部内部存在的利害关系要小得多。他们不希望他来了以后就进行全盘改革；那简直不是他的方式。他们知道他将必须依靠专家，他们相信他会这样做的。”惠普尔是前情报官员协会的执行会长，现在是中央情报局非官方的、专门负责向华盛顿新闻界搜集意见、听取批评的人，在情报问题方面，他的话常被广泛引用。他承认：“这不是一个受到一致欢迎的提名，如果我说它是，那就不够诚实了。但是，那不是情报局所需要的。总统想要在情报局身上盖上他的图章，他想说将来我们需要更好的分析，而鲍勃·盖茨是这个国家的第一流分析家。”

老一辈的官员批评一位新的被提名者，这种情况并非不寻常——当里根总统提名韦伯斯特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情况就是这样——但是，这种争论常常在几个星期之内就消失了。对盖茨可不是那种情况。在布什宣布后的数周内，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不断地非常否定地反对他的任命。他们的看法集中到了行动部副主任助理特德·普赖斯那里，而普赖斯接受的任务就是使人们的担心平静下来，并且反驳那些认为提名意味着在兰利将进行一次“大清洗”的意见。普赖斯向行动部保证，在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领导下，变化不大，他和特威腾将仍然全权负责谍报行动。副局长克尔和情报部主任赫尔杰森也作了同样的保证，虽然其结果远不如普赖斯的保证受人欢迎；他们两人被认为是属于盖茨的最亲密的被保护人之列的。

可是，由于在现职官员们中所感到愤怒和不满很强烈，因此，在提名的下一个月中，从来没有过那么多的大批中央情报局雇员自发地不声不响地跑到国会去表达他们对盖茨的看法。他们中有许多人感到布什背叛了他们，他作为第一个由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成为总统的人，应该对他们的意见更敏感。他们说，布什完全知道中央情报局中许多人对盖茨的看法，还是随随便便地提了他的名。当情报局非常需要一个大家能够信任的领导人的时刻，他给了他们一个以前有过污点、许多人最不信任的官员。布什不管他们想些什么，他是当面正视着你的总统。当时一位参议院的助手说：“对这个选择有一大堆反对意见。有些人扔下手里的木工活儿就来了。看上去真令人惊奇。我们正在谈论的不是一小撮人。”

盖茨打算向他的最不妥协的反对者们包括霍华德·梅岑鲍姆主动进行一些计划周密的访问，以缩短反对的过程。其策略就是以一個隨和的懇求者的姿態出現，這個人過去犯過許多錯誤，現在願意不怕麻煩地為它們做些補償。蓋茨熱誠地向這位年老的俄亥俄州民主黨人致意，一邊跟着他走進他的辦公室，臉上掛着一副開朗的微笑。他們不安地面對面地坐着，交換了幾句開玩笑的話，然后就陷入了沉默。過了一會兒，蓋茨解釋說他知道梅岑鮑姆反對他的任命，但他希望他能改變主意。他強調，關於伊朗門事件他知道的很少，在他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任期內他不允許干這類鬼把戲。在這番表白的過程中，梅岑鮑姆保持着無動於衷，除了在蓋茨陳述的關鍵時刻微微點頭表示同

意而已。但是，当盖茨说完了的时候，他皱起眉摇摇头。他率直地回答：“你知道，我就是不相信你。”紧接着发生的事情给了盖茨的反对者们第一个暗示——一个可能把他打倒的弱点：盖茨大吃一惊，他愤怒地高声地向那位俄亥俄州参议员抗议。会晤以盖茨气冲冲地闯出办公室而告终。一位参议院的助理人员回忆说：“他发脾气走掉的。”

在许多方面盖茨实际上具有一种使人愉快的品格。他总是对人微笑，他还常常发出有传染性的火山爆发似的大笑，他知道如何使用这种大笑对他有利。可是，硬币的另一面就是他也很容易发怒；情况是他似乎很难控制他的感情的两个极端，正如他和梅岑鲍姆的会晤所表明的。如果盖茨受到了逼迫，他就会爆裂，倾泻出他对他的贬低者的几乎隐藏不住的轻蔑。盖茨是野心勃勃的、容易激动的，而且，遭到反对时，他可以变成卑鄙的和志在报复的。一个利用盖茨的缺点的策略出现了。当他发表关于他自己八十年代在情报局的问题的使人信服的声明时，他的反对者们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问他关于伊朗门事件的详细情节。他们希望，在极度紧张之下他将爆发。与此相应，盖茨的支持者们为他安排了尽可能多的对策，并且劝告他，脸上总是露着他的迷人的微笑，而压住他的火气。

一个正式的中央情报局工作组被指派去调查研究盖茨的成就，为他的批准提出一份令人信服的实例。这个小组搜集了一扎材料，其中包括他担任情报部主任和副局长时的有效工作的鉴定。根据一位参议院调查人员所说，罗致了30多位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去制造背景材料，以备盖茨用来阐明他为九十年代情报界制订的计划，也备他用来答复那些说他在伊朗门丑闻中判断错误的指控。工作组主要集中在它认为将被委员会的关键性决定票——参议员萨姆·纳恩和参议员丹尼斯·德孔西尼所提出的问题上。当最后计算票数的时候，他们认为参议院的大多数民主党人将会看纳恩的榜样行事。

戴维·博伦的一票是可以指望的，他是委员会的主席，盖茨的公开支持者。很少委员会成员能够充份地解释这种密切关系。他们推测，这种关系是由于盖茨让博伦分享他不让别的任何人分享的重要机密信息而培养起来的，因此赢得了这位俄克拉荷马州参议员的信任。不管是什么理由，博伦的看法已是根深蒂固，而且已有很长时间，这是没多大问题的。委员会的全体工作人员都知道。在调查伊朗门事件的高潮中，只要有可能，博伦就出面干预，以保护盖茨使他躲开关于他自己在丑闻中的责任的严厉质问。有时，博伦的努力是很为难的。

博伦保护盖茨的最直截了当的例子发生在1987年7月31日，当时盖茨被召唤去为他在丑闻中的责任作证。博伦听到盖茨将要去宣誓作证，他被激怒了——他告诉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国会议员路易斯·斯托克斯和共和党参议员威廉·科恩，他反对质询。博伦说，盖茨已经以一位情报委员会证人的身份出现过，并且把他知道的一切都说了。为了强调他的义愤，在盖茨被质询的那天，博伦走到哈特参议院办公大楼，把他的看法留在纪录上。会议已经开始了将近四十五分钟，他闯入了会场，打断了委员会律师保罗·巴尔巴多罗的发言。从国会步行到此，他很明显地喘着气。

博伦说：“让我插句话，……我们一直有这样的默契——盖茨先生没有反对这个——但是我们一直有这样的默契，当我们举行一次（情报）委员会成员会议的时候，不必要召唤盖茨先生来作证。我认为这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决定的，如果要问他，就（只能）问他关于失察的政策的想法。在他们任

职批准听证会上，在宣誓作证的条件下，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一切，我们这些被挑选出来的（情报）委员会成员，如果我们在这件事里有任何权利的话，我们感到没有必要把这些问题再重复一遍。”他简直愈来愈激动。他接着说：“作为一名根据参议院法规被挑选出来的（情报）委员会成员，我愿意把我的看法纪录在案，我认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在这方面有些权利；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斯托克斯委托我传达他对这件事的同样的看法……但是，我看不出再重复一遍有什么意义，因为我认为我们的委员会已经把盖茨先生关于这些问题宣誓作证的全部正式文本交给了这个委员会。”

巴尔巴多罗对博伦的闯入感到惊愕，他怒冲冲地回答：“好吧，参议员，如果有一件事我不需要从这些听证会上学习的，那就是：被挑选出来的和负有责任的官员们作出重要的决定。”

博伦厉声说：“我认为那就是我们过去调查的事情。我想，现在有点儿令人啼笑皆非，当我们正在调查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委员会似乎在朝相反的方向运行。”

简单他说，博伦在指控巴尔巴多罗的行动超出了他的权限。律师是雇用的枪手，不是参议员，他应该服从命令；没有人告诉他他可以质问盖茨。

巴尔巴多罗非常冷淡地回答：“如果我错误地理解了委员会给我的指示，我道歉。”然后，他解释说，早些时候他在兰利的一次会议上曾和盖茨交谈，并曾建议给他一次机会回答奥利弗·诺斯所作的有关他的陈述。巴尔巴多罗补充说：“我了解，盖茨先生是同意那个建议的，不过，当然啦，我遵从委员会的被选出来的成员们的意见。”

博伦这下子进退两难了。盖茨就坐在那边，看起来他确实同意这次宣誓作证，希望澄清自己的名声。

巴尔巴多罗紧逼一步。他对博伦说：“你是头儿，你告诉我该做些什么。”

博伦迟疑了一会儿。他最后回答说，他只是想弄清楚，盖茨是在新材料方面被质询，而不是在他任职批准听证会上已经谈得“令人作呕”的那些问题上。

巴尔巴多罗不为所动。他重复说：“好吧，你是头儿。事实上，我要服从你。你可以问他你想问的任何问题。”

巴尔巴多罗靠在椅背上，等待着。

想了一想以后，博伦打退堂鼓了。他说：“我要说清楚，我没有表达任何看法认为在这里引导这次质询的那位律师（巴尔巴多罗）的行动是欺诈的。我认为他始终是一个为人真诚的人，只不过是有一个误会。这误会既在我们这一方，也在他那一方，我当然知道盖茨先生正急于回答任何恰当的和需要问的问题。”

最后，宣誓作证继续进行，但是，博伦仍然留在会场以保卫盖茨的利益。盖茨的反对者们相信，这种悉心照料恰恰正是博伦在1991年的职位批准过程中所要干的。

6月23日，关于盖茨提名的不受限制的交战变成公开的了。曾经为国会担任过伊朗门事件调查员的前中央情报局行动官员托马斯·波尔格，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被广泛阅读的意见书，指责布什所提名的人。波尔格写道：“我反对盖茨的意见集中在他在伊朗门事件中的表现上，他的表现玷污了里根的总统任期，其玷污程度比里根两届政府的任何别的什么事件更

甚。从始至终，盖茨所做所为似乎他是处于漫天大雾之中，或者，似乎他的主要兴趣是不使真相公之于众或传到国会去。”

波尔格不是唯一的一个怀疑盖茨的叙述的人。一个多月以来，委员会的调查人员一直在寻找否定他的表白的证据，他说关于伊朗门事件他听到的很少，不论是从凯西那里还是从任何别的人那里。事实上，调查很难继续进行：在中央情报局，盖茨的敌人是大批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关于前副局长参与那个事件的第一手信息。可以使他的确切的责任清楚地显示出来的主要提供消息者是3位官员，他们直接了解1986年和1987年的行动——中美洲工作组组长阿兰·菲尔兹，前行动部副主任克莱尔·乔治和德韦·克拉里奇——但是，他们不谈。

1991年7月9日，那个僵局突然起了变化，当时，在华盛顿联邦法院，菲尔兹对扣留关于把资金转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信息不让国会知晓的两项行为不端的指控服罪。在菲尔兹出庭之后，他对新闻界说：“1986年，我面对一些很困难的决定。那时，我做了我认为对国家最有利的事。今天我又面对同样困难的决定，而今天我又做了我认为对国家最有利的事，不仅如此，我做的也是宪法要求于我的。”菲尔兹承认，关于转移资金他于几个月以前就已经知道了，但是，关于他在事件中的责任问题上，他曾经故意地把国会引入歧途。他同意和联邦检察官们充分合作，给他们关于其他中央情报局官员们的信息，包括克莱尔·乔治，菲尔兹说，乔治告诉他有关情报局的秘密计划的事要撒谎，因为它将把一盏“聚光灯”放在白宫自己在那个行动中的责任上。

从菲尔兹的抗辩中看得很清楚，乔治、前国务院官员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德韦·克拉里奇和当时的副总统布什的首席国家安全顾问唐纳德·格雷格，都是无党派律师劳伦斯·沃尔什的调查目标，很可能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后就被指出来。沃尔什的调查员们甚至希望，他们也许能同克莱尔·乔治搞出一份抗辩同意书，用来交换关于计划的别的知情人的信息。可是，乔治的最亲近的同事们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有一个人说：“克莱尔·乔治永远不会谈，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永远不会。”事实上，要说把中央情报局在这个事件中的全部责任都弄清楚，沃尔什还比不上当时任何一个被质询的人——他们大多数作为证人被召唤来的，一位对调查很熟悉的华盛顿律师说：“他们不合作。他们什么也不记得了。你知道，他们说：‘伊朗门事件’，那是什么鬼东西？”

菲尔兹的抗辩立即引起对盖茨的声明的怀疑，他声称他一点儿不知道伊朗军售行动。结果，问题像连珠炮似地飞向白宫，询问布什提名的人是否有被控告的危险。盖茨的批评者指出，毕竟他的顶头上司凯西知道那次行动，而在中央情报局的指挥链上仅低于盖茨的乔治可能也知道。盖茨也曾在白宫会见了奥利弗·诺斯和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布什发言人回答问题时指出，盖茨是沃尔什调查的一个“题目”而不是一个“目标”，他未必会被控告。盖茨的捍卫者们进一步争辩说，作为一位副局长，他差不多不担负行动的责任，而凯西则要保留那种分工方式。这就意味着盖茨不知道伊朗门事件的全部细节。一位前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解释道：“事实是凯西不信任盖茨，乔治和克拉里奇也不信任他。他们不尊重他。为什么他们应该告诉他什么事情正在进行？”当前的证据似乎证明了那个论点。

不论盖茨是否知道伊朗门行动的全部细节，事实上，乔治和克拉里奇两

个人确实把他看作一个外行的暴发户，并且经常向他们的一些同事贬低他的能力。他们中的一位记得乔治提到盖茨时说“那只小狗”，他还记得克拉里奇只是简单地否定地摆了一下头就把盖茨的能力一笔勾销。这位官员回忆说：“克拉里奇非常憎恨鲍勃·盖茨。要是他（盖茨）有什么东西提出来那才可笑呢。没有人注意他。我想不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两个家伙中的任何一个曾经为某件事向盖茨征求过他的意见。”一些前高层官员同意这个论断，还进一步声称，盖茨以牙还牙地对待这种感情，虽然方式完全不同。一个人说：“无论何时鲍勃看见克莱尔走来，他就转过身去走另一条路，我有清晰的印象，他怕乔治。你知道，克莱尔·乔治可以变得非常令人害怕——开会时，如果你反对他的意见，他能够死盯着你，盯得你不敢再对视下去。”

然而，在1991年夏季菲尔斯基抗辩引起了足够的问题，因此，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考虑推迟盖茨听证会直到劳动节以后。在位于肯尼迪港的布什总统别墅里，在一次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上，布什谴责了这个计划。他抱怨说委员会不应该接受“谣言”或“像一群鹤鹑那样办事”。布什的脸都气红了，他转向他的提问者们，指责新闻界对公开怀疑盖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说：“我不认为，用谣言和含沙射影把一个人打倒是美国方式。那不是制度。”布什继续强调他说：“在这个国家，我们应该享有的权利就是公平对待，在证明有罪以前都是清白无辜的。不要任凭一个人在那边扭曲着……听到那些对他的品格完整提出各种问题的假设，真使我感到苦恼。”

布什有充分的理由想要尽快进行盖茨的批准过程。白宫在7月初就收到信息，到8月底乔治将被起诉，他可以回答有关盖茨在丑闻中的责任的所有问题；沃尔什已经发现了一些强有力的证据，它们都是不利于克拉里奇、艾布拉姆斯和格雷格的。格雷格当时任驻南朝鲜的美国大使，他甚至在7月初就已经悄悄地回到了华盛顿，想找一位辩护律师。艾布拉姆斯仍然保持平静，但是已开始与沃尔什的律师事务所谈判，通过抗辩的交易来处理他的案子。毫不奇怪，克拉里奇是所有人中最平静的。他代表他的公司雇主在中东度过了一部分夏季。

7月16日傍晚，在这慌慌张张的活动当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决定，它没有什么选择，只好不顾总统代表他的被提名者所作的尽快批准的请求。他们决定推迟听证会直到9月16日为止。盖茨本人同意这个决定，他于宣布延期的前一天夜晚在国会会晤了博伦和副主席弗兰克·穆尔科夫斯基。两位参议员告诉盖茨，他们没有多少选择；他们不得不给沃尔什一个机会，让他结束他的调查。一位委员会的工作助手后来证实说：“他们不愿意让人们看起来好像他们十分仓促地处理提名，希望在乔治被起诉以前让盖茨获得批准。”根据这位工作人员所说，盖茨同意延期，因为“他说他相信沃尔什的调查不会搞出什么新东西来。”体会时，盖茨打电话给斯考克罗夫特，告诉他那个消息。

博伦认为，延期实际上将帮助盖茨。委员会已经访问了一些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关于被提名者在丑闻中的责任，没有发现新东西。委员会中盖茨的支持者们私下里也放了心，因为中央情报局的其他官员们，包括前拉丁美洲处处长杰里·格鲁纳（阿兰·菲尔斯基的前上司），将告诉委员会的调查人员，他们怀疑盖茨在伊朗门行动中有任何责任。有人告诉博伦和穆尔科夫斯基，格鲁纳的证明将得到行动部副主任托马斯·特威腾（也是沃尔什的调查的一个题目）的支持，管预警情报官查利·艾伦曾经于1987年首次告诉盖茨他对

于资金转移的担心。从所有这些迹象看来，博伦仍然相信盖茨将澄清任何坏事，被批准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委员会里的盖茨的反对者们逐渐开始同意。最初他们曾经期望查利·艾伦能在凯西与盖茨的交往方面提供一些说明盖茨有罪的细节。他们深信，艾伦——他个人不喜欢前副局长——将说盖茨事先一定知道资金转移的事。但是，艾伦不合作。阿兰·菲尔斯也不合作，他的起诉书对委员会已经掌握的情况如盖茨知道什么和何时知道的等等，没有增添什么新东西。至于参议员布拉德利和参议员梅岑鲍姆二人手下的工作人员所关切的是，中央情报局已偃旗息鼓，现在正全天工作以使盖茨获得批准，尽管担心一旦他成了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可能干些什么。8月，梅岑鲍姆的工作人员决定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弹药；这些助手想出一个策略，目标是前情报部官员们，他们声称盖茨曾经使情报局的情报产品政治化。

盖茨的反对者们本来希望任何新的起诉会牵制他的批准，到了9月上旬，他们已经放弃了希望。他们的这种看法是由于克莱尔·乔治被起诉时出现的喘一哼态度而来。乔治对沃尔什说得很清楚，他不会在他的调查中与他合作，他还把自己描绘成“一出连续不断的以政治谋私利的戏剧中的一个卒子”。这位两腿向外弯曲的前行动部官员，在位于马里兰郊区的他家外边同新闻界玩折磨人的把戏，看上去他对他的花园工具的放置比对坐几年牢的前景更为关注。他用他自己对世界的粗略的意见款待那些记者们，并且提醒他们，他曾经面向比他的所能提供的更艰难的时世。

从乔治那里搞不到证明，这不必谈了，还剩下一个可能对盖茨认为自己有资格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要求提出异议的人，一位尚未被公众知晓的前高级分析家，他不是别人，正是海尔·古德曼，盖茨的老对头。古德曼不乐于担任这种角色，——他对中央情报局并不怀恨在心——但是，人们用情报局和盖茨背叛了他们作为一个客观的超党派的情报组织的传统这件事说服了他。他同意把他所知道的关于盖茨在情报部里工作的情况告诉委员会的调查员们，然后公开出面作为反对被提名者的一个证人。免得他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存在任何幻想，他被警告说他的证明在委员会将遭到盖茨的盟友们的猛烈攻击。工作人员还告诫说，对他的动机的质问将会是长时间的、残忍的、涉及个人的。每件事都要经过调查。古德曼说他懂。

同时，政府正竭尽所能为听证会作准备，包括举行一系列白宫招待会，与参议院共和党人一道制定批准的策略。在这些讨论会上，盖茨向他的参议院支持者们保证，他将坦率地承认在凯西任期内他曾犯过错误。他说他已准备好断然地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为了解除他的批评者的武装。他甚至已经起草了一份认错书，承认他在中央情报局的时候没有认识到伊朗门丑闻的严重性。听证会以前的那个周末，支持盖茨的运动正在全力进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作为他的主要公开保护者出现在国内新闻电视节目中；由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安德鲁·卡德挂帅的三人小组随叫随到，负责安排批准的程序；参议员鲁德曼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单人匹马的“真理班”。鲁德曼的任务很简单：他将反驳比较重要的指控和掌握住不让盖茨发火。

盖茨准备得好上加好，9月16日上午，他走进参议院哈特办公大楼，看上去很有信心很坚定。他身上有一种自信自恃的神态，他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前途就在他自己手里。他按提示对着照相机和摄像机微笑。他朝那些坐在他背后的新闻界席位上的熟人点头招呼，然后安静地坐下来等待会议开始。他

的唯一不自在的迹象来自一大群摄影记者，他们坐在他前面的地板上，用快照拍摄他的照片。有一会儿他似乎稍微缩了一下身子，但是，当参议员博伦开始他的开场白时，他坐在那里，明显地全神贯注。

甚至当参议员梅岑鲍姆在他的开场白中批评他的时候，盖茨也显得很沉着而且还盯着那位俄亥俄州自由主义者，好像他相信他过几天就会改变主意似的。在这些早早发出的猛击中，没有什么惊人之笔，如果盖茨感到紧张，别人看不出来；当他站起身来宣誓“讲真话，全部真话，只有真话”的时候，他的手毫不颤抖。当他开始他的证词时，挤满了人的听证会场安静下来。

盖茨很镇静，优美而直言不讳；他的开场白是涉及个人的，有克制的，有些部分几乎是讨人喜欢的。他描述自己为一个单纯的人，不愿意和他的贬低者交战。他说，他于1965年带了他的全部家当“乘一部1965年造的野马牌汽车，两手空空地”到达华盛顿。“野马牌汽车早就没有了，在它变成一个收藏家的项目以前把它卖掉了，而我仍然是两手空空。”他简短地勾画了他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轮廓，强调他对制度以及它所代表的理想的信奉。他把他自己描述为一名爱国公仆，“对这个国家的伟大……对它作为一种为世界谋福利的力量的使命，怀有一种深深的信念。”他说他受命改革，他清楚地觉察到苏联的解体将改变美国情报的面貌。他宣称他已准备好迎接挑战。

然后他提到了在伊朗门丑闻中他的责任问题。这是戏剧的高潮时刻。他略微犹豫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把他准备好的讲话稿放在一边，伸手去拿他预先已经另外放在桌上的一张黄色的法律用纸。他说：“由于这个委员会有很大的兴趣，也由于伊朗门事件在这些程序中的中心地位，关于这个问题，我最后想补充一些另外的个人看法，因此，昨晚我写下来了。”

盖茨继续说道：“我刚才提到对信任和信心的信奉，我不是轻率地对待那种信奉的；它是从观察经常不断的危机直接派生出来的，主要是观察1981年至1986年间中央情报局—国会的关系中的秘密活动，它在伊朗门事件中达到顶点。我觉得，关于伊朗门事件，很少有人比我想得更多，什么地方错了，为什么中央情报局不按它自己制订的规章办事，当时可能做些什么以预防、至少是阻止这个灾难性的事件。中央情报局已经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和学到了昂贵的教训。但是，今天我要说我作出的错误判断和我学到的教训。回想起来，首先，本来我应该更严肃地对待……政府中的不正当行为或者甚至不道德行为的可能性，更加敢作敢为地追击这种可能性。我应该更加有力地向凯西局长和波因德克斯特追问可能转移的资金的问题。我应该做得更多一些……其次，关于别人告诉我的事情，我应该更多一点怀疑。我应该问更多的问题，我应该不满足于我得到的答复，特别是从凯西局长那里得到的答复。第三，1月份发现禁止通知国会的规定后，我应该为撤销那些条款催得更紧些。……很清楚，如果我能重新过一遍1986年10月的日子，……我做的事就不同了。我学到了伊朗门事件的教训。”

然后他把他手写的稿子放到一边，面对委员会。

它是一份严肃的衷心的自我检查。尽管后来的新闻报道说盖茨的说明是预先准备好的——因此不是他想使委员会相信的那种即席发言——他的直截了当的自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用《华盛顿邮报》的词句，盖茨的证词是“一个结实的作品”，加上从两位前副局长约翰·麦克马洪和博比·英曼那里得到的品格证明，使反对盖茨的运动停止了。参议员德孔西尼就是盖茨的自白对那些仍然悬而未决的委员会成员们产生的影响的象征。德孔西尼对盖茨

说：“我想你一定会说：‘我不记得，我不记得’，但是，你已经超越了那个，我要你知道，我欣赏这一点。”甚至梅岑鲍姆也勉强地同意“很可能他将被批准”。参议员鲁德曼欣喜若狂。他称赞盖茨的诚实。

瓦伦·鲁德曼提供了盖茨的第一道防线，不断地打断霍华德·梅岑鲍姆的质问，梅岑鲍姆是在盖茨陈述完毕立刻就把目标对准他的。很清楚，鲁德曼的用意是保证盖茨有时间把答复理出个头绪，甚至更重要的是，保证盖茨不再重演他于7月间曾经和这位俄亥俄州参议员演过的那一幕爆炸性交锋。

在下个星期中，委员会中赞成盖茨的力量又得到了几个证人的帮助，以往他们被认为是反对盖茨提名的，其中最突出的是阿兰·菲尔斯。这位正被起诉的知名度很高的行动官员，拒绝对盖茨适合局长职位发表评论。他的唯一的赞语就是盖茨是“一位异常有天赋的分析家……官僚结构内部的异常有天赋的操作者，是一个……在情报局内部享有流星似的提升的人。”菲尔斯的唯一的批评就是，在中央情报局内部盖茨被看作这样一个人：他是“野心勃勃的”而不是“那种你可以结为好朋友的人”。这就与盖茨的反对者们认为菲尔斯会作出的分量沉重的谴责相差太远了。它使他们终止提名的最后指望之一泄了气。

甚至查利·艾伦也不指责盖茨的可信性。关于在伊朗门事件中谁对谁说了些什么，艾伦和盖茨叙述的情况有区别，但是像菲尔斯一样，关于盖茨的责任，艾伦很慎重。他甚至说，前副局长在听到白宫卷入了把伊朗和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搅和在在一起的谣言时“吃了一惊并且感到困扰”，他还证实了盖茨的证词，他——艾伦——拿了转移的证据直接交给中央情报局局长。关于盖茨何时知道转移的消息以及他建议做些什么，艾伦和盖茨的证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这些差别既不够明显也不够确凿，不足以使委员会的任何人在布什所提名的人的问题上改变他们的主意。

即使盖茨似乎很有把握得到批准，梅尔·古德曼的作证的许诺并没有动摇。他和另外两位前分析家——珍妮弗·格劳德曼斯和哈尔·福特——仍然深信，如果盖茨被允许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将把情报局向行政当局提供公正和客观的分析的能力毁掉。他们的富有戏剧性的证词是于9月25日傍晚在委员会的一个秘密会议上陈述的。如果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一说盖茨曾经腐蚀情报产品，并且故意地使中央情报局的研究倾斜，为了求得白宫的政治上的宠爱——不仅他将不能赢得批准，而且他的公务生涯也将在羞辱中结束。

古德曼的指控很具体：1985年，为了支持对伊朗开放，盖茨和凯西有目的地操纵了情报部；他们一贯低估苏维埃帝国内经济问题的证据，因为那些数据记录不符合他们自己的信念；他们压制了一些情报评估并使官们出轨，而这些评估是对苏联倡导国际恐怖主义表示怀疑的；他们曾经口授了一项研究，它要表明苏联在企图暗杀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事件中的同谋关系，而并没有这样的证据存在；最后，他们曾经调整情报局的反恐怖主义的工作计划，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他们自己的观点提供一个讲台。古德曼透露，韦伯斯特曾经试图以调查凯西和盖茨企图把情报局的情报产品政治化的办法，来消除损害。

古德曼说：“但是，我想我发现最重要和最令人生厌的，就是凯西和盖茨没来由地把作情报判断的权力归于他们自己，他们轻视为准许独立的分析存在而制定的程序；他们损害了那个程序的完整性和我曾经在那里度过了24年的中央情报局的可信性；他们忽视了长期建立起来的一个情报官员的道德

标准和美好品行；甚至美国总统收到的也是窜改过的报告和不对等的分析。我担心，让盖茨回到他造成的环境中去是发出的信号。但是，我觉得，比那个更使我震惊的是，在中央情报局很少有人能造成那样一个环境，而他们很容易地做到了。我想，就是为了那个缘故，我有一种羞愧感。”

尽管古德曼作了惊人的论断，珍妮弗·格劳德曼斯是盖茨的反对者们推举出来的最可信的证人。对一位中立的观察者来说，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例如，古德曼谈的情况可能言过其实，或者他有特别的私人的理由反对盖茨的提名和攻击布什政府。古德曼非常了解这一切。后来他甚至对他亲密的朋友们承认，他在他的攻击中的语言也许是太刺耳了。那个问题显然与格劳德曼斯的情况不同，她是一位年轻的和明显地聪明的中央情报局前分析人员。她公开地蔑视有关提名的政治斗争。她说：“我和你们一样相信盖茨先生把情报分析政治化了，而且他应对分析程序的全盘退化负责，对此我并不感到愉快。”

除了鲁德曼——他根本不考虑她的证词，好像它是某种近似于一个喃喃咕咕的青年的豪言壮语的东西——之外，甚至那些与盖茨最亲密的人也认为她的证词是可信的和出自内心的。虽然中央情报局也许能担负得起损失一个像古德曼那样的人，人们感到它担负不起疏远它的像格劳德曼斯这样的年轻的新手们，她只在那里工作了6年——主要在苏联分析室——就怀着厌恶的心情辞职离开了兰利。

她提供了听证会的第二个戏剧性的时刻。她强调：“让我讲清楚，今天我来到这里应你们的请求。你们也许知道，将近两年以前我从这一团糟里走开了……我发现，对旧伤痕的再检查和围绕着这些听证会的公开性，就我个人而言，挺别扭。直到几个星期以前，我曾经期待某个其他人将在这个席位上作证。因此，我希望你们了解，我不是被某种势不可挡的愿望所促动，亲自来责备中央情报局或任何人。当我离开情报局的时候，我没有写本书，或者去找新闻谋介，我也没有来请求这个委员会，在这些听证会之后，我不打算对新闻媒介谈话。”

格劳德曼斯给以往的10年画了个轮廓，她称之为“对保持一种专心于真理的文化的漫不经心或蓄意的疏忽”。她说：“在苏联分析室有一种威胁的气氛，过去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有这种看法：盖茨先生把某些人调走是因为他们始终不愿意遵循他的分析路线。甚至到今天，我意识到在苏联分析室仍存在一种观念：如果管理者们不够须从的话，他们就要冒失去职位的危险。”

格劳德曼斯继续说：“我认为，在最近的两年里，那种气氛变得更坏。政治化的性质变得更显眼了，我认为那些分析人员们也就更加玩世不恭了。情况就像在旧的第三世界处的情况一样坏。我最近听到的来自苏联分析室老同事的要求更大的诚实的痛苦呼声，是我从来没听到过的那种呼声。在这里，我要极力要求你们去请教最近成立的针对苏联分析室的管理上的顾问检查组。我可以向你们传达一个轶事，有这么一种观念：苏联分析室多雇一些秘书而去掉分析人员们也许更好一些，因为秘书更善于接受口述。”

盖茨声称，许多针对他们怨言都是中级分析人员们激发的，他们由于在工作程序上地位不能更高一些而灰心丧气，格劳德曼斯显然被盖茨的话激怒了。盖茨曾经告诉过委员会，当他最初开始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时候，他也有许多同样的感受。格劳德曼斯反驳说：“参议员们，我认为那个答复是对

我能想到的如此敏感的一个问题的最沾沾自喜的、带有优越感的和冷漠的答复。而且，我相信，它使你看透了盖茨先生的管理作风。想到如果他被批准了他可能做些什么，简直使我发抖。”

格劳德曼斯之后是哈尔·福特，他已有70岁，仍然是中央情报局最有表达力和受尊重的发言人之一。他的证词也像一次冲击。福特最初是被邀请出席来支持盖茨的，但是，经过两个星期的思考以及和情报局许多雇员谈话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他开始发言：“我欢迎有机会来修改你们手边已有的我的准备好的发言稿。事实上，我将要说的离它很远，所以你们可以把它撕掉。”

福特简短地描述了一下他是如何认识盖茨的，并且钦佩他的把情报评估弄得“更短、更尖锐、更适合我们的制订政策用户们的需要”的企图。但是，接着，福特所有对盖茨的评论都很刺耳。他说：“简而言之，我的话的要旨就是，我认为批准鲍勃·盖茨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将是一个错误。”福特解释说，他改变主意的主要理由就是从他敬重的人们那里来的对盖茨的海啸般的反对以及盖茨自己的证言。“对我来说，抓住他的证词的字眼儿就是‘聪明’。这位精明能干的官员的健忘——他具有照相机般的记忆力——不能把信任全部灌输给我。”

古德曼的、格劳德曼斯的、福特的证词——特别是格劳德曼斯的证词——引起了对盖茨的正直诚实和他提供客观评估的意愿的严重怀疑。那些指控都被陈述得很有说服力，因此，它们向参议员鲁德曼的希望提出了明显的挑战，鲁德曼本来希望盖茨可以顺利通过批准程序而不损害他领导情报界的能力。鲁德曼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很简单：他不管格劳德曼斯和福特而攻击古德曼。

10月1日，在委员会一次公开的会议上，鲁德曼对古德曼所回忆的几个具体事例表示怀疑，据古德曼说，在那几个事例中，盖茨曾经歪曲了情报产品。这位参议员甚至拿出了一封最近来自威廉·韦伯斯特的关于1987年一个关键事件的信，当时韦伯斯特的首席助手马克·马修斯访问了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们了解关于政治化问题。鲁德曼争辩说，马修斯对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员们的访问，既非秘密的，也没有背着盖茨（如古德曼所说）。鲁德曼指控说，事实上，那些访问和盖茨没有关系；古德曼在说谎。鲁德曼怒冲冲地对古德曼厉声说：“你有资格谈你自己的意见，但是，你在谈你自己的事实方面却不够格。”

现在，委员会的工作助手们声称，马修斯莫名其妙地改变了他反对盖茨的证词。他们指出，在以往几次与委员会调查人员举行的会议上，马修斯支持古德曼所说的关于调查盖茨的每一件事。他们断言，后来他受到了来自白宫的政治压力，就改变了他的叙述。瓦伦·鲁德曼的一名工作助手否认这个指责，称它“仅仅是一个杜撰而已”。

当时，在幕后，白宫施加给委员会中共和党人保护盖茨的压力不断增长，即使反对盖茨的三位一体的证词对于改变委员会对布什的被提名者的支持并未起多大作用。10月2日傍晚，盖茨同总统的第一流政治顾问们和中央情报局官员们在白宫秘密商议，对那些针对他的指控作出反应。他们决定，他应该用完全的正面的攻击来回敬他的谴责者们，轮流对付每一个指控把它打倒。那正是他所做的。10月3日上午，盖茨最后一次在委员会面前亮相。每一个记得曾经见过他的人都认为他今天是最好斗的。他的证词是厉害的，攻击性的，某些部分是报复性的。他甚至暗示，他在兰利缺乏众望正是他应该

被批准的理由之一，因为它将给雇员们送个信息，就是说，不管他们怎么反对，他提出的改革将照样进行。

盖茨说：“像哈尔·福特和梅尔·古德曼这样的老朋友也挺身而出，这给我带来一些真正的痛苦。”他又说，被提名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不是一场人望竞赛，我十分肯定我在中央情报局不会赢得一个人。”然后他对他的批评者们作了详细的包括20点内容的回答，并且狠狠地还击古德曼的最严重的指控。盖茨声称：“仔细检查一下发表过并送给制定政策者们的材料的记录，就可以看出程序的完善是被保持着的。他背诵了许多他于1982年对情报部作的一次讲话，他坦白地承认那次讲话给他制造了许多敌人。他提醒委员会他享有布什总统的充分信任和支持，并以此结束他的证词。他说：“总统本人当过情报局局长。我们之间的这种不寻常的关系和他的期望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去改造美国的情报工作，一方面这么做，同时在与国会的牢固和积极的关系中保持和促进情报程序的完善。”

在盖茨为他自己辩护之后的一个多星期，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召开关于他的批准的最后一次会议。没有任何惊人之举。梅岑鲍姆和布拉德利说他们将投反对票；德孔西尼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人欧内斯特·霍林斯加入他们那边。霍林斯已经证明是盖茨的最能说会道的批评者之一，在听证会即将结束的某一时刻，曾经用对盖茨提名的率直评估吓了他一跳。他说：“你是个聪明的家伙，但是，你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却又被指使来解决问题……在白宫你是个非常宝贵的家伙。如果我是布什，我就请你来做，我就养尊处优了。”当盖茨为自己辩护说他“不是任何人的马屁精”时，霍林斯恼火地回答：“中央情报局局长不属于国会或总统，……那边的那一群人，苏努努和总统，认为他们拥有你。”

但是，委员会中来自博伦和萨姆·纳恩的两张最重要的票是赞成盖茨的，最后投票结果是11比4。参议院的最后投票是于11月第一个星期举行的，其结果是可以预见的：64票赞成，31票反对。根本就没有人感到奇怪，特别是在萨姆·纳恩说他投票赞成那位被提名者以后；也没有任何真正的怀疑，在情报委员会投票以后盖茨将被批准。

1991年11月12日，在桑德拉·戴·奥康瑙尔主持下，罗伯特·盖茨宣誓就职，成为威廉·韦伯斯特的继任者，乔治·布什和盖茨的妻子贝基在一旁观看。他是中央情报局第十五位局长。对于盖茨来说，那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他对情报和他对中央情报局应如何管理的坚定看法，表明他像是会立即采取行动惩罚那些反对他的提名的人。一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助手说：“查利·艾伦和其余所有的人认为，他们可以欢迎他，讨好他，但是，他们救不了他们自己。艾伦、克尔和其余那一大帮人。他将把他们全都去掉。他将大清洗。”

盖茨保证那不会发生。在他的批准听证会上的某一个关键时刻，他说他与1985年时相比已经换了个人了，他已经从观察威廉·韦伯斯特如何待人接物中学到了应该如何做。他向戴维·博伦保证：不会有惩罚，不会有清洗，不会有大规模的解雇。他将按照中央情报局的最好的传统，指导一个开放的和诚实的行政机关，并且要注意使每一个人都感到他或她有所作为。不同政见者将受到尊重和保护。

现在，在他的受命演说中，他企图平息情报局的畏惧。他说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是它最大的财富。他说，兰利的人不仅是一个团队；他们是一个

家庭。

他着重他说出家庭这个词，他最后说：“我希望这种家庭意识以及它所蕴含的一切，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得到加强。”

结束语

威廉·韦伯斯特重新回到平民生活正如他进入中央情报局时一样，作为一位新来的人，他需要他能得到的一切帮助。每天的家庭杂务具有一种新的严肃性。十多年来，作为联邦调查局局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他从来不必自己开车到哪儿去。他辞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务后一个星期，他买了一幅华盛顿市中心区的地图，从而他出门可以找到路。

看来有些矛盾，现在韦伯斯特不大愿意回答有关他在中央情报局局长任期内的的问题，当他还在情报局工作时，他倒是很愿意谈的。他似乎很欣赏他作为一名有作者亲笔签名的书籍收藏家的隐退生活。在华盛顿的社交圈子里也不大经常见到他了。韦伯斯特对他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局局长所度过的岁月不怀任何恶感。这位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继续支持作为总统的布什和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罗伯特·盖茨。

韦伯斯特承担了一份新工作，是华盛顿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上午，有时他可以被认出来，手里拿着公事皮包，像个默默无闻的人沿着K街走着去上班。可是，他的好朋友们说，这位世界上最强的国家的前间谍头子难于使自己适应他的新工作。他已经将近二十年不当开业律师了。

罗伯特·盖茨有不同的问题。他的任命所激发的仇恨和积怨，在他宣誓就职第十五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后仍然继续存在。盖茨向反对他的任命的那些人保证，不会为他们过去的行动而反过来责备他们，他就是用这种办法处理那场论战。他走进中央情报局，每到之处他都表现出一种文静的胜任的态度，在他的正常的冷淡的职业性的举止上洒下了一层新发现的同志间友谊和忠诚的意识。

变化是存在的。在标志着他的批准的那场造成不和的辩论之后，盖茨决定减弱情报局的公众形象。例如，公共关系办公室不像它当年在韦伯斯特领导下那样乐于和记者们合作了，尽管盖茨公开允诺过兰利的高级官员们可以公开对外。盖茨也注意弄确实，把那些标志着中央情报局许多看法的防止误解的说明从他的公开讲话中删去。

盖茨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刚两个月，他就指派了几个内部的工作组去研究在冷战后的世界里中央情报局的任务和作用。他经常把他们的进展情况通知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他还证实了情报局企图为一系列新问题扩大它的情报范围：核扩散，恐怖主义，反毒品，前苏联出现的诸多共和国的组成。

盖茨的稳定的手只颤抖过一、二次。例如，他被批准后不久，有一次在国会露面，这位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断然否定了那种认为1990年8月情报局曾经预报过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的看法。在兰利内部，人们普遍地把盖茨的讲话看作是第一个信号：他被批准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并没有改变他以往的习惯；只要他在场，就不能听任人们挖出中央情报局最骄傲的时刻而使布什总统难堪。在他的任命以后4个月，一项长期等待的关于情报报告政治化问题的调查研究作了结论；认为问题不是“普遍的”，而且“主要是由于人们掌握的分寸不当而造成的……”。调查这个问题是盖茨的命令，负责执行的是前情报部主任爱德华·普罗克特。苏联分析室内部的许多不满的分析工作人员们对文件的结论不予考虑，认为它太“谨小慎微”了。一位中层的近东分析人员开玩笑说，普罗克特的结论证明，情报局的客观性的时代是永远地过去了；他说，甚至普罗克特的报告读起来也像是出自盖茨的手笔。

但是，有些事确实是变化了的。1991 年底，副局长克尔退休了。他的密友们说，他很高兴离去，并且为他已经达到的成功感到欣喜。他们说，他从来没有期望能当上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他怀着一种几乎隐藏不住的惊奇之感看待他在情报局的官僚机构内部的不断提升。

托马斯·特威腾仍然是行动部副主任，但是，行动部内部的紧密结合的中央情报局全体高级官员不相信那种情况会继续很久。特威腾仍然被中层行动官员们用怀疑的眼光看作是一个比官僚还官僚的人。他们也相信，盖茨终于是会选择一个他更中意的新的行动部副主任。

在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批准听证会上出面支持盖茨之后，查尔斯·艾伦回到中央情报局他的办公桌前，继续担任他的预警国家情报官的职务。但是，正如特威腾似的，没有人相信他会一直留任到盖茨任职期满。甚至把他看作一个有原则的人的他的最亲密的副手，也为他支持盖茨的任命而批评他。当有人告知艾伦将被迫退休时，一位前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在情报局总部表达了许多人的意见。他狠狠他说：“如果那是真的，那才是完全应该得到的下场。”

理查德·斯托尔茨自从退休以后，非常注意保卫他的隐居生活。他一贯拒绝新闻界的访问，作为最守口如瓶的前中央情报局官员之一，他显然对这种生活很满足。

德韦·克拉里奇和克莱尔·乔治在他们自己在伊朗门丑闻中所负的责任方面，继续他们的漫长和悬而不决的法庭战斗。两个人始终不为他们的麻烦所屈。到 1992 年早期，许多退休的情报界官员把他们视为牺牲者，开始募捐来支持他们的法律辩护。

情报局本身与它 4 年前的模样相比，已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机构。经常性危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时世界充满了一个毫不妥协的敌人的代理人，敌人的被宣称的目的就是自由世界的毁灭。中央情报局——曾经是世界最强大和隐密的机构之一——现在是一个缩小了很多的官僚机构；它在美国人民眼中的神话式的神秘外衣，正在慢慢地和最后地被剥光。

作者的话

这本书是三年研究和写作的成果。在那段时间里，我曾经采访过大量的美国政府官员。在一些事例中，我进行了多重的访问。在几个重要的例子里，我曾经把这本书中的叙述向前政府官员们核对过，以便弄清楚我准确地反映了他们的话。这本书在出版以前未经中央情报局现职官员或其他中央情报局官员审阅。

几位同意为本书提供材料的中央情报局现职官员，只有在不提他们姓名的条件下才肯这样做。甚至一些特别了解关键性的重大事件的退休官员们，也不允许我指出他们的姓名。在这本书里，我尽我所能地给读者一个关于提供消息者以往或当前身分的清楚概念，而不泄露他的或她的姓名，在某些少量的事例中，我采用了会议上的对话。在每一件事例中，对话均经过与会者们核实或由了解信息并处于知道人们说些什么的地位的第三方面加以证实。

毫无疑问，简直没有办法非常确切他说出在每一个例子中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记忆是有错误的；场景会谈化；每个人的个人认识都带有信念的色彩。就那些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或和中央情报局一道工作过的人来说，这的确是真的。因此，每个作者要非常谨慎小心地对待别人的认识，这是义不容辞的。在这里我就试图这样做。

保守机密的要求给一个作者加上了巨大的负担——当主题像这本书的主题一样敏感时，负担就更重了。因此，当我采用的材料来自“幕后”——意思是那位提供消息者只是在有了不提他的或她的姓名的谅解之后才给我信息——进行的采访时，我只采用能被其他主要信息来源证实的材料，或根据机密文件，或根据别的提到姓名的官员们提供的材料。

简单的真相就是，不答应保守机密就几乎不可能得到关于这个主题的信息。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非常幸运地从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内部一位提供消息者那里（和另一名记者一道）得到接近大量机密材料的机会。

可是，要知道什么可以透露和什么不能泄露，这并非不可能的——什么是一个真正的秘密，什么不是。我接触了敏感政府文件，反而比我没接触时给了我更多的对这个困难问题的洞察力。中央情报局有充分的理由保守秘密；帮助这个国家的外国国民的生命就依靠他们保守秘密的能力。但是，我发现中央情报局许多其他不公之于众的秘密，是由于情报局官员们怕受到为难，或由于公布这样的秘密会给国会或白宫里的情报局保护人造成政治上的伤害。因此，关于披露什么不披露什么的盘算就不像我原来想的那样折磨人了。

我相信，冷战的结束将导致成千上万的关于以往 40 年美国外交政策的文件解密。那是应该的。消息灵通的和受过教育的全体老百姓是民主的栋梁。但是，美国情报界真正的秘密——那些向美国政府提供关键性的重要信息的外国国民的姓名——必须永远保持秘密。

